



人·民·文·库

人文科学·撰著

元朝史(下)

韩儒林 主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版式设计:陈 岩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朝史(修订本)/韩儒林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
(人民文库)

ISBN 978-7-01-005694-4

I. 元… II. 韩… III. 中国-古代史-元代 IV. K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119 号

元朝史(修订本)

YUANCHAO SHI

韩儒林 主编

陈得芝 邱树森 丁国范 施一揆
姚大力 刘迎胜 高荣盛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4 月第 2 版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60.75 插页:4
字数:78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5694-4 定价(上下册):11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山西省芮城县永
乐宫三清殿西壁
中部下层朝元图
《奉宝玉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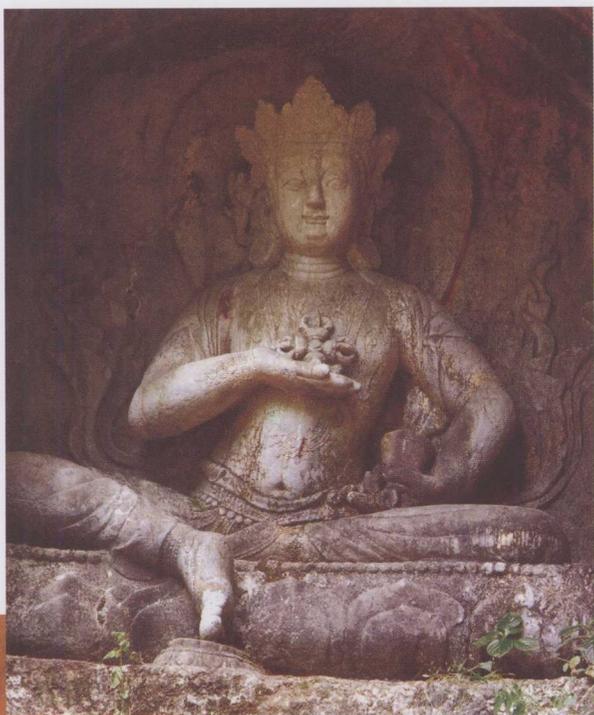
赵孟頫《人骑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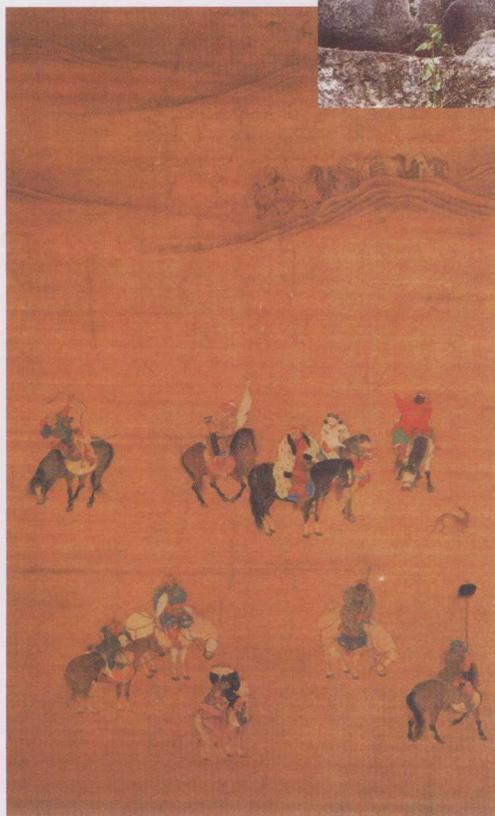
马可波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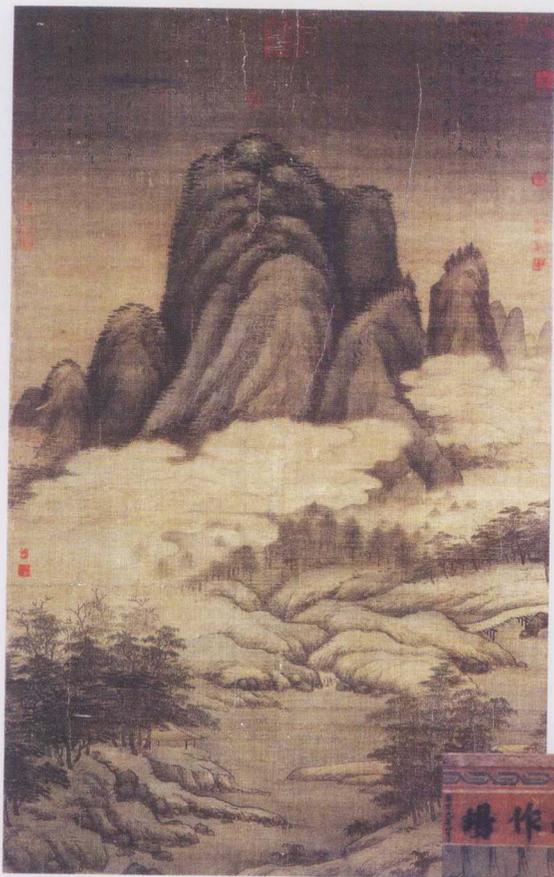
摩尼光佛



杭州飞来峰元代金刚
萨埵菩萨造像



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



高克恭《云横秀岭图》



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明应王殿杂剧壁画

第七章

元末农民大起义

第一节 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起义的准备活动

一 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

元朝统治者长期以来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最后终于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元末农民大起义就是这种矛盾激化后的必然产物。

“开河”与“变钞”是促使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红巾军起义爆发后,社会上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①

这首小令揭露了元朝黑暗统治的“人吃人”本质和“黎民怨”的社会状况,指出了“开河变钞”是酿成“红巾万千”的“根源”,讽刺了“堂堂大元”自我造成“哀哉可怜”的悲惨局面。小令的作者虽然不是站在农民起义的立场上,却是“旁观者清”,分析得入木三分。

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平地水深达二丈许,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六月,又北决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三,《醉太平小令》。

(治今山东巨野)的单州(今山东单县)、虞城(今河南虞城北)、碭山(今安徽碭山)、金乡(今山东金乡)、鱼台(今山东鱼台西)、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任城(今山东济宁)、嘉祥(今山东嘉祥)、曹州(治今山东菏泽)的定陶(今山东定陶)、楚丘(今山东曹县东南)、成武(今山东成武),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的东明(今山东东明东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的汶上(今山东汶上)等许多地方都遭受水灾。水势沿着运河北浸安山(今山东梁山县城),涌入会通河,蔓延至济南、河间(今河北河间)两路地域。黄河泛滥如此严重,受害地域如此广阔,是历史上所罕见的。

黄河大水,给沿河两岸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先是大水使农田被淹,民屋冲塌,诗人高志道写道:

屋倒人离散,风生水浪滔;
周围千里外,多少尽居巢!①

接着又是大旱,诗人迺贤写道:

河南年来数亢旱,赤地千里黄尘飞;
麦禾槁死粟不熟,长铲挂壁犁生衣。②

水灾、旱灾之后,又是瘟疫蔓延。黄河两岸的人民遭受着沉重的灾难,过着饥寒交迫、痛苦万状的生活,据估计,当时饥民的总数达到一百万户、五百余万人。余阙说:“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民罹此大困,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③。

黄河决堤后,也直接影响到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河水溢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坏两漕盐场,妨国计甚重”④。漕运和盐税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柱。通过漕运从南方各地运来大量粮食、丝绸、奢侈品;盐税收入则占政

① 《元诗选》癸之庚上。

② 《元诗选》戊集,《金台集》。

③ 余阙:《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续集》,《青阳先生文集》卷八。

④ 《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

府总收入的十分之八^①。如果漕运和盐场遭到破坏,必然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因此,当贾鲁于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提出治河方略后,立刻得到右丞相脱脱和元顺帝的批准。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四月,元顺帝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领河南、北诸路军民,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及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十八翼两万军队,到河上服役。这两万军队主要是监督河工之用的。根据贾鲁的方案,开凿自黄陵岗南至白茅、黄固、哈只口,西至阳青村,共二百八十里,为新河道,然后塞南行之旧河道,使黄河由新凿之河道至哈只口进入故道,即东去徐州,合淮河入海。

黄河泛滥后七年来,沿河两岸的贫苦农民遭受了洪灾、饥荒和瘟疫,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本来已是怨声载道,对元朝统治充满了仇恨。现在被强征为河工后,伙食和工资又遭到治河官吏的克扣,这些半饥半饱的河工,在军队的皮鞭下担负着极其沉重的劳役。他们实际上是被驱使的奴隶。怨恨、愤怒的气氛,笼罩着治河的工地。由于河工来自黄河南北的四面八方,因此,河工的怨恨和愤怒集中表现了中原地区广大受灾的劳动人民的怨恨和愤怒。

元顺帝即位后,由于对贵族、官僚滥行赏赐和宫廷的挥霍浪费,造成国库人不敷出。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右丞相脱脱准备用变更钞法的办法来解决。至正十年(一三五〇年)冬,吏部尚书偃哲笃、左司都事武祺为迎合脱脱的意图,建言变更钞法。十一月,元顺帝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②至正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开始铸造“至正通宝钱”,印造“至正交钞”,令民间通用。这次变钞的办法是:一是发行“至正交钞”,使它与“至元宝钞”并行通用,但至正交钞的

① 《元史》卷一七〇,《郝彬传》。

②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价值比至元宝钞价值提高一倍,加上宝泉提举司“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辘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①。因此,实际上形成了“钞买钞”的局面,即政府通过滥发新币的办法来搜刮民间的至元宝钞;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这样,也就形成了钱钞通行的局面。“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而惟钱之是用”^②。最后连钱也不用,“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③。在京师大都,钞十锭(每锭五十贯)买不到一斗粟。

所以,“开河”和“变钞”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当然,“开河”和“变钞”不能说就是红巾军大起义的根源,真正的根源还是“人吃人”的社会本质。宋濂等认为:“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詎无从而起乎?”^④是有道理的。

二 韩山童、彭莹玉组织起义的秘密活动^⑤

元末农民起义主力红巾军是通过宗教活动来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元人张桢说:“颍上之寇,始结白莲,以佛法诱众……”^⑥《元史·顺帝纪》也说北方红巾军的组织者韩山童出身于白莲会世家,可见,他们利用的宗教是白莲教。南方红巾军利用的也是白莲教。

①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② 王祚:《帛货议》,《王忠文公集》卷一二。

③ 《元史》卷九七,《食货志》五。

④ 《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

⑤ 本节写作时参考了杨讷《元代的白莲教》一文,见《元史论丛》第二辑。

⑥ 《元史》卷一八六,《张桢传》。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之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江苏昆山)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即白莲教。他们崇奉阿弥陀佛,只要口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茅子元依据弥陀经典,编写了《弥陀节要》,宣扬“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现前”^①,认为弥陀、净土乃是修行者明心见性的产物。白莲教的戒律,要求徒众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故其教徒被称为“白莲菜人”。由于该教教义简明易懂,在广大人民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它受到正统的天台宗僧侣的攻击,志磐在《佛祖统纪》里把明教、白莲教和宋代流行的白云宗一概称为“事魔邪党”,宗鉴在《释门正统》里说:“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逛愚俗。”

白莲教在宋亡之前就传到了北方。元朝统一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南北混一,盛益加焉。历都过邑无不有所谓白莲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②。“礼佛之屋遍天下”^③。元朝初期对白莲教采取了扶助态度,庐山东林寺受到封赏,昆山淀山湖白莲堂香火旺盛。但是,早在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年)时就有农民起义领袖利用白莲教发动反元武装起义,当年四月,江西都昌白莲教徒杜万一就曾以“五公符、推背图、血盆”等符篆发动武装起义^④。以后利用白莲教“妖言惑众”的事例不断发生。因而导致了元武宗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时白莲教被禁止,“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⑤。韩山童的祖父,可能就在这之后不久,因“以白莲会烧香惑众”,从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谪徙”广平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的。元仁宗以后,白莲教虽然恢复,有些白莲教主虽然忠于元朝统治者,但广大的

① 《庐山莲宗宝鉴》卷二,《离相念佛三昧无住法门》。

② 刘埙:《莲社万缘堂记》,《水云村泐稿》卷三。

③ 吴澄:《会善堂记》,见《永乐大典》卷七二四二引《抚州罗山志》。

④ 《通制条格》卷二八,《杂令》。

⑤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

白莲教徒仍然以各种形式不断反抗元朝的封建统治。元代流行的“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首“扶箕诗”^①,虽然很难确定是哪一教派的,但也不排斥在白莲教徒中传唱的可能,因为白莲教也被认为是“事魔邪党”。如果是这样,元代白莲教中对现实不满、追求平等的愿望是存在的。

韩山童出身于北方白莲教世家。其祖父韩学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②。至山童继为白莲教主后,开始宣传“弥勒佛下生”^③和“明王出世”^④,这就争取了更多的群众,“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⑤,并且拥有一批有能力的骨干,如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他们在宣传群众时,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倡言天下大乱”,这就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目标是十分明确的。

彭莹玉(又名彭国玉、彭翼、彭祖、彭和尚,敌人称他为“妖彭”)出身在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慈化寺东屯庄的一个农民家庭里,十岁时入慈化寺为僧,后因会治病,“袁民翕然,事之如神”,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同时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白莲教的宣传活动,组织武装起义。至元四年(一三三八年)他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动起义失败后,“逃淮西,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扶箕诗》。

② 《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

③ 同上。

④ 高岱:《宋事始末》,《鸿猷录》卷二。杨讷认为,“明王出世”出于净土宗的《大阿弥陀经》,见《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二辑。按:宋代以来的明教徒亦诵佛教《金刚经》,或非《藏经》所载的“不根经文”,如《佛佛吐恋师》、《佛说啼泪》、《大小明王出世经》、《开元括地变文》、《齐天论》、《五来子曲》之类(见庄季裕《鸡肋篇》、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九引《释门正统》)，“明王出世”似应来源于《大小明王出世经》，故立此存疑。又，各教派之间互相渗透的情况是存在的，韩山童提出“弥勒佛下生”的宗教口号，显然取自净土宗的另一教派弥勒派，而后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年)河南棒胡起义置弥勒佛小旗，又称李老君太子，看来还吸收了道教的成分。

⑤ 《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

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①。此后十余年间,他在江淮地区继续宣传白莲教,成为南方白莲教的“祖师”,他提出了“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的宗教口号,并以此组织反元武装力量。他的门徒遍及江淮地区,早期的门徒,多按白莲教的规定以“普”字命名。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起义的骨干,而且为农民大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以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为基本力量,以宗教信仰为纽带的民众团体,在元末农民起义的准备阶段,在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方面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宗教本身的派系,造成了南北两大派系始终没有统一起来,甚至各个派系内部也有不相统属、孤立分散的现象。大起义爆发后的情况也是如此。南北两支红巾军一直没有统一起来,始终是各自为战的,甚至还发生过互斗和火并,因而大大削弱了红巾军的战斗力。但宗教色彩随着起义的深入逐渐淡薄,政治斗争口号逐渐代替了宗教号召。

第二节 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和暂时挫折

一 韩山童、刘福通首义和元朝统治者的疯狂镇压

贾鲁开河后,韩山童、刘福通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一面加紧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一面又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②,同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③几个字,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等到独眼石人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消息传出,大河南北,人心浮动。韩山童等

① 权衡:《庚申外史》。

② 《元史》卷六六,《河渠志》三。

③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利用开河的机会,借独眼石人来鼓动造反,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至正十一年五月初,韩山童与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刘福通联合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颖上县^①,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等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自称南宋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②。韩山童则发布文告,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③这是假托南宋广王赵昺走崖山、丞相陈宜中走日本的故事,来达到“复宋”的目的。至于“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则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了。“贫极江南”,主要是指汉族劳动人民的贫困化;“富称塞北”,主要是指蒙古、色目贵族对土地的占有和财富的搜括。因此,汉族劳动人民反对元朝的黑暗统治,不仅具有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而且也是贫富之间,即阶级之间斗争的性质。他们还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④,表示推翻元朝,恢复大宋的决心。韩山童等人的号召,对广大汉族劳动人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是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⑤。

但是,正当起义准备举行的时候,消息走漏了,地方官派兵前来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子韩林儿逃到武安(指武安山,在今江苏徐州境)。刘福通等逃出重围,再次起兵,于五月初三(辛亥)一举攻下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由于起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元廷立即派遣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素号精悍,

① 何乔远《名山藏·天因记》载,刘福通等在白鹿庄誓告天地,按白鹿庄今地无考。《庚申外史》说刘福通等起兵地点在颍州颖上县。民间传说,刘福通起兵地点在今安徽阜阳市阜东枣庄集。

② 何乔远:《名山藏》卷四三,《天因记》。

③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④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旗联》。

⑤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善骑射”的六千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又令河南省徐左丞协同前往镇压。这三个元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赫厮军马看见红巾军势大，扬鞭高呼：“阿卜！阿卜！”（快跑！快跑！）逃跑了。于是刘福通很快占领亳州（今安徽亳州）、项城（今河南项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罗山（今河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今河南确山）等地。九月，刘福通攻占汝宁府（今河南汝宁），又克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众至十万。

在刘福通率领的红巾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全国各地纷纷起兵响应，在北方地区的主要有芝麻李（即李二）等起于徐州，布王三（即王权）、孟海马等起于湘汉流域、郭子兴等起于濠州（今安徽凤阳）。

至正十一年八月，邳州（今江苏邳县北）人^①李二（因家有芝麻一仓，饥荒时赈济饥民，故有“芝麻李”之称）与社长赵君用、樵夫彭早住及其父老彭等亦以“烧香聚众”而反，攻占徐州。未几，又占领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睢宁、虹县、丰、沛、灵璧、安丰（今安徽寿县）、泗县等地。

至正十一年十二月，王权（可能是布商，故有“布王三”之称）、张椿等攻占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今河南南阳），称“北琐红军”，未几，占领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进逼滑（今河南滑县东）、浚（今河南浚县）。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今湖北襄樊），称“南琐红军”。接着又取房（今湖北房县）、归（今湖北秭归南）、均（今湖北均县西北）、峡（今湖北宜昌）、荆门（今湖北荆门）等州。

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年）二月，定远富豪郭子兴与农民出身的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等四人起兵，攻占濠州，郭子兴等称元帅。闰三月，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来投郭子兴。

与此同时，南方各地的红巾军也纷纷起兵，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起义农民取得的重大胜利，严重威胁着元朝的封建统治。元朝统治者

^① 《庚申外史》。《元史·顺帝纪》作萧县人。

调动他们的所有武装力量,向农民起义军猛扑过来,进行残酷的镇压。从至正十一年九月至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年),北方的战争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今皖西北豫东南地区、徐州地区和南阳襄阳地区。元朝军队凭借武器装备的优势,勾结地主武装,镇压了徐州芝麻李的起义军和布王三、孟海马的北琐红军和南琐红军,因而使刘福通领导的主力红巾军受到了限制,未能进一步得到发展。

刘福通领导的主力红巾军,始终是元廷的“心腹大患”。至正十一年九月,元顺帝令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兵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十月,又加派知枢密院事老章增援也先帖木儿。十二月,元军攻陷上蔡,起义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韩咬儿被俘杀害。至正十二年三月,元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太不花攻陷汝宁,元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率数万侍卫汉军、爱马、鞑靼军屯驻汝宁沙河岸,他们为暂时的胜利所陶醉,日夜沉溺于酒色,刘福通乘其不备,偷袭元营,巩卜班战死,元军退驻项城。不久,也先帖木儿驻军沙河,巩卜班的下场使元军提心吊胆,某夜,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数万散兵逃至开封,也先帖木儿被撤职。元军经过这次不战自溃后,对刘福通起义军的围剿稍稍放松一些,而把主要力量放在镇压它的两翼——徐州地区的起义军和南阳、襄阳地区的起义军上。但是,红巾军的死敌、两支凶恶的地主武装,正在这时崛起于豫东。这就是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察罕帖木儿,畏兀儿人,其曾祖于元初开始定居河南,察罕帖木儿为沈丘探马赤军;李思齐,罗山人,为罗山县典官。刘福通起义后,他们纠集地主武装,号称“义兵”,袭破罗山,大受元顺帝的赞赏,授察罕帖木儿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府知府。后来,“义兵”进一步扩大,达万人,屯兵沈丘,对刘福通起义军是极大的威胁。

芝麻李等占领徐州后,起义军发展至十余万人,占有徐州附近的许多州县。至正十二年正月,元顺帝令逯鲁曾为淮东添设元帅前往徐州镇压芝麻李。逯鲁曾主要依靠两淮所募的三万名盐丁组成的“黄军”对徐州城进行了包围。

八月,元中书右丞相脱脱为捞取战功,亲自督制诸处军马,出师徐州。九月,徐州城破,元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芝麻李等遁走。月余,芝麻李被元军捕获,惨遭杀害^①。彭早住、赵君用等率余众逃奔濠州。脱脱命贾鲁等攻濠州,不久,贾鲁病死。五月,元兵撤离濠州。至正十三年,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权在郭子兴之上。明年,彭、赵取盱眙、泗州等地。朱元璋与之不和,分兵南略滁阳。

布王三、孟海马的北琐红军和南琐红军,也拥有起义军十万,他们活跃在南阳、襄阳及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元朝统治者自至正十二年闰三月起,先后派遣了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以及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知枢密院事老章等分几路“围剿”。五月,答失八都鲁依靠地主武装攻陷襄阳,布王三不幸被俘,北琐红军先被镇压。答失八都鲁等继续镇压孟海马的南琐红军。至正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鲁攻陷峡州,南琐红军亦被镇压。

二 南方红巾军起义和天完政权的建立

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成功后,对在江淮一带从事秘密活动的彭莹玉及其徒弟们鼓舞很大,他们认为发动起义的时刻已经来到。至正十一年八月,麻城(今湖北麻城)人、铁工邹普胜,罗田人、布贩徐寿辉等首先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发动起义。他们宣传“弥勒下生,当为世主”,烧香拜佛,起义农民头裹红巾,所以也称红巾军,共推体态雄伟的徐寿辉为主。十月,起义军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并以蕲水为都,建立了政权,国号天完^②,改元治平,徐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天完”是压倒“大元”的意思。

① 据《庚申外史》。又杨仪:《垄起杂事》载:“芝麻李之遁也,髡发为头陀僧。”

② 据新发现之《玄官之碑》,国号宋,且系于岁庚寅(一三五〇年),待考。

天完政权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它的行政机构和管军机构设置是比较完备的。行政机构设有中书省(称莲台省)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①。其军制,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职,并有管军万户府、管军总管府,统军元帅府等管军机构^②。天完政权的行政和管军设施,对于打击和镇压阶级敌人,维护社会治安,保证起义军的严格纪律和战斗力,巩固新生的农民政权,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天完政权的建立,使原来以宗教为纽带联系的南方各地的白莲教徒,现在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纷纷在天完政权的指挥下,响应起义。

天完政权建立后,南方的起义形势发展极其迅猛。为了扩大战果,起义的领袖们分兵四出,给元朝在南方的封建统治极其沉重的打击。从至正十二年正月开始,天完政权先后派丁普郎、徐明达攻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邹普胜攻克武昌、龙兴(今江西南昌),曾法兴攻克安陆(今湖北钟祥)、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中兴(今湖北江陵),欧普祥攻克袁州,陶九攻克瑞州(今江西高安),陈普文攻克吉安,周伯颜一支经江西,入湖南,抵广西,王善进攻福建。彭莹玉、项普略(又名项甲、项奴儿)一支则东去江西,到安徽,抵浙江,又折回苏南、安徽、江西,这支起义军活动范围最广,战斗最激烈,建立的功勋也最大,是天完政权初期最有代表性的起义活动。天完政权通过分攻州郡的战略,形势大变,红巾军攻城夺池,“官军多疲懦不能拒”,所在贫苦农民纷纷响应,“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屨,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③。如安徽巢湖地区的赵普胜、李普胜等,江西新淦的邓克明、邓志明,丰城的李明道,瑞州的邓南二,福建建宁的应必达,福建福安、罗源、古田县的农

^① 《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民国上虞罗氏影印本。收有天完政权颁发的“统军元帅府印”一方,印背左侧刻有“中书礼部造”,“治平四年 月 日”。可见天完政权有中书省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设,但根据起义斗争的需要,六部未必全设,或开始并未全设。

^② 参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元史论丛》第一辑。

^③ 《元史》卷一九五,《魏中立传》。

民领袖林君祥等等，他们或本身是白莲教的信徒，起兵响应；或本来不是白莲教徒，响应起义后投靠红巾军。甚至湖南、广西的少数民族也配合红巾军进行作战。因此，元朝官吏余阙也不得不承认：“余出乱中，以观南方之民，或盗至而乱，或未至而迎降”^①。

南方红巾军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这是与他们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分不开的。据记载，至正十二年四月，江西宜黄的红巾军首领涂一、涂祐，新城红巾军首领童远攻占建宁（今江西建宁）、泰宁（今福建泰宁），不久，进入邵武（今福建邵武），他们“扬旗执榜”，宣传“摧富益贫”，深受贫苦百姓的欢迎。地主分子污蔑说：红巾军首领“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氓从逆。凡窳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大掠富人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②。“摧富益贫”，这是南方红巾军领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的响亮的反封建口号。这个口号突出了一个“摧”字，即用暴力去实践他们争取社会平均和平等的主张。在“摧富益贫”的口号鼓舞下，世世代代受压迫、被剥削的“贱者”、“窳者”，挣脱了封建枷锁，“不愿为农愿为‘盗’”，纷纷参加起义，投入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中去。

彭莹玉在自己的战斗历程中，也是遵循“摧富益贫”的口号的。他无疑是南方最有权威的白莲教首领和农民领袖，在发动了后至元四年（一三三八年）周子旺起义、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徐寿辉起义两次农民起义并建立了政权后，他始终没有自己去称帝，而是浴血奋战在战斗第一线。至正十二年二月，彭莹玉率军占领江州（今江西九江），杀元江州路总管李黼。接着攻克南康（今江西星子）、饶（今江西波阳）、信（今江西上饶）。四月，挥师入安徽境，克婺源、黟县、休宁和徽州（今安徽歙县）。在这一带，主要遭遇了地主武装的拼死抵抗，其中休宁的大地主汪同、程国胜、俞茂等纠集一支“义兵”，依

① 余阙：《青阳县尹袁君功铭序》，《青阳集》卷六。

② 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黄镇成撰碑。

据山谷,控制险要,威胁很大。六月,彭莹玉、项普略率军攻破昱岭关,进入浙江。七月,在当地贫苦农民的支持下,攻克江浙行省首府杭州,元江浙行省的官员纷纷逃窜,参政樊执敬自杀。彭莹玉的军队,纪律严明,“不杀不淫”,一面继续宣传“弥勒佛出世”,号召人民参加红巾军,“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一面把府库金帛没收归红巾军所有^①。但是,红巾军在杭州并未站稳脚跟。元朝统治者决不甘心富庶的东南地区让红巾军占领,元顺帝急令江浙行省平章教化和济宁路总管董抟霄等从濠州撤围,联合江浙行省平章三旦八向杭州扑去。彭莹玉等被迫撤出杭州,退守徽州。教化、三旦八、董抟霄及当地的地主武装死死缠住不放。为摆脱敌人的“围剿”,彭莹玉等选择了北上广德(今安徽广德),进兵苏南的办法来摆脱元军。九月,红巾军攻克广德。十月,攻占常州。在常州,彭莹玉率领红巾军夺取大地主王“佛子”的钱财,发其仓廩,分给贫苦农民^②。接着又攻取江阴、宜兴、溧水、溧阳、丹阳、句容,并遣军向集庆(今江苏南京)试探。这时,元军已麇集集庆周围,在这样的形势下,红巾军再留在苏南是不利的,彭莹玉不得不再次返回徽州。但徽州已经失守,项普略被俘牺牲,彭莹玉在巢湖水师赵普胜的支援下再克徽州。至正十三年春,徽州失守,彭莹玉只好退到江西瑞州(今高安)。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包围瑞州,彭莹玉等红巾军首领全被捕杀^③。

除了彭莹玉这支起义军遭到镇压外,其他各支红巾军后来也遭到了暂时挫折。徐寿辉建立政权并占领武昌后,元顺帝调遣南方各省军队从四面八方来“围剿”起义军,其中以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等蒙古、色目贵族最为凶狠,他们“贷富人钱,募人为兵”^④,利用汉族地主武装,共同对红巾军血腥镇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八,《刑赏失宜》。

② 谢应芳:《王佛子行状》,《龟巢稿》卷一九。

③ 正德《瑞州府志》卷一一,《遗事志》。此书彭莹玉作彭国玉。

④ 《元史》卷一四四,《星吉传》。

压,致使红巾军占领的许多城市得而复失。特别彭莹玉战败牺牲后,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到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南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及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等联合进攻天完的都城——蕲水,蕲水终于陷落,天完政权的四百多名官员惨遭屠杀,徐寿辉等被迫“遁入黄梅山中及沔阳湖中”^①。

蕲水的失守,使南方红巾军起义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起义活动一度处于低潮。连响应徐寿辉、彭莹玉起义的拥有百万之众的巢湖水师也受到了影响。

彭莹玉长期在江淮一带秘密传教,组织武装起义队伍,所以,至正十一年八月彭莹玉领导的蕲州起义爆发后,“江淮人多应之”^②。巢湖周围主要有三支较大的起义军:一支是赵普胜领导的,一支是金花姐和李普胜(即李扒头)领导的,一支是左君弼领导的。其中左君弼领导的一支于至正十四年攻占庐州,以后就没有多大发展,并投降了元朝,后来又归附朱元璋;金花姐和李普胜一支活动范围较广,其部下有余廷玉、俞通海父子,廖永安、廖永忠兄弟等,金花姐牺牲较早,这支起义军由李普胜领导并与赵普胜合作;赵普胜一支则势力最大。

赵普胜,巢县(今安徽巢县)人,善用双刀,故号“双刀赵”。蕲州起义爆发后,赵普胜以巢湖为根据地,积极发展水军,势力很大。彭莹玉率军攻克江、饶、徽、信等地后,赵普胜则出师南下,与之配合。至正十二年春,赵普胜的水军先破无为(今安徽无为),威胁繁昌(今安徽繁昌西北),占领铜陵(今安徽铜陵)、池州(今安徽贵池),进而围攻安庆(今安徽安庆)。元廷急命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等调兵堵截赵普胜的起义军,但元军遭到惨败,赵普胜占领了湖口(今江西湖口)、彭泽(今江西彭泽)一带,并夺取了安庆。到

① 权衡:《庚申外史》。

② 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二,《俞通海传》。

至正十二年底,赵普胜的军队,已“号百万”^①。然而,由于彭莹玉的失败和天完都城的陷落,赵普胜不得不退到巢湖,与李普胜等结水寨自保。

南方红巾军最初三年的活动经过了一个起伏,虽然由于元朝统治者和汉族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遭到了暂时的挫折,牺牲了一位像彭莹玉这样坚强的农民领袖,但是,战果是十分辉煌的。农民军打击和摧毁了许多地方政权,“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自浙西、江东西、湖南北,以及闽、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②，“红军……纵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钜镇,诸侯王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浚隍、长戟强弩之所守,环辄碎之,鲜有固其国者”^③;打击和消灭了一批地主富豪,“自红巾窃发,士大夫不幸死于难者多矣”^④,农民军“荡折其室庐,剽夺其玉帛”^⑤,迫使他们“窜身岩石之下,屏迹田野之间”^⑥;教育和动员了广大群众,“庐井细民涵濡至治之泽,不知自爱,故凶徒扬煽其说,甘心没溺不辞”^⑦。所以,成果是巨大的,挫折是暂时的,红巾军在失败中取得教训,得到了锻炼,准备着未来的战斗。

三 方国珍、张士诚起兵反元和其他农民起义

韩林儿、刘福通、徐寿辉、彭莹玉等发动了南北红巾起义后,全国各地响应起义的“无虑千百计”^⑧,其中大部分后来都归南北红巾军建立的政权所统辖。此外,还有大小不等的其他农民起义,他们不以红巾为号,不信奉白莲教,也不属于南北红巾军建立的政权管辖。在这些起义队伍中,以张士诚、方国珍两支

① 《元史》卷一四四,《星吉传》。

② 余阙:《合肥修城记》,《青阳集》卷三。

③ 余阙:《青阳县尹袁君功铭并序》,《青阳集》卷六。

④ 《永乐大典》卷六六九七,册六四,页二九。

⑤ 宋濂:《华巢公神道碑》,《宋学士文集》卷三,《翰苑前集》卷三。

⑥ 梁寅:《赠徐大章序》,《石门集》卷二。

⑦ 周霆震:《义兵万户玛哈穆特安塘生祠记》,《石初集》卷一〇。

⑧ 解缙:《故元邵武同知萧公墓志铭》,《解学士文集》卷九。

最强大,活动范围最广,但这两支起义军的领导人表现很不好,时降时反,他们的队伍很快变质了。

方国珍,名珍,又叫谷珍,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①。至正初,黄岩人蔡乱头起义发生后,元发兵追捕,祸及平民。至正八年(一三四八年)春,方国珍怨家陈氏诬告方国珍与蔡乱头构通,方国珍怒杀陈氏,官府追捕,方国珍“大恐,屡倾资贿吏,寻捕如初”^②,出于无奈,只好和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及邻里惧祸逃难者逃入海中,聚集数千人,劫夺漕运粮,扣留元海运官员,谋起反来。元廷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前往镇压。朵儿只班兵败被俘。方国珍起兵本来是出于报复私仇,并无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意识,因此,被俘获的朵儿只班成了方国珍向元朝伸手要官的一张王牌。当时,方国珍迫其上书朝廷下招降之诏,元顺帝怕海运受阻,下诏授方国珍庆元定海尉,方氏兄弟也都捞了一官半职。方国珍回到家乡后并未解除他的武装,“势亦暴横”^③。此后,元廷和方国珍双方进行了一次又一次交易,方国珍凭借自己控制的军队,要价越来越高;元朝政府则一怕影响漕运,二怕他与红巾军相联结,所以既羁縻他,又要解除他的武装,因而就出现反复无常的情况。

至正十年十二月,方国珍又入海“烧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二月,元命江浙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泰不华夹击,方国珍俘获孛罗帖木儿,“国珍兄弟复授官有差”。十二年三月,因“汝颖兵起,元募舟师守江”,方国珍怀疑,又入海反元,杀泰不华。十三年,方国珍使人潜入京师,赂诸权贵,于是元又授以徽州路治中,方国璋广德路治中,方国瑛信州路治中,但方国珍仍在海上活动。所以,从至正八年到十四年,方国珍的两面手法已经表现得很充分了。

① 据《明太祖实录》卷八八。一说方国珍出身佃户,因杀田主而起义(见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傅维麟《明书》等)。按此说与方国珍自称及明初史料不符,今不取。

② 《明太祖实录》卷八八。

③ 同上。

张士诚，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以操舟运盐为业”^①。因平时受富户欺凌及弓兵丘义的多次“窘辱”，怀恨在心。至正十三年正月，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张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杀丘义及诸富户，招集“苦于官役”的盐丁，起兵反元，乘胜攻下泰州，“有众万余”，连克兴化、高邮。

张士诚和方国珍一样，他起兵反元，并没有推翻元朝黑暗统治的决心，因此，在元朝统治者“剿”、“抚”两手面前，渐渐败下阵来。占领泰州后，元曾多次招降，当时还未投降。占领兴化后，元朝又遣高邮知府李齐招降，“士诚因请降，行省授以民职，且乞从征讨以自效”^②。他的投降之心已暴露了出来。不久又反。至正十四年正月，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

至正十四年九月，脱脱在镇压了徐州芝麻李起义后，又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出征高邮。元兵号称百万，连“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③。十一月，元兵把高邮围得水泄不通。“城中几不支，日议附降”^④。张士诚在元军的压力面前，又一次准备投降。但“又恐罪在不赦”^⑤，不敢投降。高邮正危在旦夕的时候，在大都的元中书右丞哈麻弹劾脱脱“老师费财”，元顺帝下令削脱脱兵权和官爵，并将脱脱流徙于云南大理镇西路，后被哈麻鸩死于云南。另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领其兵。由于临阵易将，元军哗然，“大军百万，一时四散”^⑥。张士诚则乘机出兵，大败元军。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

② 《元史》卷一九四，《赵璘传》。

③ 《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

④ 《庚申外史》。

⑤ 同上。

⑥ 同上。

高邮战役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百万元军,临阵溃散,从此元朝军队丧失了对农民起义军的优势,而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镇压农民起义军;农民起义军则利用元朝在高邮战役中的失败,重新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从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开始,进入了元末农民战争的新时期。

除了上述方国珍、张士诚的反元武装力量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在今山东地区,至正十二年有长山县(今山东邹平东)的张虎山起义,拥有起义军万余人,不久被镇压^①;邹平县(今山东邹平)有马子昭起义,也被捕杀^②。在今湖北地区,至正十一年有郟县(今湖北郟县)田端子起义,“聚众杀官吏”,也被镇压^③。在今陕西地区,有金花娘子起义^④;在今江苏地区,至正十五年连续在平江(今江苏苏州)、无锡、常熟、昆山发生小规模起义,其中在平江的起义军曾从新丰杀入平江城内,后被镇压^⑤。在今浙江地区,至正十二年徐寿辉天完政权的红巾军由江西入福建,转战浙东,退走后,浙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并未停止过。在温州一带,“山谷之民亦相聚为寇,残毁州治”^⑥。至正十四年还发生了温州戍卒韩虎、陈安国“杀主帅据城叛”的事件^⑦;在平阳一带,“四境之内胥而为盗者十六七”^⑧。至正十五年爆发了李师、金翁瑞、金安三、吴邦等人领导的起义^⑨;在丽水,起义军“杀官吏,焚府库,蔓延至永康”^⑩。在青田,至正十六年潘惟贤、华仲贤等率起义军攻克龙泉县,遂昌周天觉等响应,“势连结

① 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四,《宦迹》。

② 《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

③ 《元史》卷一九五,《李罗帖木儿传》。

④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⑤ 顾瑛:《君臣同庆乐送因万户》,《玉山璞稿》。

⑥ 陈高:《陈君惠泽记》,《不系舟渔集》卷一二。

⑦ 王祚:《故参军缙云郡伯胡公行述》,《王忠文公集》卷一八。

⑧ 苏伯衡:《参知政事周公墓志铭》,《苏平仲文集》卷一二。

⑨ 同上。

⑩ 宋濂:《故义士胡府君塘铭》,《宋学士文集》卷一三,《翰苑后集》卷三。

不可遏”，次年被镇压^①。在福建地区，至正十二年南方红巾军在王善率领下，直捣福州，王善牺牲后，这支红巾军虽然失败了，但仍然有小规模起义发生。至正十三年春，在南胜就有几百名起义者攻占城邑^②。在今江西地区，红巾军在这里的战斗是最激烈的，响应起义的也最多。至正十五年，当天完政权遭到暂时挫折，南方起义处于低潮时，江西地区爆发了黄濂举、黄濂靖弟兄领导的起义，不久亦被镇压^③。在今四川地区，至正十二年也爆发了泸州（今四川泸州）王世昌的起义^④。在今广东地区，至正十三年南海（今广东广州）邵宗愚率众起义，自称元帅，后曾攻占广州，与地主武装头目何真发生过多次争夺^⑤。至正十五年东莞人王成、陈仲玉起义，至正二十二年惠州王仲刚等占领惠州起义，均被何真镇压^⑥。

与此同时，各地的少数民族也纷纷起兵响应红巾军起义。至正十二年，南方红巾军进入湖南，攻克常宁（今湖南常宁），后被地主武装夺去，耆同洞苗民再度克占，地主武装继续结寨顽抗，被红巾军将领罗甲击败^⑦。同年，红巾军将领周伯颜由江西入湖南，又攻入广西，各地贫苦农民及少数民族纷纷响应，大墟人苏德智就曾联合瑶民攻打城邑^⑧。在广东新兴也发生过汉人与少数民族“屯聚山林”，联合起义的情况^⑨。此外，不堪元朝残暴统治的少数民族也单独起兵举行武装斗争，如至正十二年在广西钦州（今广西钦县）僮族黄圣许再次发动起义，攻占钦州及灵山、安远二县^⑩；同年，湖南苗族峒长向思永

① 苏伯衡：《参知政事周公墓志铭》，《苏平仲文集》卷一二。

② 林唐臣：《送邵武司司察冯公之官序》，《林登州遗集》卷八。

③ 宋濂：《张府君新墓碣铭》，《宋学士文集》卷一二，《翰苑后集》卷二。

④ 《永乐大典》卷二二一七，册一六，页一一。

⑤ 雍正《广东通志》卷六，《编年》；《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九。

⑥ 《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四引黄佐撰《何真传》。

⑦ 王祎：《刘焱孙传》，《王忠文公集》卷二一。

⑧ 《永乐大典》卷二三四三，中华书局影印本，册二四，页一八。

⑨ 苏伯衡：《宋君墓志铭》，《苏平仲文集》卷一三。

⑩ 嘉靖《钦州志》卷九，《历年志》。

起兵反元^①；至正十四年，湖南耒阳（今湖南耒阳）瑶民进攻衡州，杀元万户许脱因^②；至正十八年广东苗族金元祐及瑶族刘文远联合反元^③；同年，湖南麻阳（今湖南麻阳西）也发生了苗族起义^④。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了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各族人民是一贯互相支持、互相同情的，他们为祖国历史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三节 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展和失败

一 宋政权的建立和失败

宋政权的建立

元朝百万军队在高邮溃散后，元末农民战争的整个战局发生了有利于农民起义军的变化。北方红巾军从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开始主动出击，范围进一步扩大。

元朝统治者对刘福通率领的主力红巾军仍然采取“围剿”和堵截的战术。至正十五年一月，元顺帝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洪丑驴守河南，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述律朵儿只守潼关，宗王扎牙失里守兴元（今陕西汉中），陕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温沙守商州（今陕西商县），通政院使朵来守山东，企图形成对刘福通起义军的包围圈，在这包围圈里，让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元军对农民军进行屠杀。后来又不断增兵，加强对红巾军的“围剿”。但这个战术很快就遭到了失败。

为了进一步联络、调遣北方各支红巾军，建立牢固的政权中心，至正十

① 乾隆《湖南通志》卷一一九，《人物》一三。

② 《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

③ 《元史》卷一九五，《朵里不花传》。

④ 乾隆《湖南通志》卷一〇五，《名宦》一〇。

五年二月，刘福通将韩山童子韩林儿从碭山夹河迎至亳州（今安徽亳县），正式建立北方红巾军的政权——宋，改元龙凤，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小明王”则是“明王出世”的标志，表示光明已经来临，黑暗势力即将驱逐。

宋政权的建置与天完政权类似。中央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六部。当时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刘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由于杜遵道擅权，未久为刘福通杀，刘福通为丞相，后来又封为太保。随着各支起义军的发展，宋政权还设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等地方行政机构。管军机构也逐步完善起来，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其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①。

宋政权建立后，元朝军队进一步加紧了对红巾军的镇压。至正十五年六月，答失八都鲁被提升为河南行省平章，率领原属太不花的诸王藩将兵马，进攻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为刘福通所击败，答失八都鲁退至中牟（今河南中牟），红巾军劫其营，夺其辎重，并俘获答失八都鲁子孛罗帖木儿。但这支红巾军又遭元军刘哈喇不花部伏击，辎重及孛罗帖木儿得而复失。刘福通遣赵明达攻取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河之北大为震动。但察罕帖木儿自豫南赶来，赵明达战败。同时，答失八都鲁又调兵向宋政权的都城——亳州进犯，刘福通在太康（今河南太康）失利，元兵进围亳州，韩林儿避兵于安丰。次年三月，刘福通与元军激战于亳州，答失八都鲁大败退走，亳州得安。

至正十六年九月开始，刘福通为了分散元军对宋政权都城亳州的压力，扩大战果，开始分兵出击，遣李武、崔德经潼关入陕，毛贵入山东。十七年夏，由于毛贵在山东的战果辉煌，刘福通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即三路北伐。以毛

^① 参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元史论丛》第一辑。

贵为主力,由东路进攻大都;以关先生、破头潘一支为中路,绕道山西,转攻河北,形成对大都的包围;李武、崔德的西部军由于在陕西受阻,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前往支援。可惜这一战略没有取得成功。

李武、崔德等率领的西路军

李武、崔德率领的西路军最先出兵。至正十六年九月,西路红巾军取潼关,连克陕州、虢州(今河南灵宝),扼淆函。答失八都鲁急调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追击,李武、崔德折往晋南,攻取平陆(今山西平陆东南)、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察罕帖木儿又急追而来,红巾军战败,队伍溃散。

至正十七年初,李武、崔德又重整队伍,出兵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二月,又夺取七盘,进据蓝田(今陕西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同时,又分兵攻克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诸州。元廷对于红巾军这一突如其来的神速行动大为震恐,陕西省台也连连告急。元廷不得不又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喇不花等由陕州、潼关进攻陕西红巾军。当时陕西省台各级元官,“汹惧无言”,奉元也处在“旦夕失守”的境地^①,但察罕帖木儿等已经赶来,红巾军只好放弃进攻奉元的计划。

是年闰九月,刘福通决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陕,他们入陕后,夺取兴元路(今陕西汉中),又克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进据巩昌(今甘肃陇西)。是年十月,红巾军攻凤翔(今陕西凤翔),察罕帖木儿往援,红巾军失利。十八年,一部分西路红巾军在李喜喜等率领下进入四川,称“青巾”,后被徐寿辉部将明玉珍逐走,李喜喜不得不率部到武昌,投奔陈友谅^②。留在陕、甘、宁一带的李武、崔德等曾于十九年攻占宁夏路(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等地。二十年五月,李武、崔德等向李思齐

^① 《元史》卷一八三,《王思诚传》。

^② 高岱:《鸿猷录》卷二,《延揽群英》。

投降。

毛贵率领的东路军

东路是由红巾军的著名将领毛贵率领的。毛贵原是赵君用的部将^①。至正十四年濠州解围后，赵君用、彭早住东去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盱眙（今江苏盱眙），据安东州（今江苏涟水），与董抟霄战于北沙、庙湾、沙浦等砦，败元军于泗州。至正十六年三月，驻守扬州的地主武装“青军”在其头领张明鉴率领下逐镇南王孛罗普化而据其城，孛罗普化逃奔淮安。不久，由盐丁组成的“黄军”又反。十月，赵君用联络青军和黄军攻克淮安，杀镇南王孛罗普化等元官。宋政权在此置淮安等处行中书省，以赵君用为平章。毛贵为其部下，赵君用可能命其攻取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由于元将也速来攻，毛贵夺取海船，率军由海道进入山东^②。

至正十七年二月，毛贵取胶州（今山东胶县），杀金枢密院事脱欢；三月，取莱州（今山东掖县），又打死元山东宣慰使释嘉讷。接着又从海道克军事重镇——益都路（今山东益都），益王买奴逃窜，又下滨州（今山东滨县北）；四月，克莒州（今山东莒县）。毛贵在仅仅二个多月的时间内就攻克了山东许多州县，这对于在豫、皖地区作战的刘福通、在曹州的盛文郁是很大的支持。元朝统治集团则惊恐万状，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及董抟霄等出兵镇压毛贵，命答失八都鲁出兵曹州，镇压盛文郁。同时，又取监察御史脱脱穆而计，从太不花、答失八都鲁等三处军马内，择其精锐守河北。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响应毛贵起义，攻克济宁路（今山东钜野），未久被元义兵万户孟本周夺去，田丰被迫出走，转战济、濮（今山东济宁、鄄城、

^① 据《庚申外史》：“分淮安赵君用（以上五字《宝颜堂秘籍》本、《学海类编》本无，《学津讨原》本有）部将毛贵兵，合田丰趋大都”；《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淮东贼毛会逼都城而退”。

^② 《元史》卷一四二，《也速传》：“讨贼海州，大败之。贼走，航海袭山东，尽有其地。”

河南范县一带),后又占领济宁。是年冬,在棣州(今山东惠民)的元义兵千户余宝也杀知枢密院事宝童,宣布起义。这时,元朝派往山东镇压农民起义的元军总指挥是太尉纽的该,他一直龟缩在东昌(今山东聊城),田丰曾多次与他作战过。

十八年正月,田丰攻克南北漕运的枢纽——东平路(今山东东平),元朝的南北漕运从此中断。同时,毛贵在益都西南的好石桥击败孛兰奚,孛兰奚退至济南,毛贵乘胜于二月初攻克济南。至此,山东各地大部分已为毛贵、田丰所占领。

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毛贵为平章。为了把山东建设成北伐的基地,毛贵设立了“宾兴院”,选用以前的元官,并派姬宗周等为地方政权的官吏,还颁发了铜印^①,以维护地方的秩序。同时,毛贵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②。可见,毛贵是十分注重生产建设的。

是年二月,毛贵开始挥师北伐,他亲率起义军进入河北。当时董抟霄方驻兵南皮(今河北南皮)之魏家庄,元顺帝为嘉奖董抟霄屠杀红巾军的战功,升其为河南行省右丞,这时毛贵兵已至,这个双手沾满红巾军鲜血的刽子手终于被红巾军所杀。接着毛贵兵攻克清(今河北青县)、沧(今河北沧州东南)二州,据长芦镇,三月,克蓟州(今天津蓟县),至灤州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通县境内),元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毛贵兵进逼京师大都。时“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輿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纷”^③。可惜毛贵只是孤军深入,其他各支红巾军并未配合。当时元廷召四方军队来援,毛贵又在柳林败于刘哈喇不花,不得不退师济南。这次北伐尽管没有成功,却是红巾军的

① 现发现的益都行省颁发的铜印有“津宁县印”一方。

② 《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

③ 《元史》卷一八八,《刘哈喇不花传》。

一次重要演习,大灭了元朝皇帝的威风,大张了起义农民的志气。十九年四月,从淮安来山东奔毛贵的赵君用,竟杀了毛贵。七月,毛贵部将续继祖从辽阳回益都,再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各部由于自相仇杀,从此一蹶不振。但罪魁祸首是赵君用。

在毛贵出师北伐的同时,田丰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先后夺取了东平、济宁、东昌等地。另一支由王士诚率领,从益都出兵配合关先生、破头潘的中路军,占领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晋宁路(今山西临汾),后又折回山东。这时山东大部分虽为红巾军占领,但由于毛贵被杀,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田丰、王士诚两部较大,田丰称花马王,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

至正二十一年(一三六一年)夏,察罕帖木儿开始向山东红巾军发动进攻。冠州(今山东冠县)、东昌相继失陷。八月,察罕帖木儿遣其子扩廓帖木儿及其将阎思孝、关保、虎林赤由东阿(今山东东阿南)造浮桥渡河,田丰率二万人夺桥未成,长清(今山东长清)陷落。元军进攻东平,田丰将崔世英战败,东平被围。察罕帖木儿一向是以“剿”、“抚”两手来对付红巾军的。他知道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理”^①,田丰投降,元授田丰山东行省平章职。察罕帖木儿还令田丰为前锋,先后招降了守棣州的余宝、守东平的王士诚、守东昌的杨诚,进而围攻济南。同时南陷泰安,北攻济阳、章丘,东略沿海州县,济南的红巾军在坚守了三个月后,由于叛将刘珪的出卖,于是年八月落入敌手。察罕帖木儿因镇压红巾军有功,升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十月,察罕帖木儿进围益都,毛贵原部将陈獠头等坚守。次年六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重返红巾军队伍,进入益都城。扩廓帖木儿袭其父职,继续围攻益都。十一月,益都陷,田丰、王士诚被杀,陈獠头俘送大都。接着莒州亦陷,山东的红巾军至此全部被镇压。

关先生、破头潘率领的中路军

^① 《元史纪事本末》卷二五,《察罕帖木儿克复之功》。

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即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等率领。这支军队原来是属于宋政权的丞相盛文郁领导的。龙凤三年初，盛文郁占领曹州（今山东菏泽），与在山东其他地方作战的毛贵相呼应。这年夏天，刘福通决定三路北伐，以毛贵为主力、以山东为基地进攻大都，关先生等为中路军，逾太行，入山西，形成对大都的包围。这一路军的任务显然是为了配合毛贵进攻大都的。

至正十七年八月，刘福通率领的中央红巾军首先占领大名路，继克卫辉路（今河南汲县）。九月，由曹州红巾军组成的中路军逾越太行山，取泽州之陵川（今山西陵川），杀县尹张辅，又克高平（今山西高平）。闰九月，占领潞州（今山西长治），接着进攻重镇冀宁路（今山西太原）。当时察罕帖木儿在这一带驻有重兵，红巾军又退入太行山。

至正十八年春，毛贵率军进入河北，锋芒直指大都。为配合进攻大都的战略计划，并加强中路军，这年二月，毛贵遣其部将王士诚、续继祖等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路，杀元怀庆路总管王得贞。三月，王士诚等攻占晋宁路，杀元总管杜赛因不花。这时，在山西的中路军，势力大增，决定分兵二路：一支攻绛州（今山西新绛）；一支由沁州（今山西的沁县）出发，攻冀宁、大同（今山西大同）等地。

中路红巾军的胜利进军，使元廷十分恐慌。当时由于攻克大都的计划没有实现，已经退守山东，使各地应征入卫大都的元军得以退回原地镇压当地的红巾军，于是，察罕帖木儿又抽调很多兵力用来对付中路红巾军。五月，察罕帖木儿遣董克昌攻陷冀宁，遣关保、虎林赤等追击晋南的红巾军。六月，关先生、破头潘攻克辽州（今山西左权），察罕帖木儿派虎林赤追击。关先生、破头潘又转西攻取冀宁路。九月，关先生等攻保定路（今河北保定），不克，转而攻克定州（今河北定县）。由于元军在晋、冀的兵力还很强，中路军的主力转向晋北，原拟由山西入河北，与毛贵军会合的计划未能实现。

是年十月，关先生等由定州向西，占领大同，又北向进攻兴和（今河北张

北)等路。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等攻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上都为元朝建立前忽必烈经营汉地之基地,宪宗六年(一二五六年)起,忽必烈开始大规模营建。中统五年(一二六四年),因“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元世祖以后的历代元朝皇帝差不多年年要巡幸上都,所以红巾军占领上都,焚毁其宫阙,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接着,关先生等又攻破全宁路(今内蒙古昭盟翁牛特旗),焚鲁王宫府。又夺取辽阳行省所在辽阳路(今辽宁辽阳),杀懿州路(今辽宁阜新东北)总管吕震,并以此为基地,准备进攻高丽。元左丞相太平遣其子也先忽都儿总兵攻辽阳,“太平意谓关先生、破头潘……军常无留行,其破辽阳,必不能久居,可以取辽阳,功成其子。至,则关、潘军日治战马,一无退意。也先忽都儿畏之,缩留不前,竟溃而归”^①。

红巾军为什么要进攻高丽呢?这是与高丽王氏统治集团的政治态度有关的。元末农民战争期间,高丽的统治者是恭愍王,他和其他高丽的贵族一样,都是与蒙古皇室通婚的,恭愍王就是元朝皇帝的驸马,因此,在对待元末农民起义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政治态度与元朝统治者完全一致,对农民起义军十分仇视。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年),脱脱率百万大军镇压高邮张士诚,遣使去召高丽的军队,高丽王派左政丞柳濯、大护军崔莹等四十余人,率兵数千前来助战,又纠集在华的高丽人达二万三千人,为脱脱之前锋。脱脱罢官,元军大败后,柳濯、崔莹等还助元进攻泗、和等州,守淮安,围六合^②。充当了帮凶角色,而元顺帝等蒙古贵族在元政权行将崩溃的时候,也把高丽当作他们的避难所,早就命令高丽统治者替他们“营宫耽罗,欲为避乱之计”^③。由此可见,红巾军出兵高丽正是为了进一步打击元朝封建统治。

至正十九年(一三五九年)二月,红巾军致书高丽王:

① 《庚申外史》。

② 见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一一,《柳濯传》;卷一三,《崔莹传》;《东国通鉴》卷四六,《恭愍王》一。

③ 《高丽史》卷四〇,《恭愍王》三。

“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今诸将严戒士卒，毋得扰民，民之归化者抚之，执迷旅拒者罪之。”^①

十一月，红巾军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毛居敬率红巾军众四万攻占义州、静州、麟州、西京（今朝鲜平壤）。同年正月，红巾军战败于西京，退走。三月，红巾军从海路攻高丽西北沿海诸州，旋退去。至正二十一年九月，红巾军在关先生、沙刘二、破头潘等率十余万红巾军渡鸭绿江攻朔州。十一月攻占抚州、安州，并占领了高丽的京城开京（今朝鲜开城），迫使恭愍王逃奔福州（今朝鲜安东）。到至正二十二年正月，安祐、李芳实、崔莹、李成桂等围攻开京，红巾军为其所败，关先生、沙刘二等战死，余众在破头潘率领下败退辽阳。四月，破头潘在辽阳被俘。

中路军在进军高丽的同时，二十年由汤通、周成率领的一支红巾军曾攻克大宁路（今内蒙昭盟宁城东北），为元将也速战败，汤通、周成牺牲。由雷帖木儿不花、程思忠率领的一支红巾军曾占领永平路（今河北卢龙）及其附近州县，后亦被也先等镇压。王士诚则继续出没于晋冀，后败于台州（今山西五台），退至山东东平，与田丰合。二十二年六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后在益都被扩廓帖木儿所杀。以后的情况，前文已有所述。

北方红巾军的最后失败

至正十七年九月，刘福通分兵进攻山东、陕西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元朝统治者为了镇压起义军，不得不把大批军力派往山东，红巾军最凶狠的敌人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也被牵制在陕西。这样，刘福通亲率的中央红巾军解除了元军的压力，开始出击。

十八年六月刘福通攻汴梁。汴梁是北宋的首都，北方红巾军以“复宋”为

^① 《高丽史》卷四一，《恭愍王》四。

号召,因此进攻汴梁,对于推翻元朝封建统治是有很大号召力的。但当年并未攻克。八月,刘福通等转攻大名路,克之,继克卫辉路。于是豫北、冀南广大地区均为刘福通占有,形成了对汴梁的包围圈。当时,太行山以东的豫北、冀南地区,元朝派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驻守,答失八都鲁曾多次败于红巾军之手,面对强大的红巾军,他自知必败,因而不得不求元廷增援。元廷增派知枢密院事达理麻失里来援,结果元军大败,达理麻失里战死,答失八都鲁被迫退驻石村。由于屡战败北,答失八都鲁于是年底忧愤死去,子孛罗帖木儿袭其职,总领其军,退驻井陘(今河北井陘西)。

十九年五月,刘福通再次发动对汴梁的进攻。元汴梁守将竹贞逃遁。这样,北方红巾军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于是将汴梁定为宋政权的都城,韩林儿也从安丰迁来。这时,北方红巾军起义出现了鼎盛局面。《元史》载:“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①。

红巾军的节节胜利,促使敌人内部发生分化。这年七月,原河南行省平章、怀庆路守将周全向宋政权投降。周全将其军队准备渡河向汴梁靠拢,驻守在洛阳的察罕帖木儿派其将伯帖木儿守碗子城,以阻周全。周全杀伯帖木儿,进入汴梁。刘福通又命令周全攻洛阳,周全兵至城下,见城坚不可攻,畏惧退兵,为刘福通所杀。

由于毛贵孤军深入大都,失败退据山东;关先生、破头潘攻保定失利,未能与刘福通的中央红巾军和毛贵的东路军会合,只好远去塞外,进军辽东;李武、崔德的西路军也远在宁夏、灵武等地;三路北伐的目的没有达到,形势发生了逆转。敌人对宋政权的“围剿”则愈益加剧。由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率领的两支实力很强的元军,对宋政权的包围进一步紧缩。察罕帖木儿本来是驻守在陕西的,由于西路军失利,元朝只留下李思齐的部队,驻守在陕甘一带,

^① 《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

察罕帖木儿的部队进驻山西；由于中路军北上，察罕帖木儿又将部队进驻澠池（今河南澠池），“北塞太行，南守巩、洛”。到至正十九年七月时，察罕帖木儿又移军洛阳，周全攻洛阳失败后，察罕帖木儿更加紧了对汴梁的包围。孛罗帖木儿则竭力切断汴梁与山东的联系，拼命进攻曹州。是年十月，曹州陷落，红巾军首领武宰相、仇知院牺牲。至正二十年初，孛罗帖木儿还北上代州（今山西代县）、丰州（今内蒙呼和浩特东）、云内（今内蒙土默特左旗东南），驻守大同，以切断中路军与汴梁的联系。这样，宋政权的处境极其危急。

同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归、亳、陈、蔡，北路出汴东，置战船于黄河内，略曹州南，据黄陵渡，又发陕西、山西各路元军，把汴梁包围得水泄不通。八月，汴梁城破，刘福通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汴梁城内数万红巾军及宋政权官吏、家属被俘。

汴梁失守后，退守在安丰的宋政权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名义上仍节制诸军，如“李武、崔德以西略地无功，福通责其逗留”^①；多次加封朱元璋的官职；至正二十二年九月，刘福通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派兵增援遭到扩廓帖木儿围攻的田丰军^②。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早已占领了濠州的张士诚，趁安丰空虚之机，遣其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安丰城中处境十分艰难，“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③。小明王韩林儿不得不遣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击败吕珍和前来助吕珍的、原属南方红巾军系的庐州左君弼，救出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④。后来，小明王和刘福通被安置在滁州，到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将廖永忠迎归小明王和刘福通至应天，途经瓜步，将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沉入水

① 《鸿猷录》卷二，《宋事始末》。

② 《元史》卷四六，《顺帝纪》九。

③ 《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④ 权衡：《庚申外史》；刘辰：《国初事迹》。

中溺死^①。在这之前,朱元璋名义上仍然奉龙凤为正朔,小明王撤到滁州后,还封朱元璋为宋政权中书右丞相。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其纪年仍用龙凤,榜文命令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

二 天完政权的重建和倪文俊、陈友谅的篡权

天完政权的重建和倪文俊的篡权

天完政权都城蕲水失守后,南方红巾军起义处于低潮。但红巾军领袖们和广大红巾军战士并未丧失信心,而是积极恢复和组织力量,以等待时机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元斗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已发现的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年)颁发的“统军元帅府”铜印得到证实。这方铜印证明了天完政权当时有自己的根据地,并继续在委任各级将领。

元军在高邮大败后,天完政权乘机吸收了一部分元军,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当时,“(元军)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②。在重建天完政权方面倪文俊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倪文俊,黄州黄陂(今湖北黄陂)人,渔民出身。蕲黄起义爆发后他起兵响应,任统军元帅。至正十五年正月,倪文俊率领红巾军占领沔阳。同月,又在汉川(今湖北汉川)鸡鸣仪与元坐镇武昌的威顺王宽彻普化之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及元帅阿思监所率领的水军激战,倪文俊用火筏尽焚敌船,获得大胜,接待奴、佛家奴、报恩奴均败死。三月,倪文俊遣扫地冯取襄阳;五月,倪文俊克中兴(今湖北江陵),杀元帅朵儿只班;七月,攻克武昌、汉阳,俘获威顺王子歹帖木儿及王妃等。

倪文俊虽然在战场上立了不少战功,但是,胜利使他产生了骄傲,产生了

^① 据《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引《通鉴博论》。一说“小明王、刘太保至瓜州渡,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小明王俱亡。”见《庚申外史》。一说刘福通战死于安丰,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② 《庚申外史》。

贪婪的权力欲，终于在敌人的腐蚀诱惑面前，走上了背叛农民起义的道路。当倪文俊占领武昌，俘获威顺王的子女、王妃后，元顺帝“特降诏招抚”^①，诱以官、禄，倪文俊乘机要价，竟向元朝统治者求为湖广行省平章。由于双方讨价还价未成交，倪文俊便杀了威顺王诸子。元顺帝招降不成，只好派兵镇压。八月，命答失八都鲁调湖广行省左丞卜兰奚守御蕲黄；十一月，命太不花为湖广行省左丞相，总兵湖广，剿杀红巾军。但南方红巾军仍先后攻克岳州（今湖南岳阳）、饶州、徽州等地。

至正十六年正月，天完政权据汉阳为都，以倪文俊为丞相，改元太平^②。

天完政权重建后依然分兵四出。二月，在徽州的红巾军破昱岭关入浙江。三月，天完红巾军复取襄阳；同月，倪文俊克常德（今湖南常德）。五月克澧州（今湖南澧县）、辰州（今湖南沅陵），八月克衡州（今湖南衡阳），十二月再克岳州。至正十七年二月，倪文俊又破峡州，占领鹿卢关。

早在至正十五年初南方红巾军开始出击时，巢湖水师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赵普胜、李普胜等结寨于巢湖后，因与左君弼有矛盾，行动受到牵制，故急欲寻求同盟，以取得出路。这年春天，朱元璋自滁阳（今安徽滁县）取和州（今安徽和县），因城内乏食，准备渡江取采石，但苦于无舟楫。赵普胜、李普胜欲与朱元璋合作，但因李普胜谋杀朱元璋未遂，反被朱元璋杀了，赵普胜就率领部分水师投奔天完政权了。另一部分巢湖水师则在俞廷玉父子、廖永安弟兄等率领下投奔朱元璋，从此巢湖水师发生分裂。

赵普胜离开巢湖后即进驻枞阳（今安徽枞阳），并南下夺取池州、青阳等地，至正十六年曾两次围攻军事重镇安庆，杀元怀宁县达鲁花赤伯家奴。

十七年九月，倪文俊再也按捺不住他的篡权野心，准备谋杀徐寿辉而篡夺

①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② 关于“太平”年号，史书并无记载。现据已发现的太平二年“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及“太平通宝”钱推算，徐寿辉建都汉阳后，改元太平，当属无疑。

帝位,结果没有成功,自汉阳逃奔黄州,被其部将陈友谅所杀。

汉政权的建立和陈友谅的蜕变

陈友谅也出身在沔阳的渔民家庭,本姓谢,因赘于陈氏,故改姓陈,曾在县衙里担任过贴书之职。因不满元朝统治,与其弟友仁、友贵等聚众起义,蕲黄起义爆发后,投奔徐寿辉,充任倪文俊部下簿椽,因作战有功,渐被重用,升任统军元帅。倪文俊杀徐寿辉未成,逃奔黄州,反被陈友谅杀,倪文俊的部下都归陈友谅指挥。

当时南方的红巾军形势是很好的,今鄂、湘、皖、浙的许多地方都在天完政权的控制下,天完的另一将领明玉珍也进军四川。陈友谅夺得军权后,把重点放在东南地区。十七年底,陈友谅沿江直捣小孤山,大败元军,又与天完在饶州的守将祝某联合援助正在围攻安庆的赵普胜。这样,三路起义军大举攻城,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年)正月,安庆城破,余阙以下元将十余人被杀。安庆处长江北岸,形势扼要,治平四年卜颜帖木儿就是依此过望江、小孤山、江州直达蕲水的。现在天完政权控制了安庆,巩固了在汉阳的政权中心,并有利于它在南方的发展。陈友谅离开安庆后,乘胜连克龙兴、瑞州、邵武、吉安、抚州、建昌、赣州、汀州(今福建长汀)、信州、衢州(今浙江衢县)等路。这时,天完政权力量大增,成为南方各支起义军中拓地最广、实力最强的武装力量。

陈友谅和倪文俊一样,也是一个权迷心窍的人。杀了倪文俊后,陈友谅的权力欲也进一步滋长了,因而开始了谋杀徐寿辉的罪恶计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除掉唯一可与他匹敌的赵普胜。当时据守安庆的赵普胜力量也很大,虽然与东边的朱元璋常在池州、青阳、石埭(今安徽石台东北)一带发生摩擦,但互有胜负,陈友谅也很担心赵普胜会和朱元璋合作。至正十九年九月,赵普胜与朱元璋将徐达战于无为、潜山,不利,陈友谅以此为借口,诈与赵普胜会军,在安庆杀了赵普胜。是年底,陈友谅又逼迫徐寿辉徙都江州,并阴险地伏杀了徐寿辉的部属,自称汉王。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挟徐寿辉攻占太平,终于杀了徐寿辉,建汉政权,改元大义,自称皇帝,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

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兼知枢密院事。

陈友谅杀徐寿辉，篡夺天完政权，标志着代表起义农民利益的天完政权已经失败，由逐渐向封建割据转化的汉政权取而代之。而陈友谅杀赵普胜、徐寿辉是很不得人心的，“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①。不少赵普胜、徐寿辉的旧部纷纷离去。陈友谅虽然貌似强大，实际上已是日益虚弱了。

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后不久，即是年闰五月，准备从江州顺流而下，直取集庆，一举消灭朱元璋。同时，派人勾结张士诚，企图东西夹击，但张士诚吃过朱元璋的苦头，慑于朱元璋的兵力，未敢出兵。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朱元璋政权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②。朱元璋采取了刘基的意见，用计胜陈友谅。

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曾是陈友谅的故友，朱元璋利用这一点，叫康茂才致书陈友谅，愿作内应。这边朱元璋已作好圈套，陈友谅果然自投罗网，双方战于龙湾，陈友谅大败，战舰搁浅，死者无算，逃到江州，朱元璋乘胜攻下太平，占领安庆、信州、袁州。而赵普胜的旧部张志雄，徐寿辉的旧部、驻守袁州多年的欧吉祥，都因不满陈友谅的倒行逆施，投降了朱元璋。陈友谅的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守将于光也投降了朱元璋。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企图进行反扑。五月，派李明道攻信州，李明道被朱元璋守军俘获。七月，派张定边攻占安庆，八月，被朱元璋军夺回。朱元璋乘胜亲率大军攻下江州，陈友谅逃奔武昌。这年，陈友谅部将守饶州的江西行省平章吴宏、守建昌（今江西南城）的江西行省平章王溥、守龙兴的江西行省左丞相胡廷瑞等都以城降朱元璋。

二十二年，陈友谅又进行反扑。三月，派熊天瑞攻占吉安。五月，又占领

① 《明太祖实录》卷九。

②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安庆。但未久又被朱元璋夺回。这一年，陈友谅的部将投降朱元璋的就更多了，如吉安的孙本立、曾万中、曾粹中，龙泉的彭时中等。

这样，到二十三年前，陈友谅的处境越来越不妙，“疆土日蹙”，众叛亲离，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明玉珍入川和夏政权的建立

明玉珍，随州（今湖北随县）玉沙村人，“家世以农亩为业”^①。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南北红巾起义爆发，当地富豪为维护自身利益，推明玉珍为屯长，组织地主武装，以结寨自保。至正十三年冬，徐寿辉派人招降明玉珍，明玉珍投奔天完政权，徐寿辉授予统军元帅之职，领所部镇守沔阳。

至正十五年春至十七年，明玉珍常率兵万余，驾斗船五十艘，沿江而上，去夔州（今四川奉节）贸粮。时四川元军薄弱，只有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及左丞哈麻秃所部镇重庆，且两人不和。明玉珍决定出兵四川，“据上流，保荆襄，开粮道，一举三得”^②。太平二年秋，明玉珍占领重庆，完者都逃窜，哈麻秃被擒后送往汉阳报捷，徐寿辉授明玉珍陇蜀省右丞。

至正十八年二月，明玉珍攻克嘉定，杀完者都。至正二十年，明玉珍占领成都。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称汉帝，并要明玉珍出兵助陈友谅攻建康的朱元璋，明玉珍不理，派莫仁寿领兵守夔州，“不与相通”，且怒曰：“汝能为帝，我岂不能帝耶！”又立徐寿辉庙于重庆城南，“春秋奉祀”^③。次年，明玉珍称陇蜀王。他在文告中宣称：“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翦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灭凶徒，幸尔坐收全蜀，此乃天意。……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弗取恶招尤”^④。从这番表白中可以看出：明玉珍不仅大

① 杨学可：《明氏实录》。年代据刘祜《玄官之碑》。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肆咒骂李喜喜的“青巾”，而且把自己的目的说成是“复见中华文明之化”，渐渐地把四川当作他的割据之地了。后来，又请元进士刘楨为参谋，“朝夕侍讲书史、裁决政事”^①。并于二十三年正月建夏政权，改元天统，自称皇帝。他在即位文告中进一步宣称“志欲除暴救民”^②。夏政权仿周制，设六卿，以戴寿为冢宰，万胜为司马，张文炳为司空，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吴友仁、周兴为司徒，刘楨为宗伯，置翰林院，地方则府置刺史、州置太守、县为县令，废释老二教，上奉弥勒，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③。

至正二十三年冬，明玉珍命万胜领兵出汉中（今陕西汉中），攻刺踏坎，元普颜达失平章逃遁。次年春，明玉珍命万胜领兵攻云南，屯兵金马山，万胜率十二万人由界首入，邹兴由建昌（今四川西昌）入，芝麻李由八番（今贵州境）入。二月，万胜率军攻克云南省首府中庆路（今云南昆明），元梁王孛罗及官吏逃走。由于邹兴、芝麻李二支军队没能跟上，万胜于是年四月退走。至正二十四年，万胜攻兴元，围城三日，不克而还。以后明玉珍就很少出兵，而重于防守。

二十五年，明玉珍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院，邹兴等为平章、参政，分兵驻守成都、保宁（今四川阆中）、夔州、通江（今四川通江）、播州（今贵州遵义）、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黔南等地。这时陈友谅已经败亡。

二十六年春，明玉珍病死。临死前，他对群臣嘱咐道：“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④。子明升即位。自后夏政权就完全成为割据政权了。

① 杨学可：《明氏实录》。

②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③ 《明氏实录》。

④ 同上。

三 朱元璋队伍的壮大

朱元璋,原名重八,又名兴宗,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父朱五四租田耕种兼卖豆腐。朱元璋小时替地主放牛,生活十分艰苦。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春,淮河两岸瘟疫流行,朱元璋父、母及长兄相继去世。十七岁的朱元璋不得不入皇觉寺为僧,不久又被方丈打发出门“化缘”,过了三四年游方僧生活后又回到皇觉寺。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等在濠州起义后不久,朱元璋就参加了这支红巾军。

贾鲁病死,濠州解围后,朱元璋领兵攻五河,取定远,攻怀远、安丰,后定远被元兵包围,朱元璋突围取含山、灵璧、虹县等地。

朱元璋很注意自己军队的建设。在战争过程中,逐渐组成了一支由素质较好、出身较苦、勇敢善战的淮西人组成的军队。至正十三年六月,朱元璋到家乡钟离“倡农夫以入伍”^①,招募了七百多人,其中徐达、邵荣、周德兴等人都是朱元璋幼时相好,出身都很贫苦,这些人和后来陆续投奔朱元璋的邓愈、常遇春、胡大海等,朱元璋的亲属李文忠、朱文正、养子沐英等,以及巢湖水师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廖永忠、廖永安弟兄,桑世杰、张德胜等人,都是朱元璋起义军的骨干,有了这样一批骨干,有了自己的一支队伍和郭子兴的旧部、巢湖水师,就构成了朱元璋队伍的基础。在这过程中虽然不断吸取地主武装,但领导权不在地主分子手里,地主武装经过改编后逐渐融合在红巾军的队伍里,所以,朱元璋的队伍在前期基本上保持了红巾军的本色。

至正十三年冬,朱元璋有了自己的一支队伍后,开始南略定远。至正十四年春得驴牌寨“义兵”三千,六月得横涧山“义兵”二万(原为七万,“悉加训练”、裁汰后剩二万)、得洪山寨“义兵”数千,于是在定远时兵至数万人。七月,克滁州。这时,赵均用、彭早住也东略泗州、盱眙。郭子兴从泗州到滁州,

^① 朱元璋:《御制皇陵碑》。

朱元璋把部队交郭子兴管辖。朱元璋由镇抚升为总管。

至正十四年十一月，脱脱领元军包围高邮，分兵围六合（今江苏六合），滁州危急。后高邮元兵溃散，滁州也安全了。朱元璋乘机攻克和州。

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病死。四月，宋政权任命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郭子兴妻弟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从此，这支起义军正式归宋政权统辖，直到至正二十六年（一三六六年）韩林儿死为止，朱元璋“用龙凤纪年，旗帜等色尚赤”^①。

是年五月，朱元璋因和州缺粮，准备南渡长江夺太平（今安徽当涂），正好巢湖水师李普胜、赵普胜要与朱元璋合作，但李普胜企图杀朱元璋而合并其军队，不料反被朱元璋灌醉后投入江中淹死了，于是赵普胜逃归徐寿辉，巢湖水师大部分为朱元璋所有。六月，朱元璋军取采石、太平，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为元帅，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作令史。一批儒士开始得到重用。

渡江取太平后，朱元璋下一步的打算就是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早在两年前，定远人冯国用就向朱元璋建议：“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②占领太平后，陶安也说：“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③于是决定进攻集庆。七月，张天佑攻城失败。九月，郭天叙、张天佑再次攻城，由于投降过来的“义兵”元帅陈野先叛变，生擒郭、张二帅给元集庆守将、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福寿，郭、张二帅被杀。至正十六年三月，朱元璋亲率水陆大军，三攻集庆，城破，杀福寿等元将，元水寨元帅康茂才投降。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接着，朱元璋分兵克镇江、金坛。

① 高岱：《鸿猷录》卷一，《定鼎金陵》。

② 《明史》卷一二九，《冯国用传》。

③ 《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七月,宋政权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金。不久,宋政权又在应天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以朱元璋为平章。

当时,朱元璋虽然有了应天这个牢固的基地,也有了以应天为中心的周围一些城镇和地区,但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南有元军,处境还是比较困难的。针对这样的形势,朱元璋采取了巩固东、西战线,出击东南的战略,取得很大成效。

与张士诚的接触是从至正十六年六月开始的。这时张士诚已在平江称周王,势力达到镇江,而镇江已在这年六月为朱元璋所占领。朱元璋为了稳住自己的脚根,派了杨宪去平江与张士诚通好,并致书张士诚云:“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①但张士诚自恃兵多将广、实力雄厚,拘留杨宪,出兵镇江,结果在龙潭大败,退守常州。朱元璋乘胜包围常州,俘获张士诚的张、汤二将。形势对张士诚很不利。十月,张士诚请和,愿“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斤为犒军之资。”^②朱元璋得书后寸步不让,致书张士诚,责怪道:“开衅召兵,实由于尔”,“浮言夸辞,吾甚厌之”^③。于是增兵克常州。至正十七年又克长兴(今浙江长兴)、泰兴(今江苏泰兴)、江阴、常熟,在常州俘获张士诚弟张士德。直到至正二十七年(一三六七年)朱元璋大举进攻张士诚前,双方战争规模不大,并互有胜负。

与徐寿辉部的接触,是从巢湖水师分裂后开始的。至正十八年初,陈友谅、赵普胜进据池州,与朱元璋军在青阳、石埭、潜山一带有所交锋。赵普胜被杀后,陈友谅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朱元璋上。至正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沿江而下,攻池州,不胜,转攻太平,朱元璋守将花云、朱文逊等战死。陈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

② 同上。

③ 同上。

友谅在采石杀了徐寿辉、做了皇帝后，就顺流而下，东取应天，在龙湾遭到
大败，逃到江州，朱元璋乘胜取太平、安庆。其部将于光、欧普祥降于袁
州，吴宏降于饶州、王溥降于建昌、胡廷瑞降于龙兴。陈友谅越来越孤
立了。

朱元璋对东南地区元朝控制的范围也发动了进攻。至正十七年，朱
元璋命邓愈、胡大海克徽州、休宁，进攻婺州（今浙江金华），击败杨完者
率领的苗军。九月，朱元璋命费子贤取武康（今浙江德清西）。十月，命
缪大亨取扬州，“青军”张明鉴投降。至正十八年六月，邓愈、胡大海取浦
江（今浙江浦江）；十一月，朱元璋亲征婺州，十二月克之。至正十九年，
朱元璋命邵荣攻湖州（今浙江湖州）。五月，宋政权升朱元璋为江南行省
左丞相。八月，命常遇春攻衢州，九月克之。十月，胡大海克处州。至正
二十年五月，胡大海克信州。至此，朱元璋的部队在皖南、浙江地区占
领了许多城市，稳住了南方阵地，从而对西线陈友谅采取了一系列
进攻。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朱元璋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一方面，在形式上他
还臣属于宋政权；另一方面，他的独立倾向日益明显。至正二十一年，小明王
封朱元璋为吴国公，但是朱元璋的作战部署和政策措施已不受宋政权制约了。
早在至正二十年陈友谅进攻应天时，朱元璋就采纳了刘基的下述主张：“士诚
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
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①所以从至正
二十年以后，朱元璋把主要力量放在西线，只是在至正二十三年五月鄱阳湖大
战前夕，由于张士诚派吕珍进攻安丰，朱元璋为了救小明王，不得不亲率大军
北去救援，这时“疆土日蹙”、日子很不好过的陈友谅，为了挽救败局，发动了
鄱阳湖大战，朱元璋的统一事业也进入了新阶段。

^①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四 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投降活动

投降变节的张士诚

元军在高邮大败后，张士诚乘机出击，高邮转危为安，队伍也大大扩大。至正十五年，淮东大饥，张士诚决定渡江南下，于是占领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入福山港，占领常熟。至正十六年二月，攻克平江路，改平江为隆平府，政权机构自高邮迁到隆平，以李行素为丞相，弟张士德为平章，蒋辉、潘元明为左右丞，史文炳为同知枢密院事，周仁为隆平府太守。接着，分兵攻克常州、松江、湖州；七月，攻杭州，元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迺逃遁。张士诚的势力逐渐扩大。

这时朱元璋的军队已经攻占了集庆，势力向东伸张，两军相峙于镇江。踌躇满志、得意忘形的张士诚，根本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朱元璋遣杨宪为使与张士诚通好，被张士诚拒绝。双方交战后，张士诚军先败于龙潭，后败于常州，不得不向朱元璋求和，反遭朱元璋讥讽。至正十七年，朱元璋连克长兴、常州、泰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德也在常熟为朱元璋军擒获。“于是，士诚北有淮海，南有浙西，江阴、长兴二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大湖口，陆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诉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指朱元璋军）有，士诚侵铁路绝”^①。张士诚在战场上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造成战场上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张士诚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

如前所述，张士诚集团起兵反元后不久，就表现出动摇、投降的政治倾向。当年渡江南下，是听了江阴地方一个投降元朝的朱英“盛陈江南土地之广，钱粮之多，子女玉帛之富”^②，才决定的。所以到了平江后，这个集团的头目，多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

^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

追求享受，“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①。他们本无推翻元朝统治的决心，“士诚之志无日不在泰州、高邮”^②。张士诚所向往的，就是满足于做一个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周政权移到平江后，就专门“设学士员，开弘文馆”^③，搜罗地主知识分子和元朝旧官吏为其服务。于是一批旧官吏、地主分子、反动儒生像蝇营狗苟那样，纷纷前来投靠，“张氏继陷姑苏，浙以西震恐，有官资者多趋附之”^④。张士诚对这一一些人，一律重用，“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趋之”^⑤。当张士诚与朱元璋不和，屡战屡败后，在张士诚周围的这批旧官吏、政客、儒生，都劝其投降元朝，其参军俞思齐尤其卖力。张士诚自己也感到“势穷力迫”，甘愿接受元朝“招安”，特派周仁“亲诣江浙省堂，具陈自愿休兵息民之意”。至正十七年八月，元顺帝封张士诚为太尉，“士诚以下，授爵有差”^⑥，终于背叛了农民起义。

张士诚降元后，在军事上继续与红巾军为敌；在政治经济上，拼命为摇摇欲坠的元朝反动统治打气输血；而他们自己则更加腐朽堕落，完全成了一伙新地主分子。

为了扭转被朱元璋包围的被动局面，张士诚从至正十八年开始，曾多次进攻常州、江阴，均遭失败；朱元璋为了进一步紧缩对张士诚的包围，曾于至正十八年十月克宜兴，廖永安率水军入太湖，被张士诚军俘获，囚死，朱元璋还多次进攻杭州、湖州、绍兴等地，也未得手。但双方对诸暨的争夺很激烈。至正十九年正月，胡大海克诸暨；六月，张士诚将吕珍决水堰灌城，吕珍败退；次年九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

③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

④ 徐一夔：《邹君墓志铭》，《始丰稿》卷三。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

⑥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

月又来攻城；至正二十二年三月，张士信率军再次攻城，又未能占领。所以到至正二十三年前，双方在江南地区基本上仍维持原来的形势。但是，张士诚趁宋政权三路北伐，造成苏北、鲁南空虚之机，其势力扩张到济宁，甚至连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亦被张士诚占领。

对于摇摇欲坠的元朝反动统治，张士诚也是为其输血打气的。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江南地区的起义军，湖北有徐寿辉，安徽有朱元璋，江苏有张士诚，三支起义军把元朝统治拦腰一刀，南北切断了。余阙曾经惊呼过：“江南不定，中原殆难独守，则朝廷不能独安！”^①特别是张士诚控制的苏南地区，本是元朝政权的财源和粮源，据长谷真逸的统计，元统至元年间，政府从江浙一带搜刮的金、银、钞、丝、绵、布帛等为总收入的一半，粮占四分之一^②。张士诚、方国珍造反后，元朝政权发生财政危机，海运粮也中断，至正十八、十九年京师大都发生了大饥荒。至正十九年九月，元朝不惜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以征其海运粮。从至正二十年开始，至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和方国珍，一个出粮，一个出船，每年海运粮十一万石至十三万石，从而延长了元朝的反动统治。

张士诚一伙也是新生的地主分子。他们占据平江、特别是投降元朝后，更加贪婪地追求财富和享乐。他们“无不志在良田美宅”^③，“诸公经国为务，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天起第宅，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④。张士诚“经岁不出门，不理政事”^⑤，终日与一批地主文人、官僚谈古论今，舞文弄墨，其弟张士信，有“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珠金玉翠，极其丽饰，园中采莲舟楫，以沉

① 余阙：《上贺丞相书》，《青阳集》卷五。

② 长谷逸真：《农田余话》卷上。

③ 乾隆《苏州府志》卷一〇，《田赋》三。

④ 长谷逸真：《农田余话》卷上。

⑤ 同上。

檀为之”^①，简直与元顺帝不相上下；其婿潘元绍，“娶美娼凡数十”^②。其他将领也多十分腐化堕落。所以，张士诚政权的权力实际上操纵在一些旧官吏和政客的手里，“士诚兄弟，骄奢淫侈，懈于政事，又谄于断制，权为元吏所窃”^③。

至正二十三年三月，乘着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十分衰弱的情况下，张士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派吕珍围攻安丰。朱元璋闻讯亲往救援，吕珍败退，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救出后安置于滁州。朱元璋退兵后，张士诚军队再次占领安丰。张士诚进攻安丰，致宋政权败退滁州，是其长期与红巾军为敌、投降元朝的必然结果。

两面三刀的方国珍

元末农民起义过程中，方国珍的表演可谓丑恶之极。两面三刀、诡计多端、朝秦暮楚，样样都干得出来。

从至正八年（一三四八年）到十四年六年间，方国珍已有三次造反、三次投降的丑恶历史。至正十五年后，其表演更为充分。至正十六年三月，方国珍又投降元朝，被封为海道运粮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方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次年八月，元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并奉命征讨尚未降元的张士诚，双方战于昆山，方国珍大胜。正好这时元朝接受张士诚的乞降。张士诚“乃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于是两境之民稍息”^④。两个降元者握手言好。后来，方国珍依然据有温、台、庆元等处，虽然有的元官很不服气，但“朝廷方倚重国珍，资其舟以运粮”^⑤，也莫可奈何。

至正十八年底，朱元璋的军队已经东下衢州、婺州，逼近方国珍割据的温、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

② 《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引《铁崖咏史乐府》。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

④ 《国初群雄事略》卷八，引《秘阁元龟政要》。

⑤ 《元史》卷一八八，《迈里古思传》。

台、庆元诸路。十二月，朱元璋遣蔡元刚至庆元招降方国珍。“国珍与其下谋曰：‘方今元运将终，豪杰并起。唯江左号令严明，所向莫敌。今又东下婺州，恐不能与抗。……莫若姑示顺从，籍为声援，以观其变。’众以为然”^①。次年正月，方国珍遣使奉书献给朱元璋黄金五十斤，白银百斤及其他礼品；三月，又以温、台、庆元三郡之地献朱元璋，并以其次子方关为质；九月，朱元璋授方国珍为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方国璋为行省右丞，方国瑛为行省参政，方国珉为江南行枢密院佥院，并“令奉龙凤正朔”^②。但方国珍本来就不是真心实意投降朱元璋的，现在虽然受了朱元璋的封职，却“心持两端，觊伺成败”。提出借口，“不奉正朔”，“姑以至正为名”^③。

果然，这个诡诈多端的两面派在地主政客刘仁本、张本仁等人的怂恿下，接受朱元璋封职才一个月，就又接受了元朝封他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官职。并于至正二十年开始，到至正二十三年，每年派大批海船，运送张士诚的十余万石粮到元大都去，元顺帝大为赞赏，封他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方国珍依然在庆元、温、台一带作威作福。但又害怕朱元璋来攻，只好伪装“惶惧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④，耍尽了两面派手腕。

第四节 朱元璋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和北伐的胜利

一 南方割据势力的消灭

陈友谅的败亡

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后，其政权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在政治上，他已丧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

② 同上。

③ 刘辰：《国初事迹》。

④ 《明史》卷一二三，《方国珍传》。

失反元斗争的目标,勾结张士诚,把矛头直指朱元璋起义军;在生活上,十分腐化奢侈,他有成群的后宫妃妾,精致华丽的宫中器物,睡的是镂金床,玩的是珠宝器,和张士诚一伙一样,完全成了新生的地主分子。

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四月,气急败坏的陈友谅,竭尽全力,作灭亡前的最后一次挣扎,举兵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于是爆发了历史上著名鄱阳湖水战。

为了进行这次战争,陈友谅特制了数百艘大舰,“舰高数丈,外饰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艖数十其中,上下人不闻相语,艖箱皆裹以铁。”并选择了朱元璋军北上救援小明王尚未回师的时刻,兵号六十万,“载其家属百官,空国回来”^①。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洪都城原来紧靠赣江,朱元璋考虑到靠江容易受水师进攻,将城墙改建为去江岸三十步。这次陈友谅来攻,大舰无法靠城墙,只好登岸围城,洪都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他率军死守了八十五天。与此同时,陈友谅还攻占了吉安、无为等地。七月,朱元璋亲率二十万大军来救,陈友谅退至鄱阳湖迎战。

当时双方的兵力,陈友谅拥兵六十万、大舰数十艘,朱元璋只有二十万,用的是小船。陈友谅虽然在人力、物力上占绝对优势,但有利中寓有不利因素:他的战舰用铁索连在一起,转动不便,朱元璋战船虽小,却机动灵活。更重要的是,陈友谅戕主篡权,大失人心,他“唯知巨舰,未知军心枢怯”^②,内部士气是很糟糕的;而朱元璋的部队则是上下一心,士气高涨,准备决死一战。

战争的胜负,除了武器和参战人员的多寡外,还决定于作战双方的指导能力。朱元璋看准了陈友谅的弱点,一开始就采用火攻。七月二十一日,双方激战于鄱阳湖,开始陈军占优势,后朱元璋利用风势发火炮,焚毁陈友谅舰二十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② 同上。

余艘，死伤惨重，朱元璋军亦有伤亡。二十二日，朱元璋命敢死勇士驾满载火药等易燃物的小舟，冲向敌阵，乘风纵火，陈友谅舰船被焚数百艘，陈友谅弟友仁、友贵及许多重要将领皆被焚死。经过二十三、二十四日两天激战后，陈友谅不得不败退草鞋山。

这次激战后，朱元璋一方面派出伏兵，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堵住陈友谅的归路；一方面又展开舆论攻势，派人致书陈友谅，重申联合对敌的主张，又要陈友谅“听我指挥”，陈友谅“得书怒，留使者不遣”^①，准备为敌到底。然而，兵败如山倒的形势已经不可挽回，甚至连陈友谅的左右二金吾将军也率所部向朱元璋投降。

八月，陈友谅由于“粮绝势困”，“进退失据”，准备逃奔武昌，二十七日，陈友谅在向湖口突击时中矢死。张定边等乘夜用小舟载陈友谅尸及子陈理逃回武昌，立陈理为帝。

至正二十四年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理请降。至是陈友谅建立的大汉割据政权归于灭亡。

张士诚被消灭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遣吕珍攻陷安丰，逼走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四月，朱元璋诸全守将谢再兴向士诚投降。以后，陈友谅又出兵攻洪都，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这时朱元璋兵力不能东来，张士诚日子好过了一些，就乘机对元朝进行要挟。

这年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请求元朝批准，元朝不准；元朝向其要粮，张士诚不予。此后，他与元朝断绝了关系。

至正二十四年八月，张士诚为了进一步在江浙地区建立割据的独立王国，逼迫元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木儿让位给其弟张士信，达识帖木儿无奈，只好移居嘉兴，不久被鸩杀。张士信当了江浙行省左丞相后，只顾寻欢作乐，过着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荒淫无耻的生活，一切政事全由黄敬天、叶德新、蔡彦文三个文人办理，老百姓十分气愤，编了一首十七字歌谣来讥讽张士信等人：“丞相作事业，专用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①不愿和张士诚合作的文人杨维桢也在诗中写道：“大兄（指张士诚）垂旒不下堂，小弟（指张士信）秉钩独当国。山阴蔡药师（指蔡彦文），云阳叶星卜（指叶德新），朝坐白玉堂，夜宿黄金屋。……机务托腹心，边筹凭耳目”^②。张士信不仅任用亲信，而且排除旧将，致使统治集团内部更加腐败。“及士信用事，疏间旧将，夺其兵柄，由是上下乖疑，不肯用命。凡兵出遣将，当出者或卧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厚赐之，始起任事，至军则载妓女歌舞，日命游谈之士酣宴博弈，及丧师失地而归，士诚亦不问，或复用为将。其威权不立如此”^③。张士诚的倒行逆施和割据政权的腐败，使其统治区的人民十分痛恨。当地人民在没有彻底认识张士诚的面目前，由于对元军特别是杨完者的苗军恨之入骨，曾有过“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④的民谣，现在却完全不同了。至正二十三年冬，张士诚为了增加农业收入，曾修常熟白茆塘，老百姓编了一首民歌：“好条白茆塘，只是开不全，若与开得全，好与西帅歌战船”^⑤。西帅是指朱元璋。可见张士诚统治区的人民心向着朱元璋，恨透了张士诚这伙人。

在这两年里，张士诚曾企图利用朱元璋攻打陈友谅的机会，突破朱元璋在江南地区的包围圈，曾派谢再兴攻东阳、李伯升率六十万军队第四次夺诸暨、张士信攻长兴，都未获胜。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年）二月，又派李伯升、谢再兴第五次攻诸暨，又遭失败。到这年十月，朱元璋开始了对张士诚的全面进攻。

① 刘辰：《国初事迹》。

② 《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引《铁崖咏史乐府》。

③ 《明太祖实录》卷二〇。

④ 姚桐寿：《乐郊私语》。

⑤ 《国初群雄事略》卷七。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的战争,采取了“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其羽翼,然后转取浙西”^①的策略,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占领张士诚在苏北、淮河流域的地盘;第二阶段是占领江南地区的城镇,形成对平江的包围;第三阶段是围攻平江。

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朱元璋发布文告,指责张士诚“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道”^②。令徐达、常遇春、胡廷瑞、冯国胜、华高等出兵规取淮东、泰州等处。到至正二十六年四月,先后攻占了泰州、通州、兴化、盐城、高邮、淮安、濠州、徐州、宿州、沛县、邳州、安丰等地,全部夺取了张士诚在苏北和淮水地区的占领区。

这年五月,朱元璋在夺取了苏北向江南进军前,发表了《平周檄》,这篇檄文虽然仍用“皇帝圣旨”和“龙凤”年号,却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指责张士诚,文中对红巾军进行了百般攻击和污蔑,标志着朱元璋已公开背叛农民起义,所以对张士诚的战争从性质上讲,已演变为封建统一战争。

八月,朱元璋令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二十万攻张士诚。朱元璋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作出了如下进攻方略:“士诚起盐贩,与张天骥、潘元明等皆强梗之徒,相为手足,士诚苟致穷蹙,天骥辈惧其毙,心并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势,而遽攻姑苏,若天骥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合,难以取胜。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援兵疲于奔命,羽翼既拔,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③。到十一月,徐达等先后攻占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只有无锡还是张士诚部将莫天佑驻守,朱军已形成了对平江的包围。张士诚的重要将领吕珍、李伯升、张天骥、潘元明等均投降朱元璋。

十一月开始围攻平江。朱元璋用叶兑的锁城法,徐达、常遇春、华云龙、汤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

② 同上。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

和、王弼、张温、康茂才、仇成、何文辉等分兵把守平江各门、各方；四周筑长围困之，又架木塔（名曰敌楼）三层，监视城中动静，每层施弓弩火銃；又设襄阳炮日夜袭击。张士诚依仗城坚，死命坚守。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好拼命突围，也未成功。朱元璋派人劝降，也遭拒绝。至正二十七年六月，张士信在阊门督战，正挟妓欢饮，结果中炮身亡。九月，城破，周仁、徐义、潘元绍等皆降，张士诚率军巷战，最后自经未遂，俘送应天，自缢死^①。不久，无锡、常熟亦下，张士诚割据政权消灭。

方国珍和明升投降

从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到至正二十七年，方国珍继续过着两面派的生活。一面先后接受元朝封的淮南行省左丞相、江浙行省左丞相等官职，一面又两次献白金给朱元璋，但其基本倾向是投靠元朝的。

吴元年四月，当朱元璋的军队已经攻克湖州、杭州等张士诚统治区并发动围攻平江后，方国珍自知难保，又要出了新的两面派诡计：一面“拥兵坐视，屡假贡献观胜败为叛服计”^②；一面“复阴泛海，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定”^③。朱元璋写信指责他有十二条罪状。七月，朱元璋又责令方国珍贡粮二百三十万石，同时又写信威胁。方国珍惶恐不已，日夜运珍宝，集海船，准备下海逃跑。

这年九月，朱元璋在攻克平江，消灭了张士诚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参政朱亮祖一路攻台州，方国瑛败逃黄岩，朱亮祖又攻温州，方国珍侄方明善逃走，朱亮祖分兵取瑞安，自率舟师败方明善于乐清之盘屿，追至楚门海口。征南将军汤和一路先取余姚、上虞，进攻庆元，方国珍逃入海中，汤和率军追击，又下定海、慈溪等县。十一月，朱元璋又令廖永忠率舟师入海，与汤和合击

① 据《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另《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引《皇明纪事录》载：“遂令御士扛于竺桥，御杖四十而死，上令焚燹石头城。”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③ 同上。

方国珍，方国珍“实欲泛海，以风不顺”^①，于是黔驴技穷，不得不纳款投降，这股割据势力终于被平定。

朱元璋和南方各红巾军各派系的关系，一般说来都是紧张的，唯独与四川的明玉珍比较好，这是因为朱元璋和明玉珍都是反对陈友谅的。至正二十四年陈理投降后，朱元璋开始与明玉珍通好。至正二十五年冬，朱元璋致书明玉珍，称：“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②。明玉珍复书表示通好。

至正二十六年，明玉珍病逝，子明升即位。明升年幼无知，其母垂帘听政。大臣间互相不和，丞相万胜杀知院张文炳，明玉珍义子明昭又杀万胜，平章吴友仁不服，联合陕西李思齐、张良弼，丞相刘桢杀明昭，吴友仁始归。

明升即位后，夏政权与朱元璋仍互有来往。明朝建立后，当然不会允许小小的夏政权继续存在，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朱元璋遣使招谕明升，明升不从。洪武四年，朱元璋命汤和为征西将军，率周德兴、廖永忠、杨璟等由瞿塘趋重庆，令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率顾时、何文辉等由秦陇趋成都。明升倚瞿塘天险，以铁索横断关口，凿两岸石壁，引绳作飞桥，上铺木板置炮石木竿铁铳，两岸置炮，以拒明师。东路明军屡攻不下，廖永忠攻夔关，亦不得胜；而北路傅友德军却长驱而入，连克阶州（今甘肃武都西北）、文州（今甘肃文县）、绵州（今四川绵阳）、汉州（今四川广汉）。于是廖永忠从间道绕至敌后，进攻瞿塘，攻克夔州，进逼重庆，明升投降。夏亡。

陈友定等被削平

南方的割据势力，除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和明升外，还有始终效忠于元朝的福建陈友定、广东何真、云南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等。陈友定、何真是靠地主武装“义兵”起家的，把匝刺瓦尔密是蒙古贵族，他们最后都被朱元璋削平。

① 《国初群雄事略》卷八，引《月山丛谈》。

② 杨学可：《明氏实录》。

陈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今福建福清）人，徙居汀之清流（今福建清流），出身贫寒，后为富户罗氏之婿，因经商折本，充当驿卒。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年），南方红巾军入闽，陈友定在其家乡清流的明溪、曹坊等地，袭击红巾军有功升为明溪寨巡检。后汀州府判来募兵，陈友定随元军镇压汀州、延平（今福建南平）、建宁、邵武等地起义军，以功升到清流县尹。至正十九年，陈友谅遣其将康泰取邵武、邓克明攻汀州、延平、将乐（今福建将乐），至正二十一年，邓克明又取汀州，进攻建宁，为陈友定所败。陈友定乘胜收复汀州，升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至正二十五年元置福建行省分省于延平，以陈友定为平章，“于是闽中八郡皆其所守”^①。

由于当时福建于北方的交通阻塞，陈友定在福建成了土皇帝，“甲兵钱谷之政，用其私人总制之，朝廷命官皆不得有所与”^②。他“颇任威福，所属违令者，辄承制诛窜不绝。”但“事元尝不失臣节”^③。张士诚、方国珍停输海运粮后，陈友定从福建运粮数十万石至大都，受到元顺帝嘉奖。因此，陈友定对红巾军和朱元璋是完全敌对、顽抗到底的。

至正二十五年二月，陈友定进攻处州，为朱元璋将胡深击败，朱元璋乘胜遣胡深、朱亮祖、王溥三路追击，在进攻建宁时胡深中伏被陈友定俘杀，平闽计划未能实现。以后，陈友定又继续占领了兴化（今福建莆田）、泉州（今福建泉州）、漳州（今福建漳州）等路。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在平定了方国珍后，随即令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军南下征陈友定。朱军势如破竹，入杉关，克汀州，取邵武，占长阳，陈友定将纷纷投降。十二月，朱元璋又令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自庆元取福州。洪武元年正月，明兵攻取建宁，进围延平，陈友定服毒自杀未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② 王祚：《书闽死事》，《王忠文公集》卷一四。

③ 《明史》卷一二四，《陈友定传》。

死,俘送应天,不久被杀,其附近各路、州、县,相继投降。

福建平定后,朱元璋同时开始南征和北伐。当时,长江以南除了四川、云南各有一个割据政权统治着外,两广地区还在元朝统治之下,湖南地区也有一些孤立的据点,但力量很分散,守城元将互不支援。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二月,平定两广的明军开始出师,兵分三路:一路由杨璟、周德兴等从湖南取广西;一路由征南将军廖永忠、副帅朱亮祖率领,由福建航海取广东;一路由陆仲亨等率领,由韶州(今广东韶关)直捣德庆(今广东德庆)。“三方进师,为犄角之势,……广东既下,合兵以取广西”^①。

杨璟一路,先取宝庆(今湖南邵阳),继取全州(今广西全州)、道州(今湖南道县)、常宁(今湖南常宁)、武冈州(今湖南武冈)、永州(今湖南零陵),各地元守将或降或逃,只有在永州遭遇守将邓祖胜等的顽抗。洪武元年六月,杨璟、朱亮祖合兵攻静江(今广西桂林),这时,廖永忠也平了广东,率军来会。城破,擒元广西行省平章也儿吉尼等。

廖永忠一路由海道至潮州(今广东潮州),元江西行省左丞何真以其统辖之郡县户口、兵马、钱粮迎降。何真,广东东莞人,原为淡水盐场管勾,后返乡,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广东各地农民起兵响应,何真集“义兵”镇压农民起义,先后镇压了东莞王成、陈仲玉起义,惠州王仲刚起义,与广州邵宗愚多次争夺广州,因镇压起义有功,升官至江西行省左丞。至正二十五年,何真占领海丰,杀当地起义领袖陈子华;又取河源,杀当地起义领袖李满林;又攻兴宁、循州(今广东龙川西),杀当地起义领袖谢以文。汤和等平福建时,何真已表示愿降,及廖永忠平广东,何真投降。廖永忠进驻惠州、循州、广州等地。又遣兵攻破三山的邵宗愚山寨,俘邵宗愚,杀于广州。邵宗愚自至正十三年起义,多次攻占广州,后来投降元朝,任参政,一直与何真不和。廖永忠进驻广州,邵宗愚企图诈降,被廖永忠识破,至是兵败身亡。廖永忠平定广州后,就率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师进入广西，克梧州（今广西梧州）、藤州（今广西藤县）、浔（今广西桂平）、贵（今广西贵县）、容（今广西容县）诸州相继投降，进围靖江（今广西桂林）。

洪武元年六月，靖江城破后，廖永忠等又克南宁（今广西南宁）、象州（今广西象州）各地土官也纷纷迎降，两广全为明朝所有。

二 朱元璋的蜕变和明朝的建立

朱元璋从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的放牛娃，成长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又从农民领袖转变为封建皇帝，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典型。朱元璋及其政权性质的转化，这是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悲剧。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全部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年）参加郭子兴部队到至正十六年占领应天，朱元璋只是红巾军的一个将领，他的斗争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一部分；从至正十六年占领应天到至正二十四年称吴王，朱元璋及其政权正处在转化过程中；至正二十四年建立的吴政权，则标志着这种转变已经完成，最后终于建立了明王朝。

在第一阶段里，朱元璋从自己带兵略定远到攻占应天，他的主要敌人是元朝统治者和各地的地主武装，这种斗争当然与红巾军“直抵幽燕之地”、“重开大宋之天”的主要政治目标是一致的。同时，在与阶级敌人斗争的过程中，朱元璋的政策也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上（指朱元璋）每遇敌，智勇奋击，身先士卒，故所向克捷。凡军中有所得，上皆无取，辄令分给群下；他将有所获，辄以献子兴。子兴以上无所献，颇不悦”^①。这说明贫农出身的朱元璋有着一种农民的平均思想，与“善殖资产”的郭子兴是不同的。“太祖（指朱元璋）渡江或亲征，或遣将克取城池，令曰：‘凡人敌境，听从稍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

从将士检刮，听为己物’”^①。这是夺取地主富豪财富的行动。正因如此，在一些地主分子的笔下，朱元璋的军队被称为“香军”^②和“淮西寇”^③。

在这阶段里，朱元璋队伍虽然吸收了一些地主武装，但这是经过“悉加训练”的，并没有影响朱元璋队伍的性质。也有一些地主知识分子，著名的如定远人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太平人陶安、李习，合肥人杨璟，纷纷投奔朱元璋，他们虽然对朱元璋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在这个时期内，朱元璋器重和依靠的还是武将。朱元璋曾对李善长说过：“吾观群雄中持案牍谋事者多訾将士，将士弗得效其能，事多败，主者亦安得独存，汝宜用为鉴，务协和诸将以成功也。”^④

在第二阶段里，朱元璋的活动虽仍然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一部分。但随着朱元璋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大，政权越来越巩固，平均主义的方式已很难推行，因此他只能维持原来的生产关系，而无法用其他生产关系来取而代之，这样，封建化的趋向开始加剧。

朱元璋的活动之所以仍然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一部分，这是由这支队伍的政治斗争方向和它与红巾军的关系而决定的。从政治斗争来看：从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年）占领应天后到至正二十年这四年间，朱元璋主要的敌人是元朝军队和张士诚，在其西境则与南方红巾军的赵普胜部队有交锋；至正二十年到二十四年三年多间，朱元璋的主要敌人是针对篡夺了南方红巾军大权的陈友谅。朱元璋与张士诚、陈友谅的斗争，虽然有争夺势力范围的一面，但战争是陈、张挑起的。何况朱元璋推翻元朝的政治目的始终未变。他于至正十八

① 刘辰：《国初事迹》。

② 《庚申外史》：“至正十五年，……香军遂乘胜渡江，破太平、建康、宁国，遂据江东。”

③ 陈基：《南台御史大夫西夏永年公勋德诗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淮西寇渡江攻太平，纵兵四劫。”《夷白斋稿》卷一〇。

④ 高岱：《鸿猷录》卷二，《延揽群英》。

年攻占婺州、开设浙江行省于金华时，就在省衙门口树起了“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①的大旗。这个口号与韩山童、刘福通的“复宋”口号是一致的。从与宋政权的关系来看：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宋政权失败前，基本上还保持了形式上的隶属关系。至正十六年，小明王封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升江南行省平章；二十年，升江南行省左丞相；二十一年，封吴国公。尽管这可能是出于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②的建议，或出于“遥籍韩林儿声援”^③，但他接受封职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而且当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派兵围攻安丰时，朱元璋不顾刘基阻挠和陈友谅出兵的危险，还是亲率军队前往救援了。

这一时期朱元璋的转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与群雄争夺地盘，百般拉拢元官。如录用元朝官吏：“太祖所克城池，得元朝官吏及儒士尽用之”^④；表彰忠于元朝的将领：元将余阙守安庆时，朱元璋俘获其属官，“遣还且曰：‘告余公善自为守’”^⑤。到至正二十七年时竟称余阙和元江州守将李黼等为“忠臣义士”，“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⑥。对元处州守将石抹宜孙，朱元璋也“嘉其尽忠死事，遣使祭之，复处州民所立生祠”^⑦。甚至遣使与镇压北方红巾军的刽子手察罕帖木儿“通好”，因而发生了元使张昶等前来招降之事，朱元璋虽然没有接受，并杀了使臣，但仍然表现了他避开与元廷的正面冲突。

二、保护封建生产关系，阶级立场开始转变。朱元璋攻占应天后即宣布：

① 《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② 《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③ 高岱：《鸿猷录》卷一，《集师滁和》。

④ 《国初事迹》。

⑤ 姚福：《青溪暇笔摘抄》。

⑥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

⑦ 《明太祖实录》卷八。

“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①。所谓“旧政不便者是指元朝的苛政，如元朝时“田赋不均”，现在“验产力以均赋役”^②，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反，为了维护他的政权，在战争过程中又培植了一批新生的地主分子，“太祖克建康，谓武官曰：‘听从开垦荒地，以为己业。’文职拨与职田，召佃耕种，纳子粒以代俸禄。和州有李善长职田，参军郭景祥核出步田不实。太祖曰：‘此盖佃人作弊，于面上刺佃字，以警其余。’”^③朱元璋不但采用封建剥削制度，而且站到了佃户的对立面去了。所以至正十九年他还亲自为“六世同居”的浦江大地主郑氏手书了“孝义门”^④。又“选宁越七县富民子弟充宿卫，名曰‘御中军’”^⑤。这些都说明了朱元璋的阶级立场开始转化。

三、大批地主分子渗入朱元璋政权内部。朱元璋占领应天后一再声称：“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⑥。一批在元朝不得志的地主分子，经过长期观察和比较，认定朱元璋是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纷纷应聘而来，如淮西集团的李善长、冯国用等，浙东的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四先生”，均深受朱元璋器重。初到江南时，朱元璋对儒士们还有警惕，曾规定：“所克城池，令将官守之，勿容儒士在左右议论古今”^⑦。儒士屠性、孙履、许元、王天赐、王祎等任李文忠的幕僚，因“干预公事”，朱元璋得知后，将屠性等五人押到应天，杀了屠性、孙履二人，王祎等三人“发充书写”^⑧。后来渐渐地丧失了这种警惕。在这批地主分子的朝夕熏陶之下，朱元璋读的是“圣贤”书，学的是“帝王之道”，对这些地主分子反而言听计从了。朱元璋出兵安丰，本与刘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

② 《明初群雄事略》卷一，引叶子奇：《静斋文集》。

③ 《国初事迹》。

④ 谈迁：《国榷》卷一。

⑤ 《国初事迹》。

⑥ 《明太祖实录》卷四。

⑦ 《国初事迹》。

⑧ 同上。

基意见相悖,后来把小明王救出来安置滁州,“中书省设御座,将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刘基大怒,骂曰:‘彼牧豎尔,奉之何为?’遂不拜。适上召基,基遂陈天命所在,上大感悟”^①。所谓“上大感悟”正说明了朱元璋听从刘基的话,决心与小明王决裂。

到了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终于在群臣“劝进”下,即吴王位,建立了完全合乎封建规章制度的一整套封建统治机器,于是完全转化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他从镇压自己统治区内的农民起义开始,最终对红巾军和宋政权也大加辱骂。由于朱元璋已经转化为封建统治者,农民阶级重新被套上了封建枷锁,至正二十五年八月,罗田县(今湖北罗田)发生了兰丑儿领导的白莲教徒起义,兰丑儿自称彭莹玉,为麻城里长袁宝俘杀,朱元璋大加赞赏,说道:“民能伏义杀贼,宜旌赏之。”并“赐以绮帛。仍令中书悬赏格”^②。次年十二月,酃县(今湖南酃县)饶一宁等起义,也被镇压。至正二十六年五月出兵张士诚前发布的檄文,竟公开咒骂北方红巾军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明确宣布保护地主阶级:“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家室”^③。是年十二月,小明王、刘福通被沉死于瓜步,最后连“龙凤”的面纱也彻底抛弃了。由于朱元璋已经彻底背叛了红巾起义,他的南征北伐,已不具有农民起义的含义了,而只能是封建统一战争。

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在南征北伐胜利进军中,朱元璋即皇帝位。洪武元年(一三六八年)正月,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京师。朱元璋成了新王朝的开国皇帝。

① 《国初礼贤录》。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

③ 吴宽:《平吴录》;陆深:《续停驂录摘抄》。

三 北伐的胜利和元朝的灭亡

灭亡前夕的元廷

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宋政权失败后,元朝统治集团更加腐败不堪,内部倾轧、军阀混战,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脱脱被贬杀害后,元顺帝与哈麻兄弟等一伙,更加为所欲为。元顺帝命哈麻为中书左丞相,哈麻的弟弟雪雪拜御史大夫。哈麻的妹婿秃鲁帖木儿、元顺帝的母舅老的沙等十人为“倚纳”,与元顺帝整天胡闹,过着极其低级下流的生活。元顺帝还自己设计极其精致的龙船、宫漏。他“怠于政事,荒于游宴”^①,国家大权,尽归哈麻兄弟。哈麻、雪雪阴谋废元顺帝,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并杀秃鲁帖木儿等,事泄,反被元顺帝与秃鲁帖木儿定计杀掉。元顺帝命搠思监为右丞相、太平为左丞相。皇太子生母奇皇后与爱猷识理达腊仍谋废立,命宦官朴不花与左丞相太平商议,太平不肯,奇皇后又召太平与议,太平还是不肯,于是太平及其支持者均被害死。这样,宫廷内就分为支持皇太子的搠思监、朴不花一派和支持元顺帝的老的沙、秃鲁帖木儿一派。

这时元顺帝更加怠于政事,皇太子掌握了军政大权,并以扩廓帖木儿为外援。老的沙等也依靠孛罗帖木儿来对抗。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失去战斗力的元朝军队已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但是依靠地主武装起家的察罕帖木儿、答失八都鲁、李思齐、张良弼等逐渐崛起,形成了新的军阀集团。答失八都鲁在北方红巾军的打击下,得病死去,其子孛罗帖木儿继之;察罕帖木儿被田丰、王士诚刺死,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继之;李思齐是与察罕帖木儿同时起家的;张良弼是靠镇压西路红巾军发迹的。这四家军阀出于争权夺利,长期以来互相攻伐不已。至正二十年,在镇压北方红巾军中占有关、陕、

^① 《元史》卷四三,《顺帝纪》六。

荆、襄、河、洛、江、淮一大片土地的察罕帖木儿准备大举进犯山东，以镇压那里的红巾军，这时驻守大同的孛罗帖木儿乘机进据晋冀，双方大打出手起来。而在陕西的李思齐和张良弼为了争夺地盘也动起武来。于是孛罗帖木儿联合张良弼，乘察罕帖木儿被刺之机，又占据真定路。至正二十二年，孛罗帖木儿又遣其将竹贞袭据陕西，扩廓帖木儿则派其将貂高联合李思齐战败竹贞，竹贞投降。

与此同时，宫廷内部的斗争也白热化起来。御史大夫老的沙准备搞掉宦官朴不花等人，反被皇太子罢官，老的沙逃到孛罗帖木儿军中，皇太子屡次索要，孛罗不遣。至正二十四年，右丞相搠思监、朴不花指责孛罗帖木儿图谋不轨，于是就下诏削其官爵，解其兵权。孛罗拒命不受，遣秃坚帖木儿出兵大都，元顺帝不得不缚送搠思监、朴不花给孛罗帖木儿，并复孛罗官爵。皇太子很不甘心，命扩廓帖木儿出兵攻打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又出兵攻大都，皇太子战败，逃奔冀宁。孛罗帖木儿入大都，元顺帝命孛罗为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至正二十五年，皇太子下令扩廓帖木儿讨孛罗帖木儿，孛罗战败。七月，孛罗帖木儿被刺死于宫中，其余党羽被杀。九月，皇太子和扩廓帖木儿入京，命扩廓帖木儿为中书左丞相。

皇太子在太原时，企图仿效唐肃宗在灵武的故事，自立为帝，扩廓帖木儿等不赞成。回到大都后，奇皇后又要扩廓拥重兵入京，逼元顺帝让位，扩廓又不从，于是皇太子、奇皇后就怀恨在心，元顺帝也忌他兵权太重，扩廓帖木儿只好请求外出带兵。闰十月，元顺帝封扩廓为河南王，代皇太子总制关、陕、晋、冀、山东诸道兵马出兵南方。

但是，李思齐等根本不服扩廓帖木儿调遣。至正二十七年，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等军阀结成联盟，会兵奉元路，抗拒扩廓帖木儿，扩廓派关保、虎林赤等出兵陕西，双方打得不可开交。这时，扩廓帖木儿部将貂高、关保等与扩廓不和，列其罪状上奏朝廷。十月，罢扩廓帖木儿兵权，其原统军马，由白琐住、虎林赤、貂高等分别统率。另立抚军院，由皇太子总制天下兵马，专防

扩廓。

北伐的胜利

正当元朝统治下的北方处在军阀混战的时候，朱元璋在消灭了张士诚的割据势力后，南征北伐同时开始了。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五万北伐。朱元璋提出的北伐具体方略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①。他又再三申明纪律，告谕诸将：“今命尔诸将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师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民生。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②。朱元璋的战略计划说明了他有很高的军事才能，也说明他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和战局了如指掌。他对军纪的重视和对军队的约束，这是使北伐军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重要原因。

为了进一步取得汉族地主阶级支持，分化瓦解蒙汉各族上层贵族联合统治的元政权，朱元璋还发布了北伐的檄文，在这篇出自宋濂之手的檄文中，公开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③的口号，它突出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声称：“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即用地主阶级的大汉族主义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另一方面，要“除暴乱”，“拯生民以涂炭”，提出“立纲陈纪，救济斯民”，这就是明确地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封建纲纪，重建封建统治。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② 同上。

③ 同上。

所以,这一檄文对当时的汉族地主阶级有很大的号召力,对瓦解敌人也起了很大作用。

根据朱元璋的作战部署,北伐的第一步是“先取山东,撤其屏蔽”。徐达率军先抵淮安,遣人往沂州招谕王宣、王信父子。王宣是靠组织“义兵”被元朝授予淮南淮北义兵都元帅的,察罕帖木儿死后,扩廓帖木儿忙着打内战,王宣父子乘机攻掠山东全境。当徐达来书招降后,王宣降后复叛,被徐达镇压。接着莒州、滕州、益都、东平、兖州、济南、济宁、密州、登州、莱州、东昌等地,相继克复,元守将或降或遁。由征戍将军邓愈率领的偏师也由襄阳北略南阳,进展顺利。

北伐的第二步是“旋师河南,断其羽翼”。这是以洪武元年三月开始的。徐达等率军进入河南后,第一个目标是汴梁,当时盘踞汴梁的是元守将李克彝和投降元朝的原天完政权将领左君弼等,左君弼等投降,李克彝逃遁。接着,河南、蒙阳、福昌(今河南永宁东北)、钧州(今河南禹县)、许州、陈州、汝州等地或降或克。同时,由冯宗异率领的偏师克陕州,扼潼关,西略华州,以防李思齐等援兵东来。五月,朱元璋抵汴梁,准备进军大都。

北伐的第三步是“进兵元都”。当时,元大都已完全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至正二十七年十月,皇太子削了扩廓帖木儿兵权后,扩廓驻军泽州,又命李思齐、貂高等围攻扩廓。次年,扩廓据太原,尽杀元朝所置官吏,皇太子又命各地军阀夹击扩廓帖木儿,经过几番激战后,关保、貂高等均为扩廓所杀,而这时明兵已占领河南,挥师北进大都了。元顺帝不得不罢抚军院,重新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中书左丞相,命扩廓和李思齐等抗拒明兵。闰七月,明兵在攻克卫辉、彰德、磁州、邯郸、临清等地后,汇集德州,步骑舟师继续沿河北上,下长芦,克青州,至直沽,元将也先自海口逃遁,大都震惊。当明军占领通州后,即七月二十八日,元顺帝率后妃太子逃到上都。八月初二日,徐达率北伐明军进入大都,至此,统治了九十七年的元朝政权终于被推翻!

元朝虽然推翻了,但元朝的残余势力还时时企图卷土重来。当时,扩廓帖木儿拥兵山西,李思齐、张良弼等盘踞陕西,纳哈出据守辽阳,其中扩廓帖木儿以数十万军队驻太原,是最大的威胁。洪武元年九月,徐达、常遇春等进兵山西。十二月,扩廓帖木儿乘北平(明改大都为北平)空虚,率军出雁门关企图夺取北平,徐达等直取太原,“倾其巢穴”,又偷袭扩廓兵营,扩廓大败,仅以十八骑逃遁,太原攻克,山西平定。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四月,常遇春、冯宗异等率军入陕西,李思齐投降。常遇春、李文忠又率军直捣上都,元顺帝只好再往北逃,次年四月死于应昌(今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在这之前,脱列伯已被明军俘虏,孔兴被其部将杀死,张良弼为扩廓帖木儿所杀,只有扩廓帖木儿还率领残部到处捣乱,到洪武三年徐达再次出师,扩廓帖木儿随爱猷识理达腊逃到和林,洪武八年(一三七五年)死去。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年)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兵败自杀,云南平。洪武二十年(一三八七年)纳哈出投降,东北平。至此,除了北奔的蒙古贵族还时时来犯外,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了统一。

第五节 元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

一 推翻了元朝的黑暗统治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元朝的历史曾经有过它光明的一页。问题是随着元朝统治者本身的日益腐朽,无法克服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它的统治最后终于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桎梏。

朱元璋曾这样说过:“当元之季,君宴乐于上,臣跋扈于下,国用不经,征敛日促,水旱灾荒,频年不绝,天怒人怨,盗贼蜂起,……”^①国家处于如此黑暗

^① 《明太祖实录》卷九六。

统治下,社会经济必然十分衰敝。尽管由于缺少必要的统计数字,但是元末以来生产力严重下降的情况还是很清楚的。至于物价飞涨、粮食奇缺、民不堪命的事例比比皆是,这都是社会经济衰敝的反映。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军对生产力破坏之严重令人吃惊。元朝官员张楨上奏说:“臣伏见调兵六年,初无纪律之法,又无激劝之宜,将帅因败为功,指虚为实,大小相谩,上下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赏则同。……所经之处,鸡犬一空,货财俱尽。……今克复之地,悉为荒墟,……两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萧条”^①。山西地区因孛罗帖木儿驻兵,“所在侵夺民田,不胜其扰”^②;西北陕西地区,“比年为张思道、李思齐交兵侵扰,加之岁旱,粟麦不登,民多饥死”^③。这样腐败的政府如果不推翻,“天怒人怨”的状况永远不会结束,社会发展势必停滞、倒退。

元末红巾军就是以夺取政权作为己任的。北方红巾军打出“直抵幽燕之地”“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南方红巾军以“天完”(压倒“大元”之意)作国号,都表示了他们推翻元朝封建统治的决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起义军是从摧毁元朝各级地方政权开始的。他们到处“杀守令,据城邑”,使得江淮之南的“雄都巨镇,……环辄碎之,鲜有固其国者!”^④元朝统治的范围越来越小,早已处于“土崩瓦解,卒不可救”^⑤的状况之下。朱元璋虽然最后完成了推翻元朝的任务,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所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⑥。《明史·韩林儿传》把韩林儿等称为“先驱者”,说“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朱元璋)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⑦。可见,真正击溃了元朝有生力量的是红巾军。以

① 《元史》卷一八六,《张楨传》。

② 《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

③ 《明太祖实录》卷四七。

④ 余闾:《青阳县尹袁君功铭并序》,《青阳集》卷六。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⑥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

⑦ 《明史》卷一二二,《韩林儿传》。

红巾军为主力的元末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元朝黑暗统治,为社会生产力的重新恢复和发展,为明初推行改革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对中国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另外,元朝的推翻对广大汉族人民来说,意味着民族压迫的解除。在元朝百年统治期间,蒙古色目贵族推行了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人为地人分四等,排斥汉人南人,造成“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不平等现象,广大汉族人民的民族压抑感是严重的。朱元璋正是抓住了人们要求摆脱民族压迫的心理,提出了符合汉族各阶层人民要求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顺利地取得了北伐的胜利。

二 打击了元末的地主阶级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朱元璋说:“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①。元末农民战争中,各地地主阶级受到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起义军所过之处,打土豪,分浮财,夺田地,使许多地主丧命破产。安徽歙县大地主罗旦,组织“义兵”抗拒农民军,“家竟以此荡毁”,被农民军镇压了^②;江苏常州大地主王佛子的仓廩被农民军打开,赈济给当地的贫苦老百姓^③;江西建昌大地主潘诚夫的田地起义者夺去了^④;江西永新地区还发生了“尽铲主家以自便”的奴仆起义^⑤;……总之,这些农民打击地主的行爲,在地主分子眼里是:“当兵戈扰攘之际,里中犷狠纠叛者蜂起,苍头弑主,恶少杀人,掠财富,毁室庐,攘纲纪,恬不足怪”^⑥。因此,“元季之乱,

① 《明太祖实录》卷四九。

② 宋濂:《徽州罗府君墓志铭》,《宋学士文集》卷四四,《芝园集》四。

③ 谢应芳:《至正壬辰七月廿二日于妻兄任氏家避乱得家兄信感叹而作》,《龟巢稿》卷二。

④ 正德《建昌府志》卷一九,《杂志》。

⑤ 李祁:《刘纶刘璐传》,《云阳集》卷八。

⑥ 舒頔:《蔓青楼记》,《贞素斋集》卷一。

大家世族所卓然不为乱贼所污，得其家、复其盛、昌其后者，江乡甚不多见”^①。

地主富豪被打击，一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受压迫最深的奴仆，他们的地位必然上升。这里且不说因参加起义军而成为农民政权的官员的情况，即“走卒厮养皆授官爵”^②的政治地位改变的情况，一般佃农自耕农、“驱口”的经济地位也得到了改善。这种改善是通过夺取地主和官府的浮财、田地、库物而得到的。徽州地主吴姓，“其家尽弃私藏而窜”^③；诸暨地主赵淑带着田籍逃走，剩余的家资“无纤毫存”^④；金华地主俞元瑞，“家业荡然，遗田数亩而已”^⑤。官府、权贵弃下的土地也很多。所以，农民自动耕占或抢占逃亡地主的土地或原属元朝政府的官田的情况是很普遍的。针对这种状况，有的农民政权，如朱元璋的吴政权就曾实行过“给民户由”的措施。“太祖亲征城池，给民户由，俱自花押。后追之。”^⑥户由的内容包括民户的丁口、籍贯、名岁和产业。这是吴政权适应农民起义后的形势、为了取得农民的支持，而采取的满足农民要求的措施，即承认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

这种所谓“冠履颠倒”或者“王公甘受辱，奴仆尽同升”的图景，不仅仅是对地主富豪的一种有力打击，而且是元末封建生产关系局部调整的一种表现。元代土地高度集中，地租剥削极其沉重，广大深受其害的贫苦农民，十分憎恨地主对土地的霸占和对生产产品的贪婪掠夺，他们本能地要求获得一小块土地以求得生存。他们乘着农民起义的大风暴，普遍开展了夺地和占地斗争，这是对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的沉重打击。当然，农民起义不可能改变整个封建的生产关系，不可能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它，但是战争过程中大批大地

① 解缙：《刘君象贤墓志铭》，《解学士全集》卷九。

② 黄省曾：《吴风录》。

③ 唐桂芳：《吕氏嘉贞传》，《唐氏三先生集》卷二〇。

④ 宋濂：《周节妇传》，《宋学士文集》卷七五，《朝京稿》卷五。

⑤ 苏伯衡：《俞元瑞墓志铭》，《苏平仲文集》卷一二。

⑥ 刘辰：《国初事迹》。

主逃亡和死亡,土地被人夺去,这不能不说是刹住了元末的那股土地兼并风;而农民由于夺占土地,使大批无地少地的佃农、奴仆上升为自耕农。战后农村中出现的这些变化,正说明了整个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局部调整,即大土地所有制受到打击后小私有制得到了发展,围绕土地问题出现的社会矛盾开始有所缓和。这种新的变化同样是明初社会改革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 改造了明初的封建统治

打击地主富豪、推翻元朝封建统治,这是元末起义农民的主观愿望,通过打击和推翻封建统治,农民部分地挣脱了封建枷锁,改善了劳动地位,局部地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因而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这是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主要方面;改造新王朝的封建统治并不是起义农民的主观愿望和要求,明朝的统治者从元朝的灭亡过程中接受了经验教训,在统治政策上发生了某些变化,他们能正视社会客观现实,采取比较开明的改革和改良措施,被迫部分地承认起义农民在战争过程中取得的某些权利,这对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多少也是有利的。

通过十七年的战争之后,明初的社会状况与十七年前相比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的封建国家机器已被砸碎,新的国家机器处在重建和完善过程中;地主贵族遭到了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结束,但农民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止;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的破坏。

面对这些社会现实,亲身参加了元末农民战争全过程、从农民领袖转化为封建统治者的朱元璋,在政治经济上都采取了一些有别于元朝末年的一种新的改良政策。这种新政策在政治上主要是:以加强“法治”为中心,重新整顿封建纪纲,对广大劳动人民重新套上封建枷锁,同时又打击贪污、抑制豪强,以防止农民重新造反,使明朝长治久安。这些措施与元末那种纪纲败坏,皇帝纵容贪官污吏、上下沆瀣一气是有区别的。在经济政策上,朱元璋以“安养生

息”作为总方针,实行减少徭役和赋税、释放奴婢、奖励垦荒、发展生产等一系列“养民”措施,使较短时间内医治了战争创伤,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恢复和发展。这与元末那种滥用民力、破坏生产又有鲜明的差别。所有这些差别,都是封建统治得到改造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王朝建立后,农民起义的某些成果并没有完全丧失。例如农民的夺田斗争在起义过程中是十分普遍的,朱元璋虽然在明朝建立前夕宣布了“旧有田产房舍,依前为主”^①的保护地主财产的政策,但当旧业主死亡或房田产凭证遗失时,则仍归占据者所有。台温地区就实行过这一政策:“凡威取田宅者归业主,得半直者中分之,两造无验者籍之”^②。这就说明了战争期间阶级结构的变化一直影响到明朝初期。

新王朝政策的变化,都是受到元末农民战争制约的。农民战争之后出现的社会条件是推行新政策的基础。朱元璋从元朝的败亡中,吸取了许多教训,总结了统治经验,根据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制定政策,终于取得了成功。所以,元末农民战争为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 元末农民战争在中国农战史中的地位

元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中规模特别大、时间特别长的农民战争之一。它在以下几点上把古代起义农民的斗争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南方红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口号,标志着元末起义农民平均主义思想有了新的提高。

封建社会里,存在着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被压迫阶级没有或者只有很少土地,他们的劳动果实被地主攫取,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在贫穷、饥

① 吴宽:《平吴录》。

② 宋濂:《熊伯颖墓志铭》,《宋学士文集》卷六四,《芝园续集》四。

饿和无权的状况下,过着农奴般的生活。憎恨封建剥削和压迫,追求自身的解放,是这个阶级的情感和理想。于是,在广大的被压迫阶级中产生了不满和反抗情绪,产生了反封建的理想。正如列宁所说:“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①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早期的农民起义是以反徭役作为它的特点,还没有触及到封建制度本身的话,那么,从唐末农民起义开始,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逐步形成和发展。唐末农民起义公开打出了“均平”旗号,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的“均贫富”,南宋钟相、杨么起义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到元末农民起义的“摧富益贫”,斗争口号一次比一次更加丰富。

“摧富益贫”是一个富有战斗性的现实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元末社会尖锐的贫富对立,表达了广大贫苦人民要求摧毁富家豪族的愿望,它主张用暴力去夺取地主富豪的浮财和田地,使贫苦农民经济地位得到改善。因此,这个口号具有极大的号召力,给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凡窳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大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②。显然,“摧富益贫”的口号与“均平”等口号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不过,前者具有强烈的暴力斗争意义在内。

第二,元末红巾军的政权意识比较强烈,普遍建立了机构完备、分工精细的政权机构,因而发挥了政治上的号召作用、军事上的指挥作用。

南方红巾军的天完政权建立于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十一月,它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的第一个农民政权。最高行政机构为中书省(始称莲台省),长官为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管军机构有统军万户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管军千户所、管军百户所等,相应的军职有统军元帅、总管、万户、千户、百户等。天完政权是否设

① 《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三九三至三九四页。

② 嘉靖《邵武府志》卷二,黄镇成撰碑。

有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院等机构,因失于记载,不能断定。地方机构设行省,据文献资料及已发现的铜印,可知者先后有江南行省、汴梁行省、陇蜀行省、江西行省等。

北方红巾军于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二月建宋政权,其中央机构,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大系统齐全。中书省设丞相、平章等长官;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管军机构有枢密院、行枢密院,下置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相应的官职有统军元帅、总管、万户等。其地方机构,可考者有江南、益都、淮安、辽阳、曹州等行中书省。

由农民起义转化为割据势力的陈友谅汉政权、明玉珍夏政权等也都有自己较完整的政权机构^①。

元末农民起义军对政权建设的重视,政权形式的严密程度,是元代以前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无法比拟的。尽管这些政权的躯壳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其形式亦多仿自封建国家机器,但它们中的一些政权,曾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农民起义的阶级性,对农民起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政权的封建形式是农民政权向封建转化的重要因素。

第三,制订了比较完善的经济政策,起到了保障供给、巩固政权的作用,其中有些措施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属于创举。

首先,从赋税制度看,元末红巾军政权都逐步制定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起义初期,红巾军在强烈的平均主义思想鼓舞下,用夺取官府钱粮和地主浮财的办法来保障军队的供给,如天完的项普略、彭莹玉在杭州将“府库金帛,悉辇以去”^②,宋政权的朱元璋“将士皆征粮于民,名曰‘寨粮’”^③,并没有赋税制度。但是,这种靠打富家、吃官府的办法是不能持久的,那个时代的农民领袖

① 以上均参看邱树森:《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元史论丛》第一期。

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八,《刑赏失宜》。

③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一。

又提不出新的办法,于是只好回过头来采用封建性的“轻徭薄赋”的赋役制度,宋政权益都行省的毛贵在山东实行了“官民田十止取二分”的赋税标准^①;江南行省的朱元璋则根据“验产力以均赋税”^②的原则,推行“均徭省赋”的政策^③;明玉珍建立夏政权后,“始定赋税,十取其一,天(民)家无力役之征”^④。这些政策虽然本质上没有跳出封建性质的范畴,但对社会秩序的安定,促进起义军控制地区生产的发展,保障农民政权的财政收入,都是有很大作用的。

其次,从土地政策和实行屯田看,这些政权逐步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办法。红巾军虽然还不可能提出土地纲领,但起义农民却自发地夺取地主和官僚的田地,并受到农民政权的支持,前述朱元璋“给民户由”即是。元朝的官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多数由农民政权直接控制,或用于屯田,或用于官员职田,毛贵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并储备粮食;朱元璋在龙江、江阴、处州等地也实行屯田,他说:“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昔汉武以屯田定西戎,魏武以务农足军食,定伯兴王,莫不由此。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若兵食尽资于民,则民力重困。……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⑤,可见,朱元璋是把屯田与减轻人民负担联系在一起的;天完政权也广设粮仓^⑥,可能也开展了屯田;明玉珍在夷陵一带也“就役屯种,置包以贍军用”^⑦。这些耕战政策的推行,大大提高了农民政权的粮食自给率,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对于保障起义军的供给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都具有很大作用。

① 《元史》卷四五,《顺帝纪》八。

② 《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引。

③ 《明史》卷一三〇,《吴良传》。

④ 杨学可:《明氏实录》。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⑥ 湖北省博物馆藏有天完政权“长安仓印”一方可证。

⑦ 杨学可:《明氏实录》。

最后,从商业活动来看,农民政权统治区的贸易和民间交换是正常的。农民政权都曾发行过钱币^①,有的还铸造了铜权、砝码^②,这说明了这些政权在抓政治、军事的同时,也抓了经济(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这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军队供给的。

综上所述,元末农民起义虽然最终的结局不可能出现一个非封建的农民政权,但起义农民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元朝黑暗统治的被推翻,打击了元末地主阶级,改造了明初的封建统治,局部改善了他们自己的地位,从而促进了封建生产力的继续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① 钱币拓片及种类见唐石文:《历代农民起义军铸造的货币》,《文物》一九六〇年第一〇期。

② 朱元璋铜权照片见《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四期;谈迁《枣林杂俎》:“万历间,秦和人掘地得砝码如月,凿十字,重四斤,天启三年造,背镌‘吉安路郭尚书’。”

第八章

元代的边疆各族

第一节 岭北地区

一 亲王的出镇

岭北地区是元朝的“祖宗根本之地”。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四朝，它是蒙古国的中心地域(qol ulus)，忽必烈定都燕京后，才降为元朝的一个边区^①。但有元一代，特别是元朝前期，它在政治上仍占有重要地位。

岭北大部分地区——从怯绿连河上游以西直到按台山，除朝廷设官管辖的区域如和林、称海等地外，大多是拖雷家族的封地(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家族封地当亦在岭北地区)；怯绿连河中游以东直到哈刺温山，是成吉思汗诸弟的封地。因此，在岭北地区，诸王所部星罗棋布，各拥有自己的属民和军队。尽管在忽必烈即位以后，忽里台选汗制度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作用，但蒙古诸王对皇位继承问题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忽必烈虽然战胜了阿里不哥，而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后裔仍分布在岭北各地，他们并不甘心放弃其取得皇位的权利，至元十三年爆发的昔里吉(蒙哥之子)之乱就是证明^②。对忽必

① 在元人言论中，经常将岭北称为“边地”、“边远酷寒之地”，且见于朝廷大臣奏章。

② 拥戴昔里吉者主要是蒙哥和阿里不哥诸子，他们以昔里吉应掌统治权，而忽必烈待他们不公为理由发动叛乱。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六六。

烈统治权的严重威胁,还来自于据有按台山以西广阔地区的海都势力。海都的野心并不满足于统治窝阔台兀鲁思,还企图恢复其先人的大汗之位,因而始终把夺取岭北地区和故都和林作为实现其计划的主要目标。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忽必烈十分重视巩固其对岭北地区的统治,使之成为朝廷的北方藩屏。

至元三年(一二六六年),忽必烈封第四子那木罕(一译南木合)为北平王,出镇北方,统领诸王之军。五年,海都开始东犯岭北,掠取按台山东侧诸王玉龙答失的部众^①,但被击退。七年,忽必烈即特派燕王真金到称海巡边抚军。次年,趁海都与察合台后王在阿母河以北等地争斗之机,命那木罕率领岭北诸王之军进驻阿力麻里,不断增给军马、器甲,后又遣右丞相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前往辅佐那木罕,监督诸军,加强对海都的进攻^②。十三年冬,从军诸王昔里吉、脱脱木儿(拖雷庶子岁哥都之子)、明里铁木儿(阿里不哥之子)等叛,执那木罕和安童,回师岭北,攻掠和林地区,取祖宗大帐,岭北诸王包括东道斡赤斤后裔多卷入叛乱,或暗中支持。忽必烈急遣伯颜丞相统领蒙古、汉军北征,打退昔里吉等叛王的进攻,随即以侍卫诸军戍守和林、称海等地,屯田实边^③。至元十八年,皇太子真金和伯颜再次奉命巡抚岭北诸军。

二十一年,那木罕获释回朝,忽必烈改封他为北安王,仍命出镇岭北;二十四年,置王傅,“凡军需及本位诸事并以王傅领之”(《元史·世祖纪》)。在此前后,又派真金长子甘麻刺到北边防镇^④。这时海都、笃哇势力极盛,不断进

①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六六。玉龙答失,蒙哥之子,封地在按台山附近之扎不罕河,见同上书,页二六〇。

② 《元史》卷一三四,《昔班传》。

③ 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碑》,《元文类》卷二四;许有壬:《刘平章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卷一六七,《王通传》。

④ 甘麻刺第一次出镇岭北年代,本传仅云“至元中”。《经世大典·站赤》载:至元二十四年,和林宣慰司报告,北安王、甘麻刺太子等要求给其所遣使臣祇应。据此知甘麻刺出镇应在至元二十四年之前。

犯畏兀儿地区和按台山一带；东道诸王乃颜等人叛迹渐露，而且有暗中勾结岭北和西道诸王的迹象。这可能是忽必烈以两亲王同镇岭北的原因。二十五年，海都乘元朝集中兵力（包括岭北守军）平定乃颜之乱的时机，越按台山而东，次年，败甘麻刺于杭海岭，进据和林。忽必烈立即统兵亲征，收复和林，留知枢密院事伯颜（伯颜于当年三月由右丞相改授此职，总领北边诸军）镇守和林，辅佐那木罕；甘麻刺则召还。

二十九年，北安王那木罕死，忽必烈改封甘麻刺为晋王，复命出镇岭北，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及北方诸军和蒙古本土^①。《史集》所载授予甘麻刺统领之地包括哈刺和林地区，赤那思，昔宝赤，斡难河和怯绿连河地区，薛良格河和海押立（？），成吉思汗大禁地即不儿罕山，以及吉利吉思等地^②。赤那思（Chinos，意为狼）应是山名，当在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怯绿连河上游之北^③；昔宝赤（Shiba'uchi，意为鹰者）疑指八里灰地面，即巴儿忽惕诸部所居之地，今贝加尔湖地区，其地产海东青，元朝皇帝常遣人到这些地区捕取，或因此得名^④。据此知甘麻刺所统之地几乎囊括全部蒙古本土及其以北地域。这些地区内的诸王、贵戚、勋臣所部军民，均受晋王节制。但东道诸王是否也包括在内，没有明确记载。元贞二年（一二九六年），成宗曾命合赤温后王也只里、哈撒儿后王八不沙、别里古台后王瓮吉刺带、斡赤斤后王也里愷等“并驻夏于晋王怯鲁刺之地”^⑤，看来他们也是在晋王节制之下的，这次共同“驻夏”可能是一次以晋王为首的大聚会。

晋王驻守怯绿连河上游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之地，置内史府，秩从二品，

①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

②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三二二。

③ 张翥《蜕庵集》卷一有《送郑宣宜伯赴赤那思山大斡耳朵儒学教授四首》，《史集》之赤那思，当即其地。

④ 参阅伯希和：《马可波罗注》，页七八至七九。

⑤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怯鲁刺即怯绿连河的异译。

设内史、中尉、司马、断事官等官属，并在大都置分司；原北安王王府官并转属晋王^①。按元朝制度，蒙古人的刑名、词讼、婚姻、驱良等事，归大宗正府管理，因此晋王所部蒙古人案件，即由大宗正府派札鲁忽赤前往，会同晋王内史审理，重刑需禀报晋王决断^②。

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年）甘麻刺死，子也孙铁木儿嗣为晋王。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年）也孙铁木儿即皇帝位，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年），以次子八的麻亦儿间卜嗣晋王位。次年，又命第四子允丹藏卜出镇岭北。致和元年（一三二八年），拥戴文宗的军队打败拥戴泰定帝太子阿剌吉八的上都集团，八的麻亦儿间卜适在上都，城陷后死。从此晋王甘麻刺这一家失去了统领岭北蒙古军民的地位。

就在甘麻刺出镇的次年（至元三十年），忽必烈遣其孙铁穆耳（真金第三子）抚军北边，以真金的皇太子宝授之，使具有统率诸王、诸军的权力。这时，海都势力虽已被逐出岭北，但力量还很强大，元朝以大量军队防守按台山、称海沿边之地，除岭北诸王之军外，还有安西王阿难答所部军、诸卫亲军和汪古等部军，与诸王阿只吉、出伯所部防守西边的军队连为一线。因此特命铁穆耳以皇太子身份为诸军最高统帅，以便统一指挥，其地位在晋王之上。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死，铁穆耳回朝继位，是为成宗，以其叔宁远王阔阔出代总边军。

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年）冬，阔阔出与诸王、大将们纵酒欢宴，备御怠忽，遭到笃哇突然袭击，大败。次年，成宗遣皇侄怀宁王海山赴北边统军，也授以真金之皇太子宝，“诸亲王、诸军莫不听命”^③。海山与其王府官属驻守称海地区，大德五年，海都、笃哇倾全力来攻，越按台山而东，海山与甘麻刺统率诸王、

① 《元史》卷一七，《世祖纪》；卷八九，《百官志》。

②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卷二六，《仁宗纪》。

③ 虞集：《杨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姚燧：《史公先德碑》，《牧庵集》卷二六。

诸将之军,与之决战于帖坚古山,胜负相当^①,海都、笃哇受伤退兵。后海都病死,其子察八儿继立,笃哇与察八儿向元成宗请和。不久,海山乘窝阔台汗国衰弱之机,进兵按台山西,封地在也儿的石河的窝阔台后王秃满(灭里后人)归降,察八儿逃往察合台汗国。大德十一年成宗死,海山回朝即位,是为武宗。他采取了一项加强中央集权的重大措施:设立和林行省以总领岭北地区的军政事务,而不再另派亲王到北方统兵。

到英宗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又命诸王彻彻秃(蒙哥的曾孙)“总兵北边”。当时,武宗长子和世珠逃亡在察合台汗国,察合台后王怯别又多次遣兵“寇边”^②,因而需要加强岭北地区的戒备。此外,英宗对晋王也孙铁木儿也存有疑虑,派彻彻秃总兵,当还含有分晋王之权的用意^③。彻彻秃统领诸王之军镇守岭北达十七年,先后晋封武宁王、郟王,文宗时曾一度出镇辽东。顺帝至元四年(一三三八年),丞相伯颜诬以谋反,被处死^④。

二 岭北行省的建置

忽必烈即位以前,岭北地区的军民行政由蒙古国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元史·地理志》载:太祖十五年(一二二〇年)建都和林,“初立元昌路,后改转运和林使司,前后五朝都焉。世祖中统元年,迁都大兴,和林置宣慰司都元帅府。”一二二〇年成吉思汗正在西域攻打花刺子模,没有从征的皇后、诸妃等家小留居本土,一二二一年丘处机前往西域途中,曾经过她们所居的斡耳朵。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的记载,这个斡耳朵之地“车帐千百”,“车輿亭

①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六、二一二。参见《铁穆耳合罕本纪译注》,《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四期。

②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

③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载,至治三年,宣徽使探忒到晋王府,对晋王内史倒刺沙说:“主上将不容于晋王,汝盍思之。”这未必完全是挑拨之辞。

④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卷四一,《顺帝纪》;危素:《夏侯尚玄传》,《危太朴续集》卷八。

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未有若是之盛也。”当为成吉思汗西征期间的留后大营(奥鲁)。其地约在今鄂尔浑河上游之西、杭爱山北麓某处^①,这一带地方当时泛称哈刺和林(Qara-qorum,意为黑砾石)^②,所谓“太祖建都和林”之说当由此而来。实际上这里只是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之一,当时还未建城郭(后来窝阔台所建和林城也不在太祖斡耳朵原地),更不可能仿效中原制度建置“路”的行政机构。所谓“立元昌路”的记载是可疑的^③。

中统年间(一二六〇至一二六四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各自称大汗,胜负未定,和林名义上还是都城。到中统四年,忽必烈才正式升开平府为上都,次年又以燕京为中都。至元九年(一二七二年),设立和林转运司^④。后来,大约在平定昔里吉之乱后(至元十九年),改置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⑤,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管理政府所属军民和城郭、工局、仓廩、屯田、驿站等

① 俄人波塔宁(Потанин)以为此斡耳朵应在今厄得尔河边,布莱资奈德从其说(见《中世纪研究》第一卷页五八注)。丁谦《长春真人西游记地理考证》、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均主应在今塔米尔河上游之南。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波义耳英译本第一卷页五四,何高济汉译本上册页六二)载,畏兀儿人认为其祖先源于鄂尔浑河,“此河发源于他们称为哈刺和林的山中”,有三十条河同源于此山;窝阔台所建之都城即因此山得名。虞集《高昌王世勋碑》(《元文类》卷二六)所载畏兀儿先世传说与志费尼略同,亦以和林为山名。据此则哈刺和林系古代畏兀儿人对杭爱山的称呼。惟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和《元史·地理志》以哈刺和林为河名,指今鄂尔浑河上游。《史集》中,经常将这一带地方泛称为哈刺和林之地。

③ 《元史》卷九一《百官志》:“国初,太祖定都哈刺和林河之西,因名其城曰和林,立元昌路。”此段文字必有脱误。同书《地理志》仅谓“初立元昌路”。许有壬《敕赐兴元阁碑》(《至正集》卷四五)云:“且和林自元昌路为转运司,为宣慰司,又为岭北行中书省”,亦不言设置年代。在其他元代文献中,找不到忽必烈以前曾设过此路的有力佐证。

④ 《元史》卷七,《世祖纪》。

⑤ 和林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失载,据上引许有壬文,知应在置转运司之后。《经世大典·站赤》载:“至元二十年二月,丞相火鲁火孙等奏:和林宣慰司答木丁乞降差使铺马圣旨。”这是最早提到该机构的一条资料。按《元史》卷一六九《刘哈刺八都鲁传》,以擒昔里吉献俘于朝之功,授和林等处宣慰副使。昔里吉被擒送朝廷事在至元十九年。

事务。

岭北地区西北部的吉利吉思、谦谦州等处,是拖雷长妻唆鲁禾帖尼的封地。唆鲁禾帖尼死后,其封地由幼子阿里不哥一家继承。至元七年,忽必烈派汉人刘好礼担任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往治其地,将该地区纳入朝廷直接管辖下,以限制阿里不哥家族的势力^①。五部指益兰州(Илан,突厥语,意为蛇,地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乌鲁克木河南)、吉利吉思、谦谦州、乌斯(今叶尼塞河上游乌斯河地)和撼合纳(Qabqanas,突厥语,意为布囊,今叶尼塞河上源贝克木河谷地带)。昂可刺部(今叶尼塞河与安加拉河合流点以北地区)附属于吉利吉思,也在五部断事官辖境之内^②。刘好礼设治于益兰州,建城郭,置官署。近年考古学者在乌鲁克木河支流帖列克特河旁登·帖列克(Ден-Терек)发现一元代古城,城内有官署、民居等建筑物遗址,并发现兵器、农具、碾磑等遗物,城外有灌溉渠道及耕地遗迹,应为元代益兰州城^③。后诸王脱脱木儿等叛,据谦谦州、吉利吉思之地,至元十七年,刘好礼被迫逃回朝。至元三十年,元军越唐麓岭(今唐努山脉),渡谦河,收复吉利吉思等五部之地,屯兵戍守^④。

成宗末年,岭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窝阔台汗国已被打垮,元朝势力扩展到按台山以西;原窝阔台后王所领部众,有的被元军俘虏,有的归附朝廷,大批地迁入岭北,达百余万口^⑤。这就需要设置更高一级的行政机构进行管理。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武宗即位后,即罢和林宣慰司,置和林等处行中书省,治和林。同时置和林路总管府,管理和林城及其周围地区;置称海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分治岭北地区西部。原来在岭北统兵、并积极参与定策拥

①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二〇一。

②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八。元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上载:“益吉刺日不落,只一道黑气遮日,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刘敬之(好礼字)往任断事官,亲见之。”益吉刺即昂可刺,据此知其地亦在断事官辖下。

③ 克兹拉索夫:《Ден-Терек 废城》,《古蒙古城市》,页五九至一一九。

④ 《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

⑤ 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中庵集》卷四。

立武宗的太师月赤察儿,被任命为和林行省右丞相,封淇阳王,有诏命宗藩、将领皆听其指挥^①;又以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出任行省左丞相。在岭北地区设立行省总军领民,授予行省丞相以节制诸王的大权,这是元朝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大发展^②。仁宗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和林路改名和宁路。

岭北行省“统有北边等处”(《元史·百官志》),其辖境大体和上述晋王所统之地相同,即蒙古本土及其以北地域。按照分封制度,岭北是晋王分藩之地,如同安西王分藩于秦蜀,西平王分藩于吐蕃的情况一样。按照行政建制,岭北行省作为元朝中央政府分治北边的地方最高政府机构,统辖这一方面的所有地区,“控制一方,广轮万里”^③,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站等事,都由行省管领。岭北是元朝皇室的故土,蒙古诸王最集中的地区,因此行省丞相常以勋旧重臣担任^④。自设立行省后,晋王的权力相对削弱了,王府直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限于本位下。行省官对诸王的无理要素和干预可予以拒绝;行省不能决定的事务,则报告中书省议决^⑤。

岭北行省管内的地方行政区,《元史·地理志》仅载有和宁路与称海宣慰司两处,其下不置州县。这是因为当时岭北蒙古人民仍是按千户、百户的组织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和宁路总管府和称海宣慰司都元帅府的管区范围也不清楚。这两个地方政府机构直接管辖的大概只是直属朝廷的城市居民、工局、屯

① 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② 武宗即位前拥重兵镇守岭北多年,成宗死后,他就凭借所掌握的强大武力,径自在和林召集诸王、贵戚、大臣会议,谋取帝位。及闻其母欲立弟仁宗,即与亲信大将床兀儿等率劲旅分三道南下,仁宗不得不将已抢到手的帝位奉让给他(见《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因此,武宗从自己的经验中深知亲王总兵岭北的利害,这可能是他即位后就设立行省来统辖岭北地区,而不再授权于亲王的原因。

③ 《元史》卷三一,《明宗纪》。

④ 朱思本:《和宁释》,《贞一斋诗文稿》卷一。

⑤ 虞集:《苏志道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一五。

田、仓廩和屯戍军队等。太宗窝阔台时,和林及其周围地区划为大汗驻地,除设四季行宫外,还有不少从中原和西域迁来的工匠所建立的居民点^①。元朝政府又先后在这个地区设立多处屯田;建立了和林、孔古烈、扎浑、昔宝赤城等大仓库^②。这些都是直属于政府,由朝廷派官管理,隶于和宁路总管府的。还设置了和林兵马司,掌管地方治安工作^③。

称海宣慰司治称海城。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这里就是从中原各地迁来的汉民工匠聚居之所,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屯田,城中还置有仓廩^④。由于其地近按台山,处在东西通路的要冲位置,后来成为元朝防守按台山沿边一线的军事重镇,真金、铁穆耳(成宗)、海山(武宗)都曾在这里巡抚或长期镇守。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年),曾罢宣慰司,改置称海屯田总管府,其后又恢复了宣慰司的建置^⑤。

岭北地区原来的蒙古诸千户,多数分属诸王或直属朝廷,当不归地方政府管理。大德末年以来陆续归附元朝,迁入岭北的原海都属下各部落人民,都由行省负责安置,出官钱易牛羊给之畜牧,或发给农具、田种使耕垦自贍^⑥。这部分人民自然归行省管理,可能按其所居之地分别隶于和宁路和称海宣慰司。

岭北行省北境的“大泽”东西,分布着巴儿忽、火里、秃麻、不里牙惕等部落。马可波罗将这个地区称为“巴儿忽地面”,并谓其境广袤达四十日程,该

① 《张辉卿纪行》,见王恽:《秋涧集》卷一〇〇。

② 《大元仓库记》。

③ 苏天爵:《周贞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一七;张思明:《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和林金石录》。

④ 《长春真人西游记》;许有壬:《镇海神道碑》,《圭塘小稿》卷一〇。

⑤ 《元史》未载复置称海宣慰司事。据宋濂《危素墓碑》(《宋学士文集》卷五九),危任中书参政时(至正二十年危始任参政),有人告发岭北参政董复初在称海宣慰司任上曾取官米千石,危遣人复按无实。据此知至正中尚存称海宣慰司建置。称海城遗址迄今未见报导,据推断当在今蒙古科布多省宗海尔罕山北。参阅陈得芝:《元称海城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四期,一九八〇年。但其地尚未发现古城遗址。

⑥ 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元史》卷二二、二三,《武宗纪》。

地区的部落隶属于大汗政府^①。这就是元代一件公文中所说为“八里灰田地”（八里灰为巴儿忽之异译）^②，按行政区划应在岭北行省分治范围之内。元朝在这里设置火里秃麻牧场，为太仆寺所领全国十七道国家牧场之一^③。

吉利吉思、谦谦州等地自至元三十年收复并屯兵戍守后，当亦复设了行政管理机构^④。元朝政府曾将吉利吉思、乌思、撼合纳等部人民迁于辽阳行省和大都附近、山东等地，但不可能将他们全部迁离故土。《元史·地理志》载，谦谦州有“居民数千家，悉蒙古、回纥人。有工局数局，盖国初所徙汉人也。”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迁移了大批汉人工匠居其地，从事织造绫罗锦绮；谦谦州出良铁，当然也是蒙元时代兵器生产的重要基地^⑤。元朝专掌兵器制造和供应的武备寺属下有“欠州兵器局”（欠州即谦谦州），秩从五品，按规定其所辖工匠应有一千户以上^⑥。

诸王分地是岭北行省境内的一类特殊政区。每个王领有分属于他的一部分民户和牧地，称为“爱马”（ayimaq），元代汉译为部，或称位下（也作投下）。诸王视其地位高低、属民多寡，各置王傅、府尉、司马或断事官等，管理所领军民，并可以成立自己的怯薛，形成许多不同层次、大小不等的藩领。当然，他们都统属于大汗（皇帝），王位的承袭、官属的设置，都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

拖雷诸子袭领蒙古本土和多数蒙古千户。其中阿里不哥诸子的分地在按

① 《马可波罗环宇记》，摩勒、伯希和英译本，页一七七。

② 《元典章》卷五九，刑部十九，《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参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注》，Bargu 条。

③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马政》。

④ 元末人杨瑀《山居新话》列举谦州出产的各种石盐及湖盐，有红色、青黑色数种。“或方而坚，或碎而松，或大块可旋成盘者。大管盘处亦以此为课程抽分”。瑀友人中有曾亲历其地者，尝以此盐遗瑀。有关该地区诸部的记载亦屡见《元史》本纪，知元朝中后期仍对该地行使着有效统治权。

⑤ 《长春真人西游记》。

⑥ 《元史》卷九一，《百官志》；《元典章》卷九，吏部三，《局院官》。

台山至吉利吉思等处^①，蒙哥子玉龙答失的分地在札不罕河^②，而怯绿连河上游祖先故地则被授予忽必烈之孙晋王甘麻刺，其余诸王的分地所在多不明。

东道诸王分地除斡赤斤一支外，都应包括在岭北行省境内^③。搠只哈撒儿的后裔世袭领有也里古纳河、海刺儿河、阔连海子等处分地，因其中原分地在般阳路，故初封淄川王。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哈撒儿次子移相哥之孙八不沙封齐王，此后这一支的首领都承袭齐王封号。今额尔古纳河西支流乌鲁伦圭河上游，曾发现一二二五年所立的畏兀儿字蒙古文石碑一块，记述移相哥射猎事，以前学界称之为“成吉思汗石”，碑的附近还发现元代宫城一座^④。这一带正在哈撒儿分地之内，此城当是其后裔所建，疑即齐王府所在地。合赤温后裔世袭领有兀鲁灰河等处封地（约当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和蒙古东方省南部地），其中原分地在济南路，故这一支为长者封济南王。大德十一年，济南王也只里因参与阿难答篡位之谋被杀，另立其族人朵列纳为济王，后改封吴王^⑤。别里古台后裔世袭领有斡难、怯绿连河等处分地，其中原封地在广宁府，故这一支为长者世封广宁王。

三 经济与文化

户口与赋役

岭北行省的主要居民是蒙古各千户所辖牧民。成吉思汗时代先后设立的一百多个蒙古千户，随着蒙古国的对外征服战争和领土的扩大，有相当一部分

①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三一〇。

②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六〇。

③ 东道诸王皆在晋王统领之下，其分地在行政区划上当亦属岭北行省。虞集《苏志道墓志铭》载，延祐年间苏志道任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时，曾拒绝诸王的无理要索，受到吴王朵列纳的赞扬，并以名马赠之。朵列纳为合赤温后王，这也可以说明东道诸王爱马是划在岭北行省辖境内的。

④ 《古蒙古城市》，页二三至五八。

⑤ 《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卷一〇八，《诸王表》；卷二二，《武宗纪》。

迁离蒙古本土。如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所属十几个千户都到了各自的分地，斡赤斤所领诸千户大部分进入辽东。据《史集》记载，拖雷承袭左、右翼共一百千户，其中有汉、乣军二十千户、汪古部四千户均本在漠南，弘吉刺、亦乞列思、札刺亦儿、兀鲁、忙兀等五投下十几个千户也南迁了，留在岭北的大约还有五十多个千户。此外还有东道诸王和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所领的十几个千户^①。不过，各千户所辖户口数是完全无法统计的。一方面，因历次战争和镇戍各地的需要，都从各千户签军调往外地，另一方面，因自然的人口增殖，加上征服战争中从各地俘掠来的驱口，户口数又不断增加。据拉施都丁说，到他写《史集》的时候（十四世纪初），大汗属下的蒙古各千户军队由于人口繁殖而增加了两倍^②。

大德末年，窝阔台汗国败亡，其民大批归降元朝而迁入岭北，据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载，“诸部落降者百余万口”。《元史·武宗纪》载，至大元年三月，“以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仰食于官，非久计，给钞百五十万锭，帛帛准钞五十万锭，命太师月赤察儿、太傅哈刺哈孙分给之，罢其廩给。”这里说的也是岭北行省的事，所指当即诸部落降者。其中有一部分是投奔海都的拖雷系诸王部众，如阿里不哥之子明理铁木儿所部^③，投降后回归岭北；一部分则是海都的属民。岭北人口因此大大增加了。

岭北行省的居民中，还有从其他地方迁来的各族人，包括工匠、屯田户、戍军及僧、道、儒、医、工商、官宦等诸色人户。成吉思汗攻金期间，命率族归降的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六六至二七七。《元朝秘史》所载授予诸子、诸弟的千户数目，与《史集》有很大出入。又《史集》将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列为左翼一千户，而《元史·别里古台传》则载成吉思汗授予他蒙古民三千户。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二七九。据载，所有属于拖雷承袭的军队，以及分给月伦母后和诸弟的军队，这时都在大汗属下。

③ 《史集》记载明理铁木儿部下那颜十九人，其中有一个万户，四个千户，一个怯薛长，据此可以推知其部众之数。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三一三至三一五。

永清土豪史秉直管领降民,达十余万家,不久迁之漠北^①,虽然道上饿死很多,总有相当多的汉民到达了漠北。成吉思汗西征回来时,也带回大量西域人,如仅撒麻耳干人被驱东迁者即有三万人,而玉龙杰赤人被俘为驱者则达十万人^②。拔都西征中,也掳来不少钦察、阿速、斡罗思等族人。这些俘掠来的各族人民大多数被分配给诸王、诸将,一部分则直属于大汗。因此,居住在岭北各地的汉人和西域各族人为数甚多,特别是和林、称海、谦谦州等城市和地区,更是汉、回人聚居之所。入元以后,又多次从中原和江南调遣成千上万汉、南军民到岭北各地屯田和戍守^③。世祖末年,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土土哈及其子床兀儿相继率领哈刺赤军万余(主要由钦察人组成),长期戍守按台山沿边,于是这批哈刺赤军户遂留居称海一带。至正中,分地在按台山之西的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乘中原红巾军起义之机,举兵叛乱,元顺帝遣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出征,“行至称海,起哈刺赤万人为军”^④,足见该地钦察等族居民之多。

《元史》缺载岭北行省户口数。根据上述早期的诸王所部千户的大略数目和大德末年仰赖政府救济的诸部降民数目推测,大约在二百万人以上。我们从下面的一条资料中,也可以窥见其大概。顺帝至元四年,总兵岭北的郯王彻彻秃入朝,丞相伯颜求婚不许,乃指使昌王实兰朵儿只告发彻彻秃企图造反,因逮入狱,杀之。曾侍郯王的华亭人夏侯尚玄上书为之讼冤,说“郯王守国北门,……所统军四十八万,其将帅皆素所信任之亲王,设有他志,当与之谋

①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

② 《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第一卷,页一二二,一二七至一二八。

③ 元代遣往岭北屯田、戍守的汉族军民数目无法统计。至元中,刘国杰统侍卫军万人北征,后复屯田称海等地(见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大德十一年,武宗以汉军万人屯田和林(见《元史》卷二二)。这是人数最多的二例。《元史·兵志》“岭北行省屯田”条载:“英宗时立屯田万户府,为户四千六百四十八。”这只是称海地区的情况,并非完全的统计。

④ 《元史》卷二〇六《叛臣·阿鲁辉帖木儿传》。

议,而乃遣使于千里之外、异姓之王而图之,此虽儿童知其必不然。”^①彻彻秃所统的四十八万军队,应当就是那时岭北诸王之军的总数。根据军数可以大致推测出诸王所部民户的数目。

蒙古牧民隶属于各部(爱马),编籍在各千户、百户之下。他们在本部“著籍应役”,严禁“擅离所部”,违者斩^②。因天灾、战乱而逃散的蒙古人,要被“勒还本部”^③。他们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格。牧民要负担国家的赋役,还要受各级领主的剥削。《黑鞑事略》记载:“其地自鞑主、伪后、太子、公主、亲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这虽是记载窝阔台时代的情况,但以后无大变化。各部民户的多寡,是决定领主的剥削收入和势力强弱的最重要因素,因此诸王、那颜们往往为争夺属民发生争执事件^④。

蒙古牧民的赋税主要是羊马抽分(qubchir)。据一二三三年规定的制度,“其家有马、牛、羊及一百者,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牝马、牝牛、牝羊及十头,则亦取牝马、牝牛、牝羊一头入官。若有隐漏者,尽行没官。”定宗贵由时又规定:“马、牛、羊群十取其—”,增加了剥削率。后来,抽分之制定为:“马之在民间者,……数及百者取一,及三十者亦取一,杀于此则免。牛、羊亦然。”^⑤蒙古各万户、千户合纳差发、羊马抽分,由宣徽院掌管。延祐二年规定:“抽分头匹羊口,自前是宣徽院管来,如今迤北蒙古百姓每,各千户并各处口子里,交他每委人抽分者,城子里交本处官司就便提调抽分者。”^⑥千户是岭北地区的地方基本行政单位,所以赋税的征收就由千户那颜委官掌管,而上其数

① 危素:《夏侯尚玄传》,《危太朴续集》卷八。昌王为亦乞列思部驸马,驻地在宁昌路。

②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卷三四,《文宗纪》。

③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卷二七,《英宗纪》。

④ 《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⑤ 《大元马政记》。

⑥ 《元典章》卷一六,户部二,《禁治久食分例》。

于宣徽院。

蒙古牧民负担的徭役,主要是兵役和站役。有大规模的征伐,政府就下令从各千户签发兵员,由所属诸王和千户统领出征,马匹、兵械、衣服杂器等都由被签民户自备。元朝驻戍各地的蒙古、探马赤军,皇帝、诸王的怯薛,也是从蒙古各千户签发兵员补充。岭北地区在成吉思汗时代就设有驿站,窝阔台即位后,制定了驿站制度,从各千户签调站户专门承当站役,除出人夫(ula'achi,兀刺赤)外,还要自备站马、祗应(shi'usun,首思)、帐房、什物,负担极其沉重^①。元代岭北行省的驿站,通往上都、大都的有帖里干、木怜两道共数十站,此外还设置了由和林通往察合台汗国及吉利吉思等北境诸部、由称海至北境等处的驿道^②。凡朝廷官员往返岭北,诸王、公主、驸马、千户等到上都朝会或遣使奏事以及运送官物,都由驿道行走。由于朝廷各衙门和诸王贵戚等泛滥给驿,遣使频繁,使站户负担大大加重,以致破产,不得不“鬻其妻子以应役”^③。

在蒙古地区,“人以孳畜多寡为贫富”。大牧主拥有成千上万的马、牛、羊,使用牧奴为之放牧^④,而普通蒙古牧民则仅有少量牲畜。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年),帖里干、木怜诸站因诸王、驸马聚会,频取物力,站户消乏,政府遣官分别贫富等差,规定“其有马、驼及二十,羊及五十者,是为有力。”政府不再给予赈济^⑤。站户一般是从中等民户中签取,可见有这个数目的牲畜者,就是蒙古牧民中的中等之家了,其余不足此数的贫户当更多。如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年),检核诸王兀鲁带部民,贫无孳畜者达三万七百二十四户^⑥。贫苦的蒙

① 《元朝秘史》第二七九节至二八〇节。

② 参阅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一期,一九七七年。

③ 黄溍:《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答失蛮)神道碑》,《黄金华文集》卷三四。

④ 揭傒斯:《中顺大夫竹温台碑》(《热河志》卷一一九)。

⑤ 《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

⑥ 《元史》卷六,《世祖纪》。兀鲁带是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之孙,封河间王。

古牧民常有卖身为奴者,尤其是遇到天灾,更破产流离。如延祐年间岭北地区大风雪,羊马尽死,蒙古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元朝政府立宗仁卫收养之,所收蒙古子女有三千户^①。普通蒙古牧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

蒙古诸王、那颜们都拥有奴婢,多是战争中俘掠的各部各族人民。他们有的是工匠,有的充当牧奴,或从事其他劳动。有一个江西人七岁时为元军所掠,被辗转卖给一个蒙古牧主,带到草地,主人将他改名察罕,命他放牧二千头羊,早出晚归,所牧羊有死、伤、逃逸或养瘦的,都要遭到主人的鞭挞^②。这个江西人的遭遇,很具体地反映了牧奴的悲惨状况。

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畜牧业是岭北行省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自漠北统一后,在各部混争停止、社会安定的条件下,畜牧业得以不断发展。尽管蒙古统治者屡次从各千户签发大批人马进行征服战争,蒙古本土仍留有足够的劳动力以维持畜牧业生产。到窝阔台在位时,由于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扩大牧场,因而命人到“川勒”(cöl 荒地)无水之地踏查,在可以做营盘的地方穿井,使百姓散开住坐。后来元朝政府也不断在漠北进行凿井,开发无水草原^③。元代岭北地区的蒙古牧民户口数有很大的增长,这也标志着畜牧业有了显著的发展,否则是无法维持成倍增殖的人口生存的。

古代的草原游牧经济是很脆弱的,无法抗拒自然灾害的袭击。在漠北地区历史上,往往一次大的风雪或干旱,就会造成众多牲口的死亡和整个部落的远距离转徙,甚至会导致一个强盛的游牧政权的瓦解和崩溃。元代史籍中,屡屡记载岭北一些地区遭受严重的风雪灾害,畜牧亡损殆尽,人民饥饿流散的事

①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卷八六,《百官志》。

② 张养浩:《驛卒佟锁住传》,《归田类稿》卷一一。

③ 如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发兵千五百人赴漠北浚井(《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年),调左右翊军赴北边浚井(《元史》卷二七,《英宗纪》)。

件,多至不胜枚举。但元代岭北地区作为统一国家内的一个行省,又是元皇室的祖宗根本之地,统治者为了维护诸王、贵族的利益和保持其“国族”的强盛,对这个地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遇有自然灾害发生,就能从中原调拨大量粮食、布帛进行赈济,赐银钞或购买羊马分给之;因天灾流散的人民,也常由政府发给资粮遣还本部。如大德九年(一三〇五年),“朔方乞禄伦(即怯绿连河)之地大风雪,畜牧亡损且尽,人乏食,其部落之长咸来号救于朝廷。公(贾秃坚不花)为之请官市驼马,内府出衣币,而身往给之,全活者数万人”^①。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斡儿朵思之地频年灾,畜牧多死,民户万七千一百六十,命内史府给钞二万锭赈之”^②。此类记载在《元史》中累见。因此,元代岭北行省的自然灾害,没有造成像历史上其他时期那样的严重后果。

元代岭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历史上空前的。辽代曾在胪胸河(今克鲁伦河)和镇州(今蒙古布尔根省青托罗盖)地区经营屯田,但辽亡后就废了。成吉思汗攻金后,从中原俘迁大量汉民工匠到漠北,他们一方面从事手工业生产,一方面在地理条件适合的地方也耕垦自给。如一二四七年张德辉在怯绿连河上游就见到有汉民居住并从事耕作;和林川西北忽兰赤斤之地,“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③。尤其是田镇海率领降民万余“辟兀里羊欢地为屯田”并建立了镇海城(即称海城)^④,规模更大。窝阔台时代,在和林地区也开始耕垦土地,种植粮食蔬果^⑤。谦谦州有汉人工匠千百,那里地宜耕种,他们自然也从事农业生产以解决食粮需要了。

其后,元朝政府进一步在岭北地区发展屯田事业,除称海外,怯绿连河、和

① 虞集:《宣徽院使贾公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一七。

② 《元史》卷三五,《文宗纪》。

③ 《张辉卿纪行》。

④ 许有壬:《怯烈公(田镇海)神道碑》。

⑤ 《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第一卷,页二一三。

林、杭海山麓、五条河、呵札，以至益兰州、谦谦州、吉利吉思等地都先后开辟屯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至元十四、五年刘国杰等率侍卫军参加讨伐昔里吉之乱，后一部分汉军留戍称海、和林，开辟屯田。至元二十五、六年海都东犯，称海等处屯田遭到破坏，元军将海都逐出岭北后，又逐渐恢复。一次是大德三年海山出镇称海，随从他戍守北边的诸卫军经营屯田以助军食。五年，成宗派往北边犒军的使者还朝，“言和林屯田宜令军官广其垦辟，量给农具；仓官宜任选人，可革侵盗之弊。从之”^①。和林宣慰司副使郭明德也上书陈备边之策，以为北边屯兵需粮甚多，若依赖从中原调运，不仅费用大，且不足供应。他说：“今和林之北，地宜麦禾，昔时田器在在有之。夫京师六卫，每军抽步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和林寒苦，汉军不能冬，若于蒙古诸军拣其富庶强壮者戍边，贫弱者教之稼穡，俟其有成，如汉军法以相资养；置田官，起仓廩，严赏罚以课其殿最。”^②据此知当时岭北以二人屯田即可给八人之食，确是解决戍军食粮需要的良法。但郭明德提出的以蒙古军屯田的建议似未实行。到大德十一年设立行省之后，武宗又命汉军万人屯田和林，次年（至大元年）秋成，收获达九万余石^③。行省左丞相哈刺哈孙命人经理称海屯田，岁得米二十余万石，于是“益购工治器，择军中晓耕稼者杂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数千顷，谷以恒贱，边政大治”^④。这是岭北屯田最显著的一次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原来主要以汉军屯田扩展到选人指导各部落民（主要似是由海都境内东迁的部落）从事农业生产。无疑，一部分蒙古人学会了耕作，开始过半农半牧的生活。此外，至元中刘好礼奏请选派中原人到益兰州等处，教

① 《元史》卷二〇，《成宗纪》。

② 苏天爵：《郭明德神道碑》，《滋溪文稿》卷一一。

③ 《元史》卷二二、二三，《武宗纪》。

④ 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又《元史》卷二三《武宗纪》载：至大三年六月，“和林省臣言：贫民自迤北来者，四年之间，糜粟六十万石，钞四万余锭，渔网三千，农具二万。诏尚书、枢密差官与和林省臣核实，给赐农具田种，俾自耕食。”此与上引哈刺哈孙碑说的是同一件事。

当地人垦种^①；大德初年，朝廷给晋王所部（在怯绿连河上游一带）屯田农器牛具，并增其屯田户^②。这些都说明岭北地区农耕范围的扩大。农业生产作为畜牧业的补充，在元代岭北行省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

手工业方面。蒙古牧民的生活必需品，仍然主要由他们的家庭副业生产，男子制造弓箭、鞍具、车帐、皮革和搅马奶酒，妇女制乳酪和缝皮衣、鞋帽之类^③。大批中原和西域各地精巧工匠的迁入，使岭北地区的手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蒙古国都和林，是各族能工巧匠最集中的地方，汉族工匠尤多，据一二五四年访问和林的法国教士鲁布鲁克记载，城中的汉人区居民全是工匠。还有来自中亚、波斯、鞑罗思以至西欧的匠人，如著名的万安宫殿门前银树，即系巴黎名匠威廉所造，巧思精绝^④。被俘掠来的各族工匠，有的属于皇帝（大汗），有的分属诸王、大臣，除和林外，他们还分布在岭北许多地方。他们为蒙古统治者建造宫室府邸，织作绫罗锦缎，制造金银玉器，以及生产弓箭等各类武器和其他用具。

岭北地区的商业，蒙古国时期基本上掌握在回回商人手里。早在成吉思汗建国以前，他们就往来于西域、漠北和中原各地，以粮食、缎匹等换取游牧民的皮毛牲畜，转手贩卖。后来，许多回回商人投充蒙古贵族的“鞑脱”，势力更大。据鲁布鲁克报告，和林城的回回区即是市场所在，很多商队来到那里经营贸易^⑤。在元代岭北行省的商业活动中，回回人仍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甚至深

① 《元史》卷一六七，《刘好礼传》。据考古报告，苏联图瓦自治区之 Ден-Терек 古城（元益兰州）外，有规模巨大之古灌溉渠遗迹，延伸达数十公里，足见垦地之多；古城中发现大量磨坊石，证明其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见克兹拉索夫：《图瓦之中世纪城市》，《苏联考古学》一九五九年第三期）。

②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

③ 《鲁布鲁克行记》，见道森：《出使蒙古记》页一〇三。

④ 同上书，页一七五至一七七，一八四。从中亚各城掳来的匠人，先多居于和林等地，后来不少人迁入中原。参见朱德润：《中政院使买公世德碑》，《存复斋文集》卷一。

⑤ 《鲁布鲁克行记》，见道森：《出使蒙古记》页一八四。

入到最边远的吉利吉思、巴儿忽、豁里等部落之地，贩运那里出产的海东青到大都^①。到明洪武初，蓝玉统兵攻北元，至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还俘获撒马儿罕商人数百^②，可见岭北行省境内回回商人数之多。岭北各爱马和戍军需要的食粮数量浩大，尽管开辟了屯田，毕竟因气候寒冷，多数地方不宜种植粮食，元朝政府除每年从中原转运官粮以供应外，又以数倍的优厚价格招募商人贩运粮食到和林，官钱不足，就以盐引偿之，于是内地富商趋之若鹜，获利甚大^③。这种厚利和余的政策在成宗初年开始实行，作为定制，每年和余粮数大概都有规定，如至正七年定额为十五万石^④。由于设置了通往中原和西域的驿路，元朝政府又采取了优待商人的政策，为各地商人前往岭北经商提供了很大便利与安全保障，这也是元代岭北地区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宗教与文化

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是元代文化的显著特色。这一点在岭北地区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蒙古多数部落自古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入元以后，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多种宗教的影响，但基本上仍保持了原来的信仰。终元一代，源于萨满教信仰的各种“国俗旧礼”未尝废弃，由蒙古巫祝（萨满）主持其事^⑤。元文宗时，还为蒙古巫覡立祠，封蒙古巫者所奉神为“灵感昭应护国忠顺王”^⑥。岭北地区蒙古人的萨满教信仰，一直到明代后期才开始改变，逐渐为喇嘛教所取代。

①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九三。

② 《明史》卷三三二，《别失八里传》。

③ 《元史》卷一四〇，《铁木儿塔识传》；虞集：《送苏子宁北行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陈旅：《旌德县便民政绩记》，《安雅堂文集》卷七。回回商人也从事于岭北的粮食贩运，见《元史》卷二一，《成宗纪》。

④ 霍有孚：《岭北省右丞郎中总管收粮记》，见《和林金石录》。

⑤ 《元史》卷七七，《祭祀志》。

⑥ 《元史》卷三三、三五，《文宗纪》。

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约在十一世纪初传入漠北,为克烈、乃蛮两部的统治者所接受,在蒙古高原中西部广泛传播。蒙古建国后,后妃、大臣中有不少这两部的人,聂思脱里教得到他们的支持,其势未衰。许多中亚、波斯和叙利亚等地的聂思脱里教士来到蒙古,以其教法服务于蒙古贵族,如叙利亚人列边阿答、爱薛等即是^①。在元代岭北地区部分居民中,仍拥有此派信徒。

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道教、佛教、伊斯兰教随着各族人民的迁入而传进岭北地区。全真道首领丘处机首先受到成吉思汗的重视,一二二一年他应召赴西域,途经蒙古,留弟子宋道安等九人在称海城附近选地立观,名为栖霞观^②,这是岭北地区最早的一所道观。一二三五年窝阔台建和林城时,在城内也盖了道院,命全真道首领尹志平、李志常拣选有德行清高道人到和林住持^③。被当时欧洲人传为著名基督教徒的拖雷长妻鲁尼,对道教也很尊重,向她的中原分地内的道观颁发护持懿旨,赐给有名道士以荣誉封号^④,这充分表现了蒙古贵族对各种宗教的宽容态度。当时道教在中原汉地势力很大,迁到岭北去的汉人中自然有不少信徒,因而在岭北也建立了道观。还有一些道士在岭北蒙古诸王处服务,如江南道教首领张留孙的弟子陈宜甫,至元十八年奉诏从皇太子真金抚军北边,二十九年,又从晋王甘麻刺出镇岭北,留侍晋邸七年之久,大德三年请告南还,仍留其徒自代^⑤。和他同时在晋邸服务的还有其他道士^⑥。甘麻刺当然是不信奉道教的,为什么一定要有道士随侍呢?这可能是元朝的一种制度,出镇方面的亲王可以和朝廷

① 程钜夫:《拂林忠献王神道碑》,《雪楼集》卷五;韩儒林:《爱薛之再探讨》,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一卷三期,一九四一年。

② 《长春真人西游记》。

③ 沙畹:《蒙古时代之汉文诏书和碑铭》,《通报》,一九〇八年。

④ 参见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页一二二至一二三。

⑤ 张伯淳:《秋岩先生陈尊师墓志铭》,《养蒙集》卷四。

⑥ 陈宜甫:《秋岩诗集》有《夜静听道友董舒隐弹李陵思汉因赋长歌以写当时之意呈傅初庵》一首,诗中云:“我为听琴哀此意,何况飘蓬沙漠地”,知董姓道人也在晋邸。

一样拥有各种宗教的教士来为他告天祝寿。

蒙古统治者最初优礼的佛教僧人是中原的禅宗和尚中观与其徒海云^①。窝阔台时,佛教地位逐步提高。一二三五年建和林城时在城内也开始兴建佛寺^②。一二四二年,忽必烈召海云去漠北,问以佛法大意,次年,其子真金生,即请海云摩顶立名;海云随侍弟子刘秉忠并被留在忽必烈帐下服务^③。不久,另一名禅宗和尚至温也被召到漠北,在忽必烈王庭留居三年,“多有赞益”^④。一二四七年,窝阔台第四子合剌察儿又延请海云到和林,住太平兴国寺。次年,贵由也将嵩山少林寺名僧福裕请到和林^⑤。这个时期,迦叶弥儿(克什米尔)僧人那摩在蒙古汗庭也极受礼遇,蒙哥即位后,并尊之为国师,“授玉印,领天下释教”^⑥。

蒙哥统治时期,佛教在蒙古十分兴盛,势力超过其他宗教。蒙哥下令在和林大兴土木建造佛寺,以福裕主持其事^⑦。一二五四年鲁布鲁克在和林见到有偶像寺庙十二所,他曾走进一所寺庙,见僧人端坐诵经,口念“唵嘛呢叭囉吽”,可见是佛寺^⑧。一二五六年兴建的和林大佛阁高达三百尺,其旁建有僧房五间,规模最大,俗称“大阁寺”^⑨。蒙哥及其诸弟虽然对各教都采取兼容政策,但已明显地更尊崇佛教,因而佛教在岭北地区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考古工作者于蒙古国库苏古尔省阿尔布拉克县境发现了一处元代寺庙遗址和一块丁

① 晚出的蒙、藏文史籍载成吉思汗于一二〇六年(或一二〇七年)即致信萨斯迦派首领,表示崇奉喇嘛教。但这显然是后人伪造,不可信。参见本章第四节。

② 耶律楚材:《和林建佛寺疏》,《湛然居士集》卷一四。

③ 程钜夫:《海云简和尚塔碑》,《雪楼集》卷六;《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

④ 虞集:《佛圆普安大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八。

⑤ 程钜夫:《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雪楼集》卷八。

⑥ 《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

⑦ 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载,一二五五年佛道双方在和林举行大辩论之前,“时少林长老裕公建寺鹤林。”

⑧ 道森:《出使蒙古记》,页一三九、一八四。

⑨ 许有壬:《敕赐兴元阁碑》,《至正集》卷四五。

已年(一二五七年)所立的石碑,碑额为汉文“释迦院碑记”,碑文记述外刺部驸马八立托(蒙文作 Bars-tö'e)与公主一悉基捐资建寺,为蒙哥皇帝祝福^①。这说明佛教已传播到了岭北境内较偏远的地方。元成宗时,晋王甘麻刺在他的驻地也兴建了一座佛寺^②。和林的大阁寺,在元顺帝时进行了重修,更为宏壮,赐名“兴元阁”。

吐蕃佛教(喇嘛教)僧人可能在窝阔台时期也来到蒙古^③。一二四六年萨迦班智达应阔端之召来到凉州后,喇嘛教在蒙古人中更为传播。后来,忽必烈召见了八思巴,并将他留在藩府;葛哩麻派名僧葛哩麻八哈失则应蒙哥之召来到和林,被封为国师。喇嘛教最易为蒙古人接受,因而最受蒙古贵族的崇信,岭北地区的蒙古诸王、贵族自然也是如此。但元代吐蕃僧人在岭北的活动情况不大清楚。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年),泰定帝“命岭北守边诸王彻彻秃月修佛事,以却寇兵”^④,可见做佛事在岭北地区也很盛行。

岭北地区有不少回回人,其中有担任高官要职者,伊斯兰教也占有一席之地。据鲁布鲁克说,和林有二所“密昔吉”(礼拜寺)。元顺帝时,和林地区的回回人在当地长官八都鲁丁的支持资助下,捐资建立了一所苏菲派“道堂”(其波斯文碑现存,详见宇野伸浩等著《元后期和林城道堂(khānqāh)兴建记波斯文碑研究》,载日本《内陆亚洲语言研究》第十四辑,一九九九年)。

元代岭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是以前任何历史时期无法比拟的。在蒙古文字产生后不久,就编出了《大札撒》这部成文法典;不到半个世纪,就出现了

① 那木南道尔吉:《关于蒙哥汗碑和宫殿的发现与研究》,乌兰巴托,一九五六年。

②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三二二。

③ 藏文史籍《智者喜宴》载,成吉思汗即位后几年,即有藏僧到蒙古传教。又说窝阔台在位时,其弟媳赛因额客(Sayin-eke,蒙语,意为好母亲,指唆鲁禾帖尼)曾迎请恭塘巴授戒,为蒙古人求法之始。(参见毕达克《吐蕃与宋、蒙关系》)。喇嘛教传入蒙古的最早信息是忽必烈的长子(生于1242年之前)取了个藏文名字:朵儿只(rDo-rje,金刚)。

④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

《元朝秘史》这样里程碑式的巨著。这是蒙古族文化史上最杰出的成就。有了文字,蒙古族不仅可以更快地发展本民族文化,而且也便于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在元朝政府主持下,许多汉文儒家经典、史籍及其他著作被译成蒙文,由皇帝颁给蒙古诸王、百官。在京城设立了蒙古国子监,专教四怯薛及各爱马官员子弟,岭北地区各爱马当也选送子弟入学。

岭北行省像其他行省一样,设置了儒学、医学、阴阳学等学校^①。哈刺哈孙任行省左丞相时,在和林建孔子庙,未成,延祐四年(一三一七年)苏志道出任行省郎中,毕其工,延寓士之知经者至庙中讲学^②。除和林外,各斡耳朵、诸王爱马,也有设置儒学教授的。元顺帝时,郑暄被派到赤那思大斡耳朵担任儒学教授,张翥作诗送行,说:“……人俗殊淳古,皇文易化成,君行当劝学,无愧鲁诸生。”^③可见教学的对象应是蒙古子弟。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郑暄上书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貽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④看来,岭北地区的蒙古人虽然受到了儒学教育,但直到元末还没有改变本族习俗而接受汉人的礼法。

第二节 东北地区

一 元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

成吉思汗分封诸子诸弟时,把幼弟帖木格斡赤斤封在以哈勒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蒙古高原最东北地区;这就使斡赤斤极便于沿哈刺温山东麓继续向东

^① 见《和林金石录》所收和林三皇庙残碑题名。

^② 虞集:《苏志道墓志铭》。

^③ 《张蜕庵诗集》卷一。

^④ 《元史》卷四四,《顺帝纪》。

去扩展自己的势力,就像朮赤领地沿着蒙古国的西北界大幅度地向外推进一样。斡赤斤一家不仅在实际上取得了镇守辽东的藩王地位^①,而且甚至迟到塔察儿时代,那兀江(今嫩江)流域等地业已被直接并入斡赤斤后王的份地。蒙哥死后,塔察儿以东道诸王之长率先拥戴忽必烈为大汗,因而获得忽必烈的恩宠,在当时“享有很高的荣誉和尊敬”^②。然而这并没有能缓和元政府和斡赤斤后王之间争夺对辽东地区控制权的斗争。塔察儿甚至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擅自管领^③。至元二十三年,鉴于斡赤斤后王乃颜的反状日益明显,而元政府统辖东北行政的最高地方机构宣慰司“望轻”,元廷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正式将东北地区的行政建制升格为行省。翌月,又将省治从辽阳徙至咸平(今辽宁开原)^④。东京行省虽然不到半年就撤销了,但仍然成为催发乃颜起兵叛乱的直接原因之一。直到乃颜、哈丹秃鲁干之乱被平定以后,元政府在辽东地区的行省建置才巩固下来。

辽阳行省的辖境,东临大海,并包括骨嵬(即库页岛)在内。据《高丽史》忠烈王十三年(至元二十四年)九月,“东真骨嵬国万户帖木儿领蛮军一千人罢戍還元,来谒公主”^⑤。足证骨嵬在元政府屯戍镇守的范围之内。设置在辽阳行省最北的统军机构征东招讨司,位于“道路险阻”,须“犬驾杷行冰上”方可到达之处^⑥。东北设立的狗站起自黑龙江下游的末鲁孙站,由此直抵海口处的努儿哥地(或称纳里干、奴儿干)。征东招讨司即在与骨嵬隔海相望的努

① 《黑鞑事略》谓“其头项分戍,则窝真(即斡赤斤)之兵在辽东”。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页五六。

③ 《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一。

④ 《元史》卷一四,《世祖纪》一一。在此之前,辽东地区曾几度设立行省,但都未成定制。从至元十五年起,该地区最高行政机构就一直宣慰司。

⑤ 《高丽史》卷三〇,《忠烈王世家》三。

⑥ 《元史》卷五、六、八、一三,《世祖纪》二、三、五、一〇;黄溍:《别里哥帖穆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按黄溍上引碑及《辽东志》卷九《外志》均称这个统军机构为东征元帅府。

儿哥。文献中留下了元军曾在此地屯田镇守的记载^①。后来明朝于此建奴儿干都司,不过是沿袭前朝遗规而已。

行省西面辖有大宁路、宁昌路和泰宁路,自南而北分别与腹里地区的上都路、全宁路以及岭北行省相邻。宁昌、泰宁两路在《元史·地理志》中俱被载录于中书省之下。但据《经世大典·站赤》,在辽阳行省的辽阳路和辽东道宣慰司所辖驿站中,即包括宁昌站和泰州站^②;而这两处驿站的所在地,正是建置宁昌和泰宁两路后的路治。《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明言泰州属辽阳省。可见从至元到延祐年间,这里始终隶属辽阳行省。宁昌地区当亦如之。《元史·地理志》所记恐有不确。宁昌路为亦乞列思部封地,它与翁吉剌部封地全宁路的分界,当在今老哈河与西辽河交汇点南北一线^③。

辽阳行省的南端,包括辽东半岛在内。它的东南与高丽接壤。行省所辖开元路南境最初抵于铁岭(在今朝鲜元山之南)。十三世纪末,双城府治(在今朝鲜永兴)以南地区相继为高丽收复。此后开元路南界遂止于双城总管府治^④。至高丽恭愍王五年(元至正六年,即一三五六年),高丽政权遣枢密副使柳仁雨破双城,“于是按地图”收复都连浦及定州、宣德、元兴三关门以南的朔方道全境。“三关门没于元九十九年,至是始复之”。元与高丽国疆界的东段,由此北移至今朝鲜咸兴南—西南一线,大致上恢复了辽金时期的状况^⑤。两国边境西段,至元初年以鸭绿江以南高丽国“北界”(亦称“西北面”)诸州辖境为界。至元六年,高丽权臣林衍、李藏用等废高丽国王王禕,立王弟湄,擅

① 张克敬:《张成墓碑》,《满洲金石志》卷五。又据《盛京通志》卷一五“城池”,宁古塔东北三千余里有“海边古城”,在“混同江(今黑龙江)之东南入海处,城外有元时石碑。路远,莫考其详”。

②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

③ 参见《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箭内互:《元代的东蒙古》,《蒙古史研究》。

④ 谭其骧:《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历史地理》创刊号。

⑤ 《高丽史》卷五八,《地理志》三。都连浦系高丽国沿其北部边界所筑长城的东端所在,在今朝鲜咸兴南。定州、宣德、元兴都在咸兴之南及西南,是长城三镇。

断国政。高丽国西北面兵马使营记官崔坦、三和校尉李延龄等以讨林衍之名叛，挈西京（今朝鲜平壤）等六十余城降元。于是高丽北界和西海道（今朝鲜黄海南、北道）一部被并入元境。明年，元廷改高丽西京为东宁府，以崔坦为总管。是时以慈悲岭为两国界山。至元十二年底，又升东宁府为路，至元二十七年，复因高丽之请，以东宁所辖诸诚归还高丽。至是，元与高丽间的这一段边界线，亦大体恢复到元初乃至辽金时期的状况^①。《经世大典·站赤》有关辽阳地区站赤的叙述，根据的是至元中叶的资料。所以在辽东道宣慰司所辖驿站下，仍载录东宁路马站“一十处”^②。废东宁路后，开元路之西的辽阳路亦与高丽接界，边界最西段起始于鸭绿江入海口。所以当时的高丽诗人李穡曾有“鸭绿东岸是吾土”之句^③。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之西的婆婆府，是这时候从高丽入元境之后“驰驿中原”的“第一程”^④。

按照蒙古的分封制度，辽阳行省的不少地区作为份地被分封给了诸王或功臣。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家，即位于宁昌路的昌王（亦乞列思部贵族孛秃后裔）封地，位于泰宁路的辽王（斡赤斤后裔）封地，以及世袭国王爵位的木华黎后裔的封地。“东诸侯”中的兀鲁、忙兀二部封地，后来也在辽东。成吉思汗

^①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高丽史》卷二六，《元宗世家》二；卷三〇，《忠烈王世家》三。又参见箭内互：《元代满洲的疆域》，《满洲历史地理》卷二。慈悲岭一名崑岭，在今朝鲜黄海北道中部。

^② 据《经世大典·站赤》和《析津志·天下站名》，这十个驿站依次为宣州、云兴、安信、都护府（今朝鲜安州）、肃州、安定、东宁府（今朝鲜平壤）、林原、生阳、洞仙。洞仙“其东海，其北接合懒府”。整个驿路，横贯东宁路辖境。自宣州往北，在鸭绿江南岸，尚有灵州、谊州（当即义州）诸驿。惟自至元十三年起，位于鸭绿江下游左岸的静州、义州、麟州（今朝鲜新义州东之麟山场或即其遗址）、威远镇凡三州一府改隶于辽阳路婆婆府。故灵、谊等驿虽在鸭绿江南，却不在上述十处之中。三州一府之地，当同东宁府路一起归还高丽。

^③ 李穡：《自京师东归途中作·婆婆府》，《牧隐集》卷二，转引自《元代满洲的疆域》。

^④ 李穡：《牧隐集》卷三。婆婆府后废为巡检司。

异母弟别里古台的份地在岭北,他在广宁路有一部分五户丝户,因此其后人中有被封为广宁王的。在以上诸家中,辽王和木华黎后人与元代中后期辽东政治史的关系尤为密切。

乃颜之乱平定后,原来隶属于斡赤斤后王而为元军“系虏”的蒙古、女真军队及其他人户,都被括入国家版籍,其中一部分还被徙置江南。元廷在今松、嫩流域立肇州城(在今黑龙江肇州西南,松花江畔),迁吉利吉思、乌斯、撼合纳等部众东居,并组织当地的各族部民在该地区开垦。但是,未曾直接参与叛乱的斡赤斤系诸王所部军民,并没有被元政府全部褫夺^①。不仅如此,东迁的吉利吉思部民,至少有一部分在不久之后就拨给了乃颜的兄弟脱脱统属^②。延祐三年,脱脱又正式受封为辽王^③。他的分地应该就在泰宁路。入明后,设泰宁卫于此。据《武备志》、《登坛必究》等书,泰宁卫的蒙语名称音译为往流,它书亦作罔留,是即 Ongli'ut 的对音,意谓“属于王的人民”。那么这个“王”是指什么人呢?按明初的兀良合三卫,都以“率众来附”的原蒙古贵族为指挥同知,仍由他们“各领所部,以安畜牧”。其中任泰宁卫指挥同知的,正是“故元辽王”。由此可见,驻牧于泰宁之境的“王的人民”无疑就是辽王部民。实际上,辽王所据之泰宁路,很久以来就成为斡赤斤后王份地的一部分了^④。仁宗、英宗两朝,辽王脱脱“位冠宗室”,势力很大。英宗末年,他矫旨杀宗亲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但仍得到泰定帝的宽宥,受厚赐,放还辽东。泰定五年(一三二八年)泰定帝死于上都。图帖睦尔据大都称帝。“时东藩诸

① 大德末,廷臣建言:“前乃颜叛,其系虏之人,奉世祖旨俱隶版籍。比者近臣请以归之诸王脱脱,彼即遣人拘括。臣等以为此事具有先制。今已归脱脱所部,宜令辽阳省臣薛闾干等往谕之;已拘之人,悉还其主。”诏从之(《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可见乃颜之乱后被元廷夺还的是战争中“系虏”之人。脱脱等人仍别有所部。

②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大德九年七月,“给脱脱所部乞而吉思民粮五月”。

③ 《元史》卷一〇八,《诸王表》。

④ 参见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穹庐集》。

王连辽海兵,方旅拒上(指文宗图帖睦尔)命”^①。在为争夺帝位而爆发的两都之战中,辽王脱脱成为以梁王王禅、权臣倒刺沙为首的上都集团骨干成员。上都军队倾巢出动进攻大都时,脱脱与倒刺沙一起留守上都,上都军一度进展顺利。正值其时,驻扎在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不花帖木儿倒向大都,领兵袭取守备空虚的上都空城。脱脱就在上都失守时,为齐王月鲁帖木儿(哈撒儿系诸王)斩杀于军中。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八月文宗复位之后,即封脱脱之子牙纳失里为辽王,以故辽王脱脱印赐之^②。牙纳失里死于何时不可确考。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元亡后投降明朝的最后一任辽王名为阿札失里,他降明后即被明政府任命为同知泰宁卫指挥使事。

国王木华黎后人在辽东也有相当势力。木华黎的封地,蒙古国时期是在桓州、兴和一带^③,他们迁往辽阳行省驻牧,可能是在中统、至元之初^④。所以嗣位为国王的木华黎后人,往往奉命“之国辽阳”^⑤。而据黄溍《别里哥帖穆尔神道碑》,木华黎曾孙硕德在世祖即位之初,“自辽西召入宿卫”。由此似可进一步推定,当时札刺儿部的封地,是在后来的大宁路一带。正因为封地在东北,所以木华黎一家在辽阳行省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元末明初在

① 尚师简、张起岩:《张应瑞先莹碑》,《满洲金石志》卷四。

② 《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③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上都路,……元初为札刺儿部、兀鲁郡王墓地。”兀鲁部后裔封德清郡王,故志文称为兀鲁郡王。札刺儿部即木华黎国王的本族部众。一二三九年木华黎孙速浑察嗣位为国王,乃“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元史》卷一一九,《速浑察传》)。蒙语阿儿查秃(Archa-tu)译言“有柏树”。其具体地望不详,要之殆不外乎桓州界。札刺儿家族的墓基地直到元朝中叶仍在兴和(治今河北张北)一带,见黄溍:《别里哥帖穆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④ 危素《送札刺儿国王诗序》记云:“及建都开平、大兴(按指金大兴府,治中都,亦即元大都),则视辽阳行省为之左臂,以异姓王札刺儿氏、兀鲁氏、忙兀氏、亦乞烈思氏、瓮吉刺氏列镇此方,以为藩屏”。瓮吉刺封地在应昌路,不属于辽阳,此为危氏误记。亦乞烈思部封地所在之宁昌路应属辽阳而被元志误植入中书省辖下。其余札刺儿、忙兀、兀鲁三部居地,当如危氏所说,是在忽必烈初年迁到辽阳行省的。见《危太朴集》续集卷一。

⑤ 《元史》卷一三九,《朵儿只传》。

辽东局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野仙溥花、纳哈出等人，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①。

元朝灭亡前后，辽阳行省的社会矛盾显得非常复杂。在当地部族吾者野人、水达达与元朝统治者之间，在进入辽东的红巾军与元军及高丽国之间，在辽东元军诸帅之间以及他们与高丽之间，先后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②。元顺帝退出大都后，辽东元军将领各自拥兵一方，无所统属。元中书左丞相也速在山东兵败，“以余兵遁栖大宁”^③，嗣国王、辽阳行省丞相、乃蛮台长子野仙溥化驻兵开元^④，洪保保据辽阳，哈刺不花据复州（今辽宁复县西北），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屯盖州（今辽宁盖县）得利羸城^⑤，平章高家奴聚兵平顶山（今辽宁本溪市南）及其东北的老鸦山一带，纳哈出则率众屯保金山^⑥。野仙溥花曾与高家奴、纳哈出、刘益等合兵围攻辽阳城，破之，洗劫全城，执洪保保而去^⑦。不久，野仙溥花被退据应昌的元顺帝任命为中书左丞相，纳哈出遂继野仙溥花出任辽阳行省左丞相，寻加爵太尉^⑧。辽东各支元军在纳哈出号令下，成为北元

① 见《元史》卷一三九《乃蛮台传》。《明史》卷一二九《冯胜传》末附文云：“纳哈出者，元木华黎裔孙”。

② 参见和田清：《明初之满洲经略》，《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卷一四。

③ 《元史》卷一四二，《也速传》；《辽东志》卷八，《杂志》。

④ 野仙溥花一作也先不花。当时开元城系指咸平（今辽宁开原）。

⑤ 在今辽宁复县。一说即盖州东南二十里之得利山城，见《辽东志》卷一《山川》“盖州卫”条。

⑥ 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二，明太祖二十年（一三八七年）明军出攻纳哈出时，先“至辽河之东”，“遂进师驻金山之西”；师还时“次金山、亦迷河（驿马河）”。被明军俘获的纳哈出部将乃刺吾，遣放后“还至松花江见纳哈出”。在此前后，纳哈出“所部妻子将士凡十余万，在松花河（松花江）北”。他的屯兵大营之一，在龙安（今吉林农安）一秃河（伊通河）。从以上记载来看，金山当位于今东辽河北岸、伊通河之西。而纳哈出的活动中心，在金山—龙安—秃河—亦迷河流域一带，北及松花江以北。参见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据地》，《东亚史研究》蒙古篇。

⑦ 《辽东志》卷八，《杂志》。洪保保后被释还。

⑧ 刘侗：《北巡私记》。

政权的一大支持势力。

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年),明军乘元顺帝病死应昌之机出师北袭,克应昌,元嗣君爱猷识理达腊仅带数十骑北遁。翌年春,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其兵马钱粮之数,遣右丞董遵、金院杨贤奉表来降”。明朝遂于辽东半岛南端复、盖等州之地建辽东卫,卫指挥司设在得利羸城,以刘益为指挥同知。不到半年,随刘益降明的洪保保等人杀刘益,北逃投奔纳哈出^①。同年,新任定辽都卫都指挥马云等由登莱渡海,逼降盘踞在辽东半岛最南端金州(今辽宁金县)的元臣叶廷秀。接着,明军击退围攻辽阳城的高家奴,缮城池、治兵甲,正式在这里建立了定辽都卫(后改为辽东都司)。洪武五年,恃险固守平顶山的高家奴兵败降明。此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负隅辽东的元军奉北元正朔,大体上与明军沿大宁、全宁一线,以及在开元、辽阳之间胶着对峙。尽管纳哈出不断出击明军,明对辽东地区的军事经略仍在缓慢但十分稳妥地扩展。明军先后扫荡了大宁、全宁全境,又建东宁、沈阳等卫,使自己对整个辽东南部的防御连成一片。屯守今乌苏里江流域及其东北滨海地区的元鲸海千户所、牙兰千户所的军官和部分兀者野人部众也相继向明军献诚。

洪武二十年,明廷以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副之,率众二十万,大举征讨纳哈出。明军师次金山,纳哈出势蹙款附,有二十余万元军被俘^②。越明年,明军又乘势北进,“肃清沙漠”。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从今呼伦贝尔地区西奔。明与北元之间的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纳哈出的投降,使盘踞在他北面的辽王阿札失里失去了南线屏障而直接面临明军威胁。脱古思帖木儿西窜后,阿札失里势力更显孤单,于是他在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一、六五、六六。

^② 关于明与纳哈出的战争,可参见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十二,“海西侯纳哈出”。

洪武二十二年向明政府请求内附。明朝在其故地置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以阿札失里为泰宁卫指挥同知。尽管由于三卫抄掠边地，明政府后来又曾数次遣兵征讨^①，但阿札失里的降明，终究标志了元在辽东统治势力的最后消亡。

二 东北各族及其社会经济

元代居住在辽阳行省的民族或部落，有汉族，还有蒙古、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诸部，吉里迷、骨嵬等等。辽王朝曾经把大批汉人强行迁徙到中京（今老哈河上游）、东京（今辽宁辽阳）等地区，广置头下军州，这是东北汉族人口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元代辽阳行省的汉族人口，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辽河流域和渤海湾东西地区。辽河流域东面的渤海遗族^②，在元朝属于“汉人”八种之一，大概逐渐融合到当地的汉族、女真等人口当中，极少再见于史载。在元与高丽的交界地段，还有一些高丽族聚居区。本节主要叙述汉族、渤海和高丽以外的东北各族。

驻牧于辽阳行省的蒙古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跟随份地在这里的诸王勋臣一起迁徙来的蒙古部众，如斡赤斤后王、木华黎国王、兀鲁、忙兀等部的部众，以及从云南调到东北的营王所部等。他们主要分布在行省西南的草原地带。另一来源是先后被遣往该地区担任镇戍的蒙古军。这部分蒙古人分布的面更广一些，但其戍守重点，仍是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行省南部。元明之际，黄河以南的蒙古部众溃败离散，它北面的蒙古人先后跟随纳哈出、阿札失里等人降明。明朝中期以前随着朵颜、泰宁和福余三卫势力的扩张，留在东北地区的蒙古人几乎全被称为兀良哈蒙古。十六世纪中叶，蒙古察哈尔部东迁，

^① 参见和田清：《兀良哈三卫的据地》。

^② 姚燧：《赵椿龄墓志铭》：“东京当高丽、倭奴用兵之冲，其间渤海、女直、契丹错居，俗各异宜”。见《牧庵集》卷二八。

越过大兴安岭,进入辽东。兀良哈三卫解体。朵颜卫的蒙古部众最终融入喀喇沁部和东土默特部^①。

辽河流域曾经是契丹故地。在金代,除留居故地者外,还有部分契丹人陆续被金政府从西北路或西南路强制迁徙到这里。金后期的耶律撒八、耶律窝斡起义失败后,金政府解散了所有的契丹猛安谋克,甚至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②。成吉思汗起兵朔漠时,东北的契丹人乘机在耶律留哥率领下反金,数月聚众至十余万。耶律留哥西觐成吉思汗后,不愿归附蒙古的契丹部众辗转进入高丽。一二一九年,他们在蒙古军和蒲鲜万奴派遣的东真军队围攻下败绩,降众五万余。其中有极小部分人留在高丽,后来,高丽政府下令专置“契丹场”以居之;大部分随蒙古军西返,属驻扎在临潢附近的耶律留哥统辖,以后又随留哥后人徙至广宁等地^③。在此之后,这批契丹遗民亦逐渐不见于史籍。

由上所述可知,元代东北地区的契丹人,实际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入元时早已被离散部落,杂处于它周围的汉、女真或其他诸族之中,因而逐渐被后者所吸收。另一部分,诸如辽东乡兵中的契丹军或留哥所部,尚能保

① 据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内蒙古要略》一,清代内蒙诸部大都为元宗室后裔,属于孛儿只吉歹氏,“惟喀喇沁及土默特左翼三部四旗为元太祖臣济拉玛(按即者勒蔑)之裔,则姓乌梁罕(按即兀良哈)”。同书又曰:“喀喇沁者,元太祖大臣札尔楚泰(按即札儿只兀歹)子济拉玛之裔,始附于明,为朵颜三卫都督、都指挥”。朵颜等卫部众中有属于者勒蔑后裔的兀良哈人,或即三卫得名兀良哈之由来。实际上,喀喇沁和东土默特部本来也属于孛儿只吉歹氏,都是跟达赉逊库登(达延汗曾孙)东迁到辽东的察哈尔汗近亲后裔。后来,泰宁、福裕两卫被察哈尔汗的另外两个近亲和尔朔齐(内喀尔喀部祖先)和奎蒙克(科尔沁部祖先)并灭,乃颜部则被得名于哈喇慎(或哈喇慎)大营的老把都(即俺答弟巴雅思哈刺)后裔喀喇沁部所控制。一六二八年,喀喇沁、东土默特等部被达赉逊后人林丹汗击败,或亡或衰。几年后,林丹汗受后金皇太极逼,退出辽东。朵颜兀良哈人遂冒用了喀喇沁和土默特的部名。参见和田清:《察哈尔部的变迁》,《东亚史研究》蒙古篇;余元庵:《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一九五八年。

②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

③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高丽史》卷一〇三,《赵冲传》、《金就砺传》。

持或重新恢复了聚族而居的状态。然而无论如何,至迟到元明之际,这一部分契丹人,当也已经融合到它周围的民族之中而不复存在了。

金代东北地区的女真猛安谋克,大约不下二、三十万户。其中上京地区是他们的重点屯防区之一。金元鼎革之际,蒙古军队攻逼于西,蒲鲜万奴招聚女真部众自立于东,东北女真人的分布重心略呈东移趋势。元辽阳行省的女真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一是从辽阳(今辽宁沈阳)地区以南直到达辽东半岛南端的女真人,其中一部分是辽初被耶律阿保机强迫迁去的。史载“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相通。迁入辽阳著籍者,名曰合苏款,所谓熟女真者是也”^①。元哈思罕万户府、千户所之名,即得诸合苏款。在辽河两岸,金咸平、东京、北京,包括半岛地区的“系辽籍”熟女真,受汉文化影响较深,文明程度是比较高的。

其次,在“熟女真”的东北方向,散布在长白山西麓北至松花江上游和中游,以及牡丹、绥芬二河流域的女真语诸部,与系辽籍女真相区别,曾被称为生女真,或谓其“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②。其经济文化的发展,虽比原来系辽籍的女真诸部稍落后一步,不过在金元两代,他们早由于和汉、渤海等民族的互相融合或影响而逐渐扩大农耕生产。至少是到元代,他们与其南面的所谓“熟女真”,恐怕差别已经不很大了。明中叶前后南迁定居在这一带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各部,或“乐住耕,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或“俗尚耕稼,妇女以金珠为饰,倚山作寨,聚其所亲居之”^③。如果不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甲集,政宣上卷三。

② “自咸州(在今辽宁开原北老城镇)之东北,分界入山谷,至于束沫江(松花江),中间所居,隶属咸州兵马司,许与本国往来,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束沫之北,宁江(在吉林扶余东)之东北,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散居山谷间,依旧置外野处,自推雄豪首长,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则谓之生女真”。见《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卷三。

③ 《皇明九边考》卷二。

是因为当地土著部民的主体即女真人中间农业经济本已相当发达,这些原先不务农耕的后来者,怎么能这么快地就学会定居和农耕的生活方式呢?

其三,由此继续往北、东北,在东北流松花江、混同江的两岸及其周围的深山茂林中生活的通古斯语族诸部,构成了元代称为女直水达达(或水达达女直)和兀者诸部的主体。达达(鞑鞑)一名出自 Tatar,从唐代起,即已不断地见于汉籍。它曾经由部落名称演变为对漠北高原上诸多原蒙古语部族的共称。但从五代至两宋,汉人一般把他们误说成“靺鞨之遗种”。在十三、四世纪的蒙古语中,Tatar 已经被重新还原为一个蒙古部落的专名(汉译塔塔儿),而以 Mongghol 来总称属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各部;但在另一方面,在元代汉语中,达达却逐渐成了蒙语 Mongghol 的固定的汉语译名之一,用来专指蒙古族或蒙古人^①。杨显之《郑孔目风雪酷寒亭》第三折:“他道:你是甚么人?我道:也不是回回人,也不是达达人,也不是汉儿人。我说与你听者”^②。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即位诏书,亦把蒙古诸部驻牧的岭北地区称为“达达国土”^③。秘史中的合木黑忙豁里(Khamugh Mongghol-i)旁译作“普达达行”,总译“众达达百姓”,更明确地反映了元代的蒙汉对译体例^④。而水达达这个名称,出现得要更早一些。南宋彭大雅一二三二年至一二三三年的北使记录《黑鞑事略》,在列举蒙古“残虐诸国”、“已争而未竟者”时,提到蒙古“西南曰斛速益律子”,小注云“水鞑鞑也”。斛速益律子当为斛速益律干之误,是蒙语 usu irgen 的音译,意为“水百姓”。这种斛速益律干,是指东真以北、黑龙江沿岸的通古斯语族各部,当时尚未宾服蒙古。彭大雅说他们在蒙古西南,所记不确。可见水达

① 《事林广记》续集八《蒙古译语》:“达达,蒙古歹(Monggholtai)”。

② 臧晋叔编:《元曲选》已集下。

③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

④ 《元朝秘史》第五二节。又参见同书第一八九节等。

达一名,至少在窝阔台时代已经出现^①。它实际是斛速益律干的汉语意译。这时候,达达亦已用指蒙古^②,惟尚未专属之。入元以后,达达的含义日渐专一;同时水达达作为非蒙古族而使用达达名称的既定特例,亦竟与元朝相始终。不过,为指明水达达与达达的一般内涵之间的区别,元人在许多场合都以女直与水达达联称,或谓女直水达达,或谓水达达女直,用以标示水达达的真正族属。

水达达虽然居住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之临江滨水区域,但大多数人仍然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牧猎生活^③;从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说,要比它南面的女真语诸部更落后一步。到明中叶,当它南面的女真语部落已基本变成成熟女真时,它们尚处在生女真阶段。明《开原新志》有云:“其脑温江(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龙江,谓之生女真。略事耕种。聚会为礼,人持烧酒一鱼胞,席地歌饮。少有忿争,则弯弓相射。可木(在黑龙江、松花江汇流处下游不远)以下,以桦皮为屋,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养马弋猎为生”^④。这种所谓“略事耕种”、“养马弋猎”的生女真,显然就是元朝时候的水达达各部。

分布于辽阳行省北部的通古斯语族居民,还有被统称为吾者、兀者或斡拙的诸部。满语森林一词,清代译写为乌稽、窝集等^⑤,当即兀者的异读。兀者

① 卡尔毕尼、鲁布鲁克、瓦撒夫、阿布勒肥达等人都提到过他们听到的有关 SuMongal(译写形式不尽相同)的传闻。突厥语 su 译言水。穆斯林史料中的 Sumongal,似指水达达女真而言,当即 usu irgen 一名流行于中亚的对译名词。欧洲人对东亚更加隔膜,所以卡尔毕尼说它曾与“大蒙古”(Yeke Mongal)、蔑儿乞、Mecrit(克烈)一起,组成蒙古的四部(four nations),自称塔塔儿。卡尔毕尼所谓加此种水蒙古,恐与水达达无涉,指的实际上就是蒙古塔塔儿部。

② 窝阔台时写给高丽国王的牒文,有“皇帝大国土里达达每,将四向周围国土都收了”等语。见《高丽史》卷二二,《高宗世家》。

③ 《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

④ 《大明一统志》卷八九《外夷》引《开原新志》。

⑤ “乌稽者,汉言大林也”,见高士奇:《扈从东巡日记》;“窝稽,盖大山老林之名”,见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艮维窝稽水源合考》。

部人之得名,盖因其出没于大山老林之故。清代仍有用之以为部族名称者,如东海兀哲部、窝稽部等皆是。

《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金之壤地封疆,东极吉里迷、兀的改诸野人境”。同书卷七三《完颜晏传》:“天会初,乌底改叛。……乃命晏督扈从诸军往讨之。至混同江,谕将士曰:‘今叛众依山谷,地势险阻,林木深密,吾骑卒不得成列,未可以岁月破也’。……声言俟大军毕集而发。乃潜以舟师浮江而下,直捣其营,遂大破之”。从以上记载可以知道,金乌底改诸部的分布大势,约是在黑龙江下游直抵奴儿干地区的沿江及大片深山密林之中^①。所谓乌底改人,应包括元代的水达达和吾者等通古斯语族诸部在内^②。元顺帝时期,由于政府向极东北诸部勒索海东青无度,激起水达达和兀者的反抗。这次起义时断时续,前后共经过近十年才最后失败。至正十五年,元廷复立吾者野人、乞列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尔分之地^③,便是镇压此次起义后的善后措施之一。哈儿分在黑龙江下游,元明两代皆置驿于此。明代亦一度因仍元朝旧制,在此设置过兀者野人、乞列迷、女直军民万户府。此外,明兀良哈三卫之一的福余卫,其蒙古名称曰我着,当亦得名于吾者。嫩江中游的这部分吾者人,或许和肇州的水达达人一样,都是在元初平定乃颜之乱以后从东面迁来的。

在大山中的吾者部落,多以射山为猎,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少数沿江滨水者,或亦以捕捞为业。与水达达相比,吾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更低一些。所以元代史料更多地拿吾者和野人相联称。元朝后期有一个东北籍人明里帖木儿,并不是吾者部人而自号“北野兀者”,被当时人看作是甘“以贱形加

① 按明《奴儿干永宁寺碑》谓本朝设都司于其地,实系继承“辽金时……故业”,足证金朝壤地之极东北,已到达东北亚这一段临海地区。

② 据《华夷译语·女真译语》“人物门”,女真语野人作“兀的厄·捏儿麻”。乌底改一名当与兀的厄同源,很可能是金代女真人对黑龙江下游地区通古斯语诸部的统称。元代的兀的哥人,其名称来自乌底改,所指似即兀者的一部分。

③ 据《经世大典序录·招捕》,大德年间,元政府即置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于其居地。

全人”^①。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吾者诸部文明程度较低的事实。

元代史料也记载了库页岛上的通古斯族居民,即骨嵬人。骨嵬既用作部族名,也是地名。它与唐代的窟说、屈说^②,明代的苦夷、苦兀^③以及近现代的库页,均为同名异译。元代文献提到的骨嵬岛居民,有吉里迷、亦里于、骨嵬三种。关于吉里迷,详下文。亦里于在通古斯语中原意为鹿。用做部族名,意即使鹿人,其族属未易确言。而以骨嵬命名的部族,当为该岛的主要土著居民。在唐代,这里的主要居民是通古斯语族的靺鞨;近现代,岛上除了南部的阿努依人(虾夷人)、近海岸地区有部分基里亚克人(即吉里迷人)外,其主要土著仍为通古斯语诸部^④。由此可以推想,元代的骨嵬人,也是说某种通古斯语的民族。他们大概不像以捕捞为生的吉里迷人那样善于造舟,所以有时还得坐着吉里迷人制作的“黄窝儿”船,从骨嵬岛浮海来到奴儿干^⑤。

辽阳行省界域内的古亚语族(Palaeo-Asiatic Group)居民,有吉里迷人以及在明代被称为“北山野人”诸部中的若干部分。吉里迷之名始见于金。上引《金史·地理志》已明言他们当时居住在金朝版图极东北的奴儿干附近。元代史料除了黑龙江下游沿岸直到奴儿干地区的吉里迷人之外,还提到了骨嵬岛上的觥因吉里迷^⑥。自金元迄于近现代,吉里迷人的分布地域似未发生

① 吴师道:《北野兀者赞并引》,《吴正传文集》卷一一。按明里帖木儿家族自其高祖时起即迁居北野山,所以他自称“北野兀者”。其父暮年“每怀乡土之念”,故死后“还葬柳城”以遂其愿。是知北野山在营州柳城。见黄滔:《明里帖木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七。

② 《唐会要》卷九六“靺鞨”条,黑水“东北十日程有窟说靺鞨,亦谓之屈说”。按《唐韵》,说一音弋雪切,与悦通。窟说、苦夷、库页音近,应是通古斯语族各部的读法;而骨嵬、苦兀恐怕反映了蒙古语民族对这个名称的发音。

③ 《奴儿干永宁寺碑》,《满洲金石志》卷六;《大明一统志》引《开原新志》。

④ 见《大英百科全书》“萨哈林”条。

⑤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黄窝儿”一译“广窟鲁”,是一种“头置枒杈,木根如鹿角状,两舷荡桨,疾行江中”的“五板船”。见《辽东志》卷九《外志》。

⑥ 《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重大变动。他们在清代志书中被称为济勒弥：“其在混同江口西至黑勒尔，则济勒弥部居之”^①。在描写东西伯利亚的同时代的沙俄或其他国家探险家著述之中，他们被称为基里亚克(Gilyak)人。现代俄罗斯学者又称之尼夫赫(Nivkh)人，这个词在其本族语言中原意为“人们”。

元朝文献有关吉里迷人生活和社会状况的记载，很不详细。据明《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引明东北地志《开原新志》佚文：“乞列迷有四种，曰曩家儿、福里菁、兀刺、纳衣。性柔刻贪狡。居草舍，捕鱼为食。不梳刷。以溺盥洗。父子不亲，夫妇无别。不知揖拜，不识五谷六畜，惟狗至多。乘则牵拽把犁，食则烹供口食。婚嫁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死者剖腹焚之，以灰骨夹于木末植之”。同书又记载骨嵬岛上的吉里迷人说：“男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岁即娶。食惟腥鲜”。这些记载中的吉里迷习俗，有相当部分一直保留到近现代。近代基里亚克人仍几乎完全靠捕捞为生，陆上狩猎以及妇女所从事的极有限的采集经济只作为其生活来源的补充而存在。尤其是在狩猎方面，他们只是在碰到机会时才在步行可止的近处顺便从事这种活动，而与它邻近那些在经济生活中狩猎占居很大比重的部族迥然不同。狗是他们驯养的唯一动物，在他们的衣食、运输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熊为牺牲的杀祭仪式，是他们每年“熊节”都要举行的重要活动之一。近代基里亚克人的家庭形式表面上是一夫一妻制的。但是，丈夫把自己的妻子、妻子的姊妹以及自己兄弟的妻子一概称呼为 аньхэй，而妻子也把自己的丈夫及其兄弟和自己姊妹的丈夫同称为 пу。男子对自己的全体 аньхэй 明确地拥有对妻子同等的权利。从这种婚姻形态中，似仍能看到古代吉里迷人“娶其姊则妹以下皆随为妾”的遗风。

^① 《吉林通志》卷一五。按黑勒尔河，在今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博格罗勃斯戈耶附近。这个地区，康熙《皇舆全览图》一排二号作 Keler Bira；乾隆《内府舆图》（即“十三排图”）六排东二作和勒尔比拉。

基里亚克人制作特别的木板船的传统技术,也一再被近代到过他们居地的探察家们所道及^①。从明代记载以及近代基里亚克人的社会生活,略可想见元代吉里迷人的状况。

吉里迷人虽然多与水达达等通古斯语族的部众错居在沿黑龙江下游两岸地区,但两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不仅所说的语言不同,而且经济生活也绝不相类。

《开原新志》还提到一种“北山野人”,说他们乘鹿出入。一般认为所谓北山,系指今外兴安岭。据《辽东志》补充,这些“北山野人”呈献给明政府的贡品,有海豹皮、海骡皮、海獾皮、犄角(原注即海象牙)、鲂须、好刺(原注即诸色鹿),要之大都是北海名产。足见他们居住在外兴安岭东端的鄂霍茨克海湾,并往北大概直到北极圈附近地区。《辽东志》称此种北山野人为“乞列迷之别种”。他们应该是当日居住在此间的吉里迷以外的古亚语族其他部落。

在“北海之南、大江之西”,也就是西南——东北流之黑龙江迤西地区,居住的是又一种“野人”。《开原新志》说他们“住平土屋,屋脊开孔,以梯出入。卧以草铺”。关于他们的族属,《开原新志》说得不很明确。《辽东志》说他们“与乞列迷为邻”,似乎他们本身与吉里迷不同族类。而根据大约同时代的永乐等朝实录,分布在这一带的土著部落首领,多为“女直野人头目”。是证海南江西的“野人”,其主体即为通古斯语部众。他们应当就是今天居住在这一地区的鄂温克、那乃(Nanais 即廓尔特)等族的先民。

辽阳行省各族的社会经济,可以分为农业经济、牧猎经济和捕捞经济三大类型。其地理分布,与各部族的地理分布基本相谐。辽东半岛,尤其金、复、盖州及哈思罕等地,辽河流域直至鸭绿江西,尤其大宁路诸县、懿州、咸平等地,还有肇州,耕植垦种原来就有一定的基础,是先后迁入东北的汉族人口比较集

^① 《大英百科全书》“基里亚克”条;《苏联大百科全书》“尼夫赫人”条;托迦列夫:《苏联民族志》基里亚克人部分。

中的地方,元政府还在这些地方建立过若干屯田基地,所以农业经济比较发达。行省中部,主要是牧猎经济的分布区,它又可以分为东、西两半。西面是蒙古人的游牧地区,而以狩猎经济为其补充。东面主要是女真和水达达居地,以狩猎为主,亦以部分畜牧、捕捞所得作为生活来源的补充;黑龙江沿岸和骨崑岛沿海的居民,则主要依靠捕鱼为生。黑龙江迤北地区又是狩猎经济区。

当然,三种经济类型的地理分布并不是绝对的。如至元二十八年十月,“以乃颜、合丹相继叛,诏给蒙古人内附者及开元、南京、水达达等三万人牛畜田器”^①。这些受牛畜田器的蒙古、水达达部众,既不是元政府派遣的屯田军,也不一定全都居住在上述农耕经济地区。又如明代居住在今乌苏里江流域和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至印诺谦提耶夫卡一带黑龙江沿岸的生女直,除“耕作狩猎”外,也驾“广窟鲁”船“疾行江中”^②。此种情况,元代当亦如之;则这个地区的水达达也从事捕捞。元代史料中的“捕鱼水达达”,指的或许就是此类部族。

元政府在东北地区的文化设施,以行省南部较为完善。这里有掌管儒学、蒙古字学、阴阳学、医学的各种专门官员及相应机构^③。宗教在元代东北地区的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金代佛寺之修建尝远至会宁(即今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④。元代在泰宁路建有万寿寺,入明后,“特敕本僧仍住持泰宁万寿寺,兴释迦之教”^⑤。主持这个寺庙的西番僧亦邻真臧卜,或许就是辽王的王师。至于辽河、黄河以南地区,辽金时代的宫观寺庙为数就很多^⑥。而元代佛道二教在东北的活动似仍以辽河以南及以东部分地区为主。此外,基督

① 《元史》卷一六,《世祖纪》一三。

② 《辽东志》卷九,《外志》“生女直”条。

③ 可参见《满洲金石志》载元祀北镇医巫闾山诸碑碑文署名及其他有关史料。

④ 《宝严大师塔志》,《满洲金石志》卷三。

⑤ 《华夷译语》下,《敕僧亦邻真臧卜》。

⑥ 参见赵万里校辑:《元一统志》卷二;《辽阳行者·大宁路·古迹》。

教聂思脱里派在辽东也拥有相当多的信徒。另外,分布在黑龙江下游等极东北地区的诸部族,直到近代仍流行萨满教;基里亚克人、鄂伦春人等还保持着“合屯公为大祭则射马、熊”的习俗^①。恐怕这种情况,从元代以来就一向如此。

第三节 西北地区

一 蒙古国时期的中亚

窝阔台时期

本节所述的西北地区,主要指东到今新疆哈密,西至阿姆河,北达塔尔巴哈台山与阿勒泰山,南抵昆仑山与阿富汗的中亚地区。

随着蒙古对外征服战争的扩大,大批蒙古人来到中亚,成为当地的统治民族。蒙古国时期,蒙古人在中亚仍保持游牧生活方式,居住在草原地区。今西北地区当时生活着许多民族。沙州之西的哈密立(今新疆哈密),居住着哈密立人,其族源目前尚不清楚。他们操东部突厥语,通用畏兀儿文(回鹘文),首领称为“的斤迭林”^②,在元代文献中常与畏兀儿亦都护并提,但在蒙古国朝廷中的地位低于亦都护。

哈密立之西是畏兀儿。畏兀儿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唐代漠北回鹘人的直系后裔,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今维吾尔族的直系祖先。九世纪上半叶,漠北回鹘汗国的汗族药罗葛氏失去政权,汗位传入铁勒阿跌氏贵族的手中。八四〇年

① 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

② “的斤”,突厥语 tegin,可汗弟子之谓,译言“亲王”。“迭林”,突厥语 terim,是对王室成员的称呼,亦用于妇女。见克劳森:《十三世纪之前的突厥语词源学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页五四九。元代有畏兀儿妇女号“赫思迭林”,当为突厥语 Qiz Terim 的音译,其意为“王室之女”。

回鹘西迁后,其统治权又转入铁勒仆固氏贵族的手中。畏兀儿之名在当时专指聚居在天山山脉东段南北别十八里、哈刺火州、昌八里(今新疆昌吉)、仰吉八里(今新疆玛纳斯)、和峻里迷(今新疆焉耆)这五座城市周围地区的西迁的漠北回鹘汗国移民的后裔,即五代与宋代史书中之“高昌回鹘”。十三世纪初叶畏兀儿臣属于西辽。畏兀儿当时在西北诸部中文化较高。其族人塔塔统阿曾受聘于乃蛮部,为乃蛮汗执掌金印及出纳钱谷诸事。畏兀儿知识分子还曾受西辽皇室延请为太子师。成吉思汗建蒙古国后,畏兀儿降附之。

元明时代的畏兀儿的含义窄于今维吾尔。畏兀儿以外今新疆其他地区及新疆以西地区的居民当时各有名号,不属于畏兀儿。如今库车地区的居民称为“龟兹人”。按台山(今阿勒泰山)地区驻牧着乃蛮人。哈刺鲁人(唐代葛罗禄人的后裔)的各分支游牧于海押立(其首领称阿儿思阑汗^①)、亦列河(今伊犁河,成吉思汗时代其首领为昔格那黑的斤)、吹河、忽章河(今锡尔河)上游流域。元代有时还将哈刺鲁人聚居地称为柯耳鲁地^②。哈刺鲁人原先为西辽属部,其首领降蒙后,受到优厚待遇。蒙古国政府置达鲁花赤监临其地。今天山以北草原当时还有一些被称为“途鲁吉”的人驻牧^③。“途鲁吉”即“突厥”(Turk)的元代音译,当为五代时“南突厥”或“北突厥”的后裔。今咸海周围地区是康里诸部的牧区,他们是唐代“康曷利”人的后裔。部分康里人还进入漠北,与克烈人杂处。

阿姆河以北农耕区的城镇居民多为粟特人的后裔,他们大部分已伊斯兰化。这一地区还生活着不少从花刺子模以北南下的康里人。阿姆河下游三角洲,今咸海以南地区称为花刺子模。花刺子模人原为东伊朗人的一支,为粟特

① “阿儿思阑汗”为突厥语 Arslan Khan 的音译,其意为“狮子王”。高昌回鹘的首领称号“阿萨阑汗”(即狮子王)即此词。

② 《元史》卷六十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中华书局标点本,页一五六七。

③ 同上。

人的近亲。至十三世纪已经完成了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金代汉文文献中称伊斯兰教徒为“回鹘”或“回纥”^①。伊斯兰教徒与西域人常在元代汉文史料中又通称为“回回”^②。

金元时代大部分粟特人已经波斯化或突厥化。波斯化的粟特人在穆斯林史籍中常通称为 Tajik^③。此外西域突厥化的回回人有时自称为 Sarta, 蒙古人称之为“撒儿塔兀勒”(Sarta'ul)^④。元代回回人继承了他们的祖先——隋唐时代的粟特人(九姓胡)善于贾贩的传统, 深入蒙古帝国内各大区域, 如汉地、蒙古草原和欧亚草原经商, 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势力。

伊斯兰化以后, 内陆亚洲绿洲城镇居民因幼年起名时多使用阿拉伯文经名, 故重名者很多。除加父名、祖名互相区别外, 还常缀以籍贯地, 说时自己是某处人氏。这种习俗在元代汉籍中亦有反映。如元代回回人常以原籍地作为自己的族属, 如不花刺人、于阗人、花刺子模人、班勒纥人等。而随西辽和蒙古军队来到中亚定居的则有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和唐兀人等。

绿洲农耕和城廓地带是中亚最富庶的地方, 也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共同财产, 所以这些地方的收益也按蒙古人各取份子的古老习俗, 由黄金家族的成员分享, 其民户按一定比例由各支宗王、亲贵分领。《瓦萨夫史》提到, 在不花刺的一万六千编民中, 属于拔都的有五千人, 属于拖雷妃唆鲁禾帖尼太后的有三千人, 属于大汗的有八千人。成吉思汗后裔中, 不论谁据有大汗之位, 都可以占有这八千民户^⑤。由于承继成吉思汗大位的大汗在黄金家族中的地位最为

① 大约当时汉地人与中亚往来的交际语是高昌回鹘所操之畏兀儿语, 故在金代文献中用“回鹘”、“回纥”来泛称高昌回鹘以西的民族。

② “回回”的词源也是回鹘、回纥。

③ Tajik, 汉译“大食”。在元吴鉴《清净寺记》中有“帖直氏”之名, 当为“大食”的元代另一汉字音译。

④ 今聚居于我国甘肃临夏州的东乡人的自称即为 Sarta。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所操语言为一种蒙古语, 但杂有大量波斯语与阿拉伯语词汇, 很可能是蒙古化的回回人后裔。

⑤ 《瓦撒夫史》第一卷, 哈默·普尔格斯塔尔德译本, 页二七八。

尊贵,故所领民户也最多。

蒙古国时期,治理中亚各地的蒙古大臣和其他各族高级官吏虽由大汗委任,但其属下同时还有代表各支宗王贵戚利益的官员。志费尼提到,受命镇守呼罗珊和柁楞答而的大臣真铁木儿(Chin Temür)的麾下,有代表窝阔台合罕利益的怯勒·不剌,代表拔都利益的诺撒勒,代表察合台利益的乞则里·不花和代表拖雷妃唆鲁禾帖尼太后的也可等人^①。元太宗时代,治理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大臣,据穆斯林史料记载,有哈扎刺不花(Khazar buqa)^②,驻守于那黑沙不城(Nakhashab,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之卡尔希 Karshi),而撒麻耳干与不花刺的长官是丞相大夫(Chingsang taifu)和不花太师(Buqa tusha)。而据耶律楚材记载,成吉思汗时代驻守于撒麻耳干的是契丹人耶律阿海,而不花刺的长官是女真人蒲察元师父子。汉文与穆斯林史料都提到,当时中亚最著高的长官是花刺子模人牙刺瓦赤,驻费尔干那西部的忽毡城,后奉调中原,由其子麻速忽接任。

蒙古统治者在中亚实行极为残暴的统治,强迫当地人民承担沉重的赋役。一二三八年,不花刺的人民掀起了反对蒙古统治和当地降蒙贵族的斗争。斗争的领导人马合木(Mahmud),是一位制筛匠,居住在距不花刺不远的塔刺卜(Tarab)村,因此又被称为塔刺比(Tarabî)。他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不

①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五七七。上述人名中,代表合罕利益的怯勒·不剌(Kül Bolat),其名意为“光灿的钢”。kül,唐代音译为“厥”;bolat是波斯语 pulad 或 falad 的突厥语形式,意为“钢”。据《史集》第一卷第一册,他是乃蛮人(汉译本,页二二二)。

代表拔都的诺撒勒(Nosāl),据《史集》第一卷第一册,他出自克烈部土伯夷惕族(汉译本,页二二二)。这个名字中的 no 即 naw,波斯语,此言“新”;sāl,亦为波斯语,意为“年”。关于这个名称的解释,见《金帐汗史评注》,页五四至五五。

代表察合台的乞则里·不花(Qizil Buqa),其名称意义为“红牛”。此名中的 qizil,乃突厥语,意为“红色的”。buqa,意为牛。代表拖雷家的也可(Yeke)的名字为蒙古语,意为“大”。

② 《瓦撒夫史》,孟买刊本,页二二八;参见《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英译本,一九六八年版,页四六九。

慎为蒙古大臣和达鲁花赤察觉,报知牙刺瓦赤,准备实行镇压。人民聚集在马合木周围,尊之为不花刺的算端。马合木号召人民说:必须清除世界上的异教徒,大家都应尽自己的力量,用刀枪锄钁、棍棒竿旗武装起来,开始行动吧!“异教徒”是伊斯兰教的习用语,这里专指入侵他们故土的蒙古人。人民响应马合木的号召揭竿起义。马合木派人进入富豪之家抢劫财物,并下令把没收来的浮财物分配给人民。志费尼站在为蒙古统治者服务的回回贵族的立场上,指责塔刺比,说他凌辱衣冠名流。贵族中有些被杀,有些出逃。这些记载正反映出,不花刺人民的起义除了反抗民族压迫之外,也带有阶级斗争的色彩。

逃亡出城的回回贵族向蒙古军求援,于是各路蒙古军、回回军队向不花刺方向集中。马合木派起义军出城迎敌。起义军素无训练,装备又差,但群众都相信马合木的话,以为自己“军队的一部分,是看得见的,由凡人组成,另一部分是看不见的,由空中飞行的天兵和地下行走的神族组成”,因此在战斗中异常勇敢坚定。马合木的说法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到蒙古军中,因此连蒙古军中也流传着“谁要向马合木动手,谁就会变成瘫子”的流言,这就大大动摇了蒙古军的军心。经过激烈的战斗,蒙古军大败,近一万人战死。起义军追赶上溃逃的税吏和地主,用斧子砸烂他们的头颅,狠狠打击了这些平时欺压鱼肉人民之徒。但在战斗中,起义军也损失惨重,塔刺比英勇牺牲。此后起义军由其两位兄弟继续领导。不久蒙古军援兵到达,双方再度激战。缺乏经验的起义军毕竟不是久经战阵的蒙古军的对手。塔刺比的两个兄弟阵亡,两万起义军被杀^①。

成吉思汗时代,察合台以皇子的身份“出镇西域”^②,但这并非表明中亚地区归其所有。事实上,察合台在中亚的份地仅是从畏兀儿之边延伸到阿

^① 以上见《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一二八至一三三。

^② 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姆河以北的草原地带。而中亚的城廓之地,如前所述,由朝廷委派大臣治理。元太宗窝阔台在位时期,察合台为诸王之长,遂生吞并城廓地区的野心。他发出一道令旨,将受命镇守中亚的大臣牙刺瓦赤治下的一个州郡改授于另一人。牙刺瓦赤对此十分不满,向太宗报告。太宗降旨斥责察合台的越轨行为,命他作出书面答复。察合台被迫认错,而太宗亦作妥协,把那个州郡赐予察合台。^①这一事件表明,中亚城廓之地虽处于蒙古国朝廷控制之下,但察合台因其势力的增长,已开始染指其地。不久牙刺瓦赤奉命离开西域,来到中原。此后从畏兀儿到阿姆河沿岸的诸城邑,即哈刺火州、别十八里、忽炭、可失哈耳、阿力麻里、海押立、撒麻耳干和不花刺等地,均由其子麻速忽管辖。

按元代制度,察合台的属臣与大汗派驻镇守中亚的大臣分属两个不同的系统。察合台为诸王,其投下藩邸有王府,设有各员属僚。察合台投下最受信任的大臣是伐者罗(Vazir)和阿迷的('Amid),大约是察合台的王傅。伐者罗的真实姓名今已无从查考,人们只知他是汉儿(Khitay)。伐者罗是他出任王府官职以后的称号^②,他的身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被蒙古人掳掠到中亚的中原知识分子的命运。伐者罗是一个文人,被蒙古军俘虏后起初在察合台的一位汉医那里做侍仆。那位汉医死后,他成为察合台麾下札刺亦儿氏大臣忽速黑(Qushuq)的牧奴。因为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忽速黑发现了他的才能,把他推荐给察合台,不久受到察合台的信任,位在诸大臣之上,可随时陈述己见,甚至可以处置察合台的亲属。但是作为一个汉人,他在察合台斡耳朵里十分孤立。察合台一死,伐者罗就被蒙古亲贵们以毒死察合台的罪名

^① 《史集》第二卷,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页一八六至一八七;周良霄汉译本,页一九〇。

^② 这个词形与阿拉伯—波斯语词汇 *vazir* 偶然相似。*vazir* 在突厥语中为外来词,源自梵文 *vajra*(汉译跋折罗),意为“金刚杵”,乃帝(因陀罗)之笏,霹雳之神。参见《史集》第二卷余大钧等汉译本,页一八四,注(6)。

处死^①。

据《史集》记载,阿迷的是讹打刺^②人。从成吉思汗西征时代起,他就追随察合台,成为其王府中主要的大臣之一。花刺子模灭亡时,察合台把成吉思汗赐给他的摩诃末算端的公主转赐给阿迷的,由此可见他在察合台斡耳朵中的地位。

贵由、蒙哥时期

大约在窝阔台去世的同时,察合台也死去。察合台子孙众多,其子抹土干在成吉思汗西征时死于范延(Bamiyan,即八米俺)城下。时长孙合刺旭烈(Qara Hülegü)刚出生,成吉思汗和后来继位的元太宗窝阔台都决定将来立他为察合台的继位人。察合台死后,其妃也速伦(Yesülün)与阿迷的等王傅根据这一遗命,拥立合刺旭烈为察合台兀鲁思之主。元定宗贵由继任大汗后,即以大汗的身份对察合台兀鲁思的汗位继承问题进行干预。他因与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Yesü Möngke)相友善,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遂以“舍子传孙为非”为由,废黜已在位五年的合刺旭烈,改立也速蒙哥为汗,并从各方面增强他的力量^③。从合刺旭烈到也速蒙哥的汗位交替,以及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察合台兀鲁思的新汗均由大汗从察合台后裔中择定。

察合台逝后,在他的旧臣中,阿迷的在合刺旭烈时代仍然握有大权。他为了保持自己家族的地位,在察合台的每一位王子那里都安插了自己的一个儿子作为侍从。也速蒙哥为诸王时,察合台派去为侍的是原哈刺汗朝贵族巴哈丁·麻儿亦囊尼(Bahā al-Din Marghinānī)。也速蒙哥即位为汗后,故他称汗

① 《史集》第二卷,余大钧等汉译本,页一八四至一八七;周良霄汉译本,页一八八至一九〇。察合台死后被处死的王府大臣不止伐者罗一人。《世界征服者史》提到,察合台的一位突厥丞相忽只儿(Hujir)和麦术丁(Majd al-Din)也被处死。这位忽只儿就是伐者罗。参见页三二一至三二二。

② Otrar,又音译为兀提刺儿。遗址位于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东岸,土耳其斯坦之南。

③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三二二。

后巴哈丁受到信用。而阿迷的则因与合刺旭烈的关系过深而遭弃用。

元定宗贵由死后，蒙古国上层爆发了拖雷系和窝阔台系争夺大汗位的斗争。以也速蒙哥为首的察合台兀鲁思支持窝阔台系诸王，但斗争却以元宪宗蒙哥即位，拖雷系胜利结束。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宗王中受牵连者，多被治罪甚至被杀。未受牵连的宗王则受赐金山以西诸地以为份地。元宪宗废也速蒙哥，将汗位复归于合刺旭烈。合刺旭烈在归国复辟途中逝去，其妃兀鲁忽乃哈屯监国执政，为时达十年之久。

蒙古亲贵之间的这场争位之乱，也波及畏兀儿之地。时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已死，二传至其子萨伦的(Salindi)。萨伦的亦都护党于窝阔台系诸王。窝阔台系诸王准备以武力反对宪宗蒙哥即皇帝位时，曾派畏兀儿人八刺必阔赤(Bala Bitikchi)与萨伦的亦都护联络。参与图谋的畏兀儿贵族还有叱理伽忽底(Bilge Quti)^①等人。他们打算装备一支五万人的军队，驻扎别十八里郊外，配合海迷失皇后、忽察和脑忽等窝阔台系亲贵的行动。不久这一图谋被泄露出去。撒伦的亦都护受到忙哥撒儿的刑讯，被迫承认参与谋叛，被处死刑。其弟斡根赤(Ögenchi)继立^②。

蒙哥战胜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诸王联盟赖拔都之力甚多，即位后拖雷系和朮赤系诸王的势力实际控制了整个蒙古国。一二五四年，法国国王的使臣鲁卜鲁克经过中亚时发现，蒙哥和拔都的势力分界于塔刺思河和吹河之间的

① 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圭斋文集》，卷一一）中有岳邻帖穆尔之兄叱理伽帖木儿，因杀西辽少监，促成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护归降蒙古有功，“加号叱理杰忽底”（《元史》卷一二四《岳邻帖穆儿传》称其名为“叱理伽普华”）。“叱理杰”即突厥语 bilge，此言“智”，“忽底”当为突厥语 qut-i，即 qut“福”加属格第三人称单数 -i。“叱理杰忽底”，此言“智福”。但《高昌偃氏家传》不载他被处死之事，仅言“叱理杰歿”，而《岳邻帖穆儿传》称“以疾卒”。此外，畏兀儿当时还有一个贵族官居“的斤必里杰忽提”(Tegin bilge quti)，“译言智福大相也”。见黄(湮)：《亦辇公神道碑》，《金华集》，卷二四。

② 斡根赤，或即《高昌王世勋碑》中提到的玉古仑赤。汉文史料不载萨伦的被处死事，显然是故意隐晦。

平原^①。至于阿姆河以北之地、讹打刺、畏兀儿、忽炭、可失哈耳、毡的、花刺子模和今费尔干纳之间的辽阔地域的管理机构，蒙哥在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两朝旧制的基础之上，设立别十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以讷怀、塔刺海和麻速忽主之^②。

管理领察合台汗国的兀鲁忽乃妃子仍留居草原地带的城廓。哈巴失阿迷的(Habash' Amid)及纳速刺丁(Nasir al-Din)在兀鲁忽乃处服务。也速蒙哥死后，察合台汗国内部的政治势力发生变化，阿迷的恢复了权势。他在大臣中实行清洗，处死了也速蒙哥的宠臣巴哈丁·麻儿亦囊尼。

二 元朝前期的察合台与窝阔台汗国

阿鲁忽、海都与八剌

在元定宗时代，拔都因与贵由不睦，不肯听命，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朮赤系诸王的半独立性势力，可以称是西北诸王摆脱大汗控制的行为的开始。但因朮赤系诸王支持蒙哥从窝阔台家族夺权成功，故拔都从未被划入叛王的范畴。叛王集团控制中亚的局面始于中统年间。阿里不哥被忽必烈逐出和林后，退居谦州。这里虽有农耕经济，但所获难以维持大量军队，阿里不哥因

^① 《鲁不鲁克游记》，柔克义英译本，页二三七至二三七；同书页一三八记载了蒙哥的话：“正如太阳光照到四方一样，朕与拔都的努力也伸及所有的地方。”

^② 《元史》卷三《宪宗纪》；《世界征服者史》，页六九九至七〇〇。在从窝阔台死到贵由即位之间的君位空悬期间，担任监国的脱列哥那皇后，企图除掉几个在窝阔台时代与她结下怨恨的大臣，治理中亚的麻速忽便是其中之一。麻速忽得讯逃离职守，奔投拔都处寻求保护。志费尼说，贵由即位后，命令牙刺瓦赤“兼领契丹、阿姆河以北及突厥斯坦之地”（汉译本，页二八四、三〇〇），此说不可信。《史集》记载，贵由即位大典上，麻速忽是从阿姆河以北之地前来赴会的。定宗即位后，命牙刺瓦赤掌管契丹之地，并以“突厥斯坦及阿姆河以北之地授之”（第二卷，余大钧等汉译本，页二一九）。一二五一年，镇守呼罗珊的蒙古大臣阿儿浑等到达别十八里时，曾遇到过麻速忽。一二五四年，旭烈兀西征时，在撒麻耳干受到过麻速忽的迎接（《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页六一三、七二七），可见这一地区确为麻速忽所治。

此以大汗的身份委派自己身边的察合台后王拜答里之子阿鲁忽(Alghu)^①赴别十八里行尚书省辖区征集给养。阿鲁忽在阿力麻里即察合台兀鲁思汗位,从监国哈屯兀鲁忽乃手中夺取权力,并得到别十八里行尚书省丞相麻速忽与当地守臣丞相大夫等人的支持,不但征集了大量军资,而且还扩充了自己的军队。不久阿鲁忽感到羽翼丰满,不愿再受制于人,遂叛阿里不哥,降忽必烈。忽必烈为争取阿鲁忽,亦以大汗的身份将东自金山、西至阿姆河的土地委付于阿鲁忽防守^②。

阿里不哥势衰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采取措施,打算恢复对别十八里等处行尚省辖区的控制。据瓦撒夫记载,这时“忽必烈合罕命一支大军前往阿姆河岸,使一切居于此地区的叛王统统从交通线上撤走,这样合罕的使臣就可以没有任何困难地往返于旭烈兀大王[与大汗]之间”^③。大约与此同时,元世祖还派人到不花刺去括户^④。

阿里不哥的失败也给海都扩张带来了希望。海都出兵向阿鲁忽进攻,并联合钦察汗别儿哥,击败阿鲁忽之军,占据阿力麻里。一二六五年,阿鲁忽逝

① 《重修文殊寺碑》(《陇右金石录》卷五)中录有“叉合歹(察合台)之子拜合里”一语。此处之“拜合里”应为“拜答里”(Baidar)之讹。碑文中“拜合里”之子为“阿福嵬”。这里的“阿福嵬”当为“阿禄嵬”之错误。“阿禄嵬”即阿鲁忽。

② 邵循正:《拉施德丁集史忽必烈汗译释(上)》,《清华学报》第一四卷第一期,页九四;《史集》第二卷周良霄译注本,页二九七至二九八。

③ 《瓦撒夫史》第一卷,德译本,页一二六。瓦撒夫的这段记载的时间较为模糊。他是这样表述的:“当统治的顺序来到正义的合罕忽必烈处时,当阿里不哥的激动和阿鲁忽的违抗达到其转折[点]时,”对照中外史籍中关于这一时期以及以后时期元政府在中亚活动的记载,可确认瓦撒夫的记录是可信的,其时当于阿里不哥失败后。至于这支军队由谁统领、如何组成、人数多少、取何途径、最终是否到达阿姆河、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与那木罕与安童之军进驻阿力麻里有何关系,均有待于研究。

④ 《瓦撒夫史》第一卷,德译本,页九四。瓦撒夫称,此事发生于别儿哥与旭烈兀战争期间(一二六二年)。此时忽必烈正与阿里不哥作战,遣使至不花刺括户似不可能,故不取。巴托尔德将此事系于阿里不哥投降之后,阿鲁忽在世之时。参阅《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英译本,一九六八年版,页五一五,注二二四。

去,兀鲁忽乃妃子未经元世祖同意,擅立自己与合剌旭烈所生子木八刺沙(Mubarak Shah)为察合台兀鲁思汗,此举引起了忽必烈的不满。他下诏派自己身边的察合台后王八刺(Boraq)赴察合台兀鲁思夺权。八刺归国后,见木八刺沙已据汗位,便隐瞒自己归来的目的,以阴谋手段骗取木八刺沙的信任,而后取而代之。

八刺巩固了自己的察合台兀鲁思的势力后,开始侵吞大汗属地。阿里不哥侵入中亚时,阿鲁忽为避军锋,曾南逃避居于忽炭之地,所以《元史》称阿鲁忽为“于阗宗王”。阿里不哥失败后,于阗回到大汗手中。元世祖忽必烈派驻忽炭、可失哈儿的大臣名忙古带拔都儿(Mughultai Bahadur)。八刺派出一位大将名别乞迷失(Begmish)争夺其地。忙古带立即向世祖报告了八刺的行为。忽必烈闻报派出大将火你赤(Qonichi)率六千骑前来迎敌。八刺另派大将率三万众迎击,迫使火你赤撤回内地。八刺的军队于是抢劫了忽炭。^①

八刺即位后,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的矛盾依然存在,双方为争夺土地、牧场与人口,不断打仗,卷入其中的还有钦察汗忙哥帖木儿。争夺的结果,导致三方于一二六九年在塔刺思举行忽里台大会。会上察合台、窝阔台与朮赤三系诸王决定,一致反对忽必烈与伊利汗阿八哈,并划分了三方在阿姆河北地区的势力范围。塔刺思忽里台大会是蒙古国历史上一次没有大汗或其代表参加的诸王大会,在蒙古国解体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此察合台汗国摆脱了大汗的直接控制,走上了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对以后数十年中亚历史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次年,八刺借口份地不足,率大军越过阿姆河入侵呼罗

^① 《史集》第三卷,汉译本,页一〇八。《史集》俄译本此处误译,汉译本相应亦误。按波斯文原文,忙古带与火你赤均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将领,而别乞迷失则为察合台汗国的大将。拉施都丁未言明忙古带的驻地,只说他是忽必烈派驻突厥斯坦的大臣。但根据八刺劫掠忽炭的报导,其驻地当距此不远。巴托尔德称,八刺此举使大汗在突厥斯坦的威望扫地(《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英译本,一九六八年版,页四九二)。此说不确。实际上,至元五年以后,大汗在中亚的影响力一直在恢复性增长。

珊,为伊利汗所败。八剌不久死去,西北叛王的势力因之削弱,为元朝力量向中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元朝在中亚的活动

八剌占据忽炭后,元朝仍握有畏兀儿之地。至元三年,世祖命火赤哈儿的斤为畏兀儿亦都护^①。至元五年,海都自阿力麻里称兵向内,元军败之于北庭(别十八里),又追至阿力麻里^②,海都再西溃退,逃向阿姆河以北。至元八年,世祖命皇子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③。阿力麻里地处亦烈河(今伊犁河)中游草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元朝宗王统率的大军驻在这里,足以威胁西北叛王的生存基础。为控制其地,元政府不断向那木罕补充装备给养,以增强其力量。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世祖进一步命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北围”^④。

入侵呼罗珊失败后八剌死去,察合台汗国的势力随之减退,可失哈儿、忽炭等处也回到元政府的手中。至元八年,元政府“招集河西、斡端(即忽炭)、昂吉呵等处居民”^⑤。九年,元政府发工匠往忽炭、可失哈耳采玉^⑥。十一年春,元政府在西域设驿。十二年,世祖“招安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儿等城”^⑦。

至元十三年秋,驻守于阿力麻里前线的元军将领宗王昔里吉、脱脱木儿等人劫持统帅皇子那木罕与丞相安童,发动叛乱。此年又有窝阔台系宗王禾忽阻断西域交通,忽炭也受到破坏。而世祖忽必烈正忙于灭宋,没有足够的力量

① 虞集:《高昌王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四。

②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

③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

④ 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元文类》卷二四。

⑤ 《元史》卷七,《世祖纪》。昂吉呵,当为 Yāngi Kat 的音译。Yāngi 为突厥语,意为“新”;Kat 为波斯语,意为“村”、“城”。昂吉呵,此言“新城”。从地望上与名称上判断,应即今“英吉沙”。

⑥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七。

⑦ 《元史》卷八《世祖纪》。

增援西北，一时别十八里之地也陷于叛王之手，火赤哈儿亦都护被迫从其地南迁火州，海都的势力迅速发展。

至元十三年元灭宋之后，元政府腾出手来对付西北叛王。世祖调各路大军陆续开进西域。李进、綦公直分别率军进据别十八里一带。至元十七年，元政府设立“北庭都护府于畏兀境”。阿老瓦丁、也罕的斤^①、刘恩、兀浑察等分头屯驻于忽炭、可失哈耳一带。新进驻西域的元军在驻地屯田、发展鼓铸冶炼，以图补充军需供应的不足。元政府还设立了“斡端宣慰使都元帅府”，作为统治今塔里木盆地西南边沿绿洲地区的军事政治领导机构。

察合台兀鲁思在八剌死后发生了新的变化，笃哇在海都的支持下即汗位，并与窝阔台汗国结盟合力对付元政府的势力，不断与驻守西域的元军冲突。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笃哇等叛王两度率军进入畏兀儿地区，连克昌八里、别十八里、火州等重镇，亦都护火赤哈儿战死。

当时忽炭、可失哈耳一带的战事也日见频繁，海都、笃哇对这里的压力越来越大。元朝在这里屯田所获不足以解决军食，而漫长的补给线与交通的不便使元军输送给养的费用“十不致一”。元政府在旷日持久的战事中，终于无力长期负担浩大的开支以在西北维持足够军队抵御叛王入侵。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元政府被迫放弃忽炭，同年九月元政府“罢斡端宣慰都使元帅府”^②。

除了在忽炭、可失哈耳一带与海都、笃哇争夺以外，至元末年元政府的注意力重点转向畏兀儿地区。至元二十三年笃哇兵退后，元军一批一批地重新进入畏兀儿地据守。元政府还采取措施恢复战争造成的破坏。至元二十六年，元政府派孛罗带到别十八里招集流亡户数。朝廷还命甘肃行省赈济当地

① “也罕的斤”是哈刺鲁人，其名为突厥语 Yaghan Tegin 的音译，其意为“象亲王”。

②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

饥民^①。曾在忽炭地区驻守的兀浑察所部军队仍留在天山以南地区。至元三十年,元政府设“曲先塔林左副元帅”一职。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又设立“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与“北庭都元帅府”两个机构^②,分治天山南北。其中“曲先”即龟兹(今新疆库车)。而“塔林”即 Tarim,今译“塔里木”。“曲先塔林”即今库车附近塔里木河流域一带。“曲先塔林左副元帅”与“曲先塔林都元帅府”所指挥的军队主力,就包括曾经驻守忽炭地区的兀浑察的部队。

海都、笃哇的强大军事压力,使元朝在畏兀儿的地位逐渐发生变化。中统建元以来,别十八里和火州曾是元朝在中亚东部地区的统治中心。至元成宗即位时,这里已转变为元驻边诸王的辖境。据《史集》记载,元成宗即位后,遣大臣阿只吉统领一军驻哈刺火州之境^③。大德二年(一二九七年)冬笃哇袭击驻守金山一线的元军,俘获汪古部阔里吉思驸马后,曾企图攻击元朝方面在火州地区的驻军^④。《史集》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畏兀儿之地时还说,火州是畏兀儿城子,出好酒,位于合罕与海都边地之间,当地人同双方友善,并向双方贡献^⑤。这些记载表明,火州一带不但有元镇边诸王驻守,海都、笃哇的军队也时来骚扰,当地人民的负担之重可以想见。

双方势力在畏兀儿的交错拉锯现象未能长期维持下去,角逐的结果叛王方面渐占优势,笃哇不久就把元朝驻军逐出畏兀儿境。到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元朝与西北诸藩王约和前夕,火州已不再处于元朝戍边诸王的防区之内。据波斯史家哈沙尼记载,笃哇在致海都之子察八儿的一封信中建议,“在别十八里之边,作为我们国家和兀鲁思的骄傲的哈刺火州与帝国的中心和幸

①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

② 《元史》卷一二三《拜延八都鲁传》;同书卷十八《成宗纪》。

③ 《史集》第二卷,周良霄译注本,页四〇一。

④ 《史集》第二卷,周良霄译注本,页四〇九。

⑤ 同上书,页二四八。

福之源的哈刺和林之间,召开一次忽里台聚会”^①。这时笃哇已将火州看做自己的领地。上述畏兀儿及其以西地区的统治权的交替,应在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到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年)之间。火州之东的哈密力则一直为元政府占有,由归附元朝的察合台后王阿鲁忽之子朮伯及其后裔驻守。

大德八年约和后西北地区的形势

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笃哇、察八儿向元廷请和后,西北诸叛王承认了元朝的宗主国地位。蒙古国内部和平的恢复,使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联盟承受的外部压力因之减少,而两汗国间业已存在了三十余年的密切关系也随之结束。元成宗巧妙地利用这个时机,支持笃哇,离间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间关系,向笃哇颁诏,宣布笃哇有权占有原先海都从察合台汗国夺取的土地。笃哇依仗成宗诏敕在中亚各地与窝阔台汗国争夺土地,使双方的矛盾日益扩大。

大德八年(一三〇四年)笃哇与元称海驻军统帅怀宁王海山联系,报告海都子斡罗思有异动迹象。海山立即发兵击败窝阔台汗国军。大德十年,海都阵营中的阿里不哥之子明里帖木儿在也儿的石河前线背叛窝阔台汗国,与元金山戍军与笃哇合击察八儿。窝阔台汗国大败,部属被元军俘获十余万人。察八儿势穷,只得投奔笃哇^②。笃哇在收容察八儿后,乘势将窝阔台汗国宗王驸马陆续收服。大德十一年,他闻知元成宗去逝的消息后,于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换札孙(Quyās)之地召集中亚蒙古诸王三百余人举行忽里台大会,当众宣布废黜察八儿,另立其弟仰吉察儿为汗。

一三〇六年笃哇逝去,继位人是其子款彻。款彻继续笃哇的政策,与元政

^① 哈沙尼(Qāshānī):《完者都史》(Tārīkh-i Ūljāytū),一九六九年德黑兰汉布利(M. Hambly)刊本,页三四。

^②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汉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页二〇五至二〇六;《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府保持友好往来。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武宗命使臣薛尼台铁木察出使撒麻耳干。与此同时,中亚的万户也列门合散也来到元廷,进呈成吉思汗时代所造户口清册。元政府赐以钞币帛,并决定:“薛迷思干^①、塔刺思、塔失玄^②等城,三看书赋以输县官。今因薛尼台铁木察往彼,宜令以二年之赋与宽闾,给予元输之人,以一年者上进”^③。回历七〇八年(一三〇八至一三〇九年),款彻汗死去,察合台家族中不里(抹土干之子)之孙宗王塔里忽篡夺了汗位,察合台汗国发生内乱。察八儿伙同秃苦灭纠集二十余万军队,企图借机复国,但被笃哇之子怯别挫败^④。窝阔台汗国末代汗仰吉察儿与察八儿一起率诸臣、近亲携七千骑往投元朝。当他们一行抵大都时,仰吉察儿被下有有毒药的舍里八酒鸩杀^⑤。自阿里不哥之乱后称雄西北数十年的窝阔台汗国终于灭亡。

察合台家族中旁系宗王塔里忽即汗位引起笃哇诸子的反对。怯别起兵袭杀塔里忽,并向武宗海山遣使,表示“永为藩服”,得到元廷的支持。怯别挫败了察八儿利用察合台汗国内乱之机,图谋恢复国之举后,从哥疾宁迎回其兄也先不花。也先不花在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换札孙召集忽里台大会,宣布即汗位。也先不花即位之初,仍然继续与元朝友好的政策。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他曾连续两次遣使人贡。^⑥

款彻时代,元与察合台汗国虽然维持友好关系,但由于双方共同敌人窝阔台汗国的灭亡,双方的矛盾又重新开始出现。在窝阔台汗国衰落的过程中,大批原窝阔台汗国属民投向元朝。元岭北行省因金山之北牧地不足,将降民置

① 即撒麻耳干的突厥语名称 Semiz-kent 的译音,译言:“肥城”。

② 塔失玄,当为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Tashkent)的元译,此言“石城”。此地 在元代又称为“察赤”。“塔什玄”为 Tashkent 之名首次见于汉籍之译名。

③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

④ 《完者都史》,德黑兰本,页一四七至一四八。

⑤ 《完者都史》,德黑兰本,页一四八至一四九。在同书页四一中,作者又称随察八儿、仰吉察儿投元的仅 1200 人。

⑥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

于金山之南,而元岭北戍军则驻于金山之北。这一安排含有监视察合台汗国的目的。这样,“军食既饶,又成重戍。就彼有谋,吾已捣其腹心矣”^①。也先不花即位后,双方对窝阔台汗国灭亡后边境地带禹儿惕的划分问题产生分歧。元朝大将秃火赤丞相与也先不花汗的使臣会商,未能达成协议。

就在这时,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趋于紧张。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的冲突,起因于占据阿姆河之南的察合台后王与伊利汗国呼罗珊驻军之间的矛盾。蒙古诸兀鲁思约和后,察合台汗国与伊利汗国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一个时期。也先不花从哥疾宁返回阿力麻里即位后,其兄弟忽都鲁·火者(Qutlugh Khwaja)之子达伍德·火者(Dawd Khwaja)继续指挥当地的军队。达伍德·火者的部下诸将谋叛,得到伊利汗国的呼罗珊守军的援助。伊利汗国军进攻达伍德·火者。达伍德·火者势不能敌,向也先不花的驻地附近逃去,伊利汗军越阿姆河追击^②。此事在皇庆元年(一三一二年)中。

就在此年,伊利汗国使臣阿必失哈出使元朝归回波斯时,途经察合台汗国。在贵族聚会宴饮时因酒醉,泄露了他在漠北与元岭北行省当局讨论双方东西夹击察合台汗国的部分内容。阿必失哈出使前为伊利汗国统兵九万的大将,他泄露的“机密”虽是醉言,但不容也先不花汗不信。为防止自己腹背受敌,也先不花汗下令切断东西交通,扣留了此后不久途经其境的元仁宗派往伊利汗国的使臣拜住及其使团。也先不花汗对拜住严加审讯。虽然拜住坚决否认元朝有与伊利汗国联合进攻察合台汗国的打算,但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双方的气氛却因之更为紧张。处于东西陆路交通两端的元朝与伊利汗国方面,因路途遥远和察合台汗国的封锁,对中亚的形势变化并不知情,仍然不断沿陆路向对方遣使。这些往来于东西的使团在进入察合台汗国后均被扣留。

哈沙尼曾描述过当时元与察合台汗国之间的军事对立态势:当时的元朝

① 元明善:《大师淇阳忠武王碑》,《元文类》卷二二。

② 《完者都史》,页一五二,页二〇一至二〇二。

军队沿霍博河及也儿的石河支流野地孙沐连、巴儿思阔、哈迷里及吐蕃边境一线驻扎。对合罕的每一支驻军,也先不花也配置了一支兵力大体相当的驻军与之对峙^①。双方关系恶化的结果很快引起边界冲突。延祐元年,也先不花汗三度向元岭北驻军大将秃火赤丞相所部进攻。统率另一支元军的钦察大将床兀儿向察合台汗国的军队发动反击。元岭北戍军主力五万人溯也儿的石河击败也先不花汗之军,扫荡了一月程之地。在哈迷立方向,驻守边境的察合台后王南忽里率军向火州方向前进,击败察合台汗国军队,向西追击四十日程,并于其地设路障,以阻止察合台汗国军队重新东进。

元政府与伊利汗国结盟使察合台汗国陷于孤立,因此钦察汗国对这场冲突的态度就显得非常重要。时在位之钦察汗为月即别。哈沙尼记载了也先不花汗拉拢月即别汗的活动:也先不花遣使向月即别游说,称元仁宗已下旨,命废黜月即别,另立他人为钦察汗。月即别接讯后命王傅、大臣讨论。诸臣向月即别指出,元仁宗是蒙古大汗,是全帝国的统治者,只有服从大汗才拥有统治兀鲁思的合法权力。月即别接受诸臣的建议,向仁宗派出使臣^②。我们虽无其他史料支持或否定这一记载,惟从也先不花曾扣留数批往来于其境的元朝和伊利汗国使团来看,他必定掌握了某些元朝方面对西北诸王政策的情报。从拔都以后朝廷不再干预钦察之地的历史判断,也先不花此举很可能是为了挑拨钦察汗国与元朝的关系。不过察合台汗国的使节转达给月即别汗的情报,与月即别的大臣在讨论后所表达的意见,均表现出当时西北蒙古诸王的潜意识中,对元朝皇帝作为所有蒙古汗国的宗主的敬畏:即大汗有权决定诸王兀鲁思的汗位归属。我国与国外一些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著作,在言及元朝几个蒙古汗国之间关系时,有时当做为一般意义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论述,

^① 《完者都史》,页三四。

^② 《完者都史》,页一四五至一四六。同书在页一七五中将此事置于元成宗铁穆耳朝,当属误记。当时在位的是元仁宗爱育黎八力巴答。

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正如元仁宗的使臣拜住所言,在当时的蒙古人观念中,这几个汗国互为兄弟之国,无内外之分。

元驻边大军按仁宗的旨意一致行动,给了察合台汗国以迅猛的打击。察合台汗国在东线丧师失地,迫使也先不花汗放弃以武力抗衡元朝的打算,另外选择攻击的目标。他把注意力转向西方,决定向伊利汗国发动进攻,以期从那里掠夺土地、财富与人口,弥补在东方战线因败于元军而受到的损失。哈沙尼记载道:也先不花审视了战败以后的形势后表示,如果元军“如此驱赶我们,这样我们的地盘和兀鲁思就会变得比瞎子的视界(dī da-ye kur)和蚁穴更为狭窄,将不复有禹儿惕及牲畜。”也先不花认为伊利汗国的实力弱于元朝,为察合台汗国计,莫如“向西方及呼罗珊之地掠夺”,^①以弥补失地。

也先不花汗派其弟怯别渡阿姆河入侵呼罗珊,击败伊利汗国驻军,乘胜挺进至也里(今阿富汗西部赫拉特)。元军在伊利汗国危难之际,施以援手,利用察合台汗国军队主力转向伊利汗国之机,从背后打击也先不花汗。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床兀儿与“也先不花之将也不干、忽都帖木儿战赤麦干之地,追出其境铁门关”^②。

这里的“也先不花之将也不干”,当即也先不花之弟也不干^③。赤麦干,加藤和秀认为指锡尔河畔之奇姆肯特(Chimkant)。屠寄把赤麦干确定为薛迷思干,他相信床兀儿到达了铁门。^④从对音的角度看,似以加藤之说较优。但他认为床兀儿一直进至渴石与忒儿迷之间的铁门则缺乏旁证,Chimkant至铁门的距离过于遥远。其实这里的赤麦干,当即赤木儿城。而铁门非指阿姆河以北地区著名的 Darband-i āhanin,应指阿力麻里附近的铁木儿忸察。哈沙尼说

① 《完者都史》,页二〇八。

② 虞集:《句容郡王世迹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三。

③ 忽都帖木儿,屠寄和加藤和秀已做了讨论,见《蒙兀儿史记》,卷三二,页八;《怯别与牙撒兀儿—察合台汗国统治体制的确立》,页七〇四注(26)。

④ 同上。

脱火赤驱敌三月程,虞集说床兀儿“转杀周匝”,都说明元军深入察合台汗国,转战了许多地方。完者都汗时代的伊利汗国史家哈沙尼记载,元代宗下旨命脱火赤丞相率领的元军进攻也先不花的冬营地与夏营地,元驻边大军奉旨出战。就在察合台汗国的西征军进入呼罗珊六个月之后,传来了元朝军队攻陷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的消息。哈沙尼这样记载:“忽然,长途急行使从也先不花帐前来到并宣布:‘原地停下!’合罕的军队就像山坡上冲下的洪水袭来,占据了作为察合台兀鲁思及一族和禹儿惕的夏营地塔刺思和冬营地 ISNKUK,并劫掠诸斡耳朵、后妃及子女”。这时也先不花的西征军所携粮食已经耗尽,只得“匆忙返回,为的是收复家园,[夺回]亲族”^①。

在历时两年的战争中,脱火赤和床兀儿为朝廷立了大功,均受到元廷的封赐。延祐二年十月,脱火赤被晋封为“威宁郡王”,赐金印^②。延祐四年七月,元仁宗“赏讨叛王有功句容郡王床兀儿等金银、币帛、钞各有差。”^③随着西北战事的胜利,元朝的统治势力再次进入火州地区。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仁宗封畏兀儿亦都护纽林的斤为高昌王,“领兵火州,复立畏兀儿城池”^④。

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年),也先不花汗逝去,其弟怯别继立。怯别改变也先不花与元为敌的政策,派出被扣留于其境的元朝使臣拜住归国向元廷表达和平和诚意。经过双方使臣近两年的奔走,元朝与察合台汗国重建了友好往来的关系。世祖朝至元年间,由于察合台的侵迫,元政府把畏兀儿亦都护家族迁往甘肃永昌。在元政府放弃了对畏兀儿之地的直接统治之后,察合台汗国

① 《完者都史》,页二一〇至二一一。元朝军队所攻占的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的冬营地 ISNKUK,加藤和秀不明其地何在。⁶⁵按,ISNKUK 应即亦思宽,耶律希亮曾至此。ISNKUK 中的第三个字母-n-,应为-i-,而词尾的-k 则应为-l,皆因波斯文字母形近而讹,其正确拼法应作 Isikkul(突厥语 Isik kul,译言热海,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伊塞克湖。

② 《元史》卷二五《仁宗纪》,页五七一。

③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页五七九。

④ 虞集:《高昌王世绩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四;《元史》卷一〇八《诸王表》。

虽然在那里另立有亦都护^①，但畏兀儿之地仍保持非常特别的地位，火州之地一直负有向元廷进贡葡萄酒的义务，并且须自己承担运力。元与察合台汗国恢复和平后，元军虽退出了畏兀儿地，但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元政府“复立总管府于哈刺火州”，其目的当是为了照管元朝在当地的权益。

自怯别时代起，察合台汗国的政治中心逐渐西移。怯别在那黑沙不(Nakhshab)附近修建了一座名为哈儿失(Qarshi)的城池^②，并常驻于彼处。

三 元朝后期的察合台汗国

怯别逝后，其弟燕只吉台、笃来帖木儿相继为汗。笃来帖木儿在位时代，元《经世大典》书成。书中附有察合台汗国的地图。此图可与《元史》卷六三《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的相关记载互相对照。上述资料中标出了察合台汗国境内城池数十所，包括哥疾宁(Gazni，今阿富汗伽兹尼)、可不里(Kabul，今阿富汗喀布尔)、不花刺、撒麻耳干、火州、曲先(今新疆库车)、别十八里、阿力麻里、可失哈耳与忽炭等，与密昔儿(今埃及)史家乌马里所述基本一致。

至顺二年(一三三一年)，笃哇之子答儿麻失里继立为汗。他改变了前任兀鲁思汗定期前往汗国东部的习俗，长年留居于汗国西部的呼罗珊边境。尽管他自己取了佛教的名字，但他却宣布摒弃佛教，皈依伊斯兰教，并与穆斯林世界建立通商关系。

一三三四年，以笃来帖木儿之子不赞(Buzan)为首的贵族们指责答儿麻失里汗违背了祖宗的扎萨，起兵发难。答儿麻失里汗被迫向哥疾宁逃亡，中道为怯别之子仰吉(Yāngi)捕获，送交不赞处死。此后察合台汗国进入了政治不稳定期，汗位更迭频繁。不赞统治的时间很短，当年就被笃哇之孙敞失(Chan-

① 拉德洛夫：《畏兀儿语文献》，列宁格勒，一九二八年，页三一，文献二二。

② 那黑沙不之旧址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沙赫里沙勃兹(Shahr-i Sabz)近郊。Qarshi，突厥语，意为“官室”。明《高昌馆译书》与《高昌馆杂字》“宫殿门”有“qarshi，殿，哈儿失”。参阅《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六辑，页三九一。

gshi,也不干之子)取代。一三三八年,敝失的兄弟也孙帖木儿起兵杀死敝失,夺取汗位。不过他在位时间也不长。

大德末年,窝阔台汗国灭亡后,其土地、人口大部并入察合台汗国,但在中亚草原游牧的窝阔台系诸王依然保持着尊贵的身份。也孙帖木儿死后,察合台汗国汗位一度落入窝阔台后王阿里算端('Ali Sultan)手中。在他之后先后为汗的是款彻之子麻哈没的(Muhammad)与牙撒兀儿之子合赞。

合赞自称合赞算端汗(Qazan Sultan Khan)。他在汗国内实行严厉的统治,招致贵族们的反对。巴鲁刺思氏贵族合札罕(Qazghan)起兵叛乱。起初,合赞算端汗击败了合札罕。合札罕在战斗中受伤,被迫溃逃。其部下被屠杀,家产被没收。合赞算端汗获胜后,移军至哈儿失驻冬。当年严寒的冬季使他的军队损失了大部分马匹。合札罕侦知这一情况,迅速地征集起一支大军突袭合赞算端汗之军。合赞算端汗兵败被杀^①,其时为一三四六至一三四七年。

合赞算端汗死后,察合台汗国的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汗的权威消失了,大权旁落到权臣手中。合札罕家族掌握了察合台汗国的军政大权。合札罕立窝阔台系诸王海都之子答失蛮(Danishmand)为汗。两年后,他又废杀答失蛮汗,另立笃哇之孙拜延忽里(Bayan Quli)为汗。合札罕死后,其子乌巴都刺('Abd al-'Allah)袭掌汗国大权。他不仅与忽延忽里汗的哈屯私通,且以臣弑君,谋杀拜延忽里汗,再立也孙铁木儿之孙帖木儿沙(Temür Shah)为汗。乌巴都刺死后,其侄迷里忽辛(Mir Husain)又扶立麻哈没的汗之子阿的勒('Adil)为汗。当帖木儿进攻迷里忽辛时,迷里忽辛又将自己所立之阿的勒算端汗手脚绑住,投入水中淹死,并宣布立燕只吉台之孙合不里算端(Qabul Sultan)为汗。实际上,上述这些相继即位的汗,都只不过是合札罕家族的傀儡。

^① 阿布勒伽齐:《突厥世系》戴美桑法译本;《阿布勒伽齐把阿秃儿汗所著蒙古人及鞑靼人史》卷二,一八七四年圣彼得堡刊本,页一六〇至一六一;《木因历史选》,俄文节译本,载《吉利吉思人及其地的历史资料》卷一,莫斯科一九七三年版,页一一九。

这时察合台汗国已四分五裂,各地贵族纷纷裂土自据,并选立自己的傀儡汗^①。

元末以后,察合台汗国东部被称为“卯卧里斯坦”(Mughulistan),意为“蒙古人之地”^②,以区别于已经基本伊斯兰化的汗国西部地区。元末统治“卯卧里斯坦”南部(今新疆南部)的是蒙古朵豁刺惕(Dughlat)氏贵族播鲁只(Pulachi)。在察合台汗国境内各地贵族纷纷拥立自己的傀儡汗的浪潮中,播鲁只找到一位名叫脱鲁帖木儿(Tughluq Temür)的贵族,宣布他是也先不花之子。根据明代东察合台汗国史家海答儿·拉希的(Haidar Rashidi)所提供的脱鲁帖木儿的生年为一三三〇年,对照汉籍中所记也先不花的卒年一三二〇年,可知他出生时也先不花早已逝去。故他不可能是也先不花之子。而据阿布勒伽齐的记载,脱鲁帖木儿是也先不花之弟叶迷立火者(Emil Khwaja)之子。由此可以推测,朵豁刺惕氏由于也先不花在汗国贵族中的崇高地位,才宣称脱鲁帖木儿是也先不花之子的。其目的是保证自己所立之傀儡汗的合法性。脱鲁帖木儿在一三四八年被立为汗。他逐渐消灭了汗国东部的各割据势力,把自己的统治区扩大到整个“卯卧里斯坦”。

统一汗国东部后,脱鲁帖木儿决意削平汗国西部的权贵诸侯。一三六〇年,他征发游牧于中亚各地的克烈、康里、斡罗刺思和札刺亦儿诸部,组成一支大军西征阿姆河以北地区。当大军到达渴石(Kesh)时,遇到当地的巴鲁刺思贵族帖木儿。当时帖木儿并非渴石巴鲁刺思部的主要首领,其力量还小,只得向脱鲁帖木儿的将领们表示归顺,以换取脱鲁帖木儿对他的承认。就这样,帖木儿得到了统治渴石的权力。在控制了汗国西部以后,脱鲁帖木儿将西征军主力撤出阿姆河以北地区。此后不久,脱鲁帖木儿阵营发生内讧。一部分札

① 《突厥世系》戴美桑法译本,页一六一至一六五。

② Mughul 为波斯语中对“蒙古”一词的译音,它大约源自某种缺乏鼻音的汉语方言,如山西方言。在明代所编波斯语—汉语字汇《回回馆译语》中,有“Mughul, 鞑靼, 卯卧勒”。今通用的“莫卧尔”是明末艾儒略等人所编《职方外纪》所用译音。

刺亦儿人投向帖木儿一边。此时帖木儿已聚集起一支大军。

一三六一年,脱鲁帖木儿再次出动大军越忽阑河(今锡尔河)西征,同时怯失迷儿(Kashmir)的军队在他命令下也攻击帖木儿军队的侧后。东部的军队取胜后,帖木儿不得不再一次表示屈服。同年冬,脱鲁帖木儿决定进攻迷里忽辛。这时迷里忽辛在巴达哈商以南、阿姆河上游镞沙(Vakhsh)河一带集结军队准备迎战。脱鲁帖木儿的大军越过铁门,大战一触即发。这时迷里忽辛的一部分军队叛变,迫使他后退。脱鲁帖木儿的大军推进到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在那里留驻到次年夏季。秋季,东部军队折回,开进撒麻耳干,控制了整个阿姆河以北地区,当地贵族只得向脱鲁帖木儿宣誓效忠。

平定汗国西部后,脱鲁帖木儿命其子亦刺思火者(Ilyas Khoja)镇守阿姆河以北,他本人返回东部。脱鲁帖木儿的两次西征使本已分崩离析的察合台汗国得到短暂的统一。但此时汗国西部的贵族已经形成了强有力的割据势力,而留驻阿姆河以北之地的亦刺思火者并没有掌握强大而可靠的武力,其部下各军都是从汗国各地蒙古、突厥部落征调来的。一旦他或其代表丧失了号令诸部的权力,他在汗国西部的军事优势就会丧失。

脱鲁帖木儿东返后,他留驻汗国西部的大将开始自行其是。帖木儿也乘机出逃,寻求与迷里忽辛结盟。不久,帖木儿和迷里忽辛就开始进攻镇守汗国西部的亦刺思火者,屡战屡胜。恰在此时,脱鲁帖木儿在可失哈儿逝去,亦刺思火者接讯后为接替父亲的统治撤军东返。次年,亦刺思火者再度率军向塔什玄(Tashkent)开进,与帖木儿的军队相会于忽毡(Khojand)附近的忽阑河畔。帖木儿的军队在滂沱大雨中击败亦刺思火者。

胜利之后,汗国西部的贵族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帖木儿与迷里忽辛开始较量。亦刺思火者利用此机会再次发动进攻,西部贵族纷纷溃逃。东部大军一直进至撒麻耳干,并开始攻城。但亦刺思火者军中瘟疫突然的流行,战马大量死亡。他只得撤围而去。这样,察合台汗国西部逐渐被帖木儿占有,而脱鲁

帖木儿的后裔则保有汗国东部。察合台汗国从此衰落下去^①。

四 社会经济

阿姆河以北地区经济的恢复

蒙元时代,阿姆河以北地区的经济经历了几度破坏——恢复——再破坏——再恢复的过程。

成吉思汗对中亚的征服,对当地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坏。成吉思汗东返后,当地的经济渐渐恢复。志费尼在记载当时的不花刺时说:“要说人口的拥塞、动产和不动产的众多,学者的去集,科学及其研究者的兴盛,宗教施舍[瓦格甫]的建立,伊斯兰国家中没有城市可以与不花刺相匹敌”,“在此情况下,不花刺人重获安乐,并免纳保护金和类似的负担。”^②一二三八年塔刺比起义失败后,蒙古统治者原打算按规矩血洗该城。后来在镇守西域的大臣牙刺瓦赤的劝说下,才放弃了这一打算。此后,阿姆河以北地区的经济一直在缓慢地恢复着。

直至十三世纪六十年代末以前,中亚的蒙古贵族仍没有完全认识到保护农业和城市的重要性。八刺在同海都作战失败后,为获得必要的给养支持战争,命令不花刺和撒麻耳干的居民悉数出城,准备纵军劫掠。在市民的请求下,八刺才收回成命,改向人民征收沉重的赋税,并命令两城的工匠终日劳作,为其军队赶紧制武器。^③ 人民只能以劳役换取生存。

蒙古贵族认识到农耕对他们立国于中亚的重要性,是从塔刺思忽里台大会开始的。一二六九年,与会的朮赤、察合台和窝阔台三系诸王一致决议,分割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赋税。其中三分之二归八刺,余下的三分之一归海都和

① 海答儿《拉希德史》书中所录《武功记》(Zafar Nama)节选,见《中亚蒙古人史》,伦敦,一九七二年版;《突厥世系》,戴美桑法译本。

② 《世界征服者史》,页一〇八至一〇九。

③ 《瓦撒夫史》第一卷,德译本,页一二九。

忙哥帖木儿。为了保证绿洲农耕地区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赋税收入,诸王们还决定,蒙古诸王和他所属的部落都留居在山区和草原,不允许畜群践踏庄稼,也不允许在规定的税收之外再向民众索取财物。管理西域绿洲定居人民的事务仍委付于麻速忽。各支诸王在撒麻耳干和不花刺的税收范围不得越过其所分民户的数目。为了防止八刺进入不花刺,海都派出一支军队驻在察合台系诸王营地和不花刺之间^①。

但当时纷乱的局势使海都等人保护农业和城市的政策并不能马上完全见效。八刺入侵呼罗珊失败后,伊利汗国阿八哈汗的军队接踵越过阿姆河。进入此地的伊利汗国将领认为,阿姆河以北诸城是察合台与窝阔台系宗王的根据地,占据此地者即易萌生吞并伊利汗国所属呼罗珊地的野心,遂决定破坏阿姆河以北诸城。阿八哈汗的大军开向不花刺,受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宗王之命镇守其地的麻速忽闻风出逃。不花刺、撒麻耳干的居民纷纷离城避祸。一二七三年一月,伊利汗国的军队在不花刺城焚杀抄掠七天。城中麻速忽建立的伊斯兰经学院内师生千人,均为阿八哈的军队俘杀,壮丽的学堂被毁。伊利汗国军在事后掠取当地居民五万人向阿姆河畔退去。阿鲁忽之子术伯、合班率兵追击,夺回所掠居民之半,使归居旧。但不久,术伯、合班等人因不满海都控制察合台汗国,起兵反抗,乘乱大肆破坏不花刺。他们掠取当地居民的钱粮,使此城荒芜了七年之久。

直至十三世纪八十年代,麻速忽再度征集流亡人口,使复旧业,阿姆河以北地区的经济渐次恢复。地主富人们又重新开始购置田产,封建庄园经济重新发展起来。据一份保留至今的文书记载,不花刺的一所清真寺的住持,曾一次买下位于离城三十公里处一个庄园及其附属水浇地、外边的另一所村子、两所清真寺及附有帮工住所的磨坊和三所以上的纺织

^① 《史集》第三卷,汉译本,页一一〇;《瓦撒夫史》,第一卷德译本,页三一。瓦撒夫说,此次忽里台会举行于 Qatwan 草原,离 Bu Muhammad ribat 不远(页一三七)。

作坊^①，以为寺产。这样大规模的购置田产的行为，只有在社会已经基本安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时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使地主的财富有了新的积累。生产的发展和贸易的活跃使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大量增加。白银是中亚传统的流通和支付手段。当时许多地方开始制造模压银币。这些产于当地的银币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据古钱币研究者统计，当时模压钱币的地点达十六处以上^②。这与麻速忽的治绩是分不开的。

随蒙古军来到中亚的一些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和西夏人成了当地的统治者，如波斯文史料中提到的不花太师、丞相大夫及汉文史料提到的契丹人耶律阿海、女真人蒲察元帅等人。还有些人侵占当地人的田产，成为官僚地主。文献记载撒麻耳干的居民“田园不能自主”，须依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③。

畏兀儿及其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

在中亚东部地区，蒙古征服时期也有许多汉人从内地迁入。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过去阿力麻里人“惟以瓶水载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者，谓汉人也。”常德西行时，看到兀泷古河南岸有很多汉民。阿力麻里附近的“铁木儿忸察，守关者皆汉民”。而阿力麻里城“回纥与汉民杂居，其俗渐杂，颇似中国。又南有赤木儿城，居民多并、汾人”。^④ 蒙古统治者为了征服花刺子模，还在天池（今新疆赛里木湖）和金山附近开筑通道。后来又“置驿张掖、酒泉，至玉关，通西域”^⑤。

阿里不哥之乱对中亚东部是一次严重的破坏。察合台后王阿鲁忽背叛阿

① 齐赫维齐：《十三世纪不花刺清真寺的寺产》，刊于《亚非民族》，一九六七年，第三期。

② 加夫罗夫：《塔吉克史》，莫斯科，一九七二年版，页四六〇。

③ 《长春真人西游记》。

④ 刘郁：《西使记》，王国维《古行纪校录》，页九。关于桃花石的含义，参见张广达：《喀什噶里和他的圆形地图》，《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七八年。

⑤ 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铭》，见《永乐大典》，卷一〇八八八。

里不哥后,阿里不哥率大军从漠北西行,攻入普刺、叶密立和阿力麻里等地,大肆杀掠,造成饥荒,人民大量饿死。阿里不哥失败后,元政府在别十八里、可失哈耳、忽炭、鸭儿看、罗卜、怯台等地设立驿站和军屯。畏兀儿的民户计亩向政府输税。元政府还在这里设立交钞提举司管理钞币印制和并设交钞库贮存钞币。当时畏兀儿地区流通的纸币有的与内地相同,在当时的畏兀儿文文献中称为“大都通用的钞币”,或以原名“中统宝钞”称呼之。这种钞币是从内地调运至畏兀儿地区的。还有的钞币在当地的畏兀儿文文献中称为“和州带高昌字样的”钞币^①。这种钞币当是由畏兀儿交钞提举司印制的,只限于在畏兀儿地区通行。

当时畏兀儿之地实行的是封建土地制度,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二十世纪初以来在吐鲁番发现的许多畏兀儿文契约文书,都反映了这种土地制度的状况。在一份畏兀儿文文书中提到,田产的卖主秃儿迷失的斤,因“需要‘大都通行的钞币’——‘和州带高昌字样的’也一样”,把自己的田地作价中统宝钞八十锭(yastuq)卖给法苏都。买卖双方秃儿迷失的斤与法苏都在文书中还明言:“自立文书之日起,余,法苏都即将全数付给;余,秃儿迷失的斤即将全数收到”,并称“从今日起,此葡萄园、土地、水、房屋、院落,法苏都有权占有,如果他情愿的话;如果他不情愿,他可转让或卖给别人”^②。

在田产交易时,可以由购方先付一笔订金,余款在以后支付。如果到约定的付款期购方无力支付的话,购方必须交出所购田产。在签字画押时,常常要实行一种“保证人”制度。下面的一份文书反映出这种情景:“羊儿年,正月(Aram)十八日,我俩按赤不花(Entsch-puka)和牙里黑(Jaryk),在我们姐姐死后立下了(下列的)字句:买下计值六百锭钞的在火州(Kotchu)的太上(? Tai-

^① 冯加升:《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一期,页一二五;拉德洛夫:《畏兀儿语文献》,列宁格勒,一九二八年版,页一三四,文献七八;页二一〇,文献一一五;页二一一至二一二,文献一六〇。

^② 冯家升:《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

sang)的葡萄园、都市花园和所有其他地产。其中我们立即支付的有一百锭,余下的五百锭留着(尚未支付)。这些钞我们在即将来临的春天和秋天将交给我们的侄子斡兀立的斤(Ogul-tegin)。如果我们不支付,我们就要无条件地交出上述字据中的每一样(东西)。如果我们在支付上述字据中所载明的钞数之前死去,则参与交易的同署代保人(? Tong-schu-Tai-Pau-syn)我按赤不花之弟阿山(A San)和我,牙里黑之子合刺秃苦灭(Kara-tökmä),我俩将没有任何反对地支付上述字据中的钞数,不作任何辩驳”^①。从文献中看,买卖交易中的保证人常由赊款人一方的亲属担任。

畏兀儿地区的封建地主拥有可观的田产,许多穷人却沦为奴婢。当时畏兀儿之地奴婢买卖十分流行。有一份畏兀儿文文书,写道:“龙年九月初四(日),我定惠大师为卖奴隶给爱古儿(Agur)的萨尤失(Sayosi)的事,与萨尤失谈妥”^②。还有一份年代不明的文书,对这种奴婢买卖记录更为明确:“猴儿年,斋月新月第二月,由于我俩:帖忒灭里(Tätmilik)和哈刺不花(Kara-puka)临近支付,遂将这个名唤忽都鲁(Kutluk)的女人卖出,从忽都鲁帖木儿(Kutluk-tämür)处得到一百五十(块)厚棉布”。“忽都鲁帖木儿有权千年万年地支配这个名叫忽都鲁的女人,如喜欢,则可以占有她,如不喜欢,可以转卖给别人”^③。被卖的奴婢毫无人身自由。这些文书中反映出的,就是社会中存在着等级与阶级矛盾的真实图像。

① 拉德洛夫:《畏兀儿语文献》,页一三至一四,文献十一。此文献中的钞币单位锭,均以突厥语 yastuq“枕头”表示。中国银锭形似枕头,故名。德国突厥学家冯加班(A. V. Gabain)曾讨论过这个字,见《高昌畏兀儿王国的生活,八五〇至一二五〇》,威斯巴登,一九七三年版,页六三。

② 此文书最初由冯家升教授刊布,考释见《回鹘文契约二种》,《文物》一九六〇年第六期;后经耿世民教授重新加以研究。此据耿世民教授译文,见《两件回鹘文契约的考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七年第二期;同氏:《民族语文论集》,一九八一年,北京,页二七二至二九一。

③ 拉德洛夫:《畏兀儿语文献》,页二二至二三,文献十六。

五 文化和宗教

元代西北地区通行多种语言文字。畏兀儿人和哈密立人以粟特文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这种文字在元代被称为畏兀儿文,或伟兀字,或称为“北庭书”。元亡后,畏兀儿文在帖木儿帝国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明政府使用畏兀儿文交通的地区,西起哈烈(Herat,今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东至哈密(Qamul)。而在畏兀儿地区,则这种文字直至清初尚有人使用。

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中亚西部地区后,阿拉伯文与波斯文成为多数人的书面语。北宋初期,哈刺汗朝统治区内操突厥语各民族,虽已开始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但尚不普遍。自元末时起,畏兀儿以西的操突厥语各民族越来越多地用阿拉伯—波斯文字母拼写自己的母语——东部突厥语,同时越来越多的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借词出现在这种突厥文书面语中。这种文字后来在文献中被称为“突厥文”、“察合台文”或“察合台突厥文”。而阿姆河以北地区、吹河(Chu)—亦列河(Ili)^①流域、与漠南的汪古部等信奉聂思脱里教各部,则通行古叙利文,或以古叙利亚字母拼写自己所操的突厥语方言。

迁居中亚的蒙古人,有一部分被当地的突厥族同化,改说突厥语;还有一部分仍保留他们自己的古老风俗,使用蒙古语。蒙古语在中亚蒙古人中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明初派往帖木儿帝国的使臣有时以降明的蒙古人为首,例如永乐年间的使臣白阿儿忻台。直至明中期,明政府仍用蒙古文书写国书送往西域。

元代迁居西域的汉人使用汉文,其他民族中也有兼通汉文者,汉人中亦有兼通他族文字者。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主要书面语是波斯文。当地的突厥族学者中,有的人用阿拉伯文写作。

^① 吹河即唐代之碎叶水,流经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今称楚河。亦列河,今伊犁河。

元代西北地区主要通行三种宗教,即伊斯兰教、佛教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此外还有少数道教徒、天主教徒和雅各派基督教徒在活动。伊斯兰教主要流行于察合台汗国西部和东部的亦列河流域、忽炭与可失哈耳地区。佛教主要流行于畏兀儿地区。聂思脱里教即唐代之景教,其教徒元代广为分布于西北各地。在元人张昱的一首描述大都城市生活的《辇下曲》中,有一首描述高昌人风俗和宗教信仰的诗,其辞曰:“高昌之神戴羖首,伏剑骑羊势猛烈;十月十三彼国人,萝卜面饼贺神节”^①。欧阳玄的《渔家傲南辞》也记道:“十月都人家百畜……燔獐鹿,高昌家赛羊头福”^②。这种崇拜“戴羖首”,“仗剑骑羊”之神,在十月十三日以羊头作祭,萝卜面饼贺节的习俗,与佛教、聂思脱里教和摩尼教均无关系,或系畏兀儿人本民族原始宗教的残余。^③

佛教。在北宋时代,佛教在西北地区仍十分流行。于阗、龟兹的僧人不断到内地入贡,内地僧人沿陆路赴天竺求法也途经这里。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后,由于皇室和贵族信奉佛教,佛教势力在中亚得以继续存在。乃蛮屈出律汗篡夺西辽政权后,灭亡了占据可失哈耳、忽炭一带的东哈刺汗朝残余势力,强行在当地推行佛教,在可失哈耳的许多穆斯林居民家中派驻信奉佛教的士兵,“于是异端的偶像教徒随意大肆胡作非为,谁也阻止不住他们”^④,严重破坏了当地人民的宗教生活。这时忽炭一带改宗伊斯兰教已经一百多年,所以屈出律的这种强行推行佛教的政策激怒了当地穆斯林群众。在忽炭的宗教辩论大会上,当地的长老(Shaikh)阿老丁·麻哈没的亦玛目挺身而出,当面与屈出律抗争,被屈出律害死。不久哲别率领的蒙古军来到这里,宣布当地居民可以自由选择信仰。屈出律被擒杀后,伊斯兰教很快又在忽炭、可失哈耳等地占据

① 《张光弼诗集》卷三。

② 《圭斋集》卷四。

③ 陈高华:《元代新疆和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新疆历史论文集》,一九七七年。

④ 《世界征服者史》,页六五。

上风。

元代佛教在西北地区的中心是畏兀儿之地。畏兀儿人信奉佛教的历史可上溯至他们的祖先——唐代的回鹘人。欧阳玄记载道：“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言‘诸天敬护’者，其国俗重佛氏，因为梵言以祝之”。^① 蒙古人入居西域后，设有官吏董理佛教事务。例如畏兀儿人哈刺亦哈赤北鲁之曾孙“月儿思蛮事宪宗，袭父爵，兼领僧人”。^② 在《长春真人西游记》和《鲁布鲁克游记》中都有对畏兀儿地区释徒的描述。元代畏兀儿之地有些佛寺的“灯火之费”是由内地僧人捐助的。元政府还将在大都白塔寺中译出的佛经颁赐给畏兀儿贵族。直至明初，文献中仍有火州奉佛的记载。

刘郁己未年（一二五九年）“三月一日过赛兰城”时，看到那里“有浮屠，乃诸回纥礼拜之所”。这里的“浮屠”如果是指佛寺的话，则是文献中提到的分布最西的元代佛寺。畏兀儿之东的哈密立也是佛教的中心之地。马可波罗曾记道：当地的居民“皆偶像教徒（即佛教徒）”。^③ 元国师“北庭感木鲁（哈密立）国”人必闾纳识里，“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④。可见除畏兀儿之地外，佛教在西北地区分布十分广泛。

聂思脱里教。唐代景教传入我国。回鹘汗国灭亡后，唐武宗下旨灭佛，景教也受牵连。此后景教在中国内地虽渐销声匿迹，但却在北方草原游牧部落中流传起来。信奉景教的著名部落有克烈、乃蛮和汪古等部。此外景教还在畏兀儿人中流行。元代景教称为聂思脱里教，其教徒又称为迭屑，或帖里薛。丘处机西行路过轮台（今乌鲁木齐西北，昌吉之东）之东时，有“迭屑头目来迎”。这里的“迭屑”乃波斯语 *tersā* 之音译，此言“畏惧”，取畏惧上帝之意。此外基督教徒在元代又称为“也里可温”。

① 《高昌侯氏家传》，《圭斋文集》卷一一。“护国第四王”号，来历待考。

② 《元史》卷一二四《哈刺亦哈赤北鲁传》。

③ 《马可波罗环宇记》，页一五四。

④ 《元史》二〇二《释老传》。

阿姆河以北的撒麻耳干是聂思脱里教的中心之一。汉文史料、伊斯兰史籍和当时东来的欧洲人留下的记录,都提到了元代撒麻耳干的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斗争的事情。元代撒麻耳干的居民主要操波斯语与突厥语两种语言。操突厥语的居民称撒麻耳干为“薛迷思干”、“薛迷思贤”或“寻思干”。此名是撒麻耳干的突厥语名称 Semizkent 的音译,此言“肥城”。梁相的《大兴国寺记》称“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①。而马可波罗则说,撒麻耳干的聂思脱里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为一与十之比。

忽阐河(今锡尔河)以北草原地区的居民中也有一些聂思脱里教徒。海押立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哈刺鲁人的聚居地。但鲁布鲁克提到,在海押立附近有一个聂思脱里教徒聚居的村子。可见当地也有聂思脱里教活动。西辽故都吹河流域的虎思斡耳朵一带,是一个聂思脱里教中心。十九世纪末这里的两个墓葬区中,出土了数以百计古叙利亚文和以叙利亚字拼写的突厥文碑石。逝者中既有主教和普通教徒,也有世俗官吏。逝者生前的身份反映出这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一个完整的聂思脱里教社团。教徒们使用希腊历或以十二生肖纪年^②。

可失哈耳一带也是聂思脱里教的流行区。马可波罗途经可失哈耳和鸭儿看时,发现两城中都有聂思脱里教徒。他们有自己的教堂。虎思斡耳朵的聂思脱里教徒中,就有人来自可失哈耳。虎思斡耳朵以东,亦列河谷的阿力麻里的合刺鲁人,除了信奉伊斯兰教者以外,也有人信奉聂思脱里教。在吹河流域出土的聂思脱里教墓石中,有七方的墓石的墓主来自阿力麻里。解放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阿力麻里故城遗址曾发现刻有十字架花纹的古叙利亚字聂思脱里教徒墓石。

从存留至今的十三世纪中叶聂思脱里教主教驻节表中可知,当时在撒麻

① 《至顺镇江志》卷九。

② 佐伯好郎:《景教之研究》,东京,一九三五年版。

耳干、可失哈里、巴里黑等地,均有主教。在十四世纪中叶的聂思脱里教主教驻节表中,尚列有撒麻耳干、Kashimghar 和 Nauakath 诸城。^① Kashimghar 可能指可失哈耳,而 Nauakath 乃粟特语“新城”。据唐代史料记载,裴罗将军城(即虎思斡耳朵)之西为碎叶城,碎叶城之西为“新城”。故这里的 Nauakath 很可能即此城。此城故址位于吉尔吉思斯坦虎思斡耳朵故城附近,称“小红溪”。虎思斡耳朵的聂思脱里教徒很可能受此主教管辖。

伊斯兰教。十世纪以后,穆斯林文化逐渐从阿姆河以北地区向忽阐河以北草原和葱岭以东传播。北宋时,伊斯兰教势力已伸展到更远的东方,但同一时期仍有于阗和龟兹居民奉佛的记载。蒙古国时代,伊斯兰教在中亚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丘处机在畏兀儿城池昌八刺了解到,由此“西去无僧道,回纥但礼西方耳”。在阿力麻里,他又受到当地“蒲速蛮国王暨蒙古塔刺忽只”的迎接^②。这一时期畏兀儿之地也出现了伊斯兰教徒。一二〇九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遣往成吉思汗处表示归顺之意的使臣中,有回回人乌马儿。据志费尼记载,一二五九年,宪宗蒙哥即皇位之前,萨仑的亦都护和一些畏兀儿贵族密谋,打算乘用别十八里的回回人聚礼日(星期五)到清真寺做礼拜时,一网打尽之。由此看来,当时的别十八里已有不少穆斯林。大致同一时期,鲁布鲁克也看到“畏兀儿的城镇中混居有聂思脱里教徒和穆斯林”^③。

① 亨利·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见《导论》,页二四五及页一七九。

② 《长春真人西游记》。伊斯兰教经典规定,做礼拜时,须向天方所在的方向拜,故言。“蒲速蛮”,即波斯语 Musalman 的音译。由阿拉伯文 Muslim“穆斯林”加波斯文形容词词尾-man 构成,意为伊斯兰教徒。元代又音译作木速蛮。当时阿力麻里的统治者是为屈出律擒杀的哈刺鲁部首领斡扎儿(札马刺哈儿昔称之为布札儿)之子昔黑那黑的斤(Siqnaq Tegin)。昔黑那黑的斤其时正随成吉思汗西征。此“蒲速蛮国王”当属留镇故土的哈刺鲁王族成员。

③ 《鲁布鲁克游记》,柔克义英译本,页一四一。马可波罗提到,可失哈耳、忽炭、阔缠街头,伊斯兰教已经占据了优势。

移居西域的蒙古人接受伊斯兰教经历了一较长的历史过程。蒙古西征时以及在西域建立统治之初,曾大肆摧残那里的伊斯兰文化。有名望的学者和回回贵族,凡有反抗蒙古统治的行为,或为杀戮,或受凌辱。普通群众的风俗习惯也受到干涉。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受命执掌札撒、出镇西域的察合台成了穆斯林群众诅咒的对象^①。

由于蒙古人在中亚统治的基础是归附他们的回回贵族,他们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程度也逐渐加深。许多回回贵族成了蒙古统治者得力的助手,如花刺子模人牙刺瓦赤及其子麻速忽、讹打刺人哈巴失·阿迷的等。一些蒙古贵族受伊斯兰文化浸染既久,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察合台后裔合刺旭烈之子木八刺沙(Mubarak Shah)的名字,就体现出伊斯兰文化的影响。Mubarak(木八刺)为阿拉伯语,意为“吉祥的”;Shah为波斯语,指君王。八刺汗临终前也接受了伊斯兰教,并取了教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居西域的蒙古人日益为当地居民所同化。怯别汗在位时,中亚的蒙古统治者已安于在绿洲回回定居民中生活。至答儿麻失里称汗时(一三三一年),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蒙古人中许多已经成为穆斯林。答儿麻失里顺应时势,下令接受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对其他各教占据了更大的优势^②。

合赞算端汗死后,察合台汗国陷于分裂。其西部早已流行伊斯兰教。一三四八年称汗的东部汗脱鲁帖木儿在回回教士们的劝说下,热心地推崇伊斯兰教,十六万蒙古人随之皈依伊斯兰教。这是中亚蒙古人基本伊斯兰化的标志,为后来伊斯兰教最终取代其他各教,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宗教奠定了基础。

① 朮札尼:《卫教者之友》,雷弗梯英译本《亚洲伊斯兰王朝通史》,页一一一〇至一一一五,页一一四四至一一四八。

② 乌马里:《眼历诸国纪行》,莱西德译本,页一一七、一一九。

察合台建藩西域之初,仍保持蒙古旧俗,对过往旧事只凭心记口传。为蒙古人掠入西域的汉人知识分子中,有的人笔录了当时所闻所历史实。《史集》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察合台王府诸臣中,有一位名忽速黑(Qushuq)那颜的札刺亦儿老人,是最了解往事的人。有一次察合台向他询问成吉思汗的历史和成吉思汗征服了哪些国家。他觉得没有把握,回去问其仆从,要他们各尽所知提供细节。忽速黑那颜有一名牧奴,是契丹人^①。他曾在察合台的一名契丹医生那里当仆人。这位医生死后,他成了忽速黑那颜的牧奴。他在屋外听到了忽速黑那颜的话后,将仆人们提供的细节一件一件地核实辨误。最后大家都同意了他的说法。忽速黑感到很惊奇。于是他把这个契丹人找去,了解他如何能把往事记得如此清楚。这个契丹人拿出了一本他逐日记事装订成册的书。忽速黑带他去见察合台。察合台了解这一情况后大为惊讶,于是这个契丹人从忽速黑那颜的牧奴变成了察合台的随从,不久受到重用,受封号曰“金刚杵”(vazir)^②。由此可知,在察合台时代,已有中原汉人为之书写历史了。可惜这一类史籍今已不存。

札马刺·合儿昔(Jamāl Qarshī)的《苏刺赫百科全书补遗》(Mulhaqat al-Surah)是至今尚存的写于中亚的元代史籍。札马刺·合儿昔约一二三〇年生于阿力麻里。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可失哈耳度过,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四世纪初,是十三至十四世纪中亚历史的目击者。书中记载了察合台系诸王及其臣属,如麻速忽等人的事迹,并描述了中亚各地城镇的种种人物,如阿力麻里的哈刺鲁部统治者昔黑那黑的斤的后裔。此书有阿拉伯文抄本传世^③。

① 契丹人,在蒙元时期的波斯文献中,往往指契丹人或北方汉人。

② 《史集》第二卷,汉译本,页一八五至一八六。

③ 载于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一部分《史料》。这是本书仅有的刊本。

第四节 吐蕃地区

一 地方首领和教派的分裂割据

公元八四二年吐蕃赞普达磨(Glang Dar-ma)被刺后,吐蕃统治集团围绕继承人问题分为两派,一派拥立达磨养子允丹(Yum-brtan,即汉文史籍所载乞离胡),据有伍如(dBu-ru,今拉萨地区)之地;另一派拥戴达磨遗腹子斡悉弄(hOd-srungs),据有约如(gYo-ru,今山南地区)之地^①。两派贵族集团进行了长期的内战。八六九年,又爆发了奴隶平民大起义,持续一二十年,给予各地贵族以沉重的打击。经过数十年的大动乱,吐蕃王国政权完全崩溃了,吐蕃地区分裂成许多由地方首领或部落头人统治的小“国”和族、部。

吐蕃史籍记载,斡悉弄之孙时,领地被允丹后裔所夺,长孙逃到纳里(mngah-ris,今阿里),其三子分别统治古格(Gu-ge,今阿里西南部札达县一带)、普兰(sPu-hrang,今阿里东南部普兰县一带)和麻域(Mar-yul,今拉达克地区)三地区^②,形成三个小王国,史称“纳里速古鲁孙”(mNgaḥ-ris skor gsum,意为纳里三围)。次孙退据藏地(gTsang,即后藏)上部今拉孜一带,其后裔中有一支迁到北方,一支迁到朵思麻(mDo-smad,今青海东部和甘肃西南部),还有一支回居雅垄(Yar-klungs)河谷^③。允丹的后裔,则分布在乌思(dBus,清译“卫”,即前藏)和朵甘思(mDo-khams,今四川西部和西藏昌都地区)各地。在上述各地区,还散布着一些吐蕃王国贵族的后裔,如乌思之噶尔氏(mGar)、郎

① 公哥朵儿只(喜金刚):《红册》(Kun-dgaḥ rdo-rje, Hu-lan deb-ther),稻叶正就、佐藤长日译本,一九六四年,京都,页九七。

② 《红册》,页一〇〇;软奴班童祥:《青册》(gZhon-nu-dpal, Deb-ther sngon-po), G. N. 列里赫英译本(The Blue Annals),一九四九年,加尔各答,页三七。

③ 《红册》,页一〇一至一〇二;《青册》页三七、二〇五。

氏(Rlangs),藏之款氏(hKhon)等。这些王室和旧贵族的残余,已丧失了先人的显赫权势和广土众民,他们有的或大或小还保有一块地盘,成为零星的地方势力,有的则完全没落了。此外,盘踞各地的众多地方首领,往往也自称是赞普或某贵族的后代,其实不尽可靠。

长期的战乱,将吐蕃旧有的统治秩序冲毁了,各地方势力之间相互攻伐,属民不时起来造反,社会动荡不安。各地首领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需要利用宗教的力量;人民历遭丧乱,也最容易接受宗教宣传。于是,在达磨灭佛一百多年之后,佛教又在吐蕃地区逐渐兴盛起来,史称“后弘期”。僧侣们在各地世俗首领的支持和资助下,到处兴建寺庙,广收徒众;许多寺庙建立在农业较发达地区和交通要道上,成为各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集中地和文化教育中心。一些大寺院占有的财产、土地和属民日益增多,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其住持们利用手中所握的经济、军事实力扩展地盘,左右地方事务,登上了政治权力角逐的舞台。邻近的地方世俗首领,转而需要仰赖这些寺院僧侣集团的庇护;一些世俗首领家族的成员则出家为僧,进入僧侣集团,逐步把持了住持职位。各地僧、俗势力进一步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个以大寺院为中心的由住持们统治的宗教小王国。住持的职位也渐由僧侣推选转为世袭传承。

十一、十二世纪,就在这寺院势力蓬勃发展和僧、俗统治者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教派集团。主要有:

噶丹派(bkaḥ-gdams-pa)——乌思人种思端(ṅBrom-ston,一〇〇五年至一〇六四年)迎请在纳里的印度高僧阿底峡(Atisha,九八二年至一〇五四年)来乌思各寺讲学,礼之为师,成为他的高足和教法继承人。一〇五六年,种思端应达木(hDam,今拉萨北当雄县一带)地方首领的邀请,率领门徒到热振(Rwa-sgreng)之地建热振寺,是为此派之发祥地^①。后来此派在乌思地区十分兴盛,建立了很多寺庙,形成一大宗派集团。十二世纪末,赞普后裔雅垄王

^① 《红册》,页一四〇以下;《青册》,页二六一以下。

族隆吉汪朮(Lha Lung-gi dbang-phyug,一一五八至一二三二年。Lha意为王子)成为其主要寺庙的住持。他死后,由其侄袭任,被噶丹派许多寺院奉为首领,有权任命各寺的管寺(dkon-gnyer)和地方长官(mi-dpon)^①。此后这个职位还长期由雅垄王族承袭。

萨斯迦派(Sa-skya-pa)——一〇七二年,后藏款氏(hKhon)贵族建立萨斯迦寺(在今西藏萨迦县)^②,逐渐形成以此寺为中心的教派,其势力范围包括今萨迦、昂仁、定日(协格尔)等县地,东面还扩展到江孜。历代萨斯迦寺住持职位,都是由款氏兄弟伯(叔)侄递相传承,只有在个别情况下以其门徒代理。

噶举派(bKah-brgyud-pa)——分为两大宗派集团,一称香巴(shang-pa)噶举,为刻珠琼波(mKhas-grub Khyung-po)所创,因盛行于后藏香地(今南木林县香曲流域),故名^③。一称达波(Dwags-po)噶举,始祖为玛尔巴译师(Mar-pa lo-tsha-ba,一〇一二至一〇九七年)。其徒铭移辣罗悉巴(Mi-la ras-pa,一〇四〇至一一二三年,又译米拉热巴)以苦行和法术闻名于世,达波(今西藏朗县一带)人锁南擎真(bSod-nams rin-chen,一〇七九至一一五三年)从之学,后回达波建岗波寺(sGam-po,在今朗县西北),其门徒甚众,形成一大教派^④。锁南擎真的几个高足分立宗门,形成伯木古鲁、捺里八、葛哩麻等支派。

伯木古鲁派(Phag-mo gru-pa,又译帕木竹巴)为朵甘思人朵儿只监卜(rDo-rje rgyal-po,一一一〇至一一七〇年)所创,一一五八年他来到伯木古鲁地方(在今西藏泽当东北)建丹萨替寺,四方僧徒来学者甚多^⑤。十三世纪

① 《青册》,页二七六至二七九。

② 此据《红册》,页一一七。《青册》(页二一〇)谓萨斯迦寺建于一〇七三年。

③ 参见韩儒林:《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穹庐集》,页四一七。

④ 锁南擎真事迹,见《红册》,页一七四至一七六;《青册》,页四五三至四六一。

⑤ 朵儿只监卜(伯木古鲁巴)事迹,见《红册》,页一八八;《青册》,页五五三至五六三。

初,当地贵族郎氏(Rlangs)取得了此寺住持职位,从此就由郎氏子弟相继承袭。朵儿只监卜的门徒又分立出几个派别:以必里公寺(hBri-gung,在今西藏墨竹工卡县东北)为中心的必里公派;以思答笼寺(sTag-lung,在今拉萨北)为中心的思答笼派;以牙不藏寺(gYa-bzangs,在今西藏乃东县亚堆区亚桑公社境内)为中心的牙不藏派等。这些派别也都各自成为不同的地方势力。

搽里八派(mTshal-pa)为搽里(在今拉萨东南)人壤搽里八(Zhang mtshal-pa,一一二三至一一九四年)所创。一一七五年,他在当地贵族噶尔氏(mKar)支持资助下,建搽里八寺,进而扩展势力,自成一派。到十三世纪中叶,噶尔氏族人出任住持,其后这个家族遂直接掌握此派教权。

葛哩麻派(Karma-pa)为朵甘思人知三世(Dus-gsum mkhyen-pa,一一一〇至一一九三年)所创。他在朵甘思葛哩麻谷(今昌都西北)建寺,徒众达千人,成一派别。后来他又到乌思之堆隆(Stod-lung,在今拉萨西北)建簇尔卜寺(mTshur-phu),终老于此^①。随着葛哩麻派在乌思地区的传布,此寺地位逐渐超过葛哩麻寺,成为这一派的主寺。

宁玛派(rNying-ma-pa)——宁玛意为古、旧,据称此派传承吐蕃王国时期的佛典,故名。

除以上各教派外,吐蕃地区还有许多较小的僧俗地方势力。往往一寺之主,一族之长,就可以在自己的统治区内行使主权。大小僧、俗首领之间政治上、宗教上的斗争经常不断。这种情况到十三世纪中叶元朝统一吐蕃地区之后,才开始改变。

二 吐蕃各地统一于元朝

十七世纪成书的两部蒙古史籍记载,成吉思汗在一二〇六年用兵于土

^① 参见韩儒林:《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

伯特,土伯特汗遣使献骆驼等物,表示臣服,于是土伯特八十万入众遂归入蒙古治下^①。更晚出的两部藏文史籍则记载了另一种说法:一二〇六年(或一二〇七年),成吉思汗曾进兵乌思,雅垄王族第悉觉噶(sde-srid Jo-dgah)和捺里八首领公哥朵儿只(Kun-dgah rdo-rje)闻知,即与三百名各地头人举行集会商议对策,派使者向成吉思汗纳款输诚,奉献乌思、藏、纳里三围等吐蕃全境之地^②。上述两种说法,在早期的汉、藏、波斯文史料中都找不到任何印证。一二〇五年和一二〇七年成吉思汗曾两次攻西夏,都只是抄掠后很快退出,并未深入西夏南境,因而与吐蕃不可能发生接触。所谓土伯特汗献骆驼云云,可能是将成吉思汗征西夏之役张冠李戴了^③。至于成吉思汗进兵乌思,雅垄、捺里八等地方首领集会及遣使献诚之说,虽然还找不到附会的原因,但其所载人物、事件年代上的混乱,暴露了编造的痕迹^④。

根据确切史料,蒙古军最早进入藏族居住区是在一二二六年至一二二七年的灭夏战争期间。成吉思汗在灵州击溃西夏主力后,分兵进围中兴府,自率一军南下,攻占了积石(今青海循化)、西宁、洮(今甘肃临潭)、

① 见Н. 莎斯奇娜译:《黄史: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Шара Туджи,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XVII Века),莫斯科—列宁格勒,一九五七年,页一二八至一二九;《蒙古源流笺证》卷三,页二三。又,罗桑丹津《黄金史》(Altan tobči)和札西本卓《水晶数珠》(Bolor erike)都记载有早期蒙古诸汗与萨斯迦派关系。参见冈田英弘:《蒙古史料中所见之早期蒙藏关系》,《东方学》,第二三辑,一九六二年。

② 见松巴堪布:《如意宝树》(dpags-bsam-ljon-bzang, 1748年成书);济美南噶(无畏空):《蒙古佛教史》(hJigs-med nam-mkhah, Hor chos-hbyung, 1819年成书),日本外务省调查部译本,东京,一九四〇年,页三一。参见G. 图奇:《西藏画卷》卷一(Tibetan painted scrolls V. I),罗马,一九四九年,页七至九。

③ 参见冈田英弘:《蒙古史料中所见之早期蒙藏关系》,《东方学》第二三辑,一九六二年。

④ 例如,《如意宝树》和《蒙古佛教史》说到,成吉思汗在接受吐蕃首领归附后,即致书于萨斯迦寺喇嘛公哥宁波(Kun-dgah Snying-po)。按公哥宁波系八思巴的曾祖父,生卒年为一〇九二至一一五八年(见《红册》,页一一八),在成吉思汗诞生前即已去世。

河(今甘肃临夏)等州。这些地区的吐蕃部落此时可能有一部分归附了蒙古。

一二三一年,拖雷率右翼军假道宋境攻金,由大散关南下,分兵西出,掠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等蕃、汉各族杂居地区。拉施都丁《史集》记载,拖雷军道由吐蕃之境,当是指此而言^①。不过,上述两次进兵都只是在吐蕃最东北部的边缘地带,而且看来并未建立统治。

蒙古大规模经略吐蕃之地始于阔端。一二三五年,窝阔台封次子阔端于西夏之地,并命统军攻南宋四川。阔端率军先取金未降之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等州,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熙河节度使(治临洮)蕃部首领赵阿哥昌等降,以阿哥昌为叠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招集吐蕃部落,立城堡,课耕桑^②。这是蒙古最早任命的吐蕃官员。一二三六年,蒙古军入宋境,宗王穆直(察合台子)与先锋按竺迺分兵取宕昌、阶、文等地,招降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③。

藏文史籍记载,阔端于一二三九年派将领道尔达(rDo-rta,《青册》作Dortog)进兵乌思藏。蒙古军推进到热振寺和杰拉康寺(rGyal-lha-khang,属噶丹派),杰拉康寺被焚,僧众五百人被杀。不久道尔达悔悟,捐金重建佛寺,率军退回,并向阔端报告乌思藏各教派情况,建议任命宗教首领管理其地^④。阔端于一二四四年遣道尔达等再入乌思藏,召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Sa-skya pandita Kun-dgaḥ rgyal-mtshan,简称萨班 Sa-pan,一一八二年至一二五一年)来见。萨班奉召,即携其侄八思巴(h Phags-pa bLo-gros rgyal-

① J. 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The Successors of Gengis Khan),纽约,一九七一年,页三四、一六六。

② 《元史》卷一二三,《赵阿哥蕃传》。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载,窝阔台灭金后即遣兵攻吐蕃(见波义耳英译本,页一九六),当是指阔端经略秦、巩之地。

③ 《元史》卷一二三,《按竺迺传》。

④ 《西藏画卷》卷一,页九;《青册》,页九一;五世达赖《西藏王臣记》,郭和卿译本,页八八至八九,民族出版社,1983年出版。

mtshan,一二三五至一二八〇年)、恰纳朵儿只(Phyag-na rdo-rje,一二三九至一二六七年)启行,一二四六年到达阔端驻地凉州。这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贵由即位大典,次年回到凉州,遂与萨班议定归附条款,由萨班致书乌思、藏、纳里僧、俗首领。信中先宣扬蒙古军威和对归降者的优待政策,接着传达阔端令旨,要点为:一,各地世俗首领,官仍原职;二,任命萨斯迦首领为达鲁花赤,赐金、银符;各地官员处理政务应请示萨斯迦金符长官,不许自由行事;三,各地编出籍册,开列官员姓名、俗众人数和贡赋定额,一式三份,一份进呈,一份交萨斯迦,一份由本地官员保管;以后由朝廷遣官与萨斯迦官员共同征收国赋。关于贡品,萨班开出了一长串单子,包括金、银、象牙、珠宝、兽皮、羊毛等。这无疑是阔端最感兴趣的东西,因而萨班一再劝诫各地首领要恪守纳贡义务^①。萨班与二侄继续留居凉州。八思巴从其伯父学习佛法;恰纳则学习蒙古语,阔端命他着蒙古服装,后又赐他一女为妻。一二五一年,萨班死于凉州。

在萨斯迦派的带动下,乌思、藏、纳里诸地归附了蒙古。但由于吐蕃地区政治上的极端分散局面,各地仍散布着不少未服部落,因此蒙古继续用兵征服或招降这些部落,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元世祖时代。一二五一年宪宗蒙哥即位,命和里觶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仍前征进”。和里觶的军队曾深入到拉萨北的达木(hDam)地区。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取道今四川西部的吐蕃之地,渡大渡河,直抵金沙江,收服了这一带的许多蕃部。其后,在蒙哥攻打四川时和元世祖前期,都曾进兵朵思麻、朵甘思地区,或遣官招谕各族酋长,先后把这一带的各零星部落收归治下。

^① 萨班此信收在《萨斯迦世系》(Sa-Skya gdung rabs)和《萨班全集》(Sa-Skya Pandita gsung-hbum)中。Tucci将全文译为英文(见《西藏画卷》卷一,页一〇至一二);王尧据藏文全译为汉文(载《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一九七九年,第三期)。萨班赴凉州事,见《红册》,页一一八至一一九。

在用兵的同时,蒙哥和忽必烈仍主要采取笼络吐蕃佛教上层人物的政策。一二五三年忽必烈驻兵六盘山时,遣使往凉州召萨班来见,时萨班已死,阔端之子蒙哥都护送八思巴谒见忽必烈。八思巴以对佛法和吐蕃历史的丰富知识博得忽必烈的喜爱,于是厚加赏赐,将他留在藩邸。其后忽必烈及诸妃、王子都从他受秘密戒,礼之为师^①。一二五八年,佛、道两家在忽必烈藩邸举行大辩论,八思巴以佛教方面的首席代表身份参加辩论,居然能引经据典,驳倒了道家^②。

同时,蒙哥也派遣使者持诏赴簇尔卜寺,召请葛哩麻派首领葛哩麻巴哈失法持(Karma bakshi Chos-hdsin,一二〇四至一二八三年)。葛哩麻巴哈失以有“法术”而声名远播,在乌思、朵甘思地区很有影响,且扩及“章”地(hJang,指今云南丽江一带),可见当时葛哩麻派的势力不在萨斯迦派之下,蒙哥所以特旨召他来朝是有深意的。他在北上途中,扶持各地的僧侣集团,修复毁坏的寺院,继续扩大其影响。到蒙古后,受到蒙哥的尊礼,据说被封为国师,赐品级黑帽,后来他的转身遂以黑帽喇嘛为名。他在蒙古、中原和西夏许多地方演法,并在宁夏建了一座大寺。忽必烈对他也深为礼敬。传说他曾在忽必烈面前表演法术,以致引起八思巴和他比法,这大概反映了两派曾发生过争夺蒙古统治者宠信的斗争。不过八思巴在忽必烈藩邸的地位这时已经稳固,而葛哩麻巴哈失看来则是蒙哥宫廷方面的人物,于是蒙古皇室内部的兄弟之争(忽必烈与蒙哥的钩心斗角以及后来与阿里不哥的争位之战),也殃及这位吐蕃喇嘛。忽必烈听说葛哩麻巴哈失拥护阿里不哥,因而把他逮捕,流放到海边,后又下之于狱,并处死了他的两个弟子。到至元初才将他释放,让他回到簇尔卜寺

^①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二二;《红册》,页一一九;《蒙古佛教史》,页一五六至一六六。

^② 释祥迈:《至元辨伪录》。

仍旧掌教^①。

吐蕃的其他教派势力,也相继向蒙古统治者表示忠诚,以取得蒙古朝廷的支持。

三 元朝对吐蕃地区的统治

宗王的分封和帝师的统领

忽必烈取得政权后,先后将诸子分封到各地区。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年),封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以吐蕃为其藩封地区。奥鲁赤死后,由其子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孙搠思班(袭封镇西武靖王)相继承袭^②。洪武三年(一三七〇年),明军取河州(元吐蕃等处宣慰司治所,今甘肃临夏),元镇西武靖王卜纳刺以所领吐蕃诸部归降明朝^③。卜纳刺世系不明,但无疑也是奥鲁赤的后裔。可见吐蕃地区在元代一直是奥鲁赤家族的“封守”之地^④。

元代吐蕃地区有事,常由奥鲁赤及其继承者受命处理。如至元十二年以奥鲁赤统诸王之军征吐蕃;至元二十七年由铁木儿不花统兵平定必里公之乱;元贞二年(一二九六年)命铁木儿不花镇压阶州(今甘肃武都)一带的蕃部;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年)敕搠思班发兵讨伐参卜郎部(在今四川甘孜自治州理塘北)“叛乱”等^⑤。但随着元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藩王的权力相对削弱了。吐蕃地区的军民财赋由朝廷设置地方官府进行管理,统辖于中央的宣政院。

① 《青册》,页四八六至四八七;《蒙古佛教史》,页一五〇至一五一、一六四至一六六;韩儒林:《〈明史〉乌思藏大宝法王考》,《穹庐集》,页四一九;H. 黎吉生:《葛哩麻派》(Karma sect, A historical note),《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一九五八年,页一四三至一四五。

②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四四;《元史》卷一〇七,《宗室世系表》;卷一〇八,《诸王表》。

③ 《明史》卷三三〇,《西域传》。

④ “封守”一词见《元史》卷六〇《地理志》,又称“分治”。《经世大典》谓世祖平天下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也就是《元史》所谓“封守”。

⑤ 分见《元史》本纪各年纪事;《红册》,页一九一;《续藏史鉴》,页二〇。

镇西武靖王不能直接处理地方军政事务,而必须将意见陈告宣政院,由宣政院议拟处理办法,上奏皇帝,请旨决定。《元史》记载,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七月宣政院奏:武靖王搠思班与朵思麻宣慰司共同报请将松潘叠宕威茂州安抚司改为宣抚司,并迁治茂州,经宣政院官会议,认为“宜从其言”。武宗批准了这个意见,同时由朝廷任命了宣抚司达鲁花赤和副使^①。又《经世大典·站赤》记载,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年)搠思班武靖王“言于宣政院,谓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三路站赤,近年以来马匹病死,人户贫乏,请闻奏赈济”,宣政院遂与中书省共同商议赈济之宜,拟拨款中统钞一万锭赈济吐蕃站赤,奏准施行。^②上述两件事很能说明元代藩王的地位。

由于吐蕃地区的特殊情况,忽必烈采取扶植一个宗教势力来帮助进行统治的政策,即所谓“因其俗而柔其人”(《元史·释老传》)。他决定扶植带头归附蒙古而且长期生活在他的宫廷、和他关系最为密切的萨斯迦派首领。即位后,他就将八思巴封为国师,并命八思巴之弟恰纳朵儿只统治全吐蕃之地^③。至元六年八思巴制蒙古新字成,升号帝师大宝法王。忽必烈亲从八思巴受戒,“屈万乘之尊,尽师敬之节”^④,备极尊礼,并以八思巴领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管辖吐蕃地区的最高机构。《元史·释老传》说:“[世祖]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据《萨斯迦世系》记载:薛禅皇帝(即元世祖)命将乌思藏十三万户僧、俗人众给予八思巴,作为第一次受戒时的供养;作为第二次供养,又把吐蕃三“地面”(Chol kha)作为一省,连同其地僧、俗人众都赐予他^⑤。这三地面大约就包括了元代的全吐蕃之地。可见,忽必烈不仅把帝师树为全国最高宗教领袖,而且授予全吐蕃地区之统领者的地位。

① 《元史》卷二十三,《武宗纪》。

②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页二至三。

③ 《红册》,页一一九。

④ 法洪:《帝师殿碑》,《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⑤ 参见《西藏画卷》卷一,页一四。三地面即指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

因此《元史·释老传》曰：“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

元历任帝师表

序号	帝师名及其生卒年	任职年	出身	附注
1	八思巴(hphags-pa, 1235—1280)	1260—国师 1270—1274		生年从《红册》、《青册》。王磐撰行状作1239年。始任帝师年从王磐行状
2	亦怜真(Rin-chen rgyal-mtshan, 1238—1279/1282?)	1274—1279 /1282?	八思巴之弟	代掌帝师职位
3	答耳麻八剌刺吉塔(Dharmapāla-rakshita, 1268—1287)	1282—1286	八思巴之侄 (弟恰纳之子)	卒年从《青史》。《元史》作1286年,《红册》作1288年
4	亦摄思连真(ye-shes, rin-chen, 1248—1294)	1286—1291	八思巴门徒	
5	乞刺斯八斡节儿(Grag-pa hod-zer, 1246—1303)	1291—1303	八思巴侍者	据《元史》本纪,至元二十八年即授为帝师
6	鞞真监藏(Rin-chen rgyal-mtshan, 1257—1305)	1304—1305	亦摄思连真之弟	
7	相家班(Sangs-rgyas-dpal, 1267—1314)	1305—1314	乞刺斯八斡节儿之侄	《元史》作卒于1313年,以相儿加思巴嗣为帝师,1314年卒。相儿加思巴即相家班的异译,当为同一人
8	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kun-dgaḥ blo-gros rgyal-mtshan dpal-bzang-po, 1299—1327)	1315—1327	八思巴侄孙	卒年从《佛祖历代通载》及《红册》、《青册》。《元史》本纪载泰定四年二月帝师参马亦思吉思卜长出亦思宅卜卒,当即其异名
9	旺出儿监藏(dBang-phyug rgyal mtshan?? —1325)	1323—1325	不明	吐蕃史籍未载此人。当是公哥罗古罗思监藏返藏受戒期间的代理帝师
10	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kun-dgaḥ legs-paḥi ḥbyung-gnas rgyal-mtshan dpal-bzang-po, 1308—?)	1327—1329	八思巴侄孙	

续表

序号	帝师名及其生卒年	任职年	出身	附注
11	鞏真吃刺失思 (Rin-chen grags-shis, 生卒年不详)	1329—?	不明	
12	公哥儿监藏班藏卜 (kun-dga h-rgyal-mtshan dpal-bzang-po, 1310—1358)	1333—1358	八思巴侄孙	
13	唆南罗古罗思 (bsod-nams blo-gros, 1332—1362)	1361—1362	八思巴侄曾孙	据《青史》、《汉藏史集》。汉文史籍未载
《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记载,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附明。此人或为元顺帝末年所任帝师				

自忽必烈以后,元朝历代皇帝都置帝师一职,给予极尊隆的地位和最优厚的赏赐。每代皇帝即位时,都要特别颁发“珠字诏书”保护帝师的权益,遣使持至萨斯迦张挂,以宣谕其属^①。帝师可以在皇帝的名义下就吐蕃政教事务发布告示(法旨)^②,可以提名地方高级官吏。根据汉、藏文史料的记载,元朝一代的十三四任帝师,除两三人出身不明外,其余都出自八思巴的款氏家族(七人)或其门徒(四人),可见元代帝师一职完全由萨斯迦派所把持。款氏家族还有许多人被封为国师、国公、司徒、司空,甚至尚公主、封王^③。他们在朝廷地位声势煊赫,常能从赏赐中获得大量经济利益;在地方上(主要是乌思藏

① 《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卷二八,《泰定帝纪》;卷三六,《文宗纪》。李昉《日闻录》记载最详:“皇元累朝即位之初,必降诏天下,惟西番一诏用青红丝书粉诏文,绣以白绒,穿真珠网于其上,宝用珊瑚珠盖之。如此赉至其国,张于帝师所居殿中,可谓盛哉。”《辍耕录》全引其文而略异其辞。

② 参见《西藏画卷》卷二,页七四七至七六四所收霞炉寺文件。这些文件的格式,开头总是:“皇帝圣旨里,帝师的言语”(rgyal-po'i lung gis/……ti-shri'i gtam)。

③ 泰定三年,以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之兄琐南藏卜(bsod-nams bzang-po)尚公主,封白兰王,赐金印,命领吐蕃三道宣慰司事,见《元史》卷三〇,《泰定帝本纪》;卷二〇二,《释老传》。《红册》(页一二一)记载,琐南藏卜初封国师,格坚皇帝(英宗)命还俗,尚公主,封王遣之,后死于朵甘思之地。

地区)也掌握有相当大的政教实权。

不过,帝师的地位无论多么崇高,毕竟只是皇帝任命的一个特殊官员。皇帝利用他来控御吐蕃地区,而最高统治权则掌握在皇帝手里,他通过特设的中央机构——宣政院,实行对整个吐蕃地区的统一管辖。

统治机构的建立

宣政院初名总制院,成立于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年),“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①,以国师八思巴领院事(八思巴升号帝师后,即由帝师领院事)。掌握实际权力的是院使(初置二人,后渐增至十人),其为长者以朝廷大臣担任,位居第二者任用僧人,由帝师辟举。至元二十五年,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以总制院所统西番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②宣政院的名称系取自唐朝皇帝在宣政殿接见吐蕃使臣的典故,更突出了它作为管辖吐蕃地区之最高官署的地位。宣政院为从一品衙门,与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最高管军机构枢密院、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同为“得自选官”的四个主要中央机构,铨授官吏和处理所掌大小机务,都可以直接奏报皇帝批准,不必通过中书省^③。宣政院的用人、行政原则是“军民通摄,僧俗并用”,体现了元朝政府根据吐蕃特殊情况而制订的统治政策。元人朱德润说:“国家混一区宇,而西域之地尤广,其土风悍劲,民俗尚武,法制有不能禁者。惟事佛为谨,且依其教焉。以故自河以西直抵吐蕃……,其军旅、选格、刑赏、金谷之司,悉隶宣政院属,所以控制边陲屏翰畿甸也。”^④这段话是对宣政院职能的很好说明。

吐蕃地区有重大政务或发生重大事件,则设立行宣政院前往处理,这是一

①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

② 《元史》卷二〇五,《桑哥传》。

③ 《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卷二二,《武宗纪》;卷二九,《泰定帝纪》;卷一〇二,《刑法志》。

④ 朱德润:《行宣政院副使送行诗序》,《存复斋文集》卷四。

种临时建置,与设在杭州管理江南佛教的行宣政院不同。如顺帝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年)吐蕃“贼”起,杀镇西武靖王子党兀班,即立行宣政院统兵镇压^①。不过,遇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宣政院必须与枢密院同议而行^②。

元朝在吐蕃全境推行统一的地方行政建制——“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吐蕃之地作为一个单独的大行政区,由宣政院统辖,军民钱谷无不掌之,在这一方面,宣政院的职能相当于一个行省机构,故不另置行省^③。其下属地方行政机构,最高一级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行政区划上称为“道”。元朝将吐蕃地区划分为三道^④,置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分管之。宣慰司之下,置元帅府、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邻近内地的藏、汉各族杂居地区,则置路、府、州、县。从宣慰使至万户各级官员,都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给予任命。其中有的是朝廷派遣其他民族官员到吐蕃地区任职^⑤,有的则任用当地僧、俗上层人物为之。万户、千户等地方官一般都由当地僧、俗首领充任,准予按本地习惯传袭,并得自署其下属官吏。

元朝还在吐蕃地区派驻镇戍军,有蒙古、探马赤军和汉军、新附军,亦置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等管军机构。有的驻军元帅府等机构兼管吐蕃军民,集军政之权。

①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卷三九,《顺帝纪》。

②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卷三四,《文宗纪》;卷八七,《百官志》。

③ 《萨斯迦世系》记载说:“在薛禅皇帝属下有十一行省(Zhing),虽然吐蕃三个‘地区’不够一个行省,但……算作一个行省赐与八思巴。”(引自《西藏画卷》卷一,页一四)这说明元朝把整个吐蕃之地视为一省。

④ 吐蕃“三道”的提法,见《元史》卷三〇《泰定帝本纪》。或以为只是指乌思、藏、纳里三路,不确。

⑤ 《元史》卷二三,《武宗本纪》;卷一二一,《按竺迩传》;卷一三三,《叶仙鼎传》;苏伯衡:《故元翰林侍讲学士陈公墓表》(《苏平仲文集》卷一三)等。

关于元代吐蕃地区的行政建置,因“载籍疏略”^①,莫之能详。通常作为主要依据的《元史·百官志》宣政院条,虽列举了各军政机构名称、品秩和设官员数,但对其沿革、辖境、统属关系等方面,都缺乏详细和明确的记载。因而我们对吐蕃三道宣慰司及其下属各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管辖状况,只能作大略的说明。

一、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吐蕃宣慰司,因所辖主要为朵思麻地,故又称朵思麻宣慰司。其设置年代约在至元之初^②。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年),割巩昌都总帅府所领河州来属,遂以河州为宣慰司治所^③。其下属地方行政机构主要有:

河州路——治河州(今甘肃临夏),辖境约为今甘肃临夏、和政、广河三县地。

朵思麻路——又作脱思麻,置有路总管府和军民万户府等机构。藏人称青海为朵(mDo),朵思麻(mDo-smad)意为下朵,指今青海东部,但元代西宁州为弘吉剌部章吉驸马封地,不在此路范围内。至元五年至八年,又先后割巩昌都总帅府所领安西州、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来属^④。

积石州——置元帅府。今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地。

贵德州——地名必赤里,置达鲁花赤、知州等官。州治今青海贵德。

礼店文州元帅府——中统初,按竺迺子赵国宝所招文州吐蕃首领勘陀孟迦入朝,赐金符(当同时授为万户),立文州吐蕃万户府,赵国宝以元帅兼万户府达鲁花赤。不久,扶州(今四川南坪)蕃部首领呵哩禅波哩揭也来归附,从

① 《元史》卷六〇《地理志》。

② 《元史》卷一三三《叶仙鼐传》载,叶于中统三年平李璫后,调任吐蕃宣慰使,在职二十四年,调云南行省平章,寻改江西行省平章,镇压钟明亮起义。按钟明亮起义在至元二十六年,据此推算,至元二、三年已有吐蕃宣慰司。

③ 《元史》卷六〇、六三,《地理志》。

④ 《元史》卷六,《地理志》。

国宝入朝，授万户；其他小首领都授为千户^①。这两个万户府可能都隶属于礼店文州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元帅府所在地当为礼店（今甘肃礼县东北），故名。赵国宝之子世荣袭其职，后升任吐蕃宣慰使。

松潘叠宕威茂州宣抚司——阔端曾以吐蕃首领赵阿哥昌为叠州安抚使（见上文），后来，松（今四川松潘）、潘、宕（均在今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威（今四川理县北）、茂（今四川茂汶）等州各部相继来附，遂合置一安抚司辖治之。管内有西番（藏族）、秃鲁卜、降胡、汉民四种人杂处。至大二年（一三〇九年），宣政院根据镇西武靖王和朵思麻宣慰司的建议，奏请将安抚司改为宣抚司，迁治茂州汶川县（今四川汶川）^②。

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吐蕃朵甘思之地，并辖有四川的黎州（今汉源）、雅州（今雅安）等州县。又称朵甘思宣慰司。

朵甘思，又作朵哥麻思，为藏语 mDo-Khams 的音译。Khams 是藏人对吐蕃最东部的称呼，指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西藏昌都地区。又《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载：“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鄙，……名火敦脑儿”（蒙古语 Hodun na'ur，译言星宿海，今同名）；“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即今积石山脉）。据此知朵甘思的地理范围包括今青海东南部、甘孜和昌都地区。元朝在这个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有：朵甘思都元帅府、刺马儿刚招讨司、奔不招讨司、奔不儿亦思刚和亦思马儿甘万户府等。“刚”（或“甘”）是藏语 sgang 的音译，意为山岗。吐蕃古史有“朵甘思六岗”（mDo-Khams sgang drug）的说法^③，上述刺马儿刚等地（在今甘孜西南部、昌都东南部一带）或许就在这六岗之内。

元初，曾置碉门（今四川天全）等处安抚使、鱼通（今四川康定东）等处达

① 《元史》卷一二一，《按竺迺传》。

② 《元史》卷二三，《武宗本纪》。

③ 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引《续藏史鉴》，页一四。

鲁花赤等官,以诏谕、镇抚这一带的吐蕃部落^①。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年),建吐蕃哈答城(一作匣答,在今四川乾宁北),遣军戍守;十三年,以哈答城为宁远府。十五年,以吐蕃李唐城(今四川理塘)为李唐州。十六年,以朵甘思地之算木多城(疑即今昌都)为镇西府^②。元朝政府设置了吐蕃招讨司来管辖这些地方,至元二十年,又割成都路所领黎、雅两州属吐蕃招讨司^③。其后似改为安抚司。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年),并吐蕃、碉门安抚司、运司为一,改称“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军民宣抚司”。并置“朵甘思哈答李唐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为掌管钱谷的机构^④。

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年),朵甘思之参卜郎(在今理塘北)诸部“叛”,劫杀过往使臣,夺取财物,声势甚大。元朝先命镇西武靖王搠思班发兵讨之,后又以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家台兼宣政院使,统兵前往镇压,并派出朝廷大臣督师,都未能平定。泰定二年(一三二五年),遣使招谕,参卜郎首领班尤儿降,于是以乞刺失思八班藏卜为吐蕃等路宣慰使都元帅,率其属往镇参卜郎^⑤。

三、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乌思藏宣慰司),管辖乌思(dBus,前藏)、藏(gTsang,后藏)和纳里速古鲁孙(mNgah-ris skor-gsum,阿里三围)三地区。《元史·百官志》所列乌思藏宣慰司下属地方官有:纳里速古鲁孙元帅二员,乌思藏各地万户十一(其中二万户府各置达鲁花赤一员),千户四,管民官二。此外还置有乌思藏管蒙古军都元帅二员,乌思藏等处转运一员。吐蕃史籍多记载元朝在乌思藏设置了十三个万户(藏语称为 khri skor chu-gsum)。

① 《元史》卷六,《世祖纪》。

② 均见《元史·世祖纪》。

③ 《元史》卷六〇,《地理志》。

④ 《元史》卷一九,《成宗纪》;卷六〇,《地理志》;卷八七,《百官志》。

⑤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卷二九,《泰定帝纪》;卷一七五,《张珪传》。

乌思藏宣慰司大约设置于至元十七(或十八)年。《青册》记载:“在薛禅皇帝将吐蕃三地面作为受戒的供养授予八思巴后,刺麻(指帝师——引者)成为宗教的领袖,而历任‘本阐’则管理世俗事务”^①。根据藏文史籍,本阐(dpon-chen,意为大官)是朝廷任命的管辖乌思藏十三万户的行政长官,多出于帝师的荐举。本阐的治所就设在萨斯迦。第一任本阐释迦藏卜(Sakya bzang-po)是“在八思巴刺麻时,由薛禅皇帝敕授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之印(dBus gTsangZam-klu-gun-min-dbang huhi damkha),使任本阐”^②。他在萨斯迦建造新邸(khang gsar chen-mo)并修筑了大寺(Lha-khang chen-mo)的内外墙。“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应是元朝最初设置的该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其设置年代当在至元五年派官清查乌思藏户口和划分万户之前,也可能就在这一年。到第五任本阐赏竹鞞真(Byang-chub rin-chen)时,忽必烈敕授为宣慰司长官(Mi-dpon,宣慰使),赐水晶印^③。这应是元朝设立乌思藏宣慰司之始。赏竹鞞真的出任本阐,系由八思巴所推荐。八思巴自至元十一年回萨斯迦主事,十七年去世,那么赏竹鞞真始任之年当在至元十七年。《元史》记载了另一任乌思藏宣慰使的任职年代: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乌思藏宣慰使软奴汪朮尝赈其管内兵站饥户,桑哥请赏之,赐银二千五百两。”^④软奴汪朮即藏文史籍所载第七任本阐gZhon-nu dbang phyug,他在任时,曾进行大改革,并编集了乌思藏的法律^⑤。至元二十四年,朝廷遣官到乌思藏整理户籍、军站和考课官吏^⑥,

① 《青册》,页二一六。按:dpon-chen,今译多作“本钦”。本书将chen音译为“阐”,係据《唐蕃会盟碑》(王尧《吐蕃金石录》页一四,文物出版社,1982年)及《蒙古字韵》。

② 《红册》,页一二五至一二六;《青册》,页二一六。

③ 《红册》,页一二六;《青册》,页二一六。

④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

⑤ 《红册》,页一二六;《青册》,页二一六。

⑥ 参见《西藏画卷》卷一页一三;L. Petech,《元代西藏的括户》(The Mongol Census in Tibet),载《庆祝黎吉生西藏研究论文集》(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一九八〇年,页二三三至二三八。

软奴汪朮当因在这次行政改革中立功,或其政绩得到钦差大臣的好评,因而受嘉奖。本阐的任期大抵为三年^①,据此推算,第五任本阐赏竹鞞真的任职年代当是至元十七至二十年,乌思藏宣慰司应成立于此时。根据文献记载,此后的许多任本阐都有宣慰使职衔^②;帝师从京城发往乌思藏的文告,也都是发给宣慰使(Zon-wi-si 的 mi-dpon),而从不提到本阐^③。我们可以据此推论,自乌思藏宣慰司设立以后,历任萨斯迦本阐的正式官衔便是宣慰使了,而本阐则只是藏人的俗称。

据《元史·百官志》,乌思藏宣慰司设宣慰使五员。可能除萨斯迦本阐外,还有其他地方或教派的僧侣首领被任为宣慰使,但萨斯迦本阐位居第一当无疑。霞炉寺文件中有一份帝师文告提到“斡节儿僧格(hod-zer seng-ge)为头宣慰司官员”,此人即萨斯迦第十三和十七任本阐。

乌思藏十三万户的设置年代,藏文史籍系于至元五年,但其中某些万户当更早(蒙哥时期)就已设置。这一年,八思巴正在萨斯迦,元朝政府派官到乌思藏清查户口、土地,按万户制度划分了地方行政区,任命了各万户长(Khri-dpon)。

《元史·百官志》和多种藏文史籍都记载了诸万户名称,两者多可相互印证^④:

1. 沙鲁田地里管民万户——即 Zha-lu 万户。据至元五年的户口清查,有

① 《红册》所载本阐共二十七任。从至元五年始置,至至正十四年(一三五四年)萨斯迦政权被伯木古鲁派取代为止,计八十六年,每任本阐任期平均约为三年。这和内地官员迁转的规定是一致的。

② 如第七任、第十任本阐软奴汪朮;第九任本阐阿格仑(A-glen);第十三、十七任本阐斡节儿僧格(hod-zer seng-ge);第十八、二十一任本阐加瓦藏卜等。见《西藏画卷》卷二所收霞炉寺文件;《元史》卷三四,《文宗纪》。

③ 见《西藏画卷》卷二所收霞炉寺文件。

④ 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各万户户数见《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页 186—187。

属民三,八九二户(按:此仅指平民——mi-sde,不包括僧户——Lha-sde,下同)。在今西藏日喀则南数十里霞炉地方,著名的霞炉寺文件即出于此。

2. 捺里八田地地管民万户——即 Tshal-pa 万户,有属民三千七百余户。万户长由掌握捺里八派实权的噶尔氏贵族担任,为乌思地区强大的地方势力。

3. 乌思藏田地地管民万户——不见藏文史籍记载,疑系萨斯迦本禅直辖的万户。属民三千六百户。

4. 出密万户——即 Chu-mig 万户,有属民三百一十户。在今日喀则西南曲弥地方。

5. 磬笼答刺万户——不见吐蕃史籍记载,无考。

6. 思答笼刺万户——即 sTag-lun-pa 万户,有属民五百户,此外还有附属散居人民一千四百户。可能就是在伯木古鲁噶举派思答笼分派主寺所在地设置的万户(今拉萨北)。

7. 伯木古鲁万户——即 Phag-mo gru-pa 万户,有属民二千四百八十三户,为乌思地区势力强大的万户之一。这个万户的实权操纵在担任伯木古鲁派主寺住持的郎氏贵族手里,最初几任万户长虽非郎氏族人,但都是由住持荐举任职的,实际上受其控制。第一任万户长朵儿直班(rDo-rje dpal)建筑聂乌东城(sNehu-gdo-ng-rtse,今乃东),为万户长驻地^①。

8. 加麻瓦万户——即 rGya-ma-ba 万户,与札由瓦万户的属民合计共五千八百五十户。在今墨竹工卡县西南甲马之地。

9. 札由瓦万户——即 Bya-yul-ba 万户。在今隆子县东南加玉地方。

10. 牙里不藏思八万户府——即 gyah-bzang 万户,置于伯木古鲁噶举派牙不藏分派势力统治区的万户。有属民三千户。

11. 迷儿军万户府——迷儿军又译必里公(今译止贡),即 hB-ri-gung 万户,在今墨竹工卡东北止贡地方。有属民三千六百三十户,辖境颇大,又因地

^① 《红册》,页一九〇。

处交通要道,十分繁盛,是乌思地区势力强大的万户之一。

此外,《元史·百官志》还载有“汤卜赤八千户四员”,与各万户平列,当是直辖于宣慰司的千户所。五世达赖所著《西藏王臣史》记载的十三万户中,前藏有 Thang-po che-Pa 万户,或即此。

《元史》未列而见于多种吐蕃史籍记载的万户还有:

后藏拉兑(La-stod,后藏西部)地区南(lho)、北(byang)两个万户,南拉兑万户有属民一千八十九户,在今定日一带;北拉兑万户有属民二千二百五十户,在今昂仁一带;

后藏的 Byang-hbrog 万户,在今日喀则东北香曲流域,是香巴噶举派势力所在地;前后藏之间的 Yar-hbrog 万户,在今羊卓雍湖一带,有属民七百五十户。藏语 hbrog,意为未垦荒地,尤指夏季牧场。这两个万户设在牧区,故户口稀少^①。

吐蕃史籍对“十三万户”名称的记载不尽一致,有些万户的设置、授职和辖境也不详,可能“十三”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字。元朝政府在乌思藏设置万户,大抵是就原来各地方势力统治的地域和人民进行划分,将当地僧俗首领封为万户长,使他们各以朝廷命官的身份治理本境。这对于限制各地方势力之间的互相争夺、混战,保持乌思藏地区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籍户口和置驿站

在一二四七年阔端通过萨班颁示于乌思藏的令旨中,就提出要各地首领编籍所属民户和规定赋额,但乌思藏各地首领是否遵命籍户造册,不得而知。忽必烈即位后,就派遣由总制院使答失蛮(Das-sman)率领的一批官员到乌思

^① 有关乌思藏十三万户的藏文史料,主要有《汉藏史集》,五世达赖《西藏王臣史》,《隆多喇嘛全集》,《松巴堪布佛教史》(即《如意宝树》)等。参见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西藏画卷》卷一,页一三;卷二,页六八一(注五二)。

藏调查户口,择地建立驿站。不久,又派遣籍户官员阿衮(A-kon)和弥陵(mi-gling)二人去乌思藏,正式进行清查户口和土地的工作。藏文史籍将此事系于至元五年(一二六八年)。

这次清查户口,只限于所置各万户、千户属下的平民(mi-sde)。寺院属民,不属万户、千户管辖的人民,以及纳里速古鲁孙和南部各地,都不在清查统计之列。统计的基本单位为“帐”(hor dud < ordo),即户。据《萨斯迦世系》说,当时以夫妇二人,子女二人,奴、婢各一人为一标准的小“帐”,即每户平均六人,按此推算,各万户人口数总计当在十九万左右。这只是应负担政府赋役的平民户口数^①。

在第一次籍户二十年后,至元二十四年,元朝又派官到乌思藏进行第二次户口清查,并划分站赤^②。元朝在吐蕃地区设置驿站,是至元五年第一次清查户口时进行的,后一次可能是整顿站赤、增设驿站或续签站户。

根据延祐元年(一三一四年)的一个文件,元朝在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三道设置了大站二十八处,小站七处。因吐蕃地面广远,人户数少,设站不如内地稠密,每站“驿程近者不下三、五百里”^③。据藏文史籍记载,朵思麻地面设有九站,朵甘思地面设七站,乌思地区设四站,藏地区设七站,共二十七站(包括大小站)^④。这可能是初期设置的站数。

驿站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单独系统,所以,划为设置驿站的地方就成为一块特殊的区域,不隶属于当地的万户;每站由朝廷设一站官(hjam-dpon, hjam源于蒙语 Jam)管理。有关驿站事务,各宣慰司需禀报宣政院,院会

① 参见《西藏画卷》卷一,页一三至一四,引《萨斯迦世系》;页二五一(注三六)页二五二(注四〇)。《汉藏史集》记载纳里速古鲁孙总计有二,六三五户(见陈庆英汉译本页186),可能是第二次籍户所计。

② 《西藏画卷》卷一,页一三至一四。

③ 《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页三。

④ 参见《西藏画卷》卷一,页一三。

同中书省议定处理办法。元朝政府十分重视保持吐蕃驿道的畅通,遇有灾荒、战乱,站赤消乏,即由朝廷拨款赈济,使补买马、牛和食羊等物以供给驿传。如至元二十九年乌思藏宣慰司报告,由于必里公叛乱,站驿断绝,诏命发给乌思藏五站每站各马一百匹、牛二百头、羊三百只的价银^①。这种装备规模,大抵和大都、上都附近以及各行省治所、交通枢纽处等特别重要的大站相当,而远远超过内地一般的大小驿站。如果中央拨款不足备办,还允许从宣政院所掌的吐蕃税收钱物内增加支給^②。元朝政府派遣大臣到吐蕃地区处理大事,往往以“治邮传”为一项要务。^③

元代吐蕃与内地来往极为频繁。由于管辖吐蕃地区的最高机构宣政院设在大都,历任帝师也都在大都供职,所以有关吐蕃地区的重要军政事务,都必须从大都发布命令,或派官到当地处理。吐蕃各地僧、俗上层人物经常往返于大都,或为谋求官职,或为解决相互间的纠纷,或为邀取赏赐。因此,驿站的设置,对传达和贯彻中央政令,维持元朝对吐蕃地区稳固的统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四 乌思藏地方统治权的交替

萨斯迦地方政府的统治

元朝中央政府通过分封万户和封授各种僧、俗官职,使乌思藏各地僧、俗首领对其所据土地和属民的占有得到了确定,成为朝廷敕封的领主。在帝师奉诏颁布的法旨中,对领主的权限、领主与属民的关系,都作了规定,如保护各领主的土地、属民和财产,不许侵犯;各领主属下民户应安居原地,不准逃亡或投靠他人,要按规定为领主当差纳赋,不得违抗领主的命令;各领主也应当保

^① 《元史》卷一七,《世祖纪》。

^② 《经世大典·站赤》,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一,页三。

^③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

护所属人民,不得滥施权力,对他们进行非法赋敛等^①。于是,各地僧、俗首领就以合法的身份确立了在其领邑的统治权,乌思藏地区的封建领主制形成了。

领主们有权任命其下属官吏,他们设置了主持行政、司法、税收和文书等事务的各种职官。各领主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按十进制组织军队,任命了将军(领邑最高统兵官)和百夫长、十夫长等各级军官。万户、千户是地方行政区划,因此万户长(khri-dpon)和千户长(ston-dpon)两级是地方长官,按照元朝制度,他们是“军民通摄”的。一个领邑内又分为若干“部”(sde),各设部官(sde-pa)管理。属民称为“部民”(mi-sde,指世俗平民),他们要负担国家和领主的赋税、徭役。赋税可以用货币或实物缴纳,实物税征收粮食、羊毛和酥油等的“什一税”,但除定额的税收外,领主还可以因战争或浩大工程的用款需要临时加征。劳役的负担尤为沉重,领主们为了兴建大寺庙和城堡,常常征调领邑内的大部分甚至全体属民;处在交通路线上的村民,要负担站役,供应马、草、人夫,还要受过往使臣的额外需索,更是苦痛不堪。

萨斯迦首领不仅拥有最大的领邑,而且由于元世祖对八思巴的尊崇,此派一直据有帝师和乌思藏长官(本阐)的职位,成为乌思藏的最高首领。八思巴受封后,在萨斯迦建立了一个“刺让”(bla-brang,意为帝师宫邸)机构,设置了司礼官(gsol-dpon)、掌内室和服装之官(gzim-dpon)、司宗教仪式官(mchod-dpon)、司接待官(mjal-dpon)、主文书官(yig-dpon)、司库官(mdzod-dpon)、司厨官(thab-dpon)、司引见官(h̄dren-dpon)、司座官(gdan-dpon)、掌运输官(skya-dpon)、掌马官(rta-dpon)、掌犏牛官(mdzo-dpon)、掌犬官(khyi-dpon)等执事官员^②。这种机构在吐蕃过去历史上未曾见过,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蒙古宫廷的怯薛组织。八思巴久侍蒙古宫廷,当他成为钦封的佛教首领时,可能就仿效了怯薛组织来建立自己的“教廷”。“刺让”执事官的性质和作用也和

① 见《西藏画卷》,卷二所收霞炉寺文件。

② 见《西藏画卷》卷一,页三五引《萨斯迦世系》。

朝廷的怯薛相类似,是帝师或萨斯迦住持的近侍,负责办理各种教廷事务。

至元六年,八思巴从故乡回到京城,奏上所制新字,由国师晋封帝师,同时仍居萨斯迦法主之位。十一年,回萨斯迦主事^①。十七年,八思巴去世,由其侄答刺麻八剌刺吉塔(第三任帝师)继任。二十年,答刺麻八剌死,忽必烈命八思巴弟子辇真监藏代理住持之职。大德八年辇真监藏入京嗣为帝师,成宗封八思巴之侄藏卜班(bDag-nyid-chen-po bzang-po-dpal)为国师,任萨斯迦住持。后来他的两个儿子相继担任住持,并且都受封为国师^②。有元一代,萨斯迦住持一职除辇真监藏一度代理外,都是由款氏家族担任。帝师通常在京供职,萨斯迦教廷实际由住持执掌。

乌思藏的军政事务由宣慰使(萨斯迦本阐)掌管。宣慰使作为朝廷任命的行政长官,直接管辖各万户,有权征调各万户的民夫,统率各万户的军队;对认为有罪的万户长,可以传讯、囚禁,以至将其撤职。但宣慰使的任职往往取决于帝师或萨斯迦住持的荐举,并由帝师传皇帝诏宣示于各万户,因而他们常不得不秉承帝师和住持的意志行事,维护萨斯迦派的利益。如史书记载许多任本阐的“政绩”,就是在萨斯迦兴建了某一座大寺院,修筑了某寺的围墙等。有一些事例说明,本阐不能违逆住持之意,否则要受到处分,如第二任本阐功嘉藏卜(Kun-dgah bzang-po),因违八思巴意,被忽必烈命蒙古军处死;元顺帝时,本阐加瓦藏卜(rGyal-ba bzang-po)可能因为与伯木古鲁万户有勾结,竟被萨斯迦座主投入监牢^③。各万户长的任免权往往也操在萨斯迦住持手中。可见,萨斯迦教廷的权势往往凌驾于世俗官府宣慰司之上。

元朝统治者在利用萨斯迦派的同时,也扶植其他教派和地方势力,使各治其地。其中,乌思地区的必里公万户、捺里八万户和伯木古鲁万户是除萨斯迦

① 藏文史料记载,八思巴此次返藏,于一二七六年回到萨斯迦。见《萨斯迦世系》。

② 《红册》,页一二四,一二一至一二二。

③ 《青册》,页二一七。

外最强的三个地方势力。在元朝分封万户和设置了层层统治机构之后,过去那种各地方势力之间相互争斗的情况受到了抑制,但矛盾并未消失,各地方势力对受制于萨斯迦派更未必心甘,而萨斯迦住持和本阐却又总是要极力迫使各万户俯首听命,不允许他们的势力有过大的发展。这些矛盾激化时,就可能爆发为战争。

必里公派与萨斯迦派的矛盾在至元二十年后变得越来越尖锐,至元二十七年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必里公之乱”(hBri-khung gling-log)^①。这次变乱的性质当是必里公派反对萨斯迦政教当局的斗争。据说必里公派得到了西蒙古 Hu-la 王(疑为笃哇)的支持^②。这就和当时十分激烈的元朝与西北诸王的斗争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严重了。于是忽必烈立即命令西平王奥鲁赤之子铁木儿不花率蒙古军前往,配合乌思藏宣慰使阿格伦共同镇压了这次变乱,焚毁了必里公寺。据《元史》记载,因必里公之乱,乌思藏站驿断绝,可见变乱和战争的规模是不小的。萨斯迦地方政府在元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稳定了局势。

伯木古鲁万户的兴盛及其战胜萨斯迦

萨斯迦派专权跋扈,日益腐败,只是在元朝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才得以维持其对乌思藏地区的统治。随着元朝的衰落,他们的地位也就动摇了。到元朝末年,乘中央政府困于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而无暇西顾时,势力强盛的伯木古鲁万户终于推翻萨斯迦地方政府,夺取了乌思藏的统治权。

自元朝分封万户后,伯木古鲁万户的实权一直操纵在世袭担任伯木古鲁派住持的郎氏家族手里。最初几任万户长由丹萨替寺(gDan-sa-mthil)住持荐举其亲信族外人担任,元成宗时,万户长软奴允丹(gzhon-nu yon-tan)举措失宜,住持乞刺思八犍真(Grags-pa rin-chen,一二五〇年至一三一〇年)对他很

① 《青册》,页二一七。

② 图奇(译):《新红史》(Debther mar-po gsar-ma),罗马,一九七一年版,页一八七。

不满意,于是报请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转奏朝廷将他免职,武靖王命萨斯迦政府司法官与伯木古鲁住持近侍等人集议处理。在帝师乞刺思八斡节儿的支持下,朝廷敕授乞刺思八鞞真为万户长^①,集政教两权于一身。

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乞刺思八鞞真的侄孙赏竹监藏(Byang-chub rgyal-mtshan,一三〇二年至一三六〇年)就任万户长。他九岁为僧,十几岁被送到萨斯迦去学习——当时乌思藏各地僧俗首领为保持其权位,常不得不结托萨斯迦住持和本阐,以取得他们的支持。送子弟入侍萨斯迦法王教廷就是结托的办法之一。不久,赏竹监藏回到伯木古鲁继任住持,又在萨斯迦住持的荐举下,被朝廷任命为万户长。就任后,他着手整顿行政,使伯木古鲁的势力更加强盛,因此对其邻境捺里八万户和牙不藏万户造成了威胁,引起他们的畏惧和忌恨。他和萨斯迦政府的关系也日益紧张,据说因捺里八和牙不藏两万户长的挑拨,本阐下令传讯他,判处他有罪。赏竹监藏公开反抗本阐的命令,于是本阐撤销了他的万户长之职,将他逮捕入狱。但他设法从囚所逃回,集结兵力,打败了牙不藏万户,然而又一次被本阐逮捕囚禁。不久又逃脱,这一次他和萨斯迦的关系完全破裂了。本阐调集各万户军队讨伐伯木古鲁,结果被打得大败。赏竹监藏乘胜扩大地盘,先后发兵攻打牙不藏、捺里八、必里公等万户,迫使他们投降,兼并乌思地区的大部分,并占领了萨斯迦的一块地方。

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同时,赏竹监藏遣使到朝廷为自己申辩,并请求封职。元顺帝完全满足了他的要求,授以达鲁花赤之职,封之为大司徒。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他建立了泽当寺,作为伯木古鲁住持驻锡之所,从此泽当寺取代丹萨替寺成为伯木古鲁派的主寺。这时,萨斯迦发生内部动乱,赏竹监藏乘机发兵进攻,至正十四年,占领了萨斯迦寺,查抄其所有文书印信,并派兵驻守。接着,又挫败了拉孜地方首领的抵抗和本阐的反攻,占领了大部分藏地。领地被兼并的一些万户长(如牙不藏、捺里八)曾向元朝廷控诉,但此时

^① 《红册》,页一九一。

元朝已摇摇欲坠,无力顾及西陲,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认可了大司徒赏竹监藏统治整个乌思藏地区的权力。于是,乌思藏的统治权遂转移到伯木古鲁政权手里。赏竹监藏自称“第悉”(sde-srid,意为摄政),不用本阍称号。他任用亲信部属为将领,派军驻守各要地,加强对地方势力的监督;并颁布了一部法典,从政治上巩固了对全乌思藏地区的统治。

第五节 云南地区

一 元朝对云南地区的统治

蒙哥三年(一二五三年)冬,忽必烈攻灭大理国^①。云南成为蒙古从西南包抄南宋的重要战略基地。入元以后,忽必烈曾把当时跟从他出征大理的亲信,比作与成吉思汗共饮班朱尼水的功臣。元朝长期在云南之地封王建藩,藩王对云南政局拥有较大的干预权。王政与省政并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朝统治者对云南地区的高度重视。

^① 目前还不很清楚,忽必烈南征之前,大理、蒙古之间是否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南诏野史》载,一二四四年,蒙古兵攻大理,大理权臣高和领军往拒,战死。南宋尝遣使致祭。《续文献通考》卷二四二《四裔考·西南夷》也提到了蒙古、大理间较早的一次战事,但没有明确年代,亦未言及高和,却说大理国王段祥兴即死于是役。按最近大理五华楼出土元碑中,出现段祥兴道隆十二年庚戌(一二五〇年)、段兴智天定三年癸丑(一二五三年)等年号,确证段祥兴至少在一二五〇年初还在位。如续通考所记不误,则此役最早也得发生在一二五〇年。又按今丽江九和里有白王庙遗址,庙后有塔,久圯。本世纪以来,先后从这里拣出刻有“兵到高逾城白王在阵亡”、“追为高逾城和高福善及战亡”等汉文以及梵文咒语的残砖。这个“高逾城”或“高逾城和”,当与高逾城生、高逾城光、高逾城隆等人出于同支,为高泰明子高明清后人。从丽江出土的文物来看,《南诏野史》所记,或许是可靠的。一二三六年以后,蒙古军多次进攻四川;南宋方面也曾不止一次地风闻其迂回大理、“鞞腹入寇”的企图。蒙古军队为配合在四川的攻势,派偏师南下,掠地大理北境,也是很有可能的。

元朝对云南的统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二五三至一二七四年,是忽必烈、兀良合台的军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云南实行军事统治的时期;一二七四至一三六六年,是元朝置行省于云南,进一步将这一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体系的时期;一三六六至一三八二年,是元对云南统治全面衰亡和瓦解的时期。

忽必烈取大理后,即于一二五四年初班师北返,留大将兀良合台继续经略云南。“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乌、白蛮三十七部”^①,相继款服。所谓五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基本上概括了蒙古国及元初对云南实行军事统治的地域范围。

八府四郡三十七部,都是元初沿用的大理国行政建置旧称。八府指善阐(今云南昆明)、威楚(今云南楚雄)、统矢(今云南姚安)、会川(今四川会理南)、建昌(今四川西昌)、谋统(今云南鹤庆)、永昌(今云南保山)、腾冲(今云南腾冲)。大理王畿地区因直接隶领于大理国中枢机构,故不在八府之内。按大理时期的行政建置,以府统郡,见于记载的郡为数颇多。所谓四郡,系指直辖郡,它们应当是善巨(今云南永胜)、河阳(今云南澄江)、秀山(今云南通海)以及石城(今云南曲靖)。三十七部之称,早已见于大理明政三年(九七一年)《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大理政权对诸爨的一部分采取就用各部首领统其部属的统治方式,带有某种羁縻性质。三十七部的具体构成、准确数目和地域范围数百年间迭有变更,但它本身却成为对大理国东部羁縻诸部的统称,一直沿用到元初。据《元史·地理志》,至元八年分三十七部为南、北、中三路,分别设总管府于临安路(今云南通海)、路南州(今云南路南,时属澄江路)、武定路(今云南武定),由此可知,当时所谓三十七部的居地,主要是在云南中部的临安、武定和澄江(今云南澄江)三路辖境之内^②。

^① 见《元史》卷一二一,《兀良合台传》;《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征伐》。

^② 关于五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的详细考释,见方国瑜主编:《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一册,一九六二年昆明油印本。

上述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加上大理王畿,是大理政权统治比较牢固的核心地区。它又可以分成东西两大部分,分别以鸭赤城和哈刺章城为中心。二者再加上茶罕章、金齿和赤秃哥儿,当日又合称为五城,用指较早款附蒙古的云南五大地区。

拉施都丁和马可波罗都提到过,鸭赤是云南建省之后的“省治所在”,或曰“省城”^①。在昆明近郊筇竹寺一三一六年的“硬译”体汉文圣旨碑,仍称该寺为“云南鸭池城子玉山筇竹寺”。可见蒙古人直到元代中后期还沿用 Yachi Balaghasun(蒙语 balaghasun 译言城子)的城名。鸭池或鸭赤,都是 Yachi 的音译,它本身并不是蒙古语辞。今纳西语尚称昆明为 Yichi,意谓南方,因昆明为其居地南方之大城。丽江地区最先为蒙古征服,其土著军队被征发,跟随兀良合台进攻鄯阐。蒙古人称鄯阐为鸭赤,很可能得诸从征的丽江土军之口。

哈刺章一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哈刺章指滇西大理地区以及它的中心大理城^②。蒙语哈刺译言黑;与这个名称相对的是茶罕章,茶罕一作察罕,也是蒙语,译言白。章可能是蒙古人沿用的吐蕃对云南地方及其人民的称呼。据相当于唐代后期的西藏编年史,吐蕃人确把在他们南方的南诏称为 hJang;这个 hJang,无疑来源于吐蕃对爨字的音译^③。不过在元代蒙、汉语文献中,除了哈刺章、茶罕章、罗罗章等已定型的专用名词以外,章的名称,一般

①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二八三;《马可波罗行纪》页二七七。

② 《元史》卷六《世祖本纪》三:“遣云南王忽哥赤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秃哥儿、金齿等处”。同书卷八《世祖本纪》五:“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统合刺章、鸭赤、赤科、金齿、茶罕章诸蛮”。鄯阐即鸭赤,赤科为赤秃哥儿省译,哈刺章即大理。又见《马可波罗行纪》页二七八。

③ 《马可波罗注》,页一七三。按爨氏原来是汉魏时迁入南中的汉族大姓。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爨氏一方面成了南中诸部的统治家族;另一方面,它自身和南中其他汉族人口一起,逐渐融合到当地土著之中。原先作为姓氏的“爨”因而就被移用来指称一方土地和那土地上的人群。东、西两爨的地域,最大时曾经包括了滇东北、滇中和滇西大部。因而,吐蕃人以爨的音译 hJang 来称呼它的南邻,而且后来一直沿用它作为对云南地区及其人民的称呼,这是很自然的。

不再见于使用。广义的哈刺章,则指整个云南行省。元立云南省治于中庆(今云南昆明)以前,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长期在大理,因而元初大理的名称亦可用以概指整个云南。

位于吐蕃与大理交界之处的丽江地区,蒙古人称之为茶罕章。金齿,“国名百夷”,指大理西南的傣族先民居住地区。它包括许多地域性的部族集团。金齿诸部中之最早归附蒙古者,于蒙哥末年遣使北觐,直到中统二年,方达上都见忽必烈^①。金齿居地的大部以及茶罕章基本上都在大理政权辖境之内。

赤秃哥儿是蒙语 chitkör(译言鬼)的音译,元初,蒙古人用它来指称滇东北和黔西地区以及居住在这里的乌蛮诸部。当时在黔西亦奚不薛(彝语,意谓水西,指今鸭池河以西地)一带,是著名的地域性部族集团罗氏鬼国(或称罗鬼)的地方^②。蒙古人以本族语中“鬼”字称之,故曰赤秃哥儿;再倒译为汉语,遂作“鬼蛮”。尽管秃赤哥儿之名本出自罗鬼,但当时系于秃赤哥儿名下的诸部和地域范围,并不限于罗鬼。兀良合台自鸭赤地区东征时所征服的罗殿部,被视为秃赤哥儿的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它曾经结罗鬼为援抵御蒙古军。分布在罗鬼之西的茫部(今云南威信、镇雄间)、乌蒙(今云南昭通)、乌撒(今贵州威宁)等诸部,也包括罗鬼在内,“境土相连,世戚亲厚”,世代延续着“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救相援”的关系,很容易看出它们之间“宗派同源”的历史特点^③。灭罗殿次年,兀良合台取道罗鬼西,经乌蒙等部地北行入川。这个地区,很可能也包括在“鬼蛮”或者赤秃哥儿的范围内。所以,赤秃哥儿实

① 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② 北宋庆历年间,泸州(今四川泸州)边外的“乌蛮王子”自号罗氏鬼主,后来这个称号得到了宋政权的承认。罗氏鬼国作为宋朝边境上的羁縻部,始于此时。构成这个地域性部族集团的两个核心部落,为罗氏和鬼国。元初,罗氏先已纳款,“后与鬼国结婚。鬼国言,我未降,尔奈何先降?罗氏遂毁虎符以叛”。见《宋史》卷四九六,《泸州蛮传》;《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③ 《明史》卷一九九,《四川土司传》一。参见尤中:《云南古代民族》上册,一九七八年四月,昆明油印本。

际上是蒙古入滇初期对云南东北部分的概称。这个地区后来分别隶属于云南和湖广两行省。

自忽必烈班师，兀良合台对云南的经略持续了三年之久。一二五六年，他奉命回师入川，遂经乌蛮，破土僚蛮^①，绝马湖江（即金沙江下游自四川雷波至宜宾一段），掠地嘉定（治今四川乐山），至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后重镇大理，但不久便率师南攻交趾。在这个时期中，蒙古先后在云南设置了近二十万户，“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②，只有万户之上的大元帅、都元帅等职才由蒙古人担任。云南的实际统治权，有相当一部分仍掌握在归附蒙古的原大理国王族段氏手中。

忽必烈即位以后，逐渐加强对云南的控制。中统年间，元廷先后置大理国总管、大理元帅府莅临云南。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于王府之外，并置大理等处行六部，在云南王监督下统摄五城之地^③。八年，忽哥赤被大理等处都元帅宝合丁、行六部尚书兼王傅阔阔带等毒死。此后，由于“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④，云南政局一直不稳。十一年，忽必烈命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以中书省平章政事之衔行省云南，建省治于中庆（今云南昆明）。在这以后，元对云南的统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在云南建立行省使地方行政机构得到大规模的调整。依旧在云南地域社会中拥有很大权势的大理王族段信直日，这时被任命为大理总管，他的影响力从此被限制在大理地区范围之内。云南的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奉命并听行省节制，行政权力多少得以统一。同时，元政府改变了军事统治时期以万户、千户兼摄地方行政、军民不分治的局面，遍置郡县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

① 亦作秃刺蛮，详下。

② 《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瞻思丁传》。

③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④ 《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瞻思丁传》。

等地。建省以后,郡县行政官员,均由朝廷委派。由于离开中央太远,往返费时,因此,元政府规定,每三年由朝廷遣使前往云南,会同行省、行台官员,就便委任或迁调六品以下官,再开具名单呈省追授。五品以上官员,则仍须移咨都省铨注。边远地区也任用一些土官,对他们的控制较松,他们有品秩而不入流,即使犯了罪,也罚而不废。土官病故,由子侄兄弟袭职,没有子侄兄弟,则妻承夫职。为了鼓励内地官员到云南任职,至元后期,宣布腹里官员迁调到云南地区,一般可升二等,到极边重地的可升三等。在云南做吏,出职入流也比在腹里快一些。官员病死云南任上,可由公家给粮食舟车,护送还乡归葬。通过这些方式,加强中央集权下的地方行政机构,使之达到与内地基本相同的水平。云南地方官本来有权擅自处决死囚,后来规定,也必须像其它行省一样,凡罪至当死,应申报朝廷断决。尽管还有某些特殊的地方,云南毕竟成了直隶于中央政府的边远行省。而在此之前数百年以来,它长期自立一方,“唐名节镇,宋假王号,是皆正朔不加,车书不一,牢笼优籍,羈縻不绝而已”^①。元朝复得郡县其地,这是重大的历史进步。

其次,云南作为诸行省之一,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交通条件也显著改善了。元灭南宋后,先后接通了云南与四川、湖广等省的驿道。从云南省治中庆东北行,一路经乌蒙部出,可至四川叙州(今四川宜宾),一路取道曲靖、乌撒(今云南威信)出省,可至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纳溪。自中庆出发,还有一条驿路北达川陕地区。其路线经武定向北,贯穿罗罗斯部居地,绝大渡河而至黎州(今四川汉源北)、雅州(今四川雅安),与成都陆路相通。不过这条站道“烟瘴生发,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②,其使用率似低于其它站道。至元末,在中庆至曲靖、普安的站道以东,又加设四站,贯穿罗殿及其以东的八番顺元地区,达于黄平(今贵州黄平)、镇远(今贵州镇远),而与湖广行省的驿道干线

^① 郭松年:《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一二。

^② 《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

相通,经辰州(今湖南芷江)、沅州(今湖南沅陵)北趋。这条路“山势少通,道径平稳,又系出马去处”^①,因而日益成为云南与内地相联系的交通要道之一。此外,由东南出省至湖广南部(今广西地区)、由东北出省至亦奚不薛,也都有驿道相连。通达云南各地的省内驿道,则以中庆为中心构成辐射状的交通体系。这对于密切云南各地区及其与内地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第三,云南社会经济在这个时期中有较大的发展。在元政府倡导下,水稻以及其它农作物的种植地区有所扩大。过去,“爨僰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引进内地先进的蚕桑技术后,“收利十倍于旧”^②。滇池地区的水利事业也有明显的发展。作为行省的政治中心,中庆城在经济上也日趋繁荣,以至于日后得以超越大理城而成为云南第一都会。与此同时,汉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也呈现出一个新的局面。“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羲之)为先师”。元代云南地方官员“首建孔子庙,置学舍,劝士人子弟以学;择蜀士之贤者,迎以为弟子师,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人习礼让,风俗稍变矣”^③。汉族的婚姻行媒、棺葬祭奠等习俗,亦逐渐流行于云南。从南诏以来自成体系的“师僧文化”,很快向处于南北整合之中的汉文化靠拢。到元明之际,在云南士人中流行的,已基本上是与内地相同的汉文化了。

最后,一部分在蒙古军事统治时期尚未款附或者降而复叛的地区和部族,在这个时期、尤其是至元中至大德年间,也相继被置于云南行省的统治之下。这些部族或地区包括:罗罗斯、乌撒乌蒙^④,广南西路(今云南广南)、左右两江及盘江流域诸部(后者不久归隶于湖广行省),临安之白衣(即百夷,傣族先民

① 《经世大典·站赤》,《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

② 《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

③ 《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

④ 罗罗斯和乌撒乌蒙的平定在至元九年到十年间,在元朝对云南实行军事统治的末期。

的一支)、和泥(哈尼族先民)和威楚之金齿、落落诸分地城寨,八番和罗氏鬼国,元江流域诸部,大车里(地方统治者驻地在今云南景洪)诸部,稍晚,又有麓川(地方统治者驻地在今云南瑞丽)、车里边外广大地区的金齿、八百媳妇等。行省的疆域,西面和南面分别伸入今缅甸、泰国和老挝的境内。云南行省对上述诸地区或部族的统一辖理,有力地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建立行省以后云南社会的安定繁盛,在赛典赤及其子纳速刺丁和忽辛任职的二三十年间最为显著。大德以后,行省权力日甚一日地受到坐镇云南的蒙古诸王梁王以及大理段氏势力的牵制。元对云南的统治虽然大体上尚能保持稳定,但云南统治当局内部的各种矛盾逐渐尖锐起来。

至元八年,云南王忽哥赤被部下毒死。十七年,忽哥赤子也先帖木儿袭封为云南王。至元二十七年,忽必烈又以皇孙甘麻剌为梁王,出镇云南,地位在云南王之上。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九年改封晋王,移藩滇北;次年,复以其子松山袭封梁王。至大元年初,也先帖木儿进封营王,离开云南,这对梁王发展自己在当地的势力造成了极大的便利。次年,元廷可能担心梁王势大难制,以其“在云南有风疾”为辞,迫使他离藩,另任诸王老的(忽必烈第七子奥鲁赤之孙)代镇云南,封他为云南王。七年之后,老的北觐仁宗。此后他是否曾返回云南不大清楚。英宗即位后,将云南王转封给松山的儿子王禅。松山与泰定帝同为甘麻剌之子。因此泰定帝一登帝位便将王禅由云南王晋升为梁王,同时以王禅子帖木儿不花袭封云南王。至此,梁王和云南王的王位同时落入王禅一家之手。王禅不但在云南势力大增,而且成了泰定帝的朝中要人。致和元年(一三二八年)泰定帝死,以王禅和倒刺沙为代表的甘麻剌系和答刺麻八剌之子海山(即武宗)系的拥护者之间,为争夺帝位引起了大规模内战。两都之战时,王禅和帖木儿不花都在北方率军作战。上都集团失败后,王禅赐死。但他在云南培植的势力尚存。朝廷几次召行省官入朝,不至。从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末开始,云南诸王秃坚不花、万户伯忽等由借故推诿、抵拒朝命

发展到公开称兵叛乱。秃坚不花占领中庆,攻掠州县,自立为云南王,署丞相等官。元廷调数省兵力进讨,虽于次年平息了叛乱,但这次战争也给云南社会经济带来了不小的破坏。

甘麻刺系诸王在云南的势力被铲除以后,元廷于元统二年(一三三四年)又封阿鲁为云南王。根据昆明发现的一三四〇年阿鲁王令旨碑,他的名字蒙古文原作 Aruq。阿鲁世系不明。从其继位者孛罗是也先帖木儿幼子看来,阿鲁当亦属忽哥赤后裔^①。孛罗在一三四七年犹为云南王。他后来何时由云南王进封为梁王,未详。一三六三年,明玉珍建夏政权于四川,遣兵三道攻云南。文献已称此时的孛罗为梁王^②。孛罗靠大理段氏兵力击败夏军。一三六六年,梁王与段氏关系破裂;紧接着,元朝廷又自大都北遁。元对云南的统治遂急剧衰败下去。

大理是段氏长期统治云南的旧基地。元初段氏受任为大理总管,并许世袭此职。其势力自然很容易在原有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元朝中后期,掌握了云南西部实际统治权的段氏,与企图独霸云南的梁王之间,冲突逐渐表面化。《南诏野史》记载,高蓬为段氏守重镇罗那关(在今云南牟定西),梁王遣人暗招之,蓬不从,作诗答曰:“寄语下番梁王翁,檄书何苦招高蓬。身为五岳嵩山主,智过六尺缩地公。铁甲铁盔持铁槊,花鞍花索驭花骢。但挥眼前黄石

① 屠寄在《蒙兀儿史记》卷一〇五中为忽哥赤一支排定的世系如下:

忽哥赤—也先帖木儿 — { 脱欢不花 } 此据《辍耕录》卷一“大元宗室世系”补
 { 脱 鲁 }
 { 阿 鲁—孛罗—把匝剌瓦尔密 }

然而,他以阿鲁为也先帖木儿幼子、孛罗为阿鲁子、把匝剌瓦尔密为孛罗子,俱无确凿根据。据阿布勒嘎齐《突厥世系》,也先帖木儿实有三子,即脱先不花(按当为脱欢不花之讹)、脱鲁及孛罗。伯希和认为《元史》卷四一《顺帝纪》四提到的“云南王孛罗”,即也先帖木儿幼子。见韩伯诗:《元史·宗室世系表》法文译注本页一一八至一一九。

② 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丙午(一三六六)年二月“明玉珍”条。按明玉珍出兵云南的时间,各书所记出入颇多。据新近发现的明玉珍墓玄官碑,他称帝于癸卯(一三六三)年正月;而夏军攻入中庆,据支渭兴《重修中庆路庙学记》,在同年春三月。

阵,击破孤云几万重。”梁王忌之,乃重赂高蓬厨人暗害之。这段传闻虽难视为信史,却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人对段氏与梁王之间紧张关系的关注。明玉珍兵入云南时,梁王一度退出中庆。段功领兵从大理东驰,将明玉珍军逐出云南。梁王遂以女阿盖公主妻功,把他留在中庆。一三六六年,梁王忌功势大,杀之于通济桥。段氏与梁王为此连年构兵,“民坠涂炭”。后来经过大理土官杨宝调解,战乱得以平息。这时元顺帝已逃离大都。段氏与梁王虽在实际上分土而治,但都奉北元正朔。一三八一年秋,明廷以傅友德、蓝玉、沐英将步骑三十万进征云南。梁王遣使至大理乞援,段氏衔于前仇,拒绝发兵。次年初,梁王势蹙自尽。中庆等城及属郡皆降。蓝玉、沐英西攻大理,克之,又分兵徇鹤庆、丽江、金齿;回军滇池与傅友德会师,复分道收附乌撒、东川、建昌等部。元对云南的统治至此结束。

二 云南各族及其社会状况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见于元代史籍的各种土著居民,有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斡泥、吐蕃、峨昌(今阿昌族)、撁人(今独龙族)、侬人(今僳族)及土僚等等。

白人为今白族先民,是以南徙入滇的古代氐羌族当中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些族系为主体,并融合了汉魏以后移入南中的汉族大姓爨氏以及其它汉族人口逐渐形成的人群。南北朝以后,氐羌后人多被区分为白蛮、乌蛮两大类;前者的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白人的名称即源于白蛮,他们在元代又被称为阿剽、爨剽(寸白)。其分布地区,以中庆、威楚、大理、永昌为主,东至普安、曲靖,北至丽江,南及元江。他们多居住在坝区,以农耕为生,“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山明水秀,亚于江南,麻麦、蔬、果颇同中国”^①。白人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文明程度最高,以至元代人滇的中原汉人,亦认他们为

^① 李京:《云南志略》。

“汉之遗裔也”^①。尤其是城镇或附近地区的白人，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风俗逐渐接近汉族。所以明人将大理“近城汉、僰人风俗”不加分别地相提并论^②。元时世居中庆晋宁的白人王惠，临终时遗训子孙“忠孝丧礼一则古，毋从僰俗”^③。这个例子，既反映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人对中原仪文之制的仰慕，同时也说明流行的“僰俗”毕竟还保持着若干固有的特点。在《云南志略》中，李京这样描写当时的白人风俗：

男女首戴“次工”，制如中原渔人之蒲笠，差大；编竹为之，覆以黑毡。亲旧虽久别，无拜跪，惟取“次工”以为馈。男子披毡椎髻。妇人不施粉脂，酥泽其发，青纱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绣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少年弟子，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居室多为回檐，如殿制。食贵生，如猪、牛、鸡、鱼，皆生醢之，和以蒜泥而食。每岁以腊月二十四日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礼。六月二十四日，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谓之驱禳。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投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诸种蛮夷，……不知事神佛，惟白人事佛甚谨。……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棋子，俗呼作叭，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人死，俗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其贵人被

① 佚名：《大理路兴举学校纪》，见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考释》一，《云南文物》一二期（一九八二）。

② 《云南图经志书》卷五。

③ 李源道：《王惠墓志铭》，转引自《新纂云南通志》。

服,近年虽略从汉制,其他亦自如也。

上引史文提到白人在六月二十四日晚缚火炬照天、持松明相烧驱禳,是有关火把节的最早文献记载。这一习俗至今仍在白族及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中流行。明清以往,关于火把节的记载颇多附会臆想之说^①,反不如李京所述朴实无华。

白人的语言,按现代语言学分类法,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自汉魏至元代,白蛮的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所以唐人樊绰曾说:“言语音,白蛮最正”,其“名物或与汉不同,及四声讹重”^②。所谓“或与汉不同”,实际上说明白语词汇中颇有一部分能与汉语的相应词汇相通。据李京记载,白人语穿衣曰衣衣,吃饭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幕,酒曰尊,鞍鞣曰悼泥,墙曰砖垣,等等。我们无法知道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如此类的词汇,在白语中是否只有汉语借词一种形态,但白语基本语汇大量吸收汉语借词,乃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一点无疑使白人极便于利用汉字和在汉字基础上稍加创造的若干新方块字来记录白语,从而形成所谓僰文。到元代中后期,僰文很可能已获得一定程度的流行。

罗罗即乌蛮,是现代彝族的先民。元时乌蛮诸部仍大多都有各自的部名,而罗罗则是对他们的统称。南诏乌蛮七部落中有号鹿卢蛮者,当即罗罗一名的来源。蒙古人又在这个名称之后加上复数后缀-s,汉语音译为罗罗斯,专门用来指集中居住在今四川凉山自治州和西昌地区的罗罗人;元置宣慰司于其地,称罗罗斯宣慰司。乌蒙、乌撒地区也是罗罗人的集中居地。此外,罗罗的分布遍及云南大部分地区,多与诸族杂居。罗罗或耕或牧,惟其农业大体上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李京记载元代罗罗风俗说:

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以

① 游国恩:《火把节考》,《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第一期。

② 《蛮书》卷八。

轻死为勇。马贵折尾,鞍无粘,剡木为镫,状如鱼口,微容足趾。妇人披发,衣布衣,贵者锦缘,贱者披羊皮,乘马并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虽贵,床无褥,松花铺地。……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每岁以腊月春节,竖长杆,横设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相起落为戏。

金齿、百夷都是今傣族先民,其俗尚以金、银、漆等来涂饰牙齿,因而很古以来就被称为金齿、银齿、黑齿等。元代的回回人和蒙古人用波斯语 Zar-dandān 称之,亦即金齿之意^①。很明显,金齿并不是这个民族的自称,而是他族的外称。实际上,唐代的裳魔,明代的歹摩,都是傣勐一音的异译,这才是“金齿百夷”部的自称。李京说:“西南之蛮,白夷(即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行省的西南及东南边地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区。南诏、大理时代,这一带的傣族先民大体上可以今澜沧江为界分为两部分,西部称为金齿(或黑齿等),东部称白衣(即百夷)。入元以后,金齿、百夷之称经常混用,已不复区别。西南的金齿百夷,由大理金齿等路宣慰司管辖,东南地区诸部则归隶于临安道宣慰司^②。八百媳妇^③、七十城门甸等部居民,都以百夷为主。

百夷诸部多从事农业经济。其地多桑柘,四时皆蚕;由于气候宜于作物生长,土地又肥沃,故“地利不能尽,然多产牛、羊、鱼、果”^④。大多数金齿部落元时还没有使用文字,只是刻木为约。

百夷妇女特别能吃苦耐劳。据《云南志略》,她们“长眉睫,不施脂粉,发

^① 元以后,这种以金饰齿的俗尚在有些百夷部落中演变为“歿后金镶二齿而葬”。见何孟春:《复永昌府治疏》。

^② 参见尤中:《云南古代民族》,云南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一九七八年四月油印本,下册。

^③ “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固名八百媳妇”。见《明史》卷三一五,《云南土司传》三。

^④ 钱百训:《百夷传》。

分两髻,衣文锦衣,联缀河贝为饰。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方得少暇。既产,即抱子俗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由于居地偏南,风土下湿上热,金齿百夷“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百夷诸部大概要到明代中后叶方才开始奉佛,其在元代唯信巫祝而已。

至正之初,随着元朝中央政府和元南行省统治势力的衰弱,麓川百夷土官思可发举兵抗命,“盗据一方,侵夺路甸”。据傣文《麓川思氏官谱》,知思可发为土语音译,其意即擒白虎之王。元明官方文献多以死可伐名之,是一种诬称。兵起之后,邻近诸部“相率纳贡”。元廷曾几次派兵往征、下诏招谕,都不能见效。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年),思可发归降元廷。此后,他实际上长期控制麓川四周“三十六路”之地^①,“虽奉正朔、纳职贡,而服用制度,拟于王者”^②。一直到洪武中,他才为明朝重新招抚。

么些即今纳西族先民。其称谓在《华阳国志》中作摩沙夷。自南诏、大理以往,他们一向以丽江为聚居中心。其“地凉,多羊马及麝香、名铁,依江(指金沙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③。么些人最早被蒙古征服。元廷先设察罕章宣慰司治其地,后又以金沙江为界,分之东、西五城地,分别隶属于北胜府(今云南永胜)和丽江路。元初的么些大姓有和氏、木氏等。察罕章管民官一职曾由和氏担任,木氏是其属下。至明初,木氏势力浸大,其后代写成的《木氏宦谱》一书,遂将元代的察罕章管民官之职安到自己的祖先木良(即麦良、阿良)头上^④。

关于么些人的风俗,《云南志略》的描写如下: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五,洪武十六年六月。

② 《百夷传》。

③ 《云南志略》。

④ 方国瑜:《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二册,一九六四年二月,昆明,油印本。

善战喜猎，挟短刀，以砗磲为饰。少不如意，鸣钲鼓相仇杀，两家妇人中间和解之，乃罢。妇人披毡，皂衣，跣足，凤环高髻；女子剪发齐眉，以毛绳为裙。……不事神、佛，惟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俗甚俭约，饮食疏薄，一岁之粮，圆根^①已半实粮也。贫家盐外不知别味。有力者尊敬官长。每岁冬月，宰杀牛羊，竞相邀客，请无虚日。一客不至，则为深耻。人死，则用竹篋舁至山下，无棺槨，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其余颇与乌蛮同。

斡泥亦作和泥、禾泥等，与现代的哈尼为同名异译，主要分布在临安西南、今元江流域，其西与百夷聚居区相接。他们多巢居山林极险，而与河谷平坝地区的金齿百夷以及山居的其他部族错落杂处。李京记其习俗云：“家有积，具以一百二十索为一窖，藏之地中。将死，则嘱其子曰，我平日藏若干，汝可取几处，余者勿动，我来生用之”。

临安西南的斡泥散布地区，实际上是民族杂居区。在上面叙述的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等族的主要聚居地区内，同样存在着其他民族杂居其间的情况。例如以么些为主要居民的丽江地区，“蛮有八种，曰磨些（即么些），曰白，曰罗落（即罗罗），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伧”^②。峨昌即今阿昌之异译。撬与佻音近，今云南贡山县西部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佻江（发源于西藏察隅县东）。撬人应即佻江流域的居民，后来逐步南下，徙至独龙江一带，今称独龙族^③。伧人即今傈僳族先民，傈为专名，傈当是少数族语音译，意为人或族，伧与傈实同名异译。伧人居地在“兰州冰琅山外”，即今云南兰坪西碧罗山（怒山）外的怒江流域^④。另一方面，除其主要聚居区之外，白人、百夷、

①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圆根，即蔓菁也”。

② 《元一统志》，赵万里辑本，卷七。

③ 尤中：《云南古代民族》下。

④ 参见方国瑜：《中国历代疆域图西南地区考释》第二册。

罗罗等族也有许多部落散布于行省各地。其中罗罗的分布尤为广泛,从行省腹地到边远地带,其足迹几乎随处可见。

李京在《云南志略》中所提到的云南土著,还有土僚人和蒲人。“土僚(即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猪羊同室而居。无匕箸,手搏饭而食。足蹈高屨,上下山坡如奔鹿。妇人跣足高髻,桦皮为冠,耳坠大双环,衣黑布,顶带锁牌以为饰。出入村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巅崖之上,以先坠者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云”。该地区土僚男子以击齿为成年标志的习俗,一直保留到明代。其东亦溪不薛地面的葛蛮,也有悬棺折齿之俗^①。他们都是古代僚族的后裔。土僚是构成近代僮族的成分之一;而葛蛮即今仡佬族先民。“蒲蛮,一名朴子蛮,在澜沧江迤西。性勇健,……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颈皆露。善用枪弩。首插雉尾,驰突如飞”。他们是今天布朗族的先民。

元代云南民族构成中还增加了两种新的成份,这就是蒙古人和回回人。明洪武末平建昌诸部时,这里的居民包括“大头土番、僰人子、白夷、么些、倮鹿、保罗、鞑鞞(即蒙古)、回纥(即回回)”诸种,杂处散居于山谷间^②。《云南图经志》卷一“云南府风俗”条云:“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罗罗、曰达达(即蒙古)、曰色目(即回回),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这些史文中提到的蒙古、回回人,都是在元代进入云南后留居在那里的人口。

云南的蒙古人,有一部分是随云南王、梁王以及其他诸王一起迁去的人户,更多的原是蒙古军户,他们或者在路经云南远征边区邻国的往返途中留镇

^① 明嘉靖《四川总志》卷一三;田汝成:《行边纪闻》。土僚、仡佬等族击齿悬棺的风俗,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参见《四川珙县洛表公社十具“僰人”悬棺清理简报》,《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② 《明史》卷三一一,《四川土司传》一。

其地,或者是被直接调来镇守云南的。元亡后,当地的蒙古军户逐渐和汉人军户一样,与编户齐民参错相处,绝大部分被汉族或别的民族同化了。只有在个别地方,他们仍相对集中地聚居,达数百年,同时还一直保留着对祖先的记忆。例如元政府曾于临安西“曲陀、阳关之原”置都元帅府,以重兵戍之^①,在这里屯驻了一支蒙古军队。他们的后代,包括曾任都元帅的阿喇帖木儿蒙古右旃的后裔,至今仍聚居于通海县西的几个相邻的自然村中,约有四千多人。关于蒙古人被周围民族同化,可以举今丽江巨甸纳西族中以“元”为姓氏的家族为例。他们本来是蒙古人,属入纳西族后即以“和”为姓氏,而且忘记了自己的祖籍。清嘉庆年间,云贵总督罗琅玕从他们祖坟的塔形蒙古文墓碑了解到这个家族祖籍蒙古,以后他们才将姓氏从“和”改为“元”^②。

元代云南回回人的来源有三。一是镇戍云南的色目军队。如至元二十二年十月,“遣雪雪的斤领畏兀儿一千户戍合刺章”^③。又如延祐二年,“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军屯田俱馔,至是以之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④。二是跟随在云南任职的色目官员一起迁去的色目人户。今云南各地纳、赛、丁等十余姓回族都以赛典赤瞻思丁为先祖,虽然出自传闻,但亦可反映出当时与色目官员一起来到云南、后来又羁留在这里的回回人,其数目是不小的。其三,当时从云南至阿拉伯早

① 李泰:《都元帅府修文庙碑记》,《新纂云南通志》卷九四,《金石考》一四。元代有一个赵姓元帅曾题诗于元帅府壁曰:“阳关形势扼新兴(即玉溪),百骑飞来似建瓴。三面山谷通海白,一天风埽崑峨(即峨山)青。朝廷战罢三军乐,官府无私百姓宁。闻说元戎不好武,新诗吟满半山亭”。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五〇,《地理志》三〇。

② 转引自杜玉亭:《云南蒙古族简史》,一九七九年,昆明,页二九。

③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一〇。

④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二。

已“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①。沿这条路线，或许也会有部分回回人西来。

^① 汪大渊：《岛夷志略》。

第九章

元代的文化科学

第一节 文学艺术

一 元曲

杂剧

我国文学史上有“唐诗”、“宋词”、“元曲”之称。“元曲”实际上包括散曲和戏剧(杂剧和南戏),而杂剧却是这个时代文学的真正代表,它在我国戏剧史上创造性的发展,它所具有的强烈的现实性和人民性,高度的艺术性,堪称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支灿烂绚丽的花朵。

早在唐代,我国的戏剧已经产生。自宋代开始,一些大城市中就建立了勾栏、瓦舍,许多民间艺人在里面进行说唱表演。金中都(今北京)的院本,就是宋代市民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而元杂剧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吸收了宋金以来的诸宫调(用多种宫调来说唱一个故事)从而结合产生了新的戏曲形式。当然,宋金的傀儡戏、皮影戏、大曲、赚词,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对它都有影响,并使它显得格外丰富多彩。

杂剧将歌曲、宾白、舞蹈动作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戏剧艺术。它以歌曲(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句尾入韵;宾白(白)、舞蹈动作(科)加以配合。结构上一般分四折,剧前或两折之间可加“楔子”。曲词一般由一个演员(男称“正末”,女称“正旦”)演唱。杂剧的题材十分广泛,内

容异常丰富。据元末钟嗣成《录鬼簿》、元末明初贾仲明《录鬼簿续编》、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等书所载,元代杂剧作家约有二百人左右,剧目六百种左右,现存一百五六十种。

元杂剧繁荣的根本原因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元朝统一全国后,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特别是由于水陆交通的发达,刺激了商业经济的空前活跃。城市居民的大量增加必然对文娱活动有着相应的要求,这就为杂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大都就是元朝前期杂剧创作和演出最昌盛的都市。当时,在大都就有一些创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玉京书会”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聚集在这些书会里的知识分子,多半因朝代的更迭或异族统治而感到失意,他们和下层市民有长期的接触,与社会实际有较多的联系,因而获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就是“玉京书会”里最优秀的戏曲家之一,由于他从事戏曲活动的时间最长,作品最多,因而影响也最大。他的作品不仅有着极高的艺术成就,而且富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关汉卿为元杂剧的完善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家。

关汉卿,号已斋(一作一斋),大都人。出身“太医院户”^①,大约生于十三世纪二十年代,卒于成宗大德初年(一二九七年)前后^②。《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③。明代臧懋循在《元曲选序》里也说他“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他自称“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通五音、六律滑熟”^④。正由于他的社会实践和舞台经验是那么丰富,因而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主义的内容。

① 此处据天一阁本《录鬼簿》。按:“太医院户”是金元时代的特殊户口,属太医院管辖,医生的子孙或兄弟即使不行医,也可属于医户,享受蠲免“杂泛差役”的待遇。

② 此从蔡美彪说。见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戏剧论丛》一九五七年第二期。

③ 《永乐大典》卷四六五三,天字韵引。

④ 关汉卿:《不伏老》。

根据《录鬼簿》的记载,关汉卿共创作了六十三个杂剧剧本。可是,现存曲目俱全的仅有十二个,科目残阙的三个,只保存着单支曲词的两个。其中《感天动地窦娥冤》则是关汉卿杂剧中最出色的代表作。

悲剧《窦娥冤》实际上是当时那个时代司法不公的真实写照。在元朝的封建统治下,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面临着倾家荡产、卖儿鬻女的威胁,而地痞流氓勾结贪官污吏,谋财害民、无恶不作,屈死了无数个窦娥。剧中窦娥喊出的“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这是一位受压迫和欺凌的妇女对封建时代强烈的抗议。

关汉卿的《窦娥冤》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关汉卿于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年)后开始南下漫游,沿途在扬州停留过,也可能在淮安停留过。《窦娥冤》故事发生的地点“楚州”就是元淮安路,而剧本则写于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之后^①。这时正是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大案件发生后不久。被关汉卿惟妙惟肖地刻画的“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的楚州太守桃机,其实就是封建社会一切贪官污吏的缩影。因此,《窦娥冤》等杂剧不能不说是元代腐败政治的一个有力抨击。当然,关汉卿的剧作也有许多局限性,窦娥的昭雪沉冤就是依靠了她死后的幽灵,她活着的父亲、一个“清官”来实现的。剧中的“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正是作者对“好皇帝”所抱有的幻想。

关汉卿的其他作品也大都是揭露元代权豪势要和政治腐败的作品。如《鲁斋郎》中的鲁斋郎是一个“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的恶棍;《望江亭》里的杨衙内是一个诬陷无辜、夺人妻子的花花公子;《蝴蝶梦》里的葛彪是

^① 关汉卿〔南吕一枝花〕《杭州景》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句。《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四年十一月,“命中书省檄谕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由此可以断定,关汉卿南游时间当在宋亡之后。《窦娥冤》第四折有加窦天章“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之职,据《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肃政廉访司”。故关汉卿作《窦娥冤》当在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之后。

一个“打死人不偿命”的恶霸。关汉卿还有些作品是歌颂妇女的反抗精神的，如《拜月亭》、《赵盼儿》等。

与关汉卿齐名的杂剧家有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光祖等。关、马、郑、白，明代以后被誉为“元曲四大家”。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①。剧作存目十四种，曲目俱全的三种，《西厢记》是他的代表作。钟嗣成对他的评价是：“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②。这部杰作是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基础上，吸收宋、金时期同题材的说唱文学和戏曲的成就，进一步精心创作而成的，但他又在思想上、艺术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西厢记》是一部描写张生和崔莺莺恋爱故事的戏剧。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更鲜明地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赞扬了崔张反抗封建婚姻、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斗争，揭露和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在人物形象和艺术表达上，王实甫大大加强了莺莺和红娘在剧中的位置，使她们的性格更加鲜明。全剧结构紧凑，主题突出，文字优美，抒情感人，对后世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马致远也是负有盛名的元杂剧家。号东篱，一说字千里。大都人。元贞、大德年间参加过大都的“元贞书会”，作剧十六种，今存七种。有《汉宫秋》，描写王昭君出塞的故事，与历史事实诸多不符，情调伤感。《汉宫秋》曲词华美，富有表现力，被臧晋叔列为《元曲选》之冠。

白朴（一二二六至约一三〇六年），隰州（今山西河曲附近）人。他也是

①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王实甫》云：“余于苏天爵《滋溪文稿》中，偶发见王德信名。如即曲家王德信，则王实甫乃王结之父。”按：王结武宗时由宿卫入仕，历官集贤学士，吏刑部尚书，中书参政，《元史》有传。《滋溪文稿·王公行状》载：“祖遯勋，以质子军从太祖皇帝西征，娶妇阿噜浑氏。……父德信，治县有声。擢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与台臣议不合，年四十余即弃官不复仕。”据此，回族史界有学者认为王实甫为阿噜浑氏（回回人之一）所生，有回回血统。

② 《录鬼簿》卷上。

在大都参加“玉京书会”的剧作家。作品存目十六种，今存二种，《墙头马上》最为著名。它和《西厢记》相似，也是歌颂男女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的剧本。剧中的主人公李千金敢于和她的公公作斗争，最后终于和裴少俊重做夫妻。

郑光祖，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作剧十八种，今存八种。代表作是《倩女离魂》，它是根据唐人传奇《离魂记》改编的，通过张倩女灵魂出壳追随王文举进京的情节，表现了张倩女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郑光祖是元朝后期最著名的杂剧家。

杂剧的题材十分广泛，除了爱情剧、历史剧、公案戏之外，还有不少是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见于剧目的至少有二十三部，今天流传下来的有十部。这些水浒戏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凌强扶弱、除暴安民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素材，描写了李逵主持正义、不怕官府和地痞流氓的英雄本质，又刻画了他粗中有细、知过必改的性格。故事情节曲折，有着自己显著的艺术特色。

元代还涌现了不少卓有成就的少数民族杂剧家。女真人李直夫，本姓蒲察，人称蒲察李五，做过湖南肃政廉访使，是一位多产的杂剧作家，据《太和正音谱》，他有十二个作品，现存《便宜行事虎头牌》一种。《虎头牌》描写女真族的金牌上千户山寿马坚持军法，责罚他叔叔银住贪酒失地的故事。全剧富有戏剧性和生活气息，而且还采用了不少女真乐曲和风俗习惯，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蒙古人杨讷，字景贤（一作景言），号汝斋，是一位多产剧作家，作品至少有十八种，现存《刘行首》、《西游记》等。

随着南方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元成宗大德前后，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也逐渐由大都向杭州南移。虽然这时还出现了像郑光祖这样的著名杂剧作家，但总的来说，杂剧已趋向于衰落，作品中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落后迷信的思想意识也日益增多。

南戏

南戏又称“戏文”，原来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性剧种，在宋徽宗宣和年间已开始流行，到南宋时已很盛行。明祝允明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①。由宋入元后，正如“南人”受到压制和歧视一样，“南戏”也被当作“亡国之音”而遭受歧视。到了元朝后期，由于元朝在南方统治的削弱和杂剧的衰微，南戏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杂剧大都限于四折，每折限一宫调，又限一人唱，“其律至严，不容逾越”。南戏则比较自由和灵活，一本剧没有一定的出数，一出中不限于通押一韵，也不限于一个宫调的曲牌；登场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不必一人独唱到底，甚至二人互歌，或数人合唱，完全不受约束。同时，它的声腔也有了发展，“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②。到了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现存宋元南戏剧本完整的有十余本，剧本存目一百七十种左右，可见南戏在当时是相当繁荣的。著名的南戏剧作家高则诚的《琵琶记》在艺术结构上有突出的成就，但宣扬“全忠全孝”，充满理学的说教。被称为元代“四大传奇”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③，只有《拜月亭》有较浓厚的反对封建礼教和习惯势力的思想倾向。

散曲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是只曲，套数是小令联组而成的。小令和套数是词体的一种解放和发展，也是民歌和市民小唱的一种演进。小令主要是民间小曲，也有少数脱胎于诗词；套数则融合并发展了唐宋以来大曲、鼓子词、传踏、诸宫调和赚词的联缀方式。散曲每支都有个牌名，以代表其谱式，如

① 祝允明：《猥谈》。

② 魏良辅：《南词引正》。

③ 《荆钗记》的作者，据王国维考证为明朱权所作，详《宋元戏曲考》；《白兔记》的作者不详；《拜月亭》明代人认为是施惠所作，王国维表示怀疑；《杀狗记》的作者是徐岷。

《普天乐》、《天净沙》等皆是。每一曲牌又必须隶于其所属宫调之下,如刘致的《端正好》隶属正宫,马致远的《天净沙》隶属越调。所谓宫调,是指乐谱上曲调高低的分别。

由于散曲是市井产物,因此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形式简单,坦率真挚,清新活泼,为一般市民所喜爱。元芝庵《唱论》云:“街市小令,唱夹新情意”。正说明了散曲的本色。散曲所具有的广泛群众基础的特点,也成了劳动人民用来暴露社会现实、议论时事的好形式。如元末红巾起义爆发后,自京师至江南,街头巷尾流行着的《醉太平》小令就是。但是,像《醉太平》那样的以社会现实为内容的小令,流传至今的极少。现在能看到的元代散曲,多数是写男女恋情、风景描绘这一类内容。据《太和正音谱》卷上《古今群英乐府格势》里的不完全统计,留下姓名的散曲作家有一百八十七人。

在前期散曲作家中,除了关汉卿、马致远外,还有张养浩、卢挚、王和卿等人,其中张养浩的作品对现实颇有揭露,如《山坡羊·潼关怀古》、《一枝花·咏喜雨》皆是。后期的散曲家有刘致、张可久、乔吉等,其中刘致的作品,如《端正好·上高监司》,揭露了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张可久和乔吉虽负有盛名,但作品脱离现实,以描写封建文人闲情逸致的生活为主。

元代少数民族的散曲家人才辈出,见于记载的有蒙古人阿鲁威,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楡,畏兀儿人贯云石、全子仁、马九皋,回回人金元素、金文石、萨都刺、阿里西瑛、琐非复初、兰楚芳、赛景初、沐仲易、虎伯恭、丁野夫,等等。其中最最有成就的是贯云石。

贯云石(一二八六至一三二四年)原名小云石海涯,元初功臣阿里海涯之孙,以父贯只哥得姓,自号酸斋。他弃职归隐,笃志诗文,尤以散曲闻名,明杨朝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收贯云石作品甚多,他的散曲豪放明朗,“慷慨激昂”,“如天马脱羈”。贯云石还是南戏海盐腔的首创者,据姚桐寿《乐郊私语》,澉川杨梓与贯云石相善,云石“无论所制乐府散套,骏逸为当行之冠,即歌声高引,可彻云汉,而康惠(即杨梓)独得其传”。明王士禛《香祖笔记》卷

一：“今世俗所谓海盐腔，实发于贯酸斋，源流远矣。”可见贯云石对唱腔也颇有研究。

二 小说

由于元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不仅喜爱杂剧、南戏这类文艺生活，对说书也很欢迎。因而，在讲史、话本的基础上，元代的小说也有了发展。

元初产生的《大宋宣和遗事》是根据一部分说书人的话本“钞撮旧籍”而成的，其中也包含了不少民间故事。它用“讲史”的形式，从唐尧、虞舜开始，讲到南宋高宗，重点是徽宗一朝事迹。作者站在儒家“尊王攘夷”和“忠君爱国”的立场上，对北宋的灭亡和南宋的苟安表示忿懣，对王安石进行抨击。书中关于水浒的故事写得比较详细，已初具后来《水浒》的梗概，包括受招安、征方腊等。

水浒的故事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南宋时这个故事已经广泛流传。南宋画家李嵩就曾传写了水浒中的人物。据南宋罗烨《醉翁谈录》的记载，当时说书题目中，已有《石头孙立》、《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等故事。宋末元初的画家龚开专门作了《宋江三十六人赞》，他在序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①。《宣和遗事》又把这些内容综合在一起成书出版。在元杂剧中许多水浒戏就是据此和民间传说编纂而成，因而也为《水浒》在元末能够成书创造了条件。

《水浒》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虽然说法不一，但据明人高儒《百川书志》和郎瑛《七修类稿》等书及明代诸《水浒》版本，以及《水浒》书中使用的元代语言和地名来看，可以肯定成书年代在元末，施耐庵、罗贯中是《水浒》最早的作者，但明代又作了许多补充。

罗贯中的生平现在有比较确凿的材料。他大约生于一三〇〇年前后，死

^①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于一三八五年前后^①，名本，别号湖海散人，太原人^②。《录鬼簿续编》说他“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他的小说，据《西湖游览志余》称，有数十种之多，除《水浒》、《三国演义》外，尚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等。罗贯中还是个杂剧作家。

既然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等书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那么，尽管施耐庵的生平没有确切记载，但施耐庵的年龄比罗贯中稍大，同是生活在元末明初，是可以确定的。

估计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曾在杭州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杭州书会中写话本、编杂剧的文人，所以不少人都称他们是杭州人。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南方红巾军很快就占领了杭州，施耐庵、罗贯中与其他封建文人一样，纷纷逃离杭州，罗贯中一直奔波于各地。据说，施耐庵迁居兴化和淮安等地，施耐庵到兴化后在答顾逖的诗中写道：“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兴化别名）好住家。愿辟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③。据兴化地区的民间传说，施耐庵后来做过张士诚的幕僚，清人顾苓在《塔影园集》里说：“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所作《水浒传》题曰《忠义水浒》。”看来施、罗两人都与张士诚有过联系。

《水浒》这部书所描写的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故事，是经过了两三百年的民间流传，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智慧，在话本、杂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施耐庵等人的加工编写而成的。施耐庵等写作的本子，一般认为就是高儒《百川书志》中所说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个本子，如今已不得而见。现在流行的一百回本可能比较

① 罗贯中的生卒年说法不一。但《稗史汇编》说他与医学家葛可久（一三〇五至一三五三年）是同时代人；《录鬼簿续编》的作者自称与罗是“忘年交”，至正甲辰（一三六四年）曾复会，这时罗的年龄已是很大了，因此，罗贯中的生年大约在一三〇〇年左右，与葛可久差不多，至正甲辰时约六十多岁，与“忘年交”之说相合。罗贯中在元朝灭亡前已年近七十，这是比较可靠的。

② 罗贯中的籍贯有钱塘、东原、太原等说。今从《录鬼簿续编》作太原。

③ 丁正华：《关于施耐庵的传说》，《江海学刊》一九六一年第六期。

接近这个本子。从这个本子来看,《水浒》这部书既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的集体创作,又是施耐庵等人用自己的世界观进行加工的结果。

从施耐庵、罗贯中的生平活动来看,他们既是封建文人,又是因为对元朝统治不满而参加过农民起义队伍的知识分子,因而作品内容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它歌颂了梁山农民英雄的反抗斗争,描写了李逵、阮氏三兄弟、解珍、解宝等劳动人民出身的英雄好汉的斗争业绩,刻画了林冲、宋江等封建政府大小官吏被“逼上梁山”的经过,揭露了昏庸无能、纵容权奸的宋徽宗、以及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高俅、蔡京、梁中书等人的滔天罪行,鞭笞了祝朝奉、毛太公、西门庆那些土豪劣绅、恶霸地痞的种种丑行,因而这本书是封建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缩影,在这点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它又没能跳出封建正统思想束缚,认为农民造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灭九族的勾当”,通过宋江形象的塑造,肯定了接受招安的投降道路。

《水浒》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作者在塑造起义英雄形象时,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使人人有性格,个个有气质,特别是鲁智深、武松、李逵、阮氏三兄弟、林冲、吴用……等人尤其精雕细刻,使《水浒》的每个读者印象深刻、终生难忘。故事情节的安排也是扣人心弦,像智取生辰纲、野猪林、武松打虎、三打祝家庄等故事,永远是脍炙人口的。作者注意使用当时的口语、方言、民歌,使作品通俗易懂,使人物个性更加突出,更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因而更受到广大市民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欢迎。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主要描写了东汉灵帝中平元年(一八四年)到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二八〇年)将近一个世纪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复杂情况。早在唐宋时代,三国的故事已在民间流传,元至治年间刻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就是依据宋元民间艺人口头讲述整理出来的。元代的诸宫调和杂剧中也有不少是演唱三国故事的。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就是有选择地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以及平话和戏曲中的若干情节,加上自己的想象,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所谓“据

正史,采小说,证文辨,通好尚”,即是。

《三国演义》在思想意识上与正史及平话、戏曲中的封建意识是一致的。它大肆宣扬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观念及儒家的“仁政”和“忠义”;对黄巾农民起义加以贬斥;对刘备、诸葛亮等人“斡旋天地”的功绩加以渲染。

但是,《三国演义》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它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凶残奸诈、贪得无厌、损人利己的阶级本质;反映了人民群众在连年战乱下的悲惨生活。小说还介绍了许多重大军事、政治斗争的历史情况,特别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及诸葛亮南征北战等的描述都是很生动的。在艺术上,书中四百多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栩栩如生的形象,小说结构严密,层次清楚,语言流畅,在我国的历史小说中是具有特色的。

《水浒》和《三国演义》都有积极和消极的方面,一些农民起义领袖从中吸取斗争经验,特别是军事斗争的经验;封建统治者利用它来宣扬三纲五常、忠孝信义,以麻痹人民的斗志。所以,这些作品同时具有人民性和封建性的双重性质。

三 诗词和民歌

诗词

元代诗词,总的来说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后人评论说:“元诗尤繁富观,诸作者多宗温(庭筠)、李(商隐),间学长吉(李贺),其病为纤浓、为繁缛。”“元诗矫宋流弊,而失于多学晚唐,……然其佳者则婉转惆怅,附物切情,工整而流逸,清新而秀丽,虑周藻密而不涉于粗疏,意深韵远而不失之径直”^①。

元代早期的诗歌,北方作家如耶律楚材、刘秉忠、许衡等较淳朴;南方作家,方回宗江西诗派,戴表元力主变宋代静细清新句法。元初有些作家,如戴

^① 顾奎光:《元诗选序》,《元诗选》卷首。

表元、汪元量、刘因等人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怀念故国之情。

至元代中期,元诗进入繁盛时期。这种新局面的开创是与赵孟頫分不开的,“大德延祐间,松雪(赵孟頫之号)尔雅风流,实为倡始”^①。而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则号称“诗歌四大家”。他们的作品讲究典雅清丽,但内容多应酬和闲逸之作,较为空泛肤浅。这一时期回回人萨都刺的著作却使人耳目一新。萨都刺,字天锡,号直斋,定居雁门(今山西代县)。幼时因家境衰落,生活贫困,后虽中进士,但官职很低。他的诗有不少是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揭露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如《鬻女谣》,诗人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荒村白日逢野狐,破屋黄昏闻哨鬼”的悲惨景象,同时谴责“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阶级矛盾的现实。他的词有更高的艺术成就,人们熟悉的两首寄调《满江红》的词——《登石头城》和《金陵怀古》,是豪迈而带感慨,抒情而又写景的好作品。萨都刺的作品与当时文坛上流行的题画咏花、应酬赠答显得迥然不同。从诗词的艺术水平上看,萨都刺也有很高的成就。毛晋说:“其诗诸体俱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②。给予很高的评价。

元朝后期的诗坛则以杨维桢最著名,号铁崖体,张雨称其古乐府出入少陵、二李之间,他的七古歌行追求新异,竹枝词清新通俗。他的作品中有些是现实主义的,如反映盐民生活和揭露盐商奢侈生活的《盐商行》等。王冕的诗也带有现实主义色彩,如《江南妇》、《江南民》、《伤亭户》等,都是暴露元末社会矛盾和同情劳动人民的作品。祖先世居金山以西的葛逻禄(哈刺鲁)人迺贤,又称马易之,作品有《金台集》。他的诗中有不少是描写劳动人民苦况的作品,如《新乡媪》、《颍州老翁歌》、《新堤谣》、《卖盐妇》等。

民歌

元代的民间歌谣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这些歌谣数量多(流传至今的有一

① 陶瀚、陶玉禾:《元诗总论》,顾奎光《元诗选》卷首。

② 转引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回回教世家之中国诗人》。

百多首),如实地反映了元代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和社会矛盾的一个方面。

元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激烈,广大劳动人民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往往通过民歌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些无名的作者,以忿懑、仇视和充满对旧制度憎恨的感情来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统治者的暴行,以淳朴、真挚和富有战斗的词语来歌颂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以豪壮、坚定和充满信心的笔调来描绘未来的生活。劳动人民的这些优秀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元朝是通过长期的战争建立的。在战争中,劳动人民遭受的痛苦最深。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彰德路(今河南安阳)的一首民歌反映了人民群众颠沛流离、惨遭杀戮的景象:

苇生成旗,民皆流离。

苇生成枪,杀伐遭殃。^①

封建社会最根本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阶级的阶级矛盾。地主阶级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广大劳动人民则经岁劳累,生活十分悲惨。《水浒》中所引的一首民谣就是这种社会现象的写照: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社会不平是封建制度造成的,而贪官污吏往往是人民最直接的掠夺者和压迫者。因此,元代有许多民歌是讽刺贪官污吏的,其中有一首写道:

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

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②

原来按元朝惯例,廉访司官员巡视州县时用金鼓迎送,其音节是二声鼓一声

① 《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②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藪篇》。

锣；起解杀人盗，也用金鼓，其音节是一声鼓一声锣，都用锣鼓开道。由于官吏“赃污狼藉”，在老百姓看来官与盗贼都是一路货。

由于元朝封建统治的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到了元朝末年，人民群众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封建压迫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即将爆发。当时这种大起义前夜的状况，在民歌中也得到了反映。浙江温台地区流行着一首民谣：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①

民谣也是农民起义军用来动员群众的宣传工具。众所周知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就是韩山童、刘福通等农民领袖在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大起义爆发前散布的童谣。同年徐州芝麻李等响应起义，也散布“挖了石佛眼，当时木子反”^②的歌谣。

大起义爆发后，人民群众又通过歌谣来表达他们对起义军的热爱。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年）松江（今上海松江）流行的一首歌谣，极其形象地描绘了起义军（尽管这支起义军不是红巾军）占领松江时人民群众的那种欢欣鼓舞的心情：

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
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③

这首歌谣爱憎分明。面对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平时作威作福、鱼肉人民的府官，吓得魂不附体，抱头乱窜，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城来，在昔日封建衙门里重建起自己的政权。这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元代民间歌谣还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未来憧憬的展望。前引流行于大江南北的《扶箕诗》就是农民阶级渴望“太平世界”的强烈表露。为了实现这种“太

① 黄溥：《闲中古今录》。

②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③ 陶宗仪：《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

平世界”的愿望,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朱衣人”——红巾军的身上。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年)彰德路流行一首童谣:

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

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①

至正二十八年是朱元璋统一了南方各支割据势力开始北伐的第二年,虽然朱元璋已经不奉“龙凤”为正朔,建立了明朝,但是深受北方红巾军熏陶的中原人民,还是把他们当作韩林儿、刘福通的继承人,期待着他们早日成为国家的“主人公”。同时,歌谣也反映了中原人民渴望摆脱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

四 书画

元代没有画院的设置,因此元代的名画家,很多是士人,不是专业的画家。这些画家由于遭受民族压迫,往往采取隐居山林、不问政治等消极态度,以艺术来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就使元代的绘画艺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摆脱了南宋画院末流的形式主义习气,逐渐形成了挥洒淋漓的写意派。

写意,这是元代绘画艺术的创作倾向。许多画家通过他们的作品来抒写自己那种孤傲清高的思想,例如以竹子的直伸不屈比喻气节,以莲花的出污泥而不染比喻君子等等。所以,不论是花鸟画,还是山水画,写意之风很盛。与写意要求相适应的是,追求笔墨情趣和诗、书、画相结合的风气日益流行。开一代风气的大画家赵孟頫就主张“不求形似”^②。元末倪瓒在他题自画墨竹中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③又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④这种

① 《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② 汤垕:《画鉴》引赵孟頫《〈人马图〉跋》。

③ 倪瓒:《跋画竹》,《清閟阁全集》卷九。

④ 倪瓒:《答张藻仲书》,《清閟阁全集》卷一〇。

为了要写胸中的逸气而不求形似的风格,正是元代绘画的特征。

赵孟頫(一二五四至一三二二年)是元初著名的画家,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他在绘画和书法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元人称:“孟頫以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①。作画主张“贵存古意”,提倡人物画要继承唐人技法,山水画要学五代董源、巨然的风貌精神,并以书法笔调写竹,用“飞白”法画石,自成清腴华润的新风格。“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②。他的书法用笔圆转流美,骨力秀劲,世称“赵体”。“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③。他的书、画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传世作品也较多,如《三马图》、《松水盟鸥图》等。赵孟頫是宋宗室,在元朝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追封魏国公。

回回人高克恭(一二四八至一三一〇年),字彦敬,号房山,居大都,官至刑部尚书,喜画山水、墨竹,是元代负有盛名的国画家。他学画“始师二米(米芾、米友仁),后学董源、李成,墨竹学黄华,大有思致。怪石喷浪,滩头水口,烘琐泼染,作者鲜及”^④。时人将他与赵孟頫相比拟,曾有“近代丹青谁最豪,南有赵魏北有高。”^⑤以及“国朝名笔谁第一,尚书醉后妙无敌”;“赵公自是真天人,独与尚书情最亲”^⑥等句。作品有《云横秀岭》、《墨竹坡石》等。

在赵孟頫、高克恭之后,有著名的“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和王蒙。他们都是元代最著名的山水画家。

黄公望(一二六九至一三五四年),字子久,号大痴,又号一峰道人,常熟(今江苏常熟)人。由于他长期遨游四方,寄情于山水之间,因而山水画有极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七,《赵魏公书画》。

② 《元史》卷一七二,《赵孟頫传》。

③ 同上。

④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五。

⑤ 张羽:《临房山小幅感而作》,《静居集》卷三。

⑥ 虞集:《题高彦敬尚书、赵子昂承旨共画一轴》,《道园学古录》卷二。

高的造诣。陶宗仪说他“画山水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①。其画设色者以浅绛居多，笔势雄伟；水墨画尤为苍茫简远。传世的《富春山居图》、《九峰雪霁图》等是黄公望山水画的杰作，又作《写山水诀》，总结五代董源、巨然以来画山水的经验。

吴镇（一二八〇至一三五四年），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善画山水竹木，笔力劲爽，墨气淋漓，风格近似倪瓒，但他能写出山川林木峥嵘郁茂的景气，又具自己的特点。

倪瓒（一三〇一至一三七四年），字元镇，号云林等，无锡（今江苏无锡）人。他的绘画风格是元代画家中最具特点的，以水墨居多，简淡幽雅为主，画的大都是平远山林、枯木竹石，笔墨十分简练，流露出一种萧肃之感。他的画上常常有很长的题跋，加强了绘画的效果。

王蒙（？至一三八五年），字叔明，号香光居士，湖州（今浙江吴兴）人，赵孟頫之甥。他的山水画，融合各家之法，而独创一格，取景多山重水复，屋宇、人物点缀得宜，曲尽幽深之致。

赵孟頫、高克恭和“元四家”的绘画艺术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人张丑说：“品画以元人为最，而元人中尤以子昂、子久、叔明为得其神，如彦敬、仲圭、元镇辈，……其画落笔精致，布景超妙，设色古雅，洪锁活泼，殆未有过”^②。对元人的画给予很高的评价。

此外，元代著名的书画家还有：兼长人物画和花鸟画的钱选，兼长人物画和鞍马画的任仁发，善画肖像画的王绎，长于画竹的李衍、柯九思，长于画梅竹的王冕等。王冕著有《梅谱》一卷，总结了前人和他自己画梅的经验。书法家鲜于枢，工正、行、草书，善悬腕作书，笔力劲健，与赵孟頫齐名。

元代少数民族出身的书画家，除了高克恭外，北庭人边鲁，畏兀儿人的颜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八，《写山水诀》。

② 张丑：《清河书画舫》，绿字号第十一，元二。

不花、回回人丁野夫以及萨都刺等也都是当时有名的画家。少数民族的书法家则首推康里人巛巛。他的父亲不忽木十分崇儒,对词曲也有修养。巛巛“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①。所谓“北巛南赵”是对他的书法极高的评价。其他有名的书法家还很多,如贯云石、赛景初、翰玉伦徒、边鲁、沙刺班、龟兹人盛熙明、回回人瞻思等等,其中盛熙明还著有《书法考》八卷。

元代壁画的艺术成就也是非常杰出的。现在除了敦煌安西榆林窟保存有元代壁画外,北方许多古寺古庙里还有不少遗迹。例如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内的元代壁画,十分生动地描绘了元代杂剧演出的情况。解放后新发现的山西永济县永乐宫的壁画,在我国古代绘画史的发展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永乐宫是一组元代道观建筑,这里的壁画十分丰富,从风格上看可分为两类:龙虎殿和三清殿的壁画风格近似,用富于装饰性的重彩勾填画法,绘出身高二米以上的《朝元图》群像;纯阳殿和重阳殿的壁画为另一种类型,是描写富于生活气息的连环故事画。

三清殿《朝元图》是一套朝谒道教最高尊神元始天尊的壁画。全部构图共计人物形象二百八十六个,数量众多,面型变化丰富,造型饱满,表情生动。每一像高达二米以上。构图上寓复杂于单纯,寓变化于统一,寓动于静。在形象的创造和构图的设计上都达到了绘画艺术技巧的高度卓越的水平。至于色彩的丰富而沉着,绚烂而协调,勾线劲紧有力而又宛转自如,流动飘荡而又严谨含蓄,技法的运用臻于极为精湛成熟的地步。这一雄伟的作品,可称是中国和世界绘画史上罕见的巨制。

唐宋时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武宗元的壁画传统,到了元代主要由民间艺人继承下来,因此,《朝元图》是唐宋绘画艺术,特别是壁画艺术的直接继承的产

^① 《元史》卷一四三,《巛巛传》。

物,也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文化、创造历史的有力见证。

第二节 史学

一 辽、金、宋三史的纂修

辽、金、宋三史是二十四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在元朝时完成的。

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一二六一年),王鹗就曾请修辽、金二史,世祖即令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后又诏史天泽监修。南宋亡后,又令史臣通修三史。元仁宗延祐年间也曾诏修三史。但终因义例未定,一直未能定稿完成。

到元顺帝至正三年(一三四三年),中书右丞相脱脱推行“更化”政策时,出于宣扬“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兴”^①的目的,又决定设局修史。以脱脱为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即太平)、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其中揭傒斯先死,未任《宋史》总裁官)。于至正三年四月同时开始修撰,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三史共七百四十七卷,以二年半的时间迅速完成,三史各有所本是重要原因。

《辽史》所据,主要是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耶律俨于乾统三年(一一〇三年)奉诏纂修太祖以来诸帝《实录》,书成,凡七十卷。辽朝建国以来即有修史传统,各朝大多修有《实录》,耶律俨总其成,故赵翼称“当辽之世,国史唯此本号为完善”^②。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党怀英、

① 《修三史诏》,《辽史》(中华书局点校本)附录。

② 《廿二史札记》卷二七,《辽史》。

郝俣等奉命修《辽史》，未完成，由陈大任续修，泰和七年（一二〇七年）书成。陈大任《辽史》是金代第二本《辽史》，第一本《辽史》是皇统八年（一一四七年）萧永祺继耶律固之后修成的。显然萧永祺本是陈大任本的重要依据。而至正所修《辽史》是在上述各种《辽史》稿本的基础上加工汇总而成的，上述各本的精粹在至正本《辽史》中得到了保存。

《金史》的史料基础最好。金人人主中原后，各朝均有《实录》，韩昉、耶律绍文等还修过《国史》。金亡后，《实录》为蒙古万户张柔所得，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阻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搆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纪录，至百余万言”^①。元好问此《野史》即《壬辰杂编》，为《金史》主要史料之一；又有刘祁《归潜志》载金末史事甚详，亦为《金史》主要史料之一。张柔所得《实录》于中统二年（一二六一年）归史馆，后来王鹗据此修成《金史》，即所谓“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②。王鹗《金史》稿，王恽《玉堂嘉话》中存有简目，今已佚。至正年间修《金史》时上述史书俱在，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称：“金一代典制修明，图籍亦备。又有元好问、刘祁诸人私相缀辑，故是书有所依据，较《辽史》为详赅。承修者明于史裁，体例亦为严整”^③。

《宋史》的史料更加丰富。由于宋代文人学士远较辽金二代为多，著述极富，实录、会要、编年著作、典章奏议、地理方志、野史笔记、文集等等，无不应有尽有，仅袁楠所举搜访书目就达一百四五十种之多^④。由于史料极富，故《宋史》多达四百九十六卷，卷帙浩繁，为二十四史之冠。赵翼批评“宋史繁芜”，正说明《宋史》保存的史料和资料最多，在许多史书失传的情况下，它就显得

① 《金史》卷一二六，《元好问传》。

② 《进金史表》，《金史》附录。

③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五，《史部》一，《正史类》。

④ 袁楠：《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清容居士集》卷四一。

更有史料价值了。

辽、金、宋三史是各族史家共同劳动的结晶。都总裁官脱脱虽然没有亲自写史,但他为组织写作班子、解决写史经费,尤其是确定三史各为正统的原则上,起了很大作用。元朝建立后,三史之所以迟迟未能修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辽、金、宋三朝谁是“正统”的问题一直争论未决。有的主张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史;有的主张以宋为世纪,辽、金作载记;又有人主张宋、金都不是正统。在这种争论不休的情况下,“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①。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统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三史的具体实际工作,以汉族士大夫欧阳玄出力最多,他从选择史官、汇集史料,到制立三史凡例,亲撰论、赞、表、奏等,贡献极大。其他如康里人铁木儿塔识,担任三史总裁官,对此“多所协赞”;修史官中还有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刺班(汉名刘伯温);哈喇鲁人伯颜;唐兀人斡玉伦徒、余阙;蒙古人泰不华等等。在二十四史中有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史家参加修史,这是仅见的。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分纪、志、表、传,但纪、志、表却各有自己的特色。例如,《辽史》有《营卫志》为各史所无,其中保存了契丹早期的户籍、兵籍、土地制度、部族组织等史料;《辽史》又有《部族表》,将与辽发生关系的周边各族按年月列入大事年表中,读来使人一目了然,“又省却了多少外国等传”^②,这是二十四史中的一个创举;《金史》的《本纪》第一卷为《世纪》,记金太祖以前先世,第十九卷为《世纪补》,记追尊诸帝,这种形式也很特殊。如果将辽、金二史全部并入宋史,“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那么上

^① 权衡:《庚申外史》。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七,《辽史立表最善》。

述各纪、志、表中的珍贵史料将不复存在，辽金史事大半将被湮没。如今独立修史，不仅保存了各志表中的史料，也使纪传中的重要史事有充分的篇幅加以丰富，使与各朝有关的同一历史事件至少在三史中的两部史书中得到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辽、金二史各附有《国语解》一卷，这在二十四史中也是特有的。由于契丹、女真两族各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二史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名称，如不加语解，即使是当时的大多数人也是无法读通的。随着契丹、女真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他们的语言文字渐渐为人们所不知，这样，《国语解》又成了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珍贵资料。

三史虽然在史料汇集、编纂方法上有许多特点和优点，但由于三史撰修的目的是出于巩固封建统治，因而，书中充满着封建迷信和儒家天命思想，作者往往用道学的标准来评判历史的是非功过。在编纂方法、史料取舍上，也由于时间仓促和校核不精，出现了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传闻之误等问题。他们还将不利于他们的史料大量删除，因此我们在《金史》中就很少看到早期蒙古与金朝关系的材料。同时，也不准史官利用秘府中关于蒙古初年的史书和档案，以免成吉思汗及其以后的几个大汗的“非可令外传”的史实被人们知晓。

二 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

胡三省和马端临是元朝前期的两位大史学家，他们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注》和《文献通考》，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胡三省（一二三〇至一三〇二年），字身之，天台（今属浙江）人。在他五十岁那年，宋亡于元，从此他坚决不仕，隐居山中。他怀着对南宋政治腐败和民族败类极其痛恨的心情，怀着对异族残酷统治的强烈不

满,以数十年的精力,完成了对我国著名的编年史——《资治通鉴》的注释。

胡三省对《通鉴》的研究可说是花了毕生的精力。从宝祐丙辰(一二五六年)开始,“大肆其力于是书”,以《资治通鉴音义》、《释文》各本乖异,刊正为《广注》九十七卷,著《论》十卷。临安失陷后,该书遗失。就在他隐居期间,“复购得他本为之诠,始以考异及所诠者散入《通鉴》各文之下;历法、天文则随目录所书而附注焉。迄乙酉(一二八五年)冬,乃克彻编。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同异,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释文》之舛谬,悉改而正之,著《辨误》十二卷”^①。胡三省的治学精神十分严谨,宋亡以前,他“游宦远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②。宋亡以后,在前稿遗失、图书难得的情况下,他继续顽强地工作;完稿后,他又精心修改,直至临终之前。

更加可贵的是,胡三省在他的《注》中充满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他或者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故国的哀痛,或者隐晦曲折、借古讽今地抨击元朝封建统治。例如,对于造成“误国”的襄阳失守,胡三省曾三次提及,心情极其悲痛。《通鉴》卷一百四十六:梁武帝天监六年(五〇七年)二月,“命豫州刺史韦叡将兵救钟离,……旬日至邵阳。……魏师复来攻城,飞矢雨集,叡子黯请下城以避箭,叡不许;军中惊,叡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胡三省注曰:

此确斗也。两军营垒相逼,旦暮接战,勇而无刚者不能支久,韦叡于此,是难能也。比年襄阳之守,使诸将连营而前,如韦叡之略,城犹可全,不至误国矣。呜呼,痛哉!

又如,对于元朝统治者压迫、控制人民的种种禁令,胡三省极为不满,他以要求

^①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古籍出版社《资治通鉴》。

^② 同上。

“舒展四体”的隐晦语言来表示强烈的反抗。《通鉴》卷二百四十：唐宪宗元和四年（八〇九年），“先是吴少阳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然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余皆不问。蔡人始知有生人之乐。”胡三省注曰：

解人之束缚，使得舒展四体，长欠大伸，岂不快哉！

胡三省通过他的史学著作，表达了他的爱国主义热忱和对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这些带有人民性的进步史学思想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三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元代另一位进步史学家马端临（一二五四至一三二三年），字贵与，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他是南宋右相马廷鸾之子。宋亡后隐居不仕，花了二十年功夫著成了一部有三百四十八卷的中国典章制度史的专著——《文献通考》。

唐代史学家杜佑的《通典》是最早的有系统、有门类、专载历代典章制度的一部史书，但是它的门类分得太宽，而且只写到唐代天宝年间为止。马端临的《通考》则是《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通考》共分为二十四门，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祀、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輿地、四裔。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五门为《通典》所未有；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了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一二一二年），作了续修。关于史料的舍取，马端临是花了一番功夫的。“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读覃思，悠然有得，则窃

著己意,附其后焉”^①。所以,这部巨著以它丰富的史料和完整的体系,为我们今天研究宋以前的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治史的方法论上,马端临较之前代学者有很大的进步。他不仅在史料的取舍上,十分严肃地加以甄择,而且并不停留在这一步,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所谓“研读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其次,马端临还特别注意历史变革的阶段。他在《自序》中认为,历代典章制度“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在掌握了它演变原因的基础上,马端临提出了自己对变革的各阶段的见解。例如在论及田赋的变革时,马端临说:“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②。这是把商鞅变法和杨炎变法作为田赋制度变革的历史标志。正由于马端临治史的方法论很多地方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因而他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

马端临和胡三省由于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成为最受歧视的“南人”。他们的民族气节促使他们与元朝统治者抱着对抗的态度,因而在他们的作品里反映了一定的人民性。马端临在《通考》中常常通过历史的叙述和自己的议论来抨击封建政权和对人民的同情。

对于腐败的封建统治,马端临在《通考》中从各个方面加以揭露和抨击。他在评论宋熙宁年间的保甲制时指出:

今熙宁之保甲,则无益而有害。言其无益者,则曰田亩之民不习战斗,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则曰贪污之吏并缘渔猎,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谙者,可以教练而能。而吏之为奸者,则虽加之禁戢而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

② 同上。

不能止。^①

他又说：

礼义消亡，贪饕成俗。为吏者以狐兔视其民，睥睨朵颐，惟恐堕阱之不早。为民者以寇戎视其吏，潜形匿影，日虞怀璧之为殃。上下狙伺，巧相计度。^②

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吏为奸、官民对立等社会现象，马端临是看得很清楚的，而且他对被压迫的人民寄予同情，他富有感慨地说：“百姓如之何而不困？”^③作为封建时代的史学家马端临能有如此进步的史学思想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三节 哲学思想

一 理学的继承和传播

当蒙古在漠北崛起的时候，金和南宋正处于对峙时期。当时，“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南宋的理学著作在北方流传不多。金末的儒学，只讲些经学章句，显得支离繁琐，处于衰敝之中。蒙古军队南下后，北方儒士纷纷投奔蒙古，从耶律楚材到杨惟中、姚枢、窦默等人，都充当了蒙古大汗的幕僚、谋士，虽然他们提不出什么新的理论，但儒家思想不免也对蒙古统治者带来了影响，尤其在灭金和灭南宋过程中，他们对于保护汉族知识分子和文化典籍，还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理学在北方开始传播是比较晚的。金末时，南方的一些理学著作已传到

① 《文献通考》卷一五三，《兵考》五。

② 《文献通考》卷一三，《职役》二。

③ 《文献通考》卷一九，《征榷》六。

北方,但对这些著作进行讲授那是元太宗七年(一二三五年)赵复被俘到燕(今北京)后的事。所以郝经说:“尔靖康之乱,吾道(指理学)遂南矣。自伊洛入于江汉,自江汉入于闽越。……于是近岁以来,吴楚巴蜀之儒与其书,浸淫而北,至于秦雍,复入于伊洛,泛入三晋、齐鲁,遂主燕云、辽海之间。……其倡明指示,心传口授,则自先生(赵复)始”^①。

理学,始于北宋周敦颐,中经二程(程颢、程颐),集成于南宋的朱熹。他们把反映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规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经地义,即所谓天理。而这个天理,体现在圣人身上,由尧舜至孔孟,直到宋代的二程朱熹,形成一个所谓圣传的道统。所以理学又称道学。在理学家看来,这个天理,即使山河塌陷,它也是永恒存在、永恒不变的。这样,就使三纲五常上升到世界本体的高度,获得了哲学的意义。这在儒家的理论思维上,形成了一套比汉唐儒学更加成熟的唯心主义体系。而作为社会的人,通过朱熹的“格物穷理”也好,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也好,只是方法不同,所要体验和获得的天理,也仍然是现实的三纲五常。显然,所谓天理,只不过是理论化、哲学化了的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而已。所以,理学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所以“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②。

蒙古占领北方后,正经历着一个上层建筑逐步适应经济基础的过程,蒙古贵族正在逐步领会“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③的道理。太宗七年,蒙古军队占领德安(今湖北安陆),江汉先生赵复被俘,杨惟中、姚枢等把他从俘虏中挑出,请到燕京,建太极书院,请他讲授其中。赵复以其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选取遗书八千余卷,又著《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

① 郝经:《与江汉先生论性书》,《陵川集》卷三〇。

② 《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

③ 郝经:《与宋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七。

图》、《希贤录》等书,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作全面介绍。姚枢、杨惟中等从其学,许衡、郝经、刘因等也因读了这些书而尊信理学的。忽必烈曾在“潜邸”召见过赵复,他对理学在北方开始传播显然是支持的。

金主迁蔡后逃到德安的金朝儒生窦默,在孝感(今湖北孝感)随谢宪子学伊、洛性理之书。后被杨惟中招集北归,在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于是名声大噪。忽必烈亲自召见,窦默大谈三纲五常,忽必烈大喜,“一日凡三召与语”^①,命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他和赵复一样,是在北方传布理学的最早的学者。

南方的理学家都是朱熹、陆九渊的直接继承者。元朝灭亡南宋前后,南方的朱学人物以吴澄、许谦、张翥等为代表,陆学人物以陈苑、赵偕、郑玉等为代表。这样,到全国统一时,理学之士已是“指不胜数,皆彬彬郁郁矣”^②。

在元代的这些理学家中,其政治态度与理学的特点又不完全一致。许衡、郝经、窦默等人是积极用世,身显廊庙,在理学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奥。刘因、吴澄、许谦等人,是高蹈不仕,闭门冥索,其理学也就趋于幽玄,走的是所谓“上达”一路。而陆学人物更是屏迹山野,玩性理、索诸天,其势力虽不及朱学,但他们终生不改陆学“自识本心”的宗旨。

在这些理学家当中,又以许衡、刘因、吴澄为最有影响的人物,称为元代三大“学者”,而许衡、刘因又是“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③。

许衡(一二〇九至一二八一年),字仲平,称“鲁斋先生”,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官至左丞、国子祭酒,身名显赫,他的许多弟子“致位卿相,为一代名臣”^④。他热心事功,重视朱熹《小学》、《四书》,主张“践履”于时,积极向忽必

① 《元史》卷一五八,《窦默传》。

② 《宋元学案》卷九〇,《鲁斋学案》。

③ 《宋元学案》卷九〇,《静修学案》。

④ 欧阳玄:《许文正公神道碑》,《许文正公遗书》卷末。

烈陈《时务五事》，推行汉法，与刘秉忠、张文谦，在元朝开国之际，立朝仪、定官制。在他看来，应当是“运用天理，而见诸行事”^①，反对把理学变成“高远难行之理”^②。所以许衡的理学虽然无“发明”，但他对理学的普及与推行，对蒙古的封建化，对维护元代的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故其死后谥“文正”，从祀孔庙，殊受隆誉。

刘因，一名驹（一二四七至一二九三年），字梦吉，容城（今河北徐水旧容城）人。年长，因慕诸葛亮“静以修身”一语，遂自号“静修”。他父祖本金朝人，但他生于金已亡国十三年之后，仍自视为亡金的遗血，除一次短暂的应召之外，是“遗世独往”^③，以授徒终生，不肯仕元，谓“不如此，则道不尊”^④，视蒙古统治下的元朝，仅有毡酪之风，不可以行儒道。故在理学上，坐禅冥索，有庄子“齐物”反观和邵雍“观物”内省的思想成分。

吴澄（一二四九至一三三三年），字幼清，学称“草庐”，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在元初曾应召为国子司业等师儒教监，但旋进旋退，以授徒、著述终生。他本由南宋入元，成学于南宋，直承朱熹的理学统绪^⑤。但他并不严守朱学门户，谓“本心之发见”，即可获得“天理之当然”，杂入陆学“明心”的方法。他是“和会朱陆”而“右陆”，以致有“宗陆背朱”之嫌，在当时，即有“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⑥。吴澄与熊良辅、汪克宽、赵沅等，亦为元代的经学大家。

由于许衡、吴澄这些理学家，对南宋理学，或“承流宣化”，奔走汗庭，或矜谈妙语，潜思冥索，使理学由南而北，遍及全国，以至到延祐年间，朱熹的《四

① 许约：《告从祀文》，《许文正公遗书》卷末。

② 许衡：《中庸直解》，《许文正公遗书》卷五。

③ 欧阳玄：《静修先生画像赞》，《元文类》卷一八。

④ 《辍耕录》卷二，《征聘》。

⑤ 吴澄为饶鲁的门生，而饶受学于朱熹及其门生黄榦。

⑥ 《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

书集注》被定为科场程式，“非斯言也，罢而黜之”^①。谓孔子是“仪范百王，师表万世”^②，被追崇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而许衡这些理学之士，或者在元朝政府中，备列顾问，“国有大政，辄以访之”^③；或者蛰居山林，授徒著述，尊为贤学之士。从此以后，以朱学为主的理学，成为明、清的官学，成为统治阶级的正宗思想。而元人修的《宋史》，在正史中首开《道学传》，其所定的理学宗旨和人物，又成为明清的理学规范，影响很大。

二 元代理学的特点

元代的理学家，虽然各自的情况不同，但基本上没有离开在宋代已经形成的理学原则，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元代是重弹了宋代理学的老调。

但是，元代的社会情况究竟不同于宋代，因此元代的理学也自有一些特色。

首先，理学从南宋发展到元代，已由朱、陆之争，逐渐趋于朱、陆“和会”。本来，朱、陆就如何获得天理的方法开展过争论，南宋的吕祖谦在朱、陆“鹅湖之会”的时候，调和不成，接着又发生“无极而太极”之争。但随着朱、陆两家牛毛汗细的争论下去，在一些理学家看来，各自的利弊尽已暴露，所谓朱的格物穷理，虽称“支离”繁烦，使人“颓惰萎靡”，但有“笃实”、“邃密”之功；陆的直求本心，虽称“谈空说妙”，无“致知之功”，但有“简易”直截之效^④。

元代朱学系统的人物，为了更好地推行理学，遂就简避繁，纷纷兼取陆学直识本心的“简易”的方法。如标宗朱学的许衡，他自问自答地说：“人与天地同，是基底同？……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⑤。这里所谓“天地”，是

① 《通制条格》卷六，《传习差误》。

② 阎复：《加封孔子制》，《元文类》卷一一。

③ 《宋史》卷四二七，《道学传》。

④ 郑玉：《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师山集》卷三。

⑤ 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三。

指宇宙本体,亦即天理。则“心与天地一般”,即人心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广大”^①,故“心之所存者理也”^②。这就是陆象山说的天理就在心中,心具天理。所以许衡求天理的方法,就在于尽心,能“尽心,是知至也”^③,故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④。这样说来,天理在心中,直求本心即得天理,不需要朱熹说的先通过心外格物的途径。许衡也讲朱熹的“格物致知”,但他把知行二者并列,谓“凡之所以不力,只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⑤,意即能真知,即可力行;而行之所以不力,不是如朱熹说的是因为未“痛下工夫”,而是因为知之不真。这种混淆知行,以知代行,实际上是陆学,尤其是后来明代王学的知行合一论。

又如师承朱学的吴澄,他虽然提出人性善恶的形成,是由于人们的气质不同,而接近朱熹的看法。但是,就如何去恶从善,恢复天地之性,也就是如何获得天理的问题上,他并没有沿着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而是直接从自身去发现善端,扩充善端。他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当用功其性,以养其性,能认得四端之发见谓之知,随其所发见,保护持守……”。并以教训的口吻说,“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也”^⑥。这就是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说的,“天之所以与我,己所因有,不待外求”^⑦的意思。这种所谓“得吾之性”,“就身上实学”,是吸取程颢的“识仁”到陆象山的自识本心的方法。吴澄就把陆学自识本心的方法概括为“自新”^⑧。而且,吴澄还把这种直觉的方法,说成是孔孟以来“先立乎其大”的“传心之印”,编造

① 许衡:《中庸直解》,《许文正公遗书》卷五。

② 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二。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许衡:《语录》上,《许文正公遗书》卷一。

⑥ 吴澄:《答人问性理》,《吴文正公遗书》卷二。

⑦ 《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⑧ 吴澄:《杂识》五,《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外集》卷二。

所谓从尧舜,中经孔孟,直到宋代的理学诸子,都是“莫不皆然……,明指本心以教人”^①,以至他主张要以陆象山的“尊德性”为主,点名批评朱熹格物穷理的“道问学”,是“偏于言语训释之末”^②的烦琐。所以,当时人“以草庐(吴澄)为陆氏之学”,不是没有根据的。

又如刘因,虽从南儒赵复受朱学,但他倡主静、不动心,自求于己,谓“天生此一世,而一世事固能办也,盖亦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也”^③。并举哪里有毒,哪里必有药治,以说明获得天理的方法是“无待于外”。他的“齐物”反观和“观物”内省,更是他通向陆学的哲学观点。

陆学的人物在元代,虽然受到压抑,其势不如朱学,但他们在坚持陆学自求本心的同时,也吸取朱学的一些内容。如由宋入元的陆学人物郑玉,大谈所谓“即气以明理”,“即理以明气”,和所谓“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哉”^④。这是吸取朱熹理气之对待的观点。他是继吴澄之后的又一个和会朱陆的学者。另一陆学人物史蒙卿,入元不仕,《宋元学案》说他在理学上由陆入朱,其实他不过是以陆学兼取朱学,并未离开陆学宗旨。他说,“学问之进行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即陆象山说的“先立乎其大”),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反身”^⑤,明显的是调和朱陆而主以陆。过去朱熹讲格物三事,其中一项就是读古圣贤书,而陆学,如陈淳所指责的,是“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工夫……,其或读书,却读语、孟精义”^⑥,六经不屑一顾,反谓“六经注我”。而元代的陆学人物陈苑的弟子李存,虽坚持“反察内观”和“格者,格自己”的陆学方法^⑦,但他读书尊经,谓“非学则不能以自明,而学之不绝如线者,

① 吴澄:《杂识》五,《草庐吴文正公全集》,《外集》卷二。

② 《元史》卷一七一,《吴澄传》。

③ 刘因:《读药书漫记二条》,《静修集》卷二一。

④ 《宋元学案》卷九四,《师山学案》。

⑤ 《宋元学案》卷八七,《静清学案》。

⑥ 《宋元学案》卷七四,《慈湖学案》。

⑦ 李存:《格斋铭》、《德义堂铭》,《仲公集》卷二〇。

赖遗经存焉耳”^①。郑玉更谓“外六经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谓道”^②，已非陆象山的所谓“六经注我”，而是朱学的所谓道从经出，吸取朱学“笃实”的工夫，避免陆学在过去“专做打坐工夫”。

当然，在元代朱、陆之间互相兼取，当不止以上这些人物，如还有与许衡并称为“二许”的许谦（白云），谓“此心即有此理”、“心者理之所存”，故“格物之理，所以推致我之心知”^③。柳贯谓读经为本外，要“翼之以周、程、张、邵、朱、陆儒先之说”^④。虞集谓“为学莫近焉，于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于他求矣”^⑤，故当“求诸其心，反诸其身”^⑥。虞集、袁桷更辑集朱熹书牋，谓朱熹中年之后，已觉“支离”泛滥，悟及“切己反求”方法之妙，而责怪朱、陆后学“党异说兴”^⑦，不识朱、陆本无区别。此说实为后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蓝本。因此，在元代朱学虽定为“国是”^⑧，朱、陆之间，虽然也还有一些人墨守师说，但大多数是互相兼取、和会，几成一时风气。这比起南宋更加明显。

但是，这种“和会”，并非是随意的游龙走蛇。朱学方面吸取陆学直求本心和知行合一，陆学方面是吸取朱学理气、理欲及“笃实”的工夫。这种“和会”的趋向，正是后来明代王学的先声。王学固可以说是接步陆学，可是陆、王并不完全一样，王学讲陆学“本心”，但也讲朱学理气、理欲的思想。王学这种混淆朱、陆的做法，其实在陆、王之间的元代理学已开其端。所以元代的理学，实为宋到明之间的过渡环节。

① 李存：《与陈苑二信之一》，《仲公集》卷二八。

② 郑玉：《余力藁序》，《师山集》卷首。

③ 许谦：《读四书丛说》，《中庸》上。

④ 柳贯：《答临川危太朴手书》，《柳待制文集》卷一三。

⑤ 虞集：《抚州路乐安县重修儒学记》，《道园学古录》卷三五。

⑥ 虞集：《可庭记》，《道园学古录》卷八。

⑦ 虞集：《跋朱先生答陆先生书》，《道园学古录》卷四〇。

⑧ 虞集：《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道园学古录》卷三九。

第二,在元代,也有一些理学家,在政治上主张用世,践履于时,因而在理学上有可能提出一些进步的思想;虽然这种思想并不是他们的理学主流。例如,许衡作为一位理学家,曾对理学作了许多新的解释,使理学的理、道,含有“日用常行”之则。他在谈到道作为标准、极则的时候,引喻设譬,认为道不是高远难行的东西,如果道是“高远难行之事,则便不是道了”,它应当是“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道不远于人”^①。他批评有些人“深求隐僻之理”,“要知人之所不能知”、“行人之所不能行”,实是“欺世盗名”,而“圣人岂肯为此事哉”^②。还讥笑那些专事言辞而于事无补的理学家,“道尧、舜、周、孔、曾、孟之言,如出其口,由之以责其实,则霄壤矣”,他们只能在“纸上摆布成文”^③。

在他看来,道不是“高远难行”,应当接近“众人”,所以他把“民生日用”的“盐米细事”视为道和义。他说:“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道也,只是一般”^④,这就把具有“贵人气象”的理学,稍稍地向下拉到只是一般的“日用常行”之道。虽然许衡并不反对理学的本身,仍然强调“君臣父子”,但他注入民生的“盐米细事”,就使过去空谈心性的理学有了一点实际。

因此,许衡所谓“践履”,虽然是伦理纲常的推行和实践,但也包括民生日用,重视吃饭穿衣的“生理”,进而提出有名的“治生”论。据郑士范作的许衡《年谱》载:“(许衡)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⑤。许衡以满足人的“生理”即物质生活前提来谈“治生”,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欲”的思想

① 许衡:《中庸直解》,《许文正公遗书》卷五。

② 同上。

③ 许衡:《语录》上,《许文正公遗书》卷一。

④ 同上。

⑤ 郑士范:《许鲁斋先生年谱》。

不尽一致。朱熹说为学之道,首先在于正人心、明天理,而许衡却认为“治生最为先务”,把那些“旁求妄进”、“作官嗜利”的原因,归之于“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谓利欲昏弊的结果。也因此,许衡曾批评“宋文章近理者多,然得实理者少”^①。

许衡重视民生日用,提出“治生最为先务”这一思想,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第三,刘因对经学提出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是元代理学中具有特色的思想。

刘因在《叙学》中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宋)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②。

其实,理学,即所谓“议论之学”,是“拨弃汉唐训诂”,直接依经发挥,所以它才能“自由其说”,“凿空臆断”,而刘因所谓六经自秦而后,才有汉唐传注、疏释,又以后才有宋代“议论”,这是把经学历史的次序,说成是理学产生的“始终原委”,将两者混淆起来,未免似是而非。刘因所以要这样说,也许感到南宋之所以亡,是同理学离开实质的汉唐训诂,以至离开六经的弊端不无关系。为补救此弊,在他看来,就得返溯汉唐训诂。因为训诂虽称烦琐,但它毕竟是紧就六经,无有“穿凿”,能得经旨“六七”,未尝离经。而六经又是古代“大圣大贤”的“惠世之书”^③,是即事言道,正像过去的一些儒生说的,六经是六艺之教,五常之道,不是谈空说妙,它能够补实理学“穿凿”的弊病。故刘因说理学出自汉唐训诂,训诂又本于六经,如此“推索究竟”,是意在说明六经为

① 许衡:《语录》上,《许文正公遗书》卷一。

② 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③ 同上。

根本。故求理学,当先谈汉唐训诂,以溯六经。这在他谈到六经与语、孟、学、庸的四书关系时,也强调要返溯六经。

因为从唐代韩愈、李翱,尤其从宋代理学开始,把语、孟、学、庸架于六经之上,成为理学的主要经典。他们只就四书矜谈妙语,空谈心性,几与佛道比并。对这一情况,刘因提出六经与语、孟等四书,应当是博与约的关系,不能把六经束之高阁。他批评“世人往往以语、孟为问学之始,而不知语、孟(乃)圣贤之成终者”,“未说圣贤之详(即博,指六经),遽说圣贤之约(指语、孟),不亦背驰乎”^①。在他看来,不先求六经之博,而径求语、孟之约,是颠倒了关系。显然这也是强调六经为根本。在宋元时期,思想界正沉浸在醉熏熏的理学情况下,刘因提出返求六经,在当时仍不失为是一种清新思想。

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如黄宗羲等痛定思痛,把明亡归之于理学束书不观,“游说无根”,提出以经学补实理学,这与刘因的论说大体相同。

刘因还认为六经中的一些经,就是历史,提出“古无经史之分”。这作为一个理学家来说,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说:“古无经史之分,诗、书、礼、春秋皆史也。因圣人删定笔削,立大经大典,即为经也”^②。谓经为史,这早在隋王通就曾提出过,但他只就体裁而言。而经与史,从内容上视为一体,则可以说是始于元代的刘因。刘因说诗、书、春秋原来是史,只是因为“圣人删定笔削”,才立为“大经大典”。这无异是把儒家奉为传世的经典,贬为普通的历史记录,剥落了经典的神圣意义;当然这并不是刘因的本意,但他的说法在客观上不免要产生这样的思想意义,对后世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如后来的王阳明所谓经与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③,李卓吾所谓“经、史相为表里”^④,都不过是沿着刘因“古无经史之分”的提法而加以铺陈的。尤其在清

① 刘因:《叙学》,《静修集》卷一。

② 同上。

③ 王阳明:《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集》卷一。

④ 李贽:《焚书》,《经史相为表里》。

代汉学考据盛行的时候,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谓六经原是史官记录,故经与史是一回事,而后人不明白这一来源,“故觉经异于史耳”^①,这也是承袭刘因的说法。

理学由北宋兴起,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元代始定为“国是”,成为官学,而沿至于明清两代,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但就朱学来说,在形式上虽然成为元、明、清的官学,可是也从元代开始,朱学本身的思想却是更多的兼融陆学。理学在元代的这种趋向,适成为后来王学出现的消息。同时,也在元代的理学中,许衡的“圣人之道”和“治生”论,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又是明清思想的滥觞。所以,元代的理学,在宋到明清之间是上承下启,有着重要的地位。

三 “三教外人”邓牧的“异端”思想

在蒙古统治者用武力统一全国过程中,一部分南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出于民族气节和缅怀旧朝的心情,决不与新朝合作,甘作“抗节遁迹者”,邓牧、谢翱、周密等皆是。

邓牧(一二四七至一三〇六年),字牧心,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亡后,他怀着极其悲愤的心情四出漫游,决心不仕,晚年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大德九年(一三〇五年),元朝派道教大宗师吴全节到余杭请邓牧去做官,邓牧拒绝了。他自称“三教(儒、佛、道)外人”,以表明他是不列入任何正宗行列的。邓牧反对元朝的统治,也反对理学家“三纲五常”的说教,但是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不可能用超时代的思想武器来反对理学,而是借用古代老庄的语言,来进行消极的反抗。他的作品有《洞霄图志》、《伯牙琴》等,《伯牙琴》是他具有哲学思想的代表作。由于他过的是隐居生活,作品流传范围很狭窄,因而他的哲学思想影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

响不大。

邓牧的宇宙观基本上来源于道家的太极说。他在《伯牙琴·昊天阁记》中写道：“太极之动生阳，而静生阴。阳轻清，上为天，日月星辰、雷电风雨丽焉；阴重浊，下为地，丘陵山岳、川泽江海丽焉。阳变阴化，其气冲和则为人。其两间莫不有主宰者焉。”邓牧虽然没有像道家那样说“无极而太极”，然而，他把自然界的运动、人类的生养，完全归功于玉皇上帝之力。他说：“恭惟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极之尊，御万有之众，凡天地所以覆载，日月所以照临，星辰所以运行，雷电风雨所以薄激荡沃，丘陵山岳之所以郁盘，川泽江海之所以流浸，生人之类所以相生相养，万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可见，邓牧关于天体演化的观点与道家是一致的。

邓牧出于对宋亡的悲愤和对元朝封建统治的不满，产生了对现实社会十分强烈的对抗情绪。然而，他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处在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时代，他既不可能投奔农民起义队伍，用农民的思想来改造封建社会，又不能朝前看，提出超越时代的新主张，因而不得不“遥荡于无何有之乡”^①，借出道家的“小国寡民”思想，幻想着尧舜时代那种“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的社会。

邓牧的思想可贵的一点，就是他看出了社会上客观存在着的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矛盾，从这点出发，对“君”和“吏”是无情抨击的。他大胆地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②

对掠夺人民的官吏，他指出“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

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数万；小者虽无禄养，则亦并缘为食，以代其耕，数十农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于其间。率虎狼

① 《伯牙琴》，《代问道书》。

② 《伯牙琴》，《君道》。

牧羊豕，而望其蕃息，岂可得也！……

今之为民不能自食，以日夜窃人货殖，搂而取之，不亦盗贼之心乎！盗贼害民，随起随扑，不至甚焉者，有避忌故也。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岂上天不仁，崇淫长奸，使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邪！^①

邓牧还通过《二戒——学柳河东》这两则寓言来揭露和讽刺元朝统治者。在《越人与狗》中，他把元朝统治者影射为狗，刻画了“狗”的贪婪与凶残。在《楚佞鬼》中，他把元朝统治者及其走卒比作“楚鬼”和“亡赖”，他们欺压“齐民”，最后终于被“神”置他们于死地。

邓牧在无情地抨击元朝统治者的同时，对人民群众的反压迫斗争却寄予深切的同情。他说：

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②

他的这个“官逼民反”的见解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但是，邓牧把社会上这一切不合理现象都归之于秦的统一，归之于秦始皇个人。他说：

不幸而天下为秦，坏古封建，六合为一。头会箕敛，竭天下之财以自奉，而君益贵；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而君益孤。惴惴然若匹夫怀一金，惧人之夺其后，亦已危矣！^③

从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出发，他幻想重新出现一个“天下无乐乎为君”的尧舜时代的社会。这个社会“君民间相安无事，固不得无吏，而为员不多”；其吏

① 《伯牙琴》，《吏道》。

② 同上。

③ 《伯牙琴》，《君道》。

“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这个社会既无盗贼，又无战争，因为“天之生斯民也，为业不同，皆所以食力也”。这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君子道高而愈谦，德尊而愈恭。其于人也，遏恶而扬善：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惟恐其不得闻，而以为己所不逮；不幸闻人之过，则亦含容覆护，不忍其不得为君子”^①。这种虚无缥缈的幻想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终于陷入“一事成败，一物完毁，莫不有数行其间；岂有天地大运，治乱废兴，非数所为者”^②的悲观绝望的境地。

四 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

谢应芳，字子兰，元末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一生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反对佛、道宗教迷信。其所著《辨惑编》是一本反对迷信思想的专著。有文集《龟巢稿》。

《辨惑编》共分死生、疾病、鬼神、祭祀、淫祀、妖怪、巫覡、卜筮、治丧、择葬、相法、禄命、方位、时日、异端十五目，这十五项都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迷信思想和活动。谢应芳针对这些“异端邪说”，一一加以“辨惑”、澄清，总是先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引古人事迹及先儒议论，一一析而辨之”^③。他反对迷信的态度是坚决的。

首先，他有比较正确的生死观，不信鬼神，反对淫祀。

谢应芳认为：“人之死生命于初，其有疾疢，由于气之乖戾，犹阴阳戾而两间之灾咎见焉。苟以人之有疾祸由鬼神，则两间之灾咎又孰祸？夫天耶，理固灼然，人莫之信。如应芳者，赖以经训之力，颇明是理，不为巫祝所惑”^④。有

① 《伯牙琴》，《君道》。

② 《伯牙琴》，《宝说》。

③ 《四库全书辨惑篇提要》。

④ 《答陈先生祷疾书》，《辨惑编》附录。

些人则“往往贪生畏死而为异端邪说之所惑”^①。因此，他反对把疾病归咎于鬼神，主张有病要求医，切勿崇淫祀。他以切身经历告诫人们：

天历（一三二八至一三二九年）中大疫，自母氏及同产者皆遭症，务求医药，不事祈祷，既而病者俱，予则无恙。时邻里崇淫祀者适多毙于疫，或以是颇叹异之。观此，亦可见淫祀不足信^②。

第二，他主张改变迷信风俗，斥巫覡、卜筮为妖妄。

民间丧葬流行大作佛事，择葬则惑于风水之说，这都是谢应芳反对的。他指出治丧中流俗之弊有二：

其一，铺张祭仪，务为观美，甚者破家荡产，以侈声乐器玩之盛，视其亲之棺槨衣衾反若余事也；其二，广集浮屠，大作佛事，甚者经旬逾月以极，斋羞布施之盛，顾其身之衰麻哭踊反若虚文也。斯二者非害礼之甚者乎？然而祭仪之设惟有力者能之，若浮屠之事，习以成俗，无有贫富贵贱，识者犹以其事为耻，可不悟乎？^③

对于“吐鄙俚之词，激漫漶之福”的巫者，他“虽见之，亦不为礼。”他呼吁士大夫家带头“正风俗、息妖妄，摈巫者不用”^④。他还说：“今之卜筮者诬罔百世，与古相戾，无足取信”^⑤。

对于相法、禄命、阴阳五行三术，以及方位、时日等忌讳迷信，谢应芳也是一概反对的。例如，他对于“时日”是这样看待的：

夫内事用柔日，外事用刚日者，圣人顺阴阳之理，初不以死生、荣辱、贫贱、富贵之类，一皆系乎年月日时之吉凶，而使人拘拘焉，择而

① 《死生》，《辨惑编》卷一。

② 《淫祀》，《辨惑编》卷一。

③ 《治丧》，《辨惑编》卷二。

④ 《巫覡》，《辨惑编》卷二。

⑤ 《卜筮》，《辨惑编》卷二。

用之。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举一物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亦尽手人事而已，夫天时何足泥哉！^①

第三，对佛、道宗教迷信他以为是“不足信”的。

在反对世俗迷信的同时，谢应芳也反对宗教迷信。对于亲歿之后，非佛氏之斋，即老子之醮，他认为是毫无意思的，“愚意不若以三日醮筵之费，赈一乡人户之饥”^②。他还引古证今，用历史上崇佛崇道的教训来告诫人们：

佛氏以释迦为师，其书无斋设之说也。至梁武帝信惑因果，俾命僧流为之，厥后亡灭宗国，饿死台城，因果无足征矣。道家以老子为师，亦未尝有设醮之论也，至宋徽宗妄意求福，命羽流为之，未几倾危宗社，流落金国，所术之福竟何有哉！二君昏迷不明物理，特以此为缙黄衣食之计焉耳。前代名贤，当今豪杰，卓然有见而不惑者固尝有之。惟闾阎小人，惑者什九，诸友无足效也^③。

他把佛、道一概斥之为异端：“古之为异端邪说者众矣，若老庄仙佛之流，自秦汉以来，惑世尤甚。”^④

谢应芳反对世俗和宗教迷信态度是坚决的，但是却并不都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他十分推崇孔孟与两宋理学，自己则以儒家信徒自居，甚至引用孔孟的唯心论来反对佛道或世俗的迷信。他说：“愚尝谓圣贤知人之死生祸福，而非阴阳五行之术也。孔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后果战歿于卫。孟子曰：‘死也盆成括。’未几，果见杀于齐。”^⑤就是用唯心论反唯心论。当然，谢应芳也引用过西门豹、荀子、柳宗元等人的言论。但总的讲来，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是有很多时代局限性和理论局限性的。

① 《时日》，《辨惑编》卷三。

② 《与王氏诸友论斋醮书》，《辨惑编》附录。

③ 同上。

④ 《异端》，《辨惑编》卷四。

⑤ 《禄命》，《辨惑编》卷三。

第四节 宗教

一 佛教

蒙古统治者最先接触的佛教,似为中原汉地的禅宗。一二一四年,蒙古军陷宁远(今山西五寨北),禅僧海云当时只有十三岁,曾于“稠人中亲面圣颜”^①。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在西域传诏,命海云及其师中观统汉地僧人,免其差发^②。一二四二年,海云又北觐忽必烈,说佛法大意^③。蒙哥汗时期,中原佛教势力迅速从金末所遭受的惨重打击中恢复和发展起来。大致在此前后,吐蕃佛教(通常称为喇嘛教)的影响亦开始渗入蒙古宫廷。一二五三年,八思巴谒忽必烈于潜邸。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至元七年,又进封他为帝师。从此一直到元末,世世以吐蕃僧为帝师。元代佛教各派当中,吐蕃佛教在朝廷的地位最高;而就全国而言,最为流行的仍是禅宗;同时,从佛教派生的白云宗、白莲教等教团,在南方也拥有越来越多的徒众。

吐蕃佛教受密教的影响极深,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或吸收了产生于吐蕃当地的苯教的某些成分。元代的吐蕃佛教,主要有萨斯迦、噶举、噶当、宁玛等派。著名学者大德布思端(一二九〇至一三六四年)主持规模宏大的霞炉寺,其所授受,也被有些学者称为霞炉派。元代前期和中期,吐蕃佛教各派以萨斯迦派的势力为最大。到后期,噶举派起而代之,其势力在吐蕃地区占据上风;帝师一职虽始终控制在萨斯迦派手里,但到这时候地位亦有所下降。帝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当时南进的蒙古右军统帅是兀赤、察合台和窝阔台。海云所见,当为窝阔台。

② 《至元辨伪录》卷三。

③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

师领宣政院事,不但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而且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帝师的法旨行于全国各地僧寺。帝师而外,元廷还封若干“西蕃僧”为国师。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也往往到吐蕃延请僧人以为“王师”。出身唐兀族的吐蕃僧人杨琏真伽,曾总摄江南诸路释教。见于记载的云南诸路释教都总统节思朵、积律速南巴等人,都是吐蕃人。吐蕃佛教僧人凭借其政治势力,在内地据有不少规模很大的寺院。一些吐蕃僧人以传授“房中运气”的“大喜乐”、“秘密法”之类,向蒙古宫廷取媚固宠;同时在中原、江南等地也化度了少数信奉者。但是总的说来,在内地流行的佛教,基本上还是从宋、金流传下来的各派。

内地流行的佛教,分为禅(即禅宗)、教(指天台、法相或称唯识、贤首或称华严等宗^①)、律(即律宗)三大派,元人把各派特点扼要归纳为:“佛宗有三,曰禅、曰教、曰律。禅尚虚寂,律严戒行,而教则通经释典”^②。寺院之分为禅、教、律三类,宋代已然。入元以后,禅僧德辉于一二六五年重编《百丈清规》(这个清规最早是由初创禅院的唐代后期僧人百丈怀海制定的);律僧省悟等编成《律苑事规》(书成于一三二五年);教僧自庆编成《增修教苑清规》(书成于一三四七年)。三类寺院的内部规定,都进一步制度化,“固各守其业”^③。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元廷集“江南教、禅、律三宗诸山至燕京(即大都)问法”。据《佛祖统纪》,这次廷辩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④。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普觉英辩传》云:“教自隋唐之后,传者各宗其说,遂派而为三:由止观之门,观假而悟空,观空而趋中,以入于实相,为天台宗;会缘入实,即俗而明真者,为贤首宗;穷万有之数,昭一性之玄,有空殊致而同归乎中道者,为慈恩宗”。慈恩宗亦即法相宗。

② 刘仁本:《送大璞圜上人序》,《羽庭集》卷二。

③ 《元史》卷二〇二,《释老传》。

④ 《佛祖统纪》卷四八,《大藏经》卷四九。这段记载可与宋本《中峰道行碑》所谓“时尊教抑禅”之说相印证。然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云峰高妙传》,经过廷辩,教僧仙林“辞屈,上大说,众噤乃熄。禅宗按堵如初”。恐怕是曲笔。

但不论是在南方或北方社会,此后最为流行的仍然是禅宗中的曹洞和临济两家。

曹洞宗在元初北方势力较大。著名的万松行秀(一一六六至一二四六年)金元之际成为出入于儒释之间的北方文士领袖,他著述甚富,《从容庵录》六卷为其举扬曹洞宗风的重要代表著作。万松弟子福裕(一二〇三至一二七五年),后来在西京主持少林寺。福裕一系,乃是元代曹洞宗的主要继承者之一。

临济宗的传播最广。北方的临济宗,以海云印简(一二〇二至一二五七年)一系最有名,因而后来被元廷封为“临济正宗”^①。南方的临济宗,宋元之际亦始而大盛。雪岩祖钦(?至一二八七年)、高峰原妙(一二三八至一二九五年)、中峰明本(一二六三至一三二三年)师徒相继,阐扬宗风。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元一代禅僧的代表人物。

禅宗的另外三家,即沩仰、云门、法眼等宗,自宋代以后均已失传。

元朝统一云南之前,在大理白人及汉人中流行的佛教,“皆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②。在云南,密教僧人称阿叱力(或阿闍梨,梵语 Acarya 的音译),或称轨度僧、轨范僧等;居家阿叱力名曰师僧,有妻子。至元中叶,禅僧雄辩(善阐李氏)、大休相继归滇或入滇,当为云南传入禅宗之始。其后,又有云南僧人玄鉴东来,问法于中峰明本,“一闻师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图归以倡道,而歿于中。吴鉴之徒画师像归国南诏”。“至中庆城,四众迎像入城,……由是兴立禅宗,奉师为南诏第一祖”^③。据陈垣先生考证,玄鉴初访中峰后曾经返滇。后又重访中峰,以至于死。玄鉴原来是教僧,访明本后改教为禅,遂成为云南禅宗第一祖。此后,阿叱力教虽在云南继续长期存在,禅宗势

① 赵孟頫:《临济正宗之碑》,《松雪斋集》卷九。

② 郭文:《重建玉案山栢竹寺记》,《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一二。

③ 宋本:《中峰道行碑》;祖顺:《中峰和尚行录》。俱见于《中峰广录》附录。按宋本所撰碑,又属入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二,某些文句略有小异,可参见。

力也开始在该地区发展起来。

元代的教、律各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僧人。如天台宗的玉冈蒙润(一二七五至一三四二年),华严宗的真觉文才(一二四一至一三〇二年),法相宗的普觉英辩(一二四七至一三一四年)、云岩志德(一二三五至一三二二年),律宗的光教法闻(一二六〇至一三一七年)等。临坛大德律师惠汶(一二六〇至一三三二年)传戒法于河北等地,“两河之间、三监旧邑,从化者盖以万数。缁素相率而求戒法,幢幢接迹于途”^①。

除了吐蕃佛教以及内地的传统各宗以外,由佛教派生出来的两个道门即白云宗和白莲教,在元代也拥有不小的势力。白云宗是北宋末由洛阳宝应寺僧孔清觉(一〇四三至一一二一年)在杭州白云庵发起的一个教团,提倡素食念佛,所以又称白云宗。它援引天台教义,攻击禅宗,在宋代一直被当做异端而受到禁止。入元以后,白云宗为政府承认,得以公开活动,势力发展很快。其中心在杭州南山普宁寺。延祐七年(一三二〇年),复被官方作为异端邪说取缔,此后逐渐绝迹。白莲教亦产生于南宋初年,元政府对白莲教时而承认,时而禁断,但其信徒一直在不断增加。到元末,白莲教为红巾军起义所利用,详见第七章。

元代佛教典籍的流传,颇具时代的特点。吐蕃藏经在这时传入内地。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汉译佛典重译的,但也有相当部分直接译自梵文。由是出现了对汉文藏经和藏文藏经进行比较研究的目录学著作,即吉庆祥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同时有部分藏文佛典在这个时期译为汉文,被吸收到汉文藏经中。武宗时期,继八思巴字创制、改进之后,由大德二十九人译藏文经藏为蒙文,可惜其刊本今已不传。在汉文藏经的刊印方面,至元时期,元政府对金代传下来的大藏经版(系以北宋版大藏经为底本雕造)加以校订补雕,刊印三十六藏,颁行各方。白云宗僧人、杭州普宁寺住持道安、如一、如志等发起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惠汶传》。

刊刻的藏经通称普宁寺本,六千零十卷。自宋季开始雕造的碇砂版藏经也在元代完成,共六千三百余卷。据新近发表的资料,元代后期还曾刊印过官藏^①。

至元初,元政府设总制院以掌浮图氏之教,至元二十五年改称宣政院。在江南地区,初置诸路释教总统所领佛教事。至元二十八年立江南行宣政院,治杭州,不久遂废总统所。此后,江南行宣政院迭经废置。至顺年间废行院,立广教总管府于各地,凡十六所,隶于宣政院。府设总管,以僧人为之,又设达鲁花赤一职,僧俗并用。元统二年(一三三四年),又废管教总管府,复置行宣政院于江南。地方上的僧官有僧录、正副都纲、僧正等,一般由政府任命僧人担任。度牒出家须由官府批准,实际上私度僧尼也很普遍。据宣政院统计,至元二十八年时,全国寺院二万四千余所,经过登记的僧尼凡二十一万余人。

二 道教

宋室南迁后,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蒙哥时期改名为真大)、全真等新创诸派以及浑元教等。金末元初,全真道及时投效蒙古统治集团,因而后来居上,获得了比太一、大道诸教以及佛教、儒学等更为优越的地位,以至能在三四十年内在北方长期维持“设教者独全真家”^②的局面。蒙哥在位时期发生了两次佛道辩论,全真道士两次遭到失败。其结果不但使道家的地位降至释家之下,而且也稍稍改变了全真道在北方道教诸派中一门独尊的状况。全国统一以后,活动于南宋故土的旧道教符箓各派继续流行于江南各地;在北方传播的,仍然是全真、真大等教,而以全真道的势力为最大。

道家势力在世祖至元年间又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蒙哥时曾勒令道家归还被他们霸占的佛寺二百余所。到至元十七年,“僧人复为征理”。据释家

^① 见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现》,《文物》,一九八四年第十二期。

^② 王恽:《真常观记》,《秋涧集》卷四〇。

声言,全真教徒毆击僧徒,自焚廩舍,诬僧人纵火,声言焚米三千九百余石。这场官司仍以道家失败告终,全真道士被诛杀、剿削、流窜者达十余人。释家乘势要求朝廷追究曾经蒙哥禁断、但尚存于世的道家伪经。元廷遂于次年命释门诸僧、翰林院文臣偕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人,会集长春宫,考证道藏诸经真伪。释道论辩达数十日之久,结果除《道德经》外,其余道家经典悉被判为伪经。释家敦促朝廷再次下令焚经,忽必烈说:“道家经文,传讹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不验,焚之未晚也”。他命令道教诸派各推一人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张宗演等人惊慌失措,承认“此皆诞妄之说。臣等入火,必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去道藏”。忽必烈于是下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家诸经一概焚毁,并禁止醮祠,遣使晓谕诸路遵行^①。这次打击,祸及南方道流,其影响超过蒙哥时局限于北方的焚毁道藏之举。不过,《道德经》外“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的诏令,并未完全执行。由于正一道人张留孙通过太子真金向忽必烈恳请,道经中之“不当焚者”或“醮、祈、禁、祝”等仪注皆得保存^②。忽必烈末年,又撤销对醮祠的禁令,“凡金策科范不涉释言者,在所听为”。当时由于桑哥等权臣沮泥,这道诏旨只在京师公布,“而外未白也”。成宗即位后,又将它重新颁行天下^③。道家这才从焚经之厄中喘过一口气来。

自蒙哥时候起,全真、真大、太一等教门宗教领袖的掌教地位均由朝廷任命或加以承认。入元之后,更由此发展为一项特殊的制度:“国朝之制,凡为其教之师者,必得在禁近,号其人曰真人,给以印章,得行文书,视官府”^④。各

① 《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至元辨伪录》卷五。

② 虞集:《张留孙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〇;袁楠:《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③ 姚燧:《长春宫碑》,《牧庵集》卷一一。

④ 虞集:《岳德文碑》,《道园学古录》卷五〇。

宗掌教的人选,由本宗上层推定后经皇帝批准赐印,有时也直接由皇帝委派本宗中之孚众望者担任^①。在南方,世代居住在龙虎山的第三十五代正一天师张可大,南宋季年已受敕提举三山(龙虎山、阁皂山、茅山)符箓,忽必烈攻鄂时,他曾对来访的蒙古秘使预言“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②。忽必烈灭南宋后,对可大之子、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备加宠渥,命其主领江南道教。此后,嗣位的历代正一天师,也都经过元廷的认可,受真人之号,袭掌江南道教事^③。成宗时,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又受封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江南道教符箓各派遂正式归并于正一道门下。正一天师就是正一道的掌教。惟元廷仍许其住在龙虎山,不像北方三派掌教“必得在禁近”。

元政府除了对各派掌教竭力加以控制外,还设置专门机构,对“教法”以外的事务,特别是涉及国家与道流之间关系的各种有关事务,加以干预和管理。在中央,以道教隶集贤院;地方上,各教门,郡置道官一人,领其徒属,用五品印。宫观各置主掌^④。元代的道官主要有道录、道正、道判、提点等。道官虽多由道士充任,但一般由政府任命^⑤。地方上的道官衙门和宫观之间有时也会发生冲突。

元代道教人物中最著名者,自然是长春真人丘处机。丘处机死后,全真掌教尹志平(一一六九至一二五一年)、李志常(一一九三至一二五六年)在促成本宗的全盛方面显示了经营大家的才干。在他们的主持下,全真道进

① 参见郭旗:《金元之际的全真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附录八,“全真掌教”。

② 《张可大传》,《汉天师世家》卷三(载《续道藏》);宋濂:《张天师世家传序》,《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六。

③ 下述史料明显地反映了张天师须经朝廷认可的事实:“延祐三年丙辰留国(张与材)仙逝,以印、剑授之(按指其子嗣成),命袭教。开府张宗师(按指张留孙)闻于朝。仁宗遣使至山,命主教事”。见《张嗣成传》,《汉天师世家》卷三。

④ 虞集:《岳德文碑》,《道园学古录》卷五〇。

⑤ 虞集:《张留孙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〇。

行了几项大规模的活动。其中包括为丘处机举行显耀的葬礼；大兴土木，广建宫观，乃至筑道院于和林；在终南祖庭会葬祖师王嘉，并扩建重阳万寿宫；刊行道藏；在广度门徒的同时竭力争取朝廷的信任和支持^①。丘处机西覲成吉思汗的详细经过，也靠随行的李志常著录成篇，才得以流传至今。另一个值得一书的人物是真大道第九传掌教张清志。在八传掌教岳德文死后，张清志归丧大都天宝宫，“丧毕潜遁”。数年后为徒众推举，“尝掌教矣。猷谒请逢迎之烦，逃去之。久无克充其任者。朝廷重其名实，遣使寻访，给驿致之。既见，度不可辞，即舍所赐传，徒步入京师。深居寡出，人或不识其面。……贵人达官来见，率告病，伏卧内，虽有金玉重币之献，漠如也。……至于道德忠正缙绅先生，则纳屣杖策往见，不以为难”^②。随着元廷对道流的利用和笼络，其上层率多趋炎附势，肆行威福，早已忘记了刻苦自励、淡泊寡营的标榜^③。张清志的行止，与他的同道相比，应该说还是高出一筹的。

正一天师自汉代以来均由张道陵后裔世世相袭。元代正一道另外还有两个著名人物，即张留孙（一二四九至一三二二年）、吴全节（一二六六至一三四六年）师徒。张留孙，信州（今江西上饶）贵溪人。少时入龙虎山学道。正一天师张宗演奉忽必烈之命北覲时，选留孙等从行。与北方的全真、真大等清修派别（太一道亦尚符箓）不同，正一诸派都持符箓念咒作法，大概更容易得到蒙古贵族的信从。元廷选正一道士留住大都，诸人以“北方地高寒，皆不乐居中”。最后留下了奏对“称旨”的张留孙。张留孙以法术为皇室驱邪禳灾，渐受眷隆。至元二十五年，元廷以其预议掌管道教的集贤院事，实际上把他推上了南北道教诸派钦定盟长的席位。此后他主盟道坛三十余

① 参见郭旂：《金元之际的全真道》。

② 吴澄：《天宝宫碑》，《吴文正公集》卷二六；虞集：《岳德文碑》，《道园学古录》卷五〇。

③ 参见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二，《宋流之贵盛》等节。

年,受玄教大宗师印,视二品,领集贤院事,位大学士之上,进入元代品秩最高的道官之列^①。张留孙死后,至元年间由他荐入京师的吴全节继任玄教大宗师。吴全节深通儒术,在“学问典故”方面一直是张留孙的顾问。张留孙、吴全节与朝中许多较有地位的儒臣,保持着比较融洽一致的关系。除主盟道教外,他们亦经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议国政,“国家政令之得失、人才之当否、生民之利害、吉凶之先征,苟有可言者,未尝敢以外臣自诡而不尽心焉”^②。这个阶段,正一道对元廷的政治影响,似乎超过了全真等教派。吴全节死后继任玄教大宗师的是其弟子夏文泳(一二七七至一三四九年)。

元代刊刻的道藏《玄都宝藏》,是由全真道在其全盛时代主持完成的。“全真之教以识心见性为宗、损己利物为行,不资参学、不立文字。自重阳王真人(即王嘉)至李真常(即李志常)凡三传,学者渐知读书,不以文字为障蔽”^③。为了争取道流正宗的地位,扩大传道手段,全真掌教尹志平决定命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藏。前后设经局二十七处,以管州(治今山西静乐)所存《大金玄都宝藏》为基础,搜求遗佚,加上全真道人的著述,一并刊刻入藏。是役起于一二三九年,告竣于一二四四年,陆续印造了一百数十部。元刊道藏共计七千八百余卷,约比《大金玄都宝藏》增加一千四百卷。可惜道藏刊成后不久,便遭到蒙哥时代和至元十八年的焚经之祸。经板和相当一部分经书被毁。明正统道藏《缺经目录》所著录,绝大多数系因元代焚经而致亡阙^④。元代南方一些较大的道观,也保存了部分道藏。其来源大都是从两宋幸存下来的《政和万寿道藏》刊本。

① 袁楠:《张留孙家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虞集:《张留孙墓志铭》,《道园学古录》卷五〇。

② 虞集:《河图仙坛之碑》,《道园学古录》卷二五。

③ 王磐:《张志敬道行碑》,《陕西金石志》卷二五。

④ 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

三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始创于公元七世纪二十年代,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当时在留居中国沿海地区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中流行^①。但迄于两宋,其传播规模一直很有限。蒙元时代,中亚各族居民大批徙居内地。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伊斯兰教徒。伊斯兰教就在这个时期随其信奉者遍及天下而传播到全国各地。

伊斯兰一词最早见于汉籍似为金代,当时译为移习览^②。但该词尚未见于元代汉文史籍。伊斯兰教的信徒,元代一般音译为木速鲁蛮或木速蛮^③,汉文史籍经常称他们为回回人。

关于回回的名称,虽首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但并不含有信奉伊斯兰教之意。到蒙古扩张至中亚、西亚后,才接触到伊斯兰教徒,蒙古人称之为“撒儿塔兀勒”(sartaul),南宋使臣彭大雅、徐霆分别于一二二二年和一二三五至一二三六年来到蒙古,著有《黑鞑事略》一书,把“撒儿塔兀勒”译为“回回”,并将“回回”与“回纥”作了区别。由此可见,回回之名就语音而言来自回纥——回鹘。在当时人看来,回回与回鹘(畏兀儿)各有所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在至元年间,对于回回一名仍然存在各种混用的情况,然而到了十三、四世纪之交,其内涵就相当明确了。它主要是指河中及其以西广大地区信

① 据九世纪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伊本瓦哈卜(Ibn Wahhāb)说,在广州的穆斯林商人,都服从由唐天子敕封的伊斯兰教法官裁断纠纷,并由他领导教徒们念清真言、做礼拜等。见田坂新道:《伊斯兰教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东京,一九六四年,页三六三至三六四。泉州的圣友寺和清净寺、扬州的礼拜寺(明代重建,今存)及其创建者补好丁(今译普哈丁)之墓(地在今扬州东关对河),都是两宋时期伊斯兰文化见证。

② 《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大定中,回纥移习览三人至西南招讨司贸易”。这三个西辽属部部民当为伊斯兰教徒,所以史文作“移习览三人”。览字属谈韵,以-m收声,用移习览译写 Islām,其音正合。

③ 阿语 Muslim(今译穆斯林)的波斯语形式 Musulmān 的音译,亦作菩萨蛮,见朱或《萍州可谈》卷二。Muslim 的直接音译,见于唐代汉文史籍,作摩思览,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褒异》三。

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①。故其礼拜寺(即伊斯兰寺院)又称回回寺;其所遵行的伊斯兰教法律又称回回法。元代回回人种族很杂,除阿拉伯、波斯人外,更多的是来自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系各族,另有东南亚、南亚、非洲各地的穆斯林。元代徙居中国各地的回回人,是今回族先民的主体。

元朝境内的回回人,来源于蒙古西征时从中亚、波斯等地俘掠的工匠或平民,先后签调来的军队,入仕于元朝的官员和学者,来中国经商因而留居的商人以及少部分在前代即已寓居中土的波斯、大食人后裔。回回人构成了色目人中的绝大部分,政治上很受蒙古统治者信用,不少人在中央衙门或地方官府担任要职。他们在国内外贸易中的势力尤大。其“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②。中统四年户口登记时,中都(即后来的大都)已有回回人约三千户,多为富商大贾、势要兼并之家。当然,更有大量的回回下层即工匠、平民等被括入官府或诸王贵族的匠局,从事纺织、建筑、兵械、造纸、金玉器皿等各种行业的劳作。例如专造纳失失的荨麻林(今河北张家口西南洗马林)匠局,就是窝阔台时期以回回人匠三千户建置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撒马尔干人^③。

东来的回回人乐居中土,“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不复回首故国也”^④,于是造成“元时回回遍天下”^⑤的局面。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回回人都固守伊斯兰教规,“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⑥;“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焉”^⑦。这两方面的因素,再加上元政府的宗教兼容政策,促成了伊斯兰教在全国的传播。至正八年中山府(今河北定县)《重建礼拜寺

① 信奉基督教的阿速人被称为“绿睛回回”,当属例外。

② 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③ 《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卷一二二《哈散纳传》。

④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

⑤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⑥ 许有壬:《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⑦ 吴鉴:《重修清静寺碑记》,《泉州宗教石刻》页二二至二三。

记》曰：“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①。其辞虽有夸张之处，但也反映了元代伊斯兰教徒的建寺兴教活动遍于全国的事实。

按照“教诸色人户各依本俗行者”^②的原则，元政府在中央设立了回回哈的司，由哈的大师（阿拉伯语 *Qāḍī* 意为法官）领之，依回回法掌本教门的宗教活动、回回人的户婚钱粮等词讼以及部分刑名之事。仁宗即位后，“罢回回哈的（按即哈的）司属”^③，下令“外头设立来的衙门，并委付来的人每革罢了者”^④。根据上引史料，回回哈的司在“外头”有“设立来的衙门”，也就是说，它曾在各地设有相应的地方机构。它们应当是由各地的回回大师或掌教哈的主持的。皇庆以后，回回哈的司所属各地方机构当在革罢之列，同时哈的大师的职掌也被限制在“掌教念经”等纯属宗教活动的范围内，元廷企图收回哈的大师处断回回人刑、民等公事的权力^⑤。到文宗时候，又有“罢回回掌教哈的所”的诏命^⑥。这些命令究竟是否得到有效执行，现在无从悉知。但据元末来中国旅行的伊本·白图泰报道，当时各地区回回人都有自己的掌教和哈的；同时元朝皇帝还任命了一个管领全国回回人的主教，赐其号曰 *Sadr al-Jahān*^⑦。波斯文 *Sadr* 译言大掌教，*Jahān* 译言世界。*Sadr al-Jah-ān* 当为汉语“天下大掌教”的移译，恐怕就是给予哈的大师的一个尊称。可见这时仍然存在着回回哈的司及其下属的各地方机构。

伊斯兰教在元代虽已传播到全国各地，但它基本上限于在回回人中间流行。此外，出嫁或者被卖给回回人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男女，当亦有一部分改

① 孙贵文：《重建礼拜寺记碑跋》，《文物》一九六一，第八期。

② 《元典章新集》，《刑部》《回回诸色户结绝不得的有司归断》。

③ 《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

④ 《元典章》卷五三，《刑部》一五，《哈的有司问》。

⑤ 同上。

⑥ 《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⑦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五〇四。

宗了伊斯兰教。元朝境内伊斯兰教的传教事业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蒙古诸王、忽必烈之孙阿难答之皈依伊斯兰教。阿难答是安西王忙哥刺之子。安西王所统的关陇河西地区,正当从西域进入中原的冲要地带,因而分布在这一带的回回人相当多。司天少监每年要把推算写造的回回历按时送呈忙哥刺,以便他向封领内的回回人颁布使用^①。阿难答从小由回回人抚养长大,深为《古兰经》、祈祷和礼拜所吸引。至元十七年他嗣位为安西王后,遂使所部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多数人改信伊斯兰教。元成宗在位时曾反对过阿难答的这种宗教狂热,但后来被迫向他让步^②。成宗死后,阿难答争帝位失败被诛。但直到元末明初,回回人“居甘肃者尚多”^③。柯兹洛夫等人在元亦集乃路治(哈刺和托,在内蒙额济纳旗东)发现的十四世纪的礼拜寺遗址及波斯文残碑^④,亦证明当地的回回人一直在进行兴教建寺的活动。

伊斯兰教很早就分裂成若干派别。现存史料似乎不足以反映出元朝境内伊斯兰教各派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在这方面目前还只有极其零碎的知识。例如根据伊本·白图泰所述可知,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在元代业已传入中国^⑤。

从公元十世纪起,波斯语作为东部伊斯兰世界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到蒙古兴起的时代中亚已普遍使用波斯语了。蒙古人最早是通过河中及其附近地区的回回人接触伊斯兰教的。在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从西北方面涌入中国境内的回回人中,相当大部分亦来自上述地区。因此元朝境内、尤其是北方伊斯兰教的文献和文物留下了明显的波斯文化的痕迹。在哈刺和托回回寺遗址发现的碑文是波斯文,山东曲阜出土的一二三五五年圣旨碑“后有回

① 见《秘书监志》卷七,至元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公文。

② 《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三二四。

③ 《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

④ 参见伯希和:《中国的阿拉伯文古碑铭》,《亚洲杂志》一九一三年,页一七九注二。

⑤ 参见《伊斯兰教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页七七三。

回字一行”，被沙畹认为是八思巴字，实际上也是波斯文^①。元朝政府公文中有关伊斯兰教的专用词汇，亦有相当一部分是波斯语辞，如答失蛮、迭里威失（与之相应的阿拉伯语为 faqīr，未见于元代汉籍）、纳麻思（波斯语 namāz 译言礼拜，相应的阿拉伯语为 Ṣalāt，亦未见于汉文史籍）等^②。

泉州的情况比较特殊。在那里发现的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回回人墓碑、礼拜寺碑铭等，有相当一部分是阿拉伯文的^③。自唐宋以来，不少波斯、大食商人从南海坐船来中国贸易，寄居在南方的对外贸易商港。两宋之际，泉州一跃而为南宋对外贸易的第一海港，许多伊斯兰教富商寓居此地。其最著名者，莫过于南宋末年掌泉州市舶司三十余年的蒲寿庚。他家虽然是从广州迁居泉州的，祖籍却是阿拉伯人，降元以后仍极有势力^④。元代泉州的回回人中，当有许多是从波斯湾一带或更西地区渡海而来的伊斯兰教徒后裔，或者直接来自上述地区^⑤。他们虽然与从河中等地东来的回回人同样信奉伊斯兰教，但所受到的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毕竟要多一些，因而也反映在他们所遗留下来的伊斯兰教文物中。

至正年间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还提到了伊斯兰教的四种教职：“……摄思廉(Shaikh al-Islām)，犹华言主教也；……益绵(Amīn? Imām)，犹言主持也；没塔完里(Mutawallī)，犹言都寺也；谟阿津(Mu‘azzin)，犹言唱拜也”^⑥。虽然很难断定这几种教职的名称是直接来自阿拉伯语，抑或是从波斯语

① 参见沙畹：《蒙古时代汉文诏令碑铭及文书》第二一件，《通报》一九〇八年，页三〇七至三〇九；伯希和：《中国最古的阿拉伯字的碑刻》，《亚洲杂志》一九一三年。

② 参见《伊斯兰教之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页一二五一至一二六〇。

③ 参见《泉州宗教石刻》，页一至二六。在其他地方也发现过阿拉伯文的元代伊斯兰教文物，如北京牛街清真寺内的元代阿拉伯文墓碑等。惟此类文物在泉州尤其集中，当非出于偶然。在扬州也发现了刻有阿拉伯文的元代墓碑。

④ 参见桑原鹭藏：《蒲寿庚事迹》，陈裕菁汉译本（《蒲寿庚考》）。

⑤ 例如至大年间重修泉州圣友之寺的阿哈玛特，即为耶路撒冷人，见《泉州宗教石刻》，页二一。

⑥ 吴鉴：《重修清净寺记》，《泉州宗教石刻》，页二二至二四。

音译过来的,但它们未见于当时北方的伊斯兰教专用名词之列,或许也反映了从波斯湾地区传来的伊斯兰教的某种特色。

四 基督教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内地,是在唐贞观年间。最初被称为“波斯经教”,其教堂名为“波斯寺”^①。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当时传到东亚的基督教,乃是在四三一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被判为异端、后来在波斯王朝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唐代称为景教或波斯景教^②。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唐武宗时取缔,景教在内地趋于灭绝。但它在西北少数民族中仍一直有所活动。入元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状况发生了明显的不同。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亚势力的扩大和九世纪以后聂思脱里教会自身长期衰微不振等等原因,聂思脱里教在该地区的影响,总的说来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随着信奉聂思脱里教的部分突厥、蒙古部民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地。与此同时,因为蒙古西征时所掳回的战俘、工匠等人口中有很多西亚、东欧的天主教徒,特别是因为蒙古及元政权与罗马教廷的直接联系,罗马教廷派遣圣方济各会教士来华传教,先后在大都建立总教主、泉州设教主,在中国广为传播。所以元代在中国流传的基督教包括聂思脱里派和方济各会两大教派。

元代早期文献沿用在中亚流行的波斯语,称聂思脱里教徒为迭屑(tarsā)。而在有关聂思脱里教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更经常出现的是也里可温一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 Erke'üd^③,用指聂思脱里

① 《唐会要》卷四九,天宝四年九月诏。

② 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元代径称之为聂思脱里教,见黄溍:《马氏世谱序》,《黄金华集》卷四三。

③ 见《石墨镌华》卷六。

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也里可温的辞源尚不甚清楚^①。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 Erküd 的部落,尚保持着用香油涂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 Erküd 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②。

元代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建立的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③。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七十二所。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 Mār(译言圣)hasiā(译言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在其他汉文史料中,它有时也被译写为马里·哈昔牙^④。列班系叙利亚文 Rabban 的音译,原意为法师、律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⑤,他们与其他宗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发的优惠。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大清楚。

元朝基督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主要有唐古特、汪古、大都乃至江南沿海等地。

唐古特较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⑥。其后,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Rabban Sauma)和麻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古特首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古特居民是热烈的信教

① erke'ün 的波斯语拼写形式作 arkāwūn,阿美尼亚文作 arkhawun。一般认为,它源于希腊文 erkou,它可能是由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或由东罗马皇帝支持下东正教会的亚美尼亚信徒辗转传到中亚地区的。

② 田清波:《鄂尔多斯志》,《辅仁大学学报》卷九,页一四。

③ 《元史》卷八九,《百官志》五。

④ 见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九;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⑤ 《景教研究》,页八九四。

⑥ 在十三世纪中叶的聂思脱里主教驻节表中就列举了唐古特教区。见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卷一,页一七八注。

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①。史料还提到一二八一年左右的唐古特主教,名为沙卜赫兰(Îshô‘-Sabhram)^②。聂思脱利教在唐古特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纪》,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部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发掘出了十字架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阔里吉思原先信奉聂思脱里教,后来在奉罗马教皇之命东来的方济各会天主教大主教孟特·戈维诺(Monte-Corvino)影响之下,带领很大一部分部众皈依了天主教,并在当地建造起一座华丽的天主教堂。但他的行为遭到他兄弟的反对。在他被西北叛王笃哇俘杀后,那些改从天主教派的汪古部众又重新被聂思脱里教派所争取^③。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似乎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麻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Archdeacon)拜泥(Baynîel)的儿子。麻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④。

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鲁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⑤。大同以南的

① 《忽必烈汗的僧人》,页一三八、一五九。

② 同上。

③ 《出使蒙古记》,页二二五。

④ 《忽必烈汗的僧人》,页一三五。东胜原书作 Kawshang,伯希和根据鄂多立克提到位于汪古居地的 Tozang 等理由,认为此处之 k 系 t 之讹。

⑤ 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一辑。

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信徒^①。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都附近的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代。孟特·戈维诺在他的一封信中谈到这里聂思脱里教说，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允许奉行另外一种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没有任何余地，他们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五年之久^②。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eregrino)的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③。

早在一二四六年，罗马教皇就派方济各会士普兰诺·加宾尼到达和林，一二五四年有鲁不卢克、一二九四年有孟特·戈维诺先后到达和林、大都，并在中国开始传播天主教。由于孟特·戈维诺等人的努力，罗马天主教在大都赢得了一批信徒。经孟特·戈维诺受洗的天主教徒不下于六千人。他在大都建立了好几个天主教堂。在大都的阿兰人原来信奉希腊正教，这时也皈依孟特·戈维诺，其人数在三万以上^④。一三〇七年七月，罗马教廷继委任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暨全东方总主教之后，又派遣了一批教士前来中国，其中热拉德(Gerard)、彼列格林和安德鲁(Andrew)三人抵达中国。安德烈后来被任命为泉州主教。

孟特·戈维诺死后，大都大主教阙任。一部分在大都的阿兰显宦联名上书罗马教皇，要求他派一位大主教来^⑤。这件事发生在元顺帝在位时。实际

① 至元四年二月，“诏遣官签平阳、太原人户为军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人等户外”。见《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② 《出使蒙古记》，页二二四至二二七。

③ 《出使蒙古记》，页二二二至二二三。

④ 《出使蒙古记》，页二二四至二二七。

⑤ 同上。

上,罗马教廷后来任命的大都大主教,始终未曾抵达过大都。元代后期,阿兰人在政府军队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随着阿兰人政治势力的膨胀,其所信奉的天主教的影响,亦当有所扩大。

大都基督教徒中不乏政治地位显赫者。如奉克烈部聂思脱里教徒、拖雷王妃唆鲁禾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即为一例。他出身聂思脱里世家,曾领崇福司事。他对于穆斯林势力的竭力攻击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宗教矛盾的色彩^①。

江南及沿海地区的基督教,是在元灭南宋之后逐步传入的。至元十四年,聂思脱里教徒马薛里吉思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其间他先后建教堂七所,其中一所在杭州。七寺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七十余顷。记录马薛里吉思事迹的梁相《大兴国寺记》,是元代汉人对于聂思脱里教认识的重要书面文献。其略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灭。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②。镇江地区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另据鄂多立克报道,扬州除了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外,也有若干天主教士住在该城^③。近几十年来在扬州发现的一三四年拉丁文墓碑,证明当时该地确有天主教士在活动。鄂多立克所言不诬。

据马可波罗说,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它无疑就是马薛里吉思建立的样宣·忽木刺(叙利亚语,Umura,译言寺院),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④。天主教士在杭州也

① 参见《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

② 《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

③ 《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一二三。

④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有若干传教活动。

泉州是天主教在江南的活动据点。自十四世纪初开始,即由孟特·戈维诺向该地派遣主教。自此至元末,担任泉州天主教主教之职者先后为热拉德、彼列格林和安德烈。他们受到当地富裕的天主教徒慷慨赠予和友好接待^①。安德烈死于一三二六年,葬泉州。他的墓也已在泉州发现^②。

除上述主要地区而外,其他地区亦有基督教徒的分布。如押赤(今云南昆明)城居民中就有若干是聂思脱里教徒。辽东地区的聂思脱里教徒一度相当集中,以致乃颜叛乱时将十字架画上战旗以蛊惑人心。他失败之后,当地基督教徒备受凌辱,或被迁徙内地。基督教的影响当由此而受到削弱。不过元代辽东古城遗址中聂思脱里教遗物的发现,似乎可以证明后来那里仍有基督教徒在活动着。

孟特·戈维诺曾经译出部分天主教经文,但不清楚是否译成汉文。聂思脱里教的文献,据十三世纪末叶亚美尼亚及 Nisibis 京城大德著录,共存 300 余种^③。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可以证明,其中有哪一种曾在元代被译成汉文^④。这个事实也有助于伯希和的下述论断,即元代的基督教,大致可以说不是汉人的基督教,而是阿兰人、突厥人以及少数蒙古人信仰的宗教^⑤。基督宗教在中国汉人中缺乏群众基础,又与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互相争夺信徒,关系紧张,加之两派也互相争斗,所以势力一直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元亡后,基督宗教在中国又湮没了。

① 《出使蒙古记》,页二三三至二三四。

② 《泉州宗教石刻》,页二九至三〇。

③ 《景教研究》,页四二二。

④ 吐鲁番出土的畏吾儿文马太福音残文,可能是十三世纪的遗物。见马洛夫:《古突厥碑铭》,页一三一至一三八。在叙利亚文的聂思脱里教文献中,则只有发现于北京故宫午门楼上的礼拜式前后唱咏赞词抄本残卷,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十三世纪的遗物。见《景教研究》,页四一四至四一六。

⑤ 伯希和:《中亚及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一九一四年,页六四三。

基督教中的东正教则主要在鞑罗思、亚美尼亚人中流行。元代活动规模较小的宗教还有犹太教、摩尼教、珊蛮教等,犹太教徒当时称为朮忽或主吾,即波斯语 Juhūd(意为犹太人、犹太教徒)的音译,今开封犹太教教堂发现的明碑《重建清真寺记》,证明该寺初建于金,复修于元,而再建于明。摩尼教主要在东南沿海一带流传。珊蛮教仍然是漠北游牧民族和东北诸部族中最为流行的宗教。珊蛮教在元代也进入了宫廷。朝廷中的“蒙古巫祝”、“巫覡”,每年都要主持若干次“国俗旧礼”,履行各种祭祀仪式。这种以蒙古语“告神”、“祝赞”、“念咒语”,“以国语呼累朝御名而祭焉”的巫祝,无疑就是珊蛮^①。

第五节 科学技术

一 天文历法

我国是世界上天文历法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遗留下来的甲骨文里,就有许多丰富的天象记录。在以后的各个朝代里,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元代的天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的丰富遗产,一方面吸收了阿拉伯人的天文知识,特别是由于郭守敬、王恂等天文学家的辛勤劳动,使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元代天文学的发展是在编订新历法《授时历》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发展的。

元初所沿用的《大明历》是金天会五年(一一二七年)在宋《纪元历》的基础上稍加增益而成的,大定二十年(一一八〇年)虽曾加以重修,但由于已用了一百多年,基本数据未变,随着年代的增长,造成了历法与天象不符的弊病,对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 响。因此,刘秉忠曾提议修历。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忽必烈决定立太史局(后改为太史院)改修新历,命许

^① 《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

衡、王恂、郭守敬、杨恭懿等主持其事。

郭守敬(一二三一—一三一六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他的祖父郭荣精通算数、水利,郭守敬受祖父的影响很大。后来,郭荣让他受学于精通天文、地理的刘秉忠。刘秉忠和他的同学张文谦都是忽必烈很欣赏的人,因而郭守敬也被推荐给忽必烈。由于郭守敬对水利建设的建议和在西夏等地的治水的业绩,使忽必烈很赏识他的才能,命他为同知太史院事。

王恂(一二三四—一二八一年),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人,也是刘秉忠的学生。忽必烈命他为太史令。

郭守敬、王恂等人经过四年的努力工作,改制和创造了近二十种天文观测仪器,并进行了大规模的实测活动,最后制订了著名的《授时历》。

天文仪器的创制

郭守敬认为,要制订新历,必须创制精密仪器,亲自进行天文测量,才能得到准确的数据。他说:

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裕中汴京所造,不与此处(指大都灵台,在今北京建国门外泡子河北)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极,约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复欹侧。^①

因此,他花了三年时间创造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窥几、正方案、候极仪、立运仪、证理仪、定时仪、日月食仪、悬正仪、座正仪等仪器。这些仪器,“皆臻于精妙,卓见绝识,盖有古人所未及者”^②。

简仪是对浑仪进行了重大改革后创制的。元以前所使用的浑仪,把测量赤道坐标、地平坐标和黄道坐标等三种不同坐标的机构都装在一个系统内,结果使一个球面的空间安装了大小八九个圆环,使用很不方便,还妨碍视线。郭守敬创制的简仪精简了黄道坐标,而把地平坐标与赤道坐标分为两个独立的装

① 《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

② 《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置。简仪的赤道装置与现代望远镜中广泛应用的天图式赤道装置基本结构是一样的。它由四根斜立的支柱托着一根正南北方向的轴,围绕着这根轴旋转的是赤经双环。赤经双环的两面刻着度数,最小分格是三十六分之一度。赤经双环的中间夹着窥管,窥管可以绕着赤经双环的中心旋转。窥管两端,架有十字线,这便是后世望远镜中字丝的先驱。这样,只要转动赤经双环和窥管,就可以观测空中任何方位的一个天体,并从环面的刻度上读出天体的赤纬数值。赤经数值则由旋转轴南端的赤道环上读出。紧挨赤道圈的里面,固定着百刻环,环上刻着十二个时刻,以测定时间。为了便于赤道圈旋转,简仪还应用了滚珠轴承装置,使之转动灵活。这比达·芬奇发明滚珠轴承要早四百多年。

郭守敬创制的简仪是我国科学史上的珍品,比世界上同类仪器要早三四百年。可惜清初时被法国传教士纪理安(当时在清朝钦天监任职),别有用心地把它当作废铜烧毁了。现存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简仪是明正统年间的仿制品。经过八国联军破坏后已经不完整了。

仰仪是铜制的中间空的半球面仪器,像一口朝天的大锅。半球的大圆面上刻着东、南、西、北和十二时辰,半球面上刻有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赤道坐标。大圆面上用竿子架着一块板,板上有个小孔,小孔的位置正好在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阳光通过小孔,就在半球面上投下了一个圆形的倒像,映在坐标上,即可读出太阳在天空上的位置。使用仰仪可以毋需直接用肉眼观看强烈的太阳而得出它的位置,还可以直接观测日食的方向、亏缺和它的时刻。

圭表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观测日中影长变化以决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刻的天文仪器。“圭”与“表”是其中的两个部件。“表”是垂直立在地面上的标竿,“圭”是从表的下端向正北伸出的一条石板,圭表成垂直状。每当正午时,表的影子就落在圭上面,以根据表影长短测定夏至、冬至等节气的时刻。郭守敬改制的圭表,把宋代八尺长的表提高到三十六尺,表上再用两条铜龙抬着一根很细的横梁,使梁心到圭面达四十尺。由于高度长,投影也就差别明显,测定的精度就高。圭的刻度很精细,有尺、寸、分、厘,还可读到毫。现存河南登封元代

观星台的石圭,由36方青石圭面和砖砌圭座组成,长31.19米,宽0.53米,高0.56米,石圭水平程度较好,石圭方位经七百年后与当地子午线方位仍相符合。

郭守敬创造的景符是定影象的仪器。一片薄铜片中有一小孔,铜片装在一个小架上,使它在圭面上来回移动,当孔架和太阳在一直线时,在圭面上的太阳象中可以看出一条平分日面很细的梁影,克服了由于日光在空气中的散射,造成表顶影子落在圭面上不清的弱点。用这种清晰的横梁影子来确定圭面日影长度,可准确到上下不差2毫米,这是旧圭不能达到的。

窥几是郭守敬用来测量星、月影长的仪器。其形如一长方桌,桌面上开一长缝,两边刻上度数,将桌放在圭面上,把缝对正南方向,人可在桌下从缝中直接观测星、月,得到和太阳影长性质一样的量。窥几和景符都是高表的辅助仪器。

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

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郭守敬上奏元世祖:“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①得到忽必烈的同意。于是在原有大都、上都等5处司天监的基础上,在元朝控制的范围内陆续设立了27所观测台、站。其最北的北海测景所,据推算,应在北纬 $64^{\circ}5'$ 的地方,已在北极圈附近了;最南的南海测景所当在占城(今越南南方),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三月,曾遣太史监候张公礼、彭质等往占城测候日晷^②。这27所测景所,现在只有河南阳城测景所还保存着,它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15公里的告成镇(即古阳城)。

郭守敬亲自参加了实测活动。他和一批监候官分道外出观测,他自己“由上都、大都,历河南府(即阳城)、抵南海,测验晷景(日影)”^③。这样大规

① 《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

② 《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

③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模的实测活动，“是亦古人之所未及为者也”^①。经过他们不辞劳苦的观测，在测定黄赤大距和恒星观察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黄赤大距是黄道面与赤道面的相夹的角度，即现在所称的黄赤交角。在郭守敬以前，由于观测精度不高，长期以来一直认为黄赤大距为 24° 。郭守敬利用他研制的先进的天文仪器，经过长期观测，得出“黄赤内外度，据累年实测，内外极度二十三度九十分”的数据，并用数学方法进行了验证，“以圆容方、直、矢接勾股为法，求每日（日、月）去极，与所测相符”^②。这个数据折合现代的度分秒为 $23^\circ 33' 5.3''$ ，与现代观测值仅差 $1' 6.8''$ 。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精确的数据。

我国古代对于恒星位置的观测，是以观测二十八星宿为基础的。古人把黄道附近的星分为二十八宿，每一宿用一星作为代表，称为“距星”，两距星间的距离称为距度。元以前曾进行过五次测距，虽然一次比一次精确，但仍有很大误差，以北宋崇宁年间的一次为例，其绝对误差总和为 $4^\circ 32'$ ，平均为 $9'$ 。经过郭守敬用精密仪器测定后精确度提高了一倍，其绝对误差总和为 $2^\circ 10'$ ，平均只有 $4.5'$ 。郭守敬还对二十八宿星进行了赤经赤线的测量，并编制成星表。此外，郭守敬还对二十八宿中杂坐诸星进行测量，测出前人未命名的星一千余颗，使那时能观测的星数从一千四百六十四颗增加到近二千五百颗，而欧洲在文艺复兴前所测量的星也只剩有一千零二十二颗。但可惜的是郭守敬的观测资料已经散失了。

《授时历》在历法上的成就

郭守敬、王恂等人经过四五年的努力，在科学观测的基础上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并参考累代历法，终于编出了新的历法，取“敬授民时”之意，定名为《授时历》，于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开始使用。这部历法在当时来说，“自古及今，

① 《元史》卷四八，《天文志》一。

② 《元史》卷一六四，《郭守敬传》。

其推验之精，盖未有出于此者也”^①。确实就是我国古代最卓越的一部历法。

《授时历》的成就，用郭守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考正者七事”、“创法者五事”。

考正七事是：“一曰冬至”，即精测了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年）冬至发生的时刻；“二曰岁余”，即结合以前各史历志中所纪示的冬至时，确定一年为365.2425日。这个岁实数值首先是南宋杨忠辅得出后在《统天历》中使用的，郭守敬根据自己多次精密测定的冬至时刻的结果，并利用历史上从祖冲之《大明历》以来的6次冬至时刻的观测资料，证实了365.2425日是历史上所使用的最精密的数值。这个数值，和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所经历的实际时间相差26秒，与一五八二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颁布的、现在世界上通行的《格里高利历》是一致的；“三曰日躔”，即测定了至元十七年冬至时太阳的位置所在；“四曰月离”，即测定了至元十七年冬至时月亮离近地点的距离；“五曰入交”，即至元十七年冬至时月亮离黄白交点的距离，并进一步利用这三个数据确定了朔望月、近点月和交点月的日数；“六曰二十八宿距离”，即测定了二十八宿距星的度数；“七曰日出入昼夜刻”，即测定了二十四节气时大都的日出、日入时刻。

创法五事是：“一曰太阳盈宿”，即求出太阳每日在黄赤道上运行的速度；“二曰月行迟疾”，即求出月球每日绕地球运行的速度；“三曰黄赤道差”，即由太阳的黄道经度推算赤道经度；“四曰黄赤道内外度”，即由太阳的黄道经度推算赤道纬度；“五曰白道交周”，即求月道和赤道的交点。

《授时历》还正式废除了上元积年日法，采用了近世截元法，这是历法史上的重大成就。“上元积年”是古代编历的老传统。“上元”就是在过去的年代里，一个朔望日的开始时刻和冬至夜半发生在一天；“积年”就是从制历或颁历时的冬至夜半上推到所选上元的年数。历法家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上元”，往往牵强凑合。郭守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以至元十七年作为推算各项天文数据的起点。

^① 《元史》卷五二，《历志》一。

二 地理学

《元一统志》的编纂

元朝建立后,全国出现了空前大统一的局面。由于全国行政区域的变更,路府州县的名称也多有更改,加上连年战争,各郡邑的图志也残缺不全,因此客观上急需一部全国性的地理著作。元朝统治者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全国各族人民,显示“皇元疆里无外之大”的盛况,也十分需要编纂一部全国地理著作。

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元世祖命札马鲁丁、虞应龙等开始编纂《元一统志》,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书成。以后又陆续得到《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因而倡议重修,由孛兰吟、岳铉等主其事,元成宗大德七年(一三〇三年)书成,凡一千三百卷,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

书中关于各路各州各县史迹,继承唐《元和郡县图志》、宋《太平寰宇记》、《輿地纪胜》等书成例,归纳为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部门。所引资料,凡大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輿地纪胜》和宋、元旧志,北方等省,则取材于《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者居多。边远地区的材料则依靠当时新编的《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由于此书保存了宋、金、元旧志中的许多材料,在学术上有很大价值。

《元一统志》所引事迹,如叙大都寺观之壮丽,古迹之纷繁,多他书所未见。延安路鄜州石脂、石油等条,可补沈括《梦溪笔谈》之漏。延安路范壅、计用章、庞籍、狄青、韩琦、薛奎、王温恭、夏安期、李师中、李若谷、王庶等人事迹均出《宋史》,但与今本《宋史》多不合,这是因为《元一统志》所据的是元初纂修的《宋史》,与元末脱脱纂修的《宋史》不同。这对于我们研究历史、考古、地质、地理都是极好的材料。

河源的探索

元朝以前,由于边区交通的阻塞,对于黄河发源地的探索,都没有获得圆

满的成果。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唐代薛元鼎出使吐蕃,均未到达河源,他们的记载也是不完全的。元朝统一全国后,中央政府对边区的管理大大加强,所在都设有驿站,交通十分便利,因而为河源的探索创造了有利条件。

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年),元世祖下诏曰:“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①乃授都实为招讨使,佩虎金符以行。都实,女真蒲察氏,通多种民族语言。凡三至吐蕃,寻求河源所在,且开辟航道,制造船只,筹建城镇。都实的行程是:“是岁至河州(今甘肃临夏),州之东六十里有宁河驿,驿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杀马关。林麓穹隘,举足浸高。行一日至巅,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②。都实的考察,后来由潘昂霄撰成《河源志》。

朱思本也从梵文图志翻译了关于河源的记载,两本互有详略。《河源志》记载:“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沮如散涣,弗可逼视,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脑儿。‘火敦’译言星宿也”^③。朱思本译本:“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部之正西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④。

忽必烈命都实探索河源,并有在河源建一城,“规置航传”,以实现西北民族地区和中原汉地进行互市,不得不说是一种大胆的设计,也是元朝统治者意图开发西北的伟大创举。

朱思本的《舆地图》

中国地图制作的画方之法,始自魏晋间的裴秀(二二三至二七一年),唐

① 《辍耕录》卷二二,《黄河源》。

② 《元史》卷六三,《地理志》六。

③ 同上。

④ 同上。

代的贾耽(七一〇至七八五年)也采用了裴秀的制图法,到了元代的朱思本,又重振画方之法,这是裴秀、贾耽以后在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

朱思本(一二七三至?年),字本初,号贞一,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是信州龙虎山的道士。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他奉命至大都,协助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吴全节处理道教事务。到武宗、仁宗朝时,朱思本奉命代天子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与此同时,中朝大夫还交给他编绘地图的任务:“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①。这一任务与朱思本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想法正合,从此,他得到了依靠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机构查阅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等资料的方便,同时,他还亲自进行察访,“往往讯遗黎,寻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②。所以他的知识是全面的,不仅有官方提供的资料,而且有询访当地父老、进行实地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多年的辛勤劳动,为他最后绘成《舆地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思本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足迹遍及今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可谓“跋涉数千里间”。从大德三年离开龙虎山北上,“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而京都实在焉”。从至大四年起,“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③。可见他的实际地理知识极为丰富。

但是,朱思本要完成中朝大夫交给他绘制地图的任务,在不具备今天科学手段的条件下,单凭一人之力四出考察,是不可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他必须从前人的地理、地图著作中吸收营养,在他们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起步。十四

① 朱思本:《舆地图自序》,《贞一斋诗文稿》卷上。

② 同上。

③ 同上。

世纪时,朱思本能看到的当时和前人的地理、地图著作还是相当丰富的。仅就《輿地图自序》中所举,地理著作即有《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而这时《元一统志》也恰好刚刚完成,朱思本以承担任务为由,得以参阅。

朱思本也利用了许多前代的地图,这些地图虽有很多“乖谬”,但毕竟为朱思本提供了借鉴。如《自序》中提到的《禹迹图》,为伪齐阜昌七年(一一三六年)四月所刻,从图中的唐代地名和绘图情况来判断,很可能是根据唐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的禹贡九州部分绘成的,它是画方的绘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朱思本也采用了这种画法。

朱思本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据他的《自序》,《輿地图》以他实地考察的地区为主体,“若夫泓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①。凡是他不熟悉的地方,概不轻易地画在图上,尽管他曾翻译过梵文《河源志》,对西北地理知识并不陌生,但因为沒有实地考察,便不十分相信。

朱思本为了制作《輿地图》,从至大辛亥年起(一三一一年)至延祐庚申(一三二〇年),整整花了十年工夫。图长广七尺,“刊面于上清之三华院”^②。可惜由于地图太大,不便刻成书本式样,所以现在失传了。幸好明代的罗洪先曾据以增广,绘成《广輿图》,所以今天我们仍可在《广輿图》上看到《輿地图》的面貌。

三 农书

《农桑辑要》

元世祖于至元七年(一二七〇年)设司农司,专管农桑水利,派遣劝农官,

① 朱思本:《輿地图自序》,《贞一斋诗文稿》卷上。

② 《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二二,《贞一斋杂著》。

巡行郡邑，察举农事，并将情况通报户部，据以考核地方官的治绩，司农司为了推广当时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农户掌握节气，就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书籍，披阅参考，删其繁重，择其切要，于至元十年（一二七三年）编成了《农桑辑要》一书。这部农书总结了十三世纪以前我国农业耕作的经验，在推广和传播先进农业经验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农桑辑要》共分七卷，包括典训（前代典籍中关于农桑起源及农桑重要性的记载）、耕垦（耕种操作）、播种（谷类和纤维、油料作物）、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岁用杂事（农家日常生产生活的月计划）等。内容和《齐民要术》相比，除桑、蚕增加了大量材料外，新添了许多作物种类和栽培法。原有的野生植物，如茺蒿、百合、薄荷等成了栽培对象；原来在长江流域或长江以南的植物，如苧麻、茶、橙、橘、甘蔗等逐渐向华北平原扩展；尤其是木棉的输入和栽培，更值得注意，书中不仅介绍了关于木棉的种子和栽培技术，而且还记录了脱花去子和捻纺的加工技术。这些都说明了从公元六世纪到十三世纪末，我国植物栽培的进展情况；也反映了八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农桑辑要》也为我们研究古代农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这本书大部分材料都是从其他农书中辑出的。除《齐民要术》外，还有《务本新书》、《土农必用》、《四时类要》、《韩氏直说》、《种时直说》、《博闻录》、《蚕桑直说》、《农桑要指》、《岁时广记》等，这些书后来都已散失，《农桑辑要》在引用这些书时都注明出处，因而保存了其中的一部分。

《农桑辑要》在至元时刊行后，仁宗延祐年间又刊行于江浙行省，英宗、明宗、文宗也都申令颁布，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时刊行了一万部，可见此书影响很大。

《农桑辑要》还流传国外。我国近邻朝鲜就采用了《农桑辑要》中收谷种法、春夏两季种红花法。十五世纪初，朝鲜艺文馆大提学李行于《农桑辑要》内抽出养蚕方，自为经验，所收倍常，把方子刊版于世。后来朝鲜政府怕民间

不懂华语,又命议政府舍人郭存中将本国俚语逐节夹注,刻版广布。

王祯《农书》

王祯《农书》是我国农学史上的一部巨著。

王祯,字伯善,东平(今山东东平)人。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起,做过宣州旌德县尹(今安徽旌德),在任六年。大德四年(一三〇〇年)由旌德调任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县尹。在任旌德县尹时,王祯开始编写《农书》,到永丰县任职两年后脱稿,到了皇庆二年(一三一三年)又作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个别附记,并写了一个简短的自序。

元朝空前大统一的局面,为全国各地经济交流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全国各族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一部全面总结和指导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农书,是十分迫切的。王祯以前中国虽然有许多很有价值的农书,但历时已久或只适用于局部地区,如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南宋陈旉《农书》主要限于江浙一带,《农桑辑要》主要是北方地区。王祯《农书》则兼论南北,是我国第一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做系统研究的农书。

《农书》的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农桑通诀”,总论农业历史、耕垦、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以及植树、畜牧、蚕缂等;第二部分“百谷谱”,分别叙述各种农作物、菜蔬、瓜果、竹木等种植培养法;第三部分“农器图谱”是《农书》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绘出各种农具和农业机械图三百零六幅,又分二十门,每门冠以简要的论述,每门下又分若干项,每项又有一幅或几幅写生图,每幅图后都有一段文字说明,描写这项农器的构造、来源、演变及用法。

王祯《农书》是一部有独到见解的农书。首先书中贯穿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的思想。王祯认为,只要“不违农时”,适时播种,选择适宜于环境的作物,选择良种,及时施肥,改造土壤,兴修水利,是可以克服天灾而夺得丰收的;第二,注意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特别是改进农具的经验。

书中总结了十四世纪初在我国出现的大量新式农具,如耒锄、耘耩、牛转翻车等,对于提高当时的农业生产率是很有现实意义的;第三,注意推广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例如,木棉的种植在元初得到了推广,但有些地方虽然种植了,却因“不得其法”,收成不佳,于是有人以“风土不宜为说”,对能否推广表示怀疑,王祯则在《农书》中对木棉栽种法做了全面介绍,指出:“木棉为物,种植不夺于农时,滋培易为于人力,接续开花而成实,可谓不蚕而绵,不麻而布,又兼代毡毯之用,以补衣褐之费,可谓兼南北之利也”^①。又如,为了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他主张效法北方的“锄社”,他说:“北方村落之间,多结为锄社。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曰‘锄社’,甚可效也”^②。第四,王祯在《农书》中除了创造性地绘制了许多农具外,还把里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联成一体,把“农家月令”的要点,全部集中总结在一幅小小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中,既实用,又方便;第五《农书》不是一部纯技术的著作,它表露了作者对劳动人民具有一定的同情。王祯指出:“今夫在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思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甚者苛敛不已,脔削脂膏以肥己”^③;并揭露元朝官吏劝农措施的腐朽,这些劝农官实际上是“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劝人,……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④。他同情遭受剥削的山乡农民“力田……未免艰食,又复租税随之,良可悯也”^⑤。王祯之所以能知晓农民的疾苦,并能写出一部博古通今、综合南北、富有创造性的不朽著作来,主要是因为他能深入实际、接触群众、善于总结,否则他是决不会获得如此重大成就的。

① 王祯:《农书》卷一〇,《百谷谱》九,《木棉》。

② 王祯:《农书》卷三,《农桑通诀》三,《锄治篇》第七。

③ 王祯:《农书》卷四,《农桑通诀》四,《劝助篇》第一〇。

④ 同上。

⑤ 王祯:《农书》卷一一,《农器图谱》一,《因制门》《梯田》。

王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农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机械设计师和印刷技术的革新家。后汉杜诗制造的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的“水排”,到元代已经失传,王祯多方搜访,加以研究,并进一步加以改革,把古人用皮囊鼓风改用木扇(简单的风箱)鼓风,对提高冶炼技术有重大意义。

《农桑衣食撮要》

元代著名的三部农书之一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优秀的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写的。他以父鲁字为氏,名铁柱,明善为其字。这本书是他在安丰路(治今安徽寿县)任肃政廉访司官员时撰写的。元制,肃政廉访司兼劝农事,鲁明善利用他的工作条件,对江淮地区农业情况做了许多调查和了解,对以往的农书进行了研究,终于在至顺元年(一三一四年)使这本书正式出版了。

鲁明善的这本书与《齐民要术》、陈旉《农书》、《农桑辑要》等不同,它是直接继承崔寔的《四民月令》的体制,以农家的月计划为主体的。因为元世祖忽必烈所颁布的《农桑辑要》对于岁月杂事仅列为卷末一篇,《农桑衣食撮要》正好补其不足。该书共分十二月令,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准备,内容有不少是适合江淮、江南地区的,如四月“做笋干,卖新笋”,八月“取漆”,十二月“收鳊鱼”。作者还搜集了一些民间谚语,如:“移树无时,莫叫树知;多留宿土,记取南枝”,“十耕萝卜九耕麻”等,作为经验介绍给农户。由于鲁明善对于农村生活很熟悉,书中对收藏蔬菜、制作酱菜、饲养家畜家禽介绍很详细。全书文字通俗,简明扼要,讲求实际。因此,从内容到文字,这本书对一般小农(包括自耕农和佃户)特别有用。

四 水利学和水利技术

水利著作

元代的水利著作甚多。王祯、瞻思、欧阳玄、任仁发等都有专门论述,他们的著作反映了元朝时我国水利科学的进步。

王祯《农书》不仅是一部农学著作,也是一部水利科学著作。王祯认为,

我国水利资源十分丰富，“海内江淮河汉之外，复有名水万数，枝分派别，大难悉数，内而京师，外而列郡，至于边境，脉络相通。”这些水利资源“俱可利泽，或通为沟渠，或蓄为陂塘，以资灌溉”^①。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对农业、对国家都是极为有利的，“灌溉之事，为农务之大本，国家之远利”^②。怎样充分利用水利资源？王祯在《农书》中对当时江南的农田水利的灌溉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自流灌溉（水源高于耕地），以修陂塘蓄水为主；一类是机械灌溉（水源低于耕地），用翻车、筒轮、戽斗、水车等机械，或用打井等解决。另外，《农书》对圩田、围田等也有介绍。

回回人瞻思，字得之，其祖先自中亚来中国，祖父鲁坤东迁青州（今陕西府谷北），后徙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瞻思自幼“博极群籍”，不仅钻研经学、文史，而且精通水利、天文、地理、算数等。他把宋人沈立的《河防通议》和金朝都水监的《河防通议》两本书“合之为一，削去冗长，考订舛讹，省其门，析其类，使粗有条贯，以便观览，而资实用”^③。至正年间，黄河决堤，曾诏他参加议论治河的方案。瞻思的著作，还有不少地理方面的，见于书目的有《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西国图经》等。

元朝统治者由于对太湖水利“废而不治”，造成“浙西河港、围岸、闸窦，无官整治，遂致废坏，一遇水旱，小则小害，大则大害”^④的局面。对此，松江（今上海松江）人任仁发曾著《浙西水利议答录》上奏朝廷，对吴淞江淤塞原因及浙西治水方法提出自己的见解。文中提出了“浚河港必深阔，筑围岸必高厚，置闸窦必多广”的治水之法。值得注意的是，任仁发大胆地批评了朝廷治河不力，他说：“今朝廷废而不治者，盖募夫供役，取办于富户，部夫督役，责成于有司，二者皆非其所乐。所以猾吏豪民搆扇，必欲沮坏而后已。朝廷未见日后

① 王祯：《农书》卷三，《农桑通诀》三，《灌溉篇》第九。

② 同上。

③ 瞻思：《河防通议序》，《河防通议》卷首。

④ 任仁发：《浙西水利议答录》。

之利,但厌目前之忧,是以成事则难,坏事则易”^①。继任仁发之后,海宁(今浙江海宁)人周文英,也著了《论三吴水利》一文,他提出“掣淤入洄”之说,以解决浙西农田遇涝问题。后来张士诚据吴,得其说,遂浚白茅、盐铁诸塘。

东明(今山东东明)人李好文,至正年间出任陕西行台治书,后著《长安图志》三卷。文中提出了泾渠灌溉用水管理和分配的原则,即以渠水所能灌田的多少为总数,分配到每年参加维修渠道的丁夫户田,为做到分配合理,文中提出了初步的流量概念:“水头深广方一尺谓之一激。假定渠道上广一丈四尺,下广一丈,上下相折则为一丈二尺,水深一丈,计积一百二十激”^②。由此可见,“水头”即过水断面面积,“水激”即计量单位,指一平方尺的过水断面。再与时间相联系,即为流量。

《至正河防记》是欧阳玄总结元末贾鲁治河经验与过程的水利著作,对贾鲁用疏、浚、塞三法结合运用,取得治河成功,作了积极的阐述。贾鲁治河的具体情况详见下文。

水利技术

元代大小不等的水利工程很多,但规模最大、影响深远以及水利技术运用最成功的当推开凿大运河和治河工程。

元代通航的自大都至杭州的大运河,大部分是利用和改造了元代以前各代相继沟通的运河段,元代凿通的是济州河、会通河和通惠河三段,其开凿情况本书第五章已有所述,这里主要阐述开凿会通河、通惠河的技术成就。

会通、通惠两段运河虽然只占整个大运河的十分之一强,但由于地形复杂,工程十分艰巨。会通河地处今山东境内的临清、东平之间,两端低、中间高,形成了中间一段越岭的河道,再加上引用汶水水源处理不当,造成岸窄水浅,使通航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通惠河的水源来自昌平白浮泉,迂回曲折,以拦

① 任仁发:《浙西水利议答录》。

② 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下。

截各处山泉,又可使河床较平缓,但自大都至通州,由于地貌变化造成有较大的水位落差。为了解决会通、通惠两河船只上下陂通航的困难问题,运河的修凿者利用宋代复式船闸技术,发展为梯级船闸,解决了通航的困难。

会通河共长二百五十里,造船闸十三座,从临清至聊城闸距为一五八里,自聊城至荆门南闸,闸距不足十里。船闸一般高一丈一尺。船闸建筑具有很高的水平,每座船闸都动用大批人力、物力,如重建济州会源闸就用石工一百六十人,木工十人,金工土工各五人,杂工一千四百二十人,用大木料一万余根,大块石五千余块,铁二万斤,石灰三百多万斤^①。通惠河的船闸是著名天文学家、水利家郭守敬设计制造的,共有船闸十座。此外,安山至济州有闸四座,济州至沛县又陆续修筑了十四座。这些船闸的修建,通过闸的启闭,起了调整两闸中间部分水位的作用,保证了该段运河的基本通航条件,同时,又为开辟越岭运道提供了经验,对人工运河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元代另一次大的水利工程就是贾鲁治河。黄河自金章宗明昌五年(一一九四年)夺淮后,使黄淮沿岸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元代黄河决溢十分频繁,达二百余次。至正四年(一三四四年)黄河又一次决溢改道,白茅决口,黄河北徙。当时担任都水监的贾鲁,“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溢,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②。到至正九年脱脱复相后,朝廷采纳其后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庐州戍军二万修河,四月开工,七月凿河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通航,十一月诸埽堤筑成,河复故道,东汇于淮,工毕。

据《至正河防记》,贾鲁治河自四月二十二日开工,至十一月十一日合龙,前后计一百七十天左右,动用人力近二十万,合计用工约三千八百万,疏浚河

^① 揭傒斯:《重修济州会源闸记》,《揭文安公全集》卷一二。

^② 《元史》卷一八七,《贾鲁传》。

道二百八十多里,堵塞大小决口一百〇七处,总长达3里多,修筑堤防上自曹县下至徐州,计七百七十里。工程之大,是我国治河史所罕见的。贾鲁之所以取得成功,这是与他经过实地考察后产生的正确方案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疏、浚、塞并举,先疏后塞,然后挽河东行,使复故道。所谓疏、浚,就是把淤塞的故道疏通;所谓塞,就是把白茅决口堵塞住;先疏后塞,就是先把工程最大的疏浚故道用土工做掉,避免灌水后成为水下作业。疏浚工程完成后,贾鲁创造了石船堤障水法:用大船二十七艘组成三道船堤,每堤九艘,用铁锚固定船身,并使三船堤连为一体,船腹略铺散草,装满石子,同时下沉,船堤上再加草埽三道。在堵塞合龙时,因水势过大,冲撼埽基,情况十分危急。贾鲁神色不动,指挥十余万民工奋力搏斗,终于于十一月十一日合龙,所决北河逐渐绝流,故道复通,治河取得了成功。

五 医药学和营养学

医药学

元代的医药学,无论在中国传统医学学说的发展上,医院的组织规模上、吸取阿拉伯医学成果上都是有成绩的。

我国医学史上有金元四大家之说。刘完素用药主寒凉,张从正主攻伐,李杲主补土,朱震亨主养阴。刘、张系金代人,李杲主要活动在蒙古国时期,朱震亨是元代人。元代其他著名的医学家还有危亦林、滑寿、葛可久、王好古、许国桢等人。

在内科方面,对伤寒的研究成绩最为卓著。李杲(约一一八〇至一二五一年),字明之,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尤长于医治伤寒、痢疽、眼目病。他幼年就学于金代名医张元素(字洁古),主张古方不能治今病之说,用药多有创新。有病员肖君端,二月中患伤寒发热,医生以白虎汤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证不复见,脉沉细,小便不禁。李杲诊断后,认为:“此立夏前误用白虎汤之过。白虎汤大寒,非行经之药,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则伤寒本病隐曲于经络

之间。或更以大热之药救之，以苦阴邪，则他证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药之升阳行经者，吾用之。”^①果然病愈。著作有《伤寒会要》（已佚）、《脾胃论》等。王好古所撰《此事难知》，记有李杲《伤寒会要》的梗概。朱震亨（一二八一至一三五八年），字彦修，学者尊为丹溪翁，婺之义乌（今浙江义乌）人，从刘完素门徒罗知悌学医。认为“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主张“推陈致新”^②，治疗以养阴为主。精于伤寒、肺癆、妇等科。著有《格致全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等书。其中《局方发挥》，力辟“局方”湿燥之弊：“《本草衍义补遗》对本草学做出了新的贡献。朱震亨还研制了越鞠丸、太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剂，至今仍为中医常用药方。葛乾孙（一三〇五至一三五二年），字可久，平江人，精于医治肺癆，著《十药神书》，有止血、止咳祛痰等十种验方，对治劳损吐血颇有功效。回回人萨德弥实，字谦斋，泰定年间曾任建昌州（治今江西永修西北）知州。在职期间，他收集考订名医药方，著《瑞竹堂经验方》十五卷，“以惠斯世”^③。

在外科方面，著名的外科医生危亦林（一二七七至一三四七年）在麻醉和骨折复位手术上有很大贡献。危亦林，字达斋，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他集五代祖传医方，著《世医得效方》十九卷。其中关于麻醉药物的使用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全身麻醉的记载，所用麻药草乌散等，是以洋金花（曼陀罗花）、乌头等药为主配成的。他在治疗骨折、脱臼，特别是脊柱骨折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悬吊复位法和运大桑树皮固定等方法，与现代的整复手术和石膏固定法，基本原理是一致的。齐德之的《外科精义》，综合了当时三十多家外科著作的成就，反映了元代中医外科方面的成就。

在针灸学方面，则以滑寿最著名。滑寿，字伯仁，号樱宁生，祖籍襄城（今

① 《元史》卷二〇三，《李杲传》。

② 戴良：《丹溪翁传》，《九灵山房集》卷一〇。

③ 王都中：《瑞竹堂经验方序》，《瑞竹堂经验方》卷首。

河南襄城),曾就学于东平高洞阳。著《十四经发挥》三卷,对十四经穴循行部位、所主病症和奇经八脉均作了专题论述。

元代回回的医药术是很受人们欢迎的。太医院广惠司专管回回药物,大都和上都专门设置过回回药物院,并译出《回回药方》等医药专书,以推广回回医术。回回人聂只儿、畏兀儿人答里麻,曾在回回药院里任过职的,畏兀儿人贯云石、回回人丁鹤年曾在民间行过医。回回医术在外科和药物上都有显著疗效的记载:如大都有一病儿患头疼,不可忍,“有回回医官,用刀划开额上,取一小蟹,坚硬如石,尚能活动,顷焉方死,疼亦遏止。”平江阊门,有一过客“马腹膨胀倒地,店中偶有老回回见之,于左腿内割取小块出,不知何物,其马随起,即骑而去”^①。又如有一种名为“火失刺把都”的回回药,据说可治一百二十种病^②。

随着医学的发展,元代医学分科比前代更细,计有十三科:大方脉科、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③。而金代只分十科。

营养学

回回人忽思慧自延祐中任钦膳太医,天历三年(一三三〇年)编成《饮膳正要》一书。该书对饮食卫生、育婴妊娠、食品营养、疾病治疗、植物品种等很有研究,如饮食卫生方面,他主张“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盖饱中饥,饥中饱;饱则伤肺,饥则伤气;若食饱不得便卧,即生百病”^④。是很符合科学道理的。食品营养方面也很讲究,他吸收了汉、蒙、回回、女真等族人民的饮食经验,总结出了许多菜谱。书中还介绍了许多植物品种,对于我们了解元代植物栽培情况和来自中亚、西域的植物品种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二,《西域奇术》。

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七,《火失刺把都》。

③ 陶宗仪:《辍耕录》卷一五,《医科》。

④ 忽思慧:《饮膳正要》卷一,《养生避忌》。

种在中国传布情况很有帮助,如香料“马思答吉”(乳香)在中国书本上还是第一次提到。所以,《饮膳正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植物学、营养学、饮食史,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六 工程技术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古代中国曾发明了火药、印刷、造纸、指南针等对世界文明有极大影响的科学技术。这些科学技术在元代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在其他科学技术上,元代也有新的技术创造。

印刷术

自从隋唐时期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后,到北宋时平民毕升又发明了活字印刷。元代则在这个基础上,由著名农学家王祜创造了木活字和发明了转轮排字法。

毕升所创活字,是用胶泥刻字烧硬后印刷的,元代又有用铸锡做字,这两种办法“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为了克服上述缺点,王祜用木活字代替。其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镏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楔楔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①在刻字之前,先按韵分类写在纸上,然后糊于板上再刻。之、手、者、也及数目字等常用字则分一类,便于挑拣。印墨用棕刷顺界行竖刷,不可横刷。他用这种办法在旌德县首先试行,花了两年时间刻制活字,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使一部六万字的《旌德县志》印出了一百部,其效果“一如刊版”^②。

为了减轻排字工人的劳动强度,王祜还发明了转轮拣字法。用轻质木料做成类似圆桌面的大轮盘,直径七尺左右,轮轴高三尺左右,活字按韵依次编

① 王祜:《农书》卷二二,《造活字印书法》。

② 同上。

好号码,另一轮盘则放常用字。再备两本册子,依照轮盘上的活字韵法号码次序登录。排版时一人执韵法号码叫号,另一人坐在两个架轮盘之间,依号码拣出活字,放进盔盘。排字工人“左右俱可推转摘字”,如字韵内无字,则随即由刻字工人补刻添补。王祜说:“以人寻字则难,以字就人则易”^①。因而大大提高了工效,又大大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

王祜创造的木活字和轮盘法虽然今天都已淘汰了,但却是印刷史上的重大革新。

火炮技术

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就已经发明了火药。火炮技术的改进不仅是兵器技术的进步,也是人们对火药性质认识不断提高的标志。

火药是一种威力很大的杀伤武器。宋代时,中国已有了抛石机,即运用杠杆原理将火药包抛射出去;还有用竹筒装火药和子窠的突火枪,这是管形火器的开始。到了元代,这种形式的火器都有了发展。西域人亦思马因所献的“回回炮”,其原理与抛石机相同,不过威力更大;而火铳的发明,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金属管火炮。

回回炮在襄樊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后,忽必烈更加重视火炮技术的改进。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括两淮造回回炮新附军匠六百,及蒙古、回回、汉人、新附人能造炮者,俱至京师”^②。这些造炮工匠都是来自南北各地和各民族的能工巧匠,终于研制成功火铳这种新式武器。

火铳的原理与突火枪的原理是一致的,不过火铳是用金属做筒,射程远,火力猛,使之能承受更大的气压。竹筒是用火药放进筒内,点燃后将火药喷射出去;火铳则把火药做成弹丸,利用气压把它射向远方,因此,威力极大。现存世界上最早的两尊火铳,一尊是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所造,铜质,铳口直径

^① 王祜:《农书》卷二二,《造活字印书法》。

^② 《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

10.5厘米,銃身较粗,可以发射大型炮弹,适合于攻城破坚;另一尊是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年)所造,銃身長43.5厘米,銃口直径3厘米,这是一种远程炮,用的弹丸较小。这两尊铜火銃制作精细,冶铸要求高,用途各不相同,所用弹丸有大有小,说明当时已能根据不同需要制作不同型号的火銃,也能根据不同的要求配制大小不等的弹丸。

火銃发明后,元朝官手工业局制造很多,而且很快用于实战。至正二十四年(一三六四年)达理麻识理为抵御孛罗帖木儿进攻大都,将“火銃什伍相联,一旦布列铁旛竿山下”^①,对敌军威胁很大。

造船术和航海术

元代的海外交通十分发达,这是与当时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分不开的。

元代的海船极大,时人说:“尝观富人之船,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檣,长年顿指南车坐浮皮上,百夫建鼓番休整如官府令。拖碇必良,綉纜必精,载必异国绝产”^②。这种十丈之竿、八翼之檣的船在宋代已很普遍,估计载重有120吨左右。但元代已有能载千余引盐的海船,则载重可达300吨。一九七五年在韩国木浦附近海底发现的元代海船有一支四尖叉的锚,长七英尺半,重七百磅,船长约95英尺,宽25英尺,全船分为十二间船舱,载重达四五百吨。马可波罗返国时所乘的中国海船,是用松木制造的,船室有五六十个;每船分隔成十余舱,互以厚板隔之,船身损坏时不致沉船;有一舵,二至四根桅,无风时用檣,檣极大,用四人操作。船上有水手二百人。另有二小船系大船之后,每小船有船夫四五十人。其制作方法,马可波罗说:船用好铁钉结合,船底另加二层厚板,用一种特殊材料粘合,然后用麻及桐油掺合涂壁,绝不透水。这种船舶每年修理一次,加厚板一层,直至加到六层厚时为止^③。海船两旁用大

① 《元史》卷一四五,《达礼麻识理传》。

② 任士林:《送叶伯几序》,《松乡先生文集》卷四。

③ 《马可波罗行纪》第三卷第一五七章。

竹帮夹,以保持航行时稳定。船上有大铁锚,重数百斤,下有四爪。船型主要有平底和尖底两种。平底船能坐滩,不怕搁浅,稳定性大,比较安全,吃水浅,阻力小,装载量大。尖底船多用作战舰。

元代的航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航海天文、航海气象和指南针的运用都超过了前代。马可波罗回国时乘坐的中国海船就有北极星高度的记录^①,可见当时中国水手已掌握了牵星术。牵星术是用观测星的高度来定地理纬度,以掌握航线。这种方法,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已广泛使用,“往返牵星为记”。在航海气象方面,中国水手熟练地掌握了海上季风(信风)规律,去东南亚、南亚及以远地区,“遇冬汛北风发舶,次年夏汛南风回帆”^②。去高丽、日本则正好相反。指南针运用于海船始于宋,元代更加普遍,而且越来越体会到它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是“人之命脉所系”^③。元代指南针的名称很多,有“行丁未针”、“行坤申针”、“子午针”等^④。海船上的舵师和梢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航海知识,“万里海洋,渺无际涯,阴晴风雨,出于不测,惟凭针路定向行船,仰观天象,以卜明晦^⑤”。他们把航海气象知识和指南针的运用结合在一起,安全地行驶在茫茫大海里。有的船工们还把自己的航海知识编成歌诀,如关于潮汐的:“前日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是下岸,潮汐不曾差今古,次月初十是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还逢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环尔”;关于行船的:“迟了一潮搭一汛,挫了一线隔一山;十月滩头坐,一日过九滩”^⑥。

总之,元代的造船术和航海术大大超过了前代,因而汪大渊等航海家借以

① 《马可波罗行纪》第三卷第一六五章:小爪哇岛“偏在南方,北极星不复可见”。

② 《通制条格》卷一八,《关市》《市舶》。

③ 汪大渊:《岛夷志略》。

④ 见《真腊风土记》等。

⑤ 《经世大典》,见《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〇。

⑥ 同上。

远航亚洲各地和非洲东海岸就不是偶然的了。元亡后仅仅过了三十多年,明代航海家郑和等就开始了七次下“西洋”的壮举,这是与他们继承和改进元代的造船术、航海术分不开的。

第十章

元朝的对外关系

第一节 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的关系

一 元朝与钦察汗国的关系

在元朝的文献中,常把钦察汗国的朮赤后王、伊利汗国的旭烈兀后王以及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统称为“西北诸王”。他们在名义上承认元朝皇帝的“大汗”地位,算是元朝的“宗藩之国”^①,但实际上是各自独立的。这些“汗国”与元朝的关系有亲有疏。大体上说,伊利汗与元朝皇帝同是拖雷后裔,关系最为密切;朮赤后王封地最远,早已有独立化的趋向,又曾长期被海都的割据势力所阻,与元朝的关系也就比较疏远了^②。

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各自召集忽里台,宣布即大汗位,随后双方进行了四年之久的争位战争。阿里不哥派使者四出,宣称他的即位得到了旭烈兀和钦察汗国别儿哥汗以及其他诸王的赞成^③。从已发现的钦察汗国钱币上铸有阿里不哥之名看来,别儿哥确曾是承认了阿里不哥为大汗的,但他对这次争位却表现了冷漠的态度,并没有积极支持阿里不哥,只是派使者到双方

^① 《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

^② 钦察汗国东部(额尔齐斯河与乌拉尔山之间)为斡鲁答封地,海都曾占领该地区的一部分,详见下文。

^③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六〇至一六一。

劝和^①。不久后,他就忙于和旭烈兀开战(一二六二年)。一二六四年阿里不哥投降后,忽必烈曾遣使请别儿哥来开会商议处置办法,并表示决定赦免阿里不哥。别儿哥答复同意赦免,并决定要来参加忽必烈召集的忽里勒台,但其实终于没有来^②。此后,本来早已自主一方的朮赤后王,就更加不受大汗的指挥了。

一二六六年别儿哥死,拔都之孙忙哥帖木儿嗣位(一二六六至一二八二年),得到忽必烈的正式册封^③。这时因海都不从命,忽必烈多次派遣铁连出使钦察汗国,商议一致的对策。据铁连回来报告,忙哥帖木儿曾表示:“祖宗有训:叛者人得诛之。如通好不从,举师以行天罚,我即外应掩袭,剿绝不难矣”^④。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出兵进攻海都^⑤。窝阔台系与朮赤系本来关系不好,但海都狡黠多谋,为了扩张势力,极力与朮赤家族结好,竟得到他们的帮助占领了一些本不属于他的地盘^⑥。一二六八年,因察合台后王八剌进犯朮赤封地,忙哥帖木儿又与海都联合起来攻打八剌^⑦。一二七六年昔里吉叛乱,把忽必烈派去守卫西北境的那木罕太子抓走,送到忙哥帖木儿处拘留,忙哥帖木儿不但没有出兵帮助忽必烈平叛,相反却将那木罕拘留起来。一二八二年忙哥帖木儿死,脱脱蒙哥嗣位,始将那木罕放还^⑧,并表示服从大汗,愿意来赴朝会。然而其后并未来朝^⑨。

朮赤后王脱脱在位期间(一二九〇至一三一二),钦察汗国与元朝的冷

①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六二。

②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六七至一六八。

③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六八。

④ 《元史》卷一三四,《铁连传》。

⑤ 多桑《蒙古史》引瓦萨夫书云,忙哥帖木儿曾于一二六八年出兵攻海都,后复与之和(冯承钧译本下册,第五卷,一九三六年版,页七)。而《史集》未载此事。

⑥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三。

⑦ 《史集》俄译本第三卷,页七〇。

⑧ 据《元史·世祖纪》,那木罕于至元一二八四年三月到达大都。

⑨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七一。

淡关系起了变化,原因是这时海都和朮赤后王产生了矛盾。朮赤封地东部原和大汗属境相接,海都强大起来后,唯恐朮赤后王与忽必烈联合,派兵占领了元朝西北境的一些地方,将他们隔断。直接和海都统治区接界的是朮赤长子斡鲁答(白帐汗)的封地。这时斡鲁答后王伯颜与庶弟古亦鲁克内争,海都、笃哇支持古亦鲁克,乘机占去了伯颜的一部分地方。伯颜一方面向脱脱求援,一方面派遣使者约请元成宗和伊利汗合赞出兵从东西两方面夹攻海都,脱脱派遣使者请海都、笃哇归还占地并仍让伯颜管理他的兀鲁思,但未被理睬。于是一三〇二年,脱脱、伯颜出兵二万,与元成宗的军队联合进攻笃哇、察八儿^①。《元史·牙忽都传》载:“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年),察八儿来归,宗亲皆会。牙忽都进曰:……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顾惟宗室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齐天,拔都罕之裔首已附顺,叛王察八儿举族来归,人民境土,悉为一家。……”所谓“拔都罕之裔(按即钦察汗脱脱)首已附顺”,当是指这件事。一三〇三年(大德七年),笃哇、察八儿遣使向元成宗求和,元成宗将此事通告诸藩国。据伊利汗合儿班答一三〇五年写给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信中说,大汗与西北诸王约和之后,“东起南家之国,西抵塔刺之湖,我辈之民族皆联合为一,道路复通”^②。延续了四十多年的蒙古贵族内部的战乱,至此告一段落。元朝与钦察汗国的交往,曾长期受战争影响,陷于时断时续状态,这时得到了恢复。

一三〇八年(至大元年),元武宗遣月鲁等出使钦察汗国,册封脱脱为“宁肃王”^③。一三一二年脱脱死,其子月即别嗣位。一三一四年(延祐元年),元仁宗按例遣使册封,予以承认^④。此后双方使节经常往来。一三三六年(元顺帝至元二年),月即别遣使请求领取分地岁赐以赉给军站,次年,元朝政府专

①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六七至六八,页二一二。

② 雷慕沙:《基督教国诸王与波斯成吉思汗族诸王外交纪事》第二篇附有此信影印件。此据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七卷,页四一。

③ 据《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卷一〇七,《诸王表》。

④ 《元史》卷二五,《仁宗纪》。

门设立了一个总管府,掌管朮赤后王的平阳等处分地岁赐,每年按额发给^①。

尽管钦察汗国和元朝的关系不如伊利汗国那样密切,但终究是“宗藩之国”,因而这个时期中国与钦察汗国统治地区——钦察草原、不里阿耳和斡罗思等地的经济上、文化上的联系,是历史上其他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早在窝阔台时期,就设置和林到拔都营帐的正式驿路。元朝建立后,这条驿路又从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通到大都。考古工作者在钦察汗国境内发现的八思巴字银牌^②说明,当时只要持有元朝政府发给的牌子(金、银符),就可以在这条路上乘驿往来。据当时往来中国的欧洲商人记载,从钦察汗国的塔纳(Tana,今罗斯托夫南,顿河河口南岸)有商路通到中国甘州、杭州等地。这条路虽然艰难,但对旅人和商贩来说是有安全保障的^③。十四世纪上半叶,塔纳城的商业相继操纵在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手中,许多欧洲商人从这里出发,经过钦察汗国境,来到中国进行贸易。

钦察汗国的许多城市——克里木半岛的速答黑、亚速海边的塔纳、拔都萨莱(今阿斯特拉罕附近)、别儿哥萨莱(今伏尔加格勒附近)和花刺子模的玉龙杰赤等,都在当时的交通线上。特别是从月即别汗时期(一三一二至一三四年)起成为钦察汗国都城的别儿哥萨莱,更是沟通中西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国际性”都市。据十四世纪阿拉伯历史家乌马里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记载,在这个城市里居住着大量从各国来的商人。欧洲商人用不着亲自到中国去,就能在这里买到中国的丝织品^④。这说明元代从中国输入钦察汗国的商品是大量的。考古工作者在钦察汗国各地发现了许多中国产品。如萨拉托夫附近乌维克村找到的中国式丝织对襟衫,别儿哥萨莱发掘出来的有

① 《元史》卷一一七,《朮赤传》。按,其岁赐额,本传为平阳、晋州、永州三处共二千四百锭,然据《食货志》,则二千四百锭仅为永州一地的江南户钞。

② 格列柯夫·雅库鲍夫斯基:《金帐汗国及其灭亡》图版二三。

③ 帕哥罗提:《通商指南》,见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二九二。

④ 《金帐汗国及其灭亡》,页一五一。

汉字铭文的铜镜^①等等,证明了阿拉伯作者的上述记载。

还有许多中国手工业者来到钦察汗国定居,并继续从事他们原来的行业。最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铜镜业。萨莱和钦察汗国其他城市发现的元代铜镜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从中国输入的(如有汉字铭文的),另一类则是本地生产的(如有阿拉伯字铭文的)^②。来自中国的手工业者带来了铸造铜镜的技术。

在蒙古西征中,有很多钦察人、阿速人归附或被俘,他们被带到中国,为蒙古贵族牧马、捋马乳,或充当兵卒。其中少数人起家行伍,爬上统治阶层,成为元朝统治者镇压各族人民的工具,在元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长期定居中原的钦察、阿速人,后来逐渐接受汉族文化,与汉族融为一体了。另有一部分则与蒙古族融合在一起。

元代,还有许多斡罗思人迁至蒙古高原和中原各地,他们中有的充当工匠、军兵,有的被抑为奴。至顺元年(一三三〇年),元政府下令将这些斡罗思人收聚起来,有一万人之多,组织了一个宣忠扈卫亲军万户府,在大都附近拨地一百顷,让他们屯田^③。这样大量的欧洲人移居中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二 元朝与伊利汗国的关系

一二六〇年五月,当旭烈兀正在叙利亚境内作战时,蒙古朝廷派遣以失黑秃儿那颜为首的使者来到军前,报告了蒙哥死去的消息。旭烈兀将军事委托给大将,启程东返^④。这时,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已各自宣布即大汗位,双方都声称得到旭烈兀的拥护。而海屯《东方史》则说,旭烈兀似乎本想回去争位,到达桃里寺时,听到忽必烈已经即位,就不再继续东行了^⑤。“争位”的说法仅

① 《金帐汗国及其灭亡》,页一七三至一七四。

② 《金帐汗国及其灭亡》,页一七四;图版三三至三四。

③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卷三四,《文宗本纪》。

④ 《史集》俄译本第三卷,页五〇。

⑤ 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本下册第四卷,页一一六。

是海屯的推测,《史集》没有记载。从当时的形势看,大汗虽然仍被视为大蒙古国的最高统治者,但各封国已逐渐走向独立化,旭烈兀这时已占有整个伊朗、伊拉克等地,正如忽必烈的谋臣郝经所说:“其势足以自帝一方”^①,无须东来争夺汗位了。因此,尽管阿里不哥和忽必烈都不断遣使请他参加忽里台商议汗位谁属的大事,他却始终没有来,而是忙于巩固其在伊朗等地的统治。一二六二年起,他与钦察汗国别儿哥汗为了争夺地盘发生战争,就更不把参加徒具形式的例行忽里台一事放在心上了。

忽必烈看到了这种形势,派使臣向旭烈兀宣布:“自只浑河(即阿母河)岸至密昔儿(Misir,即埃及)之边,诸蒙古军并大食国土,由汝,旭烈兀,仰赖吾等祖父之荣名以主之;自按台山之西以迄只浑河,其兀鲁思暨诸部族,则属阿鲁忽掌管;按台山之东直抵大洋之滨,我自守之”^②,承认了旭烈兀对其所占领地区有自主的统治权。这就使忽必烈在争位战争中得到了旭烈兀的支持。旭烈兀命其长子要不忽儿离开阿里不哥去伊朗,并遣使责备阿里不哥,劝他服从忽必烈。一二六四年(至元元年),阿里不哥投降,忽必烈再一次遣使征询旭烈兀关于应该如何处置阿里不哥等叛王的意见,同时正式命他为从阿母河(即只浑河)直至叙利亚和密昔儿之境的国王^③。旭烈兀立即派遣使臣来中国,表示完全赞同忽必烈关于处死从叛诸将而赦免阿里不哥的处置办法,并愿与别儿哥等诸王一起前来出席忽里台^④。由于不久后他就死了,终于没有能实现来朝会的诺言。此后,元朝和各汗国都各自走着独立发展的道路,元朝皇帝虽然仍拥有“大汗”的名号,却不再召集各汗国的藩王来参加忽里台了。

① 郝经:《复与宋国相论本朝兵乱书》,《陵川集》卷三八。

②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六二。按拉施都丁未记此次遣使年月,但系于忽必烈自和林回军之后,昔木土之战以前。考《元史·世祖纪》,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九月,“以阿里不哥违命,下诏谕中外”,疑遣使即在此时。

③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六六,第三卷,页六〇。

④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一六七至一六八。《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谓伯颜系“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而为世祖所留。当即是此次使团成员之一。

旭烈兀自称“伊利汗”(Il-qan),他的继承者仍袭用这个称号^①。伊利汗国和元朝的关系一直是和好、密切的。在西北三汗国中,以伊利汗国最尊重大汗的权威。旭烈兀以后的各代伊利汗即位,都以得到元朝皇帝的册封才算合法。一二六五年旭烈兀死后,诸王、大臣奉其子阿八哈嗣位,阿八哈以没有得到忽必烈的册命,还不敢正式就位,直到一二七〇年忽必烈派使者来到伊朗,传旨命他继承父位,这才遵旨重新举行了登基大典^②。中统二年,忽必烈特置管领随路打捕鹰房总管府,专掌拨赐给旭烈兀位下的中原户计。至元十二年,阿八哈遣使奏请将这些民户献给朝廷^③。一二八二年阿八哈死,弟帖古迭儿即位,称阿合马汗。阿八哈之子阿鲁浑不服,起兵争位,其亲信大臣不花宣言:“大汗系四海万民之主及成吉思汗家族之长兄。皇弟旭烈兀汗薨时,大汗已将伊朗诸地之王位授予其长子、睿智至善之阿八哈汗。阿八哈汗死,王位自应属其子——合法之嗣君阿鲁浑”^④。一二八四年阿鲁浑推翻阿合马,夺得汗位。一二八六年二月,忽必烈所遣使者斡儿都海牙奉册至伊朗,命阿鲁浑为伊朗等地诸蒙古及大食民众之主,并授不花以丞相称号,于是阿鲁浑也按照惯例举行了正式的即位典礼^⑤。现存阿八哈汗于兔儿年(一二六七年或一二七九年)发的敕令文件上,盖有方形汉字篆书“辅国安民之宝”的印。还有一件一二八九年阿鲁浑汗给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的信,开头写“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阿鲁浑谕法朗国王”。信中凡长生天及大汗名字都抬头写,这大概是当

① Il,突厥语,意思是“臣属”、“服从”,唐代音译为“伊利”。近人多译为“伊儿”,以儿译-l,不合元代译音用字规律。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三卷,页六六至六七;八六。

③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

④ 《史集》俄译本第三卷,页一一〇。

⑤ 《史集》俄译本第三卷,页一一六。按《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年)十一月,“命塔察儿、忽难使阿儿浑”。使臣名字与《史集》记载不合。又塔察儿等十一月始奉命出使。而册立阿鲁浑的使臣则早在二月就到达伊朗,时间也不合。当是另一次使团。

时伊利汗所颁公文的通常格式。这封信上也盖着“辅国安民之宝”的印。这当是忽必烈颁发给伊利汗的专用印章。

一二九一年阿鲁浑死,弟海合都即位,他取了一个刺麻教名:亦怜真·朵儿只(藏语“大宝金刚”的意思)。一二九五年四月,权臣谋杀海合都,奉诸王拜都(旭烈兀庶子塔刺海之子)为汗。阿鲁浑之子合赞以追究谋杀海合都之叛臣的名义起兵争位,于同年十月杀拜都,遂以阿鲁浑嫡子、合法继承者的身份即伊利汗位。合赞为了取得当地封建主和伊斯兰教徒的支持,宣布他自己以及伊利汗国境内的蒙古人都改信伊斯兰教,并给自己取了马哈麻(Mahmed)的名字。实际上这只是大力利用伊斯兰教作为统治当地人民的工具,并没有改变伊利汗国和元朝的密切关系。他的即位以及改信事,都得到了元成宗铁穆耳的承认和赞成^①。一二九六年(元贞二年)成宗遣拜住出使伊利汗国,被合赞留在身边服务,后来又派他回元朝奏事^②。一二九八年,合赞遣使来元朝,献大珠、宝石、文豹等珍物,成宗即将旭烈兀位下历年应得岁赐发给合赞,派员送使者回国。现存一三〇二年合赞汗给法国国王的信中,钤用另一印章,印文为汉字“王府定国理民之宝”,无疑也是元朝皇帝颁赐给伊利汗王府之印。一三〇四年(大德八年),元成宗又特置管领本投下大都等路打捕鹰房诸色人匠都总管府,掌合赞大王位下事,其官属都由合赞自命,后来元朝精简机构,废除了许多官府,但照顾到伊利汗“远镇一隅”,在朝廷没有其他代表这一支利益的机构,因此这个总管府“存而不废”^③。

这一年,笃哇、察八儿遣使向元成宗求和,历时四十余年的宗室内争暂告结束,成宗将此事诏告诸汗国。元朝使者到达伊利汗国时,合赞已死,其弟合儿班答即位(一三〇四至一三一七年在位,号完者都算端)。合儿班答在一三

① 《史集》俄译本第二卷,页二〇九。

② 袁楠:《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③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

○五年写给法王腓力四世的信中宣告,成吉思汗诸后裔今已和好,从中国至伊利汗国已联合为一家,东西道路复通了。这封信上还盖着汉字篆书“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印,此印可能是元成宗颁发给伊利汗合儿班答的一颗印章。当然,各汗国仍然是独立的,但海都割据时期的大规模战乱终于停止,这对元朝与伊利汗国的关系以及东西交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一三〇八年(至大元年),元武宗遣脱里不花等二十人出使伊利汗国^①;一三一三年(皇庆二年),元仁宗再次派拜住去合儿班答处议事^②。合儿班答也派遣使臣来元朝进贡方物。在伊利汗不赛因时期(一三一七至一三三五年),双方使节往来更加频繁。一三二四年(泰定元年)泰定帝遣称海屯田万户府达鲁花赤帖陈、近侍忽都帖木儿出使伊利汗国,当是宣告即位事^③。同年,不赛因遣使朝贺,并为其权臣出班请官,泰定帝即派使臣去伊朗,授出班以“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的头衔,赐银印、金符。这是继不花之后第二次由元朝皇帝直接给伊利汗国大臣授官。不花和出班都有拥立之功,而且掌握着伊利汗国的大权。不赛因不断地派使臣到中国来“朝贡”,有时一年中达到五次之多^④,献珠、玉、药物、马驼虎豹等,从元朝领取大量的回赐,实际上带有贸易的性质了。其间不免有官员、商人假冒不赛因之名到中国做生意,从贡赐中谋取利益^⑤。

元朝与伊利汗国密切的政治关系,为这个时期中国与伊朗及阿拉伯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旭烈兀西征时,蒙哥征集了一千名中国抛石机手、火炮手(或火枪手)、弓

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

② 袁楠:《拜住元帅出使事实》,《清容居士集》卷三四。

③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

④ 《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

⑤ 《元史》卷三五,《文宗纪》:“至顺二年八月,中书、枢密言:西域诸王不赛因,其臣怯列木丁矫王命来朝,不赛因遣使来言,请执以归。臣等议:宗藩之国,行人往来,执以付之,不可。宜令乘驿归国以自辩。制可。”

弩手从军,并带去大量武器^①。当时中国的各种火药武器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在攻打木剌夷诸堡、报达城以及叙利亚各地时,发挥了很大的威力。蒙古统治者的侵略给伊朗和阿拉伯各地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但中国的火药武器及制造技术却由此传入波斯、阿拉伯国家,并通过这些国家的中介传到欧洲。

旭烈兀还从中国带去不少精通天文历数的学者,其中有一个名叫屠密迟(译音)的人,被称为“先生”,伊朗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刺丁途昔奉命编纂《伊利汗天文表》,曾向他学习中国的天文推步之术^②。元朝时期,有不少中国学者到伊利汗国任职,他们带去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历法及历史等各类书籍。伊利汗合赞命其丞相拉施都丁编纂《史集》时,曾谕令他搜集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精通天文历法和历史的中国学者李大迟、倪克孙(译音),还应召参加编纂工作,并为拉施都丁讲述中国的干支纪年法。

拉施都丁在《史集》中还多次提到,为他提供最丰富的史料、给予他最大帮助的是孛罗丞相。孛罗,蒙古朵儿边氏人,在元朝曾担任过御史中丞、大司农卿、御史大夫、枢密副使等要职。一二八三年(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命他以丞相职衔出使伊利汗国,以拂林人爱薛为副。孛罗、爱薛等一行于一二八四年冬到达伊朗,参见了新即位的伊利汗阿鲁浑。后爱薛回到中国,孛罗则留仕伊利汗廷^③。孛罗是杰出的蒙古族学者,精通蒙古各部族以及成吉思汗建国以来的历史,熟悉元朝的各种制度。在《史集》编纂工作中,拉施都丁得到他的密切配合,由他系统而详尽地口述,拉施都丁据以笔录,编纂入书。这部具有

① 《史集》第三卷,页二三;《元史》卷一四九,《郭侃传》载,一二五二年送兵仗至和林,从旭烈兀西征。

② 布洛晒:《蒙古史导言》一九一〇年,莱顿,页一〇〇。

③ 见程钜夫:《雪楼集》卷五,《拂林忠献王碑》;《史集》俄译本第三卷,页一一六。按,汉文史料中未载爱薛在使团中的地位,据《史集》,爱薛名字放在孛罗丞相之后,称怯里马赤(通事),居第二位。

极高史料价值的名著,其中的蒙古史和中国史有一部分可以说是他们两人合作的产物。

孛罗还将中国的钞法介绍到伊利汗国。伊利汗海合都奢侈无度,滥行赏赐,弄得国库空虚。主管财政的丞相撒都鲁丁和一些官员穷于应付,建议采用中国通行的钞法行用纸币,企图用这个办法进一步搜刮人民的财富。海合都命孛罗丞相说明钞法情况,孛罗遂将元朝宝钞的形制及发行办法详细报告。一二九四年七月,海合都下令在都城桃里寺制钞,行用全国,规定凡拒绝用钞者、伪造者、私用金银铸币贸易者处极刑。并在各地设立钞库,负责发行及昏钞倒换等事务。所制钞为长方形,上面印有八个汉字,中间圈内印钞值,其下为海合都的刺麻教名^①。这一套发行制度和钞的形状,基本上是从元朝照搬去的。伊利汗国的钞法只实行了两个月,因遭到商人的反对,造成市场瘫痪,便宣布废除了。但当时的波斯、阿拉伯人却因此认识到世界上最早实行的中国纸币制度,以及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从经济、文化的交流方面看也不无作用。至今波斯语中还保留着“钞”(chāo,纸币)这个词。

和钞法的失败结局相反,驿传制度在伊利汗国得到了实行。早在一二三九年,窝阔台命畏兀儿人阔里吉思主管呼罗珊等地户口、赋税事,阔里吉思就在境内普设驿站,备马匹、祇应以供使者,严令不得骚扰百姓,不得向农民需索马匹、粮秣及各种食物,使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一定保障,因而深得民心^②。合赞即位以前,伊利汗国的驿传制度产生了许多弊病,后妃、诸王和各级将领官吏任意派遣使者,驿站无法供应,于是使者多强住民家,勒索衣食,沿途则夺取农民及商人马匹;驿吏也往往贪污中饱,造成驿路的严重阻滞。合赞下令整顿驿传,设立特别驿站,专供勾当军国重事的使臣乘驿往来。于全国各主要道路上每三程(farsang,约十七公里)置一站,每站备健马十五匹。使臣需持有金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三卷,页一三五。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英译本第二册,页五〇一至五〇二。

印牌符方许乘驿。各边境长官,则另给“黑符”,以便凭此急递军情紧急文书。此外还禁止任何人因私事派使者。据拉施都丁记载说,实行整顿之后,滥派使者的现象停止了,“蒙古人和游牧民得免于劳累,来往商人行路安全,城乡居民都能安然从事产业”了^①。这一措施,和元朝“整治站赤”的办法是基本相同的。

“牌符”制度也在元朝传入伊利汗国所辖地区。授予各级将领、地方官员和使臣不同等级(有三珠虎符、金虎符、金符、银符、铜符等)的牌符,作为其权力或身份的凭证。伊利汗国也实行这种制度,诸算端(诸侯)、统将、蔑力克(州的长官)佩圆形大虎符,地位稍低的牌面略小些。使者驰驿,则给予圆牌,上著“官牌”字样,使命完成时即将牌子交还。各边区长官需遣使乘急递铺马递送紧急军情者,也发给五至三面圆牌^②。现在波斯文的“牌子”(pāizeh)这个词,就是汉字的音译。

中国和波斯、阿拉伯国家的古代医学都是很发达的,而且早就互相交流了。在元代,医学方面的交流得到更大发展。有不少中国医生在伊利汗廷任职。旭烈兀生病时,就喜欢随身带去的中国医生给他治疗。合赞汗有一次患眼疾,据说曾按照中国医生的治疗办法,用烧红的铁在身上烙两处^③,可能是用的热灸疗法。大量中国的医学著作在元代传入伊朗等地。前述《史集》的著者拉施都丁,本是一个著名的医学家。一三一三年,他主编了一部关于中国医学的百科全书,名为《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此书至今尚存,一九三九年由土耳其医学家译成土文,于伊斯坦布尔出版^④。

元代,伊利汗国境内的波斯、阿拉伯人来中国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元代文献中,常将他们称为“回回人”、“西域人”(包括中亚人)或“大食人”。

① 《史集》俄译本第三卷,页二六六至二六七。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三卷,页二七七至二七八。

③ 《史集》俄译本第三卷,页一九七。

④ 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译本四八八页;并见参考文献。

他们有的在元朝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的则在科学、文化上作出很大贡献。

元朝前期(大蒙古国时期),回回(或西域)人是蒙古统治者在剥削方面的主要帮手。他们用穆斯林国家的剥削方法对中国各族(主要是汉族)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盘剥,以满足蒙古奴隶主贵族的贪欲,并从中渔利。忽必烈即位后,实行“汉法”,基本上采用了汉族原有的封建剥削方式,但回回人在管理财政方面仍占有重要地位。

波斯、阿拉伯久负盛名的医学、天文学知识,通过从伊利汗国到元朝来任职或侨居的医生和学者,通过来往的使臣或商人等各种途径传入中国。“回回医学”、“回回星历”是元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蒙古军队侵入波斯西北部和阿尔明尼亚地区时(一二三三至一二四〇年),有一个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僧侣、叙利亚人列边阿答(Rabban-ata)来到哈刺和林,要求窝阔台保护基督教徒以便使他们归顺,窝阔台当即命他带着圣旨去招降^①。拖雷妻唆鲁禾帖尼信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也命人去西域召请著名教士。大约在贵由在位时期(一二四六至一二四八年),列边阿答将同国人爱薛(Isa)带到和林,推荐给唆鲁禾帖尼,用为近侍^②。爱薛“于西域诸国语、星历、医药,无不研习”,大概是充当了教士兼侍医的职务。这期间,他得到了当时还是藩王的忽必烈的常识,后来他就转而为忽必烈服务,并被带到开平。一二六三年(中统四年),忽必烈命爱薛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来改置广

① 参见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一卷,页四八至五一。

② 程钜夫《雪楼集》卷五,《拂林忠献王神道》载列边阿答荐爱薛于贵由汗。据姚燧所撰爱薛封制,爱薛实事拖雷妻。参见韩儒林:《爱薛之再探讨》(载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一九四一年一卷三期)爱薛何时来和林,史无明言。据伯希和所引阿尔明尼亚史家乞刺可思(Kirakos)一二四一年的记载,列边阿答曾在波斯等地兴建教堂,进行传教活动。又教皇英诺森四世一二四六年的一封信中也提到此人。据此推断,一二四一年至一二四六年间,他都在西域执行蒙古可汗交给他的使命。他介绍爱薛东来,当在一二四六年或其后不久。参见《蒙古人与教廷》,页一三四。

惠司，“专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并将爱薛在大都所设的“京师医药院”并入，仍命他掌管^①。在广惠司任职的都是“回回”（并不专指伊斯兰教徒）医生^②，用的是回回医法和回回药物。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又在大都、上都各置“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元人忽思慧所著《饮膳正要》（专为皇家编的食谱）中，记载有大量回回食物及其烹调法和营养价值，还有回回药物与方剂等，从中可见波斯、阿拉伯等地医学知识传入中国的大概情况。医学著作传入中国的也不在少数。元朝秘书监所存的回回书籍中，有一种“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Tibb 阿拉伯语“医学”）^③。现藏北京图书馆的明初刻本《回回药方》（残本），就是元代翻译成汉文的阿拉伯医学著作，据考证，当是阿拉伯医学家拜塔尔（Ibn al-Baitār）的名著《简救法》（Al-Jāmi‘ fi-al-Ad-wiyah al-mufradāh）^④。

“回回”医生除在朝廷任职外，还有很多人散居在各地民间，用他们的医法和药物行医或卖药。王沂《伊滨集》卷五有一首《老胡卖药歌》，生动地记述了一个回回老医生：“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客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竞来集。……金丝膏药熬较好，伤折近人人苦多。川船南通有新药，海上奇方效如昨。”当时来中国做医药生意的西域商人中，有不少人往往兼擅医术。元末明初的西域诗人丁鹤年，其曾祖于元初到中国经商，后留居江南。鹤年“于导引方药之术，靡不旁习”，可能是得自祖传。入明后他不肯做官，晚年曾在四明（今宁波）市上卖药为生^⑤。

① 《元史》卷一三四，《爱薛传》；卷八八，《百官志》；卷八，《世祖本纪》；程钜夫：《拂林忠献王碑》。

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八，《奇疾》。

③ 据马坚考证，可能是阿维森纳的名著《医经》（Al-Qānūn fi al-Tibb），见《光明日报》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马坚文。

④ 参见冯家升：《从历史上看阿拉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光明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

⑤ 戴良：《高士传》，《九灵山房集》卷一九。

在元人的笔记小说中,记载着许多回回医生和回回药物治疗有奇效的故事^①,可见其影响之深。历史上,中国人是以欢迎并善于吸收外来优秀文化闻名的,元代“回回”医学流行后,其精华就被吸收为中国医学的一部分,明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著录有许多回回药物和医法,就是很好的证明。

元代,许多回回天文学家来到中国,“回回星历”成为元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耶律楚材就将西域历法介绍到中国,编了一部“麻答巴历”^②。忽必烈即位以前,曾下令征召“回回为星学者”,波斯人天文学家札马鲁丁等应召东来。中统(一二六〇至一二六四年)中,元朝政府设立了西域星历之司。至元四年,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忽必烈下令颁行。《万年历》今其内容已不见记载。唯宋濂曾简略地说到,“西域札马刺丁者,献万年历。其测候之法,但用十二宫而分三百六十度,若不闻二十八宿次舍之说。及推日月之食,颇与中国合”^③。则大抵就是当时波斯所用的历法。同年札马鲁丁还制造了一套“西域仪象”(天文观测仪器),有浑仪、天顶距仪、天球仪、地球仪等共七种。《元史·天文志》记载了这七种仪器的波斯语名称及其形制和用法,它们和同时期伊利汗国天文学家纳速刺丁·途昔在蔑刺合天文台所造的天文仪器基本相同^④。至元八年,元政府设回回司天台,以札马鲁丁为提点。十年,回回司天台拨属秘书监管理,札马鲁丁即以司天台提点兼知秘书监事。在回回司天台里工作的还有天文学家可马刺丁、苦思丁等人,可马刺丁曾为安西王“每岁推算写造回回历日”。在元秘书监所藏的回回书籍中,有多种波斯、阿拉伯的天文学和数学著作,如“麦者司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据考

① 杨瑀:《山居新话》(聂只儿条);陶宗仪《辍耕录》卷七,《火失刺把都》;卷九,《奇疾》;卷二二,《西域奇术》。

② 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③ 近年在河北省宣化县郊区发现一座辽墓,其后室穹窿顶部所绘星图,即是黄道十二宫图。可见这种西亚的观象法在辽代已传入中国。

④ 参见哈特纳:《札马鲁丁天文仪器,其与蔑刺合天文台仪器的勘同与关系》。《i-sis》一九五〇年,第四一期。

即埃及著名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的著作集(阿拉伯人称之为 Al-magest);“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积尺”即阿拉伯文 Zij(天文历表)的音译;“呵些比牙诸般算法八部”,“呵些比牙”即阿拉伯文 Hisabiya(算学)的音译^①。可见当时许多重要的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历算著作,都传到中国了。

由于元代大批西域人入居中国,散布各地,他们保持原来的宗教信仰,自然需要使用“回回历日”,因此回回历无疑流行到了中国的许多地方。至元九年,元朝政府曾下令“禁私鬻回回历”^②,说明民间已有人印造回回历书出售了。

元朝皇帝名义上是大汗,自然把诸“宗藩之国”都看成他的属地。至元中忽必烈命秘书监修《大一统志》,令各行省进呈本省地图及图说,可能也要各藩国把有关图籍送来。秘书监的一个奏文中说:“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里的文字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回回图子我根底有,却总做一个图子,怎生?”^③所谓“回回图子”,应是伊利汗国的地图。现存《元大一统志》残本没有藩国部分,但《皇元混一方輿胜览》图,《事林广记》所附地图,都简略地标注有伊利汗国的方位。特别是元文宗时修成的《经世大典》地图,比较详细地注上了伊利汗国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名称及其位置,《元史·地理志》据以编为西北地附录。此外,元朝有名的大食学者赡思,也著有《西国图经》一书。赡思参加过《经世大典》的编修工作,本人又是大食人,他的著作无疑是详尽准确地将波斯、阿拉伯的地理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可惜此书以及他所著的另一部有关波斯、阿拉伯历史的《西域异人录》都早已散亡了。而当时在伊利汗国,则有拉施都丁的名著《史集》,将中国的历史、地理知识留传给同时代以至后代的波斯人。

① 以上据王士点等编《元秘书监志》第一、四、七等卷。参见上引马坚文。

② 《元史》卷七,《世祖本纪》。

③ 《元秘书监志》卷四。

元朝与伊利汗国的亲密关系,对加强中国与伊朗、阿拉伯各地的经济联系是有利的。陆路和海路的贸易都比前代发展了。泉州、广州与波斯湾之间,商船往返极为频繁(详见第六章元代经济)。波斯、阿拉伯人在中古时代也掌握有先进的航海技术,拥有较精确的海程记载。据《元秘书监志》记载,曾派人到泉州向来华的外国商人搜集回回文海道指南(Rah-nāma)。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之间航海技术和资料的交流,无疑促进了航海术的发展。

第二节 元朝与亚非各国的关系

一 高丽

一二一六年,据有咸平(今开原)、东京(今辽阳)、澄州(今海城)一带的契丹贵族反蒙自立。不久,在蒙古大军的逼迫下,这部分契丹人窜入高丽北部,侵占了一些地方。契丹的散兵游勇四处抢掠,给高丽人民带来严重骚扰。一二一八年,蒙古军以追击契丹叛部为名进入高丽,联合高丽军击溃了契丹人。于是高丽遂与蒙古结盟,相约“两国永为兄弟”^①。高丽国王王暉(高宗)答应每年向蒙古纳贡以谢其“救援”。然而,蒙古统治者却把高丽当作任意榨取财富的对象,每年都派出大批使者到高丽进行无厌的诛求。如一二二一年,成吉思汗的弟弟斡赤斤(时成吉思汗西征,斡赤斤留守蒙古)派使者著古与去高丽,开出了一张数目惊人,无所不包的索贡单: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棉一万斤,墨一千只,笔百管,纸十万张,紫草五斤、荳花、蓝笋、朱红各五十斤,雄黄、光漆、桐油各十斤^②。这还不包括其他蒙古将领与使者的额外勒索。蒙古使者傲慢骄横,将高丽人视同臣仆,激起了高丽人民的愤怒。一二二五年著古

^① 《高丽史》卷一〇三,《金就砺传》。

^② 《高丽史》卷二二,《高宗世家》。

与索贡返国途中被人杀死。

一二三一年，窝阔台派撒礼塔率军以问罪为名侵入高丽，侵占北部诸州，逼近王京（今开城）。高丽人民对入侵者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抗战。但王暉及其权臣崔瑀则向蒙古请和。撒礼塔在王京北部各州县设置达鲁花赤七十二员，以便直接控制高丽行政和榨取高丽人民。王暉、崔瑀感到蒙古的侵略危及他们的统治，但又不敢发动和组织人民进行抵抗，于是决定迁都江华岛，令人民也都入山入海躲避，并派人去北境诸州杀掉蒙古所置的达鲁花赤。一二三二年，蒙古军再次侵入高丽，遣使责其迁都海岛、不以户籍来上等归降不赦五罪。王暉卑辞自辩，而高丽人民则奋起抵抗蒙古军，射死蒙古统将撒礼塔，迫使蒙古军撤出境外。不久，高丽派兵赶走投降蒙古、盘据西京（今平壤）的洪福源，收复了北部州县。

一二三五年，蒙古灭金后，又遣唐古、洪福源等入侵高丽，攻掠诸州。各地高丽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分散地抗击入侵者，牵制了蒙古军使其不能集中力量去进攻江华岛。一二四一年，王暉遣王族淳到和林充质子，求保苟安一时的局面。

一二四七至一二五九年间，蒙古以高丽“岁贡不入”，四次遣军侵入，肆行杀掠。特别是一二五四年的札刺儿台军，“所掳男女，无虑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戮者不可胜计。所经州县，皆为煨烬”^①。蒙古军将掠来的高丽人“罗列人肆”卖为奴婢，惨苦之状，目不忍睹^②。这种侵略，给高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但是，由于高丽人民坚持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蒙古统治者也始终未能达到灭亡高丽的目的。一二五九年，王暉遣世子倂入质，答应将都城迁回王京，蒙古统治者则不再坚持国王亲朝的条件，与高丽议和。

中统元年（一二六〇年）王暉死，忽必烈送王倂（后改名王禛）回国，嗣为

^① 《高丽史》卷二四，《高宗世家》。

^② 郝经：《陵川集》卷一〇，《高丽叹》。

高丽国王(是为高丽元宗),同时下诏许高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并宣布对以前举兵反抗者不再追究^①。其后,忽必烈为了进一步笼络高丽王室,将女儿嫁给王禛之子、高丽世子愷。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年)王禛死,即命愷(后改名贽)袭高丽国王位(忠烈王)。王贽之子源(后改名璋,大德元年袭位,是为忠宣王。蒙古名益智礼不花)也娶元朝公主为妃。王璋子焘(忠肃王)、侄暲(沈王)、焘子禛(忠惠王)、祺(忠愍王)皆尚元公主。高丽王族和元朝皇室结为“甥舅之好”^②,除了利用元朝的力量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个目的外,还意图以此表示“恪守臣职”,免除元朝的疑忌,以便维持相对的独立。终元一代,高丽名义上是臣属于元朝的。有一个时期,元朝曾派达鲁花赤驻在王京,但不直接管理或干预高丽政事,只负监视之责,有事则向朝廷奏报。元朝政府还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至元中设省的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地利用高丽的地理条件和人力、物力去攻打日本;后来行省名义仍存,但元朝不派行省官,就以高丽国王为行省丞相。大德中,借口高丽国王不能服众,需朝廷派官协助,再次派省官入高丽,旋即因高丽国王的要求撤销。征东行省与元朝国内各行省的性质是不同的。行省丞相(即高丽国王)得自辟官属;高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各项制度都不改变^③。因此,元代高丽基本上保持了独立的地位,“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④当然,元朝统治者仍不时

① 《元史》卷二〇八《高丽传》;《高丽史》卷二五,《元宗世家》。

②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送宪部张乐明大夫使还海东诗序》。

③ 《元史·百官志》谓:大德三年(一三〇〇年)立征东行省,“以中国之法治之”。然据《高丽传》,当时派去担任行省平章政事的阔里吉思虽曾上言:“若止依本俗行事,实难抚治”,似有改变高丽原有制度的企图,但不久即因高丽国王之请求,罢行省。可见并未实行。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年),有人建议将征东行省改为三韩省,制度与其他行省同。这项剥夺高丽主权的建议遭到反对,没有实施(见《元史》卷一六五《王约传》;《高丽史》卷一一〇,《李齐贤传》)。

④ 姚燧:《牧庵集》卷三,《高丽沈王诗序》。

地对高丽内政进行粗暴的干涉,甚至派兵镇压高丽人民的起义。并通过高丽王室剥削高丽人民,如侵略日本战争中,役使高丽人民制造战船,供给军粮、军械等,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中国和高丽历史悠久的经济上、文化上的紧密联系,在蒙古统治者入侵时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忽必烈以后,又逐渐恢复起来,并有所发展。元代,到中国来的高丽人相当多,他们中有不少人就在中国各地做官、侨居。许多精通汉文的高丽学者和僧人,或奉命出使,或私人游学,来到中国。他们广泛结交中国文人,相互切磋,唱和酬答,关系十分密切。在元人文集中,这一类的诗文很多。中统二年(一二六一年)王植来上都,其国相李藏用随行。李藏用中高丽状元,“通禅学,善作诗”^①,对汉文学有很深的造诣。曾出席中国诗人的“文会”,被誉为“鸭绿江头老谪仙”^②。皇庆初,王璋将高丽王位让于其子焘,自己则以驸马、沈王的身份寄居大都,筑万卷堂,“以书史自娱”。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奉召来大都陪侍王璋,长期居住在中国,从阎复、元明善、赵孟頫等人学习,交往甚密,学问更进。他还奉命出使四川等地,又陪王璋游历江南,写了许多歌咏中国历史、自然景象以及风俗民情的诗篇。其诗集《益斋乱稿》被认为是朝鲜文学史上的优秀古典作品^③。

二 日本

忽必烈在迫使高丽臣服以后,下一步就企图使日本也表示臣服,遣使来朝。

至元三年,遣黑的、殷弘为使,持诏谕日本,命高丽国王派人护送使者前往。使者至巨济岛,惧怕海途危险,折回。据《高丽史·李藏用传》载,高丽国

① 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二。

② 王恽:《赠高丽乐轩李参政甥朴学士》,《秋涧集》卷二二。

③ 参见《高丽史》卷一一〇,《李齐贤传》。

相李藏用考虑到如果日本抗命不来朝,必然会有征伐之举,将会给高丽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密劝黑的等以道远不达复命。但忽必烈要求日本臣服心切,严责高丽不肯尽力,于至元四年再遣黑的等出使。高丽国王遣其朝官潘阜代替蒙古使臣去日本传书,被留于太宰府五个月。当时统治日本的镰仓幕府和日本朝廷决定不答复忽必烈的诏书,将潘阜遣还。

至元五年,忽必烈以潘阜等既然能够到达日本,可见日本可通,于是第三次遣黑的、殷弘为使,严令高丽国王派大臣陪送,“期于必达”。蒙古与高丽使臣至日本对马岛,被拒不能前进,只俘虏了两个日本人回来。忽必烈对这两个日本人说:“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这句话很可以说明他急于宣威海外,企慕汉唐盛世君王的思想。他允许他们游览了燕京之后,命高丽派使臣将他们送回日本,并带去用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①。

至元七年十二月(一二七一年初),忽必烈遣赵良弼以秘书监职衔充国信使,出使日本。次年秋,良弼至日本,被阻于太宰府西守护所,不准入京都。良弼以未见国王,不肯交出国书,只抄录了一份副本交给日本官员。九年初,日本派人送蒙古使臣回国,赵良弼命随行官员将弥四郎等十二名日本人带到大都,冒称日本使者。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带来日本政府对蒙古诏书的任何答复。因此,当年又派赵良弼再次赴日,但仍被滞留于太宰府多时,未能至其国都。至元十年春,良弼等不得要领而还。计自至元三年至十年,忽必烈连续五次派使臣去日本劝谕遣使来朝,而镰仓幕府则采取坚决态度,拒绝答复。

至元七年,忽必烈即下令在高丽设立屯田,“欲贮粮餉以为进取(日

^① 日本史料中记载有国相管原九成所写的《赠蒙古中书省书》,即是对此次蒙古中书省信件的答复。但这封信没有送达燕京。见池内宏:《元寇の新研究》,第四二至四三页。

本)之计”^①,准备通使不成就用武力去征服。十一年初,命高丽制造大小战船九百艘,签发工匠、民夫三万多人,“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②。又设立征东元帅府,以忻都为都元帅,洪茶丘为副元帅。十月,忻都等率蒙古、汉军及高丽所征军计二万五千人^③,从合浦(今朝鲜马山)出发,侵袭对马、一歧两岛,进至肥前松浦郡、筑前博多湾等地(今福冈附近)登陆。日本守军坚决抵抗元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元军虽小胜,但在日本守军抗击下未能深入。不久博多湾起了台风,战船大部分毁坏,只得仓促撤回。第一次侵日之役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

至元十二年,忽必烈一方面遣礼部侍郎杜世忠等出使日本,一方面作再侵日本的准备。除迫使高丽人民再次承担制造战船、兵械的差役外,十六年初又下令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灭宋后新置的行省)制造战船六百只。在元灭宋战争中,大批南宋将领以所部军队投降元朝,被称为“新附军”。忽必烈命宋降将范文虎负责筹备侵日之役,驱使新附军去攻打日本。范文虎受命后,也派了两个使者和一个南宋时来中国的日本僧人,去日本传递忽必烈的旨意。

杜世忠等一到日本,就被捕送镰仓幕府处死了。但直到四年以后,有四个护送使臣的高丽水手从日本逃回,才带来了他们被害的消息(至元十七年初,消息传到元朝廷)。范文虎派去的使者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一去不返。于是忽必烈决意再举侵日,特设置征东行省(亦称日本行省)专任此事。命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后改任阿塔海)、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张禧等统率新附军及强

①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

② 《高丽史》卷二七,《元宗世家》。

③ 此据《经世大典叙录》(见《元文类》卷四〇)。《元史·日本传》作一万五千,系指当年所派的大军;如加上忻都等元领驻高丽之屯田军、水军五千,合为二万,《洪茶丘传》所说的“统舟师二万”,即指此数。此外还有高丽军五千三百多人。

迫签括的江南士卒十万人，行省右丞忻都、洪茶丘和行省左丞相（高丽国王）所派的都元帅金方庆等统率蒙古、汉军及高丽军共四万人，分两路出发，同征日本，志在必取^①。

至元十八年五月，忻都等所率东路军四万，乘战船九百艘，从合浦出发。侵袭日本对马、一歧两岛后，进抵筑前志贺岛登陆。日本守军已有前次抗击蒙古的经验，他们在箱崎、今津等处沿岸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精锐部队开进志贺岛（志贺岛与九州之间有陆路可通），与入侵元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元军未能取胜，退至鹰岛。其后又转袭对马、一歧、长门等处。

范文虎等所率江南军十万，乘战船三千五百艘，于六月十八日从庆元（今宁波）起航，抵达日本平户岛^②。在与东路军汇合后，两路行省指挥官与大部分军队进屯鹰岛^③，一部分军队仍屯于平户岛，计划分数路进取太宰府。但行省指挥官内部矛盾重重，洪茶丘与高丽军统帅金方庆仇怨甚深，范文虎是南宋降人，为诸将所轻视^④，结果意见分歧，指挥不能协调。当然，主要是日本守军已作好抗战准备，使元军有所忌惮，因此，驻鹰岛一月之久，“逗留不进”^⑤。八月一日夜，“台风大作，波如山”，元军战船多“缚舰为城”，紧靠在一起，因而“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⑥。忻都、范文虎等统帅连忙

① 至元十八年二月征日诸军陛辞时，忽必烈对他们面谕：“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徒得地何用？”（见《元史·日本传》）足见他认为此次出征，必能征服日本。

② 《元史·日本传》作平壶岛，《张禧传》作平湖岛。按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二《孔端卿东征集序》载孔氏以一士随征日，发四明（即庆元），自神前山发洋，三日至耽罗，又三日至日本海口，泊竹岛……”这可能是范文虎派去联络东路军的一支分队的行军路线。

③ 汉文史料中多称为“竹岛”，盖因“竹”与“鹰”日语音近（竹，たけ；鹰，たか）而致误。《滋溪文稿》卷二一《张氏墓志铭》及辽宁金州发现的《元管军上百户张君墓志铭》均作“打可岛”，系音译。

④ 《经世大典·叙录》（见《元文类》卷四一）。

⑤ 方回：《孔端卿东征集序》，《桐江续集》卷三二。

⑥ 苏天爵：《赠长葛县君张氏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二一。

“择坚好船乘之”，弃军队于岛上，自逃回国。留在岛上的残余元军遭到日军的猛烈攻击，大部分被歼灭。十四万出征军队，回来的只有五分之一。大张旗鼓的第二次侵日之役，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这一年是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四年，日本史上称为“弘安之役”。

忻都、范文虎等向忽必烈谎报军情，说是因为下属将领不听指挥，擅自率部逃去，他们才不得不带领余军撤回。直到后来被俘士卒从日本逃回，真相才暴露。范文虎等捏词奏报，目的在于推卸责任，但由此可以推测，似乎确实发生过许多军士不愿为元朝统治者的不义战争卖命而离队逃走的事实。

元朝统治者发动侵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高丽人民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拘刷水手，兴造海船，供办军需，弄得“民不聊生，激而生变”。受害最大的江南各地人民“相挺而起”，仅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就有二百多处地方发生了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武装斗争^①。尽管忽必烈企图重新发动侵日战争，三次再置征东行省（一二八三年，一二八五年，一二八八年），下令造船签军，但终于因为人民的激烈反抗，征东行省不得不旋置旋罢，直到他死，都未能再派出一船一卒。

一二八三年，忽必烈遣提举官王君治与补陀寺和尚如智出使日本，遇风不达^②。次年，再遣江南行省参政王积翁与如智出使，从庆元出发，经由高丽合浦，至对马岛附近时，船夫不愿前行，杀掉王积翁。两次遣使都没有成功。一二九九年（大德三年），元成宗又遣补陀寺和尚宁一山附商船出使日本。宁一山到达日本后，虽然很受敬重，但镰仓幕府仍然拒绝了与元朝通使的要求。

虽然元朝与日本政府间的关系处于僵持状态，但中、日两国的民间交往却依然十分活跃。即使在敌对时期，仍有商人来往贸易。据《元史》记载，至元

^① 《元史》卷一七三，《崔或传》。

^② 《元史》失载此次遣使之事。明中期日本和尚周凤所著《善邻国宝记》卷上收有如智写的《补陀山接待记》，记载了他二次随同使臣出使日本的经过。

十四年,日本商人持金来中国易铜钱(中国铜钱在日本流通);次年,元政府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商人市易;至元十六年,有日本大商船四艘,载商人、水手计二千余人的大商队至庆元港口,地方官员侦查结果,证明确是来贸易,并无其他目的,因许其交易而还^①。战事停止以后,日本商船来中国的更多。庆元(今浙江宁波)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日商多至此互市。元朝政府于此置市舶司提举之。庆元属县定海(今镇海)为日本商船停泊之所,经检查、抽分后,即许日商登岸市易,出现了“贾区市墟,陈列分错,咿嘎争奇,踏歌转舞”^②的热闹景象。福建、山东沿海也时有日本商船到来贸易。据有确切记载的资料统计,自大德九年到至正十年的四十五年中,三十三年都有日本商船来元,实际上还不止此数^③。

中国出口商品,以瓷器为大宗。日本商船和中国商船都运载大批瓷器去日本贸易。此外,铜钱、香料、经卷、佛寺什器等,都是日本所需的。近年在朝鲜海域发现的元代沉船,就是从中国开出路经高丽的一大商船。船中装载各种瓷器、铜器、铁器数十箱,总数达几千件。这艘沉船的发现,充分说明了元代中日贸易的规模是很大的。从日本输入元朝的,则有黄金及刀剑,扇子等物。

除商人外,来元最多的是日本僧人。《元史》载,泰定三年(一三二六年)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四十人还国”,足见来华日僧之多。据日本史家木宫泰彦统计,元代来华日僧仅知名者即达二百二十余人。他们游历中国各地名山、大城,从中国高僧学习佛经^④;与中国文人结交,研究中国文学^⑤。据说,赵孟頫的诗画就得到当时日本人的赞赏,“咸知宝藏公(赵孟頫)

① 《元史》卷一三二,《哈刺解传》。

② 袁楠:《马元帅防倭记》,《清容居士集》卷一九。

③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本,页三八九至三九三。

④ 虞集:《晦机禅师塔铭》,《道园学古录》卷四九。

⑤ 王逢:《梧溪集》卷四下载赠日本僧进上人(进得中)诗一首,云:“日本进上人将还乡国,为录予所注杜诗本义,留旬日。赠以八句:重译归看母,僧中独尔能,上方云一钵,沧海月千灯。雀舳蒙冲舰,龙函最上乘。杜诗书法隐,毋惜授诸藤(藤,其国中著姓)。”

翰墨为贵”^①。不少日僧长期留居中国，汉文化修养很高。如邵元，自泰定四年来元，在元二十年，历游江南诸名山、五台山、嵩山，居少林寺最久，他为少林寺住持撰写的道行碑现尚在该寺碑林，文笔老练。日僧雪村永梅曾访赵孟頫于书斋，作书笔势雄浑，使赵为之惊叹。也有不少元朝僧人被邀请到日本，著名者如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都留居日本直到去世，受到日本朝野的尊敬。当时日本的刻书业很兴旺，刊印了不少中国名人文集和佛经等，特地到元朝请了许多刻工去日本传授技术^②。这些都体现了中日传统的文化交流，在元代依然是继续发展的。

日本军民抗击元朝统治者的武装侵略，是完全正义的。但后来镰仓幕府为了摆脱内部矛盾和统治危机，纵使封建主、破产武士和走私商人骚扰高丽和中国沿海各地，实际上和元朝对日本的侵略性质是一样的。特别是十四世纪中期（日本镰仓幕府末期和南北朝时期），他们更经常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火城市，杀吏民”^③，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 安南、占城

一二五七年，蒙古大将兀良合台征服云南各部后，即遣使者入安南“谕降”。其时安南陈朝正处在建国初期（陈朝于一二二五年取代李朝），中央集权制度有所加强，经济得到恢复，国力较盛。国主陈日熨（陈太宗）将蒙古使者扣留，投入狱中。一二五八年初，兀良合台率军侵入安南，陈日熨等撤离京城升龙（今河内）。兀良合台军虽占领升龙，但毫无所获，仅驻了九天就退回云南。

① 欧阳玄：《赵文敏公神道碑》，《圭斋集》卷九。

② 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

③ 苏天爵：《杨君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二〇；《元史》卷四六，《顺帝本纪》；王沂：《经历张君墓志铭》，《伊滨集》卷二三；王逢：《酬赵天放并后序》，《梧溪集》卷七。

一二六〇年忽必烈即位后，即遣孟甲、李文俊等出使安南，表示允许安南“衣冠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并“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场，乱尔人民。”当时忽必烈正忙于击败阿里不哥，巩固其统治地位，故对邻国一般采取保持和平的策略。安南国主陈光晟（陈圣宗）也遣使报聘，“乞三年一贡”。忽必烈封他为“安南国王”。

此后二十多年中，蒙古统治者集中力量于攻灭南宋。南宋军民长期的抗元斗争以及宋亡以后南方各地连续不断的起义，对安南等国起了屏障的作用。忽必烈虽未能直接对安南用兵，但一直企图迫使安南臣服。他派遣纳剌丁为安南国达鲁花赤，往来其国进行督察；命安南贡献儒士和通医药、阴阳、卜筮之人并诸色工匠、各种方物。以后又屡逼安南执行臣服“六事”，即：君长入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置达鲁花赤。安南国王巧妙地援引中统元年诏书曾许其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拒绝拜跪受诏，并以各种借口推辞亲朝、入质等苛刻要求，不肯屈辱。

至元十六年，元朝消灭了南宋残余势力，就在这一年，元枢密院提出要进兵安南，追究其违诏不朝之罪。这时，安南国王陈光晟已死，其子日煊继立（一二七七年），忽必烈因他“不请命而自立”，不予承认，并遣使责问，威胁他说：“若果不能自覲，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贤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以代其土民。不然，修尔城池，以待其审处焉。”但由于南方各地人民起义不断发生，忽必烈还不敢贸然进兵安南。到至元十八年，元朝成立了安南宣慰司，进行战争的准备。二十年，忽必烈命其子镇南王脱欢为统帅，率领大军，以假道安南攻打占城为名向安南进兵，迫令陈日煊亲来军前迎拜并贡纳军粮。次年冬元军侵入安南。其兴道王陈峻统兵步步阻击元军；陈日煊也在京城布防，经过激烈战斗后，才退到天长府（今南河）等地。元军占领升龙后，向南追击，驻在占城的唆都军也奉命北上进入安南南境，企图南北夹击，包围消灭安南主力。安南军民“虽数败散，然增兵转多”。他们巧妙地避开决战，至五月，等待元朝疲劳，从四面八方发起反攻。脱欢不得不退出安南，唆都

战死。

二十四年，忽必烈复命脱欢统军水陆并进，再侵安南。安南军民再次退出京城，分兵四出邀击元军，又截断了元水军粮船。脱欢虽再度占领升龙城，但不敢久驻。

占城国在安南之南。至元十五年，福建行省左丞唆都遣人招谕占城，据回报，其国主失里咱牙信合八刺麻迭瓦(Sri Jaya Sinhavarmadeva)有意归附；十六年，元廷遂遣使诏谕其亲自入朝。十七年，再遣使持诏谕令入朝。其国主先后三次遣使至元朝“奉表称臣，贡宝物、犀象”。十八年，元朝封之为“占城郡王”，同时设置占城行省，准备以占城作为侵略海外诸国的起点。十九年年底，忽必烈遂以占城扣留元朝出使海外的使臣，“既降复叛”为名，遣占城行省右丞唆都统率军队，乘船从广州出发，航海至占城港(今越南平定省归仁)，沿海岸屯驻。占城军民修建木城，架回回三梢炮百余座，抗击元军。木城失守后，退入山中，设计诱元军，伏兵截其归路，元军死战夺围，始得还营。被扣留的使臣皆遇害。二十一年，唆都奉命从占城北攻安南，征伐占城之役遂告结束。元成宗即位后，下令停罢征南之兵，派使臣去安南“慰谕”，安南亦遣使通好。从此元与安南、占城使节往来不绝。

安南在陈朝时，儒学兴起，儒士的政治地位提高。派到元朝来的使者，多以儒臣充任。安南使臣来元，都向翰林院赠送一份礼物，因而结识元朝文人学士，赋诗赠答^①。当时安南的佛教势力还很强盛，安南国也遣使者到元朝请赠佛经^②。元代流行的杂剧对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至治元年(一三二一年)，文子方出使安南，回国后著《安南行记》，载其山川土俗甚详^③，惜此书今不存。跟随安南王弟陈益稷留居中国的安南人黎崱

① 黄溍：《安南遣使入朝……赋诗四韵以遗之》，《黄金华文集》卷二。

② 《元史》卷三八，《顺帝纪》。

③ 袁桷：《文子方安南行记序》，《清容居士集》卷二二。

(字景高),著有《安南志略》一书。

四 緬、暹、罗斛

緬国蒲甘王朝建国于十一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中叶,国势已趋衰落。緬王那罗提诃波帝(Narathihapate,一二五四至一二八七年)搜刮民脂民膏,大建宝塔,穷奢极欲。据说,在开始建造弥伽罗塔(蒲甘)时,有民谣云:“宝塔建成,国化灰尘”。反映了人民对沉重劳役的不满。事实上,蒲甘王朝已面临崩溃的前夕了。

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元朝大理等路宣慰司派乞斛脱因去緬国通使,緬国遣使者价博随来云南,地方官将价博送到大都,向忽必烈作了报告。十年,忽必烈遂命勘马刺失里、乞斛脱因等为国信使副,持诏书出使緬国,令其王以子弟或贵臣入朝。使臣一去不返,据緬史记载说,因为他们入宫见緬王时不肯脱靴,被緬王下令杀死了。

至元十四年,緬王遣大将释多罗伯率士卒象骑数万^①,进犯云南行省所属镇西路(干额)金齿部落。行省出兵救援,与緬军在干额地区进行了激烈战斗,将他们赶跑了。同年,云南行省即遣都元帅纳速刺丁进至江头城(蛮莫县江新),招降其附近掸族诸部落。因天热还师,并未深入緬境。

二十年,忽必烈以緬王不降,去使不返,命诸王相吾答儿等统大军侵緬,攻占江头城。再遣使入緬谕降,仍没有得到答复,于是进据太公城(在拉因公县)^②。緬王闻讯,弃蒲甘城,南奔其子不速速古里(即緬史之提诃都)封地昔里怯答刺(今卑谬),并遣大臣阿必立相向元军求和,请“免军马入境”^③。元即遣“招緬使”怯烈出使其国。二十五年,元使怯烈未至,而緬王那罗提诃波

① 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见《云南通志稿》),《元史·信直日传》。

② 《元史》卷一三三,《也罕的斤传》。

③ 《经世大典·叙录》(《元文类》卷四一)。

帝为其子不速速古里所杀，缅甸内乱大起。云南王也先帖木儿乘机率军深入缅甸，进占蒲甘。大概因遇到缅甸人民的激烈反抗，“丧师七千余”，不久就退回云南。这时，缅甸已经四分五裂，不速速古里在与诸兄弟互相攻战中被打死，各地贵族和掸族诸部落统治者纷纷自立，大多数臣服元朝，贡纳方物，元各置宣慰司治之。蒲甘王朝崩溃了。

那罗提河波帝的另一个儿子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经世大典·叙录》作帖灭的，又作答麻刺的微，即缅甸之侨菑）回到蒲甘，继为缅王。但实权已操纵在木连城（叫栖县）长官阿散哥也兄弟手中。阿散哥也之父原是缅甸东面的掸族酋长，入居缅甸，娶其豪族之女为妻，生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他们受到缅王的重用，赐木连城为其封地。在蒲甘王朝败乱中，阿散哥也三兄弟乘机据有缅甸北部，蒲甘的缅王成了他们的掌中之物。

缅甸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大约在至元二十六年就向元朝表示臣服^①，贡纳方物。一二九六年（元贞二年），又遣其子信合八的至大都朝见元成宗，愿岁贡银、帛、驯象、粮食等物。次年，成宗遣教化的为使，送信合八的归国，封其父为缅甸国王，信合八的为缅甸世子，并赐其权臣阿散哥也三珠虎符。缅王大喜，“集众听诏”。大德二年（一二九八年），阿散哥也兄弟起兵攻蒲甘，执缅王及世子信合八的等，囚于木连城，另立其子邹聂为傀儡国王。并用新王名义向元朝报告废立原因，数前王三罪：一是劫夺登笼国（应即从缅甸分裂出去的得楞国，今白古）使臣送往元朝的贡物，二是违背元朝圣旨，勾结八百媳妇国引兵来杀掠甘当等族百姓（当是缅甸东面的掸族部落），三是欲杀朝廷命官阿散哥也。从这三条罪名看来，似乎阿散哥也兄弟发动政变是出于维护元朝的权威，这显然是想取得元朝对其废立国王行动的承认。但是次年八月，太公城总管向云南行省报告这一事件的情况，竟与阿散哥也说的完全相反。据称，原来

^① 《经世大典·叙录》载大德三年（一二九九年）云南行省左丞忙兀都鲁迷失的奏章说：“缅王归朝十一年，未尝违分。”知其归朝应在一二八八年或一二八九年。

是阿散哥也兄弟起兵三万攻蒲甘，指责缅王：“自归大元之后，使我多负劳费”，因执杀缅王及其世子、妻妾、父师（即国师）、臣仆百余人，随国信使（应指教化的）去缅留在蒲甘的回回、畏兀儿、汉人百余人也被害。与此同时，缅王之子窟麻刺哥撒八也逃到云南，向行省讼冤，要求出兵援救。据他报告，因缅王向元朝请兵平定叛部，诸部大恨，群起作乱，而阿散哥也之弟也参与叛乱。缅王原命阿散哥也领兵平叛，后见其有二心，执而囚之。于是其弟进兵攻蒲甘，“掠百官，烧城池”，执缅王，锁其足投入豕牢中。大德四年五月，缅王之婿马来城（瑞波县东）土官纳速刺又逃到云南，报告了事变的详细经过（大体和窟麻刺哥撒八的报告符合），并说阿散哥也已于大德三年四月杀缅王及世子，并诛戮不附己者，又兴兵攻破阿真国和马来城^①。缅史也记载了这个事件，说是阿散哥也与那罗提诃波帝之妃合谋，将的立普哇那阿迪提牙诱至木连城。囚禁于寺院中^②。根据元朝所得到的前后报告和缅史的记载分析，这是掸族统治者和缅国王室之间的一次激烈斗争。当时缅王的势力已极衰微，但在得到元朝的封号后，立即召集臣僚听诏，似乎想借此重振王室权威，压制掸族势力。然而蒲甘王朝此时已无实力，终于被阿散哥也兄弟击败了。

元朝得报后，遂决定出兵“征讨”阿散哥也。大德四年十二月（一三〇一年一月），元军侵入缅甸，围攻木连城，木连城守军进行了坚决抵抗。五年二月，阿散哥也以金银礼物贿赂元军将领，自宗王阔阔、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以下至将校、幕官均受贿，于是撤军回国。据缅史记载，元军还在叫栖帮助缅人修筑水利工程，开撒兑运河，然后撤走；阿散哥也赠送礼物，乃是对他们协助缅人消除水患的感谢^③云。元军退后，阿散哥也兄弟立即先后入朝，贡纳方物，并“自言杀主之罪”。元成宗免其罪，为罢征缅之役，承认了他们在

① 以上均据《经世大典·叙录》。

② 哈威：《缅甸史》引《琉璃官史》。姚梓良译本上册，页一六六。

③ 参见姚树等编译《古代南洋史地丛考》，页三七。

缅甸的统治权。一三一二年,阿散哥也之弟僧哥速建都邦牙,仍对元朝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贡使不绝。元置“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羁縻之。

暹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十三世纪中叶,国势渐盛。其都城在湄南河上游的速古台(今宋家洛)。一二八二年(至元十九年),元朝遣万户何子志、千户皇甫杰等出使暹国,舟经占城,被占城王拘留,未至其国。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暹王使者持金册(国书)至广东,广东道宣慰司将金册报送大都。次年,忽必烈即遣使者去暹国通好。一二九四年(至元三十一年)六月,暹国王敢木丁(即暹史上著名的国王 Rama khamheng)遣使至中国^①。七月,元成宗立即派遣使臣回访,请敢木丁亲至中国朝贡,如因故不能亲来,则应遣子弟或近臣来。泰国历史学家达玛隆亲王所著《暹罗古代史》中说,敢木丁曾于一二九四年、一三〇〇年两次亲到元朝。但《元史》中没有记载此事。元人贡师泰《玩斋集》卷九《四明慈济寺碑》中提到泉州德化县尹杨秀,原为宋市舶司官员,降元后,曾奉命出使暹国,“以其主来朝”,唯未载杨秀出使及暹国主来朝的年月。这个随杨秀来中国的暹国主或者就是敢木丁。据《元史·暹国传》记载,一二九五年(元贞元年),暹国使臣持金字表至大都,请求元朝遣使去其国,其时元成宗所遣使臣已经出发,遂赐暹使佩金符兼程赶上,与元朝使臣同行。那么敢木丁来元访问,当在一二九五年之后。《元史·成宗纪》载,一二九七年(大德元年),元朝曾赠于暹国来朝者衣服等物,未知“来朝者”是否敢木丁本人。

此后,暹国与元朝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二九九年(大德三年),暹国与木刺由、罗斛等“各以方物来贡”,元朝特“赐暹番世子虎符”^②,但没有提到对暹国王有何赠物。这一次可能是敢木丁之子洛泰(Loetai)亲自来中国。《元

^① 《元史·成宗纪》载,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必察不里城敢木丁遣使来贡。必察不里,即暹国城 Petchaburi 的音译。

^② 《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

史·暹国传》有如下一段记事：“大德三年，暹国主上言，其父在位时，朝廷赏赐鞍辔、白马及金缕衣，乞循旧例以赐。帝以丞相完泽答刺罕言：彼小国而赐以马，恐其邻忻都（按即印度）辈讥议朝廷。仍赐金缕衣，不赐以马。”这段记载颇难索解。据暹罗史研究者的说法，敢木丁在位期间是一二七五至一三一四年（或一三一七）年。如果说上述记载中的“暹国主”是敢木丁，则其父悉利因达提帝牙（Śri Indraditya）在位时，尚未曾与元朝建立国交，不可能有鞍马金衣之赐。如果是指敢木丁之子，则以前暹罗史家们所推断的敢木丁去世年代就成了问题。根据《元史》的记载判断，接受过元朝鞍、马、金衣等赠品的，只能是敢木丁，而且可能就是一二九七年的那一次。而一二九九年请求按旧例“赏赐”的“国主”，似乎是新登位的敢木丁之子洛泰。他可能是亲自来朝，在《元史·成宗纪》中称他为“世子”（按例，这是元朝对外国王子的称呼），而在《暹国传》中则称之为“暹国主”。看来敢木丁可能是死于一二九八或一二九九年。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那么暹史记载的一三〇〇年敢木丁第二次来中国，应该是他的儿子、暹国新王洛泰，年代应为一二九九年。

延祐六年（一三一九年），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年），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元统元年（一三三三年），暹国均派有使臣来元朝^①。

《元史》记载暹国最后一次“遣使来贡”是在至治三年（一三二三年）。据《皇元风雅》卷二二王东《暹国回使歌》序，则天历元年（一三二八年）与元统元年（一三三三年），暹国都派有使臣到中国访问。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成书的汪大渊《岛夷志略》说，暹人“近年以七十余艘来侵单马锡（今新加坡），攻打城池，一月不下”，后闻元朝派去爪哇的使臣经过其地，乃退回。

敢木丁是暹史上的英主，因此传说中把许多英雄事迹都归于他。据说，一三〇〇年（大德四年）他第二次来中国，带了不少中国陶瓷工匠回去，因而开创了暹国的陶瓷业。据近代学者研究，速古台（宋加洛）等地的瓷窑遗迹，历

① 《元史》；《皇元风雅》卷二二，《暹国回使歌》。

史很久,所发现的古代瓷器多与宋元时代的中国瓷器相同。其后瓷器上的图画改为象、鱼等动物,具有本国特色,但颜色仍仿青瓷^①。因此,说陶瓷制造技术在元代从中国传入暹国,是完全可靠的。

一三四九年(至正九年),暹国为其南面的罗斛国所并^②,从此合称暹罗(或暹罗斛)。

罗斛国在湄南河下游,都城为罗富里(今译华富里, Lopburi)。其国地势平衍,农业生产十分发达,汪大渊说,暹国“谷米岁仰罗斛”,大概是可信的。据暹王敢木丁碑,暹国强盛时,版图极广,罗斛似亦在其控制之下。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泰族势力在罗斛国开始居于统治地位。在《元史》中,罗斛与暹是分别与元朝建立关系的,足见具有独立地位,没有服属于暹国。

至元二十六年,罗斛遣使“来贡方物”。二十八年,其王又“遣使上表,以金字书,仍贡黄金、象齿、丹顶鹤、五色鹦鹉、翠毛、犀角、笃耨、龙脑等物”。其后仍屡有使臣来中国。十三世纪中叶,国势渐强,遂并暹国。一三五〇年,移都于犹地亚(Authia)城。

五 爪哇及南海诸国

南宋与海外诸国的国际贸易极为繁盛。高宗末年,泉州、广州及两浙三市舶司的岁入达到二百万缗,成为政府的重大利源^③。而且,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珍宝、香料等奢侈品,也多仰赖舶来。因此,元朝统治者在灭南宋后,就把眼光放到海外,追求获得和扩大这宗利益。

南宋末,泉州的阿拉伯商人蒲氏掌握了海外贸易的大权,拥有大量海舶和资产,并与海外诸国有密切的联系。南宋小朝廷曾企图依靠蒲氏的财力、物力

① 参见陈序经:《掸泰古史初稿》,页一七二。

② 汪大渊:《岛夷志略》。

③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三,绍兴二十九年九月条。当时南宋全国总收入,约为四千五百万缗,市舶收入占二十二分之一。

来抗元，升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而元朝统治者为了彻底消灭南宋势力和招徕海外各国，也积极争取蒲氏。元军取临安后，伯颜即遣使招降蒲寿庚。一二七六年（至元十三年）底，蒲寿庚投降元朝，元负责专征南宋的大臣（中书左丞）董文炳以“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诱诸蛮臣服”，即解所佩金虎符给之^①，授以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之职，不久又升任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当然给他的职责主要是提举福建、广东市舶和招谕海外各国。

蒲寿庚的降元，使元朝掌握了南宋所有的海舶和经营海外的知识。于是不断遣使到海外各国“招谕”，并准备向海外扩展势力。至元十五年，忽必烈将唆都、蒲寿庚升为福建（泉州）行省左丞，命令他们说：“诸蕃国列居东南岛砦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②。实际上这是发出了“将有事于海外”^③的信号。次年，元朝开始遣使去海外各国“招谕”，并且有一些国家，如占城、爪哇（阁婆）、马八儿、俱兰等，都陆续和元朝建立了联系。但是，元朝统治者却并不满足于贸易的往来，他们还想凭借武力去掠夺更多的财富和“珍异之物”。十八年十月，忽必烈下令准备海船百艘，军队、水手万人，打算于明年正月出征“海外诸番”，第一个目标是侵占占城，以此作为进攻海外各国的起点。由于占城人民的抗战，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忽必烈并未改变其远征海外的计划，十年之后，又发动了侵略爪哇的战争。

爪哇在当时南海诸国中，是比较强盛的国家，在杜马班（新柯沙里）朝国王哈只葛达那加刺（Haji Krtanagara）在位时（一二五四至一二九二年），曾扩展势力至爪哇岛之外。因此忽必烈认为，只要征服爪哇，则“其余小国即当自服”^④。一二七九年（至元十六年），唆都遣赵玉出使爪哇。次年，元朝再遣使

① 《元史》卷一五六，《董文炳传》。

② 《元史》卷一〇《世祖本纪》。

③ 《元史》卷一二九《唆都传》。

④ 《元史》卷一三一，《亦黑迷失传》。

者去爪哇“招谕”，爪哇亦遣使通好。十八年，忽必烈即命爪哇国王亲自来朝见，被拒绝。十九年又遣宣慰孟庆元、万户孙胜夫等出使，二十三年遣必刺蛮等出使，都未能使爪哇屈服。二十六年，爪哇国王葛达那加刺将元朝使臣孟琪黥面送回，于是忽必烈决意利用这件事作为理由，出兵“征讨”。

一二九二年（至元二十九年），忽必烈命史弼、亦黑迷失、高兴率湖广、江西、福建三行省军二万人（实际出发五千人）侵爪哇。十二月，元军从泉州出发，过七洲洋、万里石塘，又经交趾（安南）、占城界，至东董、西董山、牛崎屿，入混沌大洋橄榄屿，假里马答，于勾栏山驻兵集议方略，伐木造小舟，以便能驶进爪哇国河道。这时，爪哇国内正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被杜马班朝征服的“葛朗国”（谏义里）王室后裔哈只葛当（查耶卡旺）起兵攻破杜马班，杀葛达那加刺。葛达那加刺的女婿土罕必阁耶（拉登·韦查耶）逃到麻喏八歇，积聚力量准备反攻。一二九三年二月，元军到达杜并足（厨闽），一部分登陆而行，一部分仍由水路，至八节涧（泗水）会师。土罕必阁耶正遭到哈只葛当的进攻，十分危急，闻元军至，立即遣其宰相请求救援，表示愿意归降。于是元军协助他击退了葛朗国兵，并进围葛朗国都答哈城。答哈守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被元军击败，哈只葛当被迫投降^①。四月，史弼等准备携带俘虏、战利品班师回国，可能还要土罕必阁耶随军入朝，土罕必阁耶借口要回麻喏巴歇去换正式的归降表，并取所藏珍宝入朝，史弼等信之，只派二百名兵护送他回国。路上，土罕必阁耶杀掉护送他的元军将领，并立即集结军队，夹攻元军。元军兵力已在攻打葛郎的战争中消耗了，因此不敢再战，匆匆登船回国。自侵入爪哇至狼狈撤军，计两个多月，丧失士卒三千余人，为元朝统治者换来了掠夺到的价值五

^① 元军对哈只葛当的处置有四种不同说法：《元史·爪哇传》载，哈只葛当出降后，元军统将“抚谕令还”；《史弼传》载：“哈只葛当出降，并取其妻子官属以归。”《高兴传》则谓元军遭到土罕必阁耶进攻后，“遂诛哈只葛当父子以归”。但爪哇史书《巴拉拉端》说他并未被杀，而是被关在戎牙路狱中，写了一首诗，而后死去。爪哇史书的记载较可靠，可能元军将葛郎王俘虏，准备带回，暂关在戎牙路，不久就死于狱中。

十余万的金宝香布等物。

爪哇之役与侵略日本、安南、占城一样，以失败告终。但忽必烈并不甘心，至元三十年秋，他召见刘国杰说：“爪哇得而复失，卿盍为朕一行？”刘国杰表示“爪哇指末物，臣愿为陛下取之”，忽必烈高兴地说：“此事犹痒在心，岂诸人爬搔所及。卿言乃深合我意”^①。竟准备召集十万军队，再举侵略爪哇。“犹痒在心”一语，极形象地暴露了忽必烈强烈的掠夺欲望和扩张野心。

元朝统治者发动的侵略爪哇的战争，曾一度破坏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正常经济关系。如至元二十九年，因准备侵略爪哇，“暂禁两湖、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②。其后，爪哇及南海各国又恢复了传统的与中国十分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元贞元年（一二九五年），爪哇麻喏巴歇朝（即土罕必阁耶所建立的新王朝）就遣使者到中国来，重建友好的关系。后来，爪哇国王还多次以大臣为使节，来元通好。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元朝也派不达达思送爪哇使者回国。延祐年间（一三一四至一三二〇年），元朝国师曾随商船去爪哇国寻找佛经^③。中国与爪哇的贸易往来更多。据伊本·拔图塔的记载，当时爪哇国的商船往来于中国、爪哇、印度之间，经营着国际贸易，而他本人就是在泉州乘上爪哇商船离开中国的^④。泉州及南方各地的中国商人，也经常到爪哇贸易，常获大利^⑤。

六 印度

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军队追击花刺子模沙札阑丁至印度西北部。后来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在以自然季风为主要动力航海

① 许有壬：《刘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② 《元史》卷一七，《世祖本纪》。

③ 《江苏金石志》卷二〇，《昆山州重建海宁禅寺碑》。

④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五一〇。

⑤ 《马可波罗行记》，页三六八。

的时代,每年秋冬之交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启航的船舶,利用一年一度的西太平洋—北印度洋西北季风航行的最远点,是印度次大陆南端或今斯里兰卡岛。如欲继续向西航行,必在此区域候风,待次年春季北印度洋东南季风起时,才能启程。当时印度次大陆南部最重要的国家有两个,即马八儿与俱蓝,分据印度南部东西海岸。马八儿为阿拉伯语 Ma'abar(渡口)的元代音译。此国又称西洋(或西洋国)、南毗、锁里(或西洋锁里)。俱蓝又称故临。《元史》对此两国扼处东西海路交通要道的重要战略地位描述如下:“海外诸蕃国,唯马八儿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比余国最大”^①。

印度次大陆与波斯湾地区的密切贸易联系,使许多回回商贾频繁往来于阿拉伯海两岸,并以南印度为中继点航行于中国东南沿海与波斯湾之间。在印度南部定居的回回商人日见增多,马八儿也因之伊斯兰化。元初马八儿的国王有五兄弟,分据国内各地。马八儿的回回世家中有来自哈刺哈底(其废墟位于今阿曼)的不阿里(Abū'Alī)家族,经商致富,家中“侍妾三百人,象床黄金称是”。他利用家族世代积累的财力,进入马八儿国的统治上层,世据宰相之位,老不阿里与马八儿与国王五仲昆以兄弟相称,被称为六弟。

元灭宋之后,有意布威信于海外。至元十五年(一二八七年)八月,任命唆都、蒲寿庚为福建行省左丞,并下诏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船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②在此之前,“朝议兴兵讨暹国、罗斛、马八儿、俱蓝、苏木都刺诸国”,因畏兀儿人迦鲁那答思劝阻,乃同意改用招谕的办法。世祖命岳刺也奴、帖灭等出使,“降者二十余国”。^③马八儿向元朝表示“归顺”的时间尚不能确定。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六月,“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以珍物

① 《元史》卷二一〇,《马八儿》。

② 《元史》卷十,《世祖纪》。

③ 《元史》卷一三四,《迦鲁那答思传》。

及象、犀各一来献”。看来，马八儿与元的交往约始于至元十六年。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相继发动的军事远征，使蒙古势力控制了东起太平洋西岸，西达地中海的辽阔地域，极大地震动了海外回回商人。马八儿与元交往的推动力是其国内回回商贾。不阿里与其同僚马因的曾对元朝使臣透露，前往元朝的马八儿使臣札马里丁是他们私下派出的。马八儿国王得知后曾大为震怒，下令籍没不阿里田产，并打算处死之。幸不阿里善辩，乃得脱。为保证经商利益，不阿里一直为往来于其境的元朝使臣和伊利汗国使臣提供海舶停靠、补充供给以至修补舟楫的各项服务^①。

就在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马八儿国向元朝遣使之后，同年底，元政府派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出使俱蓝，次年三月至其国。俱蓝国主必纳的令其弟肯那却不刺木省书回回字降表，准备明年遣使入贡。这年十月，元政府授哈撒儿海牙为俱蓝国宣慰使，偕同杨庭璧再次出使俱蓝。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年），自泉州入海。船行至印度南部，西北季风停止，无法继续前进，遂弃舟就陆，在马八儿登陆，打算假道其境赴俱蓝。其时马八儿与俱蓝处于敌对状态，不同意元使假道。杨庭璧等人经与马八儿宰相马因的、不阿里交涉后未果而返。

至元十九年二月，杨庭璧等再抵达俱蓝，其国主及宰相马合麻等迎拜玺书。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里八的入贡。《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九年杨庭璧招抚海外，“南番皆使来贡。俱蓝国主遣使奉表，进宝货、黑猿一。”“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撒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药物二瓶。又管领木速蛮马合马亦遣使奉表，同时赴阙”^②。至元二十年，元政府命杨庭璧再度出使俱蓝，赐俱蓝国王瓦你金符。杨庭璧四次出航印度，大大增进了中印关系。至于马八里回回世家不阿里因，后因开罪马八儿国王，被迫抛弃

① 刘敏中：《中庵集》卷四，《不阿里神道碑》。

② 《元史》卷一二，《世祖纪》。

妻子财产,逃往元朝,最后逝于福建。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详细记载了元顺帝时期与印度德里算端的一次通使。据载,至正二年(一三四二年)左右,中国皇帝(当为元顺帝)的使臣至印度,赠德里算端麻哈没的(Muhamed)男女奴隶一百名,锦绸五百匹,其中百匹为泉州织品,百匹产自“行在”(Kingsse,即杭州),五曼德(Maund,印度衡名)麝香,镶珠长袍五袭,金布五筒,宝剑五把。来使的目的,欲得允许在印度的僧伽罗(Samhal,即锡兰山)地面重建一所佛寺。从前中国人常到那里去朝圣,后为算端军队所毁。算端遣伊本·拔图塔率使团前往中国报聘,回赠中国皇帝的礼物较送来者更有过之。计有美饰高马一百匹,男奴一百多名,长于歌舞的印度女子一百名,贝兰(bairam,类似棉布,质量精美)一百匹,哲次(Juz,丝料)百匹^①。

根据拔图塔的记载,当时中印间的交通,皆由中国海舶承担。中国船分为三等,最大都称舢(Junk),中等的称为舟(Zao),三等的称为客舡(Kakam)。最大的船有三至十二帆,皆以竹制成,织如席状。每艘载人一千名,其中六百名士兵,四百名水手,另附小艇三艘。这种用途的船舶造于泉州和广州(Sinkalan)^②。

有元一代,中印之间往来频繁,仅《元史》中记载的中印间互派使者的次数就达数十次之多。来元的印度使臣可记姓名的有撮及班、不六温、爱思丁等。欧洲人自海路来往中国、泰西途中多在马八儿或俱蓝停留。《马可波罗行记》、大都主教孟特戈维诺致西方友人的信件中,都有对马八儿、俱蓝与元朝商人、使者往来的叙述。

七 非洲

元代非洲北部最强大的国家是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一二五〇至一五一

①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四一〇至四一二。

②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四一六至四一七。

七年)。元人称埃及为密昔儿^①。一二六〇年蒙古军与密昔儿军大战于阿音札鲁特,蒙古军战败。此后,伊利汗国不断与密昔儿发生冲突。马木路克统治者利用伊利汗与钦察汗之间的矛盾,与北方的钦察汗国结盟,阻止了伊利汗国向西的扩张。此后,密昔儿与钦察汗国关系一直比较密切。因此,密昔儿人对蒙古诸汗国和元朝的情况有所了解。马木路克王朝大臣乌马里,著有《眼历诸国行记》一书,该书记载了自成吉思汗祖先阿兰果火直到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简要历史,除了大汗国(元朝)以外,还记载了窝阔台后王、察合台后王、兀赤后王的情况以及他们与元朝的关系。该书是研究蒙古史和元史的宝贵史料。

在元代,往来于中国、非洲的最著名的旅行家是中国的汪大渊和摩洛哥的伊本·拔图塔。汪大渊曾附商舶出海,至数十国。回国后著《岛夷志略》,记其所见所闻。《岛夷志略》中记载了位于非洲东海岸附近的层拔罗国,即今之桑吉巴尔。汪大渊云:其“国居大食之西南涯,无林,地多卤,田瘠谷少,故多种薯以代粮食,每每贩于其地者若有谷米与之交易,其利甚溥”,“地产红檀、紫蔗、象齿、龙涎、生金、鸭嘴、胆矾。”与《诸番志》相较,其书在叙述地理位置、土地气候和物产方面都更为准确详细,可见元代对东非沿海的知识较之宋代有了较大提高。

伊本·拔图塔一三〇四年生于摩洛哥丹吉尔(Tangier),一三二五年,离家赴麦加(Mekka)朝圣,遂决意游历世界。他历访了阿拉伯、非洲和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许多地方,于一三三三年到达印度,在德里麻哈没的算端(Sultān Mahomed)处服务了八年。一三四二年,元顺帝遣使至印度,德里算端派伊本·拔图塔到中国报聘,伊本·拔图塔一三四二年离德里赴中国。途遭曲折,流寓于俱蓝、马八儿、溜山(马尔代夫群岛)、信合刺的音(斯里兰卡)、朋加刺(孟加拉)等地者数年,而后乘船来到泉州,在游览了广州后,又北

① 密昔儿阿拉伯文为 Miṣr,是希伯来文 Mizrdim 的缩写。

上旅行。他在《游记》中说曾到达大都,不过他关于大都和元朝廷史事的记载多不合事实,当是得自传闻而并未亲历。但他关于泉州、杭州等城的记载,则可以证明确是到过这些地方,如他所记泉州穆斯林头面人物帖必力思人舍刺甫丁(Sharif al-Din)、可咱隆人夏不鲁罕丁(Shaikh Burhan al-Din),都见于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年)吴鉴所撰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伊本·拔图塔在他的《游记》还记载了元朝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的情况,据他说,当时中国的瓷器运销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并转销到摩洛哥^①。伊本·拔图塔在中国还碰见另一个摩洛哥人叫布思里(al-Bushri),又称吉洼木丁(Kiwam al-Din),伊本·拔图塔说,布思里曾随其舅父居德里,后到中国,在中国很有声誉,也很有钱,有男女奴隶各五十名,他还赠给伊本·拔图塔男女奴隶各一名和大量礼物^②。

后来,伊本·拔图塔自泉州启程回国。一三五四年回到摩洛哥,在摩洛哥算端处服务。伊本·拔图塔口述其旅行经历,由算端派书记官朮札伊(Mahomed ibn Juzay)记录成书。伊本·拔图塔《游记》一书像其他多卷本阿拉伯文一样,一直以节抄本流传。十九世纪前期,全书手稿在摩洛哥发现,后由法国学者加以校订并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世人始得见其全貌。

元朝统治者为获得海外奇珍异物,常遣使四出搜求。大德五年(一三〇一年),元朝派使者回回人麦朮丁等赴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购买狮、豹等物,发给路途二年饮食分例;又遣使四起,计正使随员共三十七人,赴刁吉儿地采办异物,发给路途三年的饮食分例^③,可见刁吉儿地应比木骨都束更远,它可能就是摩洛哥的丹吉尔城。摩洛哥古名 al-Maghreb(阿拉伯语,意为极西,今译称马格里布),《事林广记》所载默伽腊国即其音译,书中对默

①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四七八。

②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四九四至四九五。

③ 《经世大典·站赤》。

伽腊国风俗、物产的记述,反映出元代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来往和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比前代有所发展。

从窝阔台到蒙哥时期,蒙古统治者先后入侵过高丽和安南;忽必烈统治时期,又对日本、安南、缅甸、占城、爪哇发动了侵略战争。这些旨在掠夺和奴役邻国人民的侵略战争,遭到了各国人民的反对,中原人民也用种种反抗手段反对了元朝统治者对邻国发动的战争。

尽管元朝统治者对邻国的入侵曾经在一个短时期内危害了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但没有能中断各国人民之间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历史记载以及近年来在亚洲各国陆续发现的元代中国商品都有力地证明:元朝时期,中国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是继续向前发展的。

第三节 元朝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一 元与欧洲各国关系发展的原因

元朝,中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当时,蒙古统治者的势力扩展到黑海南北:钦察汗国的版图达到德涅斯特河流域,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则处在伊利汗国的控制之下。这样,蒙古贵族统治的境域就直接与欧洲国家毗邻。虽然西北两个汗国实际上都是“自帝一方”,但名义上仍算是元朝的“宗藩之国”,因此驿路相通,使臣、商人的往来不受限制。有一个元朝人说,当时“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①。极形容东西交通之畅通。同时代欧洲人帕戈罗提(Pegolotti)也记载说,从黑海沿岸到中国,沿途安全而无危险^②。这是元代中欧关系发展的有利

^① 王礼:《义冢记》,《麟原集》前集卷六。

^②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二九二。

条件。

其次,蒙古统治者早在建国之初就利用“西域”商人来帮助他们搜括财富,许多蒙古贵族、官僚往往与他们勾结起来,从事贸易或高利贷活动。因此,元朝政府不但容许和鼓励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经商或经营中西国际贸易,而且给予种种优待。元朝人说,当时西域商人往往“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要,专其膏腴”^①。所指虽然是回回商人,但欧洲人在元朝也享有与回回人同样的待遇。据元代来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和商人的报告,在大都^②、泉州^③、杭州^④等地,都有欧洲商人长期居住经商或往返贸易。这是促进元代中欧关系发展的另一个因素。

其三,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基督教(也里可温)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一样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可以建立教堂,并有免除赋税、徭役等等优待。虽然元代中国流行的基督教主要是聂思脱里派(景教),但天主教也不受限制。从罗马教廷以及欧洲各基督教国家方面说,也迫切需要与强大的蒙古统治者建立友好关系,初则想借此解除蒙古武装侵略的威胁,进而则企图利用蒙古的力量共同对付伊斯兰教势力。为了达到上述政治目的,最方便的办法便是派遣僧侣充当使者兼传教士,通过扩大宗教影响来谋求欧洲的利益,这就是罗马教廷不断派教士到元朝来的原因。

二 普兰诺·卡尔平尼和卢勃鲁克

一二二三年,钦察人与鞑罗思诸公国联合抵抗蒙古军,大战于黑海东北的阿里吉河上,被蒙古军打得大败。蒙古人与欧洲人的这一初次接触,尽管使鞑罗思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却没有引起其他欧洲国家的重视。一二三五年,蒙

① 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至正集》卷五三。

② 道生:《出使蒙古记》,页二二九引蒙特戈维诺第三信。

③ 道生:《出使蒙古记》,页二三六引安德鲁信。

④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二九三。

古统治者再举西征。一二四一年,在征服了斡罗思各公国之后,侵入孛烈儿、马札儿等国。在里格尼茨击溃了集结在这里进行抵抗的波兰各地军队和普鲁士骑士团的联军。蒙古军势如破竹的进攻,震惊了整个欧洲,基督教徒们甚至将蒙古人的来临看成上帝降下的惩罚而无可奈何。各地纷纷准备自卫,罗马教皇且筹组十字军,准备开赴马札儿抗击蒙古人。

一二四五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大会最重要的议程之一就是商讨防止蒙古侵略的问题。最后决定派遣教士出使蒙古,劝告他们停止杀戮基督教徒和侵犯基督教国土,并改信基督正教。四月,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等人奉命分别携带教皇给蒙古可汗的两封信^①,从里昂出发。一二四六年四月,他们在亦的勒河(伏尔加河)边的营帐觐见拔都。拔都命将教皇信件译为俄文、萨拉森文(波斯文)和蒙古文,听了诵读后,立即决定让使者速到和林朝见大汗,并将教皇信件的译文同时呈送大汗处。卡尔平尼等于七月来到和林附近的失刺斡耳朵,参加了八月举行的贵由登基大典。

贵由接见了教皇的使者,并派镇海等人接待他,了解教皇来信的用意以及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的情况。斡罗思大公雅罗思老带到和林的通事充当了翻译。十一月中,卡尔平尼带着贵由给教皇的复信启程回国,一二四七年秋末到达里昂向英诺森四世复命,并递交了贵由的复信。据卡尔平尼记载,此信原用蒙古文写成,由镇海等人逐字逐句地给他作了解释,他即用拉丁文记录下来。为了使罗马教廷能够在欧洲找到解读原信的人,又译成萨拉森文(指波斯文)^②,交给使者带回。贵由汗复信的拉丁文译文早有传本。一九二〇年,又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了此信的波斯文原件,是用黑墨写在长一点二米、宽〇

^① 卡尔平尼所带的信,内容是斥责蒙古对基督教国家的侵略和屠杀,劝诫其停止这种行为。另一封劝告对方改信基督教、接受洗礼的信,则是由另一教士劳伦特递送的。参见伯希和:《蒙古人与罗马教廷》,页四至六。

^② “萨拉森”,欧洲人对伊斯兰教徒的称呼。在贵由汗复信的波斯文本发现以前,学者一般都认为卡尔平尼记载的“萨拉森文”是指阿拉伯文。

点二〇米的绵纸上(由两段粘接而成),上面有红墨盖的两处同一畏兀儿字蒙古文方印,印文为:“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国大汗圣旨:已服未服百姓根底,圣旨所至,敬之惧之”。贵由汗信中拒绝教皇对他侵犯基督教国境的责备,宣布蒙古可汗系受上天之命征服诸国,要求教皇率基督教国王来朝等等^①。

卡尔平尼回国后,即著《蒙古史》一书作为出使的报告。英诺森四世同时还派出以审温(Simon)为首的另一个使团,去见驻在波斯的蒙古统将拜住那颜,提出同样要求,但不得要领而还。审温使团的报告名为《鞑靼史》。

一二四八年,法国国王圣路易(路易九世)因统兵进攻埃及,驻在塞浦路斯岛,有蒙古使者大卫(David)等奉新任驻波斯统将野里知吉带之命携书来见,宣言贵由大汗将保护所有基督教徒,并帮助他们反对回教徒,收复圣地耶路撒冷^②。圣路易大喜,即遣教士安德烈(André de Longjume)等带着丰厚的礼物,随来使东行,出使蒙古汗廷。安德烈等至蒙古时,贵由已死,摄政的斡兀立海迷失皇后在叶密立之地“按蒙古和中国的仪式”接见了她。使者虽受到礼遇,但海迷失皇后交给他带回的复信,并无表示皈依正教之意,而是通常的谄降套语^③。

一二五三年,法王圣路易复遣教士卢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quis)以传教士身份去见镇戍朮赤封地西境(黑海之北)的拔都长子撒里答,请许其在蒙古辖境内传教。撒里答命他往见拔都于萨莱城,拔都又派人送他去和林朝见蒙哥。卢勃鲁克一行于一二五三年底到达和林之南的冬营地(汪吉河),受到蒙哥的接见。他在蒙古汗廷发现,大汗和蒙古诸显贵对佛教、伊斯兰教和基

① 伯希和:《蒙古人与罗马教廷》,页九二。

② 后蒙哥在致圣路易的信中,斥大卫为骗子。多桑遂断言大卫等系假冒使者名义。但据载,教士安德烈(André)前次出使拜住军营时,曾于该处认识此人,足证大卫其人确在蒙古军中服务。他的出使系由野里知吉带派遣,大约未得到大汗认可,故有假冒之说。参见柔克义译:《鲁布鲁克行记》英译本前言,页二八,注二。

③ 参见《出使蒙古记》绪言,页二〇;柔克义译:《卢勃鲁克东游记》绪言,页二七至三〇引Join Ville《圣路易传》。

督教均同等看待,给予礼遇,唯利用他们“告天祝寿”而已。一二五四年四月,卢勃鲁克随蒙哥返和林,在此居住了两个月。六月末,蒙哥交给他一封致法国国王的信,命他回国传达。卢勃鲁克根据当时译人的解释,将此信的大意记录下来,后来写进了他所著的《东方行记》(给法王的报告书)^①。信的内容仍然是宣扬成吉思汗受天命为大地之主,诸国均应臣服之类的话。

卢勃鲁克的任务无疑是刺探蒙古的政治、军事情报。他极为详细地报告了他的旅程和见闻,特别是当时蒙古汗廷的各种情况。因此,他的行记就成了研究蒙古历史的重要资料。

三 马可波罗

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一二六一年)五月,有“发郎国^②遣人来献卉服诸物”,到达上都。据来使说,“其国在回纥极西徼,常昼不夜。……妇人颇妍美,男子例碧眼黄发。”使者从本国至上都走了三年多,“途经二海,其一逾月方渡,其一亦须一月,其船舶之大,可载五十百人”。忽必烈“喜其远来,回赐金币甚渥”^③。王恽当时正在上都,任职于中书省,他的记载是十分可信的。但欧洲史籍中却找不到有关这次使者的任何记载。大约所谓“使者”其实只是民间商人,又没有留下旅行的记录,故不为其国人所知。这也说明,当时欧洲人远途跋涉来到中国的,为数颇不少。其中,马可波罗的父、叔以及他本人先后来中国的旅行,因有《寰宇记》传世,就成了中外妇孺皆知的事。

一二六〇年,威尼斯市商人尼哥罗(Nicholo)与其弟马菲奥(Maffeo)从君

① 见柔克义译:《鲁布鲁克行记》,页二四八至二五一;《出使蒙古记》,页二〇二至二〇四。

② Frank,是当时波斯人对欧洲各国的统称。元朝人也用这个名称,译作佛朗、法郎等。

③ 见《秋涧集》卷八一。

士坦丁堡至黑海沿岸经商,到了钦察汗国境上的速答黑,又从这里来到钦察汗国都城萨莱,居住了一年。一二六二年,因别儿哥与旭烈兀发生战争,归途不安全,兄弟二人率性继续东行,至不花刺城,又留居了约三年。他们在这里遇到旭烈兀派去朝见忽必烈的使臣^①,使臣邀请这两个拉丁人同来中国,大约在一二六五年夏到达元朝的上都。据说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各国的情况,决定派一个使臣出使罗马教廷,并命尼哥罗兄弟充副使随行。途中,元朝使臣因病留下,以国书交给尼哥罗兄弟继续西行,于一二六九年抵阿克拉。他们向教廷报告后,回到了威尼斯市。一二七一年,他们携带尼哥罗之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谒见新上任的教皇格里戈里十世(Gregoire X)要求回中国复命,教皇亦遣传教士二人携带致忽必烈大汗信随他们来中国。后来,此二教士因故不行,遂将教皇致大汗的信交给尼哥罗等代为送达。他们父子叔侄三人在路上走了三年半,一二七五年夏到达上都。他们所走的大致就是古代东西贸易的交通路线——丝绸之路,但路经伊利汗国境时,还到过许多波斯城市,可能是沿途经商或游历。其后越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取道南疆东行经鸦儿看(今叶城)、忽炭(今和田)、闾缠(今且末)、罗不(今若羌),复经沙州(今敦煌)、肃州(今玉门)、甘州(今张掖)、额里折兀(Ergiuul,即《元朝秘史》之Erije'ü,今武威)、额里哈牙(Egrigaia,即《元朝秘史》之Eri-qaya,今银川)、天德军(即丰州,今呼和浩特市东白塔古城)、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察罕脑儿行宫(今河北沽源县北)等地而至上都。

根据《马可波罗寰宇记》记载,他们此次留居中国达十七年,似乎很得到忽必烈的信任。马可波罗曾奉使云南和江南各地,并在扬州做了三年官,又奉命出使过占城、印度等国。《寰宇记》所载当时中国发生的许多事件以及各地

^① 据《史集》俄译本卷二,页一六六及卷三,页六〇,阿里不哥投降后(一二六四年七月),忽必烈遣使传知旭烈兀,旭烈兀当即遣使回报。约请尼哥罗兄弟来中国的,当是此次使臣。

的情况,基本上符合事实,当是得自亲身的见闻。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夸大和失实之处,但仍足以证明他曾长期在中国居住,并游历过许多地方。马可波罗说,当他从印度回来时,适逢伊利汗阿鲁浑因其妃卜鲁罕死,遣使者兀鲁姆、阿卜失哈、火者等三人来中国,请大汗选赐前妃同族之女为妃,忽必烈遂以卜鲁罕族女阔阔真赐之。阿鲁浑使者见马可波罗等熟悉海道,请求大汗派他们一同护送阔阔真回国。忽必烈答应了这一请求,同时还命马可波罗等回欧洲转送他致罗马教皇和英、法等国国王的信。他们一行从泉州乘船出发,航行三月抵爪哇,从此继续航行十八个月,渡过印度洋,到达忽鲁模子。时阿鲁浑已死(阿鲁浑死于一二九一年),使者们将阔阔真送交继位之伊利汗海合都,海合都又命他们送给阿鲁浑之子合赞。这件事在当时的汉文史料和波斯文史料中都找到了有关记载。《经世大典·站赤》记载着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使者兀鲁姆、阿卜失哈、火者等出使诸王阿鲁浑所,要求发给祇应一事^①,使者的名字与马可波罗说的完全符合。拉施都丁《史集》关于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当合赞到达阿卜合儿(Abher)时,先前“阿鲁浑汗派到大汗处去娶已故卜鲁罕合敦之族女为妃的使臣火者及其使团,携带阔阔真合敦以及中国的珍物来到这里,合赞汗遂驻蹕于此并娶了阔阔真合敦”^②。合赞至阿卜合儿不得迟于一二九三年七、八月,马可波罗等先送阔阔真至海合都处(Tebriz),又再送到阿卜哈儿,需要不少时间。据此看来至少应在一二九三年初,加上海路航行的二十三个月,马可波罗等人离开中国的时间应在一二九一年的春季(趁东北季风南行)^③。

马可波罗等完成使命后,即起程西还,于一二九五年回到威尼斯。一二九

① 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页一五。参见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来华的一段汉文史料》,《文史杂志》一九四一年。

② 《史集》俄译本第三卷,页一五四;参见F. W. 柯立甫:《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史料和到达波斯的波斯文史料》,《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三六卷,一九七六年。

③ 参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注》Cococin 条。

六年,马可波罗参加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被热那亚人所俘。狱中,他将旅行东方各国的见闻详细述说,由皮萨(Pisa)人鲁思梯切诺(Rusticiano)记录整理成书。马可波罗的旅行家声名大著,因此不久即获释回到威尼斯。一三二四年卒于家。

十四世纪以后,《马可波罗寰宇记》一书在欧洲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它对欧洲人认识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的真实情况,起了巨大的作用。

四 列班扫马出使欧洲

大约在一二七五年(至元十二年),有两个中国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修士——大都人列班扫马(Rabban Sauma)与东胜州人麻古思(Markos)^①,决意去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得到忽必烈的准许,领得圣旨文字(jarliq,疑是驿传玺书)^②,随商队西行,后留居伊利汗国。一二八一年,麻古思被推举为聂思脱里教会的总主教,称雅卜·阿罗诃(Yahbh-Allah)三世,驻锡报达城;列班扫马(Rabban,叙利亚语“法师”之意)则被任为巡视总监。伊利汗阿鲁浑即位(一二八四年)后,力图与罗马教廷及欧洲各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计划联合进取耶路撒冷和叙利亚各地。一二八七年,阿鲁浑与雅卜·阿罗诃特遣列班扫马作为伊利汗和教会使节,出使欧洲各国。列班扫马一行从报达出发,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乘船到达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受到了安德罗尼古斯二世(Anronicus II)的款待。复从此乘船至意大利那颇利港,陆行抵罗马。时教皇鄂诺鲁(Honorius IV)已死,列班扫马向教廷主事者说明来意,教廷官员告以需俟新教皇选出后,始能正式答复阿鲁浑汗。列班扫马等继续西行,至法国

① 十三世纪基督教史家(伊利汗国人)把赫卜列思说他们是畏兀儿族人(见巴兹:《忽必烈汗的僧人》)。

② 据把赫卜列思《教会年鉴》(见巴兹,上引书页一)。现存叙利亚文《雅卜·阿罗诃三世传》未载他们奉有大汗圣旨,但从他们沿途受到款待,到伊利汗国后又极受优待的情形看来,奉旨是可能的。把赫卜列思是同时代人,所载当属可信。

都城巴黎,向法王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汗的信件和礼物。腓力四世答应派军队帮助阿鲁浑汗夺取耶路撒冷,并表示遣贵人携带他的复信去见阿鲁浑。列班扫马一行离巴黎去加斯科尼(Gascony)见英王爱德华一世。后者获悉阿鲁浑约请欧洲各国同取圣地,大喜,厚赠使者。一二八八年春,当列班扫马等归途再次到罗马时,新教皇尼古拉四世隆重接待了他们,对阿鲁浑汗优礼基督教和准备从“异教徒”手中夺取圣地,扩大基督教领土一举表示感谢^①。当时,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封建主在一百多年来数次“十字军东征”一再遭到失败之后,仍然没有放弃其占领阿拉伯土地和重建“耶路撒冷王国”的计划,但显然力不从心。恰好这时盛传伊利汗甚至大汗(元朝皇帝)都崇信基督教,于是他们改变了早先对蒙古人的看法,企图和蒙古统治者结成联盟去共同对付“异教徒”,以便从中取利。罗马教皇甚至梦想使蒙古统治者改宗天主教,将教廷的势力扩展到东方各国。因此,列班扫马这次出使受到普遍的欢迎,教皇和各国国王争相赠与贵重礼品。从罗马回国后,阿鲁浑汗对他顺利完成出使任务给予嘉奖^②,使他在聂思脱里教会中居于仅次于总主教的地位。一二九四年,列班扫马在报达去世。麻古思即雅卜·阿罗诃三世,也于一三一七年死于同地。两人虽然都没有回到元朝,但列班扫马的出使欧洲,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罗马教皇和欧洲国家多次派遣教士、使者来中国通好、传教,就是其直接结果。

五 欧洲传教士在中国

列班扫马出使欧洲以后,教皇尼古拉四世益信蒙古可汗尊奉基督教,于是派遣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 Corvino)携带致伊利汗阿鲁浑、大汗忽必烈以及

^① 参见巴兹:《忽必烈汗的僧人》,页六三至七一;一六五至一九六。

^② 巴兹:《忽必烈汗的僧人》。阿鲁浑根据列班扫马的报告,于一二八九年再次遣使送信给法国国王,约他同时出兵攻打埃及。这封信保存在法国档案中,系用畏兀儿字蒙古文写成,信上盖有汉字“辅国安民之宝”方印。

海都的信,往东方传教。孟特戈维诺于一二八九年受命从罗马出发,抵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一二九一年,他与大商人彼得(Peter)结伴继续东行。因当时忽必烈与海都的战争,陆路不安全,他们走海路至印度,留居马八儿年余^①。大约于一二九三年从马八儿乘船来中国,一二九四年到达大都^②。孟特戈维诺向大汗(元成宗)呈交了教皇的信件,得到准许住在大都传教,大商人彼得也留在中国经商。一三〇五年与一三〇六年,孟特戈维诺给本国教友发去两封信,详细报告了他在中国的情况,要求教廷再派教士前来协助他进行传教活动^③。据说,他被看作罗马教皇的使节,在大汗朝廷中有一个位置。他结识了贵族阔里吉思王(按即汪古部附马高唐王阔里吉思),得到此王的不少赏赐和帮助。他在大都建筑教堂一所,购买幼童四十人,教以拉丁文及礼拜仪式,使之唱诵祈祷经文歌曲。其后,大商人彼得复捐资买地再建一新教堂于大汗宫前。他学会了鞑靼人通行的语言文字,并将新约及祈祷诗篇译为这种文字^④,又据新、旧约绘成六幅图画,附以拉丁文、突厥文和波斯文的注解。

孟特戈维诺在信中还诉说了在中国势力很大的聂思脱里派(景教)对他进行的种种迫害,他在此困难环境中努力传教,接受其洗礼者竟有六千人左右。据一三三六年大都阿兰(阿速)人致罗马教皇信及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回忆录》(下详),受洗者主要是从高加索地区迁来中国的阿速人。他们在蒙古西征时降附,被签发从军来到中国,元朝置阿速左右亲军都挥使司统之,使宿

① 孟特戈维诺于马八儿写信给本国教友,信中提到了从忽鲁模子至马八儿的海路航程,可以证明他是由海路至印度的(见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二〇九至二一八)。

② 孟特戈维诺于一三〇五年从大都发给本国教友的信中,说他在大汗身边已住了十二年,可知他系于一二九四年至大都。信中所说的大汗,指元成宗铁木儿(见《出使蒙古记》,页二二四)。

③ 《出使蒙古记》,页二二四至二三一。

④ 信中未明言系何种文字。可能是畏兀字蒙古文。

卫京师,成为元朝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①。他们是原来就信奉基督教的。孟特戈维诺的信中提到,大约一三〇三年初,有一个意大利的外科医生来到大都,散布了许多关于罗马教廷以及教团和西方国家“奇怪的恶言”^②。同年底,又有德国教士阿诺德者来。可见当时东西交通发达,欧洲各色人等到中国来的不绝于途。

一三〇七年罗马教皇知道了孟特戈维诺的情况后,就任命他为汗八里(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授以管辖中国各地主教、僧徒之权,遣主教热拉德(Gerard)、帕烈格利诺(Peregrino)、安德鲁(Andrew)等至中国传教,并辅助他管理教务。他们途经印度,逗留了许多时,大约在一三一三年以后到达大都。不久,热拉德被派到泉州当主教。居住在泉州的一个阿尔明尼亚富妇(当是商人)出资构筑大教堂一座作为主教住所,并时常资助他。热拉德死,总主教命帕烈格利诺继任泉州主教。一三一八年,帕烈格利诺致信本国教友,报告他到中国后的情况。据说在泉州还有三个欧洲教士和他在一起传教^③。安德鲁在大都住了五年,要求也去泉州,得到了元朝政府的批准,乘驿南行。一三二三年帕烈格利诺死后,他就奉命继任。一三二六年,他也从泉州写信给本国教友。信中报告了元朝疆域的广大、国势的强盛,并说皇帝给予他很高的薪俸,到泉州后他又兴建了一所教堂。安德鲁的信还透露了当时有一些热那亚商人在泉州经商^④。按泉州是元代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马可波罗与伊本·拔图塔均称之为世界最大贸易港。中国使节商人去海外,多从泉州启航;外国商船来中国,也大都在泉州登陆,然后运贩到各地。元人有“泉据南海津会”,“万货山积来诸蕃,晋江控扼实要关”的

① 参见《元史》卷八六,《兵志》;卷一三二,《杭忽思传》等。

② 可能是关于一三〇二年法王腓力四世与教皇 Boniface 八世之间的激烈斗争之事。

③ 见《出使蒙古记》,页二二二至二三四;穆勒:《1550年以前在中国的基督教徒》第七章。

④ 《出使蒙古记》,页二三五至二三七。

说法^①。留居其地的外国商人一定是很多的。其实所谓教士,也兼营商业。根据马黎诺里的记载,上述泉州主教和修士们似乎就参与了贸易活动,设货栈供商人储存货物,建浴堂招徕来往商贩,以致大富^②。其后安德鲁也死于泉州。近几十年来,在泉州陆续发现了大量基督教徒的坟墓和墓碑,其中一块墓碑石上刻有拉丁文碑文,半可辨读,大意是“*Andreas Peruginus* 牧师长眠于此”,碑文末所刻年份可辨者为“*M……XII*”,应是一三三二年^③,当即安德鲁去世之年。

据罗马教会历史记载,一三一二年教皇又遣教士托马斯、彼得等人来助孟特戈维诺。这些人可能先到大都,因为帕烈格利诺一三一八年写给教友的信中就提到了佛罗伦萨人彼得已在大都^④。又据教皇派驻伊利汗国都城孙丹尼牙总主教柯拉所著《大汗国记》,这个彼得后来也到了泉州,与安德鲁同任主教之职,各主持一个教堂^⑤。

六 旅行家鄂多力克

一三一六年,意大利教士鄂多力克(*Odoric*)出发往东方诸国旅行。他从君士坦丁堡先到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孙丹尼牙,继游报达、忽鲁模子,从此乘船抵印度,居留多年。约于一三二一年继续东游,从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占城,至广州登陆。再由广州北上,经泉州、福州、杭州、建康、扬州,沿运河至大都。在大都居住了三年,又往中国西部旅行,直到吐蕃之地。此后,他大约走陆路回到威尼斯。一三三〇年他住在帕都亚时,讲述其旅行经过

① 王恽:《徽州路总管王公神道碑》,《秋涧集》卷五五。

②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三五五。

③ 参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页二九至三〇;图版七五。

④ 《出使蒙古记》,页二三三;穆勒:《1550年以前在中国的基督教徒》第七章。

⑤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二四八。

以及所见所闻之异事,由修士威廉用通俗的拉丁文记录下来^①。一三三一年鄂多力克死后,声名大著,其行记广为流传。十七世纪刊印以来,被译成各种文字。

七 教皇特使马黎诺里

一三三六年(至元二年),元顺帝派遣在中国的欧洲人安德鲁·威廉及阿速人脱孩等为使,致书于罗马教皇。据教会史籍记载,信的内容除表示友好,要求教皇“告天祝寿”外,主要是证明使者阿兰(即阿速)人系皇帝臣仆,尊奉基督,请教皇接待,并请帮助购买良马、珍宝等物。大都阿速将领知枢密院事福定、同知枢密院事者燕不花、左阿速卫都指挥使香山等人也同时上书教皇,谓自教皇使者孟特戈维诺来此,深受教导,皆崇信正教,但孟特戈维诺已去世八年(据此知孟特戈维诺死于一三二八年),大都遂无主教,亟请教皇速派才高德隆之教士来任主教。使者于一三三八年抵法国阿维尼翁(Avignon)城教皇驻地。教皇本笃十二世(Benedict XII)隆重款待元顺帝使者,使游历欧洲各地。并派遣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Marignolli)等为特使,率领一个五十人的庞大使团,携带致元朝皇帝信及礼物,出使中国。马黎诺里一行于一三三八年年底从阿维尼翁出发至意大利那颇利港,会齐元朝来使,先到钦察汗国都城萨莱,继循商道东行,至玉龙杰赤,又经阿力麻里、哈密力等地,于一三四二年(至正二年)始抵上都。马黎诺里献给元顺帝一匹骏马,元顺帝大喜,命在廷文人赋诗作画,称为“天马”,竟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周伯琦写的《天马行应制作》诗序中说:“至正二年岁壬午七月十有八日,西域拂朗国遣使献马一匹,高八尺三寸,修如其数而加半,色漆黑,后二蹄白。曲项昂首,神俊超逸,视它西域马可称者皆在髀下。金辔重勒。馭者其国人,黄须碧眼,服二色窄衣。言语不可通,以意谕之。凡七渡海洋,始达中国。是日天朗气清,相臣奏进,上御

^① 玉尔:《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页一五九至一六〇。

慈仁殿，临观称叹。遂命育于天闲，饲以肉粟酒湏。仍敕翰林学士承旨臣巵巵命工画者图之，而直学士臣揭傒斯赞之。盖自有国以来未尝见也。”^①画家周朗所作的《天马图》，藏于内府，历代相传。清初耶稣会士宋君荣(Gaubil)还在清朝宫中见过。一八一五年(嘉庆二十年)的内府藏画目中还有此画。其后下落不明^②。

这么一件并不贵重的礼物，因为投了腐朽的元顺帝所好，使马黎诺里等人得到了隆重的接待。他们在大都住了三、四年，于一三四六年南行至泉州，乘船回国，一三五三年返抵阿维尼翁复命，马黎诺里后居布拉格，受德皇查理之命著《波希米亚史》，书中附带叙述其出使中国的见闻。后人从此书中将游记部分辑出，题为《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遂成为研究元代中西交通的重要史料。

综上所述，元朝统治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较之前代有很大的发展。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以及欧洲国家的陆路交通，两宋时期由于中国处于分裂状态，曾经衰落；到了元朝，这条交通线不仅得到恢复，而且交往的范围更扩大，来往更频繁了。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路交通，也在宋代的基础上更繁荣活跃起来。特别是许多欧洲国家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多次派使臣、教士和商人东来，这是过去历史上所没有的。

中外交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著名的中国印刷术、火药武器等科学技术，就是在元朝开始传入波斯、阿拉伯和欧洲；同时，波斯、阿拉伯素称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方面的成就，也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通过广泛的交往，还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因此，无论

① 周伯琦：《近光集》。又吴师道《礼部集》卷一一《天马赞》序云：“至正二年秋七月，上在滦京，拂郎国来献马。……拂郎在西海之西，去京师数万里，凡七渡巨洋，历四年乃至。上御慈仁殿受之。后月，乘以归燕，即敕画工为图，仍命词臣赞之。”

② 参见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徒》，《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是在古代中国的或是在许多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史上,元朝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无疑,这种国际交往的加强,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

第十一章

元代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是指某个历史时期人类所处的生存状貌,这种状貌应依存于物质与精神两个基点;它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显明的时代特征。显然,在这里对元代社会生活进行全景式描述既不可能亦无必要。现就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做如下简要论述。

第一节 服饰

元代服饰承袭了历代的一些长处,又吸取一些少数民族的优点,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贵族多着四合如意云肩,大宴饮盛行的质孙服等等。元领和元领衫的进一步通行与“比甲”的出现,则似乎表明了某种简装化的趋势。

一 几种代表性服饰

先看蒙古族通行的几种服饰。

(一)袍服

典型的蒙古长袍“如中国道服之类”,“右衽而方领”。与突厥人在长袍左边扣扣不同,“鞑靼人则总是在右边扣扣子”^①,且“腰间密密打作细褶,不

^① 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之《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月版,页一一九至一二〇。

计其数”^①。男女袍服用粗麻布、天鹅绒或织锦制成，样式男女稍有区别^②。制作材料原先用毡、毳、革，随着征服地域的扩大，“新以缣、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贵族妇女的袍服“多是用大红织金缠身云龙”，且花饰多样，装饰富丽。“行时有女提袍，此袍谓之礼服”^③。袍服腰间所系的彩带称“腰线”或“系腰”，一般用红、紫帛捻成，据说是为了骑马时“腰围紧束，突出彩艳好看”^④。妇女还惯用一块天蓝色的绸料束腰，用另一块绸布束胸，再用一块白色绸料扎在双眼下，向下挂到胸部^⑤。

一 (二)“质孙”服

“质孙”(Ĵisun, Ĵisu)，蒙古语，意为颜色，指宫廷宴饮时所着一色衣；这种宴会称“质孙宴”，又称“诈马宴”。“诈马”(Jamah)是波斯语的音译，意为衣服^⑥。此服饰习惯称为“金锦衣”、“金织文衣”。蒙元时代凡忽里台大会和內廷大宴皆服之，意在“亲疏定位，贵贱殊列”，“必上赐而后服”^⑦，且“其佩服日一易”^⑧。为此，与宴的皇帝、贵族、大臣等人有多套质孙服。按照马可波罗的描述，所谓质孙服指包括衣、带、靴等物在内、并缀有珠宝的宴饮用服饰^⑨，其中，皇帝冬季和夏季各用纳石失服十一袭和十五袭。官员人等的冬、夏服有九等和十四等。叶子奇另对“朝服”和“外授省札”者的服饰

① 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

② 详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之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页八。

③ 《折津志辑佚·风俗》。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九月版。

④ 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史卫民著：《元代社会生活史》（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版）为本章的撰写提供了很多方便。

⑤ 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之《鲁不鲁乞东游记》，页一二〇。

⑥ 详韩儒林：《元代诈马宴新探》，载《穹庐集》，页二四七至二五四。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版。

⑦ 《经世大典序录·燕飨》，载《元文类》卷四一。

⑧ 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

⑨ 穆勒、伯希和译：《寰宇记》，页221、225。

做了报道^①。

(三)发型、笠帽与罽罽冠

先看蒙古人特殊的“婆焦”发型。“婆焦”即男子结发垂两耳，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鲁不鲁乞均有详细描述^②。汉籍记载与之略同：“环剃去顶上一弯头发，留当前发，剪短散垂，却析两旁发，垂绾两髻，垂加左右肩衣袄上，曰‘不狼儿’，言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不能狼顾。或合辮为一，直拖垂衣背。男子俱带耳坠”^③。辮发有一答头、二答头、三答头、一字额、大开门等诸多发式和其他多种编法^④。妇女的“练椎”（失不勒格儿，shibülger）或指垂于胸前的两个发辮^⑤。

再看笠帽。“官民皆带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盖兜鍪之遗制也。其发或辮，或打纱练椎，庶民则椎髻”^⑥。其中檐式帽可能由忽必烈皇后察必改进。《元史》记载：“胡帽旧无前檐，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语后，后即益前檐，帝大喜，遂命为式”^⑦。贵族所戴笠上往往穿结珠玉，冬季戴用的帽子则往往与“质孙”服相配套。

罽罽（有顾姑、故姑、罽姑等不同译写），即蒙古语之孛黑塔（boghta），意指已婚妇女戴用的冠饰。大蒙古国时期的中外使者都见到过这种冠饰，其中尤以鲁不鲁克和普兰诺·加宾尼的描述尤为生动而详尽^⑧。入元以来，罽罽仍

① 《元史》卷七八，《舆服志》—《冕服》；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② 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之《蒙古史》页七、《鲁不鲁乞游记》页一一九。

③ 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载《郑思肖集》，页一八一—一八二；另详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④ 见清人吴铎辑《净发须知》转引《大元新话》中载录的各种发式。转引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页三九七。

⑤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卷一（五六节）。

⑥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⑦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

⑧ 详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页八、一二〇。

盛行于后妃等贵族妇女之间,其形制也较蒙古国时期更为华贵^①。一九七四年发现的一顶罽罽冠可能是当时较为典型的一种^②。陶宗仪诗曰:“双柳垂鬟别样梳,醉来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③,可见,罽罽冠在江南等地被视为新奇之物。据说,除蒙古、色目妇女外,“南方汉儿妇女则不得戴之”^④。

(四)其它

察必皇后在改制“胡帽”的同时,“又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襟,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⑤。《朴通事谚解》(上)提到一件“绿抹绒胸背的比甲”时,注“胸背”曰:“纱罗段帛之上以彩绒织成胸背之纹,裁成衣服者也”,而“衣无袖对襟为褰积者曰比甲”,且“妇女亦依此制为短袄着之,亦曰比甲,通称褙护。”贫者的“答忽”(即褙护)一般以狗皮或山羊皮制作^⑥。

二 官员服饰

蒙元时代的舆服之制有承袭蒙古传统的一面,亦有“考古昔之制而制服”的一面,后者《元史·舆服志》有较为充分的反映。用于朝会、册封、大礼的冕服与中原服制基本一致,其中,专门规定缠身五爪大龙图案(即《朴通事谚解》(上)所说的“五爪二角龙为文者”)为皇室所专用^⑦。包括宿卫人员在内的官

① 详《析津志辑佚·风俗》。

② 详盖山林:《内蒙古蒙古族和汪古部的顾姑冠》,载《丝绸之路草原民族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页299至303。

③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八,《聂碧窗诗》。

④ 《事林广记》后集,卷十,《服饰类·服用原始》。

⑤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

⑥ 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之《鲁不鲁乞东游记》,页一一八至一一九。

⑦ 《通制条格》卷九,《衣服·服色》。

廷人员的服装也按照中原传统服制予以规范,如幞头、唐巾等便几乎取代了原有的笠帽。

官员的公服——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颁布“文资官定例三等服色”^①。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定军官服饰“依随朝官员一体制造”,文武官员服饰等第自此无别,但公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此外,按元代以右为尊的惯例,公服必须右衽。关于各类公服,叶子奇曾以“蝉冠朱衣,方心曲领,玉佩朱履”数语做出概括,又说:“一品二品用犀玉带大团花罗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带紫罗袍,六品七品用绯袍,八品九品用绿袍,皆以罗流。外受省札,则用襕褐。其幞头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②这与《元史·舆服志》的记录基本一致。显然,元代品官服饰的等次分划较之唐、宋、明、清要简单一些。

吏的公服与常服——至元九年三月初定公服为檀褐罗窄衫,系黑角束带(亦作乌角带),戴舒脚幞头。大德七年(一三〇五年)九月立为定例。次年,定“流外之职”的巡检、院务仓库官的服饰同于吏。延祐二年,规定吏的常服“许服绸绢”。五年,规定驿站官员的公服同于吏^③。

命妇服饰——陶宗仪说:“国朝妇人礼服,达鞞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无贵贱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别,惟处子则不得衣焉。”^④命妇按一至三品、四与五品和六品以下三个等次,规定相应的服饰^⑤。

《朴通事谚解》(上)详细描述了一位舍人(显贵子弟)所崇尚的一种“刺(疑应作“刺”)通袖漆栏”衣着,“其直(值)甚高,达达之俗,今亦犹然。”

① 《元史》卷七,《世祖纪》四。

②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另详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七,《官制资品》。

③ 《元典章》卷二九,《礼部》二《服色》之《提控都吏目公服》、《典吏公服》、《巡检公服》、《站官服色》。

④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贤孝》。

⑤ 《通制条格》卷九,《衣服·服色》。

三 庶人服饰

庶人只能用暗花绞丝、丝绸绉罗、毛毳制作服装,禁用赭黄色,甚至禁用各种鲜明色彩。但比皇室专用的五爪金龙“少一个爪儿”的“胸背龙儿的段子”不在禁用之列;帽、笠不许用金、玉装饰。妇女首饰许用翠花和金钗钿各一件,耳环可用金珠碧甸,其他首饰皆用银制^①。《朴通事谚解》(上)多次提到,“织金胸背段子”(产自陕西的名品)是大都热销商品。该书(中)的南京鸦青段子和葱白素通袖膝栏段子或许也是元代即已流行于大都的名品。

民间流行的服饰有上盖、团衫、唐裙、裙裾、汗衫、裹肚等。其中的“上盖”较为通行,陶宗仪说:“俗谓男子布衫曰布袍,则凡上盖之服或可概曰袍。”^②可见上盖是比较讲究的男子袍类或袄类服装的泛称,元曲之类的文艺作品中提到的“布袍”、“布衫”抑或指上盖;另如儒服:至元十年规定参加祭礼的儒生穿着茶褐罗窄衫,系黑角束带,戴舒脚幞头。同年又规定参加祭孔的儒士须自备鞞带、唐巾。大德十年(一三〇六年)六月,以各地学正、学录、教谕等儒官与儒生同服,有失尊卑,规定儒官与吏一样,同着公服,但“南北士服,各从其便”^③。娼妓——至元五年十月,鉴于娼妓之家服饰多与官员士庶混同,乃规定“娼妓各分等第”,穿紫皂衫子,戴着特定“冠儿”;其家长和亲属中的男女服饰亦有严格的规定^④。服饰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如大都所在的所谓“幽燕沙漠之地”,达官贵人往往以鲛(鱼的头骨)制成“鬼眼睛”,用青皂帛系于头

^① 《通制条格》卷九,《衣服·服色》;《元典章》卷二九,《礼部》二《服色·贵贱服色等第》。

^②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贤孝》。

^③ 《元典章》卷二九,《礼部》二《服色》之《提控都吏目公服》、《典吏公服》、《巡检公服》、《站官服色》。

^④ 《元典章》卷二九,《礼部》二《服色》之《娼妓服色》。

部,以避风沙迷眼。市民多造茶褐木棉鞋出卖,西山人则多做麻鞋出城货卖。因此鞋备有系带,“便于登山”,故当时亦为束足的女子所喜好。大都平民多服羊皮御冬。皮衣单层,每年三四月间店家多平价卖出。冬季不论品质好坏,又添置新衣;腿部多着带毛皮裤,“然皆窄狭,仅及腿胫耳”^①。杨显之的《酷寒亭》杂剧中的酒保原为江西人,其道白中有“一领布衫二丈五,桶子头巾三尺八”句,这或许是南方的一种普通穿戴。另据陶宗仪言,妇女之缠足虽起于近世(一般以宋前后为“近世”),但熙宁、元丰以前尚少见,而“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而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名曰鞞鞋,妇女非缠足者,通曳之”^②。

元代民间通常使用的“大帽”也称“笠子”。陶宗仪说,胡石塘先生应聘入京,忽必烈召见他时,“不觉笠子欹侧”^③。《朴通事谚解》(中)提到的热销于大都市场的大帽有“(云南)毡大帽儿”和“(陕西)白驼毡大帽儿”。同书(中)提到的“油帽”有“油纸帽”和“油绢帽”两种,这或许是平民常用帽饰。孔克齐则谓,元代“学士帽”之“遗制”与僧人的“师德帽”相类似^④。

高丽服饰作为时尚,在元末颇为风行,“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⑤，“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⑥。在江南,“用紫色棕藤缚帽,而制靴作高丽国样,皆一时所尚”^⑦。

① 《沂津志辑佚·风俗》。

②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缠足》、卷一八,《鞞鞋》。

③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应聘不遇》。

④ 孔齐(孔克齐):《至正直记》卷三,《学士帽》。

⑤ 张昱:《官中词》,载《辽金元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版,页一七至一九。

⑥ 权衡:《庚申外史》,页九六。任崇岳笺证本,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⑦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处士门前怯薛》。

第二节 饮食

关于元代各族的饮食,文献有“汉儿茶饭”、“回回食品”、“女直食品”、“西天茶饭”、“畏吾儿茶饭”等多种称谓^①,现将几个较突出的方面归纳如下。

一 酒与酒海

太祖辛巳年(一二二一年)蒙古大军攻宋期间,赵珙随南宋使团赴蒙古,目击蒙古人的宴饮风俗:牧民“生涯止是饮马乳以塞饥渴”。宴饮时,主人执盘盞相劝,客人每饮必尽,否则主人不接盞;饮酒时,邻座必互换杯盞,别人与自己换盞,也必饮以尽,并斟酒劝答;客人如尽醉喧闹,进或吐或卧,便特别高兴。在他们看来,烂醉如泥,即是尽意、同心的标志^②。这里的“马乳”可分为两种,一是生马奶子,《秘史》八五节作“循”(sün),二是酸马奶子,《秘史》作“额速格”(esüg)。这些用马奶和用马奶发酵而成的马奶酒西方人一般用突厥语称“忽迷思”(qumiz)。

蒙古国时代,中外宾客进入汗廷或诸王权贵的斡耳朵时,几乎毫无例外地见到,入口处有一尊盛满马湏或酒的巨瓮或革囊,侧旁的木案上置放各色金银器皿。大汗或诸王权贵坐北面南,主膳官员着礼服,面北侍立或跪坐酒器左右,专司进酒。另二人将挹满酒、湏的杯盞,献给主坐及重要宾客;位次者,则由人提瓮或壶而至,斟于杯中^③。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大,酒器的名目、形制也愈益繁华、奢靡。鲁不鲁乞在哈刺和林参加蒙哥的朝会时见到状如“一株银

① 《老乞大谚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饮膳正要》卷一、《聚珍异馔》。

② 王国维:《蒙鞑备略笺证》。

③ 穆勒、伯希和英译本《寰宇记》,页二一八至二一九。

制大树”、构思华巧的欧式酒海^①，与陶宗仪见到的大明殿的那组酒器基本一致^②，后者提到的“木质银裹漆瓮”或作“酒瓮”、“酒海”、“酒局”、“大樽”^③。大明殿之后的延春堂与广寒殿等处也有这类酒器，后者又称“涑山大玉海”、“黑玉酒瓮”。陶宗仪说这种器具“有白花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④。

进入中原后，蒙古权贵一直保持着饮用马奶和马奶酒的习惯，两都巡幸时，历朝皇帝的陵寝（随行的各斡耳朵）甚至也各有专用的承乳车（“酝都”），“取马乳以供祀事，号金陵挤马”^⑤。鲁不鲁乞曾详细描述了制作马奶酒的方法^⑥。此酒须撞七、八日，与平常之色白而浊、味酸而臃者不同，此乳以色清而甜见称，也称为“湏酒”。

“酒海”中的饮料尚有驼酒、葡萄酒和各类米酒。葡萄酒在元代仍一枝独秀并出现许多高档名品，如舍里别（阿拉伯语 sharab，指饮料），系用青葡萄与木瓜、青橙等原料煎造。镇江路每年生产四十瓶，派专船上贡大都皇宫，主要原料青葡萄亦在当地精心栽培^⑦。宫廷上品聚涛饮、露囊饮、琼华汁、玉团春、

① 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之《鲁不鲁乞游记》（页一九四至一九五），后来的马可波罗亦有相应记载（详穆勒、伯希和译：《寰宇记》页二一八至二一九）。

②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官阙制度》。

③ 韩儒林：《元代漠北酒局与大都酒海》，载《穹庐集》，页一四〇至一四四。

④ 《元史》卷《世祖纪》一；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官阙制度》。清乾隆年间，在北京皇城内一所道观内发现一尊奇特的腌菜坛，高0.7米，直径1.35米，重约3500公斤。坛用黑玉雕成，其形饰与上列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无疑，这就是元代置于广寒殿中的大玉海，也是现存最早、形体最大的传世玉器（《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北京北海团城玉瓮亭”）。

⑤ 《元史》卷一〇〇《马政》三《马政》；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三，《句容郡王世绩碑》。

⑥ 详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之《鲁不鲁乞东游记》页一一六至一一七。

⑦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四《土产》、卷五《赋役·土贡》。

葡萄春、凤子脑、蔷薇露、绿膏浆等多为葡萄酒类^①。元中期著成的《饮膳正要》也列有宫廷用酒十三种。酿造史上的突出事例是引进、制造阿刺吉酒。“阿刺吉”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及波斯语(araq),它采用葡萄酒、枣酒、好酒及“一切味不正之酒”加以蒸馏,“取酒之精液”而成。作为义译,汉语也写成汗酒、酒露、烧酒、重酿酒^②。有趣的是,夏天大都的酒馆还在大长石枳中存放大冰块,用融化的冰水酿酒。据称,酒槽中水泥有一尺左右深^③。这便是古代的“冰酒”。《朴通事谚解》(上)还提到林檎烧酒、长春酒、苦酒和豆酒。

二 宴飨

元代皇室御膳、宴飨由宣徽院掌领,其中专掌造酒与提供造酒原料的属司有九个,提供粮食、牲畜、蔬果、茶叶、柴炭等物资的属司有十五个,而直接掌御膳的机构是尚食、尚酝二局^④。元制“重天官内膳之选”,宣徽院大臣从一品,均由天子亲信担任,凡饮食汤膳,必由他亲尝;大宴会时,由他主持行酒,诸王后妃要向他行答礼^⑤。

天子常膳称“小厨房”、“大厨房”。“小厨房”由“内人”调膳,供奉“八珍”。陶宗仪记录的“迤北八珍”或即元代的宫廷珍馐^⑥。

“内膳”之外的“外膳”称“大厨房”,也称“宣徽院所掌汤羊”。元制,太仆寺管马群(后来转属中书省),宣徽院管牛羊,加上蒙古各部的贡纳,宴会及天子常膳所需的肉、乳类等基本食品,来源极其充裕。羊系指“二岁羯

① 陶宗仪:《元氏掖庭记》。

② 黄时鉴:《阿刺吉与中国烧酒的起始》,载《文史》第三辑。

③ 《析津志辑佚·风俗》。

④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⑤ 《元史》卷一一九,《博儿朮传》。

⑥ 杨允孚:《滦京杂咏》(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续演雅发挥》。另参见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六,《行帐八珍诗》、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之《十筵诗》(见王献唐遗书《双行精舍校汪水云集》,齐鲁书社,1984年1月版,页一九至二一)。

羊”。窝阔台时规定，每年从蒙古百姓羊群里抽取一只，此为“上供羊”。“大厨房”与“汤羊”等称，如诸王在各自的份地围猎时获得的珍奇野物要上缴“大厨房”。

天子常膳用羊五头，品种有当今列入保护动物的黄羊；有天鹅。皇室与贵族设有“打捕鹰房”，执役者昔宝赤，专养海青捉获天鹅。每获一只，赏黄金一锭。上供御膳用的天鹅往往重达三十余斤^①。蒙古人素不食鱼，但御膳中却有贡自黑龙江的名贵鱼类^②。天子也食稻米，制作颇为讲究，粳米一石，仅得“圆米”四斗^③。

王恽说：“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三者而已”，后者的作用之所以异乎寻常地突出，就在于“虽矢庙谟，定国论，亦在于樽俎饜饩之际”^④。元代宴飨分两类，一是推举大汗、皇帝以及决定军国大政的大朝会（忽里台），二是通常的宫宴，称内廷大宴。与宴者都须穿着由大汗或皇帝颁赐的质孙服，且每日必易一服。这样的大型宴会似乎都可称为“质孙宴”或“诈马宴”。与宴者按序列座。开宴前，掌管金匱秘籍的一二名大臣捧出成吉思汗大札撒，诵读其中若干条文^⑤；行“月脱”（otok）礼时，列于左阶的一名大臣手执拍板，抑扬其声，高声赞颂：“斡脱”，立于右阶的另一位大臣顺声应和：“打弼”。伯希和认为，二词均借自突厥语，其意分别为“请酒”和“敬献”^⑥。献饮食的数位大臣“皆用金绢巾蒙其口鼻，俾其气息不触大汗饮食之物”；皇帝把饮，陪者下跪，众乐齐作。饮毕，献酒者接盏，众乐顿止。再饮时其礼皆如上述。食毕撤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昔宝赤》。

② 杨允孚：《滦京杂咏》（上）。

③ 《元史》卷一二五《铁哥传》。

④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五七，《吕嗣庆神道碑》。

⑤ 杨允孚：《滦京杂咏》（上）。

⑥ 韩儒林据《元史》、《秘史》及虞集、马祖常、刘敏中诸记载判断，此“月脱”之礼乃天子饮酒之礼，正如陶宗仪所说，“诸王大臣，非有赐命，不敢用焉”，详《蒙古答刺罕考》，载《穹庐集》，页三一至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版。

席,宴飨进入又一高潮:倡优伶人、斗士幻者,竞献百技歌舞^①。与宴者酒映酡颜,目迷千态。日暮秉烛时分,方尽欢而罢,众人策马出城,各还其所。

三 民间饮食概况

《朴通事谚解》曾详细记述了一种名为“秃秃么思”的做法。这种面点按各人口味加上多种调料与杂拌,“用竹签取用”。元代创制的这道食品,多见于元杂剧和元代文献,是北方人广泛喜爱的名点。

南北饮食的地域差异很明显。元杂剧《酷寒亭》有曰:“他(主人)家里吃的是大蒜臭韭、水答饼、秃秃茶食(即“秃秃么思”)。我那里吃的,我江南吃的都是海鲜,顺口吟道:‘江南景致实堪夸,煎肉豆腐炒冬瓜。’”这段台词生动反映了一个元初被掳略到北方并在一回回官吏家当奴婢的江西人对南北两大饮食特点的感受。当时蒙古、色目人南下时往往不吃山羊而要求吃北地产绵羊^②。在大都,一般经纪人、手工业者之类的市民,每天晌午食用蒸饼、烧饼之类的点心。早晚两餐则实行“共餐制”:中间大乌盆木杓一只,盛放“水饭”即稀饭、汤饭之类作为共用主食;餐具多用“木匙”(木制调羹)。少数人家用“筋”(竹筷),人手一双,就着生葱、韭蒜、酱、干盐之类的菜蔬,围坐共食^③。

南方各地饮食的地域性差异也很明显。鄂多立克说,他在广州见到,众多香味的蛇作为时髦盘肴被人食用,并且,“如请人赴宴而桌上无蛇,那客人会认为一无所得”^④。今苏浙太湖流域的饮食也有自己的独特风味,在那里生活

① 穆勒、伯希和译:《寰宇记》,页二一九;贡师泰:《玩斋集》卷五,《上京大宴和樊中侍御》;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

② 《大元马政记》。广仓学窘丛书本。

③ 《析津志辑佚·风俗》。

④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之《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华书局,一九九一年十月版。

的元后期著名文人倪瓒对饮食讲究造作精细,色味雅洁。鱼米之乡的孕育,在他笔下产生了一套食谱,并以家居为名,号“云林堂饮食制度”。书中列饮馔五十种左右,清代著名文人、美食家袁枚对历代烹饪之作多置鄙视之词,唯对倪作评价甚高,曾将其烧鹅命为“云林鹅”,收入《随园食单》中,因为,他认为云林菜肴符合“一物有一物之味,不可混而同之”的原则,保留了原料的原汁原味。东南沿海的江阴、上海、海宁等地于初春时喜食螳螂子(另有螿螿螿、鸚哥嘴等称谓),即河豚,并形成一套防止中毒的烹调法^①。沿袭前代习惯,以杭州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官府富家”和“都下街市”常置“四司六局”宴待宾客,以求“筵席排当,凡事整齐”,且“便省宾主一半力”^②,《朴通事谚解》(上)所细述的北方“赏花筵席”可与之相得益彰。

马可波罗对杭州的日常消费留下的印象是:每星期有三天为市集之日,届时野味、家禽、牛羊、菜蔬果实,应有尽有;市中积鱼之多数不胜数,“盖城中每餐皆食鱼也”;再如胡椒,全城每日消费胡椒四十四担,每担合二百二十三磅^③。元末浙江人陶宗仪也说过,杭州人日常消费普遍以新奇、价贵为时髦。廉价货物反遭冷落,即便想买,也怕邻里取笑^④。文献还报道说,太原路民户嫁女娶妻不量力而行,有的人家兴办夜宴,肴馔三二十道,酒席三二十桌,通宵不散,以致官府出面对宴饮规格作出严格限定^⑤。

四 日餐制和点心

古代日食两餐,称朝、晡两食。唐宋始向三餐制过渡。元代三餐已较普遍,上面提到的大都经纪人与工匠人家就是日食三餐。“一日三餐”亦多见于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食品有名》、卷十,《食物相反》。

②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九,《四司六局》。

③ 穆勒、伯希和译:《寰环记》,页三二八——三四〇。

④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一,《杭人遭难》。

⑤ 《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私宴》。

民间用语,杂剧《玉梳记》有言:“每日家三餐饱饭要腥荤”,《举案齐眉》有曰:“一日送三餐茶饭去”^①。日餐制与人们的生活、劳动节奏息息相关,而点心的介入则更值得注意。

广义概念的“点心”是与正餐、大菜相对而言,此外的一切小食都是“点心”。从构成看,点心应以粉食为主,另有果品、杂食,元代则大量加入了游牧民族的乳酪制品。

点心或源自南朝^②,宋代“世俗例以早晨小食为点心”,这可能已与后来点心的含义相同。到了元代,至少在江浙的多数地区,早饭前后、午前午后、黄昏前,人们已普遍增“小食”为“点心”^③。点心又有“从食”之称^④。可以说,到了元代,点心完全从正餐中独立出来,从此,人们为自己的饮食增加了新的情趣,生活质量有了新的改善。随着南北两大地域间交往水平的提高,点心的制作方法也得到大规模交流,点心名目繁多,令人目不暇接。《饮膳正要》“聚珍异饌”列出的九十四种食品中,粉、麦、粥、饼、馒头等点心类就占去三分之一,其他各门类也不乏点心的记载。《居家必用事类全集》“果品类”项下还登录了果实的蜜煎法、糖腌法、贮藏法共二十余种。果实加工业的发展,使更多干果类制品进入日常饮食领域;除“从食”属真正的“点心”外,书中所载名目众多的湿面食品、无汤干面食品、煎酥乳酪品(煎炸酥脆食品)和诸粉品(粉制食品)亦未尝不可划入点心类。可见,元代点心的领域已有大幅拓展。

五 茶饮

元代的茶叶制作与品饮方式似乎呈现出简化与实用的明显趋向。

王祜从茶叶的煎饮角度出发,将茶叶列为茗茶、末茶与蜡茶三大品类。王

① 分见《元曲选》第四册,页一四一一;第三册,页九二一。

② 称“小食”,见《梁书》卷八,《列传》第二《昭明太子传》。

③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七《点心》。

④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庚集。

楨还说,南方虽产茶,而识用“末茶”饮法者甚少;“蜡茶”“民间罕见之”,而“茗茶”则已通行于南方。明人丘浚也说,唐宋时通行的末茶(当含以茶末制成饼、片的成形茶)到明代已为世人遗忘,“叶茶”则一枝独秀,“遍于中国”而行于“外夷”^①。不过,末茶、蜡茶在元代上层中仍相当流行,“茗茶”(即“叶茶”)则不仅遍及民间,而且,早在蒙古国时代即已在上层通行^②,后期文人品茗时不时提及的“雷芽”、“金蕊”、“碎白芽”、“韭叶”、“龙牙”应是叶茶的形状^③。可见元代冲茶以饮的现象已较普遍。

《饮膳正要》中还收录“温桑茶”、“女须儿”、“西番大叶茶”(“西番”应指西藏和四川地区西部的宣政院辖地)。此茶应产于四川西部。元政府在今分宁(今江西修水)等处设官坊成造“西番茶货”^④、广南的“孩儿茶”、“金字茶”和“范殿帅茶”(“范殿帅”指投降蒙古的范文虎。此茶系江浙庆元路进贡,应属叶茶,其味“绝胜诸茶”)。

茶叶以其独到的化腻作用成为以肉食为主的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饮料。宋代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盛行茶马贸易。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原,茶叶成了他们可以统一规划调配的物资,宫廷生活的专管机构宣徽院直辖茶场遍及福建、江浙,茶工从宋代的二千多人扩充到二三万人^⑤。《饮膳正要》中记载了几种加入乳类的“炒茶”;“兰膏”和“酥签”在宫廷中属“汤煎类”饮品,都是在末茶中加入酥油。此外尚有“玉磨茶”和“香茶”。后者与下面的三玉川茶可能都是适应游牧民饮食需要而制成的“工夫茶”。

为便于茶马贸易时的长途运销,宋景德年间(一〇〇四至一〇〇七年)湖北

①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二九,《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山泽之利下》。

② 详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五,《西域从王君玉乞茶》。

③ 《萨天锡诗集·后集·元统乙亥余除闽宪知事未行立春十日乡政许可用惠茶寄诗以谢》;谢宗可:《茶笈》,载《元诗选》戊集。

④ 《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一,《资品》。

⑤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地区用米浆将两湖产茶叶粘合成饼状或圆柱状,称“帽儿茶”(又名“工夫茶”),这大概是青砖茶的前身,但一般认为此茶到明代中叶才发展起来,其后“三玉川”茶庄压制的青砖茶在蒙古牧民中享有很高信誉^①。然而,金人李俊民《新样团茶》诗与萨都刺诗中所见“玉川”,很可能就是指“三玉茶”。叶子奇则说,御茶由“建宁茶山别造以贡”,称为“噉山茶”;民间“止用江西末茶、各处叶茶”^②。

第三节 居住条件与居住状况

蒙古民族从逐水草而居的草原地区进入农耕区后,居住条件尽管发生极大变化,但两都巡幸以及相应的狩猎、宴飨活动都与原有的居住和生活方式保持一定关联。因此,这个时代居住状况的特点之一应是蒙、汉制的并行及其相互影响。

一 斡耳朵制度

南宋出使蒙古的彭大雅等人在蒙古草原见到^③:

其居穹庐(即毡帐——原注),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鞑主徙帐以从校猎,凡伪官属从行曰“起营”,牛马橐驼以挽其车。车上室可坐可卧,谓之“帐舆”。舆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谓之“饭食车”。派而五(或当做“伍”,排列之意——著者)之,如蚁阵萦纡,延袤十五里。左右横距及其直之半。得水则止,谓之“定营”。主帐南向,独居前列,妾妇次之,伪扈卫及伪官属又次之。凡鞑主猎帐所在皆曰“窝里陀”,其金

① 庄晚芳、王家斌:《西北茶叶贸易研究》,《农学研究》第三辑。

② 《萨天锡诗集》后集《元统乙亥余除闽宪知事未行立春十日参政许可用惠茶寄诗以谢》;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③ 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见《王国维遗书》第一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帐(柱以金制,故名——原注)凡伪嫔妃聚落群起,独曰“大窝里陀”者。其地卷阿,负坡阜,以杀风势,犹汉移蹕之所,亦无定止,或一月,或一季迁耳。

“窝里陀”常作“斡耳朵”(另有兀鲁朵、斡鲁朵等多种转写),是蒙古语 ordo 的音译,意为“宫帐”、“行宫”。其形制多见于元人和西方人的记述。

成吉思汗时代有所谓“四大斡耳朵”(此外另有一些斡耳朵)。窝阔台建哈刺和林,又于1236年在他的夏营地月儿灭怯土(今吉儿马台河源头附近)的山林中建造一座容纳一二千人的大帐,称“昔刺斡耳朵”(亦作“失刺斡耳朵”),意即黄色宫帐^①。这座“永不拆除”的宫帐成为宗室贵族聚会与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忽必烈以来,统治中心转移,很快在上都西面的山麓中新建成一座“深广可容数千人”的昔刺斡耳朵,并为它配建了一些相应的宫殿,使之形成一组固定的建筑群,成为“巡幸”至上都的权贵们从事“诈马宴”等活动的主要场所。此宫帐内饰以棕毛,故又以“棕毛殿”而著称^②。斡耳朵的座次规定和内外设施相当讲究,而草原一般居民居住的毡帐内的装饰则较为简单,生活方式也显得质朴而简陋^③。

据徐霆疏,“穹庐”有两种,一为“燕京之制”,二为“草地之制”,后者“以柳木织成硬圈”,形制如上述。前者“用柳木为骨,正如南方罍罍,可以卷舒畅。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此“马上可载”的斡耳朵可能包括元帝死后“架阁”起来并随队巡幸上都的斡耳朵(元代守宫制规定,世祖以来去世皇帝的斡耳朵由皇后及其继承者“奉宫祭管”,其中包

① 拉施都丁:《史集》第二卷,页七十;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上册,页二七九至二八〇。

② 按照《朴通事谚解》(上)和《析津志辑佚》的记述,大都至少有两处棕毛殿。

③ 详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之《鲁不鲁乞东游记》(页九九、一七二、六〇);《元史》卷一,《太祖纪》、卷二《太宗纪》;王国维笺证:《黑鞑事略》、《蒙鞑备录》。

括起宫车巡幸上都)。这样的斡耳朵亦称“火室房子”或“火室毡房”^①。

二 城乡居住条件

城市居住条件不仅指居民的住房状况,也包括城市城墙、街道、隅坊、市场、公共设施以及能源、卫生等条件。

(一) 城市基本设施

忽必烈统一全国后,曾下令“堕天下城郭”,除都城外,多数城墙被拆除,仅留下城门^②。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时,各地为求自保,才纷纷筹款筑城。一般说来,行省一般设在路一级治所,至少是中等城市;路治多为大、中城市;州、县则多数设在小城镇。

城市的基本构成是小巷与街道。城市街道的路面多用砖、石铺成。然而,像大都这样的新建城市可能因条件的限制,大部分是土路,平时,“长风一飘荡,尘沙涨天飞”^③,雨天,“燕山积雨泥塞道”^④。上都街面都是土路,雨后,“市狭难驰马,泥深易没车”,街道上往往是一片“黑淖如糜拨不开”的景象^⑤。有一定历史基础的城市的情况当然要好一些,如杭州,街道多以砖石铺就,并设有拱形排水沟。马可波罗看到,为防骑马疾驰时滑倒,南方城市的主要街道还往往在路的中间设置了砂土路^⑥。

街道一般都有一定规制,如大都,南北谓之经,东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

① 详《析津志辑佚·岁纪》、叶子奇:《草木子·杂制》、杨允孚:《滦京杂咏》。秘史八十节之“帐房”,原文作豁失里黑(khoshiligh),一六九节作“豁室”(khoshi),旁译“房子”。

②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

③ 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

④ 文天祥:《文山先生文集》卷一四,《移司即事》。

⑤ 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一五,《开平第二集(己未)·上京杂咏》,丛书集成本;宋本:《上京杂诗》,见《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

⑥ 穆勒、伯希和译:《寰宇记》,页三三四。

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弄通^①。此“弄”《析津志》繁写作“衙”,“弄通”可能指小于街巷的小巷^②。街道之间形成街区,如和林仅有两个街区,即回回区和汉人区,前者为从事买卖的市区。内地城市的街区要多一些,如大都,街区多称为坊,城内共五十个坊,坊名“以大衍之数成之,名皆切近,乃翰林院侍书学士虞集伯生所立”^③。坊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坊名往往以坊内的代表性建筑命名^④。有的城市在坊之上还设有隅,如镇江,元初即设七隅二十七坊。隅设隅正,坊设坊正,“凡官府排办造作、祇应杂务、鞫管罪人、递运官物、闭纳酒课、催办地钱”等事,均由隅正、坊正负责^⑤。

桥梁是城市的基本设施之一,如大都桥梁(包括寺观)多用西山白石雕琢阑干、狻猊等,桥身则“青石为砖,甃砌大方,样如江南”。镜面砖“光可鉴人”;凡桥梁、闸门、坝堰均以生铁铸锭子,“陷定石缝”^⑥。现代考古发掘已发现大都城内南北主干大街两旁有用石条砌成的排水渠,有些石渠的上部还盖有石条,可见,其排水设施是比较完备的^⑦。在大都,“马匹最为负苦,其思渴尤甚于饥者”,故独创了相应的供水设备十七处,“自朝暮不辍,而人马均济”^⑧。

大都皇室内和厚载门上有专门的浴室。马可波罗提到,中原人一星期至少洗三次热水澡,有条件者甚至每日一浴。《朴通事谚解》(上)称浴室为“混堂”或“堂子”。服务包括“挠背”、“梳头”、“剃头”、“修脚”,全套服务十九个

①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② 《朴通事谚解》(下)页三八之“衙衙”即“胡同”,贾敬颜先生曾就此义作过考证(详《“胡同”释义》,载其专著《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七月版),认为该词本于汉语(而非蒙古语),“与火巷、火弄同义,一言巷,一言巷中之道”,但未及此处的“弄通”。按“弄通”似近于今南方的音读,似指小于街巷的小巷。

③ 《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

④ 《析津志辑佚·城坊街市》;《元一统志》卷一,《大都路》。

⑤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地理·城池》。

⑥ 《析津志辑佚·风俗》。

⑦ 详见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版,页六五。

⑧ 《析津志辑佚·古迹》。

钱。马可·波罗还说,江南人习惯每日一次冷水浴。城内设有公共冷热澡堂,并有男女仆役提供服务^①,而当时的中国经历者却说,“妇女颇不洁,盖杭人常习也”^②。显然,前者或囿于所见,记述难免片面或夸张,但杭城内存在澡堂设施却是完全可能的。

沿袭前代之制,城市一般都建有报时的鼓楼或钟鼓楼。元代亦实行宵禁制度,“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③。以钟、鼓报时之外,入夜后另有按更点用木梆和铜锣报时的打更人。元代不时颁布火禁,主要目的是防止火灾发生,如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年)四月十九日,杭州大火,从东南延烧至西北,近三二十里,总计烧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一五七五五间,“官民间舍,焚荡殆半,遂使繁华之地,鞠为蕪芜之墟。”次年四月一日,又遭火灾^④。陶宗仪说,后一次火灾“尤甚于先,自昔所未有也。数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敝,实基于此。”^⑤

(三) 园林设施

今人统计元人文集中记咏“园池”、“别墅”和“亭”(大量有关“堂”的材料尚不在内)的材料达三百多处^⑥。尽管这些亭园中的相当部分并非建于元代,也有相当部分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园林,但如果计入诸如《析津志辑佚》等材料(后者举列的私家园林有十多处),元代园林的数量未必少于唐宋。重要的是,元代园林在古代园林史上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大都地区的宫苑建造和私家亭园对后来北京园林的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赵孟頫、高克恭、王蒙、倪瓒等著名艺术家参与园林的设计与构筑,又给江南园林增添了鲜明特色,对后世的影响同样深远。

① 穆勒、伯希和译:《寰宇记》页三二八至三二九。

② 孔齐(孔克齐):《至正直记》卷一《松雪遗事》。

③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夜》。

④ 郑元祐:《遂昌杂录》。

⑤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火灾》。

⑥ 陆峻岭编:《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之《亭台楼阁》部分。

先看元代的御苑。元大都是在金代离宫大宁宫的东面仿照金中都与布局形制而兴建的,并将大宁宫一带的湖泊划入皇城,由此构成的元皇家御苑,包括宫城后御苑、隆福宫西御苑、万岁山和太液池等^①。其中,万岁山与太液池承袭了秦汉神山和楼台仙阁的规制,以一池三山为主要布局,阁、殿、亭相得益彰,岛、殿、池之间以桥相通^②。另一处西前苑与寝宫相错结,也是一座富丽堂皇的皇家园林^③。

大都地区的私家园林多数集中在丰台一带,见于《析津志辑佚》的有匏瓜亭、玩芳亭、遂初亭、玉渊亭、葫芦套等十一处。见于其他诗文的有漱芳亭、临锦堂、垂纶亭等^④。其中,“万柳堂”更是名闻遐迩,名宦与文士常相邀与“歌儿”在此处赋诗游宴^⑤。陶宗仪说,浙西园苑相当兴盛,其中最古者属下砂瞿霆发,其下依次为平江福山的曹氏园、横泽的顾氏园和嘉兴魏塘的陈氏园^⑥。江南名园有倪瓒构筑的云林堂、萧闲馆、朱阳馆和清閟阁,而以后者为佳^⑦。狮子林位于苏州齐女门内。其地原为宋代废园,至正二年(一三四二年)天如禅师门人为期师创菩提正宗寺于此,欧阳玄称“林有竹万个,竹下多怪石,有状如狻猊者,故名狮子林”^⑧。玉山草堂为元末平江昆山人顾瑛构筑。顾氏为

① 详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官阙制度》;《析津志辑佚·城池街市》;萧洵:《故宫遗录》;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官阙制度》。

② 详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官阙制度》;萧洵:《故宫遗录》。

③ 萧洵:《故宫遗录》。

④ 分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漱芳亭》、王恽《秋涧集》卷三三、《元文类》卷一,《垂纶亭辞》。

⑤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万柳堂》。

⑥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六,《浙西园苑》。

⑦ 倪瓒:《清閟阁全集》卷十一,《外纪》上。

⑧ 欧阳玄:《狮子林菩提正宗寺记》,见《天如惟则禅师语录》卷九,页八四一。载《五续藏经》第70册,河北省佛教协会2006年5月版;危素:《狮子林记》,见(明)道忞编:《狮子林纪胜集》卷下,载郑晓霞、张智主编:《中国园林名胜志丛刊》第31册,广陵书社,2006年5月版。

吴中巨富。这处园林以玉山草堂为主体,另有桃源轩、可诗斋、碧梧翠竹堂、芝云堂等园池亭榭三十六处。草堂是元末文士雅集之圣地,举办各种集会五十余次,先后来会的各方名流至少达一五〇位左右^①,在元末为“一时之盛”。张士诚占领平江地区,玉山草堂的雅集中断,昔日世外桃源已被称做“金粟冢”^②。

(四)城市居民住房

城市居民按贫富贵贱的不同,居住状况各有所别。如大都建城后,官府规定“以地八亩为一分”,贵戚、功臣“悉受分地以为第宅”^③,但包括外地在内的豪富人家往往无视规定,如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年)时有人反映:“江南三省所辖之地,民多豪富兼并之家,第宅、居室、衣服、器用僭越过分,逞其私欲,靡所不至”^④。城市中的权贵、豪富一般按各自的身份相对集中居住,为之往往形成一些特殊居住区,如大都,“西宫后北街,系内家公廨,率是中贵人居住”;“皇后酒坊前,都是槽坊。各处名望馆,凡栲不同,于内多有产次。此地别无他经纪”^⑤。另如杭州的八间楼,便是有名的回回富商街区^⑥。豪门的第宅当然各有特殊形制,如“都中显宦税硕之家,解库门首,多以生铁铸狮子。左右门外连城,或以白石凿成,亦如上放顿”;“显宦之宅外门内,多做皮帽屋,以其似皮帽之制也”^⑦。可以推测,此种“皮帽屋”可能是受到草原穹庐形制的影响。另据载,住户如正订“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往往立一座“小石将军”或树一小石碑,上镌“石敢当”三字,意在“厌禳”^⑧。《朴通事

① [清]顾沅:《吴郡名贤图传》卷三,《顾瑛》。

② 谢应芳:《龟巢集》卷三,《和顾仲英金粟冢燕集诗》、《中秋日玉山顾仲瑛邀黎明府份陆良贵仁秦文仲约等十人饮金粟上酒酣赋诗各成一首》。

③ 《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侵占官街》。

④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禁豪霸》。

⑤ 《析津志辑佚·风俗》。

⑥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嘲回回》。

⑦ 《析津志辑佚·风俗》。

⑧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七《石敢当》。

谚解》(下)则说,汉人若在大街之间造房,向街者往往“周遭必设空屋,听令坐贾赁居为市,按月受直。”较讲究的房屋包括正房、西房、东房、暖阁、花房、卷篷、库房、马房、厨房、客位各若干间,另有佛堂、中门各一间,铺面周围几十间,井一眼,窗、炕、壁俱全。此外尚有空地若干亩。

大都居民密集,住房矛盾突出,素以“京师地贵”而著称。据称,当时大都“有‘两般月日’之说,即‘望月终请料钱嫌日长,到月终房钱嫌日短’,‘嫌日短’即房价贵的代语^①。杨维桢曾说,京郊一“劬劬农家子”因艳羨大都之繁华而“千金卖恒产,买屋京城居”。结果因“食技汝不如”而落得“仰屋视门传,壁立甌无储”的下场^②。在杭州,“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并答儿闲田地”^③,因而城市房价,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房价是昂贵的,如元初江南地区因行使中统钞,物价底微,至元中期以来,“百物踊贵,买卖房舍价增数倍”^④。《朴通事谚解》(下)记道,租赁房屋一般须订立“赁房文字”,内容有立据时间、赁房人、代保人和引进人。包括小工商业者、小吏、衙门仆役、下层儒士和“闲汉”等平民在内的城市下层民众的居住条件则相当简陋。

第四节 交通与通讯

成吉思汗时代已重视交通道路的建设与维护。蒙古势力进入汉地后,很快接受了内地原有的驿传制度,逐步扩大了驿站的规模。与交通和邮传条件的空前改善相适应,元代的交通工具、管理及其运作也呈现出新

① 宋褫:《燕石集》卷八,《初至都书金城坊所僦屋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② 杨维桢:《铁崖先生乐府》卷四,《招农篇》。

③ 关汉卿:《[南吕]一枝花·杭州景》,载《全元散曲》,页一七一。

④ 《元典章》卷一九,《户部》五,《房屋》。

的面貌。

一 交通工具

元代在草原、内地陆路、水路和海道等干线上都有较独特的通行工具。

先看草原地区的交通工具。

包括两都巡幸在内的皇室出行均采用了一些独特的交通工具和坐具。以两都巡幸为例,队前列有双峰骆驼,前峰绑皂纛(蒙语“如秃”,黑色大旗),后峰树小旗;驼毛上纓络垂结,四周点缀铜铎小镜,背上置有底铜柄小鼓一面。骆驼由一人驾馭。前进时,敲响小鼓,威振遐迩。另有一人徒步牵马,马背上缚四足小架,上置皮鼓一面,马首、后勒及当胸饰红纓拂响铜铃。健马盛饰与骆驼前峰上的皂纛并驾而行^①。皇帝乘坐的“象辇”由四人分驾一只大象列成方阵,编制更为奇特^②。“象辇”创于忽必烈,辇象最早来自云南,后来缅甸、占城、交趾、真腊等地陆续来贡。大都的驯象育于“析津坊海子之阳”(今积水潭和什刹前后海之南),直到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年)才被废除^③。象辇之外,另备有供皇帝乘用的輿辂,其形制当与汉地传统大体相同。皇帝郊猎时也乘坐象辇,但一般出行,尤其是狩猎,也往往骑马^④。

皇后、嫔妃和太子、诸王、大臣大多乘坐宫车,有时干脆骑马。宫车的形制与草原通用的毡车大致相同。车辆与良马也是草原民众的必备用具。“鞑人生长鞍马间”,孩童自幼便娴习骑射;为适应游牧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车辆的形制也各不相同^⑤。

① 《元史》卷七九,《輿服志》二,《仪仗》。

② 穆勒、伯希和译:《寰宇记》,页一九七;《史集》第二卷,页三五二。“象辇”由“蕃官”骑引(《元史》卷七九,《輿服志》二,《仪仗》)。

③ 《析津志辑佚·物产》。

④ 《元史》卷七九,《輿服志》二,《仪仗》。

⑤ 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之《鲁不鲁乞东游记》(页一一二至一一三)。

通行全国驿站的交通工具有马、牛、骆驼、狗和车船。运河、海运及驿站的水站用船数量巨大，适应各种水域的具体情况，船的形制也等等不一，例如，参与海外贸易的既有官船，也有兵船和私人船舶。元市舶法规定每大船一只，只许带小船一只（“柴水船”），后允许再加“八橦船”一只^①。马可波罗见到的中国船舶仅具一甲板，有船房五六十所；一舵四桅（二桅船偶一见之），可载胡椒五六千石；每船至少有水手二百人；无风时用四人操作的船橦前行；其后随以二小船（马可波罗出海时元市舶则法尚未推行，这或许是与后来只许带一小船的规定相矛盾的一个原因）；小船亦有船夫四五十人^②。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用藤篾编织；大船役使千人；船上有四层甲板，内设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住室内附有厕所，并有门锁，旅客可带妇女、女婢闭门居住在官舱内。水手则可带着眷属子女，“并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船总管活像一大长官，登岸时射手黑奴手执刀枪前导，并有鼓号演奏。”^③据此可见，元人任士林见到的“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橦”、船员一百人的“富人之舶”，只能称得上小型船舶，甚或是附于大船与柴水船之下的“八橦船”^④。

元市舶法提到的船舶人员有舶商、人伴、搭客和纲首、直库、梢工、碇手、杂事、部领、事头、火长等。第一类系指商旅，包括舶商、人伴和搭客。第二类是以纲首为头目的船员，为负责船只航行的管理与技术操作人员。元代海船“长年顿指南车坐浮度之上”^⑤。在船人员均须进入编甲，实行“人结五名为保”^⑥。

①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八，《课程·市舶》。

② 穆勒、伯希和译：《寰宇记》，页三五四至三五六。

③ 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页四九一至四九二。

④ 任士林：《松乡集》卷四，《送叶伯儿序》。

⑤ 同上。

⑥ 详《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卷八，《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二 交通的管理与维护

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便在东西大道上设置守卫和“干净的白毡帐”,为西域商人提供安全与方便^①。进入汉地后,这条被沿袭下来的举措已同时惠及汉地商人,官府在水陆通道沿线设“巡防弓手”、“水军”保护商旅安全^②,屡次颁发权豪势要“拘雇”商船、商车的禁令^③。在政府的促动下,各地官府注意为商旅提供保护,甚至出现责令官、民赔偿其“失盗”物品的极端做法^④。

驿站除有完善的管理系统外,还按规定为公使人员提供住宿和饮食。《朴通事谚解》(中)记道,馆驿门上“皆设更鼓之楼。凡使客入门,必击其鼓召集人众应办事务”,驿站人员随之齐集;使臣出示“关文”,按规定支领米、面、羊肉等“分例”。使臣颐指气使,叫厨子速来做饭,驿站领事人(百户)问:“做什么饭?”使臣道:“做干饭,再熬些稀粥。再用白面捏些匾食,撒些秃秃么思,熬些细茶。”这与鄂多立克的记述正相一致^⑤。

三 民间交通往来

元代各城镇一般都有客舍为商旅提供食宿,并且,官府亦为民间往来提供保障。元律规定,远离州县城之处,酌情于其间五、七十里所有村店及二十户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九〇至九一;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页二五八。

② 《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元典章》卷五九,《工部》,卷二,《造作》二,《船只》。

③ 《元史》卷一二,《世祖纪》九、卷一五,《世祖纪》一二、卷一八,《成宗纪》一、卷一〇三,《刑法志》二、卷一七三,《崔或传》。

④ 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载《元文类》卷五七;《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元史》卷一三六,《哈刺哈孙传》;《元史》卷一九一,《卜天璋传》。

⑤ 详何高济译:《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页七七。

以上者,须设巡防弓手,“合用器仗,必须备足,令本县长官提控”。早在至元元年(一二六四年),官府便要求商旅须投店住宿。商旅出行必须持官府许可证明,官府亦在要道口设卡查验,“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见司县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①。中国的市坊制度到宋代彻底崩溃后,元代已在全国各地打起招商旅店的招牌。《朴通事谚解》(上)注“店”字曰:“店,停物货卖之舍,客商往来者多寓之。官所营建收税者曰官店。”官店之外,当然还有私人开设的店铺。鄂多立克看到,“那里(杭州)有很多客栈,每栈内设十或十二间房屋”;还说“(扬州城内)有个风俗:倘若有人想要以丰盛筵席款待他的友人,他就去找一家专为此目的而开设的旅舍,对它的老板说:‘给我的若干友人准备一桌筵席,我打算为它花多少钱。’然后老板一如他吩咐的那样做,客人们受到的招待比在主人自己家里还要好。”^②马可波罗亦曰,大都郊外人户众多,“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③。此“显贵邸舍”,或可理解为客栈。他还说,杭州城中“并见有美丽邸舍不少,邸内有高大台,概用美石砌成。”有关住宿制度亦颇可注意。商鞅变法始查验旅行凭证,否则店主连坐。至迟到元代,除坚持查验凭证外,还实行住宿登记制,元律于此有明文规定^④。伊本·白图泰说,“在中国行路最为稳妥便行,路中各站皆有逆旅可以息宿,有官吏专管之”;“天全黑时,管理官员及其书记来舍,将留舍各人逐一点名记簿,盖印后闭门,使客安睡,到次晨天明时,吏及书记又来,依名单唤客起,作一证书。”马可波罗还说,一切客栈和旅馆的老板,也同样将寄宿客人的姓名登记在一本簿本上,注明他来去的日期和时刻。这种登记本,每天还要另备一

① 《元典章》卷五一,《刑部》一三《防盗》。

②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页六七、七一。

③ 穆勒、伯希和译:《寰宇记》,页二三五至二三六。

④ 《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

份,送交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驻在方形市场的那些官吏。因此可以大致肯定,元代已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来客来登记、客走销号的住宿制度。关市之征在宋元时代已很频繁,元明民间客店又有“不下单客”的规定,住宿须有保人,杂剧《金凤钗》有曰,“店家不下单客,我做保人知在”语。此“单客”想必就是无身份证件的客户。

四 邮传

急递铺是与驿站相辅而行的交通系统,专司“转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书往来”。主要用于官方通讯,其传舍亦有特定标志^①。经急递铺传送的文书等物分为“边关急速公事”和一般文书两种包装。执行递送邮件的铺兵准备齐全,鄂多立克说,铺兵“腰缠一带,上悬许多铃子。那些驿舍彼此相距也许有三英里;一个急差接近驿舍时,他把铃子摇得大声叮当响;驿舍内等候的另一名急差听见后赶紧做准备,把信尽快地送往另一驿舍。”^②

各递铺必须昼夜轮班,随时准备接受并转递过往公邮;来往公文必须登记,相关手续均有详细的规定。铺兵“须要本户少壮人力正身应役”,但实际上“多是乡村农叟,不识利害”,“老幼充应,多不堪役”,故元廷屡次要求各地予以整顿,亦对铺兵的衣粮供应等待遇作出相应规定。在驿路不能通达的地方则设有供地方使用的驿传之路^③。

第五节 婚姻状况

元代有关婚姻状况的记载比较丰富,内容多姿多彩,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

① 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一三,《邮传》。

② 何高济译:《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行纪》,页七七至七八。

③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四下,《疆域志》二《铺驿》。

游牧婚俗与汉地传统的交互影响所呈现出的复杂状态以及婚爱、婚俗的多样化。

一 收继婚的影响

“收继婚”系指丧父女性所在家族的内婚，亦称“转房婚”。在北方游牧社会中，“父死则妻其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是符合常规的旧俗，并且，元廷起先还以法律形式将收继婚推向包括汉人在内的全国民众。当然，这类规定不久即于修正，“各从本俗”的变通原则得以确立，《元典章》、《通制条格》与《元史·刑法制》有关婚律的条文中亦出现明令禁止汉人实行收继婚的规定。忽必烈中期以来的多项事例表明，在对汉地官民收继婚方面的民事诉讼进行量处时，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与上下级之间存在不一致性，但总趋势是明确的，即汉地因素已占据主导，突出表现是，丧夫女性一般能以“服阙守志”抵制收继。

收继婚在蒙元时代虽然经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回潮，但另一方面似乎也潜在地存在着这样的迹象：异辈收继很快被扬弃，而平辈收继虽同时遭禁限，但与之并行的是，它仍随处可见，如彰德路民户张羊儿是杨阿田的抱财女婿，至元十六年，杨家兄死，寡嫂被他收继了当^①。大德二年，民户刘大死，其叔伯弟刘三将嫂接续了当。十年，刘三又死，次年，地方官允许刘大弟收继兄嫂。延祐三年，民户缪富死，五年三月，其房兄缪富二凭房叔媒证，收继弟媳^②。应注意元后期更为自由的婚俗倾向，如元末松江上海县人俞俊不仅娶蒙古女为妻，且两次“蒸”嫂（蒙古人）而妻之^③。

在汉地传统的影响下，少数人居汉地的蒙古族和其他民族的女性也出现

① 《通制条格》卷三，《收嫂》。

② 《元典章·新集·户部·婚姻》。

③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醋钵儿》。

自觉抵制旧俗,特别是异辈收继的突出事例,元政府有时还以道德手段(旌表节烈)对这些事例予以表彰。

二 守志与元代社会

按字义,“列女”指诸女,“烈女”则主要指丧夫守志、孝养长亲与携抚幼子等方面表现卓著的女性,其中贞节是封建女德的核心与灵魂,而贞节最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守志。《元史》之“列女”实当作“烈女”,其数高达一八七人,远远超过前代,其中,杀虎、杀豹以救亲属、终身不婚以全养母弟、以“割股”或其他方式疗长亲之疾者各有数例。当然,守、孝者乃为多数。元代名儒元明善还记道:大德七年十月,孀妇马氏乳部生疮,人们劝她就医,她说,“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①这是元代烈女中较极端的一例。

汉人婚爱观念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元代只是传统的一次惯性发展。具有时代特征和历史说服力的倒是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其他各族女性在婚爱观念方面的变化,其主要体现一是统治层从汉地贞烈观角度对本族女性的类似行为予以旌表。元文宗是汉化较深的一位帝王,皇姑祥哥剌吉夫死,本人表示不从诸叔收继,文宗即诏翰林学士“议封号”^②。二是在蒙古等族女性中出现了一批较自觉抵制收继,并按汉地贞节女性模式处理婚爱的典型女性。《元史》中,这样的女性约占百分之十五。陶宗仪记道,中书平章阔阔歹去世后,其侧室高丽氏“誓弗贰适”,而阔阔歹正室子拜马朵儿赤贪其色而不可得,乃以其父的大答纳(tana,指珍珠、东珠、大珠和玛瑙等物)环子献于太师伯颜。早就垂涎于此珠的伯颜乃“特为奏闻”,获旨命拜马朵儿赤“收继小母高丽氏”。但高丽氏乘夜与母逾墙而出,削发为尼。伯颜大怒,“以为故违圣旨,再奏命省台洎侍正府官鞫问”。奉命惟谨的官员“锻炼备极惨酷”。后掌刑的国公阔里

① 元明善:《清河集》卷七《节妇马氏传》,藕香零拾本。

② 《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

吉思在别人的规劝下醒悟过来,乃于伯颜前“宛曲解释”,此“钦案”竟得以不了了之^①。汉地贞烈观的感化力,当在不言而喻之中。

此外,在一八七位烈女中,并非完全是夫亡守志,即按“一女不事二夫”教义的守贞者,特别是顺帝朝的约七十人中,包括元人的同期其他记录,绝大多数是变乱时期的殉节者,她们所面临的,有的是本夫死于变乱,有的是直接面临强暴。这些女性出于个人感情等多种因素,以自杀方式表示抗争,其主观意愿未必是在为伦理、为贞节殉道。因此,《元史》异乎寻常地表彰“列女”,既显示了官方着力倡导纲常伦理的良苦用心,也反映了元代出现了更多的包括蒙古、女真等文化背景迥异于汉人的少数民族女性能比较自觉地实践封建纲常。然而,就总体而言,其影响力仍然是有限的。《元史》烈女传之序便认为,烈女中的“自杀从之(夫)者”的行为未免“失于过中”。可见,就一般的社会评价而言,对女性的婚姻行为的态度还是较为通达的。

三 赘婿、族际婚与典妻现象

元人将赘婿划为“养老婿”、“年限婿”、“出舍婿”与“归宗婿”等四种类型^②,并就差役的负担、独子出赘、招赘婚书的基本“书式”、各类赘婿的聘礼和有关义务与权力等方面作了一系列规定。

财产的继承与分配是赘婿中最敏感的问题。一般说来,赘婿所生之子可与招家原生之子共有女家应继财产。另如养老婿,亦可与过继之子按比例分招家财产。如杭州一富民有招婿和养子,养子三岁死,“遗命婿主家产,它时

^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五,《高丽氏守节》,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版。“答纳”另参见傅乐淑:《元官词百章笺注》五一。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

^② 徐元瑞:《吏学指南·亲姻·赘婿》,黄时鉴校点,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版。

子取三,婿取七”^①。而世俗对赘婿则多持审视眼光与偏见态度,武汉臣《散家财天赐老生儿杂剧》中的赘婿张郎由年限婿转为养老婿,他自称上门的目的在“图他这家私”,最后阴谋暴露,“女婿着出舍,闺女着回房”,“泼天家私”被张家人“三份儿分”。显然,“妄图家业”是当时世人对赘婿进行度测的普遍眼光,曾当过上门婿的孔克齐便深有感触:“人家赘婿,俗谚有云:‘三不了事件。’使子不奉父母,妇不事舅姑,一也;以疏为亲,以亲为疏,二也;子强婿弱,必求归宗,或子弱婿强,必貽后患得患,三也。”^②

族际婚与典妻也是元代较为突出与通行的现象。

基于经济利害与社会地位的考虑,婚姻选择首重“门当户对”。在元代,蒙古、色目上层一般尽可能在本族中选择通婚对象,此谓“同类自相婚姻”。然而,民族之间的通婚也成为必然趋势。中书右丞相史天泽先后娶四位夫人,前两位石、李二氏为汉人,后两位纳合氏与抹然氏,应为女真氏与蒙古氏^③。中书平章政事张珪第五位女儿嫁给保定管军千户忽都帖木儿^④。中书参知政事许有壬的继室赵氏为雍古人平章政事赵世延之女,而赵世延之妻刘氏则为汉人^⑤。元代书法家、官至太常典簿的鲜于枢之女所适驸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朵尔的斤为畏兀儿人,元末孔子后裔孔瀛的继室为高昌氏^⑥。三衢人叶肃可习学蒙古语,为蒙古长史,娶蒙古人为妻。金陵人王起岩,以女嫁录事司达

① 苏天爵:《元文类》卷五六,《真定张君墓表》;析居时赘婿所获财产的比例往往因主家的意愿为转移(参见宋濂:《宋学士文集》之《补遗》卷四《俞先生墓碑》、卷十,《郑景彝传》)。

② 孔齐(孔克齐):《至正直记》卷二,《赘婿俗谚》。

③ 王磐:《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载《元文类》卷五八。

④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八《蔡国张公墓志铭》;宋濂:《宋学士文集》之《补遗》卷一,《王氏义祠记》。

⑤ 陈旅:《安雅堂集》卷一一《鲁郡夫人赵氏墓志铭》。

⑥ 《元史》卷一九五,《忠义传》三;宋濂:《宋学士全集》卷二四,《故检校孔君权厝志》。

鲁花赤之子,其间,也不乏色目男子入赘汉人家庭的事例^①。

元政府仅对族际间的通婚婚俗进行了较明确的划定。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二月颁布的“民间嫁娶聘财体例”中规定:“诸色目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家为主。蒙古人不在此例。”^②在江南地区,此类族际婚很可能是与元初的贩奴活动相伴随而滋长起来的,其间亦不乏蒙古、色目人“谘问室女妇人,虚写婚书,捏合钱财,娶作妻室”诸现象^③。驱奴买卖在元初基本告止,但“乞养过房男女”在本人遭遇贫乏并“赴所在官司具由陈告,勘当是实,出给公据”的前提下可被允许“过房”^④。应该注意,所谓“过房男女”既指“义男”、“义女”之过继,又包括受雇从事乳姐、奶娘和女使等家庭服务的女性。关于后者,孔克齐说过:“浙西风俗之薄者,莫大于以女质于人,年满归,又质而之他,或至再三,然后嫁,其俗之弊,以为不若是则众诮之曰,无人要者,盖多质则得物多也,苏杭尤盛。”^⑤不过,其中也不乏作为婚配性质雇与他人作为妻妾者,此点可从官府公布的“雇女子书式”中看出^⑥。这说明当时典雇式婚配比较普遍。

此外,元代僧道娶妻的现象比较普遍(僧侣娶妻远甚于道士),并已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⑦。

① 孔克齐:《至正直记》卷一,《石枕兰亭》、卷三,《不嫁异俗》。

② 《元典章》卷一八,《嫁娶聘财体例》。

③ 《元典章》卷五七,《典雇男女》、《禁乞养过房贩卖良民》(《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卷四,《官民婚·流官求娶妻室》、《驱良婚·驱口不娶良人》;《通制条格》卷四,《户令·过房男女》)。

④ 《通制条格》卷四,《户令·过房男女》。

⑤ 孔齐(孔克齐):《至正直记》卷二,《娶妻苟慕·又》。

⑥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公私必用》。黄时鉴辑并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六月。

⑦ 《元史》卷一四四,《星吉传》,卷一七五《张珪传》,卷一〇三,《刑法志》二《户婚》;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五《与妓下火文》,卷二八,《白县尹诗》;马祖常:《石田文集》卷七,《河西歌效长吉体》;《元典章》卷三三,《礼部》六《道教·道官有妻妾归俗》。

四 婚俗

在大统一国度里,多民族杂居,婚俗各具特色,如回回是典型的内婚制,并盛行收继婚。婚姻礼仪与汉人较为相近,如请人说媒、下聘礼等,大都回回人阿乞马娶阿里所下聘礼为:金脚玉版环儿一对,红线丝一斤,绢二,盖头一个,羊二只,面一担,酒三十瓶^①。但婚礼“绝与中国殊”,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称“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一日娶妇,因“其婚礼绝与中国殊,虽伯叔姐妹,有所不顾”,致使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来窥视,至有攀缘檐阑窗牖者”^②。

关于蒙古族婚俗,鲁不鲁乞有这样一段记述:婚娶之时,姑娘的父亲安排一次宴会,而姑娘则逃到亲戚家躲起来。这时父亲宣布,女儿归你所有了,你在哪里找到她,就把她带走。这时,未婚夫和他的朋友找到姑娘时,“必须用武力把她抢过来”,再带她回家,“佯装使用暴力的样子”^③。可见,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威斯福马克在《人类婚姻史》中谈到蒙古族的“抢劫婚”遗俗,来源比较早,或许,从成吉思汗父亲的兄弟们当年抢劫月伦姑娘,甚至篾儿乞抢劫孛儿帖的史载中,也可找到此类婚俗的影子。蒙古族的另一项重要婚俗是“预婚”,《高丽史》称,“纳年幼者养于家待年,谓之‘预婿’”^④。“预婿”或即“养年婿”,九岁时的铁木真就有过这种经历。以下谈谈元代汉地的一些婚俗。

元代婚姻的七条仪节,其基本依据是朱熹《家礼》中的《婚礼》^⑤。婚姻的

① 《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卷四,《婚姻·夫亡·未过门夫死回与财钱一半》。

②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嘲回回》。

③ 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之《鲁不鲁乞东游记》(页一二二)。

④ 《高丽史》卷二七,《元宗》三,页四〇九。

⑤ 详《元典章》卷三十,《礼部》卷三,《礼制》三,《婚礼·婚姻礼制》;《通制条格》卷三,《户令·婚姻礼制》。另详《朴通事谚解》(上)页四一。

议定含议婚、纳采(也称下定)和纳币(也称下财)三项内容,全过程有一系列往来迎拜的仪节。其间,媒人充当了重要角色。媒人有掌判、红叶、行媒、青鸟、冰上人、伐柯、月上老和因针等八种称谓^①。私媒外,元代另设官媒,由社长、巷长、耆老推举“信实妇人”充当,是一项社会职业。另一重要环节是双方出具婚聘文书。这类婚书的样式都有一定的规定^②。

元承宋代世风,而奢靡不减于宋,至元初儒臣即呼吁改变“聘娶无法,妄增财币”的弊端,官府亦为之“酌古准今”,至元八年颁布了“嫁娶聘财体例”^③。忽必烈以来,聘财愈求奢华,至有倾家荡产也不能成婚者,户婚纠纷为之层出不穷,于是成宗大德年间重作规定^④。成亲过程中另一突出现象是筵席的铺张。元初女真行“拜门”俗,婿家先拜,仅酒馔一项而言,少的也要十多车,多的要在此基础上递增十倍^⑤。“拜门”尚有“大拜门”、“小拜门”之分,此婚俗至迟北宋时已有^⑥,金代相沿成习。杨显之《蒲鲁忽刘屠大拜门》杂剧(已佚)和关汉卿《调风月》第四折对此类风俗有所涉及。奢靡的婚习当然不限于女真,如陕西“吃干羊”的风气就相当铺张,官府也曾对此作出过限定,试图予以约束^⑦。

有关婚俗,杂剧《桃花女破法嫁周公》很值得注意。作者王晔,字日华,杭州人,其身体肥胖,善于滑稽,工于词章乐府^⑧。该剧描述了从迎亲、新人上

① 《新编事文类聚启札青钱》卷七,《婚礼门》。

② 以上各书式详《新编事文类聚启札青钱》卷七,《婚礼门》。

③ 详《元典章》卷一八,《户部》卷四,《婚姻·婚礼·嫁娶聘财体例》。

④ 《通制条格》卷三,《婚姻礼制》。民间对交往过程中的礼物另有各种俗称,如求亲的“花红”、“酒礼”分别称“红定”和“肯酒”或“羊酒”,见《桃花女破法嫁周公》。有关习俗另详《朴通事谚解》(上),页四一至四二。

⑤ 《大金国志》卷三九,《婚姻》。

⑥ 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

⑦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卷三,《礼制》三,《婚礼》之《革去诸人拜门》、《禁夜筵宴例》、卷一八《户部》,卷四《婚姻·婚礼·嫁娶聘财体例》。

⑧ 钟嗣成:《录鬼簿》卷下,“王日新”条。

车、下车、入门、入墙院、入第三重门和入卧房的各道环节以及遇见相应的神道和解禳过程。郑振铎先生评道，此剧的事实虽荒唐无稽，文辞也极粗浅，“但在民俗学上看来，却是一部绝好的材料。在其间，颇能次分的看出‘阴阳八卦’的极端作用，还有许多结婚时的禁忌，至今尚沿用未改者，彼亦一一为之解释其来源，虽不可信，却都是很可珍贵的参考品”^①。

第六节 祭祀与丧葬

祭祀与丧葬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礼俗。元代多种礼俗交相辉映，呈现出一些较为独特的风貌。

一 蒙古族的祭礼

进入汉地的蒙古族的上层祭典保持了“国制”这个核心，而汉地繁杂而规范的制度又使之趋于充实、完善，其中的典型是“烧饭”之礼。

蒙语“亦捏鲁”(inerü)，译成汉语即“烧饭”，是乌桓、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基于萨满教信仰而形成的祭俗，其初始目的是祭祀死者。成吉思汗前，最先是杀马殉葬，后来的一般形式是，将宰食的马骨烧掉，妇女常常聚在一起，焚烧马骨，祭奠死者^②。后来，祭祀内容更丰富、更完备。从形式看，其中心内容一是由萨满巫师主持；二是“掘地为坎”，于中焚烧马骨，有时也焚烧马肉和死者用物；三是与祭者可分食或分得祭品。应该注意的是，此礼的性质前后有重要变化，按照王国维的考订，“贵者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所有祭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页六七七至六七八，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②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汉译本。

祀饮食等物尽焚之,谓之烧饭”^①,这说明最早是以殉葬为主要内容,后来“蒙古人中有人死后,[家人]尽力宰杀骆驼、马匹,作为殉葬牺牲一同埋葬”^②,此时可以明确说,“烧饭是祭祀不是殉葬”^③。祭祀又可分临时与定期两大类,前者用于丧葬,后者用于祭祖祈福,它甚至可扩大到祭孔活动即所谓的“丁祭”。

先看第一类。蒙古人为天子去世安排了这样一套独特的葬制:香楠木一分为二,中间剝空成人形,与死者同时入殓的有貂皮袄、皮帽、靴袜、系腰、盒钵,另有金壶瓶二,盞一,碗、碟、匙各一。双木合上后,箍上四条黄金带。送葬輿车用白毡青边的纳失失金锦装饰。车前,蒙古女萨满穿新衣,手执黄金鞍辔,骑上用纳失失装饰一新的“金灵马”。灵车缓缓驶向葬地。途中,用羊祭奠,每日三次。送葬官员止于葬地五里外,每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才能返回^④。穴地土块依次排列,下棺后,又依次覆上,余土远置别处。覆土用万马蹴平,派人严守,待青草长成后,葬地漫同平坡,无迹可寻^⑤。元帝死后也都遵守祖法,从汉地装载出发,与草原蒙古国的大汗们一起,掩埋在蒙古本土的肯特山地区。葬制规格稍次者是帝后。当呻吟于病榻的帝后被判定为不可治愈时,即移居“外毡帐房”,死后便“殡殓其中”。葬后,每日三次用羊烧饭致祭,四十九天而后止^⑥。“元朝丧制,非国人不敢近,惟高丽得与焉。”^⑦

祭祖祈福主要体现在太庙祭祀上,它趋于规范,具有更持久、更稳定的礼制色彩^⑧。在上都的祭典有两次。六月二十四日的祭祀俗称“洒马奶子”,属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六,《烧饭》。

② 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1月版,页四二九。

③ 陈述:《谈辽金元“烧饭”之俗》,载《历史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④ 《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

⑤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集。

⑥ 《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

⑦ 《高丽史》卷三一《忠烈王》四,页四八一。

⑧ 详《元史》卷七四、七七《祭祀志》三、六。

祭天大礼,原则是“帝后亲之,宗戚助祭”^①。成吉思汗以来,祭天礼屡屡举行。忽必烈即位,将祭地从漠北的日月山改在上都,时间原是每年的四月和九月九日,因属“亡金旧例”,故改成六月二十四日。祭天之后是祭祖。每年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与皇后穿着最贵重的白色服装,偕世臣子弟奠马酒,望祭“北方陵园”即肯特山的列祖葬地肯特山,随后择道吉日,整驾南返大都^②。

耐人寻味的是,在太庙之外,黄金家族还为自己建立了两类祭祀场所,一是“原庙”^③,这很可能是根据汉地儒臣建造起来的^④;二便是“烧饭院”和一座“官祭场”,这是黄金家族和蒙古权贵按本俗专门从事祭祀活动的场所。“烧饭院”在海子桥南,后定在蓬莱坊南。海子桥南改为“官祭场”,或即蒙古族官僚进行祭祀的场所^⑤。与“烧饭院”这一设施相联系,元代的守宫制也值得重视——从事“烧饭院”祭祀的“十一宫”元代文献又称“十一室皇后斡耳朵”,而此斡耳朵又特称为“火室房子”、“火室毡房”。按制,“元君立,另设一帐房,极金碧之盛,名为斡耳朵。及崩即架阁起。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⑥可以设想,每位皇帝死后,在世皇后仍须率“怯薛女孩儿”奉守原斡耳朵,其职能主要有二,一为按本俗(烧饭礼)至烧饭院进行祭祀^⑦,二是奉官车巡幸上都^⑧。

蒙汉因素交互影响的祭俗如:元帝的双重庙号——忽必烈去世后追谥的庙号,除汉语之外,又有一个蒙语庙号,即将蒙古习俗同中国传统王朝的庙制

① 《元史》卷七二《祭祀志》一、卷七七《祭祀志》六。

② 周伯琦:《近光集》卷二,《立秋日书事五首》。

③ 《析津志辑佚·风俗》。

④ 这是通行于汉地的传统,见《史记·高祖本纪》裴骃集解。

⑤ 《析津志辑佚·古迹》。

⑥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五月版。

⑦ 《析津志辑佚·岁纪》。

⑧ 同上。

结合起来,发展成了双重庙号^①;荐佛事与神主金制——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十二月,“命国师僧荐佛事于太庙七昼夜”,此为“太庙荐佛事之始”。十三年九月,再于太庙荐佛事时,“命即佛事处便大祭”。此外,另造木质金表牌位十六个,设“大榻金椅”奉安室(宗庙中藏神主的石盒)前。十二年,前代通行的栗木神主(“栗主”或“主”)“改作金主”^②。可以说,金制神主(包括柘室前的“大榻金椅”与木质金表牌位)正是元代帝王崇奉喇嘛教的某种深刻印记;祭品的蒙古色彩——受游牧贵族的食尚的影响,致祭物品中的天鹅、野马、塔刺不花(其状如獾)等物均与汉地“古制”不合^③。并出现了一些前代极少使用的附加祭名;宗庙神主位次——清代学者万斯同认为元代祭礼的特异之处、亦即“不合古礼”之处一是神主金制,二是元以前庙室皆西上以次而东,“至(指元武宗时)始以中为上”。三是神主当按左昭右穆原则排列,但元代实际是右昭左穆。然而,按古代礼仪习俗,席位以左为尊,但就地位而言,又以右者为尊,在神主位次的排列上也一直存在争论。况且,蒙古人尚右,这种尊卑观当然会对宗庙神主位序排列产生直接影响。应该注意的是,英宗以后,元代又恢复了左昭右穆之排列位序,汉制最终对蒙古旧俗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规范。

二 其他葬俗与祭俗

以下再看元代的几种特异的葬俗与祭俗。

文宗时的太平王燕帖木儿来自钦察部。他遵循本部族的传统祭奠先人,

① 详黄时鉴:《元朝庙制的二元特征》,载《元史论丛》第五辑,一九九三年。有学者证明,有些庙号在该帝生前即已作为尊号采用(详[台]洪金富:《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载《汉学研究》第23卷第1期)。

② 《元史》卷七四,《祭祀》三,《宗庙》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一,《官阙制度》。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版。

③ 《析津志辑佚·物产》。

方式是:将先人的形象用白石雕琢,藏在上都西北七十里的小室之中。祭时,向石像灌酒,再用肥肉涂抹石像全身^①。值得注意的是汉人与各民族之间在葬俗与祭俗方面的相互影响。

入元以来,有些蒙古色目人按照汉地的习惯行丁忧之制,《元史·孝友传》统计的蒙古色目“居丧庐墓”的典型有纳鲁丁、赤思马等十三人^②。本纪中“行古丧礼”的显例尚有畏吾儿人廉希宪、捏古思氏彻彻等人。尽管致和元年(一三二八年)四月曾作出“凡蒙古色目人效汉法丁忧者除其名”的规定^③,《元典章》亦有一则令畏吾儿人“休似汉儿体例”行丧的规定^④,但更多场合下,对蒙古、色目人的此类行为均予听从乃至予以表彰。

火葬也较为通行。有记载称,中书省最先认为北京路百姓将去世父母“置于柴薪之上,以火焚之”的做法“有乖丧礼”,为之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年)作出规定,“除从军应役并远方客旅、诸色目人许从本俗,不须禁约外”,汉人遇丧则须“依理埋葬,以厚风俗”^⑤。但十多年后经行中国境内的马可波罗却见到,大运河沿线的邳州、淮安、宝应、杭州和湖北襄阳等十多处地方均盛行火葬^⑥。元后期著名剧作家郑光祖在杭州做官,死时即火葬于西湖灵隐寺^⑦。另据载,火葬后“投骨清渊之中”的做法在浙江地区相当普遍,义乌一带至有“亲丧十余年,怵于拘忌不葬者”^⑧。

大都除色目、大食等伊斯兰教部民外,包括蒙汉诸族的市民葬俗已无多

① 许有壬:《至正集》卷一六,《陪石大夫太平王壬祭先太师石像》。

② 《元史》卷一九七,《孝友》一。

③ 《元史》卷三〇,《泰定纪》二。

④ 《元典章》卷三,《礼部》三,《礼制》三,《丧礼·畏吾儿丧事体例》。

⑤ 《元典章》卷三〇,《礼部》卷三,《礼制》三,《丧礼·禁约焚尸》。

⑥ 穆勒、伯希和译:《寰宇记》,页三〇八、三一三、三一四、三一七、三三七。

⑦ 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之〈附录曹棟亭刊本录鬼簿〉卷下“郑光祖”条。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四月版。

⑧ 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二三,《傅守刚墓碣》。

大区别,家中遇丧事,请僧人诵经超度,棺木停于门檐下,一、二日后从家中移尸入棺,抬上灵车送至预定佛寺中;火化毕,收遗骨葬于寺侧;孝子归家一哭而止。家中不立祖先牌位,也不立死者神主牌位。市民人家丧亡之时,还如同叫卖商品一样,敲打家中物品,引人上门,相互搏骂,称为“惊尸”;吃饭时,让人一边喧叫,一边在隔壁拍打陈设物品,不让人下食,名曰“咽食”^①。

第七节 四时节令与消闲时光

按照汉地传统,每年各地都有相应的被灾迎福和节庆活动,元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参与,又为这些活动增添了更多的民俗与宗教色彩。现就其中最富特色的部分梳列于下。

一 蒙古族的被灾迎福活动

在蒙古上层的大力倡导下,大都与上都每年都要大规模兴办一些被灾迎福的活动^②。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游皇城”。

至元四年(一二六七年)世祖采纳帝师八思巴的奏请,置白伞盖于御座之上“以镇邦国”,至元七年,又在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一顶,用泥金梵字“镇伏邪魔、护安国刹”八个大字书于紫色缎匹上。此后每年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上建伞,另组织各色仪仗社直迎引伞盖,周游皇城内外,借义为“与众生被除不祥,导迎福祉”。活动从正月十五日开始准备,此后各按一定程式进行。队伍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男女,倾城出观。五德殿门外搭起金脊五殿彩

^① 《析津志辑佚·风俗》。

^② 详《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

楼,专供皇帝、后妃、公主观览。尔后,各色队仗、社直送伞盖还宫,恭置御榻之上。帝师率僧众作佛事,十六日罢散。

此活动于六月中望日在上都如法举行一次^①。有人用“蚩氓聚观汗挥雨,士女簇坐唇摇风”描绘这项活动的胜概^②。

蒙古旧俗尚有十二月十六日后的“脱旧灾、迎新福”和十二月下旬的“射草狗”。

二 四时节令以及大都等地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其他习俗

元廷对各族传统节日采取“各从其俗”的政策,至元八年(一二六四年),还给予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以节令假日^③。

汉地传统节令仍被元代所继承,但蒙古习俗和宗教因素的介入,又为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文献反映各地的节令习俗非常丰富。例如,西蜀地区“地大物繁,俗好娱乐”,当地首领官顺达民情,主动倡导,动辄宴集冶游,“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护导。四方奇技幻怪,百态千态”^④。大都相关的节令有“元旦”、“元宵节”、元月十九日的“燕九节”、二月初二的“龙抬头”、二月初四的“立春”、“清明寒食节”、四月十七日的“浴佛节”、“重午节”、七月七日的“乞巧节(七夕节、女孩儿节)”、“立秋节”、九月九日的“重九节”、十月一日之后的“送寒衣节”、十一月的“冬至节”和十二月初八的“腊八(佛成道日)”等,届时均有相当丰富并颇具特色的活动。

节令活动之外的其它文体活动也非常丰富,如盛行于两都的蒙古传统体育项目角抵、竞走和击球便很有特色。

文献还记录了大都一些带有经济特质的民俗,其中,店铺的标志性设计

① 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下。

② 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一六,《皇城曲》。

③ 《通制条格》卷二二,《假宁·给假》。

④ 费著:《岁时记丽谱》。

便很有特色。如大都酒槽坊，门首多画春申君、孟尝君、信陵君和平原君等“四公子”像，以红漆阑干护之，上盖以“巧细升斗”，形如宫殿；两旁大壁上画车马、骑从、伞仗，间或以汉钟离、唐吕洞宾画像为门额；正门起立山字形金字牌共三层，称“黄公炉”；夏季于大长石柷中载大冰块，以消冰之水酿酒，槽中“水泥”（融冰）有一尺深。大都“显宦税硕”之家的“解库”门前两侧多置以生铁或白石铸成的狮子（公府月台上，两南角亦如上置）。此外，儿医之家、稳婆收生之家、兽医之家和剃头者的门前也各有特殊的标记。

店铺亦有一定规制，如官大街上或斜或正，朝南作半披屋。这些铺面除分布剃头、算卦和加工面粉的碓房外，亦货卖四时鲜果。盛果菜的器具用荆筐制成；又用盛放各色果品的红漆四方盒铺设在案板上。因方盘有“蔽风沙”等作用，故官员、士庶、妇女往往以此“作往复人情，随意买送”。烧饼之类的物品，多用荆盘盛放，置于地下、土案上或矮桌上零卖。卖酒者则用长木桶盛酒担送各处，名其曰“酒稍”。卖面糕者更活跃：蒸饼者五更即起，用铜锣敲击货卖；枣糕用黄米制作，往往二三升米为一团，“徐而切破，秤斤两而卖之。”馒头铺用大木杈支住长木杆，“当街悬挂”花馒头为幌。小商人则就铺批买，用蒲盒顶于头上，敲木鱼而叫卖。可见，大都多数商号和店铺均有各种形式的店牌与招幌^①。

三 城市生活空间的展拓

《朴通事谚解》(上)说，“大元以燕京为大都，俗呼南城，以开平府为上都，俗呼北城”，时人将两都联为一体，并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活动，从而使元代城市的生活空间得以大幅展拓。

成吉思汗常说，行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士兵

^① 详《析津志辑佚·风俗》。

和军人应尽的义务,所以,“当他们不打仗时,他们老那么热衷于狩猎”^①。按照这一传统,围猎便成为“国之大事”中的一种。大型围猎贵族必须带部属参加。蒙古国时期的围场设在漠北草原,“自和林南越沙地,皆浚以堑,上罗以绳,名曰‘扎什’,实古之虎落也。”^②这应该就是拉施都丁记载的窝阔台在其冬营地汪吉用木桩和泥筑起一道长达两天路程的围墙,该围墙可将猎地圈起^③。忽必烈以来,上自天子、诸王、后妃,下自百官、卫士,每年定期拥出城外,在大都、上都周围多处猎场展开声势浩大的围猎活动。大都的行猎地在今北京通州南面的柳林。上都行猎地一在上都之东五十里的东凉亭,二在西一百五十里的西凉亭,偶尔亦至西北七百里之外的三不刺川(北凉亭)。在两都巡幸途间的察罕脑儿(意为“白海”,今河北沽源县北数里处)建有亨嘉殿(西道于此与东道合),也是一处行猎地^④。

两都巡幸制是对城市生活节奏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项重大活动。

政治中心迁入汉地后,忽必烈一般于一、二月间在大都西南的柳林行猎,回宫后二至七天启程北上。后继者因种种原因,启程时间有时改在三月、四月或五月。上都高寒地区,“七月已似十月凉”^⑤,返程早在七月,有些习惯草原生活的帝王,则迟至八月或九月才返回大都。

在上都逗留的时间几乎占去全年的一半,因而,北巡时,元廷中枢及其外围人员几乎倾巢而出^⑥。数月后,择吉日南返。太仆卿先期征马,为皇帝权贵等准备提供食品的“酝都”(承乳车)。留守大都的宣徽院官员亦起解西瓜等

①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29—30页。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商务印书馆版)或据此义表述为“蒙古人不与人战时,应与动物战”(上册,160页)。

②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六,《大猎》。

③ 拉施都丁:《史集》第二卷,页七一;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三〇、三一。

④ 周伯琦:《扈从集》《近光集》卷二,《立秋日书事五首》。

⑤ 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五,《秋色长》。

⑥ 详《析津志辑佚·风俗》;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时鲜蔬果北上迎驾，北城、南城之人则“咸望圣驾回日近，买卖资羨，例有喜色”^①。“车驾还都”的时间或在重九节前后，或在八月。宫中为之举行的菊节也自有定制。大驾至大内下马后，“大茶饭者浹旬”；太子则于还宫后九天左右，择日令中书或左右丞、参议、参政等僚属于国学开学，并烹宰羊若干、酒若干樽宴请祭酒、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典籍等教官^②。

辽金燕京旧城因在新都之南，故大都市民习惯称之为南城，新城为北城。南城历史悠久，辽金两代又是陪都和都城，历经营建，因而古迹名胜，比比皆是，如唐太宗建悯忠寺、元杂剧中的昊天寺以及道教名胜长春宫便是胜迹所在。因此，这里自然成了大都居民游览的胜地，特别是阳春三月，“风日清美”，吸引全城官员士庶、男女老幼前往“踏青斗草”^③。

大都西面的西山是丛山的总称，玉泉山、寿安山、香山和西湖等著名的景点也是大都人游乐的胜景。

第八节 演艺与元代社会

有学者将宋元戏曲文物的形成划为三个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应的墓葬中，戏曲砖雕非常普遍（北宋后期集中在汴京地区，金代中期集中于平阳等地区）；元代属第三阶段（文物集中在平阳等地），此时，前代盛行的仿木建筑砖室墓走向衰落，“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墓葬建筑中戏曲装饰的减少，像金代那样集中的杂剧雕砖墓群再也未发现过。”值得注意的另一“异峰突起的现象”是“地面遗留的神庙附属戏曲舞台的大量存在”。这种舞台遍布晋南城乡和北

① 《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马政》；《析津志辑佚·岁纪》。

② 《析津志辑佚·风俗》。

③ 《日下旧闻考》卷一四七引《析津志》。

方各地，“它既是戏曲文化生活高度发达的标志，又反映出当时社会世俗心理的一个变化，即对于现实享乐的沉湎日益掩盖了寻求冥世的造福，人们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于生活中的戏曲文化娱乐，过去用于墓葬建设的投资现在转移至神庙舞台的建筑——尽管这种变化被崇神观念所冲淡。”^①可以说，伴随着戏剧形式的成熟及其演出活动的盛行，封建社会后期社会文化的这种世俗化倾向不仅为局部的戏剧文物发现所证实，也被更为广泛的文献记述所验证。胡紫遁就说过，“乐音与政通，而伎剧亦随时所尚而变。近代教坊院本而外，再变而为杂剧。既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民风机巧，虽郊野山林之人亦知谈笑，亦解弄舞娱嬉，而况膏腴闾阅市井丰富之子弟。”^②夏伯和在《青楼集志》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杂剧是元代文艺舞台的主要表演艺术，杂剧之所以称为“杂”，就在于它承袭了宋金以来的传统，即实际包含了说唱、杂技、歌舞、院本、傀儡等伎艺在内，又在勾栏瓦舍等场所进行多种艺术表演的混合演出。事实证明，包括杂剧在内的各项演艺活动对元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相当广泛而深刻的。

一 演艺在统治阶层和文人学士中的影响

女真、蒙古本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进入汉地后，其嗜好自然随之而来。据载，南进的蒙古军队中，“亦从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四拍子为节，甚低。其舞甚异。”^③在征服华北地区期间，蒙古军

① 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页三四至三五。元代六次杂剧文物出土即墓室画像砖的出土情况详该书页一〇八至一一〇。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二月。

② 胡祇通：《紫山先生大全集》卷八《赠宋氏序》、卷二六《语录·优伶赵文益诗序》。

③ 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

也往往将“优伶”置于屠杀对象之外^①。此后，“十六天魔”与“四大天王”成了元宫廷的专用歌舞(元中期以后又较广泛地流行于民间)^②，宫廷大宴也必有倡优伶人、斗士幻者的表演。

教坊歌伎倡优的多数由女性构成，官府将她们编入乐户，隶属于教坊司。然而，不仅宫廷，而且达官贵人、中下级官吏、文人学士所及场合乃至社会一般场所都有她们的身影。关汉卿《钱大尹智宠谢天香杂剧》中的谢天香是开封“管着这班门户人”的“上厅行首”，即歌伎班头。当地新任官钱大尹到任时，“一应接官的都去了”。谢天香作为教坊辖下的歌伎首领，按例也必须“参官去”。这就是夏伯和《青楼集》和许多其它材料中所说的“唤官身”。

演艺对文人学士的生活节奏与审美情趣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大量“不屑仕进”的儒雅文士(包括大批官宦)本身就是小令、杂剧等通俗文艺的创作者、欣赏者乃至演出活动的参与者。明人胡侍总结说：“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中州人多不得为之，每沉抑下僚，志不得伸”，“屈在簿书、老于布衣者，尚有多人。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纾其怫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③胡紫适特别指出：“居官者，不以政治勋业致君泽民为乐，而日与优伶、女妓、酒色、声乐为娱。其位则卿相，其志趣则优伶也。”^④像赵孟頫、高克恭以及姚燧、阎复等名士便与名伎们交往厮熟。类似者在元散曲中亦屡见表露，如高安道《嗓淡行院》写为官者习于“待去歌楼作乐，散闷消愁”，无名氏之《掏刷行院》套曲亦以“穿长街，蓦短衢、上歌台、入酒楼”之类的描写表现官宦文士们的嗜好。

①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

② 《元史》卷四三，《顺帝》六、卷二〇五，《哈麻传》；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之下《杂制》；《元典章》卷五七《刑部·诸禁·杂禁·禁治装扮四大天王等》。十六天魔舞之事尚多见于元明载籍。

③ 胡侍：《真珠船》卷四，《元曲》。

④ 胡祇适：《紫山先生大全集》卷二六，《语录》。

二 五彩缤纷的大都演出活动

大都的演出盛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略见一斑。

一是演出场所。主要分布在集市和繁华市区,最集中的是皇城北面的钟楼、鼓楼一带的商业中心。钟楼西面的斜街濒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斜街在海子(积水潭)东北岸上。海子是南北大运河的终点,各地货船多停泊于此,故热闹非凡,一派“弦歌啁啾”的景象^①。

二是大都聚集了众多全国一流的文艺作家群与著名演员。明确见于《录鬼簿》的大都著名“才人”至少有二十多位,其中早期作家有关汉卿、杨显之、费君祥等,后期有马致远、王伯成等。元代演艺界“名角效应”明显,大都的名演员,仅《青楼集》就记有张怡云、刘燕歌、曹娥秀、宋六嫂、天然秀等三十多位。黄文仲《大都赋》中所谓的“歌棚舞榭,选九州之秣芬”正可反映这一盛况。

再看大都的勾栏演出。

元代的“勾栏艺术”,特别是以大都为代表的勾栏艺术,呈现出以杂剧演出为中心,诸般演艺各显其能、争奇斗艳的表演格局和繁荣局面。嗜好者有皇室成员、达官贵人和儒雅文士,观众的主体则是大批平民和殷实富庶之家。黄文仲在《大都赋》中称艺人的演出“皆能以蛊人之心而荡人之魄”,“歌馆吹台,侯园相苑,长袖轻裙,危弦急管”,“一笑千金,一食钱万,此则他方巨贾,远土谒宦,乐以消忧,流而忘返。”

继承了宋金杂剧的传统,元代勾栏瓦舍中的表演内容有说唱、杂技、舞蹈、院本、傀儡等多种门类,如《朴通事谚解》(卷中)描绘花“五个钱”进场的观众即可在勾栏内见到“诸般唱词”、“诸般把戏”。与此相印证,至元年间在大都

^① 宋棗:《燕石集》卷一〇《望海潮〈海子岸暮归金城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的胡紫通亦以组诗形式展现了“小儿爬竿”、“相扑”、“趺鼓”、“太平鼓板”、“诸宫调”、“马骑”、“使棒”和“斗虾蟆”等杂艺演出^①。“摩肩累迹隘康衢”、“喧声百万动京华”的景况跃然纸上。

三 遍及南北各地的杂剧演出

夏伯和在《青楼集志》中说：“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我朝混一以来，殆将百年，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之所以形成如此盛况，演艺团体的流动巡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杨弘道看到不备干粮的优伶成群结队地从燕京南下汴梁时曾“怪而问之”，优伶们答道：“（我们）技同相习，道同相得。相习则相亲焉，相得则相恤焉”，“言竟，自得之色浮于面。”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元明间无名氏杂剧《蓝采和》等材料生动反映了当时许多剧团“冲州撞府，求衣觅食”和“沿村转庄，撞工耕地”进行流动演出的情况^②。通过这些艺人的努力，元代的杂剧演出可谓遍及于大江南北。

早期杂剧主要流传于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和中原地区，兼及黄河之南的汴梁、洛阳等地。如平阳发现的大批金元时期的戏曲文物中，属元代戏雕和壁画者有六通，涉及新绛、稷山和运城诸县。另有著名的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元杂剧演出壁画。更可注意的是舞台文物的发现，如晋南地区今存者多数属元代，且各个时期都有^③。

① 胡祇通：《紫山先生大全集》卷七，《马骑》、《使棒诗》、《趺鼓》、《相扑二首》、《斗虾蟆》、《小儿爬竿》、《诸宫调》、《太平鼓板》。

② 古杭才人编：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见钱南扬校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页二三二。

③ 详徐莘芳：《关于宋德方和潘德冲墓的几个问题》，载《考古》一九六〇年第八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山西新绛南范庄 吴岭庄金元墓发掘简报》，载《文物》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山西师范大学《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

诸多事实表明,平阳地区不仅城市勾栏演出发达,广大农村和乡镇的演艺活动也相当兴盛。再如山东地区,杜善夫的《庄家不识勾栏》套曲可足以印证东平一带商业性演出的繁荣局面。另如济南,时人称其地“水陆辐辏,商贾所通,倡优游食颇多”^①,行省高参政之“参政者,参知杂剧”虽属自诩之词,但杂剧在临淄一带乃至整个山东地区受欢迎的情景亦不难想见^②。另据宋濂报道,天历年间汴梁路的陈州(今安徽淮南市)“倡优为戏剧以射民利,昼夜聚观,皆废所执业,府君患之,捕置于法。有挟权贵人势欲脱去者,府君持之愈急,一城震悚”^③。

再看杂剧在南方的影响。明人徐渭说:“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④南传地以扬州为首站,其地有行教坊司之设^⑤。元初扬州的歌台舞榭戏剧演出相当繁华,朱帘秀等北方名伎和白朴、马致远、关汉卿、杨显之等剧家的流入为扬州演艺的繁兴增添无穷活力。至元、大德年间(一二九五年至一三〇七年),南方杂剧中心在杭州形成,像朱帘秀这样的名伎已从早年“作场”的扬州来到这里;关汉卿的晚年在杭州度过,马致远、戴善甫、尚仲贤等是在杭州任职的杂剧作家。据《录鬼簿》、《青楼集》诸籍统计,活跃在杭州的剧作家另有宫天挺、郑光祖、钟嗣成等三十多位,名角有杨驹儿、杨买奴、王玉梅、米里哈近三十位。时人以“东街南曲声婉扬,西街北曲声激昂”之类的文句描绘当时街市演出的景象^⑥。号称“销金锅儿”的西湖仍是官吏、才人、仕

① 于钦:《齐乘》卷五《风土》。

② 详王恽:《秋涧集》卷四四,《纪梦》。

③ 《宋学士文集》卷二一,《故承务郎道州路总管府推官李府君墓志铭》。四部备要本。

④ 徐渭:《南词叙录》,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剧论著集成》(三),23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7月版。

⑤ 《元史》卷一六,《世祖纪》一三。

⑥ 徐士荣:《新街曲》,载《元诗选》癸集。

女、百姓游乐赏艺之佳处^①。在杭州,宋代以来形成的喜好演艺、纵情歌舞的习俗沿袭至明而不衰^②。

元统一南北后,杂剧传入南方,南戏也开始传入大都,但北剧与南剧互争雄长主要在东南地区进行^③。按照《青楼志》、《录鬼簿》等文献的记载,其范围以杭州为中心,广泛波及扬州、建康、镇江、平江、常州、松江、嘉兴、湖州、婺州。湖北以武昌为中心。流入江西、福建的剧作家和艺人也不在少数。杂剧等戏剧歌舞演出活动遍及上述地区的城乡各地,成为官宦、文士和城乡民众不可或缺的嗜好,如前文提到的玉山草堂,“园池亭榭之盛,图书之富,暨饩馆声伎,并冠绝一时”^④，“其雅不能诗者,尤好搬衍杂剧。即一段公事,亦入北九宫中。”^⑤陶宗仪记述松江府(今属上海市)一次勾栏演出时“棚屋”倒塌,压死的四十二人中竟有一个僧人和两个道士^⑥。可见,“民风机巧,虽郊野山林之人亦知谈笑,亦解弄舞娱嬉”(胡祇适语)确已成为一代风尚。

① 马臻:《霞外诗集》卷九,《西湖春日壮游即事》。

② 高启:《凫藻集》卷二《送顾倅序》。

③ 季国平:《元杂剧发展史》,[台]天津出版社,1994年3月版,页三七六至三八〇。

④ [清]顾沅:《吴郡名贤图传》卷三,《顾瑛》。

⑤ 《稗史汇编·曲中广乐》。

⑥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四,《勾栏压》。

人名索引

A

阿盖公主 671

阿八哈 246,609,624,773

阿必失哈 188,237,615

阿卜失哈 815

阿布别克儿 149

阿布勒肥达 592

阿布思 10

阿丹汗 59

阿的勒 620

阿底峽 636

阿儿孩合撒儿 61,73

阿儿浑 150,180,186,607,773

阿儿思兰汗 122,123

阿格仑 653

阿袞 656

阿哈玛特 735

阿海 75

阿合马 245,310,327,391,392,404—408,
418,419,421,466,682,773

阿忽台 415—417

阿刺罕 278,788

阿刺黑 132,133

阿刺忽思剔吉忽里 738

阿刺吉八 431,437,561

阿刺浅 193

阿刺忒纳失里 333,430,440,495

阿刺兀思剔吉忽里 31,72,77,100,103

阿兰答儿 166,236,237

阿兰果火 25,26,28,39,68,807

阿老丁·麻哈没的 629

阿老瓦丁 249,390,611

阿勒赤歹 173

阿勒坦 35

阿勒坦汗 31,114

阿里 15,16,28,115,141,150,258,261,
635,651,686,804,805,810,857

阿里不哥 88,164,166,175,177,186—
188,232,236—239,243,245—247,264,
280,413,558,559,563,564,567,569,
607—609,613,614,625,626,642,767,

- 768,771,772,793,814
- 阿里底 17
- 阿里海牙 233,282,283,333,340,462
- 阿里黑赤纳 53
- 阿里火者 132,206
- 阿里替也儿 118
- 阿里西瑛 686
- 阿里鲜 226
- 阿鲁 24,25,28,39,61,62,437,670
- 阿鲁忽 177,188,237,238,245,246,607—
609,613,624,625,772
- 阿鲁欢 343
- 阿鲁辉帖木儿 570
- 阿鲁浑 413,773,774,776,815—817
- 阿鲁浑察 211
- 阿鲁浑萨里 410
- 阿鲁威 686
- 阿鲁温沙 505
- 阿迷的 604—607
- 阿明灭里 138
- 阿奴思的斤 127
- 阿诺德 819
- 阿齐思 127
- 阿散 408,425
- 阿散哥也 796—798
- 阿沙不花 416,417
- 阿山 627
- 阿失歹儿 475
- 阿失黑 79
- 阿朮 169,256,261,282,333,461
- 阿朮鲁 212,221
- 阿思监 516
- 阿速歹 164
- 阿速带 237
- 阿速铁木儿 430
- 阿塔赤 144,461
- 阿塔海 282,788
- 阿忒黑拉 118
- 阿同葛 196,198
- 阿维森纳 780
- 阿泽汗 51,52
- 阿札失里 586,588,589
- 阿只吉 237,249,612
- 阿朱 23
- 爱不花 738
- 爱德华一世 413,817
- 爱鲁 474
- 爱思丁 806
- 爱薛 228,578,740,776,779,780
- 爱因班 495
- 爱猷识理达腊 544,548,588
- 爱育黎拔力八达 416,417,420,421
- 安德烈 739,741,812
- 安德鲁 739,810,819—821
- 安德罗尼古斯二世 816
- 安全 93,94,96

安天合 208
安童 247,251,405,408,425,559,608,610
安祐 513
俺巴孩 43,53,58,59,101
按察儿 218
按陈 77,91,113,173,404
按赤不花 626,627
按赤带 116
按弹 117
按摊不花 448
按梯不花 428
按只罽 216,269
按竺迩 158,162,640,648,649
昂吉儿 259,461,462
奥都刺合蛮 208,217,228
奥敦周脚 686
奥鲁赤 202,249,379,643,660,669

B

八把 249
八不沙 560,568
八赤蛮 143
八春 237
八的麻亦儿间卜 561
八都马辛 473
八刺 11,13,21—23,37,57,82,124,138,
174,181,192,228,246,423,424,453,
607,609—611,623,624,632,633,768,

794
八刺必阁赤 606
八刺马 478
八郎朵公 477
八立托 84,580
八鲁浑 247
八撒察里 249
八思巴 83,224,225,227,337,580,639—
642,644—648,652,653,658,659,722,
725,734,736,770,864
巴歹 71
巴儿坛 44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 632
巴哈丁·麻儿亦囊尼 605,607
巴塔赤罕 7
拔都 142—147,149,174,178,180—185,
188,193,203,212,238,259,384,570,
601,602,606,607,609,616,768—770,
811,812
把赫卜列思 816
把匝刺瓦尔密 536,548,670
白不信 507
白栋 406
白朴 683,873
白琐住 545
百户盖分 473
百丈怀海 723
拜答儿 143,145,188,237

- 拜答寒 248
拜答里 607
拜都 774
拜合里 607
拜泥 738
拜塔儿 780
拜姓忽儿 57
拜延忽里 620
拜住 87, 149, 151—153, 180, 414, 425—
429, 479, 573, 615, 617, 618, 774, 775, 812
班都察 143
班朮儿 651
棒胡 480, 481, 490
保八 419, 420
报恩奴 516
盍禄汗 45, 52
本笃十二世 821
彼得 620, 818, 820
彼列格林 739, 741
必刺蛮 802
必阑纳识里 630
必纳的 805
毕勒哥 121
毕升 762
边鲁 696, 697
别不花 481
别迭 195, 214
别儿哥 142, 143, 180, 182, 185, 186, 237,
245, 608, 767, 768, 770, 772, 814
别刺四世 146
别里古台 67, 84, 161, 164, 171, 172, 174,
201, 211, 560, 568, 569, 585
拔绰 143, 211
孛端察儿 7, 26—28, 38, 40, 46, 48, 56, 61,
86
孛儿帖 8, 54, 61, 79, 171, 172, 177, 178,
857
孛儿帖赤那 25
孛哥帖木儿 201
孛古 29
孛兰奚 508, 509
孛里海 109
孛鲁 95, 103, 106, 109, 218, 220, 222
孛鲁古 201
孛鲁合 85, 88, 216, 228, 269
孛伦赤 430
孛罗 201, 246, 342, 428, 433, 521, 545,
670, 776, 777
孛罗带 611
孛罗普化 508
孛罗台 201
孛罗帖木儿 501, 503, 506, 514, 515, 544,
545, 549, 764
孛秃 63, 77, 105, 163, 584
伯八 211
伯杭 422

- 伯忽 669
伯家奴 517
伯木儿 247
伯帖木儿 282,514
伯颜 39,47,247—251,257—260,282,
313,333,337,355,373,379—381,410,
430,431,434,436—438,440,457,477,
481,559,560,562,570,700,769,772,
801,853,854
伯颜察儿 430,431
博尔忽 67,81,118,177,278
博尔朮 28,61,63,79,81,177,201,410
博刺克 149
博罗欢 85,247,250,361,365
博希蒙六世 153
卜兰奚 517
卜鲁罕 415—417,420,815
卜纳刺 643
卜颜帖木儿 498,499,518
补好丁 731
不达达思 803
不答失里 435
不古讷台 28
不合 46,118,278,354
不合秃撒勒 68
不忽合塔吉 68
不忽里 473
不忽木 75,197,406,411,415,697
不花 119,127,129,130,132,133,135,
136,175,178,182,206,228,241,415,
505,511,601—604,608,619,623,624,
773,775,785,814,862
不花即里 585
不花太师 602,625
不花帖木儿 152,431,586
不里 19,119,139,142,143,175,182,188,
237,250,566,614,619,620,770,798
不里孛阔 66
不怜吉斛 182
不邻吉带 471
不六温 806
不赛因 775
不兀刺 61,117
不欲鲁罕 30
不只儿(布智儿) 218
布思端 722
布王三 493—495
- C
- 蔡大老 468
蔡福一 469
蔡京 689
蔡乱头 501
蔡沈 311
蔡五九 476,477
蔡彦文 533

- 蔡元刚 530
藏卜班 659
曹伯启 426
曹梦炎 335,336
曹世雄 255
曹友闻 162
曹元用 427
岑世杰 475
岑世兴 477
岑雄 475,477
岑毅 465
查理 822
察八儿 251,412,413,562,612—614,769,
774
察必 404,826,827
察罕 24,69,96,97,161,162,210,405,
455,473,573,664,675,814,867
察罕帖木儿 494,505—507,510,511,
513—515,541,544,545,547
察合台 63,103,104,132—134,136,138,
142,143,150,171,172,174—182,186—
188,193,201,203,237,238,245—247,
384,385,412,424,559,562,569,572,
602—611,613—625,628,629,633,634,
640,722,767,768,807
察忽刺 164
察刺孩领忽 41,47,57
察乃 192,416
昌国公主 201
长谷真逸 336,355,528
常德 150,288,517,625
常遇春 522,525,534,546,548
抄兀儿 69
抄真斡儿帖该 28,41
彻彻都 247
彻彻秃 562,570,571,580
彻里 406
撤必 228
陈安国 503
陈大方 252
陈大妇 465
陈大任 698,699
陈吊眼 262,461,463—465
陈飞 473
陈夔 753,755
陈高 403,458,503
陈光晟(陈圣宗) 793
陈桂龙 465
陈机察 469
陈积万 483
陈君用 481
陈峻 793
陈空崖 473
陈理 532,536
陈良臣 467,468
陈隆之 162

- 陈马骥 480
陈猺头 510
陈普文 496
陈七师 469
陈千二 463
陈庆安 478
陈日熨(陈太宗) 792
陈日煊 793
陈三官 465
陈氏 501,518,525,844
陈寿 689
陈思谦 292
陈邃 341
陈天祥 277,405,421,472
陈文龙 263
陈巽四 468
陈宜甫 33,578
陈宜中 258,259,262,263,492
陈益稷 794
陈寅 158,453
陈友定 384,535—537
陈友谅 516,518—521,524,525,530—
533,536,537,540,541,555
陈祐 251,406,461
陈苑 707,711
陈再一 468
陈瓚 263
陈炤 259
陈仲玉 504,538
陈子华 538
成吉思汗 6,7,17—21,23,25,27—29,
31,34—36,38,40—51,54—57,59,61—
64,72,74—88,90,91,93—97,100—107,
109,110,113—119,121—123,125,126,
128—139,142—144,147,150,155,157,
158,163—165,167,171—179,182—189,
191—194,198—200,202,206,207,215,
216,219,223,224,226—229,231,233,
245,265,269,272,273,278,288,303,
314,337,340,343,384,390,404,405,
407,410,413,415,425,453,558—560,
562,563,566—570,572,574,576—581,
584,590,600—603,605,614,623,632,
634,638—640,643,662,664,701,722,
729,734,736,769,773,775,776,781,
783,803,805,807,813,834,840,846,
848,857,859,861,866
成宗 274,277,282,287,292,296,306,
310,318,320,321,323,325,333,335,
338,339,350,388,409—417,420,452,
456,457,472—475,560—562,564—566,
575—577,585,612,613,647,651,659,
681,727,728,734,774,796,798,799,
849,858
丞相大夫 602,608,625
承裕 103

- 程国胜 497
- 程颢 706,710
- 程钜夫 14,221,223,224,338,339,351,
391,392,409,421,578,579,776,779,780
- 程鹏飞 421
- 程思忠 513
- 程彦晖 156
- 程颐 311,706
- 赤斤铁木儿 428
- 赤老温 81,177,278
- 赤勒格儿孛阔 177
- 赤勒古台 62
- 仇成 535
- 仇知院 515
- 出班 775
- 出伯 561
- 出木哈儿(旭烈兀子) 237
- 床兀儿 429,565,570,616—618
- 崔斌 341,407
- 崔德 506,507,514,515
- 崔立 112,158,160
- 崔世英 510
- 崔坦 584
- 崔莺莺 683
- 崔莹 512,513
- 崔暅 466,790
- 撮及班 806
- D
- 达·芬奇 744
- 达国珍 509
- 达海紺卜 162
- 达赉逊库登 590
- 达理麻失里 514
- 达玛隆 798
- 达磨 635,636
- 达识帖木儿 532
- 达识帖睦迩 526
- 达延汗 590
- 答儿麻失里 619,633
- 答耳麻八剌剌吉塔 645
- 答即归阿散 408,409
- 答己太后 422,423,425
- 答刺海 436
- 答刺麻八剌 416,659,669
- 答里 436
- 答里不罕 463
- 答里麻 480,761
- 答里麻失里 430
- 答里台斡赤斤 62,70
- 答里真 201
- 答木丁 563
- 答失八都鲁 495,505—508,514,517,544
- 答失蛮 229,285,572,620,655,735,738
- 大刀 140,149,812

- 大刀敖 507
大休 724
歹帖木儿 516
带都刺·莎合儿 118
带孙 109,201,222
戴表元 690,691
戴曲薛 243
戴寿 521
丹尼勒 145
胆巴 405,415
党怀英 698
党兀班 481,648
倒刺沙 427,429—433,562,586,669
道安 725,793
道尔达 640
德辉 723
德米特尔 145
德任 95
德寿 416
德薛禅 59
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 796
的颜不花 697
邓克明 496,537
邓牧 716—718
邓南二 496
邓愈 522,525,547
邓祖胜 538
狄青 748
迪牙别克儿 153
邸浹 243
邸顺 222
第悉觉噶 639
迭该 62
丁大全 252
丁好礼 440
丁鹤年 761,780
丁普郎 496
丁氏 529
丁野夫 686,697
定惠大师 627
定宗 180,182,571,605—607
东汉灵帝 689
董复初 566
董解元 683
董俊 107,109,196,232
董克昌 511
董起谊 156
董士选 421,472
董士珍 421
董宋臣 166,252,254
董抟霄 498,508,509
董文炳 167,199,232,280,801
董文用 328,350,461
董文忠 278,279,407,408
董贤举 469
董源 695,696

- 董遵 588
都实 749,750
窦娥 682
窦默 227,233,406,705,707
闾里帖木儿 250
独吉思忠(千家奴) 103
独刺 114
独木干公主 211
笃来帖木儿 619
笃麟帖木儿 333,440
笃哇 249—251,411—414,559,561,562,
611—614,619,620,660,738,769,774
睹答儿 218
睹海 475
杜诗 755,791
杜世忠 788
杜万一 463,464,489
杜瑛 165
杜佑 703
杜遵道 492,506
段成式 7
段丑厮 473
段功 671
段思平 166
段祥兴 662
段信直日 666
段兴智 167—169,662
多桑 15,177,178,413,674,768,769,771,
812,866
朵奔伯颜 25,26,28
朵朵 430,431
朵儿伯·朵黑申 118
朵儿直班 654
朵儿只班 501,516
朵儿只监卜 637,638
朵豁刺歹 40
朵来 505
朵列纳 568
朵鲁知 249
- E
- 讹鲁不 217
额勒只吉歹 85,216
鄂多立克 738,740,835,849—851
鄂诺鲁 816
- F
- 法忽鲁丁 418
法苏都 626
樊绰 673
樊执敬 498
范孟 481,482
范天顺 257
范文虎 256—258,260,334,788—790,838
范壅 748
方关 101,157,530,616

方国珉 530

方国瑛 501,530,535

方国璋 501,529,530

方国珍 500—503,525,528—530,535—
537

方回 690,789,818

方腊 687

方明善 535

方氏 501

菲烈德里二世 147

腓力四世 413,769,773,775,817,819

费子贤 525

冯长舅 511

冯国胜 534,540

冯国用 523,540,542

冯胜 586,588

冯岳 477

冯宗异 547,548

佛家奴 516

佛嘉 437

弗拉基米尔大公 144,145

福定 821

福寿 426,523

福裕 223,227,579,590,724

傅高 462

傅全 464

傅友德 536,588,671

G

甘麻刺 251,410,411,414,559—561,568,
578,580,669,670

敢木丁 798—800

高达 166,313,391,448,579,697,853

高岱 490,507,523,540,541

高洞阳 761

高峰原妙 724

高和 168,370,405,662

高家奴 587,588

高克恭 695,696,843,870

高明清 662

高蓬 670,671

高俅 689

高儒 687,688

高泰明 662

高仙道 473

高祥 168

高兴 195,464,467,802

高逸 94

高逾城光 662

高逾城和 662

高逾城隆 662

高逾城生 662

高则诚 685

高智耀 230,233,240

纥石烈执中 97,103

- 格坚皇帝 646
格里高利十世 747
格里戈里十世 814
格烈戈里九世 147
葛不哥 116
葛不律寒 57
葛达那加刺 802
葛儿罕 124,125
葛勒可汗 10
葛哩麻巴哈失 642
葛乾孙 760
葛子熙 709
公哥朵儿只 635,639
公哥儿监藏班藏卜 646
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 645
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 645,646
公哥宁波 639
公主合敦 104,172
恭愍王 512,513,583
恭塘巴 580
龚开 687
巩卜班 494
贡师泰 321,798,834
苟梦玉 157,158
古出古儿 62
古儿罕 45,54,69,76,92
古亦鲁克 769
谷纳 463
骨力裴罗 10
顾苓 688
顾时 536,660
顾仲瑛 336,845
关保 510,511,545,547
关汉卿 681—683,686,846,858,870,871,873
关先生 507,510—514
管景模 258
贯云石 686,687,697,761
贯只哥 686
光教法闻 725
广王 262,468,492
贵由 84,116,143,144,149,150,175,179—183,185,188,193,201,217,224,228,571,579,605—607,641,779,811,812
桂如渊 157,158
郭从 293
郭存中 753
郭德海 309
郭火你赤 483
郭侃 91,151,775
郭明德 575
郭菩萨 478
郭荣 743
郭守敬 267,345,379,742—747,758
郭天叙 523

郭文振 108
郭震 480
郭子兴 493,495,522,523,539
国用安 221

H

哈巴失·阿迷的 607,633
哈赤温 201
哈丹 250
哈丹秃鲁干 582
哈刺不花 237,238,587,627
哈刺哈孙 415—417,565,569,575,581,
849
哈刺旭烈 180,188,238
哈刺亦哈赤北鲁 121,630
哈临秃 498,499
哈麻 502,544,774,870
哈麻秃 520
哈撒儿 104,173,201,560,568,586,805
哈萨儿 237
哈散 151,732
哈散萨巴 150
哈沙尼 413,612,615—618
哈扎刺不花 602
哈真 115,116
哈只儿汗 130
哈只葛达那加刺 801
哈只葛当(查耶卡旺) 802

海都 19,23,28,41,44,46—48,57,183,
184,186,245—251,264,411,412,466,
559—562,566,569,575,607,608,610—
613,620,623,624,767—769,775,818
海合都 774,777,815
海蓝伯 75
海迷失 606,812
海山 416—418,420,561,562,566,575,
613,614,669
海屯 153,154,343,566,575,771,772,
775,835,849—851
海屯一世 149,153
海云(印简) 224
韩阿巩 293
韩从益 421,426
韩法师 481
韩虎 503
韩林儿 492,500,506,514,515,523,529,
532,541,549,694
韩琦 748
韩山童 488—492,506,541,693
韩世安 243
韩咬儿 490,492,494
韩愈 715
韩赵奴 293
韩仲晖 379
喊舍 113,116
汉高祖 472

- 杭忽思 144,259,461,818
沆忽阿忽 68
郝定 241
郝和尚拔都 222
郝经 105,165,166,198,203,212,213,
217,219,232,234,236,239,255,258,
335,706,707,772,784
郝天挺 421
呵哩禅波哩揭 649
禾忽 248,610
合班 624
合必赤 243
合彪 469
合不勒 42,59
合不勒汗 41,42,44,45,47,53,57—59,
62,67,101
合赤温 61,74,116,164,173,174,184,
250,560,568
合答 65,68—70,73,75,178,182
合答安把阿秃儿 101
合丹 143,146,147,183,211,237,598
合丹太石 53,59
合丹太息 201
合的儿子汗 52
合儿班答 413,423,769,774,775
合刺察儿 579
合刺秃苦灭 627
合刺旭烈 182,605,606,609,633
合撒儿 173,174,184,192,250
合失 211,610
合赞 620,633,769,774,776—778,815
合札罕 620
何荣祖 291,292
何时 262
何实 386
何玮 406,408
何文辉 535—537
何真 504,536,538
何子志 798
和尔朔齐 590
和礼霍孙 408
和里解 641
和世球 423,424,430,432—434,562
曷思麦里 141,288
贺伯颜 423,424
贺惟一 456,698
赫厮 492,493
黑的 40,52,71,600,632,634,786,787
黑驴 333,425,440
亨利 146,632
红娘 683
洪保保 587,588
洪茶丘 788,789
洪丑驴 505
洪福 259,461,769,784
洪皓 8

- 忽必烈 83, 85, 88, 163—169, 183, 184,
186—188, 205, 208—211, 215, 216, 220,
224, 225, 227, 228, 231—240, 242—251,
255—257, 261, 264—266, 268—270,
272—274, 278, 280, 282, 286—289, 291,
300, 305, 306, 310, 311, 315, 320, 327,
337, 340—344, 346, 349, 350, 353, 355,
356, 386, 387, 396, 404—411, 414, 415,
418, 425, 440, 441, 444, 450, 454—456,
460, 461, 466, 471, 512, 558—564, 568,
579, 580, 582, 586, 607—610, 641—644,
646, 652, 655, 659, 660, 662, 663, 665,
666, 669, 707, 722, 727—729, 734, 737,
738, 742, 743, 745, 749, 755, 763, 767—
769, 771—774, 776, 779, 781, 782, 784—
790, 793—795, 798, 801—803, 809, 813—
818, 826, 830, 840, 841, 847, 852, 858,
861, 867
- 忽察 182, 433, 606
- 忽察儿 44, 62, 70—72, 79
- 忽都 68, 121, 122, 200, 205, 229, 234
- 忽都不花 483
- 忽都合别乞 20, 21, 70, 73, 74, 77, 118,
119, 121
- 忽都虎 199, 210
- 忽都火者 478
- 忽都鲁 149, 176, 294, 615, 627
- 忽都鲁铁木而 475
- 忽都帖木儿 617, 775, 855
- 忽儿札胡思盍禄罕 14
- 忽哥赤 664, 666, 669, 670
- 忽刺忽儿 237
- 忽兰合敦 172
- 忽怜 247
- 忽邻拔都 60
- 忽鲁八 19
- 忽鲁不花 85, 241
- 忽鲁速蛮 143
- 忽难 77, 79, 773
- 忽思慧 761, 780
- 忽速黑 604, 634
- 忽滩汗 141, 146
- 忽秃思 154
- 忽图刺汗 53, 58—60, 62, 101
- 忽只儿 604
- 胡丞相 85, 197, 217
- 胡大昌 252
- 胡大海 522, 525, 527
- 胡三省 701—704
- 胡沙虎 58, 97, 103
- 胡深 537
- 胡天作 108
- 胡廷瑞 519, 525, 534, 537
- 胡土 85, 116, 199
- 胡应麟 688
- 胡祗通 191, 197, 218, 277, 286, 288, 289,

- 308, 310, 318, 338, 349, 369, 378, 395,
869, 870, 872, 874
- 虎伯恭 686
- 虎林赤 510, 511, 545
- 护都不丁摩诃末 127
- 花云 524
- 华高 534
- 华云龙 534
- 华仲贤 503
- 滑寿 759, 760
- 桓宗纯佑 93
- 皇甫杰 798
- 皇太极 590
- 黄大成 468
- 黄道婆 369, 370, 374, 375
- 黄德宁 475
- 黄公望 695, 696
- 黄广德 461
- 黄华 463, 467, 470, 695
- 黄潛 248, 311, 357, 403, 437, 438, 572,
582, 586, 594, 736, 794
- 黄敬天 533
- 黄濂靖 504
- 黄濂举 504
- 黄溥 448, 501, 693
- 黄圣许 471, 504
- 黄兀儿塔海 201
- 黄璋信 475
- 黄宗羲 715
- 黄佐才 481
- 晃火帖木儿 436
- 惠汶 725
- 慧远 489
- 浑都海 236, 237
- 豁儿赤 77, 79, 118
- 豁里察儿篾儿干 40
- 豁里失列门 45
- 豁里台·答亦儿 52
- 火赤哈儿的斤 249, 610
- 火赤斡兀立 248
- 火儿忽答 482
- 火雷公主 201
- 火鲁和孙 174
- 火鲁火孙 250, 563
- 火你赤 82, 498, 609
- 火者 151, 815
- 霍里极 211
- 霍鲁海 236, 237
- 霍希贤 421

J

- 吉列思 480
- 吉庆祥 725
- 计用章 748
- 纪理安 744
- 季文龙 462

- 济拉玛 590
祭伯秧 478
加瓦藏卜 653,659
夹谷三合 457
嘉泰丁 147,148
贾耽 10,750,751
贾居贞 462,463
贾鲁 487,488,491,495,522,757—759
贾思勰 753
贾似道 166,236,252,254—258,260
贾塔刺浑 191
贾秃坚不花 574
贾仲明 681
价博 795
蒋丙 482
蒋辉 526
蒋祁 376
蒋仁五 482
焦竑 296,427
教化 415,418,498
教化的 796,797
接待奴 516
揭傒斯 365,375,393,464,572,691,698,
758,822
节思朵 723
劫烈 481
解宝 689
解成 243
解珍 689
金哀宗 91,97,110—112,158
金安三 503
金方庆 789
金花姐 499
金花娘子 503
金家奴 250
金就砺 115,116,590,783
金山 113,116,424,587,613
金世宗 101,327
金太宗 101
金太祖 700
金文石 686
金翁瑞 503
金熙宗 58
金宣宗 97,98,101,104—106,113,114,
155,198,218,220
金元素 686
金元祐 505
金章宗 65,97,99,100,102,223,758
晋武帝(司马炎) 689
居谊 258
巨然 695,696
瞿霆发 335,336,338,844
君不花 738
- K
- 卡尔毕尼 592

喀尔平尼 78,180,181

凯亦·豁思鲁 149

勘马刺失里 795

勘陔孟迦 640,649

阚文兴 464

康进之 684

康里脱脱 417,419,565,571

康茂才 519,523,535

康泰 537

柯九思 87,696

可马刺丁 781

克薛杰 182

刻珠琼波 637

肯那却不刺木省 805

孔清觉 725

孔提谷充儿 477

孔温窟哇 67

孔兴 545,548

孔元措 229

孔子 229,408,581,668,709,721,855

口温不花 161

窟麻刺哥撒八 797

苦马鲁丁 233

宽彻 432

宽彻大王 475

宽彻哥 494

宽彻哥思 248

宽彻普化 390,440,516

宽阔 614

奎蒙克 590

扩廓帖木儿 510,513,515,535,544,545,
547,548

阔出 161,180—182,211

阔端 82,162,179,201,224,278,580,
640—642,650,655

阔客歹 142

阔阔 19,233,241,286,797,853

阔阔不花 201,218

阔阔出 76,79,247,416,417,561

阔阔出乞儿撒安 47

阔阔带 666

阔阔真 815

阔里吉思 150,186,612,738,777,785,
818,854

阔列坚 143,172,201,558,569,572

L

拉施都丁 5,7,8,13—15,17,18,20,21,
23,25,26,29,34,37,38,41,47—49,52,
56,57,60,76,77,88,90,117,175—177,
180,187,191,407,411,453,569,609,
640,664,772,776,778,782,815,840,867

兰丑儿 543

兰楚芳 686

蓝青 473

蓝玉 577,588,671

- 郎瑛 687
老把都 590
老的 86,250,669
老的沙 544,545
老章 494,495
老子 227,721
乐夔 699
乐实 419,420
雷帖木儿不花 513
雷通 473
黎尉 794
黎德 467,468
黎浩 468
李(商隐) 690
李翱 715
李伯升 502,533,534
李伯祐 244
李藏用 583,786,787
李昌国 110
李昶 165,210,221
李成 695
李成桂 513
李椿 392
李存 711
李达淑 465
李大迟 776
李德和 727
李德裕 5
李芳实 513
李芾 261
李黼 497,541
李杲 759,760
李国昌 158
李好文 438,698,757
李贺 690
李简 234
李进 249,611
李京 671—674,676,677
李克彝 547
李克用 31
李逵 684,689
李龙神(万顷) 475
李满林 538
李孟 420,421,425
李明道 496,519
李普胜 496,499,500,517,523
李齐 502
李齐贤 785,786
李千金 684
李谦 205,406,407,421
李全 99,108,109,156,196,216,221,222,
226,232,233,241,242
李若谷 748
李三 461
李穡 584
李善长 523,540,542

- 李师 503
李师中 748
李守贤 222
李顺 554
李思齐 494, 505, 507, 513, 514, 536, 544, 545, 547—549
李嵩 687
李璫 219, 222, 232, 233, 241—245, 264, 270, 280, 404, 649
李庭 250, 251, 788
李庭芝 256, 260—262
李文俊 793
李文忠 522, 542, 548
李武 506, 507, 514, 515
李习 523, 540
李喜喜 507, 521
李显祖 465
李心传 6, 155
李信 16
李行 752
李行素 526
李延龄 584
李冶 231
李毅奴哥 243
李玉 377, 378
李裕庵 364
李直夫 684
李志常 226, 454, 578, 728—730
李志甫 481
李卓吾 715
李梓 463
郈希成 226
廉和尚 483
廉惠山海牙 700
廉希宪 227, 233, 237, 241, 244, 404, 407, 849, 863
梁德懿 95
梁武帝 702, 721
梁相 136, 228, 631, 737, 740
梁中书 689
辽圣宗 12, 19
廖永安 499, 517, 522, 527
廖永忠 499, 515, 522, 535—539
列班扫马 737, 816, 817
列边阿答 228, 578, 779
林冲 689
林丹汗 590
林桂芳 467
林君祥 497
林衍 583, 584
刘备 690
刘秉忠 165, 167, 200, 205, 208, 209, 224, 227, 231, 232, 234, 235, 244, 264, 404, 579, 690, 708, 742, 743
刘炳 98
刘伯林 104, 107, 215, 219

- 刘德仁 225
刘德柔 190,218
刘恩 249,611
刘二拔都 467
刘二祖 99,241
刘福通 490—495, 500, 505—508, 511,
513—515, 529, 532, 541, 543, 693, 694
刘光世 492
刘贵 472
刘国杰 248, 467, 474, 570, 575, 803
刘哈喇不花 506, 507, 509
刘好礼 246, 247, 564, 575
刘黑马 162, 164, 219—221
刘亨安 160, 194
刘基 328, 519, 525, 541—543
刘甲 471
刘金莲 472
刘景周 477
刘夔 427
刘六十 472, 473
刘敏 190, 217
刘敏中 322, 336, 416, 421, 564, 566, 569,
575, 805, 834
刘祁 699
刘仁本 383, 530, 723
刘深 474
刘师勇 259
刘时中 169
刘肃 197, 221
刘太平 236, 237
刘完素 759, 760
刘文远 505
刘垓 420, 421, 441, 469, 470, 489
刘益 587, 588
刘郁 150, 288, 625, 630
刘楨 521, 536
刘整 164, 255, 256
刘正 421, 422
刘致 686
刘仲禄 91, 226
刘宗福 377
留哥 113, 114, 590
柳贯 213, 286, 401, 712
柳仁雨 583
柳濯 512
柳宗元 721
六彪 469
隆吉汪朮 637
娄铃精 261
卢布鲁克 35, 189, 190, 269, 393
卢世荣 323, 404, 405, 408, 466, 682
卢摯 686
鲁布鲁克 576, 579, 580, 592, 630—632,
738, 812, 813
鲁国大长公主 49, 333, 440
鲁克奴丁 149, 151

鲁坤 756
鲁明善 755
鲁思 45, 46, 51, 57—60, 62—64, 72, 76,
142, 173, 174, 177, 178, 182—186, 188,
238, 245—247, 412, 466, 559, 605, 606,
608, 609, 611, 612, 615—619, 769, 772,
816
鲁斋郎 682
鲁智深 687, 689
陆儒先 712
陆帅 468
陆象山 710—712
陆秀夫 262, 264
陆仲亨 538
吕德 361
吕师夔 258
吕文德 161, 165, 166, 255, 256, 259
吕文焕 256—258
吕珍 515, 525, 527, 529, 532, 534
吕震 512
吕重二 471
吕祖谦 709
罗半天 465
罗璧 351, 381
罗旦 550
罗飞 462
罗贯中 687—689
罗洪先 380, 751

罗琅玕 678
罗氏 496, 537, 665, 669
罗太后 93
罗天麟 483
罗文素 490, 492, 506
罗焯 687
罗知悌 760
洛泰 798, 799

M

麻古思 737, 738, 816, 817
麻哈没的 620, 806, 807
麻速忽 139, 180, 187, 602, 604, 607, 608,
624, 625, 633, 634
马端临 701, 703—705
马儿忽思 17, 45, 51
马菲奥 813
马哈木 129, 206, 216
马哈木·喀什噶里 12
马哈木汗 124
马合麻 805
马合马 805
马合木 602, 603
马九皋 686
马可波罗 22, 59, 76, 92, 259, 283, 284,
370, 371, 376, 399—401, 403, 560, 566,
567, 630—632, 664, 738, 740, 764, 765,
803, 806, 813—816, 819, 825, 831, 836,

- 841, 842, 848, 850, 863
马克利西 88
马黎诺里 818, 820—822
马绍 406
马帅 468
马廷鸾 703
马墜 261
马薛里吉思 228, 740
马月合乃 361
马云 588
马札儿台 361, 390, 437, 438
马致远 683, 686, 871, 873
马子昭 503
马祖常 217, 353, 394, 422, 834, 856
玛尔巴 637
衲衲 241, 270
买奴 217, 508
买住 482
麦良 168, 675
麦朮丁 604, 808
蛮子海牙 499
忙哥 200
忙哥刺 248, 333, 734
忙哥撒儿 18, 42, 85, 179, 182, 216, 269, 606
忙哥铁木儿 419, 420
忙哥帖木儿 246, 247, 609, 624, 768
忙兀鯨 381
忙兀都鲁迷失 796, 797
忙兀台 260
毛贵 506, 508—511, 514, 556
毛晋 691
毛居敬 513
毛太公 689
毛夕里王 149
毛璋 244
茅子元 489
冒顿 2
蒙哥 85, 143, 144, 149—151, 154, 163—167, 169, 174, 178, 179, 181—183, 185—188, 190, 192, 199, 207—212, 216, 217, 223, 224, 226—228, 230, 231, 233, 236—238, 247, 255, 269, 286, 317, 340, 558, 559, 562, 567, 579, 580, 582, 605—607, 632, 641, 642, 653, 662, 665, 722, 726, 727, 730, 771, 775, 809, 812, 813, 831
蒙哥都 642
蒙力克 79
孟本周 508
孟珙 112, 159, 161—163, 255, 260
孟海马 493—495
孟甲 793
孟琪 802
孟庆元 802
孟速思 227
孟特·戈维诺 738, 739, 741

- 孟子 721
弥四郎 787
迷里忽辛 620,622
米海勒 145
密赤思老 141
密里火者 237
苗道润 220
灭古赤 201
灭里 138,183,211,562
篋年土敦 18,40,41
篋兀真笑里徒 66
明极楚俊 792
明里董阿 430
明里铁木儿 412,413,417,559
明里帖木儿 247,594,613
明理铁木儿 569
明升 521,535,536
明玉珍 507,518,520,521,536,555,556,
670,671
明昭 536
明宗 423—425,430,432—435,440,565,
752
铭移辣罗悉巴 637
缪大亨 525
谟葛失 5
谟斯塔辛 152
摩诃末 127—137,139,605
磨古斯 17,19,29
磨延啜 10,122
抹燃尽忠 105
抹土干 182,605,614
末哥 164,166,181,182,211
莫罕伦 18,19,22,23,35,39,44
莫仁寿 520,521
莫天佑 534
木八刺 425,633
木八刺沙 246,609,633
木官泰彦 791,792
木华黎 18,46—48,67,78,79,81,95,100,
103—109,114—116,131,177,180,194,
196,201,214,215,219—222,224,281,
425,434,584—586,589,869
沐英 522,671
沐仲易 686
- N
- 那罗提河波帝 795—797
那摩 224,227,579
那木罕 246,247,249,559,560,608,610,
768
纳臣 40,41
纳哈出 548,586—589
纳速刺丁 607,669,776,795
纳速刺丁·途昔 781
纳图尔 278
纳兀儿·盍禄汗 17,45,51

纳昔儿 153,154
纳牙阿 79
纳真 23,57
乃刺吾 587
乃蛮台 586,587
乃颜 174,245,250,466,560,582,585,
590,594,598,741
迺贤 447,486,691
南木合 473,559
南平王昞 96
南宋高宗 687
喃加巴藏卜 646
囊加带 477
囊加台 427,432,433,478
囊家真 247
猱虎官人 211
嚧嚧 697,822
脑忽 182,606
讷怀 607
讷刺丁 793
内哈刺那海 484
尼哥罗 813,814
倪克孙 776
倪文俊 516—518
倪瓚 336,694—696,836,843,844
昵匝马丁 476
鞑真吃刺失思 646
鞑真监藏 645,659

捏儿哥 115
捏古伯 246,247
捏古思 8,26,38,64,863
捏坤太子 44,62
聂秀卿 480
聂只儿 761,780
宁一山 411,790
宁宗 157,253,434
牛富 257
纽的该 509
纽儿杰 36
纽林的斤 618
纽璘 164
纽泽 428
女王鲁速丹 149
诺撒勒 602

O

欧南喜 467,468
欧普祥 496,519,525
欧阳玄 12,292,295,298,406,434,438,
467,563,606,629,630,698,700,707,
708,755,757,791,844

P

帕戈罗提 809
帕烈格利诺 819,820
潘昂霄 749

- 潘诚夫 550
潘阜 787
潘惟贤 503
潘元明 526,534
潘元绍 528,535
庞籍 748
裴少俊 684
裴松之 689
裴秀 749,750
彭大雅 196,197,220,269,592,731,839
彭时中 520
彭义斌 109,157,222
彭莹玉 481,488,490,495—500,543,555
彭早住 493,495,508,522
彭质 745
毗理伽忽底 606
破头潘 507,510—514
蒲寿庚 262,396,735,801,804
蒲鲜万奴 113—116,590,591
蒲择之 164
朴不花 544,545
普哈丁 731
普觉英辩 723,725
普兰诺·卡尔平尼 810
普颜 427
普颜达失 521
- Q
- 齐秉节 469
齐德之 760
齐妃 16
祁志诚 727
奇皇后 544,545
歧国公主 104
綦公直 249,611
乞觶脱因 795
乞卜察克 246
乞刺可思 154,779
乞刺失思八班藏卜 651
乞刺思八鞞真 660,661
乞刺斯八斡节儿 645
乞里歹拔都 201
乞台不花 237
乞台普济 419
乞颜 8,15,26,35,36,38,41,42,44,47,
54,58—60,62—64,66,67,70,75,453
启昔礼 71,201,208
恰纳朵儿只 641,644
钱选 696
乔吉 686
怯别 562,614,617—619,633
怯的不花 151—154,187
怯来木丁 418
怯勒·不刺 602
怯列木丁 775
怯烈 13,14,574,795
怯烈台 218

怯台 104,626
钦察 130,139—146,176,184—186,245,
385,399,413,427,429,434,453,570,
608,609,616,767—772,807,809,810,
814,821,862
秦始皇 718
秦王 231,436
青狗 113
清拙正澄 792
庆童 480
丘处机 35,134,174,191,223,226,227,
562,578,630,632,728,729
丘大老 469
丘世杰 430
丘细春 465
丘元 469,470
曲吕不花 428
曲默思 52
曲也怯律 96
屈出律 74,121,123,125,126,130,629,
632
全太后 260,338,340
全子才 160,161
全子仁 686

R

壤搽里八 638
饶一宁 543

热拉德 739,741,819
热论 23
仁宗 283,296,327,334,338,355,356,
379,385,388,390,416,417,420—426,
429,430,435,452,472,475—477,561,
565,571,583,585,614,616—618,669,
728,733,750,752,769
任仁发 335,696,755—757
任速 446
如一 197,206,375,574,725,745,783
如志 725
如智 790
阮氏三兄弟 689
软奴允丹 660
瑞兴 791

S

撒察别乞 44,56,62,66,67
撒迪 433
撒都鲁丁 777
撒敦 431,436
撒吉思 174,178
撒吉思卜华 112
撒刺丁 153
撒礼塔 116,784
撒里答 185,812
撒里黑汗 52
撒里蛮 248,468

- 撒里雅寅特斯 29
萨班 224,225,640—642,655
萨德弥实 760
萨都刺 686,691,697,839
萨仑的 632
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 640
萨尤失 627
赛典赤 228,233,241,664,669
赛典赤瞻思丁 666,678
赛甫丁 138
赛景初 686,697
赛因的斤 53
三宝奴 419—421
三旦八 498
三模合拔都 105,107
桑哥 310,391,392,404—406,409,411,
415,419,466,647,652,682,727
桑昆 71,72
桑世杰 522
僧哥速 798
沙卜赫兰 738
沙不丁 484
沙的 127,129,480,483
沙刺班 697,700
沙刘二 511,513
莎儿合秃主儿乞 42
山寿马 684
苦思丁 781
商挺 165,237,241,244,248,404
商鞅 704,850
赏竹监藏 661,662
赏竹鞏真 652,653
尚文 391,407—409,421
邵荣 522,525
邵元 792
邵宗愚 504,538
蛇节 474
舍刺甫丁 808
沈括 731,748
沈立 756
沈明仁 327,339
沈万三 336
沈仲纬 296,301
审温 812
晒赤伯颜 35
胜纳哈儿 184
圣路易(路易九世) 812
省悟 723
盛文郁 490,492,506,508,511
盛熙明 697
失儿古额秃 50
失哈不丁 127
失黑秃儿 771
失吉忽秃忽 66,84,85,105,138,173,179,
197,199,205,216,217,234,269
失烈门 180—182

- 失秃儿 428
- 施惠 685
- 施耐庵 687—689
- 石珪 108
- 石昆山 480
- 石抹明安 105,107,215
- 石抹宜孙 541
- 石天应 91,105,107,108
- 实兰朵儿只 570
- 史弼 467,470,471,802
- 史秉直 106,107,213,220,569
- 史格 462
- 史楫 211,220
- 史蒙卿 711
- 史弥远 157,242,252,253
- 史嵩之 112,159,160,252
- 史天倪 106—109,194,220,232,569
- 史天祥 108,198
- 史天泽 109,110,112,161,163,165,197,
204,205,207,219,220,232,241,243,
244,256,280,286,291,340,404,456,
462,698,855
- 史文炳 526
- 世杰班 437
- 世祖 7,18,19,23,27,40,41,46,57,88,
168,191,209,221,234,235,237,239,
245,249,260,264,270,280,282,286,
289,291,296,301,306,310,317—319,
321,327—329,333,336,341—343,349,
353,355,356,361,365,367,388,394,
396,405,411,412,414,417,421,422,
425,426,429,441,444,446,450,451,
454,456,457,459—463,465—471,487,
559,561—563,570,573,582,584—586,
598,609—611,618,643,644,650—652,
657,664,666,678,682,698,726,745,
763,768,769,772,773,780,782,801,
803—805,828,832,840,849,864,873
- 势都儿 184,250
- 释多罗伯 795
- 释迦藏卜 652
- 释嘉讷 508
- 术伯 624
- 术赤后王 413
- 朮赤 61,71,79,103,104,118,119,132,
134,136,141—143,149,152,171,174—
181,183—185,188,193,201,238,246,
248,569,582,606,607,609,623,722,
767—769,807,812
- 朮赤台 65,77,177,201
- 朮虎高琪 97,101,104
- 朮札伊 808
- 述律朵儿只 505
- 顺帝 81,292,293,295,380,388,390,397,
435—439,447,479—484,488,490,493,
503,505,509,515,544,549,556,562,

- 570,581,648,670,792,794,854,870
- 舜 264,265,420,687,706,711,713,717,
718
- 硕德 423,424,586
- 捌不罕 111,157,158
- 捌思班 478,643,644,651
- 捌思监 481,544,545
- 捌只哈撒儿 568
- 思可发 675
- 松山 137,669
- 宋道安 578
- 宋衢 406
- 宋德方 730,872
- 宋都带 461
- 宋高宗 58,251
- 宋高宗吴皇后 328
- 宋徽宗 492,684,689,721
- 宋江 687—689
- 宋君荣 822
- 宋理宗 158,159,163,252
- 宋濂 225,336,393,437,441,488,500,
503,504,542,546,550,551,553,566,
728,781,854,855,863,873
- 宋隆济 474
- 宋宁宗 101,155
- 宋神宗 92
- 宋太祖 700
- 宋文瓚 380
- 宋印简 231
- 宋子贞 111,165,199,205,208,214,217,
221,222,232,781,849
- 苏德智 504
- 苏志道 308,565,568,581
- 苏子荣 477
- 速别该 47
- 速不罕 157
- 速不台 27,48,57,61,110—112,126,130,
134,135,137,139—141,143,145—147,
167,177,211,214
- 速敦 179,428
- 速浑察 153,586
- 速客该者温 61
- 速亦客秃 62
- 宿敦 28,211
- 岁哥都 210,247,559
- 孙本立 520
- 孙德崖 493,522
- 孙恩 472
- 孙虎臣 258
- 孙立 687
- 孙履 542
- 孙胜夫 802
- 唆都 396,793,794,801,804
- 唆火脱因 168
- 唆鲁禾帖尼 175,178—181,183,228,564,
578,580,601,602,740,779

峻南罗古罗思 646

琐非复初 686

琐南藏卜 646

锁儿罕失刺 28,49,60

锁火奴 482

锁南 428

锁南鞞真 637

T

塔不台 250

塔察儿 112,159,160,165,174,237,241,
280,582,773

塔察儿(斡赤斤孙) 164

塔儿忽台 50,56,59,60,68

塔海 62,96,475

塔刺海 607,774

塔刺忽只 632

塔里马 168

塔鲁虎陞 217

塔马儿 140

塔思 116,161

塔思不花 420

塔思火儿赤 201

塔塔统阿 83,600

塔阳古 125,128

塔亦儿拔都 151

台不花 46

台出 44

台帖木儿 45

太不花 494,502,506,508,517

太平 115,231,258,333,434,456,485,
490,512,517—521,523—525,540,544,
579,686,693,698,748,804,805,862,
863,872

太阳罕 30,46,51,56,72—75,83

太宗 83,112,116,143,144,176,182,196,
198—202,207,209,211,212,218,269,
344,348,566,604,607,706,840

泰不华 501,700

泰定帝 339,424,427—431,437,442,478,
560—562,571,580,585,592,646—648,
651,669,775

谭惠 479

谭景山 480

谭汝楫 479

檀石槐 2

汤和 534—538

唐大二 482

唐其势 431,436,437

唐庆 111

唐肃宗 545

唐太宗 192,231,868

唐兀台 477

唐宪宗 703

桃机 682

陶安 523,540

- 陶宗仪 14, 369, 370, 384, 436, 448, 449, 453, 456, 485, 490, 492, 498, 526, 527, 555, 693, 695, 761, 780, 827—834, 836, 837, 843—845, 852—854, 856, 857, 862, 874
- 忒木台 201, 202
- 特薛禅 34, 68, 77, 173, 440, 583
- 天顺帝 431, 432, 434
- 天祚帝 121
- 添都虎儿 201
- 田端子 503
- 田丰 508—510, 513, 515, 544
- 田师颜 309
- 田镇海 191, 206, 208, 228, 574
- 铁连 246, 768
- 铁木迭儿 421—428, 472
- 铁木儿 311, 405, 428, 617, 625, 818
- 铁木儿不花 420, 472, 643, 660, 661
- 铁木儿塔识 577, 698, 700
- 铁木耳 250, 388
- 铁木哥 172—175, 191, 430, 431
- 铁木真 34—36, 44, 45, 49, 50, 52—54, 56, 59—76, 86, 100, 102, 177, 178, 284, 857
- 铁木真兀格 59
- 铁穆耳 410, 411, 413, 457, 561, 566, 616, 774
- 铁失 426—429
- 帖陈 775
- 帖哥 115
- 帖古迭儿 773
- 帖里干 163, 385, 572
- 帖列格秃 47
- 帖柳兀秃 201
- 帖木儿 582, 606, 620—622, 627, 628, 633, 678, 862
- 帖木儿不花 669
- 帖木儿灭里 133, 136
- 帖木儿沙 620
- 帖木格斡赤斤 250, 581
- 帖乞失 127
- 佟氏 201
- 佟锁住 455, 573
- 童远 497
- 统古与 113, 116
- 秃赤 492, 665
- 秃答 59
- 秃都儿必勒格赤斤 53
- 秃儿罕可敦 130, 131, 135, 136, 138
- 秃花 100
- 秃坚不花 669, 670
- 秃坚帖木儿 545, 570
- 秃鲁 82, 248, 483
- 秃鲁和伯 484
- 秃鲁帖木儿 544
- 秃麻 20, 21, 37, 118, 119, 328, 566, 567
- 秃满 428, 562

秃失里 499
秃秃哈 428
秃薛 211
图帖睦尔 428, 430—433, 435, 437, 456,
585
涂祐 497
屠密迟 776
屠性 542
土敦箴年 18, 23, 39, 56, 57
土罕必闾耶 802, 803
土土哈 167, 247, 248, 250, 251, 282, 559,
564, 570
屯必乃 36, 40—42, 47, 57, 59
托勒密 782
托马斯 820
拖雷 103, 104, 110, 111, 132—134, 136—
138, 143, 157, 158, 171, 174, 175, 179,
181—183, 185, 201, 210, 211, 228, 231,
236, 246, 558, 559, 564, 567, 569, 578,
601, 602, 606, 640, 740, 767, 779
脱吉思合敦 153
脱吉思帖木儿 588
脱哈帖木儿 182, 185
脱孩 821
脱忽察儿 134, 137, 138, 193
脱虎脱 418—420
脱欢 430, 431, 508, 793, 794
脱欢不花 670

脱火赤 428, 618
脱里 15, 17, 66, 126, 153, 227, 228, 578,
599, 628—632, 736—741, 779, 810, 816—
818
脱里不花 775
脱里赤 236, 237
脱列伯 545, 548
脱列哥那 150, 179, 180, 205, 228
脱列哥那皇后 150, 186, 208, 607
脱劣海迷失 52
脱鲁 621, 622, 633, 670
脱朶扯儿必 105
脱罗豁勒真伯颜 46
脱忒哈 425
脱脱 19, 53, 61, 68, 70, 73, 74, 121, 183,
385, 413, 416, 429, 430, 436—438, 472,
487, 495, 502, 512, 523, 544, 585, 586,
698, 700, 748, 758, 768, 769
脱脱不花 248
脱脱赤颜 482
脱脱蒙哥 768
脱脱木儿 247, 248, 482, 559, 564, 610
脱脱穆而 508
脱斡邻勒 14, 47, 48
脱兀脱 234
拓跋焘 3

W
瓦陈主教 147

- 瓦撒夫 178,592,601,602,608,623,624
瓦英 473
完颜安国 65
完颜陈和尚 110
完颜承裕 97,103,113
完颜纲 104
完颜合达 109—111
完颜纳丹 426
完颜奴申 112
完颜希尹 6,58
完颜襄 53,65—68
完颜珣 97
完颜晏 594
完颜雍 327
完颜众家奴 114,115
完颜子渊 116
完泽 411,414,415,421,799
完者 428,500
完者不花 481
完者都 413,414,463,464,520,612,614—
618,774
完者忽都皇后 361
万奴 113—117
万胜 521,536
万松长老 223
万松行秀 724
汪大渊 397,398,678,765,799,800,807
汪德臣 163—165
汪广洋 523
汪克宽 465,708
汪良臣 237
汪世显 162,222,640
汪同 497
汪元量 194,230,340,691,833
王瞰 783,784
王安节 259
王安石 687
王保保 544
王弼 535
王禅 429,431,586,669
王成 504,538,796
王賸 785
王大用 257
王得贞 511
王鹗 231,233,264,698,699
王佛子 498,550
王官福 479
王罕 14,17,30,34,45,47,50—54,56,61,
63,66,68—72,75,87,92,93,100,178
王好古 759,760
王和卿 686
王虎臣 257
王桓 430
王惠 672
王积翁 262,790
王穉 105—107,112,158—160,162

- 王坚 165
王结 426,683
王京 25,116,784,785
王景榆 686
王君治 790
王夔坚 162
王蒙 695,696,843
王冕 369,691,696
王穆直 162,640
王奴罗 479
王奴欧 476
王罍 420
王溥 519,525,537
王权 44,493,831
王荣祖 116
王善 198,393,496,504
王审知 327
王实甫 683
王士诚 510,511,513,544
王士熙 430,431
王士禎 686
王世昌 504
王庶 748
王思廉 421
王天賜 542
王倌 784
王通 559,715
王万十 465
王温恭 748
王文干 243
王文举 684
王文统 232,233,241,243,244,270,404,698
王仙人 468
王显忠 490,492
王小波 554
王信 547
王信二 465
王宣 547
王恂 105,406,742,743,746
王阳明 712,715
王祎 488,503,504,537,542
王沂 214,698,780,792
王英 472
王约 426,612,769,785
王恹 150,198,199,204,205,207,211,212,217,218,220,225,270,280,286,288,291,300,310,313,318,349,350,367,377,387,391,399,407,461,467,469,470,566,665,699,726,786,813,819,834,844,873
王璋 785,786
王昭君 683
王嘉 225,729,730
王珍 222
王禎 350,351,353,354,374—376,753—

- 756,762,763,837
王禛 583,784—786
王仲刚 504,538
王周 479
旺出儿监藏 645
危素 292,307,315,378,382,383,562,
566,570,586,844
危亦林 759,760
威廉 190,576,820
嵬名令公 94,96
卫绍王 94,104,172
畏答儿 64,65,77,177,200
畏兀儿台 192
畏翼 64
魏初 99,219,291,318
温(庭筠) 690
温迪罕青狗 113
文才喻 462
文天祥 259,260,262,263,266,462,841
文子方 794
文宗 81,281,282,298,323,333,334,338,
391,428,430—437,439,440,447,448,
451,456,472,478,479,561,562,571,
574,577,585,586,646,648,653,733,
752,767,771,775,853,862
瓮吉姆 470
窝阔台 61,63,85,103,104,110—112,
116,132—134,136,138,142—144,147—
150,159,161,163,171,172,174—176,
179—183,185—190,192—196,198—
200,202,204,207,208,211,213,214,
216—221,224,228,229,237,246,269,
286,309,314,321,323,340,343,384,
386,412,559,562—564,566,569,571—
574,578—580,592,593,599,602,604—
607,609—611,613—615,620,623,624,
640,722,732,768,770,777,779,784,
807,809,834,840,867
斡赤斤 79,104,110,116,142,172—175,
179,180,184,191,192,201,204,559,
560,568,569,581,582,584,585,589,783
斡儿都海牙 773
斡歌来 62
斡根赤 606
斡黑答 47
斡列别克的斤 118
斡鲁不 218
斡鲁答 143,180,185,767,769
斡罗思亦难 118
斡勤巴儿合黑 42,53,101
斡思蛮汗 125
斡兀立 627
斡兀立海迷失 181,182,205,812
斡悉弄 635
斡玉伦徒 697,700
斡匝儿 123

- 乌巴都刺 620
乌古孙良桢 292
乌刺赤 185
乌马儿 136,392,632
乌马里 412,619,633,770,807
乌玛利 176,180,184
吾也而 116,215
吴邦 503
吴秉道 430
吴澄 198,308,321,328,393,402,426,
489,707,708,710,711,729
吴道子 697
吴法受 463
吴宏 519,525
吴鉴 601,724,732,735,808
吴林 468
吴满 465
吴潜 255
吴全节 716,729,730,750
吴提刑 467
吴天保 483
吴兴 276,375,468,695,696
吴用 689
吴友仁 521,536
吴元珪 426
吴镇 695,696
吴直方 437
五世达赖 640,655
武祺 487
武松 687,689
武宰相 515
武宗 272,274,291,295,296,306,310,
325,329,344,355,357,365,385,390,
414,416—424,429,430,435,451,452,
489,562,564—566,568—570,575,585,
613,614,630,644,647,648,650,669,
683,697,725,736,750,769,775
兀浑察 611,612
兀刺黑·兀都儿 56
兀良合台 145,166—170,663—666,792
兀鲁斛 815
兀鲁带 572
兀鲁忽乃 183,188,238,606—609
兀鲁思不花 428
兀孙 74,86
兀颜拔鲁欢 482
兀咱儿撒里马 805

X
西璧氏 94
西门豹 721
西门庆 689
昔班 143,146,181,559
昔黑纳黑的斤 123
昔里吉 237,247—249,558,559,563,575,
610,768

- 悉利因达提帝牙 799
- 夏贵 256,258,261,461
- 夏侯尚玄 562,570
- 夏神宗 94
- 夏文泳 730
- 夏献宗德旺 96
- 夏襄宗安全 94
- 鲜于枢 696,855
- 咸得不 215,216
- 线真 241
- 宪宗 83,85,143,163,168,178,181,182,
208—212,218—220,224,230,231,235—
237,243,269,286,340,344,346,348,
512,606,607,630,632,641
- 相家班 645
- 相吾答儿 795
- 香山 821
- 想昆必勒格 41,57,58
- 向士璧 166,255
- 向思永 504
- 项普略 496,498,555
- 萧爨 421
- 萧拜住 422—424
- 萧抱珍 225
- 萧辅道 226
- 萧挾凛 12,16,19
- 萧永祺 699
- 萧札刺 117
- 小明王 506,515,516,525,529,531,532,
541,543,693
- 小薛 334
- 肖君端 759
- 肖乃台 109,202,218
- 斜温 201
- 偃哲笃 487
- 谢翱 716
- 谢昌元 407
- 谢发 473
- 谢方叔 254
- 谢太后(理宗后) 258
- 谢五十 461
- 谢宪子 707
- 谢以文 538
- 谢应芳 498,550,719—721,845
- 谢再兴 532,533
- 辛札儿 124,127,128
- 忻都 454,788—790,799
- 新李 480
- 信合八的 796
- 兴宗 521
- 星吉 390,498,499,856
- 行丑儿 201
- 雄辩 446,724
- 熊良辅 708
- 熊天瑞 519
- 徐达 518,522,534,546—548

徐大焯 277
徐明达 496
徐寿辉 495, 497—500, 503, 507, 517—
520, 523—525, 528, 530
徐霆 197, 204, 731, 840
徐相 468
徐琰 225, 406, 408
徐一夔 371, 400, 527
徐义 535
徐元瑞 207, 854
许大 475
许夫人 262, 461, 463
许国桢 759
许衡 232, 240, 311, 690, 707—710, 712—
714, 716, 742
许谦 107, 707, 712
许脱因 505
许有壬 14, 191, 203, 216, 272, 309, 343,
438, 442, 559, 563, 566, 570, 574, 579,
732, 803, 810, 855, 863
许元 542
旭烈兀 150—154, 178, 183, 186—188,
209, 211, 237, 288, 607, 608, 767, 768,
771—776, 778, 814
旭迈杰 428
续继祖 510, 511
玄鉴 724
薛超兀儿 797

薛彻干 250
薛阁干 585
薛军胜 243
薛奎 748
薛尼台铁木察 614
薛塔刺海 91
薛元鼎 749
雪村永梅 792
雪你台 142
雪雪 502, 544, 678
雪岩祖钦 724
荀子 721

Y

鸦儿 114, 610, 814
牙罕沙 499
牙忽都 19, 417, 769
牙刺瓦赤 129, 139, 187, 195, 206, 211,
216—218, 228, 235, 602—604, 607, 623,
633
牙纳失里 586
牙撒兀儿 617, 620
雅罗思老 145, 146, 811
严实 108, 109, 165, 196, 198, 214, 217—
221, 226, 229, 232
严忠范 243, 244
阎复 28, 100, 247, 248, 410, 603, 709, 786,
870

- 阎思孝 510
颜浩 480
宴只吉带 85,182
燕不花 821
燕铁木儿 333,334,391,429—436,440
燕帖古思 435
燕只吉台 619,620
杨安儿 99,241
杨宝 671
杨朝英 686
杨诚 510
杨大渊 164
杨朵儿只 422—424
杨妃 264
杨恭懿 743
杨果 241
杨璟 536,538,540
杨静 432,433
杨璉真伽 723
杨璉真加 339
杨么 554
杨妙真 99,222,241,242
杨讷 275,488,490,684
杨仁风 406
杨三合 367
杨氏 397,492,853
杨庭璧 805
杨完者 525,533
杨惟中 163,165,232,705—707
杨维楨 394,400,533,691,846
杨沃衍 111
杨贤 588
杨显之 592,830,858,871,873
杨宪 524,526
杨秀 798
杨衙内 682
杨炎 704
杨元六 471
杨载 691
杨镇龙 470
杨志 687
杨忠辅 747
杨梓 686
杨宗瑞 698
仰吉 600,613,614,619
尧 264,265,420,687,706,711,713,717,
718
姚里氏 114
姚枢 163,167,169,217,227,232,233,
241,343,344,404,406,705—707
姚燧 85,163,164,168,208,213,216,218,
274,279,307,341,344,349,373,400,
457,460,462,464,468,561,589,727,
779,785,870
姚桐寿 533,686
姚嵩 259

- 姚仲实 392
咬住 495,498
药木忽儿 247,248,251
要不忽儿 772
要束谋 425
耶的 113
耶律阿保机 11,12,121,591
耶律阿海 71,75,100,102,115,134,602,
625
耶律楚材 98,102,111,112,124,134,179,
194—200,202—205,208,214,216—218,
223,227,229,269,309,579,602,690,
705,781,838
耶律大石 13,27,121,123—125,629
耶律固 699
耶律留哥 97,100,112—114,116,590
耶律撒八 590
耶律绍文 699
耶律速撒 16,19
耶律挞不也 17
耶律秃花 215
耶律窝斡 100,590
耶律斡特剌 19
耶律俨 698
耶律铸 157,241,698,833,867
耶厮不 113,114
也不干 617,620
也儿吉尼 538
也该晃脱合儿 47
也罕的斤 611,795
也客扯连 71
也苦 174,211
也里愷 560
也力可合刺 52
也立安敦 122
也列门合散 614
也速 508,513,587
也速不花 201
也速儿 163
也速该 17,42,53,54,59,60,62,92,177,
178
也速干合敦 172
也速仑合敦 172
也速伦 605
也速蒙哥 180,182,183,188,605—607
也速台儿 463
也速兀儿 201
也孙铁木儿 427,428,477,561,562,592,
620,807
也孙脱 182
也先不花 14,269,587,614—618,621
也先忽都儿 512
也先帖木儿 428,432,494,495,499,669,
670,796
也只里 560,568
野牒亦纳里 118

- 野里知吉带 85,180,182,812
野仙溥花 586,587
叶丙六 463
叶琛 542
叶德新 533
叶兑 534
叶李 409
叶廷秀 588
叶仙鼎 167,168,648,649
叶子奇 272,280,282,300,301,307,383,
442,491,492,503,517,521,542,692,
825,826,828,839,840,860,861,869,870
伊本·拔图塔 770,803,806—808,819
伊本瓦哈卜 731
伊利阿儿思兰 127
伊万 140
移刺楚材 269
移刺都 113
移刺捏儿 100
移刺蒲阿 110,111
移相哥 84,163,164,173,237,238,568
亦黑迷失 801,802
亦刺合·桑昆 71,93,96
亦勒迭吉思 139
亦力哥帖木儿 118
亦力撒合 85,279
亦怜真 495,645,774
亦列失八 425
亦邻真臧卜 598
亦难赤汗 45,52,54,55
亦难出 130,132
亦乞里带 342
亦摄思连真 645
亦朮丁 149
亦思马因 150,151,153,364,763
亦孙哥 163
奕喜 258
益王 261,262,508
懿璘质班 435,471
殷弘 786,787
银住 684
尹志平 226,578,728,730
英诺森四世 84,779,811,812
英宗 87,295,296,324,328,416,422—
430,476,478,562,570,571,573,585,
646,651,657,669,752,862
于光 519,525
余宝 509,510
余古赧 17
余玠 163,252,254
余阙 350,357,394,447,486,497,500,
518,528,541,549,700
余嵘 155
俞茂 497
俞思齐 527
俞廷玉 499,517,522

- 俞通海 499,522
- 虞集 12,197,242,249,278,282,298,308,
309,350,401,413,466,561,563,565,
568,574,577,579,581,610,617,618,
691,695,712,727—730,785,791,832,
834,842,855
- 虞应龙 748
- 禹 265,615,617,618,750,751
- 玉冈蒙润 725
- 玉里吉 141,143,144
- 玉龙答失 237,559,567
- 玉鲁 367
- 玉伦亦撒 249
- 玉素甫·坎哈 129,206
- 玉昔帖木儿 250,251,408,410,411
- 愈元瑞 551
- 元成宗 347,411,413,416,439,457,464,
472,562,580,612,613,616,660,684,
734,748,769,774,775,790,794,796—
798,818
- 元好问 99,108,190,196,198,218,220,
221,226,699
- 元昊 91,92
- 元明善 102,103,158,247,472,559,565,
610,613,615,625,786,853
- 元宁宗 471
- 元仁宗 311,338,422,423,446,458,475—
477,489,615—618,698,769,775
- 元世祖 257,260,272,283,327,333,338,
349,353,377,390,409,471,474,512,
608,609,641,644,658,698,745,748,
749,751,755
- 元顺帝 338,347,355,361,433,435—437,
441,448,451,480,482,487,494,498,
501,502,505,509,512,517,527,528,
530,537,544,545,547,548,570,580,
581,587,588,594,646,659,661,671,
698,739,769,806,807,821,822
-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 409,435,440,479
- 元太宗 83,602,604,605,706
- 元太祖 103,265,590
- 元泰定帝 807
- 元文宗 347,428,433—435,439,456,478,
479,577,782,853
- 元武宗 420,422,423,441,475,489,769,
775,862
- 元英宗 471,477
- 元芝庵 686
- 袁宝 543
- 袁楠 180,311,328,333,337,414,427,
699,712,727,730,774,775,791,794,
841,865
- 圆明和尚 477
- 约翰长老 738
- 月即别 616,769
- 月即别汗 185,616,770

- 月即伯 139
月阔察儿 502
月里麻思 162
月鲁 428,769
月鲁帖木儿 431,495,586
月禄帖木儿 481
月伦 54,60,64,66,173,177,183,569,857
岳德文 727—729
岳邻帖穆尔传 121,606
岳铉 272,748
允丹 635
允丹藏卜 561
郅国公主 201
愠里答儿薛禅 201
- Z
- 臧懋循 681
曾粹中 520
曾万中 520
札八儿火者 72,105,206,215,216
札儿赤兀歹 61
札尔楚泰 590
札刺 12,13,17—19,21—23,28,33,35,
36,42,44,46—48,56,57,61,67,78,106,
116,164,201,281,453,569,586,604,
621,634
札刺儿台 784
札兰丁 129—131,135,136,138,139,
147—149
札马刺·合儿昔 634
札马刺丁 359,781
札木合 52,54—56,61,63,64,69—75,79,
86,178
粘合南合 241
粘合重山 216,269
粘阔 247
詹云卿 376
瞻思 697,755,756
张本仁 530
张必先 518
张弼 423
张昶 541
张丑 696
张椿 493
张从正 759
张大老 472
张道陵 729
张德辉 191,231,233,574
张德胜 522
张德兴 261,262,462
张定边 519,532
张飞 465
张辅 511
张耕 234
张公礼 745
张珪 282,315,338,426,427,466,478,

- 651,855,856
张贵 256,257
张弘范 232,256,257,263
张弘略 463
张宏 221,222,243,244
张虎 462
张虎山 503
张角 472
张鲸 105
张珏 261,262
张开 108
张可大 728
张可久 686
张良弼 536,544,545,548
张林 108,109,222
张留孙 578,727—730,750
张驴 421
张明鉴 508,525
张启元 241
张起岩 221,222,421,585,698
张倩女 684
张清志 729
张荣 91,109,219,221,222
张荣实 243
张柔 107,161,163,219,220,232,259,699
张三八 462
张生 683
张胜 166
张士诚 364,395,500—503,512,515,519,
524—537,540,541,543,546,688,757,
845
张士德 524,526
张士信 528,532,533,535
张世杰 256,257,259,262—264,461,464
张顺 256,257
张思道 549
张思佑 523
张天骥 534
张天师 337,339,728
张庭珍 333
张温 535
张文炳 521,536
张文谦 163,165,167,169,205,227,231,
234,235,241,342,708,743
张文盛 392
张武义 469
张禧 788,789
张雄飞 340,406
张瑄 327,380—382,384,387,397,415
张养浩 439,455,573,686
张易 244
张与材 728
张雨 691
张昱 629,830
张元素 759
张桢 442,488,549

- 张之翰 392
张志雄 519
张致 105,107,114,115,215
张翥 560,581
张宗演 727—729
章伯颜 480
章吉驸马 649
章闰 356
章台 428
章焱 462
章溢 542
章自福 423
章宗 97,98,102,284
赵阿哥昌 640,650
赵贯亨 462,463
赵璧 163,165,231,241,270
赵秉温 168
赵昂 262—264,492
赵炳 248
赵冲 116,590
赵丑厮 478
赵璠 262
赵复 706,707,711
赵珙 6,35,76,831
赵国宝 649,650
赵国公主 201
赵和尚 468
赵吉甫 259
赵君用 493,495,508,510
赵葵 160
赵良弼 244,787
赵良鈜 467
赵良嗣 6
赵卯 258
赵孟頫 786,791,792,843,870
赵明达 506
赵沔 335,708
赵普胜 496,498—500,517—519,523,
524,540
赵祺 252
赵仁 309
赵汝适 397
赵世荣 425
赵世延 298,424,855
赵昱 261—263
赵淑 551
赵天麟 333
赵同知 476
赵王永中 97
赵偕 707
赵彦呐 162
赵翼 439,698—700
赵尹甫 259
赵玉 801
赵昫 252
赵子昂 695

- 折儿瓦台 247
折米思拔都儿 201
哲别 70,103,104,126,130,134,135,137,
139—141,177,629
者勒蔑 177,590
者台 62
真宝 483
真德秀 100,155,156,159—161,252
真金 211,233,236,310,405—410,559,
561,566,578,579,727
真觉文才 725
真铁木儿 602
真帖木儿 149,150,186
镇海 150,181,182,191,192,202,216,
269,343,566,574,791,811
郑鼎 167,168,261,350
郑光祖 683,684,863,873
郑和 765,766
郑介夫 279,292,294,295,439
郑梦周 293
郑清之 252
郑士范 713
郑思肖 826
郑损 157,158
郑王永蹈 97
郑玉 274,282,707,709,711
郑元祐 272,724,843
郑子箕 481
芝麻李 493—495,502,521,693
知三世 638
直鲁古 125,126
只必帖木儿 278
志费尼 12,120,121,125,129,130,150,
174,176,384,563,602,603,607,623,
632,640,777,840,849,866,867
秩虫 23
中峰明本 724
钟大老 468
钟大明 480
钟明亮 469,470,649
钟嗣成 681,683,858,863,873
钟相 554
钟召二 465
种思端 636
众家奴 115
重八 521
周伯琦 394,402,821,822,825,834,861,
867
周伯颜 496,504
周成 513
周德兴 522,536,538
周公 252,503,858
周朗 822
周隆 462
周密 687,716,732
周仁 526,527,535

- 周天觉 503
周王和世球 431—433
周文英 757
周兴 521
周子旺 481,490,497
朱德润 307,391,576,647
朱光卿 480,481
朱焕 261
朱亮祖 535,537,538
朱清 327,380—382,384,387,397,415
朱权 681,685
朱三十五 469
朱升 541
朱思本 457,458,565,749—751
朱文逊 524
朱文正 522,531
朱熹 311,706—708,710—712,714,716,
857
朱英 526
朱元璋 442,448,493,495,499,515—543,
546—553,555—557,694
朱震亨 759,760
诸葛亮 690,708
竹温台 49,572
竹贞 514,545
竺仙梵仙 792
主卜罕 155
祝阿里沙忙里八的 805
祝朝奉 689
祝允明 244,685
爪都 237
庄季裕 490
拙赤汗 62
拙赤合撒儿 163,172,173
宗浩 67,68
宗鉴 489
邹裒 796
邹普胜 495,496,518
邹兴 521
祖冲之 747
遵頊 94,95
左君弼 499,515,517,547

引用书目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四卷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列宁:《国家与革命》 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
《列宁全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
《毛泽东选集》 第一至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 《北史》 中华书局点校本
《隋书》 中华书局点校本
《旧唐书》 中华书局点校本
《新唐书》 中华书局点校本
《五代史》 中华书局点校本
《宋史》 中华书局点校本
《辽史》 中华书局点校本
《金史》 中华书局点校本
《元史》 中华书局点校本
《明史》 中华书局点校本
- 叶隆礼:《契丹国志》 嘉庆扫叶山房本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 国学基本丛书本
傅维麟:《明书》 丛书集成本
司马光:《资治通鉴》 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光绪七年辛巳浙江书局校刻本

- 《明实录》 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
谈迁：《国榷》 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八年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海天书店，一九三九年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 国学基本丛书本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 国学基本丛书本
吕毖：《明朝小史》 玄览堂丛书本
洪皓：《松漠纪闻》 辽海丛书本
《元朝秘史》 四部丛刊三编本
《圣武亲征录》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孟珙：《黑鞑事略》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权衡：《庚申外史》 学津讨原本
刘侗：《北巡私记》 云窗丛刻本
高岱：《鸿猷录》 纪录汇编本
《国初礼贤录》 纪录汇编本
吴宽：《平吴录》 纪录汇编本
刘辰：《国初事迹》 金声玉振集本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 适园丛书本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 光绪十年浙江书局刊本
《历代名臣奏议》 崇祯八年张溥删正本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 中华书局影印本
郑士范：《许鲁斋先生年谱》 正谊堂藏书本
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 明成化刊本
郑麟趾：《高丽史》 一九五七至五八年朝鲜铅印本
杨学可：《明氏实录》 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本
杨慎：《南诏野史》 光绪庚辰云南书局刊本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 道光间修补本
《大明一统志》 天顺五年经厂本

- 《寰宇通志》 玄览堂丛书续集本
罗洪先:《广輿图》 明刊本
《畿辅通志》 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钦定热河志》 辽海丛书本
《辽东志》 辽海丛书本
《盛京通志》 乾隆元年修,咸丰元年校补本
《吉林通志》 光绪十七年刊本
于钦:《齐乘》 乾隆四十六年刊本
《济南府志》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济宁直隶州志》 民国铅印本
《重修临清县志》 民国铅印本
《江苏通志稿》 民国三十四年稿本
《至顺镇江志》 咸丰九年刻本
《至正金陵新志》 至正四年刻、明修补本
《苏州府志》 乾隆十三年刊本
《昆山郡志》 太仓旧志五种本
《太仓州志》 太仓旧志五种本
《昆新两县合志》 乾隆十六年刊本
《常昭合志稿》 光绪三十年活字本
《徽州府志》 嘉靖四十三年刊本
《延祐四明志》 宋元四明六志本
《大德昌国州图志》 宋元四明六志本
《至正四明续志》 宋元四明六志本
《至元嘉禾志》 道光十九年刊本
《泉州府志》 光绪八年重刊本
《邵武府志》 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嘉靖刊本
《漳州府志》 嘉庆十一年补刻本
《湖南通志》 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 查慎行：《西江志》
康熙五十九年刊本
- 《建昌府志》
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正德刊本
- 《瑞州府志》
正德十年刊本
- 《赣州府志》
乾隆四十七年刊本
- 《南丰县志》
嘉靖十六年补修本
- 《广东通志》
雍正九年修，刊本
- 《钦州志》
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嘉靖刊本
- 《云南图经志书》
传钞本
- 《云南通志稿》
道光十五年刊本
- 《新纂云南通志》
民国三十八年刊本
- 《蛮书校注》
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
-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
-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说郛本
- 汪大渊：《岛夷志略》
雪堂丛刻本
- 《百夷传》（附《云南志略》）
江应梁校注本，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 魏焕：《皇明九边考》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
-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
中华书局点校本
-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辽海丛书本
- 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
辽海丛书本
- 曹廷杰：《西伯利东偏纪要》
辽海丛书本
- 王士点：《秘书监志》
广仓学窘丛书本
- 杜佑：《通典》
万有文库本
- 《唐律疏议》
四部丛刊三编本
- 《大唐六典》
日本帝国大学影印本
- 王溥：《唐会要》
国学基本丛书本
- 《宋会要辑稿》
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本
- 马端临：《文献通考》
万有文库本
- 《大元圣政国朝典章》
台湾景印元本

- 《通制条格》(残本) 国立北平图书馆影印本
《大元马政记》 广仓学窘丛书本
《大元仓库记》 广仓学窘丛书本
《庙学典礼》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吏学指南》 台湾大华印书馆本
《华夷译语》 涵芬楼秘笈本
《续文献通考》 万有文库本
焦竑:《国史经籍志》 明曼山馆刊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中华书局影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中华书局排印本
《陇右金石录》 甘肃文献征集委员会刻本,一九四三年
《满洲金石志》 满日文化协会刊本,一九三七年
《和林金石录》 灵鹫阁丛书本
赵岷:《石墨镌华》 清刊本
《陕西金石志》 续修陕西通志馆刊本
《江苏金石志》 民国丁卯年江苏通志局影印本
《山右石刻丛编》 光绪辛丑年刊本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 科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赵翼:《廿二史札记》 中华书局,一九六三年
赵翼:《陔余丛考》 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
章学诚:《文史通义》 大学丛书本
许谦:《读四书丛说》 四部丛刊续编本
谢应芳:《辨惑编》 守山阁丛书本
丘浚:《大学衍义补》 明刊本
黄宗羲:《宋元学案》 国学基本丛书本
王桢:《农书》 万有文库本
《农桑辑要》 万有文库本
任仁发:《浙西水利议答录》 浙西水利全书本

- 瞻思：《河防通议》 守山阁丛书本
- 萨理弥实：《瑞竹堂经验良方》 当归草堂医学丛书本
- 张丑：《清河书画舫》 乾隆戊寅年刻本
- 汤昼：《画鉴》 说郭本
- 陶宗仪：《书史会要》 影刊明洪武九年本
- 《事林广记》 中华书局影印本
- 《永乐大典》〈残卷〉 中华书局影印本
- 王定保：《唐摭言》 丛书集成本
- 庄绰：《鸡肋编》 丛书集成本
- 朱彧：《萍州可谈》 丛书集成本
-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 津逮秘书本
- 李翀：《日闻录》 丛书集成初编本
-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 知不足斋丛书本
- 徐大焯：《烬余录》 清刊本
- 叶子奇：《草木子》 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
- 刘埙：《隐居通议》 丛书集成初编本
-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
- 长谷真逸：《农田余话》 宝颜堂秘笈本
- 杨瑀：《山居新话》 知不足斋丛书本
- 孔齐：《至正直记》 续粤雅堂丛书本
- 祝允明：《猥谈》 续说郭本
- 郎瑛：《七修类稿》 中华书局点校本
- 何乔远：《名山藏》 明刊本
- 黄省曾：《吴风录》 学海类编本
- 金继登：《皇明典故纪闻》 明万历刻本
- 黄涛：《闲中今古录》摘抄 纪录汇编本
- 姚福：《青溪暇笔》摘抄 纪录汇编本
- 陆琛：《续停驂录》摘抄 纪录汇编本

- 志磐：《佛祖统记》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
《至元辩伪录》
果满：《庐山复教集》
普度：《庐山莲宗宝鉴》
中峰明本：《天目中峰和尚广录》
《甘水仙源录》
《汉天师家传》
真德秀：《真西山集》
刘克庄：《刘后村集》
郑所南：《心史》
谢枋得：《叠山集》
林景熙：《霁山集》
汪元量：《湖山类稿》
元好问：《遗山集》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
郝经：《陵川集》
张养浩：《归田类稿》
王义山：《稼村类稿》
方回：《桐江续集》
张伯淳：《养蒙集》
陆文圭：《墙东类稿》
刘埙：《水云村吟稿》
胡紫迳：《紫山大全集》
任士林：《松乡集》
赵孟頫：《松雪斋集》
吴澄：《吴文正公集》
邓牧：《伯牙琴》
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民国十五年先照刊本
影元抄本
影续藏本
光绪辛巳年姑苏刻经处刊本
道藏本
续道藏本
四部丛刊初编本
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虞罗氏心井庵钞本
四部丛刊续编本
知不足斋丛书本
武林往哲遗著本
四部丛刊初编本
四部丛刊初编本
乾隆三年高邮王氏刻本
乾隆十五年周氏刻本
四库珍本初集本
四库珍本初集本
台湾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
常州先哲遗书本
道光爱余堂刻本
三怡堂丛书本
清抄本
四部丛刊初编本
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中华书局，一九六〇年

- 杨奂：《还山遗稿》 适园丛书本
许衡：《许文正公遗书》 清乾隆五十五年刊本
刘因：《静修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魏初：《青崖集》 四部珍本初集本
刘将孙：《养吾斋集》 四库珍本初集本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 知服斋丛书本
许谦：《白云集》 四部丛刊续编本
安熙：《默庵集》 畿辅丛书本
王恽：《秋涧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姚燧：《牧庵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程钜夫：《雪楼集》 湖北先正遗书本
陈宜甫：《秋岩诗集》 四库珍本初集本
袁桷：《清容居士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刘岳申：《申斋集》 台湾元代文集珍本汇刊本
张之翰：《西岩集》 四库珍本初集本
刘敏中：《中庵集》 元刻本
马祖常：《石田集》 元四大家集本
虞集：《道园学古录》 四部丛刊初编本
揭傒斯：《揭傒斯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王沂：《伊滨集》 四库珍本初集本
黄潜：《黄金华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欧阳玄：《圭斋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柳贯：《柳待制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许有壬：《圭塘小稿》 三怡堂丛书本
许有壬：《至正集》 宣统刻本
吴师道：《吴礼部集》 清抄本
傅汝金：《傅与砺诗文集》 嘉业堂丛书本
李存：《李仲公集》 明刊本

- 苏天爵：《滋溪文稿》
余阙：《青阳集》
周伯琦：《近光集》
张翥：《张蜕庵诗集》
邵亨贞：《野处集》
迺贤：《金台集》
贡师泰：《玩斋集》
刘仁本：《羽庭集》
陈高：《不系舟渔集》
郑元佑：《侨吴集》
郑玉：《师山集》
舒頔：《贞素斋集》
谢应芳：《龟巢稿》
周霆震：《石初集》
王逢：《梧溪集》
戴良：《九灵山房集》
李祁：《云阳集》
扬翮：《佩玉斋类稿》
倪瓒：《清閼阁全集》
王礼：《麟原文集》
汪克宽：《环谷集》
赵沔：《东山存稿》
杨维桢：《铁崖古乐府》
陈基：《夷白斋稿》
张昱：《张光弼诗集》
朱德润：《存复斋集》
朱思本：《贞一斋诗文稿》
顾瑛：《玉山璞稿》
适园丛书本
四部丛刊续编本
淡生堂祁氏抄本
四部丛刊续编本
四库珍本初集本
元人十种诗本
明刊本
乾坤正气集本
敬乡楼丛书本
台湾元代文集珍本汇刊本
道光善道堂修补本
明刊本
四部丛刊三编本
豫章丛书本
知不足斋丛书本
四部丛刊初编本
明刊本
四库珍本初集本
台湾元代珍本文集汇刊本
四库珍本初集本
清刊本
康熙刊本
四部丛刊初编本
四部丛刊三编本
四部丛刊续编本
四部丛刊续编本
宛委别藏本
读画斋丛书本

- 梁寅：《石门集》 光绪十五年刻本
- 宋濂：《宋学士文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 四部备要本
- 刘基：《诚意伯文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 陶安：《陶文宪公全集》 道光洗月轩刊本
- 危素：《危太朴集》 嘉业堂刻本
- 王祚：《王忠文公集》 退补斋刊本
- 林弼：《林登州集》 明刊本
- 张羽：《静居集》 豫章丛书本
- 王冕：《竹斋诗集》 徐民丛书本
- 胡翰：《胡仲子集》 金华丛书本
- 苏伯衡：《苏平仲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 徐一夔：《始丰稿》 武林往哲遗著本
- 孙作：《沧螺集》 元四大家集
- 解缙：《解学士全集》 康熙五十七年刊本
- 王阳明：《王文成公全集》 涵芬楼影印本
- 李贽：《焚书》 中华书局，一九六一年
- 苏天爵：《国朝文类》（即《元文类》） 四部丛刊初编本
- 《皇元风雅》 四部丛刊初编本
- 顾嗣立：《元诗选》 嘉庆中补刻本
- 臧晋叔：《元曲选》 四部备要本
- 《录鬼簿》 古典文学出版社点校本
- 魏良辅：《南词引正》 真迹目录二集本
- 王国维：《观堂集林》 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
-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
- 《续藏史鉴》 刘立千汉译本，成都，一九四五年
- 弗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 刘荣焌汉译本，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 《多桑蒙古史》 冯承钧汉译本，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

韩儒林:《穹庐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 Том 1—3,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46—1960. (《史集》卷一——三, 莫斯科、列宁格勒, 一九四六——一九六〇年)

Б. Д. Греков, А. Ю. Якубовский, Золотая Орода и Её Падение,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0. (格列柯夫、雅库鲍夫斯基:《金帐汗国及其灭亡》, 莫斯科、列宁格勒, 一九五〇年)

С. В. Киселев, Древнемонгольские Города, Москва, 1965. (吉谢列夫:《古代蒙古城市》, 莫斯科, 一九六五年)

Juvain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 by J. A. Boyle, Manchester, 1958.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波义耳英译本, 曼彻斯特, 一九五八年)

Rashid al-Din,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tr. by J. A. Boyle, New York, 1971. (拉施都丁:《成吉思汗的继承者》, 波义耳英译本, 纽约, 一九七一年)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tr. & ad. by W. W. Rockhill, London, 1900. (《威廉·鲁卜鲁克东游记》, 柔克义编译, 伦敦, 一九〇〇年)

The Mongol Missions, tr. & ad. by C. Dawson, London, 1955. (道森编译:《出使蒙古记》, 伦敦, 一九五五年)

Nasawi, Histoire du Sultan Djela ed-Din Mankobirti, tr. par O. Houdas, Paris, 1891—1895. (奈撒微:《札兰丁传》, 胡达斯法译本, 巴黎,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年)

The Monks of Hüblai Khân, tr. by W. Budge, London, 1928. (《忽必烈的僧人》, 巴齐英译本, 伦敦, 一九二八年)

Abul-Ghāzi, Histoire des Mongols et des Tatars, tr. par Le Barou Desmaisons, St. Pétersbourg, 1874. (阿布·嘎齐:《突厥世系》, 戴美桑法译本, 圣彼得堡, 一八七四年)

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 Al-Umaris Darstellung der mongolischen Reiche in Seinem Werk Masālik al-absār fi mamālik al-amsār, Paraphrase und Kommentar von K. Lech, Wiesbaden, 1968. (《蒙古世界帝国, 乌马利在〈眼历诸国行纪〉一书中叙述的蒙古国家》, 莱赫译注, 威斯巴登, 一九六八年)

Juzjani,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uhamadan Dynasties of Asia*, tr. by H. G. Raverty, London, 1881. (朮札尼:《亚洲诸回教王朝通史》,雷弗提英译本,伦敦,一八八一年)

Hudūd al-Ālam, tr. & ed. by V. Minorsky, London, 1937. (《世界境域志》,米诺尔斯基英译本,伦敦,一九三七年)

G.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Roma, 1949. (杜齐:《西藏画卷》,罗马,一九四九年)

gZhon-nu-dpal, Deb-ther sngon-po, *The Blue Annals*, tr. by G. N. Roerich, Calcutta, 1949—1953. (童祥:《青册》,列里赫英译本,加尔各答,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 by A. C. Moule & P. Pelliot, London, 1938. (《马可波罗行纪》,穆勒、伯希和英译本,伦敦,一九三八年)

P. Pelliot et L. Hambis, *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 Cheng-wu Ts' in-Tcheng lou*, Leiden, 1951. (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莱顿,一九五一年)

P. Pelliot, *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e*, Paris, 1960. (伯希和:《卡尔玛克史评注》,巴黎,一九六〇年)

P. Pelliot,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Paris, 1933. (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巴黎,一九三三年)

P. Pelliot, *Notes sur l'histoire de la horde d'or*, Paris, 1949. (伯希和:《金帐汗国史评注》,巴黎,一九四九年)

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1973. (伯希和:《马可波罗注》,巴黎,一九七三年)

W. Barthold, *Turkstand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London, 1928. (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代的突厥斯坦》,伦敦,一九二八年)

V. A. Riazanovsky, *Customary law of the Mongol Tribes*, Harbin, 1929. (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哈尔滨,一九二九年)

René Grousset, *L'empire des steppes*, Paris, 1964. (格鲁赛:《草原帝国》,巴黎,一九六四年)

L. Hambis, *Le Chapitre CVIII du Yuan Che*, Leiden, 1954. (韩百诗:《元史诸王表评注》,莱顿,一九五四年)

H. F. Schurmann, *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üan Dynasty*, Harvard Uni. Press, 1956. (舒尔曼:《元代经济制度》,哈佛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

Ch' i-Ch' ing Hsiao,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Harvard Uni. Press, 1978. (萧启庆:《元代军事制度》, 哈佛大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

B. Spuler, *Die Golden Horder: Die Mongolen in Russia, 1223—1502*, Leipzig, 1965. (施普勒:《金帐汗国史》, 莱比锡, 一九六五年)

J. A. Boyle, *The Mongol World Empire*, London, 1973. (波义耳:《蒙古世界帝国》, 伦敦, 一九七三年)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iden, 1913—1934. (《伊斯兰百科全书》, 莱顿, 一九一三——一九三四年)

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 东京, 1906

稻葉正就、佐藤长共译:フウラン・テ プテル——チベット年代记(公哥朵儿只《红册》, 日译本), 京都, 1964

箭内互:《蒙古史研究》, 东京, 1930

安部健夫:《西ウイグル国史の研究》(《西畏兀儿国史研究》), 东京, 1958

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の研究》, 东京, 1954

前田直典:《元朝史の研究》, 东京大学出版社, 1973

那木南道尔吉:《关于蒙哥汗石碑和宫殿的发现》, 乌兰巴托, 1956



人·民·文·庫
人文科学·撰著

ISBN 978-7-01-005694-4



9 787010 056944 >

定价(上下册): 116.00元